



苏联共产党 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

兼析苏共基层党组织建设与苏联解体关系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imary Party
Organizations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李 燕 / 著



国家社科基金

GUOJIA SHEKE JIJIN HOUQI ZIZHU XIANGMU

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5097-7986-6



9 787509 779866 >

定价: 128.00 元



苏联共产党 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

兼析苏共基层党组织建设与苏联解体关系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imary Party
Organizations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李 燕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联共产党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兼析苏共基层党组织建设与苏联解体关系/李燕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0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 - 7 - 5097 - 7986 - 6

I. ①苏… II. ①李… III. ①苏联共产党 - 基层组织 - 党的建设 - 研究 IV. ①D35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03013 号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苏联共产党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

——兼析苏共基层党组织建设与苏联解体关系

著 者 / 李 燕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曹义恒

责任编辑 / 曹义恒 刘俊艳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政法分社(010)593671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8.75 字 数:455千字

版 次 /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7986 - 6

定 价 / 128.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序 一

苏联解体 20 多年来，中国学界围绕苏联解体原因的讨论和争论一直在进行。学者们从各个视角进行分析和探究，其中从苏共党建和苏共领导人的责任角度分析的成果有不少。不过，从苏共基层党组织入手，以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党员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却不是很多。一个主要原因是，该题目涉及范围太广——苏联解体前基层党组织达 40 多万个，党员最多时近 2000 万人；同时，在时间上跨度也比较大——从 20 世纪初布尔什维克党成立到苏共解散、苏联解体，跨越了近一个世纪。但是，作为苏共组织结构中最基本的单位，基层组织是党的执政基础，它的组织结构、职能作用、活动形式与内容等体现了党的基础细胞的运转状况，基层党员的思想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群众对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认知与执行情况。总结执政的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深入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十分必要。

苏联前期，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先锋队与战斗堡垒，苏共基层党组织在保卫苏维埃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大工业、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中，为苏联的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实力的增强，特别是击退法西斯的侵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不过，20 世纪中期以后，特别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初，受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影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风气开始充斥党的各级组织和各个部门。基层党组织的先锋队作用渐失，基层党组织逐渐变成了一些人用来谋取私利和实现向上晋升的阶梯。尽管苏共党员人数在不断增加，但是基层党组织的职能与作用实际上在降低。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一些基层党组织和部分党员由改革的参加者与推动者变成了多党制下选举的组织者和积极参与者，其先锋队作用几乎消失殆尽。与此相伴的则是改革失败，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陷入混乱状态，苏共本身也在多党制的“号召”下变成了几百个“党之一”，最终苏共被解散、苏联解体，基层党

组织也名存实亡或自行解散。

在这一过程中，基层党组织处于党组织体系中的底层，对党的路线方针的制定并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是，基层党组织是执政党的最基本的细胞，其兴衰实际上被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所影响和决定：当执政的共产党坚持正确的路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落实民主集中制，充分调动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时，基层党组织就能够迸发出活力，在各个领域发挥先锋队的带头作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也能顺利展开；当执政的共产党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背离社会主义原则，执行错误的改革路线时，基层党组织就会出现组织资源丧失、队伍涣散等情况，不能发挥积极正面的作用，而最终的结局则是执政的共产党更快地走向全面失败。

苏联解体后，当代历史学家、政论家与很多当事人在回忆中，从不同角度描述过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苏联锅”的“沸腾”。不过，当苏共被解散、苏联解体时，并没有党员组织起来，走上街头为党呼吁和抗争。这种“混乱中的平静”令人不解：为什么在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千万党员却沉默下来？其主要原因在哪里？

这个问题需要从执政的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与广大党员的思想情况来加以探讨。第一，苏共后期，民主集中制成了摆设，基层党员难以行使真正的民主权利，更无权决定党和国家的命运。尤其是，当戈尔巴乔夫实行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背叛社会主义的改革路线时，尽管有很多党员不赞同，但他们除了用退党表示抗议外，直接表达诉求的渠道很少，这也是个别高层领导的背叛大行其道的一个原因。第二，苏共历史上的清党，在一定程度上纯洁了党的队伍，但苏共后期还是出现了党的队伍不纯、部分干部不思进取的情况，甚至不乏信仰缺失的机会主义分子、投机钻营者进入党的高层。当苏联后期改革遇到困难时，这些人不是精诚团结、共渡时艰，而是自拆台脚。他们为了个人和集团利益不惜损害党和国家的利益，败坏了党的声誉，动摇了党员群众的共产主义信仰，严重挫伤了基层党员的积极性。第三，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大肆批判党的领导人，完全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导致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搞乱了社会意识，摧毁了社会的集体记忆。在主流舆论把党的领袖形象抹得漆黑一团的情况下，

部分党员群众已经不知道应该拥护谁、反对谁，也不知道应该跟谁站在一起。第四，苏共后期，列宁所倡导的节俭、自律等作风几乎被完全抛弃，部分党的干部严重脱离群众，官员腐败与官僚特权严重，败坏了党风，使领导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距离不断拉大。当基层党员有权利重新选择自己的党派和政治信仰时，一部分党员离开了苏共，因为他们已经不可能再用鲜血和生命去捍卫由部分腐败分子所掌握的、不再以为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执政党。第五，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不成功的情况下，着手政治改革。其中主要的一项是实行“不受限制的多党制”。在此情况下，各种社会组织纷纷涌现，其中有些政党直接表明其政治立场是反共产主义的。苏共由执政党变成了几百个“党之一”，地位被严重削弱。退党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洪流，从内部冲击着党的组织。基层党组织数量急剧减少，各级党组织处境艰难，更不要说有组织地带领党员为党抗争和呼吁了。

不过，并不能就此下结论说，所有基层党员的态度都是冷漠的。1988年3月，列宁格勒工学院教师尼娜·安德列耶娃发表了文章《我不能放弃原则》，对苏共的政治路线提出质疑，引起了很大反响。另外，当时还有很多类似信件被扣压下来，有的信中用“不能抹黑历史”“不能这样对待我们的过去”“抹黑我们的历史是有害的”等言辞表达对否定苏共历史、否定党和国家的过去的严重不满。除了以信件形式表达不满之外，还有人在公开场合对戈尔巴乔夫提出“下台”的要求。而比较激烈的抗议方式，是老党员自杀，其中有苏共高层领导，也有卫国战争老英雄，他们不愿看到自己的祖国在内外交困的处境下分崩离析，但又无法力挽狂澜。此外，苏联后期出现了大规模退党风潮。其中多数党员退党是为了对党内高层的背叛行为表示抗议。他们离开的不是领导人民打退帝国主义和法西斯进攻的共产党，也不是领导苏联取得社会主义建设辉煌胜利的共产党，而是被“叛卖者”掌控、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与社会主义原则的党。

苏联解体后，俄共对苏共失败进行了深入反思，认为苏联的解体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身的失败，而是几十年间“执政党内部危机”引起的。在思想上，苏共后期，许多干部和党员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大部分人人党不是为了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

事业，而是为了捞取个人好处。在组织原则上，俄共认为苏共没有解决好民主集中制问题。一方面，党的领袖和上层越来越脱离普通党员和群众，不能及时了解群众的情绪；另一方面，苏共没有努力把工人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培养成理想信念坚定、敢于和善于斗争的“阶级斗士”，而只要求他们服从上级领导的意志。上层出了问题，下层党员当然不知所从。在干部队伍建设上，俄共认为，苏共没有解决好领导层新老干部更替的问题，党内健康力量无法有效地监督党内上层，无法防止越来越多的投机钻营分子甚至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人混入党内，窃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位。同时，苏共后期，党员数量快速增长，但党员队伍质量不断下降，不能发挥先锋作用，使党失去了保卫自己、推进事业的组织力量。

在深入反思苏共失败教训的基础上，今日俄共在基层党组织建设方面有了很多改进，如根据地域、职业特征在劳动集体中建立基层组织，在组织体系上巩固党的基础；坚持民主集中制，在思想和道义一致、同志情谊以及平等的基础上保证党的纪律的执行；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在领导干部定期更换制的基础上杜绝领袖至上现象；在党内杜绝败坏党的声誉的政治腐败分子和投机钻营分子；促进党员队伍年轻化，广泛吸收年轻一代加入党的队伍；对共产党员进行系统的政治教育，把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劳动群众中去。此外，俄共党纲还规定，为提高党对社会进程的影响力，必须保证俄共在所有对人民至关重要的社会活动领域和组织中有代表出席。比如，参加联邦和地区的各级权力代表机关的选举和地方自治机关的选举，改进劳动集体、工会、工人运动、妇女组织、青年组织中的政治工作等。

苏共在拥有 20 万多名党员的时候，参加了二月革命，在俄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在拥有 35 万多名党员的时候，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执掌了全国政权；在拥有 550 万多名党员的时候，领导人民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立下了不朽功勋；而在拥有近 2000 万名党员的时候，却丧失了执政地位，亡党亡国。这一情况不仅给俄罗斯共产党建设留下了深刻教训，也对其他执政的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提高执政能力提出了一系列新任务。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是，如何更好地发扬民主，提高全党理论水平，给基层党员群众

以更多的民主权利，保证下情上达，提高领导人的决策水平，以保证革命和建设的顺利进行。在上级的路线方针政策出现失误或者错误的情况下，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是将错就错，还是行使民主权利，及时反映，使之得以纠正，既体现出一个执政党的党风，也关系到民主集中制原则能否得到落实。

令人欣慰的是，苏联解体 20 多年来，不仅中国学界对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和广泛讨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也不断总结苏共历史教训，在制定改革的各项方针政策时，既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坚持毛泽东思想，又与时俱进，根据国内外发展变化的新形势提出新理论，如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些思想和理论带领中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旗帜鲜明地回答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对于党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决不是危言耸听。”^① 这个结论正是在总结苏联东欧共产党执政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的。

随着时代变迁，国内外形势也不断变化，对党的领导的执政能力、党的组织建设以及党员干部的基本素质、理论素养、工作作风提出了新要求。而在我们的党建工作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包括领导干部的信仰不坚定，理论素养不够，组织纪律性不强，部分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不能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等，从而影响到广大基层党员的社会主义信念。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② 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环节，也是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发

^① 《习近平党风廉政建设论述摘编：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29/c_1112670566.htm，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9月10日。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387页。

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前提。因此，我们党在从严治党、反腐倡廉、严明党纪等方面采取了多项重大举措，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我深信，一个能够保持先进性、严格自律的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将在广大基层党员群众中牢固地站稳脚跟。

李慎明

序 二

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之时，尽管已经有近300万人退党，苏共尚有1650余万名党员、几十万个党的基层组织（1989年统计苏共有44万个党的基层组织、73万个党小组）。但是，在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一声令下解散党中央时，偌大一个苏共，基本上没有抗议行动，党组织基本上也自行散去（当然，苏联解体几十年后，今天大多数的俄罗斯人已经对他们当初面临苏联解体时的“无动于衷”表示了悔意）。曾经作为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核心“先锋队”的苏共，在斯达汉诺夫运动中屡创劳动佳绩的苏共党小组，在卫国战争中冲锋在前、占800万名牺牲烈士总数一半的苏共党员，当时为何那样不堪一击？只有详细研究苏共基层组织的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才有可能比较全面地回答这个问题。这就是当初为李燕确定博士论文题目的初衷。

李燕博士的新作《苏联共产党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兼析苏共基层党组织建设与苏联解体关系》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近八年的再充实与再加工形成的一本专著。这部著作以苏联共产党基层党组织为研究对象，以俄罗斯档案馆的大量历史档案材料、苏共历史文献、中国与俄罗斯及其他国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力图勾勒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的布尔什维克党、联共（布）、苏联共产党的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整体轮廓，在此基础上，对苏共基层党组织建设与苏联解体关系加以深入分析。

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诞生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布尔什维克党。还在布尔什维克党成立之初，基层党组织作为党的基础。“党的下层的、群众性的环节”，其基本的组织结构（党小组）就已出现。十月革命前后，党支部是与党小组共同存在，是党同群众联系，针对各类劳动群众进行鼓动、宣传和组织工作的主要渠道。1934年，由于党员队伍的扩大，党支部就其成分、职能、任务而言，都

超出了旧式支部的范围。在苏共第17次代表大会上，支部改为基层党组织。苏共执政几十年间，基层党组织的结构、规模、职能、工作方式经历了一个逐步变迁的过程。苏共党组织遍及工厂、矿山、国营农场、集体农庄、苏联陆海军部队、机关、学校等。基层党组织是将共产党员团结到党的集体中的总的、包罗万象的形式，对党的生活与活动、对党的群众政策的实行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实际活动中，基层党组织领导苏联共产党的纲领和章程的制定。它是劳动集体的政治核心，直接在群众中工作，把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组织他们完成共产党员的建设任务，积极参与执行党的干部政策。

如果说，党小组是一种政党在初创时的自觉实践，那么建立党支部就应该是一种有组织、有领导的活动。以支部作为党的基础，是列宁最早提出的，在布尔什维克党成立前后，他就主张建立一个有严格组织纪律的党，随着形势的发展，他又提出以支部作为党的基础，并对不同革命形势下支部活动的方式提出了具体建议。尽管身在国外，但是列宁每天都关心并关注着党的活动，指导党的建设。回国后，列宁亲自领导党组织，发展革命力量，做宣传鼓动工作。十月革命期间，被动员起来的士兵和工人党员成为斗争的主要领导力量。十月武装起义胜利后，列宁又对执政党的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和看法，并身体力行。列宁的系统理论与实践为苏共基层党组织建设打下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就面临着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的叛乱。在前线，军队中的共产党员英勇战斗；在后方，党员与群众开展星期六义务劳动，以极大热情支援前线。正是广大党员群众的支持，保证了保卫和巩固苏维埃政权斗争的胜利。在伟大卫国战争中，无论在前线还是在后方，基层党组织都发挥了组织、宣传作用，广大党员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撤退在后，以坚忍不拔的耐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而在敌占区和敌后，党员参加游击队，与占领军展开英勇斗争，在生产中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一个人完成几个人的工作定额，以最快地、尽可能多地完成生产任务，为前线提供武器弹药，共产党员起到了先锋队作用。战争可以检验民族力量和民族品格，苏共党员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奉献精神成为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苏共带领苏

联人民在战胜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中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也获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重。

在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以及后来的国家建设中，基层党组织都积极开展有组织的活动，组织劳动竞赛，进行各种宣传鼓动工作。当然，由于体制和激励机制的原因，在几十年间，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逐渐降低，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断削弱，苏共 20 大开始对斯大林的批判以及后来的“去斯大林化”运动给广大党员带来思想困惑，而西方“民主”“自由”化思想的侵入更推动“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出现与扩展。在此情况下，基层党组织工作面对着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而固守老旧的思维与工作方法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无法解决新问题。国家所面临的改革问题同样摆在了党组织的面前。

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基层党组织建设经历了从社会主义建设的组织者、党的政策与决策的贯彻者到无所事事、“不知道应该做什么”的转变，基层党组织的职能与作用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与社会的动荡而急剧削弱。在意识形态多元化形势下，基层党组织原来的宣传与说教被指责为欺骗，党组织和干部处境艰难。而在多党制与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中，基层党员的脱党、退党现象层出不穷，基层党组织作为执政党的基本“细胞”已经无法发挥作用，而不少党员走向了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政党组织。最终，在“8·19 事件”后，党被宣布解散时，基层党组织也随之黯淡“出局”。

苏共基层党组织由兴而衰的发展历程说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党内生活中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调动起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使基层党组织活动充满创造力，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社会主义事业就能够走向胜利。反之，面对不断变化的新形势、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执政党不能改进自己，不能做到与时俱进，党就要失去先锋队作用。而放弃党的领导，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党就必然失去群众的支持，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将走向失败。

总结历史是为了面向未来。苏共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经验教训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基层组织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及时梳理其发展历

程，总结其历史经验，对于研究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十分重要，同时对于中共执政党的基层党组织建设也是有益借鉴。只是，这项工作艰难浩繁，一部两部成果是难以将其完全涵盖的，前路漫漫，还需要学术同行的共同努力与大力支持。

吴恩远

前 言

苏联解体不久，有关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在苏联史研究领域就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当代的俄罗斯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研究者以及俄罗斯、中国、西方学界的研究者从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意识形态等多个领域对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总结。目前，在中国学界关于苏联解体原因问题有多种观点，包括苏共领导者（主要是戈尔巴乔夫）执行了“错误的改革路线”，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或者苏联体制活力尽失、走到尽头，经济情况恶化，民族矛盾激化等等，争论不断。也许这种争论在国内外学界还要持续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因为一个“超级大国”的轰然解体不可能是一两种因素直接使然，并且随着俄罗斯以及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档案材料的公布，一些新材料陆续得以公开，人们的各种观点与说法也在不断更正，争议也就不可避免。在以往的各种分析中，主要是从苏共领导人以及苏共中央决策中寻找错误和失误的根源，而作为执政党的基础——基层党组织在苏联几十年的历史中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基层党组织在它的后期是怎样的情况，基层群众对于苏联领导人以及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改革持怎样的态度，对于党被解散基层党员又是如何看待、如何对待的，目前还没有专门著作来研究。就此意义来说，这是研究苏联历史和苏联共产党历史乃至分析苏联解体原因的一个既属空白又需要理清的部分。

基层党组织是苏联共产党的基础。无论是在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群众、发动革命的过程中，还是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基层党组织在宣传党的思想、方针以及动员群众参加到革命斗争和建设中的过程中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苏联几十年的历史中，基层党组织为保证苏联共产党这个执政党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做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不过，由于苏共在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以及党的组织宣传工作上的形式化、方法僵化，导致基层党组织渐渐失去活力，成为一部分

人政治晋升的台阶。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基层党组织思想涣散，难以发挥应有作用。因此，有人称：“苏联共产党这座大厦的坍塌是从底层开始的。”这种判断是否正确？本书将在理顺基层党组织的演变过程及其作用发挥方面加以分析。更重要的是，需要从苏联共产党基层党组织的演变发展过程中，总结执政党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经验与教训，为当今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建设提供借鉴。本书即以苏共基层党组织的发展历程为线索，展现基层党组织在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过程中的历史作用，最终目的则是分析基层党组织的蜕变与苏联共产党垮台的底层原因。同时，也对有关十月革命的发动、列宁的作用、斯达汉诺夫运动的起因、苏联农业中的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苏联军队中的基层党组织建设等苏联历史研究领域存有争议或者研究较为薄弱的内容做学术上的探讨和分析。

苏共基层党组织的早期形式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下的党小组。1911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将党支部确定为布尔什维克党的基层组织形式。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掌握了苏维埃国家政权，党的队伍不断壮大，党员在巩固苏维埃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中发挥着先锋队的作用。1934年，为更好地发挥党员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的作用，加强对党员的管理，俄共（布）第17次代表大会通过新党章，决定以基层党组织作为党的基础。

在布尔什维克党成立前后，列宁主张建立一个有严格组织纪律的党。随着俄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列宁又提出以支部作为党的基础，并对不同革命形势下支部活动的方式提出了具体建议。1917年二月革命后，列宁回到国内，亲自领导党组织，在工人、士兵中发展革命力量，进行宣传鼓动，党的力量在几个月间迅速壮大。10月，布尔什维克党取得武装起义的胜利。以后，列宁又对执政党基层党组织建设、基层党组织在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中应发挥的作用，以及基层党组织与工会、青年团等群众团体的关系等提出一系列理论观点，并亲身实践。列宁的革命理论与实践是苏共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理论基础。

从十月革命胜利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共产党基层党组织在巩固苏维埃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先锋队和战斗堡垒作用：在国内战争时期，由莫斯科一喀山铁路共产党员发起的星期六

义务劳动，带动了全体党员和群众的劳动热情，星期六义务劳动成为苏联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的开端；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时期，党员积极参加劳动竞赛，基层党组织是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组织者，从30年代中期直到80年代，劳动竞赛始终是苏联劳动组织的主要形式，为社会主义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红军中党的队伍扩大，党员是战胜敌人的重要力量。基层党组织在前线战场上，在后方生产战线上，在组织敌后抵抗运动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党员和基层党组织构成社会主义国家不可战胜的堡垒。

苏共20大给苏联社会政治生活带来了极大变化，也是苏联共产党发展历程上的一次重要转折。20大以后，苏共党员数量迅速增加，党对基层党组织的组织结构做了相应调整。基层党组织的主要职能是发展党员，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先锋队作用。

20世纪50~60年代，在苏联农业以及商业服务业等行业中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基层党组织体系，基层党组织网络深入苏联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不断扩大的党的队伍和比较完善的基层党组织体系保证苏联共产党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这个时期，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苏共基层党组织建设也面临诸多新问题：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带来党员思想上的巨大波动，“解冻思潮”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使党的宣传领域出现了不同声音，西方思想的渗透，宗教意识的影响，民族矛盾的突出，酗酒、赌博、离婚等社会问题的出现，给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带来复杂局面。这一切都要求基层党组织工作适应新形势，改进工作方法。但是，体制上的僵化，经济发展的停滞，领导人的不思进取，使得苏联共产党不能与时俱进，反而抱残守缺。基层党组织的先锋模范作用逐渐丧失，变成晋升官僚特权的阶梯。

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进入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直到1989年，苏共基层党组织还有着比较完整的组织体系，党员数量一度接近2000万人。但是，苏共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民主化、公开性以及苏维埃选举，削弱了党的群众基础。1990年苏共28大宣布实行多党制，基层党组织的职能由社会主义建设的先锋队变为多党竞争下的一支政治选举力量，加之以叶利钦、波波夫为首的党的高级领导人的退党行为，使本已出现的大规模退党现象加剧。进入1991年，党员队伍严重涣散，基层党组织

处境艰难。“8·19事件”后在苏联更出现反共高潮，直至苏联共产党被宣布停止活动。几个月后，苏联解体。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苏联共产党成为苏维埃国家的执政党。苏共基层组织作为执政党的基础，作为一个比较完整的政治体系，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已经深入苏联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也深入苏联领土上的各个民族中，成为维系这个拥有全世界最广大领土、有100多个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苏共基层组织由兴而衰的发展历程说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党内生活中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调动起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使基层党组织活动充满创造力，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社会主义事业就能够走向胜利。反之，面对不断变化的新形势，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执政党不能改进自己，不能做到与时俱进，党就要失去先锋队作用。而放弃党的领导，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党就必然失去群众的支持，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将走向失败。

目 录

| | |
|--|-----|
| 绪 论 | 1 |
| 一 选题的提出及意义 | 1 |
| 二 文献综述与研究现状 | 9 |
| 三 苏共基层党组织的概念内涵及其组织结构与主要职能 | 21 |
| 四 研究时段与研究范围 | 36 |
| 五 理论价值与应用价值 | 38 |
| 六 研究的创新之处与研究方法 | 40 |
| | |
| 第一章 苏共早期：基层党组织是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 国家的先锋队 | 44 |
| 第一节 列宁的基层党组织建设理论与实践 | 44 |
| 一 列宁的党建理论与布尔什维克党早期基层党组织建设 | 45 |
| 二 列宁的革命实践与基层党组织在十月武装起义中的作用 | 51 |
| 三 苏共执政初期列宁的基层党组织建设理论与实践 | 59 |
| 第二节 基层党组织是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先锋队 | 68 |
| 一 基层党组织发起和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 | 69 |
| 二 广大党员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主力军 | 76 |
| 三 基层党组织是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组织者和参加者 | 100 |
| 四 苏联前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 104 |
| 第三节 基层党组织是保卫国家的战斗堡垒 | 120 |
| 一 苏联前期的军队基层党组织建设 | 121 |
| 二 伟大卫国战争中党员队伍的扩大 | 124 |
| 三 基层党组织在前线组织抗击德国侵略军 | 132 |
| 四 基层党组织在敌占区领导游击战争和宣传工作 | 139 |
| 五 基层党组织是后方生产活动的主要组织者 | 143 |
| 本章小结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先锋队：不可忘却的历史 | 150 |

| | |
|--|-----|
| 第二章 从苏共 20 大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基层党组织建设 | 153 |
| 第一节 苏共 20 大给苏联社会政治生活带来重大变化 | 154 |
| 一 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从苏共 20 大到 22 大 | 154 |
| 二 “全民国家”“全民党”理论的提出 | 158 |
| 三 苏共在管理体制上的变动及社会影响 | 160 |
| 第二节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中期苏联的社会思潮 | 163 |
| 一 苏共 20 大在基层党员群众中引起的波动 | 164 |
| 二 “解冻文学”与自由化思潮 | 167 |
| 三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 | 169 |
| 第三节 20 世纪 50 ~ 80 年代的苏共基层党组织 | 173 |
| 一 党的队伍扩大，基层党组织结构和工作内容调整 | 173 |
| 二 基层党组织工作的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 | 182 |
| 三 20 世纪中后期农业政策调整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加强 | 210 |
| 四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初苏联军队的基层党组织建设 | 224 |
| 本章小结 执政党必须不断完善自身 | 229 |
| | |
| 第三章 戈尔巴乔夫时代基层党组织：先锋队的蜕变 | 236 |
| 第一节 改革前期：基层党组织是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参加者 | 236 |
| 一 从安德罗波夫到戈尔巴乔夫继任之初的干部调整 | 237 |
| 二 “加速战略”与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基层党组织 | 242 |
| 第二节 苏共第 19 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党的队伍不稳定 | 248 |
| 一 “民主化”“公开性”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 | 249 |
| 二 苏共第 19 次全国代表会议与全国性的苏维埃选举 | 261 |
| 第三节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与多党制：基层党 | |
| 组织职能转变 | 269 |
| 一 苏共 28 大：苏共由执政党变为“议会党” | 269 |
| 二 基层党组织：从改革和建设先锋队到多党制下的选举力量 | 271 |
| 三 党员的流失与基层党组织的困境 | 274 |
| 四 戈尔巴乔夫军事改革与苏联军队的瓦解 | 281 |
| 五 “8·19 事件”与苏共被停止活动 | 287 |
| 本章小结 正确的改革路线是基层党组织发挥积极作用的保证 .. | 290 |

| | |
|---------------------------------|-----|
| 第四章 苏共基层党组织建设与苏联解体关系分析 | 296 |
| 第一节 苏联历史上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主要成就与问题 | 296 |
| 一 苏共在基层党组织建设理论和实践上的成就 | 297 |
| 二 苏共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 303 |
| 第二节 苏共基层党组织与苏联解体关系分析 | 337 |
| 一 基层党组织职能与作用的有效发挥体现了党的活力 | 338 |
| 二 削弱基层党组织的职能与作用动摇了党的根基 | 339 |
| 三 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苏共失败的根本原因 | 341 |
| 四 苏联共产党失败使苏维埃联盟失去了维系基础 | 344 |
| 第三节 苏共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与启示 | 346 |
| 一 苏共历史上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经验 | 346 |
| 二 苏共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历史教训 | 350 |
| 三 苏共历史经验教训对执政党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启示 | 353 |
| | |
| 结束语 男儿为何不抗争 | 358 |
| | |
| 附录一 苏共党员人数变化 | 368 |
| | |
| 附录二 苏联共产党基层党组织发展情况 | 370 |
| | |
| 附录三 当代俄罗斯学者评析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 371 |
| | |
| 附录四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的苏联社会思潮 | 395 |
| | |
| 参考文献 | 409 |
| | |
| 索 引 | 424 |
| | |
| 后 记 | 435 |

绪 论

20 世纪的世界历史上发生过几乎是人类历史中所有最为重大的事件。在与俄罗斯（苏联）相关的事件中，最重要的是十月革命和苏联解体。十月革命后在俄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有了一次成功实践；70 年后苏联解体，结束了 20 世纪最大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人也称之为帝国）的历史，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创。苏联解体后，原苏联各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们从政治、经济、文化甚或军事、科技、宗教等不同视角去研究分析过去近一个世纪中，在这个曾经辉煌的社会主义大国中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一度被认为是世界历史上最无可挑剔的政治文明形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导致其解体。这些分析主要集中于政治制度、经济因素以及领导者个人素质等上层原因。人们注意到，在 70 多年间，领导苏联的是苏联共产党，而在苏联解体前，苏共先垮掉了。作为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社会支柱，苏共的垮台无疑给了摇摇欲坠的联盟以沉重的打击。几个月后，苏联也解体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大党的解散与大国的解体同样令人遗憾。正因为如此，苏联共产党的失败与苏联解体的原因成为密不可分的话题，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苏联的执政党——苏联共产党。从 20 世纪初布尔什维克党成立，到共产党被解散，苏联共产党在近一个世纪的历程中，从 1917 年十月武装起义前的 35 万名党员，发展到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约 1950 万名党员，44 万个基层党组织，共产党员和基层党组织遍布苏联国民经济生活的各个部门。无论对整个苏联历史还是对各个时期的苏联社会而言，苏联共产党及其基层党组织都是社会生活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一 选题的提出及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社会主义成为一种与资本主义并行的社会制度，与资本主

义社会有着不同的目标和追求，代表着人类社会最终发展方向。从十月革命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发展和壮大，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曾经充满生机和活力。但是，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社会主义是有发展前途的制度还是超越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早产儿”？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是不是历史的必然？这些问题反映出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怀疑，也有对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思想建设与组织建设等方面的教训的深入反思。

苏联解体已经 20 多年了。自苏联解体之初，中国学界就对苏联解体原因、苏联历史上的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进行了深入研究。对于苏联解体的主要和直接原因，国内学界的看法存在很大差异。有学者强调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关键在于选择了方向性错误的改革路线”。戈尔巴乔夫及其领导集团确定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总路线本身是错误的。错误的政治思想方针造成国家领导核心的丧失，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进一步导致社会、经济、政治、族际关系等方面的激烈动荡，国家的灭亡就不可避免了。在个性特征上，戈尔巴乔夫的社会主义信仰不坚定，没有得力的领导班子，领导作风独断专行，缺乏大国领袖应有的人格魅力与领导魄力等，各种原因使得他不能胜任苏联这样一个大国领袖的职务。因此，他本人对于苏联解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①。在这里，学者们在剖析苏联解体的多种因素之外，指出了戈尔巴乔夫作为苏共领导人在领导改革时，对于改革方向的错误选择，即放弃社会主义路线。另外一些学者虽然也看到戈尔巴乔夫个人负有的历史责任，诸如改革的目标不够明确，没有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工作重点，改革出现方向性错误，以及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摇摆不定，其领导集体没能很好地驾驭和控制国家的局面等等，不过他们更强调的是苏联在历史上所积淀的各种阻碍因素，例如，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物质生活的关系；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和僵化的经济体制阻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苏联政治生活中缺乏民主，破

^① 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 783 ~ 796 页。

坏法制，极大地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在意识形态领域采取教条主义和学术上的批判运动，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气息和创造精神；一个拥有 100 多个民族的大国没能很好地解决民族问题；执政党忽视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不能始终保持先进性，失去民心，终至垮台^①。这种观点更强调苏联解体的历史因素和客观原因。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着重强调苏联解体的体制性原因。也有研究者从多个方面总结了苏联解体的原因：“左”的教条主义的思想理论，是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最重要的思想根源，而“左”的政治路线是导致苏共失败的关键的路线因素；高度集中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导致苏联发生剧变的深刻的体制原因；缺乏民主和监督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造成苏联党政领导机关的官僚化、特权化和严重脱离群众，是导致苏共失败和苏联解体的重要政治原因；对待农民和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失误、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上的失误、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上的失误都是苏联遭受失败的重要原因^②。在这里，学者们更侧重于苏联解体的体制性因素。

总体来看，就苏联解体原因，国内外学者有的从戈尔巴乔夫改革入手——戈尔巴乔夫改革在路线、政策、具体实践以及其本人的思想方法等方面的失误与错误；有的从政治角度入手——斯大林体制的弊端，苏共后期政治改革的失误或者错误；有的从经济角度入手——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机能耗尽，戈尔巴乔夫改革过程中经济政策的失误；有的从思想和意识形态角度入手——苏联后期民众的政治冷漠，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公开性”、民主化与多元化对传统价值观以及社会思想意识的巨大冲击；有的从民族问题入手——苏联后期对民族问题的压制以及没有对民族问题予以足够重视、戈尔巴乔夫改革中对民族冲突的处理不当；还有对外部因素的分析与解读——西方的和平演变政策等。这些观点归纳起来，形成了苏联解体原因的“改革错误路线说”“斯大林模式说”“民族矛盾说”“外部原因说”等多种观点^③。当然，更普遍的观点是

①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 927～944 页。

② 陆南泉、姜长斌主编《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 377～384、298～299 页。

③ 有关苏联解体原因各种观点介绍与研究路径分析，可参见富景筠《卢布信用危机与苏联解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 4～11 页。

“合力说”，即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分析在20多年间不断深化，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并且基本上都围绕苏联上层的执政者、国家体制与制度、民族关系与政治、经济、外交政策等方面进行。如果套用大卫·科兹的话说，苏联解体是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似乎更清晰地反映出苏联解体中的上层决策者以及国家政治体制因素。不过，作为一党执政的国家，苏联共产党对于苏联解体应负有责任，苏联共产党在自身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①。尤其是作为执政的苏联共产党最基层的部分——基层党组织，其在苏联历史上曾经起到怎样的作用，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它又处于怎样的地位，广大党员如何对待和看待党和国家发生的一场巨变，苏共失败、苏联解体对于他们的个人生活与社会价值观有什么影响，等等，值得人们深入反思。

早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一个完整的组织体系对于政党的存在十分必要。他们明确提出，在现存世界中，“共产主义者”这个概念的意思是“特定革命政党的拥护者”^②，并且“任何政党没有组织都是无法存在的”^③。党组织是党得以存在的基础，而基层组织是党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是党借以影响每个团体、每个劳动者、每个人的据点，也是党联系广大群众、取得群众支持的纽带。列宁在很多理论文章中也强调布尔什维克党要“在一切工作部门建立党支部”，“每个支部和每个党的工人委员会，都应当成为‘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工作、宣传工作和实际组织工作的据点’”^④。党通过基层组织直接地、实际地实现自己的政策和决议，实行自己的纲领。研究党的基层组织，对于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完善自身，使之发挥更强的战斗力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在苏联历史上，苏共基层党组织曾是一个有严格纪律、严密组织系统的政治体系，还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其他领导者就对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出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列

^① 在苏共执政党的建设经验与教训方面，国内有一些基于新材料的最新研究成果，如李慎明主编《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李慎明主编《苏联解体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等等。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9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63页。

^④ 《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第337页。

宁，从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建立之初就在革命斗争理论和实践上给布尔什维克党的基础——党小组和党支部以指导。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成为执政党，党的组织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其基础——基层党组织在苏维埃国家面临外来侵略时，起到了保卫者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是先锋队。基层党组织深入苏联国民经济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部门，在苏联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当苏共被宣布停止活动，以及不久后苏联解体时，对于这样关乎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命运的大事，几十万基层党组织和上千万名党员并没有做出激烈反应。一个很重要的客观原因是，在苏共被停止活动前，党的队伍已经涣散，多数基层党组织已陷于瘫痪，党员与基层党组织的先锋作用实际上已经丧失，加之人们对戈尔巴乔夫实行的改革的失望、对政治的冷漠等主观因素，使得苏共基层党组织这个曾经有强大战斗力的集体在历史的紧要关头竟无所作为，留下历史的遗憾。“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共党的队伍和基层党组织从结构严整的体系走向涣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因此，苏共基层党组织在苏联前期具有怎样的理论指导和组织结构，使之能够发挥先锋队和战斗堡垒作用，又有哪些因素使这个先锋队的性质发生变化，导致人心尽散，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是本研究关注的焦点。

苏联解体前，党的基层组织战斗力的丧失以及各级党组织的涣散，对于苏共被解散，及至几个月后苏联的解体都有直接影响。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基层组织作为最小的细胞，虽然其破坏不会立刻产生社会影响，但在党的长期发展中，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在社会主义大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它的自身建设对于国家的强大、社会的稳定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党的建设应是立足于基层组织之上的。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共产党被多数人视为苏联共产党的继承者。到2000年前后，它有约50万名党员，近1.7万个基层党组织，是俄国国内最大的党，基层组织较其他党派也最完备。不过，进入新世纪以后，俄罗斯共产党的党员人数不断下降，到2013年，俄罗斯共产党的党员不到16万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俄共深入宣传使俄罗斯摆脱危机、实现现代化的建设性方案，并在城市居民尤其是青年学生中吸收新党员，以增强队伍的战斗力和战斗力。在其后3年中，新增党员4.6万人，在2011年的杜马

选举中，得票率与2007年相比几乎增加1倍。俄共认为，普京执政以来的统治集团错过了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机会，使国家卷入金融危机的旋涡，面临实体经济不振、贫富分化加剧的局面。可以说，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是现行统治制度坚定的反对派，主张使俄罗斯回归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经济危机不断深化的情况下，2009年3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提出了党的反危机纲领，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2011年为扩大社会影响，该党对关系国民生活的一些重大问题展开公众投票活动。同时，为反对篡改苏联历史，俄罗斯共产党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例如，在2009~2010年，为庆祝列宁诞辰140周年、斯大林诞辰130周年和苏联人民取得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俄共举办了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在媒体上对“去斯大林化”进行了抗议和抵制，并采用拍摄电影、增加网站等手段扩大在民众中的影响。其目标是在2012年的国家杜马选举中取胜^①。在2012年总统大选中，俄共的得票率仍位居第二，并且，其在俄罗斯议会中始终处于第二大党的地位。不过，俄共对俄罗斯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并不是最大的，远不及统一俄罗斯党，其最主要的原因是俄共并非俄罗斯议会第一大党^②。除了这个客观原因之外，在俄共的自身，其组织形式、组织结构、政治纲领等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问题甚至有延续苏联共产党的弊端的“嫌疑”。例如，有俄罗斯学者指出，在俄共党纲中，把国际形势放在第一位，而对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国内经济

① [俄]德·格·诺维科夫：《现阶段前苏联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陈爱茹编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4期；刘淑春：《俄罗斯社会主义流派当前境况》，《人民论坛》2012年第9期（下）。

② 目前在俄罗斯议会中，有四个主要政党。第一大党是统一俄罗斯党，这个党是普京一系列政策的支持者，强调强大的总统政权是政治稳定的保障和法制建设的牢固基石。由于许多官员都是统一俄罗斯党党员，因此该党又被称为“政权党”。俄罗斯共产党为议会第二大党。俄共属于左翼政党，在经济、社会政策上，该党反对强行私有化，赞成不同形式所有制的最佳结合。党的战略目标是通过议会斗争和宪法手段获得政权。公正俄罗斯党是议会第三大党，属于中左翼政党。该党纲领认为，社会不公正正是国家和社会面临的最尖锐的政治问题，是国家发展的最大障碍。贫富差距悬殊损害了公民权利和自由，最终将导致丧失社会信任和团结。因此该党较多关注提高退休金和社会补助，合理分配收入，对国家开支进行切实的公民监督等议题。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为议会第四大党。该党政策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称其首要任务是“复兴强大的民主和繁荣的俄罗斯”，在对外政策方面主张在自愿的基础上重建俄罗斯国家，与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结盟，首先与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原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统一。

问题关注不够，党的理论创新与宣传工作还停留于形式上，不能深入人心。尽管做了大量工作，在年轻人中发展新党员，但俄共党员的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在不到16万名党员中，有将近一半的（44%）党员是已过退休年龄的人，只有10%的人是不到30岁的年轻人。在党的高层领导中也存在年龄老化的问题，领导队伍20多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变化。诸多情况说明，俄共领导人“并不了解转型时期俄罗斯社会的实质”，奉行了一条“脱离民众的路线”^①。可以说，俄罗斯共产党要扩大社会影响，获得更多的支持，还需要在政治纲领、组织结构、思想宣传等方面做大量的工作。其中，如何吸取苏联共产党在基层党组织建设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提高基层组织人员的思想素质，更好地了解基层党员的政治诉求与实际状况，在党的纲领中更好地反映广大党员的要求，应当成为俄共在党的建设方面的一项重要工作^②。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一度进入低潮，遭遇挫折。尽管面临西方国家的强大压力，中国、越南、朝鲜、老挝、古巴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保持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各国根据时代变化和本国国情，努力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和执政力量，经受住了时代发展的考验。虽然目前世界上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仅有这5个，但各国展现给世人的却是一幅比较美好的画卷：经济持续增长，社会秩序井然，各国共产党执政地位比较稳定，共产党员数量不断增加。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达8512.7万名，比上年增加252.5万名，增幅为3.1%；党的基层组织总数达420.1万个，比上年增加17.5万个，增幅为4.3%。党员数量和基层党组织数量都在稳步上升。越南共产党现有党员360万人，朝鲜劳动党现有党员400万人，老挝人民革命党现有党员19.1万人，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古巴共产党现有党员70万人。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在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

^① 2013年4月24日，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格·弗·布罗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从关注民生的角度把中共十八大报告与不久前召开的俄共十五大报告做了比较，指出了俄共在纲领与组织结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② 华东师范大学的周尚文教授撰文《俄共缘何衰落》（《俄罗斯研究》2006年第3期），介绍了俄罗斯共产党进入新千年以来的衰落境况并分析了其原因，其中也谈到了苏共的影响。

程中，都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核心作用，十分重视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采取了许多适合本党本国的措施，加强和改善执政党的领导。在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如何加强执政党的建设，从组织结构以及思想认识上更好地把广大党员凝聚在一起，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是各国执政党需要结合新形势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苏联共产党的执政经验与管理模式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曾起过示范作用，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可以说，学习、借鉴苏共的组织管理模式曾经是执政的共产党的一项重要任务，而推广苏共管理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也曾是苏共的主要工作。如何客观看待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历史，从中汲取经验，总结教训，也是其他国家共产党需要面对的问题。苏共20大以及苏联解体，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剧烈震动，同时，也促使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深入反思苏联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从而为开创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契机，也对执政党如何巩固执政基础、抓好党的自身建设提出了严峻的课题。基层党组织建设尽管只处于执政党的基层，不能对高层决策起到决定作用，但它是执政党的基石，直接影响到执政党社会基础的稳固。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党员的组织程度与思想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执政党是否代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在党员群众中是否具有影响力和号召力，这是执政党必须时时面对并不断解决的问题。

俄国文学家涅克拉索夫曾感叹：“你又贫穷，你又富饶，你又强大，你又衰弱，——俄罗斯母亲！”^① 诗句反映了诗人当时的矛盾心理，而这又岂不是20世纪末叶苏联国情的写照：一个拥有广袤土地、不竭资源的富饶国家，一个打败过法西斯，曾经让全世界人肃然起敬的大国突然变得既贫穷又衰弱；曾拥有近2000万名党员、对本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直至世界政治都产生过深刻影响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关乎党自身存在、国家命运的问题上，竟衰弱到几乎没有发言权的地步。这个过程是怎样演变的？从中应汲取执政党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哪些经验

^① [俄] 尼·阿·涅克拉索夫：《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飞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第435页。

与教训？思考并回答这些问题，无论在当时还是现今的世界各国，尤其对同样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 文献综述与研究现状

在中国研究苏联共产党，就材料来源看，主要可从三个方面获得可资引用和借鉴的文献材料：取自原苏联或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及独联体各国的资料、中国党建和中国苏联史研究的学术成果、西方学者和政论家的著作。其中，苏联时代的档案文献或回忆著作是多数研究工作的主要材料来源。

（一）档案材料

苏联解体前后，由于苏共被解散，苏共中央被强制迁出，一些档案遭到破坏。但是，在原有的一些档案馆、博物馆以及图书馆中存放的与苏共历史有关的档案文献还是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些国家正式机构的档案文献，成为后来查阅苏联历史和苏共党史资料的主要来源。同时，还有一些非国有的、社会化的档案机构。“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社会经历了一系列变革，在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中，俄档案管理的法规体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1993年7月出台的关于俄罗斯联邦档案全宗的法规规定，将俄罗斯全宗划分为两部分：国有的和非国有的。这反映出国家对形成于非国有机构行政管理中的文件价值的认同。国有机构按法律要求移交档案，非国有机构向国家档案馆移交档案的关系则建立在合同的基础上。”^① 随着近些年苏联历史研究的深化，反映苏联时期社会生活的档案文献开始更多地来自非国有机构。

由于本研究以基层党组织为主要内容，其范围不仅包含苏共的政策、决议，还涉及基层群众的活动以及社会反响，因此，档案文献来自两个方向：一个是苏共上层的决议、政策，以及各级党和政府部门的决议；另一个是党的基层部门的记录、基层管理与组织机构的各种文档，还有社会组织的档案文献。在写作过程中，笔者主要通过俄罗斯两个档案管理机构获得第一手文献材料，即俄罗斯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РГАСПИ）和

^① 《俄罗斯档案工作简介》，宁波档案网，http://www.dangan.ningbo.gov.cn/dakw/201106/31wbly/201111/t20111115_705217.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3月8日。

俄罗斯国家现代历史档案馆（РГАНИ）。俄罗斯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是与苏共党史关系最为密切的档案馆，该馆的前身是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以收藏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及苏共〔俄共和联共（布）〕文献与国际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史文献著称。有俄罗斯学者著文介绍了这个档案馆的沿革情况：1920年12月8日，俄共（布）中央全会做出决定，在社会科学院里成立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博物馆。1921年1月，该博物馆更名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达维德·鲍里索维奇·梁赞诺夫被任命为研究院院长。研究院的任务是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文献遗产都汇集到莫斯科，在此基础上筹备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根据原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1924年7月11日决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被认定为“苏联境内唯一一家负责保存马克思恩格斯的活动以及出版其作品有直接关系的所有原始文件的国立机构”。由于梁赞诺夫等人的努力，到1930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档案馆成为欧洲最大的档案馆之一，在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方面文献收藏首屈一指。1931年11月3日，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与列宁研究院合并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①。不过，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迁入前，在莫斯科的德米特洛夫卡大街24号（М. Большая Дмитровка №24）原址的是列宁研究院。在该档案馆的一份档案中，记载了这个研究院的设立：十月革命胜利后，要建列宁学院（专门收集存放列宁手稿的学院）和列宁图书馆。在得到批准后，就开始找地方，最后找到这个地方。在早期，这里存放的档案主要是列宁的手稿，包括他在国外的书信以及在《火星报》等报刊上登载的文章手稿，后来，还保存了斯大林时期的历史档案材料^②。苏联解体后，这里也成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历史档案文献的主要保存地。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笔者在俄罗斯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查阅了列宁手稿，苏共早期的党组织建设情况，前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农村与城市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苏共前期的党费收缴以及苏共的财务监督检查制度，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基层党员对当

① [俄]瓦·福米乔夫：《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典藏》，李铁军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1期。马克思恩格斯的个人文献档案是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的镇馆典藏之一，为该档案馆的一号全宗。

② РГАСПИ. Ф. 347. Оп. 1. Д. 70.

时党和国家建设情况的意见、建议、要求等。这些档案文献是了解当时基层组织建设的主要问题的重要材料。

在俄罗斯国家现代历史档案馆中，主要集中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党建材料，还有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境内共产党的发展与组织建设情况。这些材料对于写作20世纪50~80年代初苏共的思想政治工作、意识形态政策以及基层党组织活动，以及了解苏联解体后共产党的情况提供了重要素材^①。

除了笔者本人直接查找的一手档案资料外，一些从苏联时代保留下来的文献也是重要素材。这些材料包括苏共中央公布的党代表大会与代表会议决议、记录及公开发行的党史文献、统计数据、党报党刊。还有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通过的党章、决议以及会议记录等文献，这是研究苏共党史的第一手材料。十月革命后，在历次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上都有关于基层党组织的内容，有的是决议，有的是领导人的报告中所谈及的一些问题、现象以及解决方法，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苏共基层党组织的发展情况。这类文献主要有《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简称《苏共中央决议汇编》）以及各种会议速记记录，多数都已译成中文，来自苏共中央的政策、决定基本都可找到出处。

由苏共中央公开发行的党史文献也是本书的一个主要素材来源。这种文献又可分几类：第一类是苏共领导人的讲话、文集，如《列宁全集》《列宁选集》《斯大林文集》《斯大林文选》，以及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等党的领导人的言论集。在苏联历史上，党的领导人对基层党组织建设都有论述。尤其是列宁，从19世纪90年代末为建立统一、有组织纪律的政党到十月革命后，对基层党组织与其他群众组织的关系以及共产党员在保卫苏维埃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活动方面，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并亲身实践，对苏联共产党早期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历届苏共领导人的言论中，可了解党的上层对基层党组织建设问题的意见和看法。第二类是由苏共公开发行

^① 在收集材料过程中，俄罗斯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与俄罗斯国家现代历史档案馆的工作人员给予笔者全力支持与帮助，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耐心地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他们的敬业与认真十分令人感动。在此一并致谢。

的党史著作，如由斯大林亲自主持编写、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①，波诺马廖夫主编、1959年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历史》，波斯别洛夫主编的六卷本《苏联共产党历史》^②，还有波诺马廖夫主编、1982年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历史》，这些党史著作中所叙述的史实、数据，多数可作为文章的原始材料或参照资料。第三类是苏共公开发行的有关党建理论的论著与工具书，如《党的建设》^③《党建词典》^④《党务工作者手册》《基层党组织书记手册》《苏共基层党组织文件》《党小组长手册》等。一些有关基层党组织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和党组织发展情况都可在这些文献中看到。另有一些统计数字出自《苏联大百科全书》《联共（布）统计资料》等。

由苏共中央公开发行的党报党刊或有关的政治、历史刊物，主要有《布尔什维克》《苏共历史问题》^⑤《历史问题》《俄共（布）中央通报》

①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一部由苏联官方组织编写的苏共党史教材，其中充斥着对斯大林的颂扬，在西方人眼中这是一部不可信的党史书。苏共20大后的苏联以及解体前后的苏联对这部教程也有很多批判，但它提供了一些历史事实。苏联解体后，有俄罗斯学者对这部书进行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如P. A. 麦德维杰夫在为2004年再版的《联共（布）党史》所做的后序中，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称为“共产主义的圣经”，认为它曾影响到当时人们的思想认识和职业选择。他在这篇后序中逐章分析介绍了教程的内容，具体内容可参见P. A. Медведев. Научное послесловие. История Всесоюзн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Москва. Логос. 2004。另一位学者Г. Д. 阿列克谢耶娃在其著作《俄国历史科学，意识形态，政治（20世纪60~80年代）》中，也用一定篇幅分析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她认为，尽管这部教程在当时不仅对苏联历史产生了影响，还对苏联以外的社会主义阵营产生影响，但后来人们对这部书的研究并不透彻。实际上，教程对20世纪前期苏联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如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集体化运动、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及一些老布尔什维克的活动等都有论述与评价。具体内容参见Г. Д. Алексеева.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 в России. Идеология. Политика 60-80-е годы XX века Москва. 2003. сс. 30-36。

② 这一六卷本的《苏联共产党历史》是分批出版的，最早的一批1965年出版，后来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出版齐全。中译本能够见到的主要是第一卷和第二卷。

③ 《党的建设》开始是苏共中央委员会批准出版的期刊，在1929~1946年每月出两期，战争中有间断。后来作为党建的专门著作，对党的思想、组织建设、党务工作等方面的各项原则都做了比较详尽的论述。本书主要参阅彼特罗维切夫主编的《党的建设》1978年增订第五版。

④ 本书主要参阅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87年的版本。

⑤ 这是从1957年开始出版的党史专刊。

《共产党人》^①，还有《真理报》《消息报》^②《共青团真理报》以及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发行的报刊等。从1946年开始发行的《党的生活》杂志一直发行到1991年苏共被解散时。这个杂志主要刊登苏共中央文件、决议以及对基层党组织活动情况的介绍，还有一些基层党组织工作人员对党务工作的看法、回忆等^③。这些材料是写作本书的重要依据。

苏联解体后，随着很多重要档案材料的公开，与基层党员及广大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党的政策，以及苏联时期被严密封锁的信件、克格勃与政府其他部门的档案资料得以公开，经过当代学者的收集与整理，也为研究苏联时期的历史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资料，如A. 别列洛维奇主编的《紧急状况委员会—国家安全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眼中的苏联农村》、维克多·达尼洛夫等主编的五卷本系列档案汇编《苏联农村的悲剧：集体化与四处出击（档案材料与文献，1927～1939）》，及其主编的档案汇编《菲利普·米罗诺夫：1917～1921年时期的静静的顿河》，A. H. 雅科夫列夫主编《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之《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1928～1929年联共（布）中央全会速记记录》（五卷本），由国立奔萨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维·康德拉申主编的《苏联1932～1934年饥荒》第2～3卷，以档案材料为主，集中收集了1929～1934年的一些与饥荒有关的档案文献^④；还有沈志华主编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以及

① 这个刊物从1919年出版，到1929年，主要刊载党史的重要事实材料；到1989年又重新出刊，刊名为《苏共中央通报》，登载了许多党史重要材料，1991年苏共被解散时停刊；《共产党人》是苏共主要理论刊物，1991年苏共被停止活动后，改名为《自由思想》。

② 前者为苏联共产党的机关报，后者为苏维埃政府的机关报，两者报道内容的侧重点不同，但都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报刊。

③ 《党的生活》与其他两个期刊有关，即1919年起发行的《俄共（布）中央通报》，1929年被新的、比较通俗化的政治宣传杂志《党的建设》所取代，到1946年，更加通俗的《党的生活》取代了《党的建设》。1991年苏共被宣布停止活动后，这个杂志更名为《实业生活》。

④ Под. ред. В. В. Кондрашина, ид.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 – 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первый. 1929 – июль 1932. книга I.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2012; Отв. Составитель В. В. Кондрашин.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 – 1934. 3т. лето 1933 – июль 1934. М.: МФД, 2013.

不久前由毛俊杰翻译成中文的《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等^①。这些档案材料的公开，对于当代研究者辨别苏联历史的真相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原苏联或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历史文献

在苏联共产党被解散之前，关于苏联共产党建设的著作、文章还是很多的。无论是专门论述基层党组织的理论与组织建设问题，还是在党史中所涉及的内容，其专门论著或相关著述可谓数不胜数。苏联解体之初，由于人为破坏，一些苏共档案文献被损毁或者遗失，不过，我们还是能够找到不少材料。从文献出处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苏联时期党的领导人的回忆录，反映各时期社会政治生活主题的历史著作、文学作品

这类材料主要包括两种，一是苏联时代发表的一些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的回忆录，如对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等人的革命活动的回忆，对朱可夫等军队领导人的回忆录，以及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撰写的有关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领导人的传记和回忆，对他们时代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看法的著作和文章等，如沃尔科戈诺夫的《斯大林胜利与悲剧》，卡尔波夫的《大元帅斯大林》，伊萨克·多伊彻的“先知三部曲”，《布哈林文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回忆录》，罗伊·麦德维杰夫的《让历史来审判——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赫鲁晓夫政治生涯》、《赫鲁晓夫时代》，布尔拉茨基的《领袖和谋士》、《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阿夫托尔哈诺夫的《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肖洛霍夫文集》，巴齐尔·凯布莱的《当

^① Под. Ред. А. Береловича, В. Данилова. Советская деревня глазами ВЧК-ОГПУ-НКВД. 1918 – 193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5; Под ред. В. Данилова, Р. Маннинг, Л. Виолы. Трагед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деревни.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я и раскулачивани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в 5 томах. 1927 – 1939.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1999 – 2006гг; [俄]丹尼洛夫等编《菲利普·米罗诺夫：1917～1921年时期的静静的顿河》，乌传袞、温耀平译，人民出版社，2010（А. Н. 雅科夫列夫院士主编《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系列）；А. Н. 雅科夫列夫（А. Н. Яковлев）院士主编《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之《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1928～1929年联共（布）中央全会速记记录》（五卷本），李方仲等译，人民出版社，2007～2008；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英]奥兰多·费吉斯：《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代苏联社会》，伦纳德·夏皮罗的《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罗伯特·康奎斯特主编的《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等。这些著作或文章虽以苏共领导的政治活动为主题，不是直接介绍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作品，但对当时国家政治生活的记录具有写实性，有一定参考价值。

二是苏联共产党或国家政治出版机构发行的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和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情况的政治、历史著作，如《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的共产党》《伟大卫国战争时期苏共历史问题》《苏共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斗争》等，还有一些反映各时期社会政治主题或基层党员、共青团员生活情况的文学作品，如《顿巴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敌人后方》等。这些材料对于了解苏维埃政权早期社会情况、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时期人们的精神风貌、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党员与民众的爱国热情和爱国行动都有一定帮助。

2. 苏联解体后，一些政论家、党史研究者的著作、回忆文章以及文学作品，当今在报刊和网上依据新材料发表的新观点、新看法

苏共解散、苏联解体后，不少党报党刊停止发行或更改名称，论述党的建设、基层党组织问题的文章几乎见不到了。苏联解体20多年来，俄罗斯及独联体其他各国社会学家或历史学家所探讨的问题侧重于党的上层领导的决策得失，探究一些影响苏联历史发展进程的大事及人物活动，如十月革命是否顺应了历史进程，斯大林体制对苏联社会发展的影响，对斯大林个人的评价，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存在哪些问题，对苏联民族政策的评价，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改革是对还是错，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对苏联解体应负的责任等。也就是说，人们关注的焦点是苏联发生“质变”的过程，而对于来自党的基层的“量的变化”则很少探讨。

对于苏共与苏联解体的关系，几乎每一个当事人都有一些说法，如戈尔巴乔夫的《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尚未结束的历史》，雅科夫列夫的《一杯苦酒》，普里马科夫的《大政治年代》，利加乔夫的《警示》，雷日科夫的《改革：背叛的历史》《大动荡的十年》，利加乔夫的《戈尔巴乔夫之谜》，博尔金的《戈尔巴乔夫沉浮录》，切尔尼亚耶夫的《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久加诺夫有关斯大林的历史地位的评价和他对赫鲁晓夫、苏共20大的看法，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的《俄国共产主义的灭

亡》等。在这些著作中，有人为自己当初的选择辩解，有人反思历史教训。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进入新世纪的俄罗斯，在展望新世纪前景时，对昔日辉煌不再感叹。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的对话录《20世纪的精神教训》《“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的《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苏联领导人对历史的反思。还有来自西方国家研究者的回忆与思考，如小杰克·马特洛克的《苏联解体亲历记》、雷切尔·沃克的《震撼世界的六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怎样葬送了苏联》、威廉·奥多姆的《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等。

2005 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在俄罗斯及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一些国家都举行了纪念活动，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对于苏联战胜德国法西斯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对斯大林为建设强大的苏维埃国家、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的贡献给予了肯定。在这前后，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为纪念斯大林诞辰 125 周年的演讲《强国的建设者》，从地缘政治角度对斯大林的大国思维、为强大的苏联国家所做的一切进行了分析和阐述，有助于人们了解今日俄罗斯对斯大林及其时代的看法与评价。2006 年是苏共 20 大召开 50 周年，在年初，俄罗斯报刊、网站上就登载出一些回忆文章，有的是对有关苏共 20 大的新材料的看法，有的是结合苏共 20 大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重新反思^①，如《独立报》2006 年 2 月 15 日所登尼古拉伊·托洛依茨基的《二十大未被汲取的教训》，该报 2006 年 2 月 17 日登载的布尔拉茨基的《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时代已去，但它的影响没有消失》，俄罗斯国家网 2006 年 2 月 14 日登载的《久加诺夫谈苏共二十大的遗憾》，以及在这前后戈尔巴乔夫对苏联解体的遗憾等文章。从表面看，这些著作或文章写的都是苏联领导阶层的事，但有关这些领导人的评价的社会调查，正好反映出民众的心态以及党的上层领导活动对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影响。

^① 有关当今俄罗斯反思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重新评价斯大林的情况可参见吴恩远《俄罗斯重新评价斯大林》，《历史研究》2003 年第 5 期；吴恩远《俄罗斯重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 年第 6 期；吴恩远《俄罗斯重评斯大林续》，《马克思主义研究》2004 年第 1 期；吴恩远《再谈俄罗斯反思历史、重评斯大林思潮》，《世界历史》2006 年第 2 期。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在俄罗斯史学界，悄悄出现了专门研究苏共历史的成果，如《苏联共产党历史》《从军事工业走向军工综合体：苏联的军事工业（1917年至1941年6月）》^①。前者是俄罗斯学者重新编写的一部苏共党史，它与苏联时期的苏共党史最大的不同，是把苏共的历史从最初建立一直写到苏联解体，而在时间段上更延伸至2012年。无论其具体内容怎样，它可以使人们对苏联共产党有一个整体历史时期的了解。书中将整个苏共历史划分为1883～1920年、1920～1939年、1939～1945年、1946～1984年、1985～1991年这样几个时段，分别以初建时期、工业化时期、战争时期、民主化时期、改革时期来描述这几个时段的主题。对这几个时段的特征描述是：革命与战争时期、苏维埃共产党员的党、伟大卫国战争前夜以及战争年代、和平生活时期、苏联改革年代，最后还有两章专门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后苏联时期的共产主义运动。后者主要介绍苏联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全书有这样几章：内战与新经济政策初期的苏联军事工业（1917～192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军事化”（1927～193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军事工业（1933～1937年）；苏联的军事生产（1938～1941年）。这类成果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苏联解体后，专门研究苏共历史的著作极少或者很难见到的情况已在逐步改变。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苏联历史和苏共党史是构成俄罗斯全部历史阶段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有专门的研究成果。

除了原苏共领导人以及专门研究苏共历史的著作外，在当代俄罗斯还有一些历史学、社会学研究著作与文章，从一些侧面反映了苏联时期的社会情况与党的基层组织活动、广大党员的生活与工作情况。例如，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谁扶持起了戈尔巴乔夫》，亚历山大·舒宾的《苏维埃国家的十个谎言》，亚历山大·舍维亚京的《苏联是怎样灭亡的：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谁准备了苏联的瓦解》，E. Ю. 祖布科娃的《波罗的海国家与克里姆林宫（1940～1953年）》，亚历山大·希

^① Отв. Ред: А. Б. Безбородов. науч. Ред: Н. В. Елисеева,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14. ; Соколов А. К, От военпрома к ВПК: советская военн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1917—июнь 1941 гг. М: Новый хронограф. 2012.

罗戈拉特的《持不同政见者（1956～1990年）》，A. H. 萨哈罗夫主编的《20世纪祖国史》，A. C. 奥尔洛夫等主编的《俄国史：教科书》，Л. Н. 捷尼索娃的《消失的俄罗斯农村：20世纪60～80年代的非黑土区》，谢尔盖·卡拉-穆尔扎、根纳基·奥西波夫的《苏联——未来的文明：斯大林的创新》，卡拉-穆尔扎的《俄罗斯共产主义：理论、实践、任务》，伊戈尔·贝霍洛夫的《被诬蔑的伟大领袖：关于斯大林的谎言与真实》等，这些著述分别从苏联时期的政府决策、高层政治变更、苏联宪法对加盟共和国与联盟关系的界定、波罗的海国家与苏共中央的关系、苏联农业与社会经济、社会生活方面反映了苏联时代的社会与政治经济情况^①。“后苏联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在一些描述中也反映出戈尔巴乔夫改革给基层党组织生活带来的影响，如尤·波里亚科夫的《无望的逃离》对80年代末苏共加速发展党员、不严肃的组织生活、人们的失望心理做了比较细致的描述。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历史的真实、可靠性决定了文学作品不能作为历史材料的来源。所以，前面所提到的文学作品，在本书中只是将其作为当时社会情况、民众心理的一种折射，作为其他材料的补充说明，而不是当成第一手材料使用的。

（三）国内研究成果

中国学界一向重视对苏联共产党历史的研究，《苏联共产党历史》的各种版本在国内基本都有译著。有关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苏联国家领导人的传记、政治活动的译著或中国学者的著述也

^① Александр Островский, Кто поставил Горбачева, Москва. Алгоритм, ЭКСМО. 2010; Александр Шубин. 10 мифов советской страны. Москва "ЯУЗА" "ЭКСМО", 2007; Александр Шевякин. Как убил СССР: Величайшая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атастрофа. М: ЭКСМО: Яуза. 2014; Александр Шевякин. Кто готовил развал СССР? М: Алгоритм, 2014; Зубкова Е. Ю. Прибалтика и Кремль. 1940 – 1953. М: РОССПЭН; Фонд первого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Б. Н. Ельцина. 2008; Александр Широкопад. Диссиденты 1956 – 1990гг. М: Алгоритм. 2014;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А. Н. Сахарова.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XX век. Моск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е. 2002; А. С. Орлов, В. А. Георгиев, Н. Г. Георгиева, Т. А. Сивохина.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учебник. Москва, ТК Велби. 2007; Л. Н. Денисова, Исчезающая деревня России: Нечёрноземье в 1960 – 1980 – е годы. Москва. ИРИРАН. 1996; Сергей Кара-Мурза, Геннадий Осипов. СССР-Цивилизация будущего. Инновации Сталина. Москва. Эксмо. Яуза-пресс. 2010; Игорь Пыхоров. Великий оболганный Вождь. Ложь и правда о Сталине. Москва. Яуза-пресс. 2010.

很多。这些译著多出自一些对苏联及俄国历史有深入研究的资深学者之手，翻译多数准确可信，使本书写作省却了不少翻译阅读劳动，并且在阅读中能够体会到前辈们严谨扎实的学风。

在苏联解体后的20多年间，与俄罗斯学界相比较，中国学者对苏联共产党的研究更多些。其中有对苏联历史从建立到解体的纵向、宏观研究，如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的《苏联兴亡史纲》^①，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的《苏联兴亡史》，在回顾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从产生到解体的过程中，对苏联解体教训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其中对苏联共产党在各历史时期的作用、苏共失败的原因也做了一定阐述。这些学者对苏联解体原因所持观点各异，给读者以不同角度的启发。沈志华、于沛等编著的《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苏共历史大事实录》，概述了1898～1991年从俄国社会民主党到苏联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本书写作与思考有材料与思想观点上的帮助。张伟垣等著《苏联兴亡和社会主义前景》第六章“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从党的执政地位与领导作用、党的组织原则与领导体制、党群关系等角度分析苏联共产党执政的得与失；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组织编写的《苏共的失败及教训》，从苏联解体原因入手分析苏共失败的教训。黄苇町的《苏共亡党十年祭》，总结了苏共失败教训，分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性。近年来，中国学者十分注重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界新成果与新材料的翻译与研究，一些新著正不断面世，如李慎明主编的《历史的风——俄罗斯学者论苏联解体和对苏联历史的评价》《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苏联解体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等。这些材料对于丰富国内有关苏联历史问题的内容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对中国学界以及思想界一些分歧和争论起到了“用事实说话”进行分析辨别的作用。不过，上述著作主要从宏观角度分析苏共领导的得失，特别是苏共领导在决策与实践上的成功经验与失败的教训，还没有细化到把苏共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一个完整独立的体系来研究。并且，包括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论家及历史学

^① 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的《苏联兴亡史纲》在阐述苏联兴亡历史的同时，对书中涉及的几乎全部重大历史事件都做了有理有据的分析与评价，所采用的材料多是近些年在俄罗斯和中国苏联史学研究方面的新成果和新著述。本书在相应章节中借鉴了该书中的一些观点，在此对该书各位作者深表敬意与谢忱。

家对苏联共产党失败原因的分析，多集中于苏共历史上的积弊以及戈尔巴乔夫时代出现的各种问题，有的学者基于对苏联社会主义体制导致解体这一原因的认识，把主要目光放在苏联共产党的种种失误或原则性错误上。实际上，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与巩固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在生产劳动中，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苏共基层党组织起到了组织者和先锋队的作用，有丰富的经验值得借鉴，而不能仅仅因为苏共失败、苏联解体就将苏联共产党历史上的全部功绩与成就抹杀。有关苏共基层党组织在苏联历史上的成功经验，以及苏共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客观评价这类专门研究著作在目前还比较缺乏。

总体而言，在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对苏共基层党组织的研究可从苏联共产党的各种文件、档案及文章中查找，但需要辨别一些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说教，以及出于意识形态原因对事实的歪曲；90年代以后，出于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遇挫折、俄罗斯社会转型等原因，在俄罗斯研究苏联共产党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度受到冷落，而专门从事苏联共产党基层党组织研究的成果几乎很少见^①。不过，在一些苏联时代的政治家与社会活动家的回忆录以及当代一些历史著作中，还是有一些比较零散的论述，需要整合与重新辨别整理。最近几年来，在俄罗斯开始出现新编的《苏联共产党历史》之类的书籍。而在当代西方学界，专门研究苏联共产党历史的书籍有一些，不过大多是从揭示“历史真相”的角度，对苏联时期的政治清洗、饥荒以及对受害者情况的访谈和档案材料的记述。这类成果中有一些可以作为当时基层党员群众生活的基本材料，而有的材料因真实性还需考证，也就不能采用。相比较而言，自苏联解体以来，中国国内在这个方面的研究成果更多些，主要是分析苏共党建与苏联解体的关系。不过，国内学界的成果多属理论研究，而实证性研究苏共基层党组织的成果目前几乎未见。就此意义来说，本书具有一定的原创性与开拓性。当然，本书毕竟是在前面无数学者、政论家的著述基础上进行研究，所以对他們所做的理论或材料的铺垫笔

^① 有关苏联解体前后俄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情况以及俄国马克思主义当代研究现状，可参见弗·布罗夫、李燕《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俄罗斯并不过时——俄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概况与主要流派》，《国外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陈红《布兹加林的马克思主义再现实化思想述评》，《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1期。

者充满敬意与感激。

三 苏共基层党组织的概念内涵及其组织结构与主要职能

研究一个问题，首要的是必须明确所研究的目标是什么，它的基本概念是什么，以及研究时段与范围。本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苏联共产党基层党组织，即在苏联共产党研究范畴内，对它的基层党组织进行系统研究。从学科划分角度来说，这项研究属于苏联共产党历史研究，从政党学说角度来看，也属于政治学范畴。在基本概念上，需要明确基层党组织在党的组织机构中的地位、职能、结构和作用以及工作机理。在时间段上涵盖苏联全部历史，但俄共（布）早在十月革命前，也就是苏联历史开启之前就已经成立，因此，本项研究的时段要更早一些。在研究范围上，既包括基层党组织问题，也反映了苏联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些或大或小的问题。由此，本项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苏联时期执政党和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底层的、基本的问题。

作为基层组织，苏联共产党基层党组织在几十年间组织结构、规模、职能、工作方式等有一个逐步变迁的过程。这主要是苏共根据国内形势和斗争的需要对党组织结构以及职能进行调整的结果，当然，也有基层党组织因形势变化在职能与作用上被弱化的因素。从其沿革与变迁中不难看出，在苏联各个历史时期，尽管基层党组织的职能与作用大小不同，但作为执政党的基层组织，在组织机构中，它始终处于“有组织”“有领导”的状态。而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由于多党制的实行，以及总统制以及苏维埃选举等“民主化”措施，苏共基层党组织在组织结构和功能上被人为弱化，从而造成严重的组织结构松散、职能不清、党员严重流失等现象。

（一）基层党组织的定义

基层党组织是苏联共产党组织的一个部分。关于基层党组织的定义，在苏联共产党的党章、决议以及有关党建问题的各种文件、书籍中都有规定。例如，苏共党章中写道：“基层党组织是党的基础。……党的基层组织由区委员会、市委员会或相当的政治部批准。”1978年版的《党的建设》一书中对于这句话做了进一步解释：“既然劳动群众集中在工厂、集体农庄、国营农场以及各种机关和团体中，所以在基

层中，在人民群众和工人阶级中进行活动的组织，也就应该成为共产党的基础。”也就是说，基层党组织是党的基本组织，在行政级别上，基层党组织是属于党的区、市委员会或相当的政治部领导下的组织（见图 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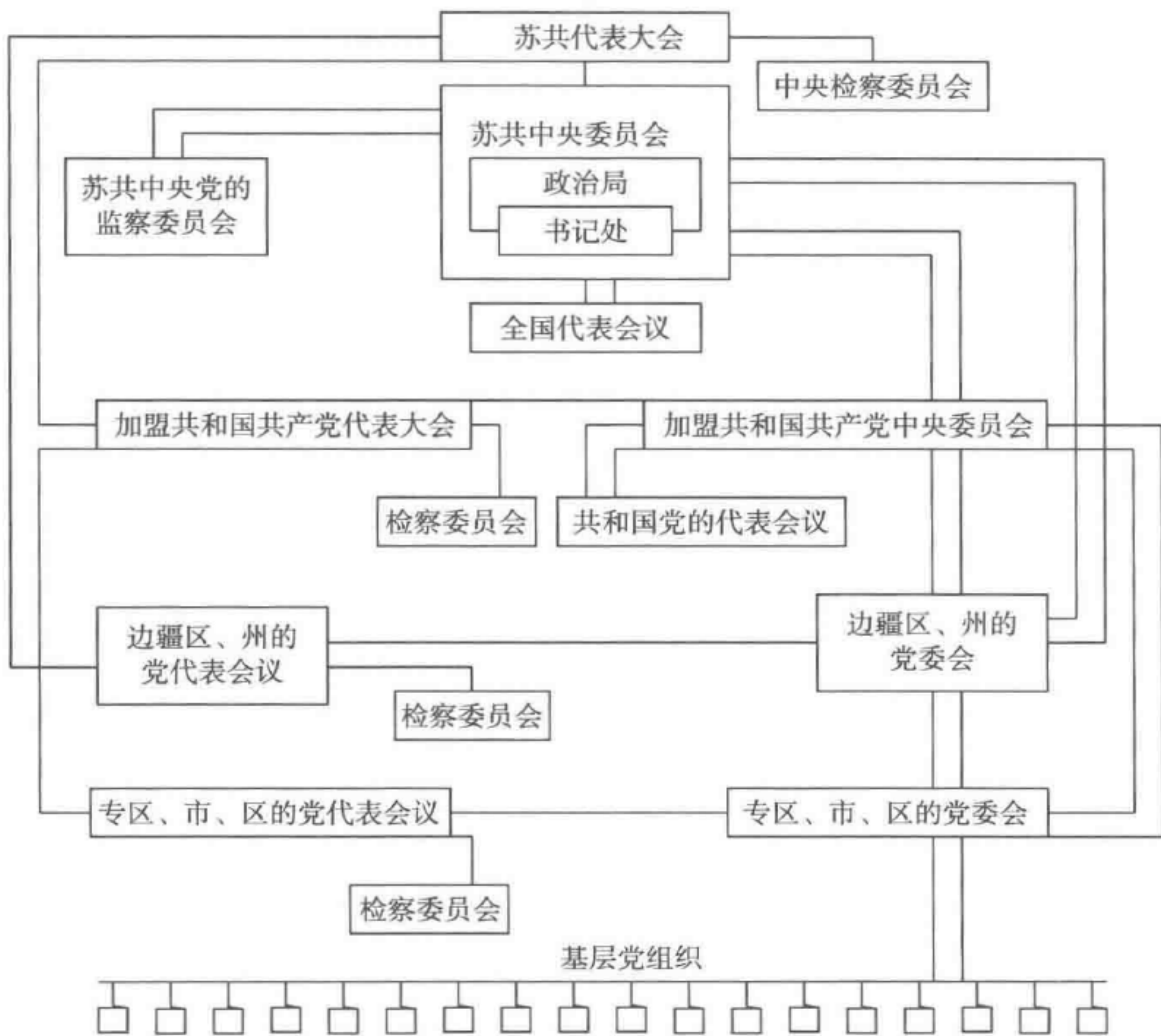


图 0-1 基层党组织在苏共组织机构中的位置

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州和边疆区的苏共州委会及边疆区委会直接从属于苏共中央委员会。在没有州的建制的加盟共和国，党的市委会和区委会直接从属于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各共和国共产党的建立情况是：1918年6月，建立了土耳其斯坦共产党；中亚共和国按民族划定界限后，产生了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和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共产党；1918年举行乌克兰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加入俄国共产党（布）；1918年10~12月，建立了立陶宛、白俄罗斯、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共产党；1920年，南高加索各共和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共产党成立。到1991年之前，除俄联邦外，所有加盟共和国都有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俄联邦内的边疆区和州的党组织，由苏共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

资料来源：〔苏〕H. A. 彼特罗维切夫主编《党的建设》，郭华等译，求实出版社，1983，第145、204页。

苏共《党建词典》中对基层党组织一词有比较详细的解释：

党的下层的、群众性的环节，构成党的基础。

基层党组织根据党员的工作、服务或学习地点创建——在工厂、矿山，在国营农场和其他企业，在集体农庄，在苏联陆军和海军部队，机关，学校等等。它的成员不少于3人。必要时可以根据党员生活地域来创建区域性的基层党组织。在个别情况下，经过州、边疆区、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批准，加入生产联合公司并且位于同一个区或者同一城市的几个区的几个企业，可以联合建立基层党组织。

基层党组织对党的生活与活动，对党的群众政策的实行，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是将共产党员团结到党的集体中的总的、包罗万象的形式。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加入一个基层党组织。

在实际活动中，基层党组织领导苏联共产党的纲领和章程的制定。它是劳动集体的政治核心，直接在群众中工作，把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组织他们完成共产党员的建设任务，积极参与执行党的干部政策。

党的大会是基层党组织的最高机关。为完成当前工作，在基层党组织中选出党委会或党的机关，其人数由党员大会确定。在党员人数少于15人的基层党组织，不选举党的机关，而只是选出1名党组织书记和1名副书记。大的基层党组织内可建立车间党组织或党小组^①。

这里对基层党组织的性质、结构、作用，以及领导成员的职位设置等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结合以上规定，本书给基层党组织所下定义为：苏共基层党组织是在苏联共产党区、市委员会或相当的政治部直接领导下，在工厂、矿山，在国营农场和其他企业，在集体农庄，在国家武装力量中的团^②，机关，学校^③等基层单位中，设立的党的基层委员会、支

① Редактор-составитель И. А. Швец. Словарь по партийному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у Москва 1987. сс. 208 - 210.

② 在苏联陆军和海军中，在团、独立部队（营、炮兵营、连、炮兵连、大队以及与它们相当的分队）、一二三级舰艇、小型舰艇大队、司令部、管理部门（部）机关，凡有党员3人以上的，由相应的政治部建立基层党组织。

③ 学校包括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八年制学校和初等普通学校等。在高等学校中设立党委会，领导各系党组织。

部委员会。必要时可以根据党员生活地域来创建区域性的基层党组织。它的成员不少于3人，有权力接收新党员，进行党员登记、审查党员人事档案等工作。在人数较多的大的基层党组织内，还可建立车间党组织或党小组。这种基层组织下的党支部、党小组一般没有权力接收党员，只是从事党员登记、审查党员人事档案等具体工作。

在广泛意义上可以讲，凡是在党的区、市委员会或相当的政治部直接领导下的党组织都可称为党的基层组织。就准确意义来说，只有在党的区、市委员会或相当的政治部直接领导下，不少于3名党员，有权力接收新党员，进行党员登记、审查党员人事档案等工作的党组织才可称为基层组织；没有权力接收党员，只是从事党员登记、审查党员人事档案等具体工作的基层组织下的党小组不能算做党的一级组织。

本书所使用的基层党组织一词，主要是广泛意义上的基层党组织概念，也就是在苏联共产党的区、市委员会或相当的政治部领导下的党的基层组织，既包括十月革命后一段时间内交替使用的党小组、党支部，也包括苏共17大后广泛使用的基层党组织；既包括按生产原则在工厂、矿山，在国营农场和其他企业，在集体农庄，在国家武装力量中的团以下单位，在机关、学校、科研院所等基层单位中，设立的党的基层委员会、支部委员会，也包括根据党员的生活地域来创建的区域性的基层党组织，以及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在一些城乡根据季节流动作业而组织起来的临时性的党组织。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和考察基层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基层党员在巩固苏维埃政权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伟大卫国战争时期以及苏联解体前后在各行业、各部门所发挥作用的情况。在叙述中也可能会超出基层党组织的范畴，但本书的主旨是研究基层党组织的职能及其活动。

（二）苏共基层党组织的沿革

在苏联共产党历史上，苏共基层党组织的由来与沿革大致经过三个发展阶段，从最初的党小组，到党支部，再到基层党组织。

1. 党小组（партийная группа）

在早期，苏联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是社会民主主义小组。

1883年，普列汉诺夫领导创建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在这前后，俄国又出现了一批社会民主主义者组织，有彼得堡的布拉戈耶夫小组、托契斯基小组和喀山的费多谢耶夫小组，以

及勃鲁斯涅夫小组等，有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后来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小组。1888年，列宁在喀山参加了费多谢耶夫小组中的一个组织的活动，四年后，他在萨马拉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创立了那里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列宁将这视为自己从事社会民主主义活动的开始^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是从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发展而来的，但在那时，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多以单独的、彼此没有联系的小组形式存在。列宁认为，这些单独的小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他曾写道：“在一个专制制度的国家里，特别是在俄国革命运动的整个历史所造成的那种条件下，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只能由小组发展而来。”^②后来，正是这些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在工人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并逐渐走向联合与统一。因此，联合各地方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创建革命政党，后来成为必然趋势。在这个时期，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实际上是中央组织的基层单位。

1898年，在明斯克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把俄国所有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诞生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布尔什维克党。从此，“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③。当时，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加强组织工作。随着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革命形势的发展，基层党组织网的扩大及其活动的加强等问题凸显出来，党小组已经难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党员人数增加的情况，将党小组组织为党支部势在必行。

2. 党支部（партийная ячейка）

党支部这个词最先出现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决议——《关于党的工作的性质和组织形式》中。该决议提出：“必须极力巩固和发展秘密的党支部，发掘这种支部的新的尽量灵活的组织形式；在每个城市建立和巩固党的秘密领导组织。”^④在俄

① 列宁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登记表上关于“1917年以前是否参加过革命运动”一栏里写道：“1892~1893。萨马拉。社会民主主义者秘密小组。”实际上，列宁的革命活动一般从1887年算起。

② 《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第97页。

③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第245页。

④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64，第356页。

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1911年）通过的党章中，对党支部有明确规定：“党支部是党组织的基础。”^①

当然，支部这种组织形式不是一下子就发展起来的。在十月革命前，在秘密活动条件下，在党员人数较少的情况下，不可能有统一的、结构完全如党章所规定的那样的党支部。当时不是全体党员都加入支部，而是根据具体情况，有些党员加入一般的地方组织。因此，直到十月革命前后，作为党的基础，党支部是与党小组共同存在的。但是，那时党支部已经成为党同群众联系的主要渠道，是党针对各类劳动群众进行鼓动、宣传和组织工作，从而不断地教育自己、教育全党、教育全阶级和群众的主要形式。

当时的支部不仅有生产性的，还有地区性的，以及按工会、俱乐部等建立起来的，情况比较复杂，也比较乱，在革命前的党章中没有关于党支部的专门章节。

1919年12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会议上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了党的组织结构，使党的组织结构与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行政区划相适应。这个党章还明确规定，党的基层组织为支部，一个支部不得少于3人，并规定，每个人党的人都必须经过预备期，以便熟悉党的纲领和策略，也便于党组织对入党者的个人品质进行考察。

以后，在党章中对党支部的性质、任务和作用都有明确表述，指出：支部是把一个地区的工人和农民群众同党的领导机关联系起来的组织。它的主要任务是在群众中落实党的号召和决议；吸收新党员；协助地方委员会进行组织工作和鼓动工作；作为党的机关，积极参加国家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

对于党支部的作用，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规定。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党支部的工作主要是在工厂支部的成员中选拔担任行政管理工作、工会工作和其他工作的干部，工厂党支部派遣共产党员到国内战争的前线去，到肃反委员会和征粮队去；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时期，党支部的工作“不应当局限于宣传教育，而应当变成党进行经济工作的基本的战斗机关”^②。其工作应当根据当前政策和“直接涉及群众的物质基础的实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64，第597页。

^②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64，第58页。

际的日常工作”^①来决定。

随着国家建设的展开，工业企业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党组织也相应扩大。1924年在大工厂党支部内建立了车间党支部（开始时为试验性质，后来在党的14大决议中，这种做法得到肯定）。在党章中加进在工人多的大企业，经专区委员会或区委员会个别批准，可在包括整个企业的全厂支部内按车间成立支部。

五年计划期间，大批优秀工人阶级加入，劳动者的文化政治水平和社会主义觉悟提高，党员的先锋作用加强，提高了支部作为群众真正的政治领导者的作用。工业企业和运输业的党支部展开了新的强有力的群众运动——社会主义竞赛和突击运动。

党支部的扩大：1929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在工人超过5000人、共产党员满1000人的大企业内部建立党的工厂委员会来代替全厂性的党的委员会。

随着集体化的完成，农村党员数量有了一定增加，农村党支部也在扩大。

3. 基层党组织（первичная партий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由于党员队伍的扩大，党支部就其成分、职能、任务而言，都超出了旧式支部范围。在党的第17次代表大会（1934年）上，支部改为基层党组织。

在党的第17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专门有一章对党的基层组织做了如下规定：

第四十八条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基础。在工厂、国营农场和其他经济企业中，在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红军部队中，在乡村、机关等地方，凡是有党员三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在党员不满三人的企业、集体农庄和机关等地方，成立预备党员小组或党员和共青团员混合小组……党的基层组织由区委员会、市委员会或相当的政治部批准。

第四十九条 党员人数多的（一百人到三千人或者更多的）大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64，第205页。

企业、机关和集体农庄等等，经区委员会、市委员会和相当的政治部的个别批准，可以在包括整个企业、机关等等的全单位的党的基层组织内按车间、工段、部门等等成立党小组。在车间、工段等组织内，也可以按照企业的工作队、机组工作组等成立党小组。

该党章第五十条和第五十一条规定了党的基层组织的主要任务、领导机构等^①。

在这里，作为“党的基础”的基层党组织与原来的党支部比较，其主要职能是保证共产党员在生产中发挥先锋作用；在组织结构上，规定在车间、工段等组织内，按照企业的工作队、机组工作组等成立党小组。于是，在党的基层组织内又有了更基层的环节——车间党组织和党小组。

以后，基层党组织就成为苏联共产党的一个最基础的、不可少的组织结构，基层党组织的工作也是党的工作的重要内容。在苏共 17 大之后的各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在苏共中央的许多决议中，对基层党组织的任务、工作方法、组织结构等做出了更加具体、更加明确的规定：“无论在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年代还是在战争考验时期，基层党组织都表现出巨大的力量和生命力。”^②

（三）苏共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形式及领导结构

1. 苏共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形式

苏共基层党组织的建立主要依据生产原则和地域原则，结合党员人数而定。

生产原则：基层党组织按党员的工作地点建立，即按工厂、建筑工地、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机关、学校等建立。按生产原则建立起来的基层组织，再按地区联合为区、市和专区组织，后者再组成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组织。管理整个地区的组织，对于该地区内各个部分的党组织来说是上级组织。

地域原则：除以上形式外，也可按照党员在农村和在城市房屋管理区的住址来建立地区性的基层党组织。

^①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编《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求实出版社，1982，第76~77页。

^② [苏] H. A. 彼特罗维切夫主编《党的建设》，郭华等译，求实出版社，1983，第210页。

生产和区域原则，即指在一个生产单位有一个党组织，而在一个行政区范围内始终要有一个把整个地区包括在内的统一的党组织。党的机关以地区为单位，协调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发展。

在人数上，凡党员满 3 人的就可以由区委员会、市委员会、专区委员会或相当的政治部批准建立基层党组织。

在必要时经州、边疆区委员会、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同意，加入生产联合公司并且位于同一个区或者同一城市的几个区的几个企业，可以联合建立基层党组织。

在党员和预备党员不满 50 人的基层党组织以及车间党组织内，按照工作队和其他生产环节建立党小组（见图 0-2）。基层党组织自己可以就此做出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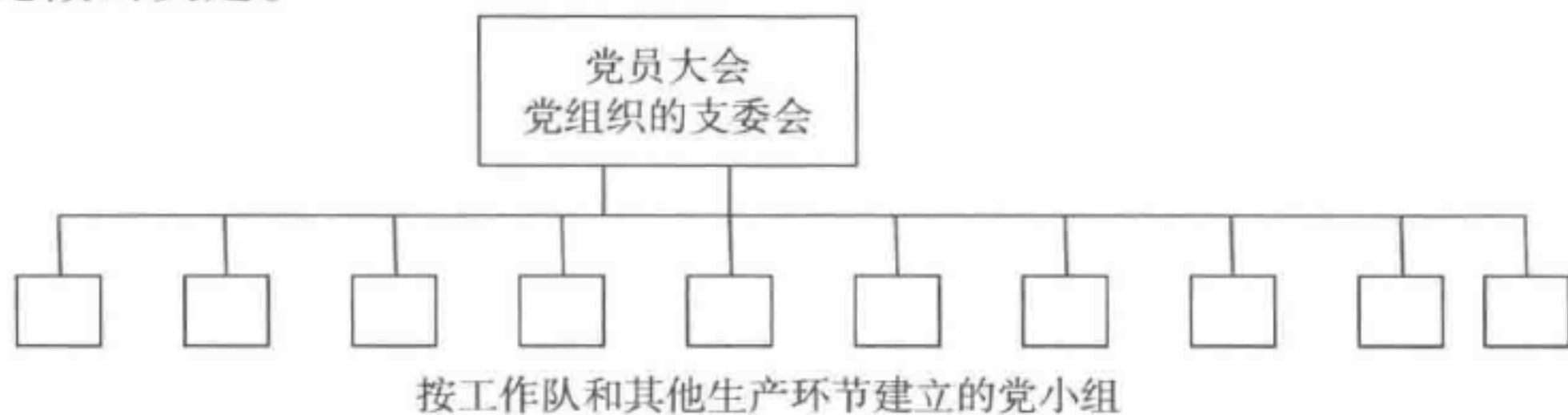


图 0-2 党员和预备党员不满 50 人的基层党组织的机构

资料来源：〔苏〕H. A. 彼特罗维切夫主编《党的建设》，郭华等译，求实出版社，1983，第 211 页。

在取得党的区委员会、市委员会、专区委员会同意的情况下，在党员和预备党员超过 50 人的基层党组织内，可以按照车间、工段、农场、工作队、部门建立党组织（见图 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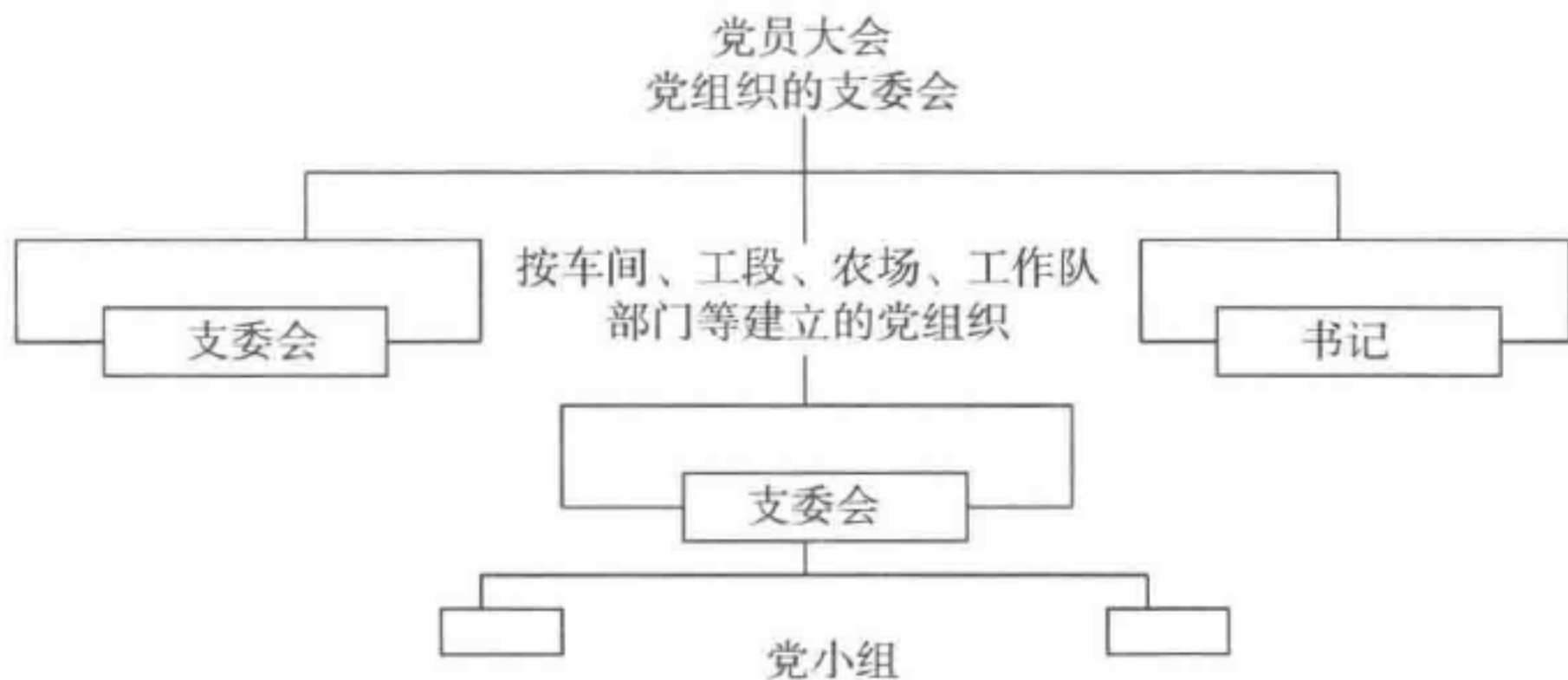


图 0-3 党员和预备党员超过 50 人的基层党组织的结构

资料来源：〔苏〕H. A. 彼特罗维切夫主编《党的建设》，郭华等译，求实出版社，1983，第 212 页。

党员人数满 300 人的基层党组织，经州委会、边疆区委员会、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同意，可以建立党委会。在特殊情况下，也可在党员满 100 人的组织建立党委会。在此情况下，车间党组织享有基层党组织的权力。有党委会的基层党组织的结构参见图 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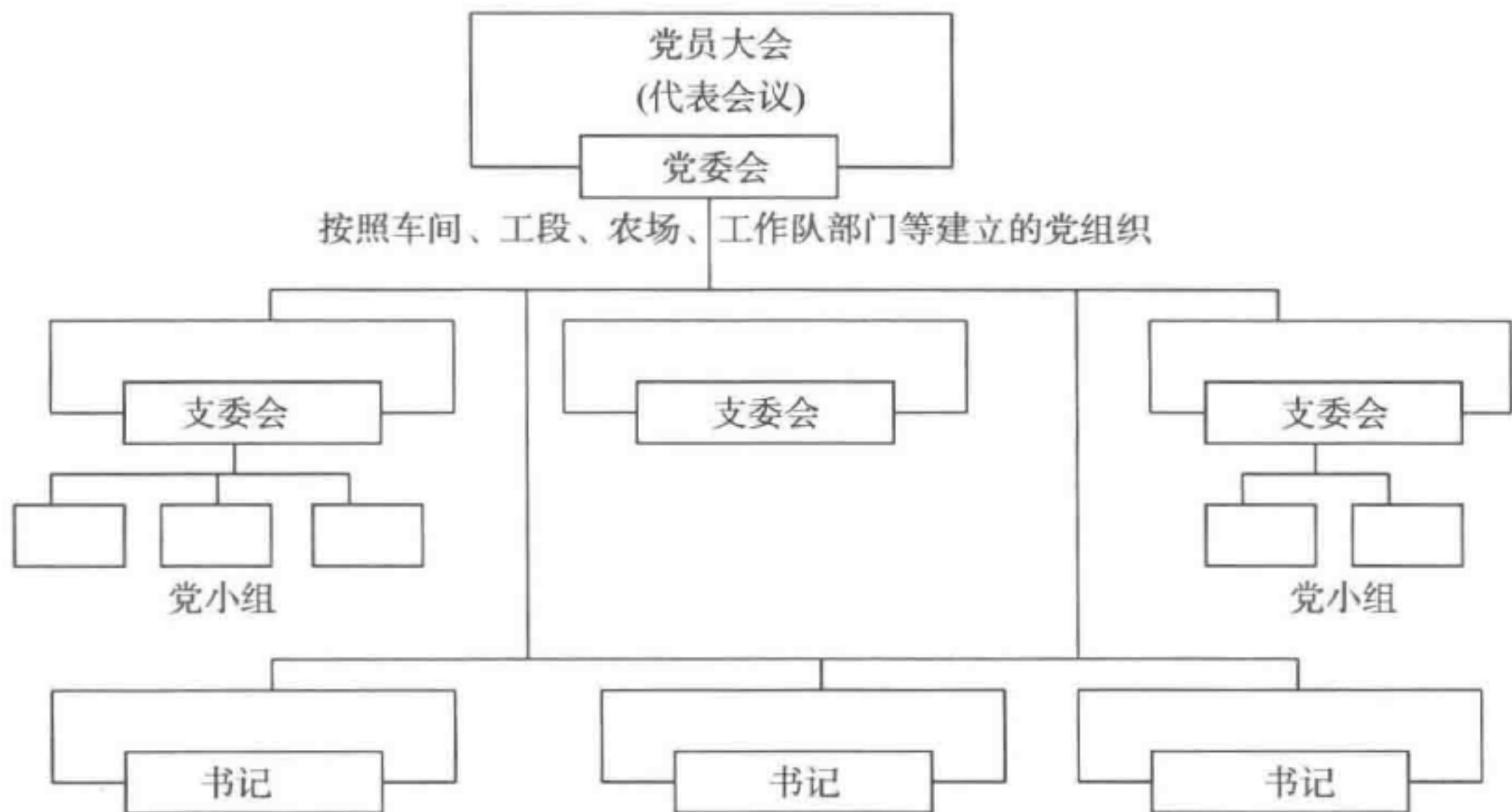


图 0-4 有党委会的基层党组织的结构

资料来源：〔苏〕H. A. 彼特罗维切夫主编《党的建设》，郭华等译，求实出版社，1983，第 213 页。

在个别情况下，党员人数超过 500 人的党组织，经州委会、边疆区委员会、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批准，在大的车间可以建立党委会，生产工段的党组织享有基层党组织的权力^①。

为了在人数众多的大单位更好地展开党的工作，党员人数超过 1000 人的基层党组织的党委会，经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同意（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州和边疆区则要经苏共中央同意），在接收苏共新党员、登记党员和预备党员以及审阅党员个人档案等问题方面可以享有党的区委会一级的权力。党委会的任期为 2~3 年，其人数由党

^① 根据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开始后，工人党员迅速增加的情况，在党的 16 大上做出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向车间和生产组织的决定。1930~1932 年，党对工厂党支部做了组织上的调整。鉴于当时相当一部分城市党支部变成了成千上万人的集体，党中央建议在拥有党员 500 名以上的所有企业中成立党委会、车间支部，在生产组里成立党小组。这样有助于改进党在工厂中的工作和扩大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为了更好地领导城市党组织工作，还在 5 万人以上的城市中成立了城市党委会。

员大会（或代表会议）确定。享有党的区委会一级权力的基层党组织的结构参见图 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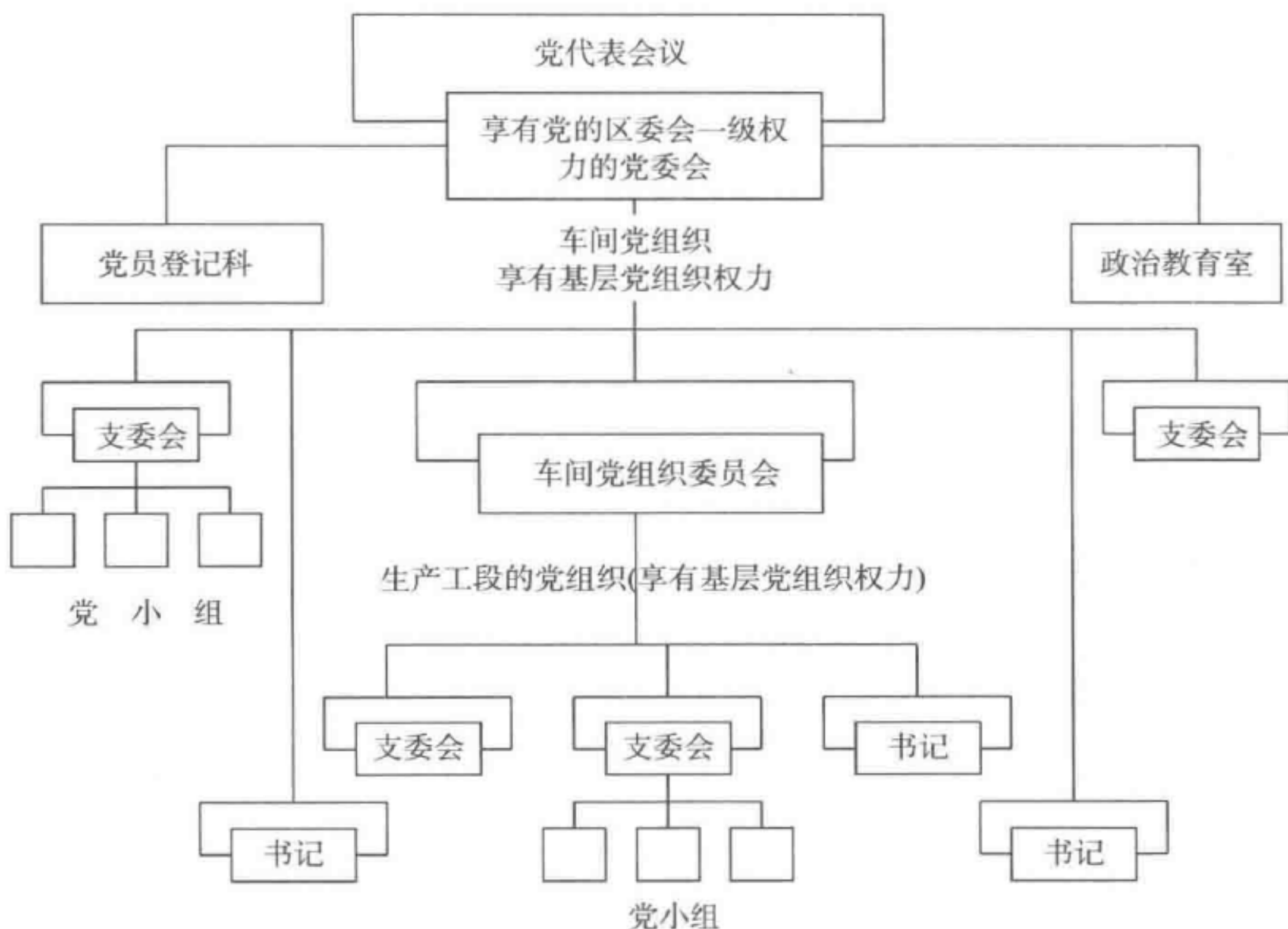


图 0-5 在接收苏共党员、进行党员和预备党员登记以及审阅党员个人档案方面享有党的区委会一级权力的基层党组织的结构

资料来源：〔苏〕H. A. 彼特罗维切夫主编《党的建设》，郭华等译，求实出版社，1983，第 220 页。

可见，基层党组织的组建取决于党员进行生产、工作活动的生产领域的特点，取决于基层党员的人数情况。组建基层党组织是以更好地配置党的力量，加强党组织对各个部门劳动者的影响为目的。

到了 20 世纪 60~70 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在一些流动作业的建筑工地上，建立起临时的党小组。在春播、收割季节时，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的人们需要集中劳动的宿营地，也建立起临时性的基层党支部或党小组。由于组织工作具有灵活性，这种做法得到推广，临时性的党支部或党小组数量不断增加。在党员人数超过 100 人的一般建筑托拉斯和专业化托拉斯里，还建立起由党委会领导的统一的基层党组织，那些在承包分担合同的单位以及在脱离自己所属的托拉斯所在地

方工作的共产党员都由这样的基层组织管理。当然，党员成分的多样化和临时性，给基层党组织在管理、组织学习等工作方面带来一些复杂性，不过，却使基层组织工作更加灵活多样，更接近生产实践，有利于“基层党组织在各部門將工作做到每个人头上”^①，因而，这种临时性的党支部或党小组在全国得到推广。

2. 苏共基层党组织的领导结构

在1934年苏共17大上通过的党章中，对党的基层组织领导成员结构做了如下规定：

党的基层组织选出一个委员不超过11人的党委员会（如工厂党委会等）处理日常工作，任期为1年；车间组织选出党的组织员，由党的基层组织的委员会批准。

党员和预备党员不满15人的党组织，不成立党委会，只选出党的组织员。党员不超过100人的基层党委员会内，党的工作通常由不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担任。党员人数达1000人的党委员会内，应当有2~3个领薪的专职工作人员担任工作。党员人数达到3000人或更多的党委员会内，应当有4~5个专职工作者。

党的基层组织委员会书记至少须有3年党龄，党的组织员须有2年党龄^②。

这个规定在1939年召开的党的18大上有所变更，如在党员和预备党员不满15人的党组织，不成立党委会，只选出一名基层党组织书记，而不采用组织员的称呼；党的基层组织和车间党组织书记要求至少须有1年党龄。综上，苏共党章中对基层党组织的领导结构的规定为：党员人数满15人的基层党组织和车间党组织可选出支委会，委员名额由党的全体大会规定，任期为1年；党员人数不满15人的基层党组织和车间党组织，不选举支委会，只选出党组织的书记和副书记各1名；党的基层组织和车间党组织书记要求至少须有1年党龄。党小组选出1名党小组

^① Спутник партгруппоргао Москва. 1982. с. 3.

^②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编《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求实出版社，1982，第77页。

长，不论党小组人数多少。

（四）苏共基层党组织的职能与作用

从十月革命前后的党小组、党支部，到党的 17 大后的基层党组织，苏联共产党基层党组织的人数、规模、结构等都有很大变化，其主要职能、任务与所发挥作用的情况在不同时期因党的工作任务的变化也有所不同。在 1919 年党的第 8 次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的俄共（布）章程中，规定党支部的主要任务是：“在群众中实现党的口号和决议；吸收新党员；协助当地委员会进行组织工作和鼓动工作；作为党机关，积极参加国家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1934 年在党的 17 大通过的党章中，对基层党组织的任务有了一些补充，并具体化为：“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来实现党的口号和决议；吸收同情者小组成员和新党员并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协助区委员会、市委员会或政治部进行日常的组织工作和鼓动工作；动员企业、国营农场、集体农庄等等的群众来完成生产计划，加强劳动纪律并开展突击运动；同企业、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中的松懈现象和经营不善现象作斗争，经常关心改善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的生活条件；作为党的机关，积极参加国家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①

以后，在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展开以及伟大卫国战争时期，或战后恢复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面开展时期，基层党组织的职能与作用因党和国家所面临的主要任务而有所不同。从总体来看，苏联共产党基层党组织的职能与作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和决议：基层党组织是党的基础，通过生产活动建立起来的基层组织，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与党的领导机关联系起来，是党借以影响每个团体、每个劳动者、每个人的据点。基层组织教育、团结、组织和发动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者去完成党的号召、任务，党通过基层组织直接地、实际地实现自己的政策和决议。

（2）接收新党员入党：基层党组织接收新党员，直接领导党员和预备党员，有责任保证接收新党员的质量。党章规定，每一个入党的人都必须经过基层党组织。此外，基层党组织还要加强共产党员的纪律，加强对党员和预备党员的教育和思想锻炼与组织锻炼。为把党员培养成具

^①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编《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求实出版社，1982，第 76~77 页。

有高度党性的人，基层党组织要对党员进行广泛的多种多样的思想工作，通过党内生活等形式，使每个党员和预备党员都能积极地参加本组织的工作，提高党性。

(3) 参加选举：党的所有领导机关都是从基层党组织开始选举和产生出来的，党员在自己的基层党组织中选举党组织的书记或支委会（党委会），选举出席区或市的党代表会议的代表。区或市的各基层组织代表再选举区或市的党委会和出席州的代表会议的代表，直到苏共代表大会。

(4) 党的舆论的表达者：党把对内对外政策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提交全体党员讨论，这种征询（即弄清楚共产党员的意见和想法）首先是在基层党组织的会议上进行的。基层党组织直接领导共产党员参加党的政策的讨论、制定，参与党的决定和各项决议的形成，参加到党的事务中。基层党组织是制定和颁布党的思想、使共产党员达成一致观点与行动的基本核心。

(5) 行使对行政部门的监督权力：企业、机关、学校的基层党组织都被赋予监督行政部门的权力，而部委、国家委员会和其他中心和地方的苏维埃、经济机关和部门则有权监督劳动机关中党和政府的指示的执行情况^①，维护苏维埃的法律。在履行自己的这些权力的同时，它们发现所存在的不足，同行政部门通力合作^②。

(6) 发挥劳动先锋作用：基层党组织注意提高共产党员在劳动中，在企业、集体农庄、机关学校等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先锋作用。基层党组织以劳动者的组织的形式参加到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中去。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由基层组织发起领导了完成国家计划和劳动者义务的社会主义竞赛，使生产集约化，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将科学技术成果和先进经验广泛深入地应用于生产中。基层党组织动员劳动者发掘内部潜力，以期合理地、经济地利用材料、劳动力和基础资

① 在苏联国家机关、经济机关、交通邮电企业、科研机关、苏维埃机关、创作协会这样一些有很多隶属的组织的机关中，党组织情况比较复杂，与一般工厂企业和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等单位党组织在监督职权上有所不同。苏共党章规定，这些机关里的党组织的活动都局限于本机关的范围，不能扩大到有自己党组织的隶属部门去。所以政府各部、各国家委员会和其他主管部门的党组织不能监督这些部门的全部工作，而只是监督这些机关本身的工作。

② 这里列举的基层党组织对行政部门的监督权利内容，是在1989年的《党建词典》中所列举出来的，在苏共早期的党章中没有具体规定，具体情况可见后文。

源，注意保存和增加社会财富，改善劳动环境和人们的日常生活。

(7) 保证党的统一：基层党组织是把全体党员和预备党员联合为享有党章权利的党的集体的一种普遍形式，在保证党的统一和铁的纪律方面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要完成自下而上的全部领导职能，都要从基层党组织开始。

(8) 引导其他社会组织：苏共章程赋予基层党组织以在法律上保证提高劳动集体在管理企业和机关中的作用，进行号召并引导工会、共青团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工作。

(9) 在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基层党组织同官僚主义、地方主义、本位主义、破坏国家劳动和生产纪律的行为进行斗争；粉碎欺骗国家的企图，纠正企业、集体农庄和机关中的纪律松散、不善于经营、挥霍浪费现象。

从苏共党章来看，这些规定作为苏共党内制度的条文，直到1991年都有明确规定。不过，由于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党的管理混乱，以及多党制与苏维埃选举等因素，导致基层党组织的实际职能与作用极大弱化，很多规定都停留于决议中。另外，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基层党组织所面临的具体事务也不同。所以，在很多时候，上述条文都处于原则性的“指导性地位”，具体工作内容由具体情况而定。

在苏联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领导苏联政治生活的70多年中，基层党组织职能的发挥在不同时期有不同侧重点。例如，在战争时期，主要是在部队和地方发展新党员，扩大党的队伍并增强党的战斗力；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劳动先锋作用，引导和组织工会、共青团以及妇女进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等。在多数情况下，基层党组织都有一些常规性的工作要做，如发展党员、宣传和落实党的政策与决议、召开党员大会、讨论党的重大决定等。而诸如行使对行政部门的监督权力，在党的不同历史时期，情况就各不相同，有时这种职能发挥情况好些，有时监督权力受到来自党中央的政策限制，或因基层党组织自身涣散等原因而不能发挥监督权力甚至失去监督作用。对于如何处理党的组织与其他群众组织的关系问题，列宁、斯大林以及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的看法不完全一致，虽然总体上都肯定基层党组织对于其他群众组织要发挥领导和指导作用，但在不同时期具体做法不同，效果也不一样，有时会出现超出党组织自身职能范围的

现象。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过于强调党组织的作用，而忽视其他群众组织的作用，从而影响到党内以及苏联社会生活中的民主。

总体来看，苏共基层党组织职能与作用的发挥对于基层党组织自身存在具有重要意义。基层党组织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大，党内民主情况也就越好，党的活力也就体现得越明显；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和影响减小，或者说明党内民主不够，党的上层权力过大（如斯大林时代后期），或者说明基层党组织失去战斗力，不能起到先锋模范作用，甚至陷于涣散状态（如戈尔巴乔夫时代后期）。因此，基层党组织职能与作用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党组织建设情况。研究苏联各历史时期基层党组织也主要依据其职能和作用的发挥情况。在苏联共产党被解散、苏联解体过程中，基层党组织已经起不到任何积极作用。从组织结构上看，这种情况的出现实属必然。不过，基层党组织的弱化也反映出苏共执政几十年间活力渐失、基础越来越不牢固的情况。

四 研究时段与研究范围

关于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有人从1898年算起，也有人从1903年算起^①。对于本书而言，这不是核心问题，本书主要探讨作为执政党领导下的苏共基层党组织在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在党的思想建设以及组织建设中的问题，分析苏共基层党组织在戈尔巴乔夫后期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甚至很多基层党组织瘫痪的原因，从而深入探究基层党组织与苏联解体的关系。因此，本书研究时段主要是在十月革命后到苏联解体^②。研究范围包括社会生活各行业、各部门，如

① 列宁曾写道：“从1903年起布尔什维主义就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一种政党而存在。”参见《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第6页。他还曾指出：“1898年春天成立了党。这是这一时期社会民主党人所做的一件最突出的、同时也是最后的事情。”参见《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9，第490页。苏联科学院波诺马廖夫以及波斯别洛夫主编的《苏联共产党历史》将苏联共产党历史从1903年算起。一般来讲，国内也采用这种说法。

② 在分析列宁的建党学说时，需要从列宁的早期革命活动讲起，即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列宁对党小组的活动的论述，以及他在布尔什维克党成立后，关于党的组织形式、斗争方式等的论述，主要是指十月革命前列宁关于党的建设理论内容。因此，对于列宁的基层党组织建设理论的叙述，在时段上超出本书标题所限定的时间，但作为列宁党建理论研究之整体的一部分，在时间上有连续性，在此加以说明。

工矿企业、国营农场、集体农庄、机关、学校及研究机构，还有苏联武装力量等部门的基层党组织情况。当然，基层党组织从政党出现之初就作为其基本细胞存在，俄共（布）的基层组织在十月革命前以及革命过程中都发挥了领导作用，列宁的建党思想尤其是基层党建思想对于苏联共产党基层党组织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本书在时段上并不局限于苏联历史，也包括十月革命前的俄国。

在地域与行政区划上，从理论上说，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以下所属的所有地方基层党组织都属于本研究范畴之内。当然，由于篇幅和时间所限，本书不可能对所有的基层党组织活动都加以研究与探讨，只能从苏共基层党组织的总体状况上进行分析，主要集中在苏共 74 年执政时期、从 100 多个发展到几十万个的基层党组织的很少一部分，不可能详尽地反映各地方基层党组织的全貌，尤其是对于那些俄罗斯之外的加盟共和国，以及诸多民族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在苏联解体后由于语言沟通上的限制、行政管理方面的限制，难以获得当地共产党基层组织的档案材料，限制了研究的范围与视野。不过，笔者仍期望能将这项研究作为一个开端或者是铺垫，基本上反映苏联共产党基层党组织的情况，总结苏共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的经验与教训，为执政党的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一些借鉴。

在主要内容上，本书按照时间顺序，把苏联共产党基层党组织的历史分成三个主要部分：列宁和斯大林时期，这个时期是基层党组织从产生到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时期以及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发挥革命和建设先锋队作用的阶段；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苏共 20 大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以及“三和路线”，党内思想开始出现动摇，不过在基层党组织形式上还是健全的甚至得到加强的；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加速战略的失败以及过早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混乱，还有批判苏共早期领导人带来的社会信仰危机，导致基层党组织思想涣散。

在时段上理顺各个时期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之后，对各时段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成就与失误加以理论总结，主要目的是研究基层党组织与苏联解体的关系，分析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党员群众对苏共失败、苏联解体的态度和看法，从中汲取教训：执政党一定要在群众中打牢思想基础，稳固组织体系，同时不断改革创新，保持自身的先进性。

从逻辑演进上说，苏共基层党组织在组织形式上经历了以下几个演变阶段：

| | | |
|------------|---------|-------------------------|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 联共(布) | 苏联共产党 |
| 党小组 | → 党支部 | → 基层党组织 → 基层党组织 → 被解散 |
| (1898年) | (1911年) | (1934年) (1952年) (1991年) |

而从苏共基层党组织发挥作用的情况看，大体经历了如下几个过程：俄国革命的参加者→国内战争的主力军→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先锋队→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倡导者和参加者→卫国战争中前线后方的战斗堡垒→苏共与苏联社会的基层组织→改革时期组织涣散→被解散。

五 理论价值与应用价值

苏联与中国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有过同样的社会制度，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对中国曾有过的重大影响。当今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国、国际政治舞台上不容忽视的一个国家。中俄关系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组具有较大影响的国家关系，相互之间需要不断深化理解，以加强沟通与协作。这一切都决定了苏联历史研究的重要价值。

(1) 理论价值。在2014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当代俄罗斯学者舍维亚京曾感慨地写道：苏联的“死亡”不只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悲剧”，也是我们历史中最最重要的一个谜。为什么跟所有人的预测相反，连那些把苏联视为“难以接近的堡垒”的势不两立的敌人都感到突然，没有任何原因，没有大的军事失败，没有大规模饥荒，也没有自然灾害，苏联就“死去”了。他进而指出，苏联之“死”并非偶然，没有自然的、历史的“规律性”，苏联是被“打死”的，不是在公开的战争中被打死，而是在地下的战争中，是腹背受敌，被悄悄地、深思熟虑地、无情地打死的。追踪这场世纪罪恶，分析大量的秘密信息，研究全部的悲剧场景，就可以看到，是谁怎样消灭了苏联^①。苏联解体后不久，有关

^① Александр Шевякин. Как убил СССР: Величайшая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атастрофа. М: ЭКСМО. Яуза. 2014. Предисловие.

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在苏联史研究领域就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当今的俄罗斯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研究者以及中国、西方学界的研究者从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意识形态等多个领域对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总结。目前，在中国学界，有关苏联解体原因，多种观点还在争论与交锋中。也许这种争论还要持续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因为一个“超级大国”的轰然解体不可能是一两种因素直接使然，随着俄罗斯以及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档案材料的公布，一些新材料陆续得以公开，人们的各种观点与说法也在不断更正，争议也就不可避免。在已有的各种分析中，主要是从苏共领导人以及苏共中央决策中寻找错误和失误的根源。而作为执政党的基础——基层党组织在苏联几十年的历史中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基层党组织在它的后期是怎样的情况，基层群众对于苏联领导人以及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改革持怎样的态度，对于党被解散群众又是如何看待、如何对待的，目前还没有专门著作来研究。就此意义来说，这是研究苏联历史和苏联共产党历史甚至分析苏联解体原因的一个既属空白又需要理清的内容。本书也是目前国内党建研究领域中以苏共基层党组织建设为主题的为数不多的专门研究成果。

(2) 应用价值。作为一个政党，无论其是否执政，都需要有足够的群众基础。苏联共产党垮台了，但在当今俄国政党派别中，共产党还占有一定席位，俄罗斯共产党还在为俄国社会主义运动而斗争。在目前失去执政党地位的情况下，俄罗斯共产党需要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与政治影响。而要获得群众的支持，首先就应该代表群众的利益，了解群众的要求。吸取苏联共产党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经验与教训，了解民众需求，完善自身建设，使共产党作为代表民众意志的组织，更接近群众，争取得到更广泛的群众支持，对于当今俄共建设十分必要。

与苏联时期情况相近的是，中国共产党也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目前有几千万名党员，基层党组织遍及党的各个地方。在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使党保持活力，保证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保证社会和谐与稳定等方面，基层党组织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加强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加强基层党组织与其他民主党派及群团组织的联系，对于执政党的自律与自我监督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汲取苏共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创新基层党组织工作方法，使之更科学、

高效，在建设民主、法治国家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是本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

六 研究的创新之处与研究方法

不久前有报道称，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米哈伊尔·季塔连科所长、院士以及其他学者指出：“江泽民同志当选总书记后，指示中国社会科学院集中主要精力研究苏联解体经验。过去30年有关论著被大量发表。中国正努力寻找一种方法，既可以避免重蹈别人的覆辙，也可以避免自己犯错。”他们认为，中国重蹈苏联解体命运的可能性几乎没有^①。俄罗斯学者的结论没有错。在中国的苏联史研究领域，围绕苏联解体原因，尽管尚存很大分歧，但研究成果卓著。在苏共党史研究上，也取得了较大成就。其主要目标，不仅仅是要弄清苏联为什么会解体，更重要的是汲取其教训，将其作为“前车之鉴”。就此意义来说，研究苏联历史的人几乎都肩负着一个十分重要的使命，那就是在解读、分析其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同时，找寻历史根源，总结其中的经验与教训。本研究既肩负着理清历史事实、反映历史真相的任务，同时也期望对当今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建设、民主法治社会建设等方面有所启发。在开辟苏共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领域的时候，在学术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也要有所创新。

（一）创新之处

第一，从基层党组织角度研究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历史，分析苏联解体原因，这是一项“艰难的”基础研究，具有开拓性。无论是苏联时代还是“后苏联时代”，对于苏联共产党或者苏联社会情况的分析与研究，一向并不缺乏。但是，从苏联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入手，“自下而上”地观察苏联共产党，成果并不多见。究其原因，一则是这项工作过于庞大和繁杂，难以入手；二则是苏联解体后，在当代俄罗斯以及独联体其他国家，从事苏联共产党研究的学者已经很少，更不要说从事苏共基层党组织的研究，可以参考的现成资料与研究成果极其有限。就此意义来说，从事这项研究本身就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而它对于当今执政党的建设又

^① 《俄专家：中国崛起难阻挡，已解决苏联所犯错误》，《环球时报》2013年10月26日。

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其必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早在布尔什维克党建立前后，列宁就多次强调要发挥党小组的作用。在苏共的党章、中央委员会决议以及苏共领导人的讲话中，基层党组织一直占有一定分量。但是，把苏联共产党基层党组织作为一个专门问题，研究从苏共建立到被解散的过程，尤其是对戈尔巴乔夫时代苏共基层党组织发展情况，在改革时代基层党组织在组织形式、职能、思想等方面的变化加以综合概括与分析，这样的著作目前还比较少见。一方面，由于苏联改革到后期出现混乱，使学者和党务工作者没有精力和时间进行系统研究；另一方面，苏共的解散是一个突然发生的事件，苏共被解散时，很多党的文件与档案被破坏，加上意识形态和经济方面的其他原因，使得苏联解体后苏共基层党组织问题成了一个少有研究的课题。在俄罗斯和中国，尚未见有在全部历史阶段上对苏共基层党组织进行专门的系统分析和阐述的著作。本书把苏联共产党历史的研究视点放在党的最底层：基层党组织，这本身就是研究政党史的新视角。另外，结合组织行为学、文化人类学等研究方法，把社会学研究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中，改变了执政党研究中主要以政治学、行政学为主的状况，力求在政党研究以及苏联解体原因分析方面开辟新路径。

第二，苏联解体前后，苏共与俄罗斯政府就公布了大量档案材料，其中有很多涉及国内战争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政府政策法规、民众来往信件、苏联社会生活等。这些材料对于真实地了解苏联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苏联时代诸多官方报道与会议决议和党的文件的补充，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起到“修正”的作用。充分运用这些材料研究苏联社会的基本情况，了解基层党组织的职能作用发挥情况，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理清苏联社会机体变化的过程，帮助人们更准确地分析苏共职能与作用的变化，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目前，无论在俄罗斯学界还是在中国学界，都比较重视“用事实说话”“以史料为依据”。大量历史档案资料的公开也为此创造了条件。不过，有关苏联时期基层党组织、基层党员群众生活的材料往往分散在其他材料之中，要从中辨别并提取出来，加以整理和运用，就需要做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本研究力求更多地运用新材料和新史料，真实地展示苏联历史原貌，补充相关领域研究中的缺憾。

第三，从组织行为学角度入手，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成败。研究苏联历史，不仅仅要展示其原貌，还需要从中分析其成败得失的原因，汲取经验与教训。苏联共产党的基层党组织作为一个基层组织系统，在不同时期其结构与职能及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这些情况是缘于领导者个人因素还是缘于执政党的制度，抑或受到国家制度的影响？基层党组织要保持其战斗堡垒作用、保持先进性，宣传动员能够起到多大作用？物质刺激能否补充宣传动员体制的不足？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靠行政命令还是有影响的个人，抑或有宣传力的组织？建设学习型政党在基层党组织中如何落实？这些问题有的距离苏联共产党基层党组织似乎很远，有的似乎与其密切相关。运用组织行为学理论分析苏共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成败得失，可以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一个政党要保持先进性，保持战斗力，需要不断学习和完善自身。

同时，本书的目的是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提供借鉴与帮助。在书中，对于执政党的基层党组织如何处理与工会、共青团等群团组织的关系有一定分析。这是从基层党组织角度研究执政党与其他党派群团组织关系的一次尝试。

（二）研究方法

本书主要按照时间顺序，利用档案材料、历史文献，以史实分析为主，对苏共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形式、管理方式、激励机制、在苏联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情况、影响因素等问题展开深入分析，采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组织行为学、管理学等多学科并用的交叉研究方法。

一般而言，在社会科学领域进行某一个问题的研究，往往是对这个问题提出某种假说，然后围绕着这个假说去收集材料，将与自己观点接近的材料或者与之相反的材料都收集起来，再加以对比和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随着材料的丰富，视野的扩展，论题就可能超出最初的内容，而在演绎推理中，最终得出的结论也可能与开始时的假说相去甚远或者得出与原来假说相反的结论。本书基本循着这样一个研究路径，即提出主题“苏联共产党基层党组织产生、发展变化过程”，之后，围绕这个主题，研究基层党组织在苏联共产党历史上走过了怎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是怎样发挥作用的，有哪些因素对基层党组织的变化

产生影响，哪些因素给基层党组织建设带来关键性的作用，在苏共失败、苏联解体过程中，基层党组织处于什么位置，在此基础上得出基本结论。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强调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从历史事实出发分析客观存在的现象。19世纪30年代，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也倡导要“如实直书”。因此，从历史事实出发，尊重史实是史学研究的必要前提。本书立足于苏联历史的基本事实，以事实为依据，力求有可信度，有一定科学价值。同时，历史是人的历史，基层党组织更是涉及苏联社会最广泛的人群的组织。这个组织在苏共存在的几十年间，有一个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在研究中要用辩证发展的眼光来分析和看待它。本研究根据苏联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以及苏共高层对待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观点的新提法，理顺苏共基层党组织内部在思想意识上发生变化的过程，力求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在研究中，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研究方法，客观地看待人们的心态变化，进行比较分析与研究，并采用案例分析的形式，不失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的执政党，苏共基层党组织作为这个党分布最广泛的组织，其管理实践也有借鉴意义。因此，运用管理科学理论对苏共基层党组织在组织结构以及人员管理等方面进行科学分析，也是研究苏共基层党组织的一种手段。

第一章 苏共早期：基层党组织是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先锋队

基层党组织是共产党的基础，是共产党与群众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共产党作为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体现着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同千百万工人群众、全体劳动者的联系。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使党能够深入了解各个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和情绪，并且影响它们。党在实现所有任务的过程中都是依靠作为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的群众，党的力量就在于与人民的联系。同时，也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的强大创造力才能真正发挥，并且对社会发展的进程和结局产生明显的影响，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决定作用之原理的体现。列宁在自己的理论与实践活动中，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革命情况结合起来，深入探讨党的基层组织工作的任务与方法，不断完善党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手段，不仅发动群众，取得十月武装起义的胜利，还在保卫苏维埃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中，注意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宣传和组织群众中的巨大作用。在列宁的基层党组织建设理论指导下，苏共基层党组织在国内战争、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卫国战争中起到了社会主义建设先锋队和社会主义国家保卫者的作用。

第一节 列宁的基层党组织建设理论与实践

列宁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早期创始人之一，又是苏维埃国家执政党的第一位领袖，其党建理论与实践对苏联共产党有着深远影响。

从19世纪末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到1924年逝世，列宁多次撰文论述基层党组织建设。在为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而努力的斗争中，列宁强调在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下面，建立广泛的地方党组织网，以各种形式和职能的地方党小组来加强党的作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统一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建立起来后，为适应党员人数增加、

党组织活动范围扩大局面，列宁又提议将党小组改为党支部，加强党对地方小组活动的指导作用。他还在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失败，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处于低潮状态下，提出将党的公开组织和秘密组织结合等主张。而当革命进入新的高潮时期，他又及时对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出理论与行动指导。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布）成为执政党，列宁从执政党建设角度对基层党组织与工会、青年团等群众组织的关系、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等问题做了阐述，并亲自到工人群众中进行鼓动和宣传。列宁的基层党组织建设理论与实践为苏共基层党组织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并提供了实践指导。

一 列宁的党建理论与布尔什维克党早期基层组织建设

早在1895年秋，列宁就领导建立了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标志着社会主义开始和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斗争协会包括若干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在它的影响下，俄国其他地方也相继成立了一些类似的组织。在组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活动中，列宁主张，工人阶级政党应该把俄国全体人民反对专制制度的民主斗争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斗争结合起来，到居民的一切阶层中进行革命的宣传和鼓动，从政治上揭露专制制度，揭露沙皇俄国整个社会政治制度。只有把这种全民的揭露工作组织起来的党，才能成为革命力量的先锋队。以后，列宁对这个政党的组织体系以及活动方式等提出了系统的理论。

（一）建立一个有严密组织的政党

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但没有制定出党纲和党章，党的地方组织也十分涣散。实际上，俄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还没有建立起来。在以后的几年中，列宁一直为组建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而努力。他在1902年所写的《怎么办？》一文中提出，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全俄的集中组织，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而由全体人民的真正政治领袖领导的组织。他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

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①但是，列宁并不是把全部目标都放在职业革命家身上，他认为党应当是由少数人（主要是职业革命家）和广泛的地方组织网构成的。在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建党计划中，列宁对地方党组织的组织结构、主要工作任务、性质等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述，阐明了基层小组的作用及职能。他主张在每一个城市建立一个统一的委员会来领导本组织的整个生活，同时，集中的、处于地下状态而严格保密的领导机关应当同群众建立密不可分的联系。另外，党的每一个地方组织都由领导者（主要是职业革命家）和广泛的外围小组组成，在这些城市所属的地方组织下，必须成立区小组（指在很大的城市中）和工厂小组。

除了这种由中央到地方之间上下级的组织结构外，列宁还提出，应该建立横向的、各种各样有具体工作分工的小组，如大中學生小组、官员协助者小组、交通联络者小组、印刷小组……他认为：“建立秘密组织的全部艺术应在于利用一切力量，‘让每个人都有事可做’，同时保持对整个运动的领导……”^②列宁特别强调工厂小组的重要性。他说：“工厂小组对我们特别重要：运动的全部主要力量就在于各大工厂工人的组织性……每个工厂都应当成为我们的堡垒。”^③“领导运动的应该是数量尽量少、类型尽量同一、由富有经验的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小组。参加运动的应该是无产阶级各阶层（以及人民中的其他阶级）中数量尽量多、类型尽量多种多样的小组。”^④

在这里，列宁构想的党的组织结构是：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城市委员会、各种小组（区小组、工厂小组以及执行各种职能的小组），以及党的每一个地方组织都由领导者和广泛的外围小组构成。地方党组织的任务有宣传、经济鼓动、政治鼓动、印发书刊（散发秘密出版物）、印发地方的和全党的机关刊物（收集、编写、保管）、组织游行示威、补充和审查党的关于游行示威的文献等^⑤。在这种较成熟的构想的基础

①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06页。

② 《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9页。

③ 《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10页。

④ 《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15页。

⑤ 参见《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60~62页。

上，列宁在1903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建立一个集中的、组织严密的、纪律严格的无产阶级政党，而党的另一个领导人马尔托夫主张建立的实际上是一个组织涣散、没有定型、成分复杂的政党。由此，列宁与马尔托夫在党章第一条内容上产生了严重分歧^①。正如列宁所表明的那样，这种分歧“归结起来说，问题正在于是彻底实行组织原则，还是崇尚涣散状态和无政府状态”^②，争论的实质是维护与反对无产阶级组织性和纪律性的斗争。

（二）“组织起来”，以支部作为新的基层党组织形式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后，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了起来。但是，在组织上，这个党还存在松散现象，列宁多次强调党的组织工作的重要性。他曾在1904年指出：“为了保证党内团结，为了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还需要有组织上的统一。”“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③1905年俄国发生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列宁提出，在新的革命形势下，党必须采取新的斗争手段，寻求新的组织形式，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党应当进行改组以适应斗争的需要。“我们应该利用我们合法取得和非法夺来的自由，来增加和巩固各种各样的党组织。……要稳妥可靠地保持革命的一切实际成果，只有看无产阶级的组织程度如何。”“如果我们不能够大胆主动地建立新的组织，那我们就应该放弃起先锋队作用的空洞抱负。”^④由此，他发出号召“组织起来”，用新的组织形式——支部代替党小组，使社会革命党成为一个有组织、有纪律、能够发挥革命首创精神的政党。在1905年4月召

^① 列宁提出：“凡是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且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都可以成为党员。”（参见《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第63页）。马尔托夫则提出：“凡承认党纲并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亲自协助党的人，都可以成为党员。”列宁条文的出发点是：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应该是尽量有组织的，那些能够为工人阶级的事业忘我斗争并在群众中进行工作的人才能入党；马尔托夫则认为党员只要协助党做一些事情，不一定要亲自加入党的一个组织。在第一次讨论党章时，列宁的观点未获通过。但是，列宁与马尔托夫的这个分歧始终存在。在1917年7~8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中，第一条采纳了列宁的意见：“凡承认党纲，加入党的一个组织、服从党的一切决议并缴纳党费的人，都可以作为党员。”

^②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第104页。

^③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第130、158页。

^④ 《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291页。

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各级党组织，尤其是所有的工人的党组织，都要实行两周报告制，建议：“代表大会应当把第三次代表大会和第四次代表大会中间相隔的时期（1年）分为两部分。前半年每一个党组织，直到我们党的最基层的工人支部，都应当建立好，并且一定要搞好同中央的正常联系，搞好正常的两周报告。”^①就目前所得资料看，这应是列宁首次公开提出“基层的工人支部”^②这个新的组织名称。

1905年堪称俄国政治风云变幻的一年，从年初开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秋天进入高潮。9月19日开始的莫斯科政治罢工，到10月扩展到全国。沙皇于10月17日签署诏书，同意召开“有立法权的”杜马。在10月中旬，俄国出现了资产阶级第二大政党——立宪民主党。工人们则在罢工斗争中成立了工人苏维埃。在新形势和新条件下，社会民主工党必须改变党的结构和党的组织工作形式。11月，列宁在《新生活报》上发表文章《论党的改组》，提出党的改组计划。他指出，在10月17日诏令后，党的活动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集会、结社、出版自由已经争取到了。虽然形势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但党的秘密机关必须保存。不过，除秘密机关外，还必须建立大批新的、公开的和半公开的党的（以及接近党的）组织。同时，在新形势下，还要采用新的组织形式。“新的组织形式，或者确切些说，工人政党的新的基层组织形式，无条件地必须比旧的小组更广泛些。此外，新的支部大概应当是手续不太严格的、比较‘自由的’、‘松散的’组织。”对于新的组织的职能，列宁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每个团体、组织、小组都会立刻选出自己的常务委员会、理事会或管理委员会，总之，就是选出常设领导机构，进行组织工作，同党的地方机构取得联系，领取和散发党的出版物，征收党的工作所需的经费，组织集会、报告会、演讲会，以及筹备党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党的委员会当然必须注意帮助每个这样的组织，提供材料使它了解俄国

^① 《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189页。

^② “支部”这个词并不是列宁首创的。在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领导制定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规定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结构。同盟的基层组织是支部，由3~20人组成。各支部组成1个区部，它们由区部委员会领导。同盟的最高机构是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是最高机构。

社会民主工党、党的历史以及党在目前的伟大任务。”^①也就是说，他认为必须保存党的秘密机关，同时要尽量利用工人阶级争取到的合法机会，成立公开和半公开的党组织以及广泛的外围组织；并提出以新的党组织形式——党支部作为党的主要的基层组织形式，代替过去处于地下状态的党的小组。

（三）将公开与秘密形式的党支部斗争结合起来

1907年“六三政变”^②后，俄国开始了斯托雷平的反动时期，大批革命者遭到杀戮和追捕，革命进入低潮时期。在党内，许多知识分子脱离党组织，党出现了危机。有报道说，在有的地方，由于缺少知识分子工作人员，专区党组织已经灭亡了。而在另一些地方，“那些根本不愿参加秘密组织……而只是在高潮时期，在很多地方真正有自由的时期才加入党的人，都离开了我们的党组织”^③。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强调由工人当中的先进“知识分子”来领导群众。他说：“坚强的秘密的党的中央机关，经常出版的秘密出版物，而更主要的是工人当中同群众有直接联系的先进分子所领导的地方党支部，尤其是工厂的党支部，——这就是我们赖以建立起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不可动摇的坚强核心的基础。这个秘密的核心将会通过杜马和工会、合作社、文化教育团体等空前地无限广阔地伸展自己的触角，扩大自己的影响。”^④

列宁还肯定，在革命低潮、组织涣散、出现了不坚定分子的情况下，要加强理论工作，促进革命队伍的分化。在深入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研究新问题，发展学习小组，以在工人中间培养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的群众领袖等工作中，党支部的“作用特别大，机会主义的分子所深恶痛绝的‘职业革命家’也应当起新的良好作用”^⑤。在

① 《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82~83页。

② “六三政变”是指1907年6月3日，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二届国家杜马，逮捕了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成员，并未经杜马同意，颁布了能保证右派在第三届杜马中占多数的新选举法。人们将沙皇政府这个举动称为“六三政变”，政变标志着1905年革命已经结束，沙皇政府走向反动。

③ 前者的情况出现在库列巴基工厂中的报道，后者则来自乌拉尔的报道。《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第2页。

④ 《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第4页。

⑤ 《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第270页。

1909年的一篇文章中，列宁再次强调在革命处于低潮、党内出现危机的情况下，要进一步发挥党支部的作用：“巩固秘密的党组织，在一切工作部门建立党支部……这些支部和委员会的任务应当是利用一切半合法组织，尽可能地利用合法组织，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每个支部和每个党的工人委员会，都应当成为‘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工作、宣传工作和实际组织工作的据点’……要靠自己的毅力、自己的思想影响（当然不是靠自己的头衔和官位）来争取在一切无产阶级的合法组织中起领导作用。”^①从这段话中可看出，即使在革命处于低谷时期，列宁仍然主张坚持党的基层组织工作，不过，为保持革命力量，党支部主要以秘密组织形式进行工作。

1910年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结束，俄国工业生产由停滞转向高涨，工人队伍扩大，革命情绪增长，罢工运动和游行示威重新活跃。当时，在各地几乎到处都有小规模、不定期活动的党的工人小组和支部，它们在工人中间享有很高的威望^②，沙皇政府宣布将在1912年进行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在此情况下，列宁提出，应该在各地建立支部，进行宣传鼓动，为选举进行筹备工作：“为了立即开展选举运动，社会民主工党的秘密支部必须在全国各地、在一切合法的和半合法的组织里、在一切大工厂、在人民的各阶层和各集团中间立即主动地进行活动。……主动地建立支部（这个词很好地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规模不大的、很灵活的团体、小组和组织是由外部条件决定的）应当成为全体社会民主党人的首要任务，哪怕两三个人，只要能够‘挂上钩’，就应该建立某种联系，开始经常的哪怕是最平凡的工作。”^③他强调，必须抓住有利时机，立即行动起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地的发起支部，应该是有严格党性的秘密支部，它要能立即开始进行选举的筹备工作，立即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来开展宣传和鼓动工作……如果推迟成立这样的支部，那就是损害工作。”^④

① 《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第337~338页。

② 列宁的《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一文介绍了这种情况。参见《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第266页。

③ 《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第355页。

④ 《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第356页。

以后，列宁又多次强调建立支部和加强支部的作用，将公开的支部和秘密的支部工作结合起来，认为秘密的党支部的周围应当有各种各样的合法工人团体，形成公开活动网，作为在群众中进行工作的据点。这种新的组织形式将会有助于党在新的环境下开展工作：“正是因为有这种支部，使得党的建设有可能采取另外的方式。”“这些由合法支部网为外围的秘密支部，可以为我们提供新的基地。”“有支部，同中央机关报有联系，每年联系一次，工作比过去做的多一百倍。”“无论哪里都要在秘密支部的外围建立起合法支部网。”^①

当党内“取消派”^②提出改组党，开展“公开的社会政治生活”时，列宁再次强调，在革命形势高涨的情况下，党的秘密组织仍应是主要活动形式，而支部是它的基本形式：“我们的组织是由各秘密支部组成的，这些秘密支部的外围是有尽可能多的分支机构的合法团体网。”^③

1905～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经历了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也经历了1911年前后的革命高涨时期。在不同的革命形势下，列宁对于建立新的组织形式——半公开或秘密的党支部，通过有组织的支部的宣传鼓动工作，发动群众，做了多次论述，在支部的构成、活动方式、主要职能、作用等方面基本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二 列宁的革命实践与基层党组织在十月武装起义中的作用

1917年2月，俄国发生了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政权，建立起资产阶级政权。布尔什维克党参加了二月革命，但并没有掌握革命政权。4月，列宁回到国内后，亲自到工人、士兵中宣传布尔什维克党的思想主张，在工人士兵中争取更多的支持。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迅速壮大，为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奠定了群众基础。在此情况下，党领导十月武装起义并取得了胜利。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140页。

^② “取消派”：“六三政变”发生后，沙皇政府走向反动，俄国革命走向低潮。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派中，有一些人主张党应顺应杜马俄罗斯的合法条件，广泛建立合法工人党，取消过去的秘密党组织。这一主张的代表人物有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等，这种思想主张的派别被称为“取消派”。

^③ 《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197页。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二月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对待战争的态度上，出现了不同主张、不同派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以列宁为代表的一派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让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口号；普列汉诺夫与“前革命者”格·阿列克辛推出文集《战争》，将沙皇进行的战争说成“正义的”和“防御性的”战争；尔·马尔托夫与阿克雪里罗得等为中派；托洛茨基则提出“不战不和”的主张。社会民主党内对待战争的不同态度导致派别争论。在战争中，有的党组织遭到破坏，有的党员去了前线，党组织再次涣散。《苏联共产党历史》中记载：“战争初期，党员的数目锐减。”“在战争年代里区和州的组织很少，他们只是偶尔才举行活动，同地方上也没有牢固的联系。”^① 不过，随着战争的继续和国内矛盾的加剧，工人中的不满情绪也在增强，新党员人数也在增加。例如，1914年11月彼得格勒有100~120名社会民主党党员，到1917年初，彼得堡党组织已经有2000人，这2000人成为后来十月武装起义的骨干力量；1915年夏在莫斯科有200名布尔什维克，到秋天已经增至500人；1915年春哈尔科夫有近15名党员，到秋天已增至85人，到1916年秋增至200人，1917年初已达到400人^②。与地方的情况不完全一样的是，战争爆发之初，布尔什维克党就开始将自己的力量渗透到军队中，因为“布尔什维克知道，如果不把士兵群众争取到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一边来，那就不能指望革命会取得胜利”^③。布尔什维克在军队中建立党小组，向他们提供秘密书刊。这一工作进行得很有成效，1916年中一份某警察局的报告中就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印发的革命呼吁书在彼得堡流传甚广，其中很多份已传到正在作战的部队和舰队。”^④ 几乎每一个党的委员会都有自

①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т. 3. первый.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67. с. 544.

②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т. 3. первый.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67. сс. 547 - 548.

③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т. 3. первый.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67. с. 559.

④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т. 3. первый.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67. с. 559.

己的军事部，军事部负责在后方部队中开展工作，往前线寄送书刊，组织自己的工作人员去部队中做宣传，在这些部队中建立新的党小组。在北方前线 and 波罗的海舰队中建立了 80 个军事党小组，在西部前线建立了 30 个^①。在党的军事工作中，迪宾柯、伏龙芝等后来的党的军事领导人已崭露头角。军队里党组织的活动为后来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转变做了组织准备，而列宁将党的公开组织和秘密组织结合起来，为党在军队和地方保存了实力。

不过，在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能够取得彼得格勒苏维埃政权，而是由孟什维克取得了政权，临时政府第一任主席李沃夫后来对此总结道：“临时政府有权无力，而工人代表苏维埃却有力无权。”^②这主要是因为，孟什维克在整个战争期间得以合法开展活动，公开露面，他们有像杜马党团这样的重要合法据点，而被迫转入地下的布尔什维克是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另外，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武装起义上，低估了政权问题^③。列宁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没有掌握政权是因为没有组织起来和没有觉悟，应当进一步加强宣传和组织工作，以扩大革命基础。

（二）1917 年 2 ~ 10 月：列宁的领导和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宣传增强了革命力量

二月革命后，列宁冒着被逮捕的危险于 1917 年 4 月回到彼得格勒。他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说明革命的下一个发展阶段是由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阶段，而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使布尔什维克党动员起更多的力量，这是革命胜利的前提。他认为：“一切真正的革命，其科学的和实际政治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积极、自动和有效地参加政治生活，参加国家制度建设的‘普通人’非常迅速地、急剧地增加起来。”^④从 1917 年 4 月到 1917 年 7 月 4 日，列宁在 69 种党的

①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т. 3. первый.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67. с. 560.

②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т. 3. первый.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67. с. 560.

③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т. 2.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66. сс. 676 – 677.

④ 《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 41 页。

机关刊物上发表了 175 篇文章和札记，宣传布尔什维克的思想主张，呼吁将政权交给布尔什维克党^①。

这个时期党的主要工作是动员并组织群众。由于进行了有力的宣传工作，党的队伍在几个月间急剧扩大：1917 年 1 月，党员人数为 2.3 万人，到 4 月就增加到 8 万人，党组织有 78 个，而到 1917 年 7 月，党员人数达到 24 万人，党组织增加到 162 个。一些距离中心城市比较远的地方，党组织也建立起来并参加布尔什维克中央的活动^②，党的影响力极大地增强。

关于党的组织工作，列宁强调：“要使工人和贫苦农民取得政权，要保持并巧妙地运用这一政权，就必须组织、组织、再组织。”^③ 在 1917 年 4 月代表会议后的 3 个月间，彼得格勒、莫斯科、乌拉尔、顿巴斯、中部工业区的党组织扩大了 1 倍多，他们主要在工人、士兵、农民以及非俄罗斯人中间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工人中：在每个工厂中建立党的支部和小组。在所有工会（工厂委员会）中建立党团。1917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3 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了第一次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列宁亲自参加会议并就实行工人监督问题讲话。通过工厂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加强了对彼得格勒大工厂的影响，并由此对其他城市的工厂委员会和工厂中党的工作施加影响。

在士兵中：前线的失败、经济的崩溃、全国性的饥饿、统治阶级不愿签订和约等情况客观上促进了士兵和水兵的革命化。布尔什维克党提出口号“立即实现和平”“停止可恶的大屠杀”，在 1917 年 4 月会议后发出建立和巩固陆海军中布尔什维克党的基层组织的指示，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到 5 月，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中已有近 6000 名布尔什维

①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т. 3. первый.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67. сс. 85 - 86.

② 譬如，在 1917 年 7 月召开布尔什维克党 6 大时，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的地方的布尔什维克（他们有时参加地方组织，但经常是在地方委员会下单独有自己的支部），也派代表参加了大会。

③ 《列宁全集》第 29 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 449 页。

克，所有团队都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①。

列宁领导了军队布尔什维克化^②的全盘工作，制定了党的军事工作的理论原则，并亲自从事宣传鼓动工作，就发展革命和士兵、水兵参加革命等问题在报刊上撰文，还在群众大会上演说。莫斯科委员会军事局把莫斯科卫戍部队中的 2000 多名共产党员士兵联合起来，在波罗的海舰队中，几乎所有大军舰都有党的组织或小组。截至 1917 年夏，波罗的海舰队中的共产党员总数已达三四千人^③，在 24 万名布尔什维克党员中，有 2.6 万人是军人^④。在前线，特别是在北方和西方前线，党支部的数量激增，这主要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军事组织领导，以及党和列宁在士兵和群众中的宣传教育活动的影响。

在农民中：1917 年初，俄国农民党员不到 2000 人，布尔什维克党对俄国农村的影响很小。布尔什维克党将分配给农民土地作为革命纲领，为取得农民的支持做了宣传工作。1917 年，在俄国农村，农民暴动不断增加，3 月发生过 50 次，5~6 月则爆发了 1600 次。布尔什维克党在农民中宣传自己的革命主张，并号召复员的水兵到农村中去做农民的工作，这些措施在农民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在第一次全俄农民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社会革命党领袖们说，解决土地问题是将来立宪会议的事。列宁则提出：“我们要农民连一个月、一个星期、一天也不耽误地立刻得到地主的土地！”^⑤ 列宁的话得到在场多数人的欢迎^⑥。

在非俄罗斯人民中：列宁强调布尔什维克党要实行民族自决原则，使布尔什维克党能够取得非俄罗斯人民的支持。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①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т. 3. первый.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67. с. 120.

② 军队布尔什维克化指布尔什维克党为使士兵、水兵转到无产阶级一边，将他们的政治积极性引上革命轨道，并使其投身于推翻剥削制度和建立劳动人民政权的斗争而进行的宣传和组织活动。

③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т. 3. первый.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67. с. 121.

④ 转引自〔苏〕阿·阿夫托尔哈诺夫《苏共野史》（上卷），晨曦、李荫寰、关益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第 246 页。

⑤ 《列宁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 143 页。

⑥ 〔苏〕阿·阿夫托尔哈诺夫：《苏共野史》（上卷），晨曦、李荫寰、关益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第 215 页。

前就宣布各民族有权自决直至从俄国分离出去。他是第一位公开这样言论的政治家。“他甚至认为乌克兰也有这样的权利。”“承认这种权利就可以确保非俄罗斯各族人民（约占全国人口的47%）支持他夺取政权。”^① 1917年6月，列宁提议建立一个新俄国，一种联邦共和国式的俄国。他说：“让俄国成为一个自由共和国的联盟吧。”^② 当芬兰国会和乌克兰拉达^③要求让他们的国家实行自治而临时政府（包括所有政党：右派政党和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等）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时，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承认乌克兰人民有这种权利。布尔什维克党还加强了在非俄罗斯民族中间的宣传活动。1917年7月，党出版了41种报纸，其中27种用俄文出版，其余的则用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拉脱维亚、鞑靼、波兰及其他文字出版^④。列宁的民族政策使布尔什维克党在非俄罗斯各民族中间得到了一定支持。

由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组织所做的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布尔什维克在几个月间急剧扩大（见表1-1），到1917年10月，已基本具备取得政权的能力。

表1-1 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力量的增长情况

单位：万人

| 时间 | 党员数量 |
|----------|------|
| 1917年2月 | 2.3 |
| 1917年4月底 | 8~10 |
| 1917年8月初 | 24 |
| 1917年10月 | 35 |

资料来源：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т. 3. первый.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67. с. 244.

当时，党的力量分布的情况是：莫斯科及莫斯科区域有7万人

① [苏]阿·阿夫托尔哈诺夫：《苏共野史》（上卷），晨曦、李荫寰、关益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第217页。

② 《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258页。

③ 拉达是1917~1919年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反革命）中央机关。

④ 转引自[苏]阿·阿夫托尔哈诺夫《苏共野史》（上卷），晨曦、李荫寰、关益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第251页。

(20%)；彼得格勒及其省6(7)万人(17%)；乌克兰、西南前线及罗马尼亚前线、黑海地区共6万人(17%)；波罗的海沿岸、北方前线、波罗的海舰队、驻芬兰的俄罗斯部队共3万人(8.5%)；白俄罗斯和西部前线共3万人(8.5%)；伏尔加河流域有2万人(5.5%)；高加索、高加索前线、顿河流域共2万人(5.5%)；西伯利亚和远东共1.5万人(4.5%)；其他地方为1万人(3.5%)^①。党的力量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经济比较发达地区以及军队中。

由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宣传组织工作，加之战争的影响，到1917年8月以后，俄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政府机构完全瘫痪了，但是全国人民都活着。他们要求建立政权，要求国家机器发挥作用……贪婪和饥饿的农民在全国掀起了洗劫浪潮。……所有工业中心罢工接连不断，似乎俄国所有无产者都分别参加了罢工。……全国各种倾向和观点的报刊，从上到下，一起高呼：经济快要崩溃了。”^②这正是布尔什维克党发动革命的条件：“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认识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个真理的另一个说法是：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③党的影响的扩大以及形势的发展为布尔什维克党提供了夺取政权的有利时机。

（三）抓住时机，发动群众，领导武装起义

到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党把工人阶级、士兵和一部分农民争取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已有党员约35万人。列宁对党的影响的扩大有准确的判断和认识，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时提出：“党应当把武装起义的问题提上日程的建议是正确的。事态逼迫我们这样做。”“我认为，必须在党内进行鼓动，让大家认真对待武装起义。”他还提出：“无论水兵或者

①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т. 3. первый.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г. 1967. с. 244.

② 转引自〔苏〕阿·阿夫托尔哈诺夫《苏共野史》（上卷），晨曦、李荫寰、关益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第270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93页。

士兵，当然都有休假。应当把到农村作短期休假的人组成鼓动队，让他们有计划地走访各省，在农村进行一般的以及关于立宪会议的鼓动工作。”^①不难看出，列宁不仅对工人、士兵中的宣传鼓动工作十分重视，还注意让一切可以发动起来的人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把工作做到落后的农村中去。

正是因为动员起比党自身更大的力量，布尔什维克党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在1917年10月发动了武装起义并夺取政权，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列宁关于党支部的理论原理在党的建立和形成过程中，在党为社会主义斗争的各个历史阶段的活动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成为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1911年在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党章中规定：“党支部是党组织的基础。”^②对于列宁在十月革命中的历史作用，党内有众多评论。苏哈诺夫说：“党内除列宁之外，当时再没有任何人了。”^③托洛茨基也肯定道：“毫无疑问，列宁在党内确实享有很高的威望。”^④斯大林认为列宁的演说具有“不可战胜的逻辑力量，这种逻辑力量……紧紧地抓住听众，一步一步地感动听众，然后就把听众俘虏得一个不剩”^⑤。一位反对派历史学家阿夫托尔哈诺夫则是这样评价列宁的：“没有列宁，党也会存在……但那只能是一个平平的左派革命民主党……这样的党所能做的只不过是给议会政府输送两三个左派部长而已。”“在历史急转弯时，只有具有政治远见的领袖，才有希望获得成功；只有能为党指出令人信服的夺取政权的道路的人，才能控制自己的党。列宁正是这样的人。”^⑥

当然，由于环境和条件所限，在十月革命前，党支部的活动主要是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258~260页。

②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第597页。

③ 转引自〔苏〕阿·阿夫托尔哈诺夫《苏共野史》（上卷），晨曦、李荫寰、关益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第211页。

④ 转引自〔苏〕阿·阿夫托尔哈诺夫《苏共野史》（上卷），晨曦、李荫寰、关益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第211页。

⑤ 《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50页。

⑥ 〔苏〕阿·阿夫托尔哈诺夫：《苏共野史》（上卷），晨曦、李荫寰、关益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第198、212页。

秘密形式的，党员人数又比较少，并且不是所有党员都参加到支部中。那时，支部的建设也不像党章中规定的那样有完整的结构和统一形式。就列宁本人的活动情况来看，他多次被流放或在国外居住，也参加社会民主党国内或国外组织的一些活动，但因条件所限，他所能参加的实践活动还是比较少。对于基层党组织建设而言，列宁在十月革命前的大多数时间里主要是在理论上进行思考并在实践上给予指导。不过，列宁对于党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结构的论述，他所提出的建立新的基层组织——支部，以及根据革命发展的不同形势对基层组织所应采取的不同斗争方式等理论，对于1917年党动员起数倍于自身的力量取得十月武装起义的胜利，以及革命胜利后作为执政党执掌政权所奠定的组织理论基础和群众基础，还是无可置疑的。正因为党在基层组织工作中，有正确理论指导，密切联系群众，才有可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中，抓住历史机遇，发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建立起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三 苏共执政初期列宁的基层党组织建设理论与实践

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掌握了国家政权，成为执政党。列宁在执政党的基层党组织建设中，在党内生活中坚持民主集中制，在共产党与其他群众组织关系上，将共产党的基层党组织活动与工会、青年团等组织结合起来，由党领导其他群众组织共同发挥作用。这些理论和实践活动对苏共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在基层党组织活动中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组织机构和组织活动的指导原则，它把工人阶级革命政党本身所固有的集中和民主两种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党的民主，如果下一个简单的定义，其基本点就是党员群众当家作主，全体党员直接或通过自己的代表参加党的事务的管理，参加制定党的政策，建立领导机关。但是，只有在具有高度组织性和严格的纪律性，服从统一领导的情况下，党员才能很好地当家作主，行使自己的权利。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党的工作的集中化，依靠有权威的领导。

早在1899年，列宁在著作中就提到“必须成立统一的因而也是集中

制的党”^①。他认为，一个集中统一的党组织是党内团结的保证：“为了保证党内团结，为了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还需要有组织上的统一……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党章，没有少数服从多数，没有部分服从整体，那是不可想象的。”^② 列宁在早期主要强调集中制，并且，在党的组织原则上他与马尔托夫等人就民主制和集中制问题进行过多次争论。他认为，在革命处于低潮、党的组织涣散的情况下，坚持集中制对于党的统一、保证党的威信是十分必要的。后来，民主集中制作为表达一项正式的、由党的决定加以合法化的原则的术语，出现在1905年召开的布尔什维克（芬兰）塔墨尔福斯代表会议的文件中^③。在1906年召开的党的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章中写道：“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④ 因此，民主集中制作为苏联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在1905年前后确定了下来^⑤。

关于民主和集中的关系，布尔什维克党认为，民主和集中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布尔什维克党不反对党内民主，但在决定运用民主制的范围时，总是根据具体环境，考虑对革命是否有利。例如，在十月革命后，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了，由于保卫新生政权、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维护十月革命胜利成果的需要，党不得不暂时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民主、加强集中。因此，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决议指出：“党正处于绝对需要有最严格的集中制和最严格的纪律的环境下。”^⑥ 不过，列宁时期的党也坚持民主原则。“在列宁时期，党内还有相当强的民主传统。那时候党的各次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中记录有会上的尖锐讨论和不留情面的批评，这些记录

①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167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99页。

③ 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英国学者夏皮罗认为，这个词在俄国首先应是来源于孟什维克。他说，从历史上看，这个词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是拉萨尔的一个主要追随者J. B. 施威策尔于1865年第一次使用的。参见〔英〕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徐葵、邹用九、裘因译，东方出版社，1991，第94页。

④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第165页。

⑤ 关于民主集中制这项组织原则的确立过程，高放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做了比较详尽的叙述。可参见尹彦《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高放在为此书所做的代序言中写了“列宁对党内民主建设的探索”。

⑥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第567页。

可证明当时在通过决议时是有真正表决的。”^① 在列宁时期的基层党组织生活中，适应革命战争年代的紧张情况以及和平建设时期的情况，将民主与集中统一起来。后来，针对斯大林时代破坏党内民主的情况，在党的 22 大上通过的党章中明确规定：“党的组织机构的指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说：（1）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从下到上都由选举产生；（2）党的机关定期向自己的党组织和上级机关报告工作；（3）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4）下级机关必须无条件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② 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在苏共几十年历史上，始终是一项重要的组织原则。

（二）将基层党组织的工作与工会、青年团等群众组织的作用结合起来

还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多次论述过党要与工会结合，共同发动群众。十月武装起义刚取得胜利，列宁就在《告人民书》中向广大劳动者宣布，现在是劳动者自己管理国家，他们应当团结起来，把国家的一切事务自己担当起来，如果不这样，谁也帮不了他们。他还倡议：“我们想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苏维埃应当取代旧官吏，全体人民都应当学习管理。”^③ 革命胜利后，列宁多次亲自到工人和农民中间进行宣传鼓动。

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列宁就强调既要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作用，同时将发挥工会、同情者分子、青年团等群众组织的作用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他认为，只有这样，党才能带领百倍千倍于自己的力量，克服各种困难，战胜敌人。在 1918 年的一次讲话中，列宁讲道：“现在感到力量奇缺，而群众中存在着可以利用的力量。要充分相信工人群众，并善于从他们中间吸取力量。办法就是把青年中和工会中的同情者吸收到党内来。即使不能按期交纳党费，也没有什么危险。……应当利用道义上的影响来扩大我们的党。”他对党支部的工作提出批评：“必须扩大我们对工人群众的影响。党的支部表现得很不主动，它们在当地的活动本来是很能影响非党群众的。必须重视俱乐部工作，从群众中吸收党的

^① [俄]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第 28 页。

^②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第 456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33 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 59 页。

工作人员。”^① 在另一次讲话中，列宁再次指出：“把千百万劳动群众组织起来，这是革命最有利的条件，这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最深的泉源。”^②

在打退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列宁号召调动一切党和群众组织的力量，参加到革命斗争中。他主张：“通过工会、工厂委员会、党组织、合作社等等，立刻成立地方的和中央的援助红军委员会或协助委员会。”^③ 列宁还提出：“除军事首长外，还必须设政治委员，由可靠的、具有忘我精神的共产党员担任，并在每一个部队中成立共产党支部，以建立内部思想的联系和自觉的纪律。”^④ 当苏维埃政权面临内外困难时，列宁接连在莫斯科的多次会议上做报告或讲话，向干部和群众阐明形势和任务，帮助他们认识困难所在和解决办法，看清敌人色厉内荏的虚弱本质，坚定苏维埃必胜的信心。列宁认为，开诚布公地说真话会得到更大的好处，即使这是一种沉痛的真话，只要讲清楚，任何一个觉悟的工人和农民都会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1919年春，一位军事评论家在《泰晤士报》上分析形势时说道：“全世界的军队都在瓦解，但是只有一个国家的军队在建设，这个国家就是俄国。”他还指出：“忍受不住战争的苦难、懂得了这次战争是犯罪、不断逃跑的1000万军队^⑤瓦解之后，一支社会主义军队开始建立起来了，一批又一批数以十万计的人参加了军队，这支军队知道为什么而战，甘愿忍受比沙皇时代更大的牺牲和困苦，因为它知道，它在保卫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土地、自己在工厂中的权力，它在保卫劳动者的政权。”^⑥ 对于这种评价，列宁总结了原因：“18世纪的一位普鲁士君主说了一句聪明话：‘如果我们的士兵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战，那就连一次仗也不能打’。”^⑦ 正是因为党在群众中做了最广泛的宣传工作，才取得工农群众的支持，这是布尔什维克党取得胜利的保证。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45~46页。

②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69页。

③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275页。

④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410页。

⑤ 这是指在十月革命前，由沙皇和资产阶级政府组织的一支由1000万武装的工人和农民组成的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旧军队。十月革命后，其成员都离开或逃走了，这支军队实际上已经瓦解。

⑥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43页。

⑦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44页。

在同邓尼金匪帮斗争的过程中，莫斯科举行了征收党员周^①活动，列宁亲自发表讲话，阐述征收党员周的目的和意义。他肯定将有一批真心拥护共产主义的人，真正忠于工人国家的人，正直的劳动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过压迫的群众的真正代表加入党组织。他还指出：“多吸收群众中新的工作者入党，使他们独立参加建设新生活的工作，这就是我们克服一切困难的手段，这就是我们走向胜利的道路。”^② 列宁还在莫斯科苏维埃大楼阳台上对应征入伍的工人共产党员发表讲话，鼓励他们到前线与敌人顽强战斗。在几天后的一次讲话中，列宁向党的各级组织提出新问题：“我们现在应该关心怎样正确地使用新党员。”“一切党组织都应当对如何使用这些新党员的问题作专门的研究。应该更大胆地把各种各样的国家工作托付给他们，应该更迅速地在实践中考验他们。”“苏维埃共和国应当成为一个统一的军营，它应该尽量发挥一切力量……”^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厌战情绪笼罩欧洲，俄国到处是破坏与衰败的情况下，苏维埃政权之所以能够进行反对国内方面叛乱和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战争，并战胜敌人，最重要的是党团结一切力量，做耐心细致的宣传鼓动工作，让群众知道他们在“为什么而战”。在1920年召开的各省肃反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列宁强调肃反委员会也“应该依靠共产党支部，依靠工会，把自己的工作同宣传鼓动工作结合起来……”^④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曾对党与工会的关系做了明确阐述。他指出：“党直接依靠工会来进行自己的工作。……工会形式上是一种非党的组织，而实际上大多数工会的领导机构，首先当然是全俄总工会的中央机构或常务机构……党就是通过这个机构同本阶级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阶级专政就是通过这个机构在党的领导下

① 这是根据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举行的。在苏维埃共和国处于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极其困难的时刻，俄共（布）彼得格勒党组织于1919年8月10~17日、莫斯科省党组织于同年9月20~28日相继举行了征收党员周。俄共（布）中央全会总结初步经验后，9月26日决定在各城市、农村和军队中举行征收党员周。通过征收党员周，仅俄罗斯联邦欧洲部分38个省就有20多万人入党，其中50%以上是工人。在作战部队中被接收入党的约有7万人。参见《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472~473页（注释91）。

②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217页。

③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230~231页。

④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129页。

实现的。”^① 列宁指出：“正是这种主张共产党人不参加反动工会的荒谬‘理论’最清楚不过地说明……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应该善于作出一切牺牲，克服极大的障碍，在一切有无产阶级群众或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机关、社团和协会（哪怕这些组织是最反动不过的）里有步骤地、顽强地、坚定地、耐心地进行宣传和鼓动。而工会和工人合作社，恰恰就是（后者至少有时是）这种有群众的组织。”^② 党正可以通过这些群众组织来扩大自己的影响。

当然，列宁也不是不顾实际地主张无限扩大群众组织的作用。在这次讲话后，苏维埃国家出现了工会迅速扩大的情况，工会会员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成百万地增加，后来又出现了强制入会现象。针对这种情况，列宁在一次讲话中明确了工会的任务：“今后工会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在无产阶级同资本作斗争时从各方面全力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③ 他还提出应恢复工会的自愿入会制：“把所有工人强行登记为工会会员的做法，既不符合工业社会化实际达到的水平，也不符合群众的觉悟水平。此外，强制入会的做法还使工会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弊病。必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坚决恢复自愿入会的做法。对工会会员决不能要求具有一定的政治观点；在这一点上，也和对待宗教的问题一样，工会应当是非党的。”^④ 可见，列宁肯定党与其他群众组织的合作关系，但不主张无限度地扩大党的影响，甚至采用行政手段的方式干预工会或其他群众组织的活动。

（三）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在保卫国家和建设国家过程中发挥先锋队作用

党的先锋队作用，是指党组织和党员在群众中应产生的影响，即在进行革命斗争时，党员要冲锋在前；在从事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时，党员应起带头作用。党员要做军事斗争和社会工作的骨干。此外，基层党组织还要成为党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桥梁。

1919年夏，东线形势稍缓，邓尼金匪徒在南面的攻势变强，列宁做

^①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27~28页。

^②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33页。

^③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第298页。

^④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第300页。

了题为《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的演讲，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危急关头甚至可能是最危急的关头到了。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全体共产党员，以及全体同情分子，全体正直的工农，全体苏维埃工作人员，都要按照战时要求紧张行动起来，把自己的工作、精力和注意力尽量转到完成直接的战争任务上，转到迅速击退邓尼金的进犯上。在这个关键时刻，为了帮助前线动员，做好应征者的工作，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都应当行动起来。他们应该毫无例外地组织起来，帮助动员，要有严密的组织，每个人都要由地方党组织和军事当局指定担负一定的工作。列宁在演讲最后号召：“所有共产党员，所有觉悟的工人、农民，每个不愿意让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胜利的人，都应当立即在最近几个月内空前地紧张地行动起来，‘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① 在他的号召下，许多党员主动要求去前线，后方则掀起了加入党组织的热潮。党员的带头作用不仅体现在战场上，还体现在后方工人的创造性活动中，共产党员星期六义务劳动正是这种模范作用的体现。

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列宁号召党员学习管理经济，要求党的各级组织不要害怕让共产党员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其中也包括向商人，向办合作社的小资本家，向资本家“学习”）。他甚至提出：“为了学习要不惜破费，只要能学到东西就行。”^② 在从事经济工作时，列宁看到，当时突出的矛盾是大多数担任负责工作的共产党员文化低，不会管理。虽然他们是忠诚的革命者，但不懂得做买卖这一行，一些党员甚至还不知道自己不懂这一行。列宁曾举例说：“我们往往派某个共产党员去领导一个机关，他无疑是一个勤勤恳恳的人，在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中受过考验，坐过监牢，但不会做生意，偏偏这样的人被派去领导国营托拉斯。他具备共产党员的一切无可争辩的优点，但商人还是揍了他，并且揍得好，因为这种地方本来是不该派最可敬、最优秀的共产党员去（除去疯子，没有人会怀疑他们的忠诚），而应当派机灵的办事又诚实的店员去，店员能做好自己的工作，比最忠诚的共产党员强得多。”“我们安排了一批共产党员去从事实际执行工作，他们虽然具有一切优秀品质但完全不

^①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58页。

^②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第234页。

适宜做这种工作。”^① 面对这种情况，列宁认为共产党员不能退缩，他告诫全党要不怕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要公开承认自己的素养不够，本领不大；观察事物要清醒一些，扔掉华而不实的东西，脱去华丽的共产主义外衣，老老实实地学着做些平凡的工作，这样才能战胜资本家。

除了向资本家学习经济，列宁还主张共产党员发挥创造精神。在给萨马尔罕党组织一批共产党员来信的回复中，列宁认为，在实施新经济政策和探寻经济建设新途径的过程中，发挥地方的独创精神和进取精神最为重要。他在电报中说：“现在，主要的是立即改善工农的状况。粮食税，工农业之间流转的发展，小工业的发展，——这一切当前都取决于地方工作人员的干劲和才能。”^② 在苏维埃政权的一些具体工作遇到困难时，列宁也首先提出由共产党员去完成主要的工作任务。例如，1919年国内战争时期，列宁就曾亲自过问由坦波夫省和沃罗涅日省向前线派遣共产党员的人数情况^③。当1921年出现粮食收购危机时，列宁又建议增调部队去参加粮食工作。因担心人员不够，列宁还在一封信件中问道：“是否在莫斯科省再动员200—300个担任要职的党员去抓粮食税的征收工作？”^④ 一般而言，在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中，在新经济政策实行过程中，列宁都强调发挥基层党员和党组织的先锋队作用，每当苏维埃国家面临危难时刻，列宁都号召共产党员走在前面，做各项工作的带头人。他在每一个阶段都向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提出新的任务和要求，这不仅调动了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工作热情，还激励了他们去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成为真正的先锋队和带头人。

综合以上内容可看出，列宁的基层党组织建设理论的形成过程有这样几个时期：在建党前，列宁主要强调将分散的党小组组织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有组织有纪律的党，党的小组主要从事组织宣传工作；在建党初期，列宁对党小组在把握入党资格、党员成分等方面的工作给予极大注意；在党的力量扩大，党员人数增加的情况下，列宁提出新的组织形式——基层党组织，主张以支部作为基层党组织的主要形式；同时，

①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第324页。

② 《列宁全集》第51卷，人民出版社，1988，第1页。

③ 参见《列宁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8，第640~641页。

④ 《列宁全集》第51卷，人民出版社，1988，第162页。

列宁强调随着俄国革命形势的变化情况，党组织的斗争方式也应有变化。在革命形势低落时，党组织的斗争主要以秘密方式，但也要充分利用争取到的合法权利，进行公开斗争；在革命形势高涨的情况下，还要将党组织的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结合起来。但无论以什么方式，党都要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从事革命的动员工作。正是由于党组织的组织和宣传作用的发挥，党才领导并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掌握政权，成为执政党。作为执政党的领袖，列宁充分相信劳动群众的被革命激发起来的创造力量，认为广大群众自觉地参加国家管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源泉之一。他对基层党组织工作任务和组织形式也有了新的认识和主张，提出要注意党的基层与其他社会团体的关系，在各种社会团体中扩大党的宣传与影响；强调由党组织、工会和其他组织共同发动群众，巩固政权，发挥各种社会组织在保卫国家与建设国家中的作用。他要求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做保卫国家冲锋陷阵的带头人、社会主义建设的先锋队。正是这种动员全社会的宣传鼓动工作，才使得布尔什维克党动员起超出自身百倍千倍的力量，从而战胜敌人。

由于环境所限，在十月革命前，列宁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流放中或者避居国外，主要从事理论研究。所以，在十月革命前，列宁主要在党的建设理论上进行指导，对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形式、活动方式、内容等进行分析和论述；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经常深入群众，亲身亲历，与工人、士兵、农民交谈，到工厂、农村中进行鼓动宣传，以取得多数民众支持，并动员起全部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正是由于党的理论指导和深入细致的宣传鼓动工作，基层党员才能在保卫和建设苏维埃国家的过程中发挥创造力，在国内战争中组织起来，进行星期六义务劳动。星期六义务劳动作为党员创造力的表现以及在保卫国家和建设国家的过程中先锋模范作用的体现，在苏联历史上及至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基层党组织建设理论只是列宁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活动的一部分，但却反映出列宁善于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善于组织与发动群众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正是因为这种深入群众的工作态度，才使得布尔什维克党动员起更大的力量，取得武装起义的胜利，并建设和保卫社会

主义国家。列宁的基层党组织建设理论为苏联共产党的基层党组织建设打下了基础，成为苏联共产党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基本理论与实践的指导。列宁的党建思想在长时期内贯穿于苏联共产党组织形式中，并且对后来的苏共以及东欧、中国甚至世界上其他一些民主国家共产党或社会主义政党建设产生了影响。可以说，列宁在理论与实践上为执政党基层党组织建设起到了引路人的作用。

第二节 基层党组织是巩固和建设 社会主义国家的先锋队

列宁关于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为布尔什维克党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党纲与党章中，逐步完善对党的基层组织在群众中的宣传鼓动工作的要求。十月革命胜利后，作为执政党，俄共（布）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事业中，不仅发挥了先锋队作用，同时也起到了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战斗堡垒作用。

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党的影响主要在大城市，党员中的很大一部分也是在城市中，以工人和职员为主。根据一份统计，1917年1月布尔什维克党有2.3万名党员，其中工人占60.2%，职员占25.8%，农民占7.6%，其他人员占6.4%^①。十月革命胜利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在苏维埃国家的工业中心城市、各省以及民族地区，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先后建立起来。当然，由于情况不同，在各个地方党的基层组织——党支部的人员构成有多有少，并且直接处于生产一线的党员也不多：“工厂支部多数人员比较少，尤其是从事车床工作的工人比例很低。”^②党支部除了做好宣传鼓动工作，以及在非党群众中做思想工作外，还要在组织方面“坚持不断地从苏维埃政权机关派党员到企业中，并从行政岗位转向车床。改变不能把广泛的非党的工人群众吸引到党内的状况，要注意把诚实的机床工人吸引到党内，尤其注意在他们中形成先进的思想认

①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т. 3. первый.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67. с. 24.

② РГАСПИ. Ф. 572. Оп. 1. Д. 3. л. 24.

识”^①。由于党的组织和领导，基层党组织在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开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基层党组织发起和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

1919年春，苏维埃政权面临着严峻的局势：高尔察克在西伯利亚纠集了30万兵力向伏尔加河流域推进；邓尼金从南部进攻，占领了国家煤炭基地顿巴斯等地；尤登尼奇军队进攻彼得格勒；英法干涉者的部队从北面进犯，对苏维埃国家形成四面包围态势。其中，高尔察克匪军在东线的进攻最强大，苏维埃政权处在危急关头，东线局势将决定革命的命运。

苏维埃共和国面临所有反革命力量的进攻，必须集中全部力量打退敌人的进攻。1919年4月10日，苏维埃政权发布了动员令，列宁亲自草拟了《为支援东线告彼得格勒工人书》《俄共（布）中央关于东线局势的提纲》等文件，动员党和人民的力量去粉碎敌人的进攻，号召工人、士兵、农民和其他人立即动员起来投入抗击白匪的斗争，要求党和工会组织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为响应布尔什维克党的号召，当时有2万多名共产党员奔赴东方战线，共青团宣布了第一次全俄团员总动员，将3000多名共青团员派往前线。工会也动员了几万名工人去前线^②。以莫斯科、彼得格勒等地工人为骨干的共产党员加入军队后，鼓舞了士气，加强了红军中的党支部和政治部。在后方，共产党员也以忘我工作来支援前线。他们组织发起了星期六义务劳动，这是苏维埃国家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早期形式。

（一）基层党组织领导发起星期六义务劳动

俄共（布）中央关于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的号召给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以有力推动，在革命热情影响下，铁路上的许多共产党员职工走上了前线，但大多数人不能离开重要工作岗位。1919年4月12日，星期

^① РГАСПИ. Ф. 572. Оп. 1. Д. 3. л. 24.

^② 在波诺马廖夫的《苏联共产党历史》中，工会派往东线工人的数量为6万人；在《社会主义时期苏联史（1917～1957年）》中为2.5万人。参见基姆主编《社会主义时期苏联史（1917～1957年）》，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等译，三联书店，1960，第201页。根据当时苏联工会迅速扩大的情况，本书基本采用前者的观点，参见Б. Н. Пономарев, М. С. Волин, В. С. Зайцев и др.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2. с. 267。

六，莫斯科一喀山铁路上的莫斯科一索尔集罗沃契纳亚机车库的党支部根据支部书记、钳工伊·叶·布拉科夫的建议，组织了13名共产党员和2名普通工人，从当晚20点工作到第二天早6点，义务劳动10小时，修复了3台机车。这一消息传开后产生了巨大反响，莫斯科一喀山铁路分局的共产党员决定组织群众性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活动。1919年5月7日，在莫斯科一喀山铁路分局共产党员和同情者大会上，分局党组织提出建议，共产党员和同情者每天从休息时间内抽出一个小时，将这些时间集中起来，在星期六这天进行一次六个小时的体力劳动，以便尽快创造出实际的价值。他们还提议在全分局内实行共产主义星期六，一直干到完全战胜高尔察克。

1919年5月10日是星期六，晚上六点钟，莫斯科一喀山铁路分局党委组织了第二次义务劳动。有报道介绍了这次劳动的过程：

义务劳动的参加者像士兵一样来到工作现场，整队之后，秩序井然地由领工员分别领到各处工作。他们工作的地点是在莫斯科机车总修配厂、莫斯科客车机务段、莫斯科编组站、莫斯科车辆部以及“佩罗沃”车辆总装配厂，主要工作是装载积压下来的铁路沿线所需材料和机车部件，以及对机车进行维修。

在劳动中，大家都非常努力并密切合作，人们的工作效率和完成的工作量比平时都有很大提高。一位上了年纪的领工员也许是有些夸张地说，在一个共产主义星期六干的活，等于不自觉的疲沓的工人一个星期干的。当工作结束时，人们唱起《国际歌》来庆祝工作的胜利。

这里应注意的是，莫斯科一喀山铁路分局的共产党员是这次劳动的主要参加者。根据统计，共有205人参加了这次义务劳动。其中，约有10%是经常在现场工作的共产党员，其余的则是行政工作人员和选任的人员：有路局的政治委员，也有各企业的政治委员，以及工会人员、管理局和交通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铁路分局党组织是这次劳动的组织者，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在这里体现了出来。

1919年5月10日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是第一次见诸报章的共产党员组

织的义务劳动。实际上，在此之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满目疮痍又面临帝国主义军队和白匪军进攻的苏维埃国家，在其他一些地方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已经自觉地利用工余时间加班加点地工作。1919年5月20日的另一篇文章介绍了这样的情况：“共产党员做这样的工作并不是罕见的事情。我知道电站和各铁路线都有这样的事例。在尼古拉铁路上，共产党员加班干了几个晚上，把陷在转盘坑里的机车起了出来；冬季，北方铁路上的全体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用了好几个星期天去清除铁路上的积雪；许多货运站的支部为了同盗窃货物作斗争，在站上进行夜间巡逻——不过这种工作都是偶然进行的，而不是经常性的。”^①当然，这些做法与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的共产党员的行动还是有差别的，因为在那些地方，共产党员是在特殊情况或紧急情况下进行加班工作，而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的共产党员“他们把这一工作变成了有系统的经常的工作。他们决定‘一直干到完全战胜高尔察克’，工作的全部意义正在于此”^②。

（二）星期六义务劳动在全国展开

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共产党员的行动首先在党员中间树立了榜样。亚历山大罗夫铁路召开了共产党员和同情者大会，做出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决议，并将第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定于1919年5月17日进行。共产党员和同情者共98人根据大会决议在会后做了5小时无报酬的工作。有报道说，这次活动的参加者仅仅是有权再买一顿饭，而这顿饭同一般体力劳动工人的一样，也是每人半俄磅面包。这次活动尽管准备工作做得不充分，组织得也差，但劳动生产率还是比平常高出1~2倍。另有消息说，维亚济马铁路上也在组织这样的星期六义务劳动，在6月7日的《真理报》上还登载了一位共产党员几次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详细过程，反映了共产党员的劳动热情。

莫斯科铁路共产党员的行动在其他地方也产生了影响。例如，1919年5月31日在特维尔城也进行了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有128名共产党员到铁路上劳动，三个半小时装卸了14辆车，修好了3台机车，锯了10立方俄丈木柴，还做了别的工作。熟练的工人党员的工作效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4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4页。

率比一般效率高12倍。在萨拉托夫铁路也开展了这样的活动。6月5日，萨拉托夫铁路上的共产党员职工响应莫斯科同志们的号召，在党员大会上决定：为了支援国民经济，每星期六无报酬地加班劳动5小时。

星期六义务劳动不仅在共产党员中间推广开来，还在非党群众中展开。前述亚历山大罗夫铁路修配厂的共产党员要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消息刚一传出，非党群众就激动地谈论起来，到处都有人说：“昨天我们不知道，不然我们也会做好准备干它一场……下星期六我一定来。”^①星期六义务劳动第一次进行后的情况则是“现在有许多非党工人都表示愿意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各机车修理队都自告奋勇要在星期六义务劳动时间内把机车从‘坟堆’里弄出来，修好使用”^②。

当时，在报上出现了这样的呼吁：“后方的所有共产党支部都应当向莫斯科—喀山线的同志们学习。不仅莫斯科枢纽站上的各共产党支部应当如此，全俄罗斯的党组织都应当效法这个榜样。乡村中的共产党支部，首先应当帮助红军家属，实行代耕。……莫斯科—喀山线的同志们高唱《国际歌》结束了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劳动。如果全俄罗斯的共产党组织都学习他们的榜样，而且坚持不懈地贯彻下去，那么，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就会在共和国全体劳动者的洪亮的《国际歌》声中度过今后一段艰苦的岁月……”^③的确，星期六义务劳动开启了苏维埃共和国建设的新局面。

（三）党员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成为制度

从1919年5月10日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共产党员开始发起，到1919年下半年，在半年左右时间里，全国很多地方开展了共产党员星期六义务劳动。以后，星期六义务劳动发展成为有组织、有固定形式的义务劳动方式。1921年，苏共中央颁布条例，对星期六义务劳动的目的和任务、组织形式、进行方式、义务劳动参加者的任务以及不能参加义务劳动的人予以明确^④。对于星期六义务劳动的目的和任务，规定：星期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页。

④ 参见 Справочник партийного работника. Москва 1921. стр90 - 91。转引自 Первичная партий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Документы КПСС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й период) . Москва. г. 1974. сс. 17 - 19。

六义务劳动是义务劳动思想和工人阶级自我组织的宣传形式之一。星期六义务劳动应成为共产主义劳动形式的试验，星期六义务劳动首先是为完成极重要和紧迫的任务，进行星期六义务劳动时应制定不少于规定的定额，同时，星期六义务劳动参加者应努力超过这个定额。由于星期六义务劳动是由共产党员首先发起的，这是共产主义劳动形式，因此，在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时，应由党委会对星期六义务劳动加以统筹领导，具体工作则由党委会、劳动委员会等部门共同负责。在进行义务劳动前至少两天，应由分管义务劳动的支部代表，向愿意参加义务劳动的党员、同情者和非党群众说明劳动计划。在义务劳动进行中，行政部门负责对参加者按技术能力进行分配，但党支部也要做一些具体工作。例如，在参加劳动的班组中选出一名班长，在支部会议上汇报劳动情况，以及负责合理分配义务劳动参加者的力量。在劳动进行前，应弄清楚义务劳动参加者的数量（男、女人数，其职业、知识水平），明确劳动地点，劳动工具的数量，把握劳动时间^①等。每个共产党员要用自己在劳动中的个人模范作用和宣传作用，吸引非党群众参加到义务劳动中来，每个党员每月至少要参加两次义务劳动，对于回避义务劳动或不能认真对待义务劳动中所承担的工作的党员，要以破坏党的纪律给予警告、公开批评、劳动一周或由正式党员降为预备党员的处分。由此，组织广大党员群众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就成为基层党组织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伟大的创举”——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意义

1919年由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党支部发起，广大党员群众参加的星期六义务劳动，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苏维埃国家发展成为以共产党员为主，带动党的同情者和非党群众共同参加的共产主义劳动形式，在保卫和巩固苏维埃国家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一，星期六义务劳动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在星期六义务劳动中，后方工人的忘我劳动，提高了工作效率，创造了物质财富，保证了前线红军必需品，首先是武器弹药的供应。1919年4月，全国各工厂共

^① 按照规定，一次义务劳动一般进行4个小时，但在各次劳动中，可根据劳动组织者的指令或经行政部门同意延长。参见 *Первичная партий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Документы КПСС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й период)* . Москва. 1974. с. 18。

出产 1.6 万支步枪；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以后，到 7 月，全国各工厂向前线供给了约 4.3 万支步枪；机关枪的月生产量从 1919 年 4 月的 325 挺增加到 7 月的 720 挺。5 月共制造大炮 45 门，比 4 月多出 1 倍。弹药的生产在 4 月为 1700 万发，7 月的生产量为 3400 万发^①。铁路工人加班劳动，修复了大量被损坏的机车，加快了铁路运输的恢复。在内战的 3 年中，军工企业工人总共给前线红军提供了 250 万支来复枪，2.1 万挺机枪，约 15 亿发子弹，3973 门大炮，800 万颗左右炮弹，160 多万颗手榴弹^②。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国内满目疮痍的情况下，比较充足的武器供应和运输条件，是保证苏维埃政权取得胜利的重要物质条件。

第二，星期六义务劳动创造了一笔精神财富。内战初期，共产党员发起义务劳动，他们的奉献精神，党员的先锋队形象成为鼓舞人们战胜敌人的巨大力量。当 1919 年秋前线形势再次吃紧时，又有 3 万名共产党员被派到前线去，共青团宣布了第二次全俄总动员，有 1 万名共青团员奔赴南方前线。由莫斯科等地开始的“征收党员周”活动也进行得非常热烈，有 20 多万名工人和农民加入了党组织。后方工人的英雄主义精神给了前线战士以极大鼓舞，在红军中涌现出像传奇英雄恰巴耶夫^③那样的一批优秀党员。1919 年 10 月红军开始反攻，邓尼金和高尔察克匪军先后被击溃。到 1920 年 11 月，红军收复克里木，结束了内战，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稳固下来。

列宁把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称为“伟大的创举”（Великий почин）。他认为：“首创精神在群众情绪转变的背景下往往起着决定的作用。莫斯科的粗工和莫斯科的铁路员工……这些处在资产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恶毒的反革命煽动包围中的忍饥挨饿的工人，不顾饥饿、疲乏和衰弱，实行‘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不领任何报酬

① 参见基姆主编《社会主义时期苏联史（1917～1957年）》，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等译，三联书店，1960，第203～204页。

② 王金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七十年——苏联经济发展史》，北京出版社，1992，第29页。

③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恰巴耶夫（1887～1919年）1917年入党，1918年起历任苏俄红军支队长、旅长和师长，是国内战争时期红军中的优秀指挥员。1919年率第25师与高尔察克白卫军作战时，解放了乌法，立下赫赫战功。当年9月在乌拉尔地区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他的名字在中文中又被译为夏伯阳。

地加班工作，并且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① 他还指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对我们具有巨大价值，不仅是因为它在实践中实现共产主义。除此以外，星期六义务劳动对我们还有双重意义：从国家的角度看，它是对国家真正实际的支援……从经济方面来说，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必要的，它能使苏维埃共和国摆脱经济破坏并开始实现社会主义。”^② 的确如此，当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匪军被粉碎，国内形势稳定后，国民经济恢复工作进入党的日程，党号召群众以同样的热情投入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1920年3~4月召开的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宣布，1920年五一节为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日。这一天，在莫斯科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人达50万，彼得格勒将近20万人^③。共产党员走在最前列，用自己的英勇劳动精神带动群众。党和政府的领导人都参加了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在克里姆林宫参加了星期六义务劳动。千百万劳动群众响应党的号召，在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中表达决心，要像在前线保卫社会主义祖国那样忘我地献身于和平劳动。

第三，星期六义务劳动不仅在内战时期发挥作用，在苏维埃俄国恢复国民经济时期，及至在整个苏联历史上，以及苏联解体后的今天，都有着重要影响。1921年以后，党支部和广大党员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成为固定的义务，他们在劳动中起到组织者和带头人的作用。义务劳动的内容也不只是生产军工产品，在工业、农业生产中，党支部和广大党员都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又出现了青年突击队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随着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出现，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在全国展开。因此，星期六义务劳动就成为后来贯穿苏联全部历史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开端，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这场由莫斯科一喀山铁路分局共产党员首先发起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不仅在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的斗争中，激励着人们以英雄主义精神去战胜敌人，还激励着人们以同样的热情投入国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6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95页。

③ Б. Н. Пономарев, М. С. Волин, В. С. Зайцев и др.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2. с. 276.

家的经济建设。这个活动的出现，反映了在保卫和巩固苏维埃政权斗争中广大党员和基层党组织饱满的工作热情、积极的工作态度和对国家的责任感。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共产主义义务星期六都被作为一个名词^①，成为伟大献身精神的象征。

二 广大党员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主力军

在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基层党组织是劳动先锋队和主力军。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初，由共产党员组织起来的劳动突击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就起到了劳动先锋作用。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全国兴起了以矿工阿列克赛·格里高利耶维奇·斯达汉诺夫命名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运动。斯达汉诺夫运动发起以后，党员积极参加到劳动竞赛中，基层党组织在组织、领导劳动竞赛中做了大量工作。劳动竞赛后来成为贯穿苏联历史的主要劳动组织形式，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斯达汉诺夫运动以采用新技术改进生产工艺、打破劳动定额创造新纪录、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要内容，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作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群众劳动竞赛运动，它的兴起是轰轰烈烈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在苏联时代，斯达汉诺夫的名字家喻户晓，斯达汉诺夫的纪录以及他的回忆录《我的成长故事》被编进中学教科书中，几乎所有中学生都知道。斯达汉诺夫一度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他被邀请出席各种演讲活动，得过列宁勋章，当选苏共中央委员会成员，还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他就是苏联工业化成就的化身。不过，20世纪60年代以后，斯达汉诺夫作为一颗“政治明星”悄悄陨落，他几乎不再参加与他的名字有关的那场运动的纪念活动，1975年也没有参加纪念斯达汉诺夫运动50周年的庆祝大会，1977年他逝世时只有极少的人知道。

20世纪80年代末，斯达汉诺夫的名字又开始被历史学家和政论家提起，只不过在这些人的笔下，斯达汉诺夫几乎完全成为一个反面人物，

^① 原词为“共产主义星期六”（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е Субботники），后简化为“星期六”“Субботники”，专指星期六义务劳动。

他的形象成了一些对苏联行政命令体制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进行批判的批评家们合适的“靶子”。斯达汉诺夫的劳动纪录被解释为政府指定的政治行为，斯达汉诺夫运动被说成得到“命令”的，以降低产品质量为代价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并借以加剧对所谓破坏国家建设的“怠工者”和工程师的镇压。他的纪录甚至被解释为假造的。这些说法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一度盛行。

进入新千年以来，几乎每年8月，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报章上都会有一些文章回忆斯达汉诺夫运动，评价斯达汉诺夫以及那场运动。有人认为，这位曾经影响几代苏联建设者的英雄人物被苏维埃政权忘记，在苏联解体前后又几乎被作为历史上的反面人物，是不公平的；有文章指出，历史不仅仅是由政治家、军事统帅以及科学家写成的，一个普通工人用自己的勤劳创造了劳动纪录，写就了那一段历史甚至今天的历史，那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不能忘却。2007年，在这位劳动英雄逝世30周年之际，俄罗斯《真理报》重述了斯达汉诺夫的一生，不过似乎更强调英雄的“另一面”；还有文章考证斯达汉诺夫运动到底是不是真的，工人的劳动热情是不是利益驱动的，斯达汉诺夫本人后来与斯达汉诺夫运动还有没有关系，等等^①。

看来，有关斯达汉诺夫和斯达汉诺夫运动的不同认识依然存在，并且还要继续争论下去。斯达汉诺夫运动能够出现、扩展到全国并影响后来几乎半个世纪的苏联历史，到底是一种政治运动还是经济现象？换言之，那场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是党的号召组织推动的结果还是计件工资制这种物质利益驱动的结果？人们怀着怎样的热情投入创造纪录的活动？应该如何认识当时人们那近乎“疯狂”的劳动热情？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看法实际上反映出当今研究者对斯大林时代苏联劳动管理体制的不同认

^① Сергей Костантинов, Двойное забвение Алексея Стаханова: Знаменитый шахтер был забыт властями при жизни, а ныне стал почти отрицательным персонажем нашей истории http://www.ng.ru/style/2000-08-31/8_stakhanov.html 2000-08-31; Михаил Хрищук, И в забой отправился парень молодой... <http://www.partyofregions.org.ua/contrprop/resonance/43a9221804585/03.01.2006>, 11: 36; Подвиг Стаханова,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Бухареста и первый шахматный турнир между компьютерами. Гибель принцессы Дианы. Правда. Ру 31.08.2007; Александр Малахов. Человек-молоток. http://www.kommersant.ru/k-money-old/story.asp?m_id=17594.

识，以及对于当年那些以忘我的劳动热情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人们的行为如何评价等问题，也反映出对斯大林体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如何看待，并影响到当今时代人们对20世纪30年代苏联建设者的价值取向的理解。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政治的原因，中国史学界在斯达汉诺夫运动产生原因上，与苏联学界基本一致。直到90年代初期，大体都强调党的号召与群众的劳动热情这种精神因素。进入新千年前后，在一些中国学者所著的历史著作中，对于苏联30年代实行的计件工资制所产生的激励效应，有了正面介绍。^① 不过，也有研究者从某个侧面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例如，学者闻一曾分析斯达汉诺夫运动“并不像传统所说的那样，是一场自发的群众运动，而首先是一场领导需要的、自上而下培植起来的运动”。“斯达汉诺夫开创的是这样一个时代：平均主义的计时工资不再被认为是合理的，计件工资给工人平添了无限希望。”^② 闻一先生的说法基本上概括了在斯达汉诺夫运动问题上苏联官方与西方学界的主要分歧：这是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性自发运动，还是由苏联政府培植起来的运动？其产生动因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学习新技术的热情，还是计件工资制度触动工人物质利益，调动了工人生产积极性的结果？看来，不只是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在中国也存在如何客观看待斯达汉诺夫和斯达汉诺夫运动的产生及其作用与评价等问题^③。

（一）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出现及其发展

1935年8月30日夜间，苏联顿巴斯煤矿卡吉耶夫卡矿区“中央依尔明诺”矿井的年轻矿工阿列克赛·斯达汉诺夫在夜班作业时，在一班

① 参见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194页；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285页。在这两部著作之前的苏联历史教材以及文章中，基本还是沿用苏联教科书的“官方说法”。此外，还有文章探讨这个问题，如佟宝昌的《试论苏联斯达汉诺夫运动》和姜天明的《苏联斯达汉诺夫运动及其经验与教训》，对于斯达汉诺夫运动的产生都从星期六义务劳动说起，并肯定斯大林的号召对群众学习技术热情的重要影响。这两篇文章分别载于《史学集刊》1982年第3期和《辽宁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② 闻一：《回眸苏联》，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第30~31页。

③ 有关斯达汉诺夫运动出现的原因及历史作用与评价，参见李燕《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历史作用与教训》，《北方论丛》2007年第6期；李燕《社会主义价值观与斯达汉诺夫运动之辨》，《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5期。

工作时间内，用风镐挖煤 102 吨，超过了原有劳动定额 13 倍，创造了世界采煤的新纪录。之后，不断有人打破这一纪录。与斯达汉诺夫同一工段的党小组长米隆·久加诺夫，在一班工作时间内采煤 115 吨；掘煤手共青团员米特罗凡·康采达洛夫在一班工作时间内采煤 125 吨；9 月 8 日，斯达汉诺夫自己超过第一次的纪录，在一班工作时间内采煤 175 吨。然后，顿巴斯矿工尼基塔·伊左托夫一班采煤 240 吨。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矿井里出现了第一批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对于这一成绩，联共（布）中央高度重视，在全国工人中宣传了斯达汉诺夫的事迹，并号召工人们向他学习，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莫斯科、列宁格勒、高尔基、斯大林格勒等城市继顿巴斯后，也掀起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竞赛活动。于是，在全国各行业兴起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运输业中的司机克里沃诺斯、汽车工业中的锻工布塞根、制鞋业中的上鞋工斯美塔宁、纺织业中的织布女工叶·维诺格拉多娃和玛·维诺格拉多娃^①等先进工作者相继涌现。在农业集体化后的集体农庄，也出现了一批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这场运动发展迅速，到 1935 年 12 月中旬，全国就呈现出“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②的局面。

在 1935 年之前，苏联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有过星期六义务劳动、青年突击运动等形式，多是为完成紧急任务而组织起来的集体劳动。斯大林把斯达汉诺夫运动称为社会主义竞赛的更高阶段，因为它是与新技术相联系的，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标的竞赛活动。的确，斯达汉诺夫工作者都是掌握了本行技术，驾驭并推动这种技术前进的男女工人，他们或者以个人形式，或者以班组为单位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超额完成劳动定额。在他们的带动下，苏联各大工厂中掀起了超额完成生产定额的热潮。

① 彼得·费道罗维奇·克里沃诺斯因把重装火车时速从每小时 23 公里提高到 47 公里而成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在以莫洛托夫命名的戈尔克夫斯基自动化工厂，锻工亚历山大·布塞根带领自己所在班组在一班时间里生产几千个曲轴，远远超出一班生产 675 个曲轴的定额；列宁格勒市“斯科洛霍特”制鞋厂工人尼·斯美塔宁因一班上鞋 1400 双超出 700 双的定额而成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叶夫多基亚·维诺格拉多娃和玛丽亚·维诺格拉多娃在维楚加的一个纺织工厂工作，也因打破织布定额而一起成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参见 *Партия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в борьбе за завершени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Москва. 1949. с. 65.*

② *В. А. Шестаков, М. М. Горинов, Е. Е. Вяземский. История отчества XX век. Москва. 2002. с. 167.*

例如，1936年1月1日，在莫斯科市展开了“斯达汉诺夫运动日”活动。这一天，莫斯科市很多工厂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成果：“铣床”工厂完成计划的201%，第四机械工厂完成计划的200%，“勇士”工厂完成计划的198%。1936年初莫斯科市还进行了斯达汉诺夫运动10天活动，结果是：列宁区有54家企业完成计划的152%；鲍曼斯克区有60家企业完成计划的140%；基洛夫区有40家企业完成计划的131%，等等^①。这种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群众运动不仅在莫斯科，在全国其他城市也广泛开展起来。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斯达汉诺夫运动是苏联各行各业组织生产劳动的主要形式。

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在苏联涌现出成百甚至上千位战时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他们几倍、十几倍地完成劳动定额^②。库兹涅茨克冶金工厂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炼钢工人亚历山大·恰科夫在3年时间里超计划炼钢14000吨；莫斯科女共青团员、刨工叶卡捷琳娜·巴雷什尼科娃把自己带领的班组由6人减少到3人，并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在她的影响下，许多工厂展开压缩人员集中劳动的运动。除提高劳动生产率外，卫国战争中的劳动竞赛又为斯达汉诺夫运动增添了新的内容，即发掘内部潜力、节约原材料、降低成本，争取最好地完成前线订货。到战争后期，劳动竞赛参加者急剧增加。例如，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联合企业，从1944年1月1日到1945年1月1日一年中，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和突击手的人数就从11000人增加到15400人；在库兹涅茨克人数从9300人增加到16800人^③。劳动竞赛为苏联取得卫国战争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① И. Ротин. Москов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ВКП (б) в 1935 – 1941 гг. Партия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в борьбе за завершени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Москва. 1949. с. 142. 不过，应注意到的是，在当时莫斯科的个别工厂企业中，还出现了企业班组、工段为打破工作纪录而给“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人为地创造条件的现象，如奥尔忠尼启则机床制造业中的铣工古多夫，当他个人打破劳动定额时，他所在车间却没有完成任务。这种情况后来得到纠正。

② 指由高尔基市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共青团员们发起的，在生产工作中，通过革新工作方法和技术而将定额完成到3~5个，甚至达到10个或更多。情况可见 Н. Шатагин.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вдохновитель и организатор побед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Москва. 1955。

③ 参见〔苏〕Н. И. 舍霍夫佐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10卷，蒋妙瑞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704页。

在战后恢复时期，在生产领域的劳动竞赛，除节约成本、降低原材料等目的外，还增加了提高质量、降低残次产品等要求。斯达汉诺夫运动最初所提倡的学习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内容又有了新的变化。以后，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继续在苏联生产部门展开，直到20世纪70~80年代。可见，斯达汉诺夫运动作为苏联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形式之一，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及战后，占有重要的标志性地位。

（二）斯达汉诺夫运动出现的主要原因探析

斯达汉诺夫运动产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并不是偶然的，从最初一些工人打破劳动定额的个人行为，到发展为全国性的社会运动，实际上反映了苏联工业化时代的社会情况。国家制度、党的号召、组织引导、社会风气等因素在其中都留有历史的印记。

1. 党的号召——关于斯大林的两个口号与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关系问题

在苏联开始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早期，像第涅伯河水电站、乌拉尔机器制造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厂等大规模工厂、电站类基础设施建设，不需要工人掌握太多的生产技术，人们只要有劳动热情，能够加快生产速度就是对国家建设的贡献。于是，劳动突击队成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劳动竞赛的主要形式。不过，当工厂开工，机器运转，农业集体化中机器逐渐普及后，苏联的建设遇到了一个困难：极端缺乏能够组织新的生产和掌握复杂技术的人才。这个问题首先出现在捷尔任斯基拖拉机制造厂中。这个工厂的建设仅仅用了11个月，但人们掌握这个工厂的生产工艺却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工厂中的许多工程师、技术员和工人都不会使用新技术和设备，不会在流水作业中相互协调地工作^①。拥有现代技术设备的新工厂建立起来了，可是却没有足够的懂得新技术的工厂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更缺乏懂技术的行政管理人员，极大地影响了工业化建设速度。在这种情况下，让更多的工人掌握新技术就成为当务之急。1931年斯大林在一次讲话中提出“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

^① Б. Н. Пономарев, М. С. Волин, В. С. Зайцев и др.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2. с. 394.

切”，党通过开办各类技术学校和训练班培训工人，还支持共青团举行社会性技术考试，从1931年起技术考试开始在工厂和新建工程中普及。几十万名从前的粗工和建筑工人因掌握新技术而成为钢铁生产、机器制造及煤炭行业的熟练工人。在农业生产中，1931年春天有20多万个集体农庄庄员成为拖拉机手和农业机器操作人员。

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后，国家需要大批掌握技术和充分运用技术的干部，来领导工农业和运输业的生产。1935年，斯大林在对苏联红军学院学生的讲话中，又提出“干部决定一切”，将社会主义建设对技术的要求提到更高的层次，即要有大批懂得新技术并会管理企业的人员领导生产活动。斯大林的两个口号^①反映出苏联工业化建设时期国家对技术工人的需求，给青年工人以激励和启发，成为当时苏联共产党号召人们学习和掌握新技术的代表性号召。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斯达汉诺夫运动。因此，斯大林所一再强调的斯达汉诺夫运动是自发的群众运动，显然是指最初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个别提高生产效率的情况，而不是就当时苏联社会环境的总体情况对工人的影响而言的。

当然，斯达汉诺夫式的工作方法的出现，具有一定的自发性。在参加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大会时，斯达汉诺夫这样谈他创造纪录时的想法：“国际青年节在临近，我想要创造一个纪录来纪念它。”布塞根则说：“我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像对学习那样充满梦想。我想知道汽锤是怎样造成的，并亲手制造它。”^②的确，早期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都是以单个人的形式创造了劳动纪录，但这只是说明，早期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出现具有自发性质，而要使个人的行动具有社会效应，成为社会运动，没有来自执政党上层的推动，没有各种形式的宣传，是不可能的。全苏

① 实际上，斯大林曾经提出三个口号：第一个是1931年初，在“破获”了“工业党”“农业党”等资产阶级专家案件以后，提出“布尔什维克必须掌握技术！”（Большевики должны овладеть техникой!）；第二个是“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Техника в период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и решает все）；第三个是“干部决定一切”，准确地说，斯大林的原话为“掌握技术的干部决定一切”（Кадры, овладевшие техникой, решают все）。第一个口号主要是针对一些工人出身的企业管理者，在不懂技术的情况下，把企业的技术工作委托给政治上“不可靠”的旧专家而提出的。后来官方经常提到的只是后两个口号。

② Anna Louise Strong, *The Stalin Era*, New York: Mainstream Publishers, 1956, pp. 52 - 53.

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大会的召开本身就是一种宣传和号召。据统计，1935年11月中旬，也即第一次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大会召开时，在列宁格勒的工业部门中有4万名左右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到1936年1月1日，这个数字就增加到10万人^①。党组织和行政部门的号召与推动，对于大规模的群众性创造劳动纪录的活动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力量。

2. 计件工资制度对于提高工人生产积极性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

还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党的领导人列宁就已经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劳动中需要有收入上的差别，这是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一种重要手段。1918年春，列宁在一次讲话中提出，必须实际采用和试行计件工资制，采用泰罗制^②中许多合乎科学的进步的方法，根据生产总额、运输业的经营结果来决定工资，并实行奖励制。之后，全俄产业工会和地方产业工会先后制定了各行业工人的工资标准^③，但这些标准不足以将高工资与低工资之间的差距拉开。工资差距过小，不能鼓励技术高的工人，对生产不利。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反对平均主义成为工资分配中的一项主要任务。1921年，苏联开始实行计件工资制。当时实行计件工资的工人仅占29%，1923年提高到41.5%，到1925年则提高到60.1%^④。由于实行的范围有限，早期计件工资仍不足以拉开工资收入的差距。1931年，斯大林在讲话中提出要取消平均主义，打破旧的工资等级制度。1931~1933年，在全国范围进行了一次工资改革，一方面拉大工种间和

① 参见基姆主编《社会主义时期苏联史（1917~1957年）》，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等译，三联书店，1960，第536页。

② 弗雷德里克·泰罗（1856~1915年）是美国工程师。他提出的一套生产管理和工资制度即泰罗制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其主要内容是，从企业中挑选体格最强壮、技术最熟练的工人进行操作，将工作过程拍成电影，以一秒或几分之一秒为单位记录下完成每道工序、每项动作的时间，研究出最经济、生产效率最高的所谓“标准操作方法”。据此制定生产规程和劳动定额，规定不同等级的工资单价，迫使工人以最紧张的劳动去达到规定的定额，超过定额的有奖，达不到定额的受罚。这种制度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但也使工厂生产的管理走上科学管理轨道，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参见〔苏〕O. A. 叶尔曼斯基《科学的生产组织和泰罗制》，张贤务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

③ 譬如，1918年顿涅茨—格鲁舍夫斯克五金工会制定出三等十五级工资等级表，彼得堡区五金工会制定了五等十五级工资等级表。两个登记表中高低等级差为1比2.1。参见国家劳动总局办公室外事组编《苏联工资制度概况》，三联书店，1978，第2页。

④ 参见国家劳动总局办公室外事组编《苏联工资制度概况》，三联书店，1978，第6~11页。

工种内的工资距离，另一方面推广计件工资制，与此同时还广泛实行奖励制度。因此，客观地说，斯大林在1931年的讲话并不是首创计件工资制，他只是强调要拉大工人的工资差距，而从实际效果来看，由于工资差距拉大，计件工资的刺激作用才凸显出来。但从经济利益角度说，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超出劳动定额为目的的斯达汉诺夫式突击手、劳动英雄的出现，的确与计件工资这种激励机制调动了工人的劳动热情有密切关系^①。

此外，成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所获得的社会声望，也吸引更多的青年努力创造新纪录。一位冶金业斯达汉诺夫工作者B. M. 阿莫索夫曾回忆说：“原来我是一个落后的人，劳动竞赛激发了我的求知欲，我开始学习技工课程，结业成绩为优。市党委派我到哈尔科夫学习……作为先进工作者，提拔我进入党的机关……1939年我被授予劳动红旗勋章。”^②党和国家给予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荣誉以及全社会的尊重，无疑是青年工作者创造劳动业绩的一种巨大推动力量。正因为如此，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在获得高收入时，并不隐瞒自己的收入，他们购买文化用品来丰富自己的生活，姑娘们会把自己打扮得更漂亮些^③，因为他们相信，只有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会给工人带来高收入，“在资本主

① 在西方，一些学者和政论家多从经济利益角度出发来分析斯达汉诺夫运动出现的动因，强调物质利益即计件工资的刺激作用。例如，20世纪30~50年代曾在苏联城乡实地考察的联邦德国人克劳司·梅特纳就认为，斯达汉诺夫运动出现的主因是实行了计件工资制度，苏联的计件工资制度实际具有资本主义剥削的性质，人们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努力工作是因为他们希望获得工资外的更多收入；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在他的遗著《权力与繁荣》中，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比较详细地分析了斯达汉诺夫运动的产生根源。在奥尔森的笔下，苏联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是在意识形态烟幕下用物质刺激掩盖剥削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典范。参见〔西德〕克劳司·梅特纳《苏维埃人剖视》，北京编译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第66~68、73页；〔美〕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苏长和、嵇飞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第86~104页。

② В. А. Шестаков М. М. Горинов Е. Е. Вяземский. История отчества XX век. Москва. 2002. с. 167.

③ 当时，在一次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同国家领导人的座谈会上，打眼工尼娜·斯拉弗尼科娃很有兴致地讲到，她同另一位同是打眼工的朋友马露霞·马卡洛娃比赛。尼娜挣了886卢布，而马露霞挣了1336卢布。米高扬问她，那位女朋友的钱是怎样花的？尼娜介绍，马露霞给自己买了一双乳白色的靴子花了180卢布，一条双绉的连衣裙花了200卢布，一件大衣花了700卢布。最后尼娜自豪地说：“这就是眼下我们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花销！”参见 Александр Малахов. Человек-молоток, http://www.kommersant.ru/k-money-old/story.asp?m_id=17594。

义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能导致工人被辞退并使得资本家更富裕”^①。换言之，工人们创造生产纪录，是因为他们将当上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视为最光荣的事。正如当今人们总结的那样：“在那个时代创造纪录不是为了金钱，也不是为了名声，而是为了人的精神的崇高。”^②正是有了这种精神动力，怀着对共产主义理想必胜的信念，才使得几百万普通劳动者投入忘我的劳动。要知道，千百万人在突击劳动中收获的不只是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还能感受到道德水平的巨大提升，以及因国家实力迅速增强而带来的自豪感。也正因为有了劳动者的巨大热情，当时的苏联每年有 600 个新企业建成投产，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

这一点，连苏维埃制度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波兰历史学家多伊彻在自己的著作中，用很不屑的口吻写道：“斯达汉诺夫运动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使工人的摄取欲达到了极端，推动他们在机床前互相竞赛”——他把斯达汉诺夫运动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主观因素归结为工人的物质需求或经济利益。不过，他也承认工人们的社会主义劳动热情，认为在当时人们身上还保留着“（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和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性”，肯定地指出：“任何一个在 30 年代观察过首批突击队员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劳动热忱的人，都会对此深信不疑，他们简直是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在乌拉尔光秃秃的山岩上或更遥远的东方建起了钢铁厂和电站。”^③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曾访问过苏联的法国作家纪德，对斯达汉诺夫运动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是苏联人的懒惰和劳动效率低下，才使当政者想出这样一个调动人们积极性的办法。但他也承认，正是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和一代热血青年热爱工作，才给这个沉闷的国家带来了生机和活力^④。

① Александр Малахов. Человек-молоток, http://www.kommersant.ru/k-money-old/story.asp?m_id=17594.

② Михаил Хрищук, И в забой отправился парень молодой..., <http://www.partyofregions.org.ua/contrprop/resonance/43a9221804585/>, 03.01.2006, 11: 36.

③ 参见〔波〕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 托洛茨基：1929～1940》，施用勤、张冰、刘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 116～117 页。

④ 参见〔法〕安德烈·纪德《纪德文集》，徐和瑾、马振骋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第 906 页。

不过，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苏联学界并不愿公开承认计件工资的激励效应，他们更多地从党的号召、人们的爱国主义劳动热情等因素上分析，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刺激结果。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肯定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的社会主义阶段，在社会产品分配上实行“按劳取酬”原则，也承认物质利益对于劳动者的刺激作用。列宁对泰罗制的评价^①说明，他已认识到在苏维埃国家的建设中，需要用工资收入上的差别来实现科学管理和对劳动的监督。斯大林也指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基本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一公式。”^②他还在1936年将按劳分配具体化为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所得到的劳动报酬不是以他们的需要为标准，而是以他们所投入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为标准。”^③斯大林在讲话中多次强调要消灭工资制度中的平均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斯达汉诺夫运动，不可能不受到分配激励机制的影响。从体制上看，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出现可以视为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没有对外殖民、不能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侵略的情况下，挖掘内部潜力，调动工人积极性进行工业化建设的一种比较成功的尝试^④。可惜的是，出于政治原因，苏联以及后来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宣传中对于利用计件工资来激励工人的劳动热情，以及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半遮半掩状态，没有将这种调动工人生产积极性的手段很好地发挥，成为导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僵化的因素之一。

① 列宁最早评价泰罗制是在1914年，认为“泰罗制就是用机器奴役人”（《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398页）；以后，随着对资本主义研究的深入，他又指出泰罗制“也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即按科学来分析人在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精确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统计和监督制等等”（《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9，第237页）。

② 《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第108页。

③ 《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第92页。

④ 西方学界更多地强调苏联体制的低效，在这种低效体制下统治者为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而采取了物质刺激的办法。关于苏联经济制度的低效率以及西方学界对苏联这一类型的制度安排的批判，奥尔森的学生、中国学者张宇燕的《制度选择、历史哲学与苏联经济史》，对西方主要著作与观点加以介绍并分析，可参见张宇燕《经济学与常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第30~37页。

3. 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风气的影响

促使那些劳动者创造纪录的，还有对苏维埃国家的热爱——爱国主义精神。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适逢西方国家遭遇经济危机，苏联借机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与设备，还聘请了一批外国专家和技术工人到苏联工作。在工作中，一些外国专家的鄙夷与轻视，给了苏联青年很大刺激。斯达汉诺夫工作者 И. И. 古多夫在创造了第一个生产纪录多年后回忆道：“当时是什么力量促使我忘我地工作？是为了多得些报酬？是的……但又不仅仅是这些……是那些有关苏联工人如何笨拙的说法刺痛了我。”^① 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经济危机刚过，资本主义世界一片衰败，苏联正热火朝天地加速进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两者对比，更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因为如此，苏联青年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并坚定不移地相信这个国家的明天一切都会是美好的。这是一种迥然不同于资本主义世界尔虞我诈、自私自利的价值观念，这种信念促使人们全身心投入建设中，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和家庭。当时，不仅苏联青年忘我地投身于建设，连西方国家的青年对苏联也十分向往：在斯达汉诺夫的事迹传到国外后，他成了苏联最知名的人物之一，美国林肯大学请他邮去自己的照片，为的是“把它放到那些我们时代或我们以前时代最伟大的人们的照片和亲笔信当中”。可以将这一举动理解为美国人对各种纪录的狂热崇拜，但也说明斯达汉诺夫的纪录已经成了真正的世界性成就。当时，法国矿工也前来研究他的经验^②。那时，这是令所有斯达汉诺夫工作者骄傲的事。

4. 西方学界的不同看法与评价

最初，西方人并不十分清楚苏联出现的青年突击运动和斯达汉诺夫

^① В. А. Шестаков М. М. Горинов Е. Е. Вяземский. История отчества XX век. Москва. 2002. с. 167.

^② Сергей Костантинов, Двойное забвение Алексея Стаханова: Знаменитый шахтер был забыт властями при жизни, а ныне стал почти отрицательным персонажем нашей истории. http://www.ng.ru/style/2000-08-31/8_stakhanov.html 2000-08-31.; Михаил Хрищук, И в забой отправился парень молодой... , <http://www.partyofregions.org.ua/contrprop/resonance/43a9221804585/>, 03.01.2006, 11: 36.

运动是怎样的一种劳动组织形式，他们曾形象地称之为“赶工”^①。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和研究后，西方人对斯达汉诺夫运动更多的是采取批判的态度，并从经济制度层面上加以分析。20世纪30~50年代曾在苏联城乡实地考察过的联邦德国人克劳司·梅特纳就认为，斯达汉诺夫运动出现的主因是实行了计件工资制度，苏联的计件工资制度实际上具有资本主义剥削的性质，人们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努力工作是因为他们希望获得工资外的更多收入。克劳司·梅特纳的主要根据是，十月革命初期，人们是靠对社会主义的热情而工作的，他们不需要物质享受，所以才出现了共产主义义务星期六。而在十月革命的热情过后，物质刺激就成为国家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重要手段。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涌现出的劳动英雄还是一些“全心全意、无所需求和充满集体主义精神的普通工人”，而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仅仅靠思想工作已经不能调动人们的劳动热情。于是，苏联便开始采用这样一种制度：基本工资非常低，要想超过维持生活的水平，每一步都必须经过特别的、额外的努力才能赢得。这是从斯大林在1931年批准将工资由平等向级差以至于不平等的变化开始的。克劳司·梅特纳由此肯定，这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剥削方式：“俄国已经进入了它的资产阶级时代。‘新阶级’并不是西方所谓的那种资产阶级，这是国家资产阶级，它的所有的成员都是为国家工作而且从属于国家。”^②

半个多世纪后，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在他的遗著《权力与繁荣》中，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比较详细地分析了斯达汉诺夫运动的产生根源。他认为，斯大林时代的苏维埃国家用最大限度地压低劳动者工资，实行奖金、累进计件工资制，对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予以奖励，以及向生产效率特别高的工人发放特殊额外津贴等方式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热情，来保证工业建设的快速进行；在农村则用迫使农民向集体农庄提供大量密集劳动，以此换取一点时间经营分配给他们的一小块私人土地的方式，实

① 这个词是“speed-up”，参见 Anna Louise Strong, *The Stalin Era*, New York: Mainstream Publishers, 1956, p. 52。

② [西德]克劳司·梅特纳：《苏维埃人剖视》，北京编译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第66~68、73页。

现“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①。当时的苏联就是通过这些手段来实现经济的增长，而实际上那是一个低效的体制。他将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视为一个通过专制权力采用“狡诈”的手段实现繁荣的典型。换言之，在奥尔森的笔下，苏联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是在意识形态烟幕下用物质刺激掩盖剥削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典范。

对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发起原因的这两种解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苏联与西方的“主流”说法，后者甚至延续至今。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这两种说法似乎是相互对立的：苏联共产党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劳动热情，西方则突出苏联共产党利用经济手段刺激人们，目的是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在冷战时期，这两种观点几乎水火不容。时过境迁，如今回头看，这两种因素对于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发起都曾是十分重要的推动力量。有材料表明，在斯达汉诺夫运动发起之前，在苏联的很多企业就已经开始了劳动竞赛，斯达汉诺夫只是他所在班组推举出来的一个创纪录的代表。他创造劳动纪录的当天，矿井就召开党委会：“矿党委认为，斯达汉诺夫创造的纪录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用镐头挖 102 吨煤，这是一条完成斯大林同志关于干部要无条件保证提前完成年度计划之命令的可行途径。”矿井党委做出了对斯达汉诺夫进行表彰的决定^②，并在全行业宣传，最终变成一场群众劳动竞赛运动。就此意义来说，“党的号召”与组织推动，是斯达汉诺夫“一夜成名”并使斯达汉诺夫运动成为全国性群众运动的主要动力。

同时，在斯达汉诺夫运动发起前后，计件工资制度也给斯达汉诺夫本人以及其他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带来了“不菲”的收入：首次创造纪录的那一天，斯达汉诺夫在一个班内挖煤 102 吨，挣得 200 卢布，而平常

① 奥尔森的具体表述为：苏联对劳动者“边际内”收入征收非常高的隐性税收，而对额外收入或奖金性收入征收很少的税或不征税，实际上是用最大化税收收入的方式剥削劳动者的劳动这种隐性手段来提高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参见〔美〕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苏长和、嵇飞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第 86~104 页。

② 矿井党委会做出的决定包括：将斯达汉诺夫的名字写到黑板报上，与矿井先进人物列在一起；另发给他一个月的工资作为奖金；从给技术人员的住房中拨出一套给斯达汉诺夫，安装电话，配备交通工具；给斯达汉诺夫及其妻子在所有电影院、剧场以及所有晚会中安排指定的座位等 9 项。详情参见 Александр Малахов. Человек-молоток, http://www.kommersant.ru/k-money-old/story.asp?m_id=17594。

一个班的收入是 20 ~ 30 卢布。斯达汉诺夫运动开始时期，一个采煤能手在一个月内能挣近 400 卢布，掘进工中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每月能挣超过 1600 卢布，而同期低工种的工人工资只是 100 卢布……^①越来越多的材料说明，在当时确实存在上下收入相差十几倍的计件工资制度，这个制度给创造纪录的工人带来了高收入^②。对于计件工资的激励作用，当时的苏联史学界并没有完全否定，但也不宣传，因为政府更侧重于其精神作用。事实上，一场社会运动的产生与扩展的动力应是多方面的。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时期的苏联，国家对技术人才和掌握技术的管理人才的需要，是社会需求导向；计件工资和奖励制度，是国家为鼓励人们学习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采取的推动措施。在有了社会需求又有了制度推动后，将单个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活动变为一场社会运动，就需要有组织上的动员和组织体系的保证。单纯强调某一个方面都有失偏颇，不能完整揭示这场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运动的起因。同时，对于这场运动的发起，除了应看到执政党的号召与组织、计件工资制度等制度层面上有形的因素外，还应该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人们的心理和思想等精神层面的原因。

总体来看，20 世纪 30 年代，在苏联社会主义已经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工人阶级的社会心理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以新的姿态看待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早期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多半还是以个人形式出现的先进分子，后来，斯达汉诺夫运动就成为在党组织以及其他行政或群众组织领导下的集体行动，单个人为获得工作或更高工资而进行的竞争逐渐变为真正的同志情谊和兄弟般的互助。除计件工资、奖励制度等经济因素外，党的号召，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对技术和人才的需要，党员的模范作用，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工作，苏维埃国家“新人”^③的爱国主义、

① Михаил Хрищук, И в забой отправился парень молодой... <http://www.partyofregions.org.ua/contrprop/resonance/43a9221804585/03.01.2006,11:36>; Александр Малахов. Человек-молоток, http://www.kommersant.ru/k-money-old/story.asp?m_id=17594.

② 实际上，还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就已认识到，在苏维埃国家的建设中，需要用工资收入上的差别来实现科学管理和对劳动的监督。

③ 曾在苏联生活多年，也是中国人所熟知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自己的著作中，就用这样的词称呼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的建设者。参见 Anna Louise Strong, *The Stalin Era*, New York: Mainstream Publishers, 1956, p. 47。

集体主义精神，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热情都体现在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劳动创造中。对于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年代后方工人节约原料、降低成本、以忘我的劳动热情为前线生产军工产品和日用品的行为，就更不能够单纯用物质刺激来分析了。因此，依个人之见，在导致斯达汉诺夫运动产生的诸多原因中，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精神的因素远大于物质的因素。

（三）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历史作用

在1935年之前，苏联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有过星期六义务劳动、青年突击运动等形式。由于斯达汉诺夫运动以掌握新技术为手段，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标，因此被斯大林称为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更高阶段。以斯达汉诺夫运动为基础，随着国家建设的需要，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战后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不断增添新的内容，成为苏联劳动组织的主要形式。

1. 斯达汉诺夫运动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反法西斯胜利奠定物质基础

斯达汉诺夫打破劳动纪录的秘密在于改变劳动组织形式。原来在煤矿中的掘煤工都是一个人掘进，中间要中断挖掘，从事坑内支架工作，斯达汉诺夫与别人合作，将掘进手和支架工的工作分开，从而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也为采矿技术的革新提供了思路。先是在采矿业，之后在冶金行业、轧钢业、机器制造业以及制鞋业、纺织业等轻重工业部门，工人们学习新技术，改进生产工艺，不断打破劳动纪录，提高劳动生产率。

由于斯达汉诺夫运动在全国的广泛开展带动起生产革新运动，在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年）期间，苏联的劳动生产率有了极大提高。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时的1937年，同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的1932年比较，重工业部门生产率达到209%，轻工业为136%，食品工业为166%，全部工业生产率达182%^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苏联工业生产，尤其是重工业和能源工业生产部门产品产量急剧增加。第三个五年

^① 数字出自 E. Капитонов. Корни и значение стаханов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Партия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в борьбе за завершени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Москва. 1949. сс. 77-78。

计划时期，国家加快重工业和军工产品的生产步伐，在这些企业中，斯达汉诺夫运动继续展开，生产效率也在提高。

由表1-2可看出，与其他几年相比较，1937年国民经济主要生产部门的生产量或生产能力是有明显增加的一年。除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加快建设步伐等因素外，主要原因还在于，当时在各行业中（尤其是重工业各部门）开展的斯达汉诺夫运动，使得劳动生产率有了极大提高，生产能力和产出量也大幅提高。到1941年，苏联已拥有强大的经济基础。钢产量已达到1800万吨，生铁1500万吨，煤16600万吨，石油3100万吨，电力500亿千瓦。在几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建成了9000个大型工业企业；1940年全部工业总产量比1913年增长了6.7倍，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了14.5倍。对加强国防力量特别重要的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业总产量超过革命前的俄国34倍^①。这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国家实力增长极快的时期，苏联国力空前强盛，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表1-2 苏联战前主要工业部门产品产量与生产能力

| 年份 | 1928年 | 1932年 | 1937年 | 1940年 |
|-------------|--------|--------|---------|---------|
| 煤炭（万吨） | 3551.0 | 6436.0 | 12796.8 | 16592.3 |
| 石油（万吨） | 1163 | 2141 | 2850 | 3112 |
| 钢（万吨） | 425 | 593 | 1773 | 1832 |
| 轧材（万吨） | 343 | 443 | 1297 | 1311 |
| 汽车（万辆） | 0.084 | 2.388 | 19.99 | 14.54 |
| 拖拉机（万台） | 0.13 | 4.89 | 5.10 | 3.16 |
| 纺织品总计（亿立方米） | 21.98 | 21.64 | 30.13 | 33.20 |
| 电站发电量（亿度） | 50.07 | 135.40 | 361.73 | 485.62 |
| 电站装机容量（万千瓦） | 190.5 | 467.7 | 823.5 | 1119.5 |

资料来源：《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转引自陆南泉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第154~224页。

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在苏联后方，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继续开展，竞

^① 《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队建设），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第689页。

赛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工业中劳动生产率1942年一年就增长了19%^①。1943年，为保证前线物资供应，苏联国民经济各个生产部门广泛展开社会主义竞赛，1943年初，工业、建筑、运输部门有77.6%的工人参加了竞赛，到年底时就增加到82.1%^②。这个时期的劳动竞赛内容除提高劳动生产率外，还有发掘内部潜力，节约原材料，降低成本，争取最好地完成前线订货等。在竞赛中涌现出成千上万名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或突击手。后方工人中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为保证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在战争最后3年间，苏联军工部门每年生产3万辆坦克、自动推进炮和装甲车，航空工业每年生产4万架飞机，制炮业每年生产12万门大炮、45万挺轻重机枪、300多万支步枪和将近200万支冲锋枪，迫击炮生产部门每年生产10万多门迫击炮^③，这是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重要物质保障。

在战后恢复时期和国家大规模建设时期，劳动竞赛在提高效率、节约能源和原材料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2. 斯达汉诺夫运动创造了精神财富

斯达汉诺夫运动不仅为苏联国家建设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还对20世纪30~50年代苏联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对于形成良好社会风气，提高民众科学文化素质，树立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斯达汉诺夫运动改变了苏联社会风气，推动了全社会的学习热潮。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之前，苏联社会文化水平还很低。1926年，全国只有51.1%的人识字，在个别民族，民众识字率比这个比例还要低。譬如，在中亚的哈萨克，识字率仅为7.1%，在吉尔吉斯为2.2%，在土库曼为2.3%，在西伯利亚的雅库特人中为5.8%。五年计划开始时，9岁以上的农村居民还有半数以上是文盲。相比较而言，工人中的识字人数稍高些。例如，1929年，在列宁格勒的金属加工和机器制造业中，不识

① [苏] В. П. 莫罗佐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5卷，吴文智、朱蕴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第527页。

② Профсоюзы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в четырёх томах. Москва. 1963. т. 3. с. 372.

③ 数字出自 Партия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в борьбе за завершени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Москва. 1949. с. 79。

字的工人数量平均占 2.8%，在莫斯科省的同行业中，不识字工人的数量平均为 3.6%^①。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全国开始了扫盲运动，各种技术学校、培训班以及工人学校的开办，使苏联工人的文化技术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是，大规模工业化建设，需要大批劳动力，加之农村集体化的实行，使许多农民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加入工人阶级的行列，工人中文盲比例还比较大。在工厂中，一些普通工人和党员不尊重技术人员，工人在上班时闲逛、酗酒，讽刺打击进行发明创造的人，阻碍新发明。有的管理人员因不懂技术，只满足于从事一般性的事务工作^②。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开展，带动起全社会的学习风气，在党的大力宣传和组织下，在苏联掀起群众性革新技术的热潮，工厂工人和集体农庄的农民文化水平有了极大提高，他们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学习班，学习新机器的使用，尊重技术人员。到 1936 年末，在大工业中，有 2/3 的工人通过国家技术测验。在农村，1938 年初，集体农庄中有 100 万名左右的拖拉机手，20 万名以上的联合收割机手和副手，10 万名以上的汽车司机、机械工和钳工，120 万名集体农庄领导人员^③。随着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苏联的社会风气也有了极大变化，国民素质提升，体现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精神风貌。

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后方工人以超额完成生产定额的方式展开劳动竞赛，他们几倍、十几倍地完成劳动定额，涌现出成百甚至上千位战时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多生产，加快生产，保证前线物资供应，为战胜德国法西斯做出贡献。

卫国战争结束后，在第四个五年计划（1946～1950 年）和第五个五年计划（1951～1955 年）期间，为恢复苏联国民经济和展开大规模社会

① 数字出自基姆主编《社会主义时期苏联史（1917～1957 年）》，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等译，三联书店，1960，第 492～493 页。

② 1929 年莫斯科自动化工厂车间党支部书记 A. П. 萨罗夫发起突击运动前，他所在车间的情况就是这样的。萨罗夫组织起突击队，规定突击队成员要同闲逛和酗酒现象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批评破坏劳动纪律的人。在他们的带动下，车间里的风气有了明显好转，几乎所有工人都参加突击队，都到技术学校和夜校学习。B. A. Шестаков М. М. Горинев Е. Е. Вяземский. История отчества XX век. Москва. 2002. с. 166.

③ 数字出自基姆主编《社会主义时期苏联史（1917～1957 年）》，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等译，三联书店，1960，第 551 页。

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在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等生产部门中继续展开。这个时期的劳动竞赛，在内容上，除斯达汉诺夫运动最初提倡的采用新技术提高生产率外，还有节约原料、降低成本、减少能源消耗等内容，与西欧经济的衰败正相反，苏联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3. 斯达汉诺夫运动为执政党组织群众性劳动竞赛提供了经验

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时期，随着工人队伍的壮大，大批工人加入党组织。据统计，在联共（布）16大（1930年）召开时，产业工人约占全体党员的一半^①。党员人数的急剧增加，凸显出党组织结构上的一些弊病，如城市党委会的权限不够大，基层支部因党员队伍庞大而距离生产第一线过远，从而难以灵活有效地发挥领导和组织职能等。在此情况下，苏联共产党对基层党员的管理和组织形式进行了调整，在1930~1932年扩大了城市党组织的权限^②，1934年党的17大通过新党章，决定将党支部改为基层党组织，下辖若干支部和党小组。这样，党的基层组织更接近于生产和群众生活，方便了党对群众性劳动竞赛的领导。

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刚出现时，还不是有组织的，多是以单个人的形式创造了劳动纪录，他们不但没有得到相关行政部门的支持，还受到一些行政管理人员的阻拦^③。不过，基层党组织很快就在劳动竞赛中发挥出组织和宣传作用。那时，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所创纪录，一般都是由班组、工段中的党员协助或党小组发现，报到上级工会或党委那里，才使他们的工作成绩得到宣传。开始时，对于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宣传主要以口头形式，后来，就变为以壁报、板报、宣传画等方式进行了。1935年11月中旬全苏第一次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会议后，基层党组织在组织工人进行技术培训，推广先进技术和经验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从而使斯达汉诺夫运动几个月间在全国开展起来。

① Б. Н. Пономарев. М. С. Волин. В. С. Зайцев и др.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Москва. 1982. с. 384.

② 规定在5万人以上的城市设立党委会，增加工厂党组织中车间、工段党支部、党小组的数量。

③ 斯大林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企业中某些行政人员在工人创造劳动纪录时的拦阻提出批评。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379页。

伟大卫国战争期间，为响应党的“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号召，基层党组织领导党员和团员青年开展竞赛，加班加点生产，以配合前线作战。全苏社会主义竞赛成了群众发挥创造性、积极性的强大动力，打开了生产的补充源泉，为战争胜利提供了物质保障。

战后，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更多地以工段、车间、企业为单位进行，基层党组织与各级行政部门、工会、共青团共同领导和组织劳动竞赛。基层党组织做了很多宣传工作。当时在工厂车间中，一般都有一个专门的宣传栏，将五年计划的目标、前景、本部门的任务列出。例如，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在莫斯科索柯尔尼克区卡冈诺维奇车辆修理厂车厢车间，就有这样一个“红角”，那里有宣传画和图片橱窗，用数字和事实描绘苏联第五个五年计划前景，使车间工作者了解自己车间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工作任务^①。在当时苏联的工厂企业中，这种宣传工作一般由基层党组织牵头来做。

正是由于基层党组织和工会以及其他群众组织的组织与宣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才由工人单个打破劳动定额的行为推广成一场全社会都参加的运动，并在之后的半个世纪中，贯穿苏联经济生活，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其他一些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也产生了很大影响^②。

从最初处于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之中，到战胜德国法西斯，再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繁荣时期，斯达汉诺夫运动加快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步伐，在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身上体现出了爱国主义精神。

（三）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历史教训

斯达汉诺夫运动在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和伟大卫国战争时期，以及战后社会主义建设中，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不过，作为一场社会运动，斯达汉诺夫运动在进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留下了历史的教训。

^① В. Зимин. Цеховая партий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Москва. 1953. с. 4.

^② 20世纪50年代初，在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以及中国等国家的建设中，曾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开展群众性劳动竞赛，劳动生产率和工业生产水平有很大提高。参见姜天明《苏联斯达汉诺夫运动及其经验与教训》，《辽宁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1. 生产中的“冒进”

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中，就出现了制定的指标过高，向工业化“大跃进”（большой скачок）的情况。虽然劳动者以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参加到建设中来，进行突击劳动，当斯大林宣布五年计划提前完成时，还是有许多建成的工厂不能投产，机器不能正常运行。因此，有学者提出斯大林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实际上是计划无法进行下去^①。

第二个五年计划进行了一些调整，生产指标有所降低，但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人为提高指标现象再次出现。第一批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出现后，随着打破纪录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为降服“科学的烈马”而不停地挑战新纪录，创造新纪录，从而出现为创纪录而造纪录的情况。1935年与斯达汉诺夫同样出名的乌克兰集体农庄甜菜种植员玛丽·捷姆琴柯，在这一年春天提出口号，要让她所在的生产队每公顷出产甜菜500公担。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她带领队员在整个生产过程中9遍锄草，在夜间用火驱除蛾子，每次都有若干人前来参观。夏天，当全国都为天气干旱少雨而叹息时，她们请来消防队在她们的地上浇了2万桶水，最后终于保证每公顷地出产500公担多甜菜^②。于是，在全国农业中开展起“五百公担运动”，一年后，这个纪录已经增加到每公顷700~1000公担。在乌兹别克斯坦等地，人们提出了棉花和亚麻生产的新纪录，冶金业工人也提出了创造单位炼钢空前纪录的竞赛计划。例如，1936年12月初，《真理报》上登载了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种植者和加里宁省的亚麻种植者的社会主义竞赛合同：棉花种植者保证在1937年每公顷产棉16公担，亚麻种植者则保证每公顷产麻4~4.5公担。这年苏联冶金工业工人则在马里乌波尔冶金工厂的炼钢者马卡尔·马扎伊倡议下，为每昼夜炼钢6万吨而展开竞赛^③。而事实上，有些计划是达不到的。

① 这是当今俄罗斯一些历史学家的看法，参见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191~193页。

② Anna Louise Strong, *The Stalin Era*, New York: Mainstream Publishers, 1956. p. 51. 书中所用的计量单位是英亩，而在苏联是用公担来计量。因此，本书中也改用公担作为计量单位。当时，在粮食产地乌克兰，甜菜的平均产量是每公顷120~130公担，也即他们把亩产提高了3倍左右。

③ 基姆主编《社会主义时期苏联史（1917~1957年）》，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等译，三联书店，1960，第537~538页。

2. 形式主义的“一窝蜂”

在第一批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受到表彰奖励后，斯达汉诺夫运动就变成一场社会运动，到1935年12月中旬，全国“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①。诗人马克西姆·高尔基曾用“群众热情的急剧迸发”^②来形容斯达汉诺夫运动的迅速扩展。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把斯达汉诺夫的生产方式运用到其他行业，在有些地方引出了荒谬的做法：在医院，牙科医生保证拔牙的定额增加2倍；在剧院，芭蕾舞演员按“斯达汉诺夫方式”跳舞，将2个人的角色放上12个人……在一些工厂企业中，为了保证本厂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创造纪录，不顾及其他工人生产能力，其中的一个典型是莫斯科的奥尔忠尼启则机床制造厂，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古多夫创造了高产纪录，但他所在的车间却没有完成生产任务。另外，在有些工厂，不只是班组和车间，整个工厂都成了“斯达汉诺夫式的”，人们为提高数量而不顾产品质量，导致残次产品量的增加，正常生产节奏因创纪录而被打乱，许多企业出现了生产混乱。工人为了提高效率，让机器不停地运转，不注意劳动工具的保养，从而增加了事故率，从长远来看，反倒影响生产率的提高。结果，第二个五年计划也没有完成，在46个重要计划指标中，只有10项在综合水平上完成70%~77%^③。当然，这对于工业和工艺生产新部门的发展已经是不少的了。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时期到战后恢复时期，以青年突击运动、斯达汉诺夫运动为主要形式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提高了劳动效率，同时也给工人的生活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主要是一再大幅度地提高劳动定额。尽管是采用新方法，借助新技术和新机器，但对多数工人而言，要得到计件工资，打破新定额，就必须不断加大劳动强度。例如，1936年苏联推广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经验，将劳动定额提高了13%~47%（按不同生产部门）。之后，群众性创造新的劳动定额的结果，使得1937年一些部门劳动定额一再提高。这种情况对整个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但对于

① В. А. Шестаков. М. М. Горинов. Е. Е. Вяземский. История отчества XX век. Москва. 2002. с. 167.

② В. А. Шестаков. М. М. Горинов. Е. Е. Вяземский. История отчества XX век. Москва. 2002. с. 167.

③ 客观地说，这里还有制定的指标过高的因素。数字出自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овет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1917 - 1991. Москва. 2002. с. 212.

部分工人不利，要得到计件工资，他们就必须进行超强度劳动^①。过长的劳动时间和超出人的体能的强劳动，使工人体的体能下降比较快，从而影响到工人的健康。当时，在公开讲话中，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不承认自己延长工作时间，认为延长工作时间是工作效能不高的做法，但实际上，为打破劳动纪录，他们还是付出了很大精力和体力。

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负面效应，斯达汉诺夫运动还是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人民群众的创造劳动，为苏联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取得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广泛开展，改变了社会风气，工人们以学习技术，掌握新知识并运用到生产中为工作目标，不再酗酒闲逛，“成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是那个时代苏联人引以为自豪的事情。即使到了卫国战争时期，人们也以此为荣。在德军占领的小城克拉斯诺顿，人们最信任的还是“党员，斯达汉诺夫工作者”^②。

1985年，戈尔巴乔夫刚上台，适逢斯达汉诺夫运动50周年。在会见斯达汉诺夫运动的老战士和全苏社会主义竞赛的先进生产者时，他发表讲话，称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义是伟大和永恒的，它鲜明地表现出一个创造性的开端。他认为，斯达汉诺夫运动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是一种道德现象，展示了新社会的人的美好心灵。这个运动最初的开拓者已成为苏联真正的英雄，工人、集体农民、知识分子应向他们看齐，向他们学习如何生活，跟着他们前进^③。在发表这个长篇讲话时，苏联的改革刚刚开始，不能排除戈尔巴乔夫的这番讲话有为改革做动员的因素。但可以看出，在那个时候，人们还没有完全忘记斯达汉诺夫运动，党对于斯达汉诺夫运动的老战士和全苏社会主义竞赛的先进生产者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做出的巨大贡献还是肯定的，这应该让他们感到欣慰。

苏联解体前后，拜金主义盛行，人们一度对共产党、集体主义、劳动英雄等字眼有反感情绪。经过十几年的反思后，人们开始比较清醒地

① В. А. Шестаков. М. М. Горинов. Е. Е. Вяземский. История отчества XX век. Москва. 2002. с. 168.

② 参见〔苏〕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第2部，水夫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③ Речь и Заключительное слово М. С. Горбачёва на встрече в ЦК КПСС ветеранами стаханов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передовиками и новаторами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20 сентября 1985 года. Коммунист. №. 14. 1985.

看待历史，看待苏联时代人们创造的那些令世界瞩目的成就。进入新世纪之初，在俄罗斯的莫斯科等大城市，又兴起了星期六义务劳动活动^①。虽然今天的义务劳动与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时的义务劳动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很大区别，但这毕竟是社会主义苏联时代留下的传统，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光荣。

三 基层党组织是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组织者和参加者

党员和基层党组织在社会主义突击运动和斯达汉诺夫运动以及后来几乎贯穿苏联全部历史的劳动竞赛中发挥了带头作用和组织作用。

（一）基层党员是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参加者

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时期，随着工人队伍的壮大，大批工人加入党组织。据统计，在联共（布）16大（1930年）召开时，产业工人约占全体党员的一半^②。党员人数的急剧增加，凸显出党组织结构上的一些弊病，如城市党委会的权限不够大，基层支部由于党员队伍庞大而距离生产第一线过远，难以灵活有效地发挥领导和组织职能等。在此情况下，苏联共产党对基层党员的管理和组织形式进行了调整，在1930～1932年扩大了城市党组织的权限^③，1934年党的17大通过的新党章，决定将党支部改为基层党组织，下辖若干支部和党小组。这样，党的基层组织更接近于生产和群众生活，方便了党对群众性劳动竞赛的领导。

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刚出现时，还不是有组织的，多是以单个人的形式创造劳动纪录，他们不但没有得到相关行政部门的支持，还受到一些行政管理人员的阻拦^④。最初，劳动竞赛的参加者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不是共产党员。例如，当斯达汉诺夫开创第一个掘煤纪录时，就不是党员，而是一位共青团员。比他稍晚些的列宁格勒市制鞋工斯美塔宁，

① 李庆义：《俄重温“星期六义务劳动”》，《中国青年报》2001年4月26日。

② Б. Н. Пономарев, М. С. Волин, В. С. Зайцев и др.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2. с. 384.

③ 规定在5万人以上的城市设立党委会，增加工厂党组织中车间、工段党支部、党小组的数量。

④ 斯大林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一些企业中的某些行政人员在工人创造劳动纪录时的拦阻提出批评。情况可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379页。

在被授予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时，也不是党员，他们都是在成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后被发展入党的^①。但是，基层党员在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发起过程中，还是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斯达汉诺夫所在工段的党小组长米隆·久加诺夫，曾帮助斯达汉诺夫创造了纪录^②。1929年入党的党员彼得·费道罗维奇·克里沃诺斯，在成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后，还是顿涅茨铁路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组织者^③。当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全面展开时，党员参加斯达汉诺夫运动或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作为先进技术工人的典型被吸收入党就成了比较普遍的现象。党员在斯达汉诺夫运动以及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起到了以自己的模范行动鼓舞落后工人的典型和示范作用。在前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广大党员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都是带头人和劳动典范。

（二）基层党组织及时有效地推广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先进经验

当斯达汉诺夫运动成为群众性的运动之后，基层党组织在组织和领导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发现和树立社会主义劳动中的先进典型，帮助劳动者个人创造新的工作业绩，以各种形式加以宣传。

在斯达汉诺夫运动早期，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所创纪录，一般都是由班组、工段中的党员协助完成或党小组发现，报到上级工会或党委那里，才使他们的工作成绩得到宣传^④。开始时，对于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宣传主要以口头形式，后来就变为以壁报、板报、宣传画等方式进行了。全苏第一次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会议后，基层党组织在组织工人进行技术

① 日丹诺夫在1939年苏共18大的发言中曾介绍过他们的情况，可参见《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求实出版社，1982，第110~111页。

② 米隆·久加诺夫是矿工的儿子，曾参加过国内战争。他1924年从事掘煤手工作，1929年入党，参加过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会议，后担任“伏罗希洛夫煤炭”联合工厂经理，是苏共第18次党代表大会代表。卫国战争开始后，他到苏联军队中工作，1941年在前线牺牲。

③ 彼得·费道罗维奇·克里沃诺斯是顿涅茨铁路机车司机，他创造斯达汉诺夫工作纪录的情况如前所述，后担任铁路局长。情况可参见基姆主编《社会主义时期苏联史（1917~1957年）》，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等译，三联书店，1960，第534页。

④ 客观地说，在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创造劳动纪录之初，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并不是很积极的。斯大林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一些企业某些行政人员在工人创造劳动纪录时的拦阻提出批评。虽然他没有批评基层党组织的工作，但可看出，当时基层党组织在工作中并不是很主动的。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379页。

培训、推广先进技术和经验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如组织先进工人对后进工人辅导，或者由先进工人帮助不能完成定额的后进工人掌握操作技术，以保证他们能完成或超额完成生产定额。例如，有色棉联合厂有400名先进工人辅导了1124名后进工人，结果劳动生产率提高了8%~10%^①；组织举办斯达汉诺夫学校，这种学校可以是一个工厂内的，也可以是几个工厂联合举办，或几个城市联合，这是传授先进经验最普遍采用的方法。在厂内斯达汉诺夫学校，一般说来，经过学习的工人，马上就能多完成定额40%~50%^②。厂与厂之间和城市与城市之间联合的学校效果会更好些；组织企业中的各种生产会议，总结和推广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先进生产经验；还有全国性的生产经验交流会。1935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会议，有3000名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参加，交流经验，对宣传先进人物和先进经验、普遍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40年代末，由《劳动报》编辑部、苏联轻工业部、制鞋业职工会共同组织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星期二’”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一年内，全国各行各业共举办100多次这种活动，介绍先进经验的有99人，听讲的有工人、技工、技术工程工作者、科学工作者，共34000人。这是在战后社会主义竞赛和斯达汉诺夫运动中的一次创造性活动，对提高生产率、提前完成战后五年计划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过，基层党组织作为组织者的作用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特别是战后，更为突出一些。那时，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更多地以工段、车间、企业为单位进行，基层党组织与各级行政部门、工会、共青团共同领导和组织劳动竞赛。基层党组织做了很多宣传工作。当时在工厂车间中，一般都有一个专门的宣传栏，将五年计划的目标、前景，以及本部门的任务列出。例如，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在莫斯科索柯尔尼克区卡冈诺维奇车辆修理厂车厢车间，就有这样一个“红角”，那里用宣传画和图片橱窗以数字和事实描绘苏联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前景，使车间工作者了解自己所在车间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工作任务。墙上还挂着一幅标语：要广泛地开展社会主义竞赛，争取提前完成第五个五年计划！要在

① 刘实：《苏联的社会主义竞赛》，工人出版社，1956，第63页。

② [苏]玛斯洛娃：《社会主义竞赛是建设共产主义的有力杠杆》，庄正、罗林译，工人出版社，1954，第70页。

1953年内提高劳动生产率15%，到五年计划终了时，提高50%！^①在苏联的工厂企业中，这样的宣传几乎到处可见，有些可能流于形式，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是能够起到正面宣传从而激励人心的作用。

（三）基层党组织有计划地组织开展劳动竞赛

基层党组织领导工人结合本部门情况，制订劳动竞赛的计划。在制订计划的过程中，群策群力，将一些好的建议或意见收集起来，推广先进工作者的经验，使之成为全体工人的财富，发现不足予以解决。

基层党组织作为一个组织体系，将党的政策和号召贯彻到工人的生活中。例如，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莫斯科“海燕”工厂四号车间党组织在领导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针对本厂产品成本过高、质量降低的情况，及时组织工人研究降低成本的途径：一方面由车间会计员查沃德斯卡雅向工人们讲解成本的构成，启发工人在各生产环节想方设法节约成本，展开合理化建议收集月活动；另一方面，当有工人的改进办法得到证实后，由党组织为工人开办学校，将先进方法及时予以推广和宣传。在党组织的帮助下，车间全体工人逐渐掌握了具有高生产效率的操作方法，使本部门节约原材料、降低成本的工作收到良好效果。而在推广新技术遇到困难时，车间党组织以组织身份出面，在各部门间协调，以消除生产过程中的“瓶颈”，使劳动竞赛收到整体效果^②。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创造了先进的技术经验后，他们所在车间或工段的党支部帮助他们将先进技术或经验传授给其他工人，这一方面可以使先进工作者脱颖而出，另一方面也树立起集体观念。

（四）基层党组织在劳动竞赛中起监督生产的作用

基层党组织对基层行政工作予以监督，监督干部的选拔配备以及生产设备和材料的使用情况。

苏共党章中有规定，基层党组织有监督行政工作的权利，这是为了提高生产企业中党的基层组织的作用，并提高基层党组织对于工作的责任感。为此，基层党组织就需要了解工厂企业直至车间的生产情况，在生产进程、生产方式等方面，对群众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并团结非党群

^① В. Зимин. Цеховая партий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 1953. с. 4.

^② В. Зимин. Цеховая партий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 1953. сс. 13 - 17.

众，在群众中发挥作用。例如，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莫斯科“红勇士”工厂十号车间党组织，主动征求车间工程师、技术员和生产革新者的意见，深入工人中了解他们的情绪，倾听他们的批评或建议，在车间定期举行生产技术积极分子会议、工人大会和生产会议，监督干部的选拔和生产情况，使党对行政工作的监督成为经常性的群众监督。同时，党组织还注意，不能由党的书记或其他人员代行生产指挥人员的职责，将党组织的工作权限限于监督层次。他们的经验得到上级党委的肯定，并大范围加以推广^①。

基层党组织在动员党员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对劳动竞赛进行组织和计划、督促完成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这里不可能仅仅用几条几点来弄清楚。所以，这里所举只是基层党组织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所起作用的突出方面。可以说，基层党组织一直在参与苏联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起主导作用。关于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的作用，在苏联时代有许多经验和宣传内容。总体来看，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过程中，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基层党组织作用的发挥还与工厂行政部门和工会及共青团的协作相关，应该说，他们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四 苏联前期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制定了实行土地国有化、将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还在农村采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组织形式。20世纪30年代，苏联政府在农村强制推行集体化，对农民加强了控制，农民在国家工业化中做出巨大牺牲。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再到农业集体化、全盘集体化的过程中，苏联的农业政策先后出现了“收紧”“放开”“再收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工作重点与所起的作用也有所不同。不过，由于苏联前期农业中党的力量比较薄弱，基层党组织的数量也很少，基层党组织的主要工作任务是落实党的粮食征购任务以及监督农民等，其作用与影响力总体上还是比较有限的。

^① В. Зимин. Цеховая партий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 1953. сс. 18 - 20.

（一）苏维埃政权早期：农村基层党组织十分薄弱

十月革命前，俄国农村中布尔什维克党的力量十分薄弱，党在农村的影响很小。十月革命后不久，布尔什维克党就派出党员队伍到农村，发展农村中的党组织。不过，农村中党组织建设始终比较薄弱。1917年初，俄国人口为1.63亿人，农村人口大约有1.34亿人，农民占全部人口的82%，而农村中的党员总共不到1800人。到了这年4月，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人数已达6万名，农村党员的数量依然很少。“直到夺取政权之前，布尔什维克未能在农村建立起一个基层党组织。俄国农村是……社会革命党人的天下。”^① 换言之，在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党对俄罗斯农村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十月武装起义刚刚胜利，布尔什维克党就颁布了《土地法令》，平均分配农村的土地，农民分得了自己的土地，苏维埃政权只要求农民提供一定数量的农产品。这些政策使布尔什维克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农民的支持，俄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不过，对于苏维埃俄国早期的农业而言，社会革命在一段时期内并没有带来农业生产的变革。苏联早期的农业生产基本上还延续着俄罗斯帝国时期的传统，这就是在广大的疆域范围内存在落后的小农经济状况，农业生产效率低下。正如一位俄罗斯学者所说，十月革命建立了新国家，把土地分给了农民，但国家并没有触动沙皇俄国的农业基础，原有的农业生产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对于早期的苏维埃国家来说，农业产量的调剂因素主要还是靠市场，因此有当代俄罗斯研究者认为：“革命并没有消灭农业生产的商业特点，交易粮食还在进行。”^② 换言之，十月革命只是完成了土地革命，使农民拥有了土地，但是却没有实现对农业生产的彻底改造。当时，布尔什维克党派出党员队伍到农村，发展农村中的党组织。但是，这项工作进展缓慢，农村中党员数量十分有限，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受到限制。正因为如此，每当苏维埃政权需要开展农村工作，尤其是粮食征购工作时，就不得不从城市中抽调党员干部作为“工作队”到农村。

① [苏]阿·阿夫托尔哈诺夫：《苏共野史》（上卷），晨曦、李荫寰、关益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第214页。

② В. Д. Пухорович. О причинах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х голода 1932 – 33 гг. на Украине. <http://www.rkrp-rpk.ru/index.php?action=articles&func=one&id=141>. 24 ноября 2006.

国内战争时期，国家需要农民提供大量农产品，但因战争期间工业部门又不能向农民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工业品，于是农民拒绝供给国家粮食。在此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把农民手中的粮食全部征集起来，实行配给制。但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实行一段时间后，开始引发农民的普遍不满，一些农业地区的形势开始紧张起来，尤其是在主要产粮区，如顿河地区、西伯利亚地区。国家派出征粮队（全称为粮食征集队），到农村征集粮食。在1920年以前，有2万~4.5万个粮食征集队分布在农村。到1920年，农民提供了总量约等于1914~1917年平均年供应量一半的粮食。征粮队实行的强制征粮办法最初达到了一定效果，为集中全国的财力物力战胜反革命叛乱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不过，这种向农民“进攻”的做法的结果却是灾难性的：由于农民在枪口下交售他们的产品，又不能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工业品，作为反抗方式，他们停止生产粮食。因此，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了两年多以后，苏维埃俄国的农村地区形势急剧恶化。正如有学者介绍的那样：“1920年末至1921年初，农民武装暴动席卷西西伯利亚、坦波夫省和沃罗涅日省、伏尔加河中游地区、顿河地区、库班、乌克兰和中亚。到1921年春，农民暴动已遍及全国。城市中的形势亦是一触即发。粮食不足，许多工厂由于能源和原材料短缺纷纷关闭，工人流落街头。”^① 列宁也对当时严重的国内外形势有过分析：“苏维埃共和国被敌人包围着。她要战胜外部和内部的敌人。”“在当前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部的敌人是英、法和日美帝国主义。”“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这个内部敌人是什么人。这些资本家、地主、富农，他们的儿子，敌视工人和劳动农民的苏维埃政权，还有个别榨取自己同村人血汗的农民。”“富农起义的波浪席卷俄罗斯。富农疯狂地敌视苏维埃政权，准备扼杀它，阻止成千上万的工人。”“毋庸置疑，富农是苏维埃政权疯狂的敌人，或者是富农比很多工人活得更长久，或者工人打垮富农造反，这是少数剥夺者反对劳动者的苏维埃政权。”^② 不过，苏维埃政权最终战胜

① [俄] 纳乌莫夫、科萨科夫斯基编《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任建华等译，人民出版社，2009，第1页。

② РГАСПИ. Ф. 347. Оп. 1. Д. 179. Л. 19 - 20.

了敌人，得以巩固下来。

国内战争期间，红军队伍中大多数是农民，这些农民对国内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但正如列宁所承认的，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转而反对共产党的统治。1920年底国内战争结束后，部分回乡的士兵增强了农村中的反叛力量，他们主要针对征粮队，提出了口号：“打倒共产党员！”1921年2月，发生了“喀琅施塔得叛乱”，这次叛乱主要起因是水兵们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农村政策不满，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的水兵提出，要“保证农民处理他们的土地的充分权利，保证个体小规模生产者的权利，只要他们不雇用劳动者”^①。当时，列宁对这次叛乱的看法是，在喀琅施塔得，“那里不要白卫分子，也不要我们的政权”^②。这次叛乱被平息了，却给布尔什维克党提供了教训：要改变农村政策，改变“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农民的反抗加之战争破坏，导致1921~1922年的饥荒：1921~1922年，苏维埃国家农业生产下降到1913年总产量的一半左右，土地耕种面积下降到1913年的3/4，在苏维埃俄国出现了大规模的饥荒。正是在此情况下，苏维埃政权对政策及时做出调整，决定以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1921年布尔什维克党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这个政策对活跃农村经济起到了明显作用，农民获得了较大自由，发展起个体经济，他们在土地上精耕细作，粮食产量开始回升。

1925年，苏联政府还准许农民采用雇佣劳动方式以及租赁土地，鼓励农民富裕起来。当时，在农村还实行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组织形式，不过，这种组织形式只占农村的一小部分。到1927年前后，在苏联农村，个体耕作成为主要生产方式。当时，无产者占农村人口的8.2%，贫农占21.1%，中农占66.8%，富农占3.9%。1927年，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生产的粮食不到粮食总产量的2%，其耕地面积也不到全部耕地面积的1%，其余的主要是个体生产成果。根据统计资料，1927年苏联粮食总产量的85%以上是中农和贫农生产的，富农所生产的粮食只占全

① [英] 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徐葵、邹用九、裘因译，东方出版社，1991，第231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58页。

部的13%^①。莫洛托夫在1927年党的十五大上的报告中说，当时运到农村的商品一半以上是由共产党员控制的合作社来分配的，大约2/3的农产品是通过合作社在市场上销售的。不过，在许多地方富农仍然是农村生活的中心，尽管苏联政府采取了排挤富农的政策，但是无论怎样努力都难以将他们排挤掉。并且，他们在农业生产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多。

苏维埃政权前期党员的构成特点是，在职业上，1919年10月，党员中52%是工人^②，15%是农民^③，18%是白领工人，14%是知识分子^④。1920年的征收党员周使得农民党员人数有所增加。到1920年9月，在农村支部中共有18万名正式党员和候补党员，比1919年10月增加了大约4倍。到1923年，在布尔什维克党员中，工人占45%，农民占26%，其他成分占29%^⑤。农民党员数量有了很大提升。不过，这些农民党员在广大农村中还是显得微不足道。俄共中央委员会组织部的一份从俄共（布）11大之后到1922年5月的总结汇报记录：“尽管巩固农村党支部的工作已经开始，我们的农村党组织还是很虚弱的。在一些农村党支部中，多数小的支部分布在个别村庄中，只有孤单单的一个党员。相比于城市而言，这些支部的工作处于很低的水平，它们的作用只是在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农村支部党员的认识水平还很低。据此，我们有必要在近期加强农村支部的工作，扩大农村支部，从内部改善农村支部的工作。”^⑥同时，这份报告也指出了农村党支部的主要工作及其困难：“农村党支部内的工作是极其困难的。支部的党员有行政任务——技术工作、完成交税等。支部成员要协调、解决问题，要讨论，通常讨论的问题没有准备，有纯粹的党的问题，也会涉及其他问题，或者读‘党员入门’（Азбука коммуниста）。在非党的农民中间党的工作很弱。在村民大会中

① [英] 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徐葵、邹用九、裘因译，东方出版社，1991，第366～367页。

② 指原来曾受雇的工人。

③ 这个比例比1917年1月时（占7.6%）增加了1倍，实际上农村党员数量还要多，因为这时党员总人数已大为增加。

④ Известия ЦК ВКП (6), №. 15. 24 марта 1920.

⑤ Известия ЦК ВКП (6), №. 49. январь 1923. 当时在统计中，把白领工人和只受过初等教育的人都归到工人中，于是，工人成分就占党员的2/3了。

⑥ РГАСПИ. Ф. 572. Оп. 1. Д. 3. л. 22.

党员无法展开组织工作。没有接近最优秀的农民的个人渠道。”^①不难看出，在当时，无论是农村基层党支部还是那些分布在农民“汪洋大海”中的个别党员，要在农民中展开工作，可谓困难重重。尽管如此，党还是明确，要从提高农村党员比例入手，努力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必须确定近期的主要任务是改善支部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提高农村党员的比例。必须在农村开展党员日（每周不少于两次）。党委会应当确定讨论的问题，结合社会政治与地方实践问题，关注解决问题的思想—政治途径。”^②

从1924年1月1日到1928年1月1日4年间，苏共党员人数几乎增加了2倍：从47.2万人增加到130.4万人^③。其间最大的一次征收党员活动是1924年为纪念列宁而开展的，大约有20万名新党员入党，其中主要是工人。由于1921~1922年的清党和大批新党员入党，苏共党员在年龄上呈现年轻化，但缺乏经验且文化水平低。1927年的党内调查表明，1/4的党员年龄在25岁以下，30岁以下的党员占一半，40岁以下的党员占85%强。在基层党支部书记中，1921年以后入党的占60%多^④。1927年的调查还表明，党员文化水平仍比较低，受过完整高等教育的党员不到1%；受过中等教育的不到8%；全党有1/4的党员是自学者，文盲占2%以上，而在技术和经济领域，非党人员所占比例却比较大^⑤。从1927年起，农村党支部中工人党员大大增加，农民党员则相应减少。在1927年的农村党支部书记中，工人出身的占80.5%，到1928年，这个比例还要高^⑥。

1928年，苏联农村党组织依然比较薄弱。这年初，农村党员不到20万人，农村人口为1.2亿人，即党员占农民总数的不到1.7‰。在这不到

① РГАСПИ. Ф. 572. Оп. 1. Д. 3. л. 23.

② РГАСПИ. Ф. 572. Оп. 1. Д. 3. л. 23.

③ [英] 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徐葵、邹用九、裘因译，东方出版社，1991，第339页。其中包括1/4或1/3的预备党员，他们到期不一定能够转正。

④ [英] 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徐葵、邹用九、裘因译，东方出版社，1991，第341页。

⑤ Большевик, №. 15. с. 27. август 1928.

⑥ Пятыйн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 11 - 12 (13 - 14) . сс. 31 - 35. июнь 1930.

20 万人党员中，农业劳动者只有 1.5 万人，即农村党员中真正从事农业劳动的仅占 0.8%^①。1928 年 1 月 1 日对农村党支部情况的分析表明，党员中产业工人占 19.8%，42.8% 为个体农民，44.5% 为雇员及其他人员，集体农民为 2.9%（原文如此，身份有重合）。1927 年，萨拉托夫州委对 27 个农村党支部的调查表明，党在农村的影响非常薄弱，党员人数很少，并且发展党员存在很大困难。党支部内几乎没有直接从事耕作的农民，少数农民出身的党员一般都在农庄内担任各种各样的职务。在多数情况下，农村支部中大多数党员甚至不是当地居民，党支部在本村事务中不起什么作用，其工作仅限于动员选民选举村苏维埃，在苏维埃选出之后，党支部在村子里就不起什么大的作用了^②。有历史学家指出：“在上世纪 20 年代中期，农村共青团员的人数是农村党员的 4 倍。”“在许多村庄，特别是……偏远村庄，布尔什维克尚未设立党支部，宣传鼓动工作必须依靠共青团。”^③而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富农在农村经济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他们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苏联的农村经济，也影响到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他们意识到自己力量的强大，不想按照很低的收购价格卖给国家粮食，而落后的小农经济决定了政府只能通过按农户征收的办法来获得粮食。1927 年苏联粮食获得了丰收，但是，在农业中却出现了收购困难。到 1928 年，政府通过市场成功收集 12800 万普特粮食，比 1927 年以前还要少，1928 年和 1929 年苏联农村被迫往城市运送土豆作为粮食。如果放在今天来看，这种情况可以通过经济杠杆运用经济手段来改变，属于经济问题，但是在当时，却被当成严重的政治问题，苏维埃政权就此开始了同“富农”的斗争。

（二）20 世纪 30 ~ 40 年代农村基层党组织有所发展

苏联农业集体化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力量并不强，在集体农庄中，基层党组织的主要工作是监督那些被流放的所谓“富农”，基层党

① [英] 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徐葵、邹用九、裘因译，东方出版社，1991，第 343 页。

② [英] 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徐葵、邹用九、裘因译，东方出版社，1991，第 343 页。

③ [英] 奥兰多·费吉斯：《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第 90 页。

员多半在集体农庄中担任领导或者农机站的技术人员，基层党组织与农民的关系在这个时期不是很融洽，有时甚至处于对立状态。卫国战争爆发后，在爱国主义精神驱动下，农村中很多劳动力去了前线，老人和妇女在后方承担起农业生产任务。基层党组织领导农民多生产粮食，支援前线，出现了一些农业生产中的先进人物。应该承认，战争使原来农村中党的干部与农民，尤其是富农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另外，战争结束后，有一批军人（党员）转业到了集体农庄或者拖拉机站工作，加强了农村中党的力量。不过，直到斯大林逝世的1952年，苏联农业状况也没有大的好转，集体农庄中的基层党组织依然比较薄弱。

1. 五年计划和农业集体化期间的农村党组织

20世纪20年代中期，苏联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此时，落后的农业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阻碍，粮食收购困难使得这种阻碍作用尤其明显地表现出来。政府为获得更多的粮食，摆脱农业生产落后局面，开始实行集体化政策。最初农民可以自己决定是否加入合作社，也可以退出。之后，采取了强制集体化的措施，并在1929年实行全盘集体化运动。由于国家对富农并没有定出一个明确的标准，也没有明确建立集体农庄必须坚持自愿原则，于是在剥夺富农以及建立集体农庄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过火行为。强制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做法引起了富农、中农甚至一些贫农的反对，一些富农藏起谷物，宰杀牲畜，破坏农机具，甚至对集体农庄中的党员进行报复，以此表达对强制集体化的强烈不满。有些富农则采取了暗中抵制的方式，通过收买或其他办法，控制苏维埃，影响当地的共产党员，以阻止集体化的实行^①。也是在1929年底，苏联政府改变了对富农的政策：剥夺富农财产，“消灭富农”，对富农进行强制搬迁，加快集体化步伐。

从1929年下半年起，集体化已经开始，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在1929年10月占农户总数的4.1%，1930年1月20日增加到21%，1930年3月10日达到58%。在5个月时间里，一半以上的农户都加入了集体

^① Пихорович. О причинах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х голода 1932 - 33 гг. на Украине. <http://www.rkrp-rpk.ru/index.php?action=articles&func=one&id=141>. 24 ноября 2006.

农庄^①。

在集体化步伐加快的同时，农民的反抗也越来越激烈。他们从“无度地挥霍”自己的财产，大量宰杀牲畜，到藏匿粮食，“消极怠工”，既不与政权直接对抗，也不支持政权，甚至在暗地里支持或参加那些诸如杀害村庄中的党员、烧毁农庄中的财产等行为。更有甚者，有的富农走上公开反抗之路，聚众骚乱和暴动，直接与政权对峙^②。而苏维埃政权一边加速推进集体化，一边打击富农，赶走富农，迫使他们和其他农民交出自己的全部财产。在这个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一项“重中之重”的任务，就是为推广集体化做工作，具体就是劝说那些不愿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放弃自己的想法，或者对那些顽固的、拒绝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施行惩罚。当时，一些地方的党组织承认“在集体化过程中还存在很多困难”，除了把农民都“拉进”集体农庄这项艰巨任务外，“党组织与集体农庄组织还需要做的一项工作是，把富农清除出集体农庄”^③。除了利用基层党员、集体农庄中的党员干部推动集体化之外，当时苏维埃政权还从中央到地方，把各级党的机关和政权机构都动员起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也行动起来，城市工人利用周末来到了农村，就连法官、检察官也走上了第一线，组成了“两万五千人”^④的工作队，“充实”到农村中，与集体农庄干部一起开展强制集体化和强制征粮的工作。例如，在1929年6月底联共（布）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中，就有这样的内容：“当前集体农庄的干部队伍的力量还很弱，不能保证完成中央委员会新决议交给他们的任务，应该用党的新鲜力量加强集体农庄中的党组织。”“必须特别注意在区合作组织中选拔最有能力的工作人员。”“必须加强从雇农、集体农庄和贫农一中农积极分子中间选拔

① [英] 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徐葵、邹用九、裘因译，东方出版社，1991，第412页。

② 当时各地农民抵制集体化的情况，参见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я в СССР 1929 - 1934гг. <http://www.hrono.info/sobyty/1930sssr.html>。

③ РГАСПИ. Ф. 5. Оп. 1. Д. 25. Л. 48.

④ 这个数字最早是在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出现的，当时苏维埃政权从城市向农村派出了约2.5万名党员、工人中的优秀分子，专门从事征粮工作。后来，“两万五千人”（Двадцатипятитысячники）成了那些“征粮队”工作人员的代称。20世纪30年代初政府派出的“征粮队”人数实际上已经超过这个数字。

新干部的工作。”^① 1930年上半年，一些城市中的共产党员被派往农村“维稳”和“征粮”，从1930年4月2日莫斯科州委员会“关于派出100名党员赴农村工作的名单”看，这些人都是经过挑选的，对他们的年龄、党龄、从事社会工作的经验以及职业都有考察。他们的年龄为25~50岁，处于中年阶段的也即40岁左右的人居多。党龄有的在25年左右，也有刚刚入党不久的，但多半都是在几年到十几年间的。他们原来的身份，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大学生，多半是职员、机关党务工作者等^②。其具体身份有的是马达工、皮革工、印刷工人，有的是教育家、法律工作者，还有时装师、瓦工、车工等^③。1930年6月23日由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签署的一份前往波兰区“维稳”及“征粮”的200人名单中，那些党员原来从事的职业也以工人和职员为主^④。这说明当时农村党的组织人力十分有限，人手不足，需要从城市里抽调党员前来工作。在档案中，没有记载他们到农村将从事什么工作，但都是服从组织的挑选与安排，前往农业地区。实际上，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动员农民加入集体农庄。那些原有的或者外派来的党员干部试图做农民的思想工作，但在遭到农民的拒绝和抵制后，就开始采用“斗争”手段。“与富农斗争”逐渐成为苏联农业生产战线与基层党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些做法导致“几乎每个村庄都变成了规模空前的阶级斗争的战场”。

苏共中央意识到在农村出现的过火行为给农民带来的伤害，斯大林在报上发表了《胜利冲昏头脑》，对在农村集体化中的过火行为提出了批评，集体化的速度因此有所减慢。1930年9月，集体农庄占农村经济的比例由当年3月的58%降到21%。不过，这种状况只是暂时的，到1931年，集体农庄的比例再次上升到52.7%。1932年，全盘集体化的浪潮重又掀起，而到1934年，3/4的农庄都实行了集体化^⑤。对于不愿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则采取强制迁徙、流放等办法加以惩罚。1936年，

① РГАСПИ. Ф. 5. Оп. 1. Д. 25. Л. 52.

② РГАСПИ. Ф. 5. Оп. 1. Д. 32. Л. 2-4.

③ РГАСПИ. Ф. 5. Оп. 1. Д. 32. Л. 17.

④ РГАСПИ. Ф. 5. Оп. 1. Д. 32. Л. 8.

⑤ [英] 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徐葵、邹用九、裘因译，东方出版社，1991，第413页。

有 90.5% 的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在苏维埃政权与“富农”的斗争中，农民的粮食全部被收走，饥荒时期用来充当食品的牲畜也被没收或者被农民自己给宰杀了，连用来耕种土地的牲畜也几乎杀光了，农业经济几乎陷于绝境。1932~1933 年，在苏联农业地区发生了大范围的饥荒，导致几百万农民被饿死。从当代学界的研究成果看，这次大规模饥荒的发生有多种原因，包括出现旱灾、虫灾之类的天灾，也有强制集体化引起农民反抗、政府过高的粮食收购定额、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加重了国家的粮食供应负担、饥荒发生后政府为封锁消息而阻止饥民外出等因素。其中，政府与“富农”的斗争所造成的“人祸”是一个重要原因^①。

1929~1930 年还进行了一次清党，这次清党使党员减少了 13 万多人，占接受审查党员的 11.7%。那些党员被开除的理由主要是“表现消极”、“不守纪律”（占被开除总人数的 1/5 左右）、酗酒、“官僚主义工作作风”，还有“异己分子”。在被开除的党员中，占大多数的是农民，其次是知识分子，而老布尔什维克被开除的较少^②。1930~1934 年，农村党员从 40 万人增加到 80 万人。不过，1933~1934 年的清洗使得农村党员再次受到很大冲击，1933~1935 年，集体农庄的基层党组织数量减少了一半，边疆区的农村党组织减少了 1/3。结果是许多集体农庄和农村地区根本没有党的组织，或者最多只有 1 名党员。到 1939 年党的第 18 次代表大会时，24.3 万个集体农庄中只有 1.2 万个基层党组织，党员总数（包括预备党员）为 15.3 万人^③。在这些农村党员中，大多数人并不直接从事农业劳动，而只担任行政职务。由于农村党员的缺乏，1930~1934 年，约有 5 万名工人党员被派往农村，以加强党的农村基层工作，他们主要在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以及机器拖拉机站政治部^④工作。

① 有关苏联 20 世纪 30 年代初饥荒的原因，参见李燕《斯大林有没有制造饥荒——对斯大林在苏联 1932~1933 年饥荒中责任的探讨》，《俄罗斯研究》2008 年第 6 期；李燕《“苏联 1932~1933 年饥荒”问题研究综述》，《西伯利亚研究》2008 年第 6 期。

② 《苏共决议汇编》第 4 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第 43~53 页；Патийн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 10 (12). сс. 14 - 19. май 1930.

③ Патийн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 20. с. 59. октябрь 1939.

④ 1933 年 1 月，中央委员会设立机器拖拉机站政治部，管理地方农业生产工作。它直接受中央委员会管理。1934 年 11 月，机器拖拉机站政治部被撤销，由州的党组织管理地方农业工作。

总体来看，1930年以后，苏联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主要活动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30~1933年，为实行农业集体化而与富农“作战”，监督富农。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对被流放的富农和一般农民的监督，后来有很多人提及。例如，池田大作在与戈尔巴乔夫的对话中就讲道：“在30年代那个悲剧性的、强硬推行农业集体化的时代里，有位少年曾向当局告密，指其祖父是反革命富农分子。因此，他的双亲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那位少年却因告密行为被表彰为少年先锋队的模范……长时间受到表扬。”^① 他所说的这位“英雄少年”，就是曾经在苏联家喻户晓的帕夫里克^②。美国学者奥尔森也认为，在农业集体化时代，苏共基层党组织的主要任务就是监督集体农庄的农民，把一切粮食等收获物交给国家^③。第二个时期是1934年以后，农业集体化已经完成，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也像在城市工厂企业里那样，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集体农庄庄员、生产队长、拖拉机手等都在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争当斯达汉诺夫工作者。

1937年开始的大清洗也波及农村中的党员。虽然当时对农村党员的清洗不是主要目标，但也有党员被清洗的情况发生。戈尔巴乔夫对20世纪30年代的农村生活有过回忆：“我的外祖父参加了革命，成了共产党员和集体农庄的组织者，对当局及其政策从未表示过怀疑，而且还认为是苏维埃政权给了他这样的农民土地，并救了他全家，可他遭到了逮捕，并被判了死刑。……他是偶然地活下来的，一名上级检察官的助理……从我的外祖父的‘案件’中看不到有枪决的根据，而且根本就谈不上什么罪行。他们释放了外祖父。”^④ 相比于苏共高层领导和军队而言，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党员在30年代的大清洗中所受到的冲击并不是很大，

① [俄] 戈尔巴乔夫、[日] 池田大作：《20世纪的精神教训》，孙立川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386页。

② 帕夫里克·莫罗佐夫（1918~1932年），一个由于同富农斗争而被杀害的苏联少先队员。不过，苏联解体前后有关这位“小英雄”也有另外的说法。参见蓝英年《向帕夫里克看齐！》，《随笔》2005年第5期。

③ [美] 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苏长和、嵇飞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98页。

④ [俄]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第25页。

并且被处决的也不多，但因为农村党员原本就少，因此农村中的基层党组织力量还是很薄弱的。

对于苏联 20 世纪 30 年代的农业集体化运动，近年来政界和史学界的评价一直很低。实际上，早在 1959 年，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卡德尔在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四届九中全会上的开幕词中就曾说道：“苏联从 1930 年后所运用的集体化方法，只能付出重大的经济和政治动荡不安的代价……不必要不计代价坚持这种集体化，因为这种集体化并不是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唯一可行的办法。”^① 在 30 年代初苏联饥荒的发生原因中，政府在粮食歉收情况下执行过高的粮食收购定额这一政策是直接导因，不过从稍远一点来看，饥荒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农业集体化政策在制定和实行过程中出现了重大偏差。苏维埃政权早期，列宁也曾经号召对富农展开“无情斗争”：“富农——这是最凶残的、最恶劣的最野蛮的剥削者，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也不止一次地有地主、沙皇、教士、资本家跟政权造反。富农比地主和资本家更多。但终归富农在人民当中还是少数。”^② 不过，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难以继续实行的情况下，苏维埃政权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并且对农村的集体化始终采取自愿为主，以集体劳动的优势吸引农民加入。在列宁的表述中，并没有强制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甚至“全盘”加入的内容，也没有提到对富农采取极端惩罚的措施。但后来，正是那些“过火”的偏差行为在当时给富农乃至普通农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富农经济被彻底消灭，富农作为一个社会阶级被消灭了，而苏联农业生产的落后性、缺乏技术含量、生产效率极为低下等状况却长期存在下来。缺乏活力的集体农庄经济建立在 30 年代初那场农民灾难的基础之上，就如同一个先天营养不足的婴儿，始终处于病态成长的过程中。可以说，强制集体化与随后的大饥荒使当时的苏联农业元气大伤。而集体化作为一种长期的管理和经营机制，本身在后来的苏联历史发展中也因为对农村、农民管得过严、统得过死，国家把农民挖得太苦，造成苏联农业长期发展缓慢。尽管后来的苏共领导人有了一定认识，并且也进行过调整，但整体局面始终没有根本改变。

^① 陆南泉、张文武编《国外对苏联问题的评论简介》，求实出版社，1981，第 176 页。

^② РГАСПИ. Ф. 347. Оп. 1. Д. 179. Л. 19 - 20.

20世纪80年代改革时期，尤其是反思苏联解体教训时，很多人指责集体化给苏联农业经济带来的恶果。例如，戈尔巴乔夫就认为，在集体化过程中，那些比别人生产搞得更好的人，最能干、最爱劳动的人被消灭了。那时候农村遭受了非常可怕的打击，其影响直到80年代中后期也还没有消失^①。不过，集体化改变了苏联农村个体生产的分散局面，集体农庄成为苏联农业的支柱，个体农民已经极少。这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政府的统一管理。从农业基层党组织建设来看，尽管在集体化过程中，在农村出现了农民尤其是富农与基层党员的矛盾乃至对抗，但正是集体化使得基层党员有了更多的机会从事集体劳动，这种情况为后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扩展奠定了一定基础。从形式来看，集体化改造了苏联农村，完全彻底地改变了俄罗斯农村上千年来的小农与村社的经济社会模式。无论对俄国历史而言，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乃至世界农业发展史来说，在当时这都堪称一场前所未有的探索，是一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只是，当农民被完全统一地管理起来后，他们的自主性和生产活力也逐步丧失了。

2. 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卫国战争时期及战后恢复时期有所发展

卫国战争爆发初期，苏联农业处境困难。1942年同1941年相比，粮食和棉花的总收获量减少近一半，牲畜总头数也有所减少，有劳动能力的集体农庄庄员数量急剧下降，机耕人员颇感不足。由于农村人口剧减，农业干部也很缺乏。在战争的第一年，后方地区农场有劳动能力的男子减少了近300万人，1942年又减少230万人^②。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妇女从事机械操作，妇女、少年和老人成了生产的主要力量，越来越多的妇女担任农村领导工作。

为调动后方农村中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各地方党组织加强了宣传鼓动工作。例如，阿尔泰边疆区党组织在1942年春播期间组织了1000多个鼓动队。其中包括12300名直接在各个田间工作队、畜牧工作队和拖

^① [俄]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第36页。

^② Ю. Арутюнян. Совет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в годы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Москва. 1970. с. 74.

拉机工作队里工作的鼓动员，仅在春播期间他们就出了7万多份宣传墙报和快报，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这年春天，阿尔泰边疆区超计划播种135000公顷土地。诺沃辛比尔斯克省的党组织在1942年春播期间，派了2500多名鼓动员下乡工作。

1943年是苏联农村最困难的一年，战争所造成的损失严重影响了农业。农村人口锐减，有劳动能力的集体农民只有1940年的47%，每个集体农庄庄员的劳动负担几乎增加了1倍。为保证春播和秋收，农业工人发扬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加班加点地工作。在秋收时节，妇女拖拉机工作队开展了广泛的社会主义竞赛，参加竞赛的女拖拉机手达15万人以上。仅据28个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的统计，这一年参加夺丰收大会战的团员、青年小组就有2.6万个以上，男女老少一起出动，进行收割，谁都不计时间，不怕劳累，大片庄稼都是用手工收割的。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集体农民竭尽所能为前线 and 后方提供粮食。

在集体化农村的劳动者开展了夺高产、改进机器拖拉机站工作和最大限度地发挥农业机械作用的竞赛，女拖拉机手工作队的竞赛已成为群众性的运动。西哈萨克斯坦州一个集体农庄的乌克兰女拖拉机手安格利娜工作队和梁赞州雷布诺夫斯克机器拖拉机站加尔马什拖拉机工作队是这个活动的带头人。成千上万名集体农庄庄员和国营农场工人在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蔬菜种植等方面取得了高产，为前线军人提供了食品，也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原料。

由于农业技术人员缺乏，党和共青团组织着手培训农业机械操作人员，基层党员积极参加到农业生产中去。在战争期间，几乎所有苏联城市的党组织都派遣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下乡到农村进行群众政治工作，并帮助集体农民从事农业劳动。战争期间在农村开展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为战胜法西斯做出了重要贡献。

战争结束后，苏联经济呈现严重下行状态，出现了通货膨胀，粮食、原料、战略物资的生产都有减少。同时，经历了一场战争浩劫后，人们都希望过上安定的生活，希望生活条件变得更好些，而集体农庄制度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整个苏联，1946年有75.8%的集体农庄支付给庄员的报酬每天少于1公斤谷物，甚至7.7%的集体农庄无谷物支付给庄员。在俄罗斯联邦，不能给庄员提供粮食的占13.2%，一些州（如奥

尔廖夫、库尔斯克、坦波夫斯克)不能按庄员劳动付给谷物的占50%~70%^①。集体农庄庄员普遍对劳动失去兴趣,破坏劳动纪律、不出工现象到处都是。有的地方农庄庄员因食物不足,面临全家挨饿的状况。例如,1947年7月19日俄联邦普斯科夫州法院曾下达一个判决,被审判的对象就是这个州普斯科夫区扎波里耶村的农庄庄员伊万诺夫,他是卫国战争的二级残废军人,有三个孩子,因“家里没有面包和土豆,已揭不开锅”,就到“什克维尔托夫劳动者”集体农庄的地里偷土豆,在被集体农庄护田人发现后,用刀将对方扎伤,最后他被判刑。伊万诺夫在上诉状中陈述说,他确是因家中一无所有,不得已进行盗窃,是为了保住孩子们的性命,才走上犯罪道路。在这前后,在罗斯托夫州马丁诺夫区,一位村民为了一袋小麦而将另一位村民用榔头打死。还有一位73岁的农民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写信,请求后者“下令将我借贷给国家的现款还给我,以挽救我和家人不致饿死”^②。农民对集体农庄制度不满,认为农庄主席的主要任务就是驱赶他们劳动,在有些地方开始流传解散集体农庄的传闻。当然,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西部地区,在曾经是战场的那些地方。在西伯利亚、中亚等粮食产区,情况会好一些。到1948年前后,苏联农村的总体情况有了一些好转。

值得注意的是,战后有一部分党员复员回到农村,从而增加了农民党员的数量。当然,这时从事实际生产的工人入党的也越来越多。有数字显示,1949年从事实际生产的党员比1940年多4倍^③,在以后还有发展。例如,1952年上半年在白俄罗斯新征收的党员中,有一半以上是工人或集体农民。在莫斯科,1949~1951年征收的党员中有34%是工人^④。当然,这些工人或农民党员一般都在其所在工厂或农村中担任领导职务。

总体来看,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职能变化影响到农村党员队伍的扩大

① Клестьянство и колхозы: Антиколхозные настроения в деревне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 3. 1998. сс. 29 – 30.

② 沈志华、于沛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2~9页。

③ [英]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徐葵、邹用九、裘因译,东方出版社,1991,第551页。

④ [英]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徐葵、邹用九、裘因译,东方出版社,1991,第551~552页。

和基层党组织作用的发挥。国内战争时期，在苏联农村，农民与布尔什维克党的关系比较紧张，党派出以共产党员为主的征粮队，到农村征缴粮食，几乎把农民手中的口粮征收殆尽，结果引发农民的反抗。新经济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积极投入生产，到1928~1929年，苏联农业呈现出繁荣景象，但由于采取个体生产形式，当时苏共更注重发展工人入党，所以，党在农村中的影响还是很小的。当然，农村中党员队伍比十月革命时有了很大扩展，党员与普通农民的关系有了一定改善。20世纪30年代初的集体化运动，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的基层党组织带来了一个新任务，那就是巩固集体化成果、监督富农。农村中党的干部职权扩大了，他们主要监督农民或富农，结果，农村党员干部与农民，尤其是所谓的富农的关系再一次紧张起来。在集体化完成后，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开展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到1940年前后，苏联农业生产获得丰收。尽管在这时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影响还是不够大，但随后到来的战争将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感调动了起来。战争期间，后方的党员与广大群众共同开展劳动竞赛，增加农产品产量，支援前线，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战争结束后，一批军人复员回到农村，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农村中党组织的力量。不过，由于这些复员的军人多半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加之战争结束初期经济萧条，使得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影响力受到很大限制。直到党的19大召开时（1952年），农村基层党组织依然比较薄弱。

第三节 基层党组织是保卫国家的战斗堡垒

从苏维埃政权建立到苏联解体，苏联历史上进行的两次大的战争，就是在苏维埃俄国初期打退外国武装干涉和平定国内反革命叛乱的国内战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与德国法西斯的较量。在这两次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中，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民走向胜利，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在战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国家保卫者的作用。

1941年6月22日，苏联政府在来不及进行战前动员的情况下，向14个军区发布了动员令，开始了伟大的卫国战争。战争期间，党共调派了150多万名党员到前线参加战斗。在陆海军队伍中，共产党员以自己刚毅、无畏和英勇的榜样，以布尔什维克式的真理的言论来保持军队的

高昂士气，并鼓舞所有战士为祖国建立战功。在后方工厂、集体农庄、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中，党员也成为劳动英雄的榜样。

一 苏联前期的军队基层党组织建设

军队党组织是指苏联武装力量中的党组织，即在苏军军人和军队所属职工中建立的共产党组织。苏共中央通过苏军总政治部领导苏军中党组织的工作。党的基层组织由相应的政治处领导，党组织的实际工作依据苏共军队组织工作细则、国防部长和苏军总政治部主任的指示进行。苏联武装力量的最早形式是十月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赤卫队^①。1918年初始建红军，在红军中实行政治委员制^②，并建立了军事科学院，其主要任务是“对红军中的干部进行军事理论培训”，同时，还对科学院的学员构成、教学大纲、科学院委员会的构成、从事教学的人员与课程内容的要求等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③。最初，军队党组织从属于地方，由于国内战争中党员人数迅速增加，军队中党支部数量大增。1918年10月红军中有800个党支部，到1920年7月发展到6000多个，其中有近30万名党员。从1918年中起，党支部工作普遍开始转归军队党委领导，1918年底起转归政治部领导。1919年1月，俄共（布）中央批准了第一个红军前线 and 后方部队党支部工作细则，并根据这一细则在团一级建立了基层党支部。1920年初，俄共（布）中央对军队党组织结构进行调整，在所颁布的新细则中规定，苏维埃国家共产党的连（或相当于连）支部是红军部队、部门、机关和院校党组织的基本单位。党支部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战士鲜明、坚定的共产主义意识，同敌人进行坚决斗争。内战时期，军队中的党员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内战紧张时刻，当时的军事

① 赤卫队（Красная гвардия）是十月革命准备和进行期间以及国内战争（1918～1920年）初期，苏维埃俄国武装力量的主要形式。1917年4月最先在莫斯科成立。

② 1918年4月，根据列宁的指示，苏维埃政权开始在部队、兵团、军事指挥机关和军事院校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并成立了全俄政治委员局。1919年4月，按照俄共（布）第8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为实现对政治机关的领导，建立了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后更名为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下辖5个基本部门：①宣传和鼓动；②文化和教育；③文献和出版；④监察；⑤行政和财务。其主要领导通常由一位俄共（布）中央委员来担任。

③ РГАСПИ. Ф. 347. Оп. 1. Д. 124. Л. 77 - 79.

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给基辅军区发来电报，要求动员基层党员志愿者前往救援：“基辅军区。根据从各个渠道得来的信息，芬兰被战争分子狂热地占领着。很明显，彼得格勒面临的新危险在上升。需要用行动给西部战线以特别有力的援助。必须敲响警钟。需要尽快动员建立共产党员的志愿者冲锋排、连和营，正确地培训他们。必须高度紧张起来。”^① 内战结束后，列宁曾总结道：“（我们）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胜利。这是因为在红军中有共产党支部，它们起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②

国内战争结束后，军队党组织把注意力集中在提高共产党员在军事训练、掌握技术和武器、军人政治锻炼方面的先锋队作用。1925年，在俄共（布）第14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章中，第一次单独列出了“关于红军中的党组织”一章，指出：“在红军和红海军中，党的工作总的领导由作为中央委员会军事部的工农红军总政治部负责，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通过它所委任的各级政治部（方面军、军区、舰队、军、师的政治部）、政治委员以及党的各级部队代表会议所选出的党务委员会来实现自己的领导。”^③ 据此，在苏联武装力量的各军种——战略目标火箭部队、陆军、国土防空军、空军和海军中，都建立了政治部；在各军区、军队集群、防空军区和舰队建立了政治部；在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军事人民委员部，在某些建设机关、一些卫戍区特种部队和机关也都建立了政治部。

苏联武装力量肩负着保卫苏维埃国家和加强苏联防御能力的任务。苏联武装力量是高度集中的组织，在这个组织里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需要全体人员行动的统一，需要绝对服从指挥员的意志。因此，1925年3月2日，苏联军队中开始实行“一长制”（единоначалие），取消指挥命令必须由政治委员副署^④。

① РГАСПИ. Ф. 347. Оп. 1. Д. 124. Л. 52.

②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309页。

③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编《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求实出版社，1982，第59～60页。

④ 不过，在苏联空军和海军部队中的一些单位，仍继续实行军事专家和政治委员双重领导制度。1937年，在苏联军队中又部分实行“一长制”。1940年8月12日，“一长制”再次采用。卫国战争期间，因军队人员损伤严重，1942年10月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命令，在军队中实行单一的军事指挥制，将政治指导员分派到各部队中担任军事指挥工作。战争后期，又逐步恢复“一长制”。参见〔美〕哈里特·法斯特·斯考特、威廉·法·斯考特《苏联的武装力量》，王学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274页。

军队中的政治机关是苏联武装力量中共产党的领导机构。与地方党组织不同，军队党组织不是按照生产和地域原则，而是按照军队的组织机构来组建，由军队政治部统一领导。苏联武装力量中的党组织形式一般与党和武装力量进行活动的具体条件及其要完成的任务相适应。在通常情况下，在陆军和海军中，团、独立部队（营、炮兵营、连、炮兵连、大队以及与之相当的分队）、一二三级舰艇、小型舰艇大队、司令部、管理部门（部）机关，凡有党员三人以上者，由相应的政治部建立基层党组织。

经政治部同意，基层党组织内部，在有三名或三名以上党员的营、炮兵营、大队、舰艇的战斗部队和部队（舰艇）的独立分队可以建立相当于车间党组织的党组织。在分队的党组织内部以及基层党组织内部，经政治部同意，可以在连、炮兵连、航空兵中队、空军支队以及小舰艇、排、机组、编队和编组、机关的处和企业的车间建立党小组。

随着苏联武装力量的发展和任务的变化，军队党组织的机构、活动方式方法不断发展和完善。1934年联共（布）17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支部在质量和数量都有提高的情况下改称为基层党组织。20世纪30年代，军队中党的力量有了比较大的发展。1931年底，苏军中共党员有20万人，1932年增至30万人。在这一时期，军队中党员占全部军人的1/4以上^①，1935年这个数字降低到15万人^②。1939年军队中党员人数大量增加，达到43.5万人，军事单位中的基层党组织有9468个^③。1941年中，军队中共有14700多个基层党组织，党员达56.3万多人。在卫国战争期间，军队中的党员和基层党组织数量有了极大增长^④，1941年7月1日至1945年7月1日，共有378.8万名军人成为预备党员，237.6万名军人成为正式党员。在卫国战争结束后的一年半左右时间里，约有250万名

① 转引自〔美〕哈里特·法斯特·斯考特、威廉·法·斯考特《苏联的武装力量》，王学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273页。

② 1933年重新审查党证时，许多党员失去党证。在大清洗期间（1933～1938年），军队中党员增加也很少。

③ 〔美〕哈里特·法斯特·斯考特、威廉·法·斯考特：《苏联的武装力量》，王学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274页。

④ 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的基层党组织情况前文已述，这里就不多赘述。

党员和预备党员复员，军队中的党员比例又恢复到战前的15%左右^①。

二 伟大卫国战争中党员队伍的扩大

苏德战争的爆发，给苏联共产党提出了重大任务：作为执政党，一个对本国人民和整个进步人类的社会主义命运负有责任的政党，苏共应做出一切必要努力来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建设成果。在和平时期，军队里的党政工作以宣传鼓动为主，但到战争时期，组织和直接协助指挥人员执行战斗任务的问题就被提到第一位了。战争的爆发要求党改组国家生活，使之转入战时轨道，把国家变成一个统一的军事营垒。正如列宁曾经号召的那样：“全体正直的工农，全体苏维埃工作人员，都要按战时要求紧张行动起来，把自己的工作、精力和注意力尽量转到完成直接的战争任务上。”^② 战争期间，苏联共产党党员人数有很大变化：苏联武装部队中党员和基层党组织的数量不断增加，军人党员在苏共党员总数中所占比例也在提升。党的组织工作随着党员队伍变化而变化，主要任务是采取不同措施以加强各级党组织的影响。

（一）党员队伍的扩大、军队中党的力量的加强

在战争爆发前，苏联共产党约有党员380万人，其中有56.3万多人是在苏联军队中（占全部党员总数的约15%）。苏联军队中共有14700多个基层党组织，占全部基层党组织的7.2%。战争初期军队党组织遭受严重损失，仅在头6个月就有50万名党员失去作战能力。为提高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党就要加强军队的军事和政治工作。

首先是改组军队政治工作：动员1000万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加入军队，将优秀的党的干部派到军队中工作，在部队中吸收军人入党和入团。在战争之初，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有54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3名中央检查委员会和加盟共和国的领导干部转到军队中担任领导工作。

为补充前线兵员损失，各地方党组织积极工作，仅在战争爆发后的

^① 〔美〕哈里特·法斯特·斯考特、威廉·法·斯考特：《苏联的武装力量》，王学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277页。

^②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41页。

头 8 天里，就动员了 530 万人参加军队，组建起新的兵团和部队^①。在之后半年的战争动员中，又有 110 万名共产党员（即地方党员人数的 1/3）加入了武装部队。到 1941 年底，大约有 8800 名地方党的领导干部转到军队中工作^②，苏联陆海军中的党员已达 130 万人，占全党党员总数的 40% 强^③。苏共还在 1941 年底对党章中有关入党的条件进行调整，放宽了对战斗中表现出色的军人入党的要求^④。因此，虽然在战争头半年前线军队中党员和预备党员伤亡很大，但军队中党员人数仍增加了近 1.2 倍，这都是由地方党员干部和吸收新党员及预备党员来补充的。在战争期间，特别是在战争考验最关键时刻，优秀的战士、共青团员纷纷加入共产党，要求以党员的身份参加战斗，苏共党员队伍迅速扩大^⑤。例如，在交战最为激烈的 1942 年冬至 1943 年春，党的队伍迅速扩大（见表 1-3），军队的战斗力大为增强。

表 1-3 1942 年 12 月至 1943 年 3 月党的队伍扩大情况

单位：人

| 时间 | 地方党组织接受入党人数 | | 军队党组织接受入党人数 | | 总计 | |
|-------------|-------------|-------|-------------|--------|-------|--------|
| | 正式党员 | 预备党员 | 正式党员 | 预备党员 | 正式党员 | 预备党员 |
| 1942 年 12 月 | 13140 | 28105 | 56587 | 126426 | 69727 | 154531 |
| 1943 年 1 月 | 11999 | 25639 | 55306 | 118694 | 67305 | 144333 |
| 1943 年 2 月 | 13099 | 28537 | 50709 | 108170 | 63808 | 136707 |

① 50 лет Вооружённых Сил СССР. Москва. Воениздат с. 257; [苏] 安·安·格列奇科：《苏维埃国家的武装力量》，厦门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 1972 级工农兵学员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第 66 页。

② Б. Н. Посберов и др.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т. 5. первый.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70. с. 171.

③ 《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队建设），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1941 年 1 月 1 日、1941 年 7 月 1 日、1942 年 1 月 1 日苏联军队和地方党员人数变动情况参见表 1-4。

④ 1941 年 8 月 19 日和 12 月 9 日苏共两次做出决议，改变前线入党条件，入党者必须有 3 名 1 年以上党员介绍，并有分队政治指导员或部队政治委员所做的战斗鉴定，3 名介绍人对入党者的了解也可以少于 1 年。还允许军队政治机关对战斗中表现突出的军人经过 3 个月预备期即可转为联共（布）正式党员。这对部队党员人数增加有很大影响。参见 [苏] Н. Г. 安德罗尼科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 ~ 1945 年）》第 4 卷（下册），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俄语翻译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第 632 页。

⑤ [苏] 索洛维约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 ~ 1945 年）》第 7 卷（下册），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第 141 页。

续表

| 时间 | 地方党组织接受入党人数 | | 军队党组织接受入党人数 | | 总计 | |
|---------|-------------|--------|-------------|--------|--------|--------|
| | 正式党员 | 预备党员 | 正式党员 | 预备党员 | 正式党员 | 预备党员 |
| 1943年3月 | 14817 | 34829 | 61136 | 122520 | 75953 | 157349 |
| 小计 | 53055 | 117110 | 223738 | 475810 | 276793 | 592920 |

资料来源：转引自〔苏〕帕罗季金、霍罗希洛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6卷，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第357页。

由表1-3中可见，在卫国战争转折时期的4个月间，苏共党员总计增加了869713人，其中80%以上在苏联军队中。在这之后，1943年4～12月，后方劳动者和苏军战士中有799366人成为联共（布）正式党员，1349222人成为预备党员，他们大多数也在苏联军队中。1943年1月1日，苏联武装力量中共有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1938327人，占全党党员和预备党员总数的50.3%。到1943年底，陆海军中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人数已增至2702566人，占全部党员人数的54.9%^①。其间，还有相当一部分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各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和其他各级党委会的负责人员被派去担任军事工作。党员在苏联军队中所占比例不断提高，极大地增强了军队的作战能力，许多党员密切联系群众，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将军队将士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他们向广大战士宣传党的号召，用自己的行动树立军人忠于国家的榜样，以英勇无畏的精神、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的决心赢得了战士们的尊敬。

到1945年1月1日，全党共有党员（包括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约576万人，其中军队党组织的党员有3030758人，占全部党员总数的52.6%（见表1-4）。在整个战争期间有531.9万人入了党，苏联陆海军军人中最坚定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加入了党的队伍。尽管遭受了巨大伤亡（战争中共牺牲了300多万名共产党员），党员仍增加了

^①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自己的回忆录《小地》中曾讲到军队党员迅速增加的情况：他本人几乎在每次战役前都听到感人的表态：“我要在火线入党！”正是这种对党的热爱使战士们以作为共产党员去前线为光荣，战争期间党员增加了300万人。对此，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在每次发起进攻前，勃列日涅夫都要签发一大沓战士的入党申请书，并且隆重地授予他们候补党员证，“火线入党”是党员（预备党员）数量增加的一个因素。参见〔苏〕阿夫托尔哈诺夫《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杨春华、张道庆译，新华出版社，1981，第175页。

160多万人，战争结束时总数达约600万人，其中有332.5万人在武装部队中^①。当时，几乎每4名军人中就有1名共产党员。在战争中还涌现出一批优秀将领，如А. И. 安东诺夫、И. X. 巴格拉米扬、А. М. 华西列夫斯基、Н. Ф. 瓦图京等。可以说，强大的党员队伍和共产党员冲锋在前的模范作用，是苏联取得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政治保证。

表 1-4 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军队中党员数量变化情况

单位：人，%

| 项目 | 1941年 1月1日 | 1941年 7月1日 | 1942年 1月1日 | 1943年 1月1日 | 1944年 1月1日 | 1945年 1月1日 | 1945年 7月1日 |
|--------|---------------|---------------|---------------|---------------|---------------|---------------|---------------|
| 苏共党员总数 | 3872465 | 3817906 | 3063876 | 3854701 | 4918600 | 约 5760000 | 约 6000000 |
| 军人党员人数 | 559182 | 563503 | 1234373 | 1938327 | 2702566 | 3030758 | 3325000 |
| 军人党员占比 | 14.4 | 14.8 | 40.2 | 50.2 | 54.9 | 52.6 | 55.4 |

资料来源：根据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т. 5. первый.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70；《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2～10卷整理。

（二）战争期间基层党组织数量的变化和力量分布情况

伟大卫国战争开始前，苏联共产党基层党组织力量主要在地方党组织中。1941年1月1日，基层党组织总数为184238个，90%以上属于地方党组织^②。到1941年7月1日，苏联陆、海军中党的基层组织有14751个，占联共（布）基层党组织总数的7.2%（见表1-5）。战争头半年，由于前线军人党员损失很大，大批地方党组织中的党员和共青团员被派往前线。到1941年底，陆、海军中党的基层组织已增加到26742个，占全部基层党组织的22.2%，这对于加强党对军队的影响起到了很大作用。

1941年和1942年，在战争最困难时期，大批新党员加入党的队伍^③。在党的队伍不断壮大的基础上，陆、海军中基层党组织网也在扩

① Б. Н. Пономарев, М. С. Волин, В. С. Зайцев и др. История КПСС т. 5.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79. с. 512.

② 此数字出自〔英〕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徐葵、邹用九、裘因译，东方出版社，1991，第553页（注释）。

③ 1942年初到1943年苏共党员数量的增加情况见表1-4。

大。根据 1942 年 5 月 1 日的情况，苏联武装力量计有约 3.1 万个基层党组织，到年底已有 41137 个^①。生气勃勃的党组织的建立，加强了党在军队中的影响，党通过设有许多支部的党组织网在苏联陆、海军中开展自己的全部工作，共产党员在军队人员中的先锋作用明显增强。

表 1-5 卫国战争期间苏共基层党组织数量及分布情况

单位：个，%

| 项目 | 1941 年 7 月 1 日 | 1942 年 1 月 1 日 | 1943 年 1 月 1 日 | 1944 年 1 月 1 日 | 1945 年 1 月 1 日 | 1945 年 7 月 1 日 |
|---------------------|-------------------|-------------------|-------------------|-------------------|-------------------|-------------------|
| 基层党组织总数 | 204920 | 132206 | 147737 | 196300 | 228948 | 244328 |
| 陆、海军基层党组织数量 | 14751 | 26742 | 41137 | 67089 | 78640 | 80423 |
| 陆、海军基层党组织数量 所占比例 | 7.2 | 20.2 | 27.8 | 34.2 | 34.3 | 32.9 |
| 后方基层党组织数量 | 190169 | 105464 | 106600 | 129200 | 150308 | 163905 |
| 其中：工业企业 | 19100 | 12524 | 13485 | 15952 | 14189 | 15163 |
| 农业 | 60200 | 38800 | 38000 | 45200 | 54268 | 60104 |
| 交通运输部门 | 9200 | 6500 | 6600 | 7900 | 9253 | 9621 |
| 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和机关 | 101669 | 47640 | 48515 | 60159 | 72598 | 79017 |

资料来源：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4、5、7、8、10卷整理。原始数据出自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т. 5. первый.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70。

1943 年第一季度末，苏共党员总数超过 400 万人，其中有 200 多万名党员在军队中。在党员人数增长的同时，党的基层组织网也有所扩大，除约 15 万个基层党组织外，还建立了 1.1 万多个预备党员小组和 4500 个以上的党、团混合小组。其中，陆海军中约有 4.2 万个基层党组织，2200 个预备党员小组和党、团员混合小组，约占全部基层党组织的 1/4^②。由于大批现役军人入党，基层党组织和连队党组织也更加巩固。这些党组织在军队政治机关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各分队的政治工作，时刻加强党对各分队日常生活和战斗活动的作用。

① 数字参见〔苏〕B. П. 莫罗佐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5卷，吴文智、朱蕴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第546页。

② 〔苏〕帕罗季金、霍罗希洛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6卷，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第357页。

尽管军队基层党组织数量有了很大增加，但相对于急剧扩大的党员队伍而言，数量仍不够：到1943年1月1日，苏联军队党员总数占全部党员的50.2%，而陆海军基层党组织数量仅占全部数量的27%左右^①。与地方相比，军队基层党组织过于庞大，不利于战时的领导和组织。当时，军队基层党组织主要设在团一级部队中，团的基层党组织委员会要指导25~30个连队党组织活动（并且连队党组织中党员数量在不断增加）。在战斗中，要在团或者相当于团一级的部队召开全体党员会议十分困难，有时简直不可能。因此，党的基层组织工作必须改进，以提高效能。

1943年5月24日，联共（布）中央发布了《关于改组红军党团组织机构，加强方面军、集团军和师办报刊作用》的决议^②，决定在营和大队建立基层党组织，团则建立党委会来领导各基层党组织和连队党组织，连和相当于连一级的分队仍建立党的组织或党小组。海军中的党团组织也进行了类似的改进，在营和相当于营一级的分队直接建立基层党组织^③。党组织机构的改变，使基层党组织的数量从1943年6月1日的40262个增加到夏季战役开始时的60414个，即增加了50%^④，有40余万名积极分子被提拔担任党团领导工作^⑤。共产党依靠数量上不断增加的基层党组织，进一步增强了对苏军全体成员的影响，提高了党组织在执行战斗任务方面的作用。

从1944年底到1945年初，苏联军队开始进入别国境内作战。为加强军队纪律，扩大苏联军队的影响，军队中采取了一系列巩固党和共青团组织的措施。在战役开始前，几乎所有的连、营以及同级机构都恢复了党和共青团的基层组织。例如，1945年1月，在进入德国东普鲁士境内作战前，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的部队中有2784名战士被吸收为正式党

① 数字与具体情况可参照表1-4、表1-5。

② 内容参见索洛维约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7卷（上册），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第182页。

③ 1950年1月，苏共中央决议，批准总政治部在团一级建立基层党组织，以取代隶属于团的大队和营一级的基层党组织。这主要是由于战后苏联武装力量中党员数量减少，连队及其相应分队党员人数减少。截至1948年底，40%以上的步兵连和20%以上的炮兵连没有党的组织。情况参见苏联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编《苏联武装力量（建设史）》，《苏联武装力量》翻译组译，战士出版社，1981，第501~502页。

④ КПСС и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Советских Вооружённых Сил. Москва. 1967. с. 338.

⑤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работа КПСС на фронте [1941-1945гг.] Москва. 1960. с. 148.

员，2372名战士被吸收为预备党员^①。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战斗中表现良好，被授予各种勋章和奖章。到1945年1月1日，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和第2方面军中有党的基层组织11100个左右，共青团基层组织近9500个；还有连级和相当于连级的党组织20200多个，共青团组织近17800个；党员为425700人，团员超过243200人^②，两项相加，党、团员人数约占两个方面军总人数的41%。在欧洲战争结束阶段，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规模更大，意义也更深远。

在卫国战争头半年，苏联后方的基层党组织数量几乎减少了一半^③。在地方基层党组织大量减少的情况下，党对地方党组织中党员的分布进行调整，首先保证军事工业企业党员所占比例，将党员优先派往国防工业部门。在共产党员人数不足以建立基层党组织的地方，就建立区或市党委领导下的预备党员小组和党团员联合小组。将近1942年底时，地方基层党组织网已经涵盖工农业、交通运输以及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党的队伍在数量上的增加和质量上的提高以及党组织网的扩大，使党能够保证党员在生产的主要部分起主导作用。

1943年春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后，苏联军队的作战规模扩大，开始由防御状态转入进攻作战。为进行目的明确、规模巨大的战役，需要大量的物资器材，特别是技术兵器、武器装备和弹药。从1942年底到1943年初，联共（布）中央、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做出决议，增加燃料开采、冶金和发电量。为此，工业系统的基层党组织得到加强，这些部门基层党组织数量和党员人数不断上升，其中，重工业和国防工业部门基层党组织和预备党员小组数量增长最快。例如，1943年1~12月，上述部门党员人数增加了50678人，其基层党组织的数量同时增加了2467个^④。

① [苏] Н. И. 舍霍夫佐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10卷，蒋妙瑞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162页。

② [苏] Н. И. 舍霍夫佐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10卷，蒋妙瑞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163页。

③ 后方工业企业和农业及交通运输等部门基层党组织数量减少情况可参见表1-5。此数字出自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т. 5. первый.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г. 1970. с. 377。

④ 此数字参见索洛维约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7卷（下册），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第142页。

在这个时期，大批优秀的集体农庄庄员入党，使集体农庄的党组织网得以扩大。1943年集体农庄党员总数增加了48674名，基层党组织增加了3219个，预备党员小组增加了2101个，党团员混合小组增加了1950个^①。

战争期间，在后方，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代表纷纷入党，使党的队伍不断扩大，党的威信和作用也不断提高。1945年上半年，各地区党组织每月平均吸收27000人为候补党员，是1941年上半年的2.7倍^②。不论是在敌人未曾占领的各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的建筑工地、车间、集体农庄、国营农场，还是在解放区，都建立了新的党组织。例如，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州，从1944年10月到1945年5月建立了246个基层党组织、31个候补党员小组和26个党和共青团小组^③。据1945年7月1日统计，乌克兰共产党有14980个基层党组织，比年初增加了2254个^④。在东部各州，党的队伍发展尤为迅速。1945年初，车里亚宾斯克州党组织比战前增加了53%，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增加了51%，克麦罗沃州增加了44%。1945年，这些党组织增加了将近74000人^⑤。

随着被解放地区的扩大，需要在这些地区恢复党的机关和党组织的工作，并将经济工作纳入党的工作中来，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被从前线召回到后方工作。到1945年1月1日，仅回到斯摩棱斯克州一地的来自游击队和苏军部队的共产党员就达2000多人。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为加快经济建设、恢复生产、增加产品量做了大量工作。在党的领导和党员群众的努力下，国防和国民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

综上，可以看出，战争期间党在注意增加联共（布）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数量的同时，也努力增加国民经济关键部门的党、团员数量。党

① 索洛维约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7卷（下册），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第142页。

② [苏] Н. И. 舍霍夫佐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10卷，蒋妙瑞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659～660页。

③ Ворошиловградская правда. 22 мая 1945.

④ [苏] Н. И. 舍霍夫佐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10卷，蒋妙瑞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661页。

⑤ [苏] Н. И. 舍霍夫佐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10卷，蒋妙瑞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660页。

的基层组织、预备党员小组和党团员混合小组的不断发展又进一步加强了党与群众的联系，使党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各条战线上的影响更为扩大。苏联共产党所进行的组织工作、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干劲和忘我劳动，使苏维埃国家强大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得到进一步巩固，保证了对法西斯德国的彻底胜利，并为向社会主义和平建设过渡创造了条件。

三 基层党组织在前线组织抗击德国侵略军

在苏德战争的前线战场上基层党组织的主要工作是，动员广大党员以身作则，以自己的勇敢顽强为共青团员和普通战士树立榜样；在开展大大小小的战役时，动员共产党员到前线建立功勋，保证前线军队的作战力量；随着前线党员队伍的扩大，加强部队中党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

（一）从战争开始到战争结束，共产党员始终是苏联军人英勇无畏的榜样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战争首先在西部和西北部进行。当德军大举进攻时，苏联军队，主要是边防军，对德军的大举进攻进行了顽强抗击。从战争爆发之初，共产党员就成为苏联军队抗击德国侵略军的主力，他们或者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或者以共产党员的自觉行动，为保卫祖国而奋不顾身甚至献出生命。

在战争刚开始的日子里，飞行大队长、共产党员尼古拉·加斯特洛的名字就传遍全国。他驾驶着一架被火焰包围的轰炸机向一堆密集的德国坦克俯冲下去，在巨大的爆炸声中与敌人的若干辆坦克同归于尽。他的英雄壮举对前线将士产生了巨大影响，许多苏军飞行员、坦克手和步兵也像他一样创下英雄业绩。共青团员彼得·哈利托诺夫的飞机子弹全部打光了，他就驾驶飞机向德军轰炸机冲去，用自己飞机的螺旋桨打掉了敌机的升降舵。在西布格河的一个边防哨所，40名苏军战士与有坦克和飞机支援的一整营德军进行了一昼夜战斗。横扫欧洲大陆的德军在与苏联军队最初的交战中，遇到了不屈不挠的顽强抵抗^①。尽管这时战争

^① 关于苏德战争初期苏军战士的英雄壮举情况可参见 Н. Шатагин.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вдохновитель и организатор побед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Москва. 1955。

的主动权还操纵在德军手中，苏联军队的抵抗主要是由边防部队或在一些城市中数量不是很大的部队进行的。在战争刚爆发时期，他们可能得不到上级的战斗命令或指示，但由于党的培养和教育，出于对党和国家利益的忠诚，出于自己的责任，基层党组织和前线的共产党员自己组织起来，进行坚决的抵抗。德军在苏联境内最初所遇到的就是那些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的自觉反抗。他们的行动证明，德军在社会主义苏联境内所进行的战争已经不可能像在西欧国家那样顺利。

在战争进行中，共产党员的英雄业绩依然层出不穷。1941年秋天，在莫斯科保卫战中，潘菲洛夫师^①某分队政治指导员瓦·格·克洛奇科夫-季耶夫率领约30名战士与50辆德军坦克进行殊死搏斗，克洛奇科夫号召战士们与敌人血战到底。他说：“俄罗斯虽大，但已无处可退，我们身后就是莫斯科！”战士们宁死不屈，几乎全部牺牲，但敌人最终没有冲过杜博谢克沃铁路会让站。同一天^②，在斯特罗克沃村，政治指导员巴甫洛夫带领11名战士与企图冲入潘菲洛夫师后方作战的敌军坦克作战，将敌人阻挡了一整天。由政治指导员格奥尔吉耶夫内伊率领一小队战斗机把第三个德军坦克纵队牵制在梅卡宁诺村附近，阻滞了敌人的推进^③。这些共产党员、政治指导员多半牺牲了，但他们履行了政治工作者的思想教育和党员模范带头职责，对战士是莫大的教育和鼓舞。

在保卫列宁格勒的战斗中，一位共产党员格·普·马斯洛夫斯基在前去执行战斗任务时，给自己的儿子留下遗书，告诉儿子，为保卫光荣的列宁城，他不能活着回来了，他要不遗余力地完成战斗任务，直到用尽最后一口气、流出最后一滴血。他说，自己的举动是服从军纪和党员的要求，是出于对祖国的热爱，并要求儿子记住自己的父亲是为祖国而

① 潘菲洛夫师（панфиловцы）指И. В. 潘菲洛夫将军所指挥的第316步兵师。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这个师于1941年在莫斯科近郊沃洛科拉姆斯克方向与德国法西斯军队英勇作战。在10月和11月的战斗中，这个师抗击了沿沃洛科拉姆斯克公路突向莫斯科的敌人步兵及坦克的密集冲击，英勇地保卫了莫斯科。

② 1941年10月29日。

③ 他们的事迹参见Н. Шатагин.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вдохновитель и организатор побед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Москва. 1955。

献身的^①。

在战争中有无数共产党员就这样为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正是共产党员的这种英勇无畏的精神，激励着无数人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建功立业，才使得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前线的组织动员工作和先锋模范作用

从战争的头几天开始，共产党就把几十万党员派到武装部队中去。奔赴前线的共产党员都争取到最艰苦的岗位上，到战事最激烈的地方去，希望以自身的榜样鼓舞战士们建功立业。在一些重大战役开始前，基层党组织总是要对战士进行动员，以配合军队的指挥和战斗的进行。

1941年秋，当德军逼近莫斯科城时，莫斯科市党组织召开了积极分子会议，做出决议：“动员全莫斯科党组织，莫斯科全体党、团员和劳动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保卫莫斯科，争取胜利。”^②决议号召组织工人共产党员义勇队。在几天时间里，就有12万以上的莫斯科市民加入了人民自卫队，有24000人加入了防空队。在由他们所组编的25个共产主义工人独立连和独立营中，有约3/4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经受过坚强锻炼的党员和共青团员加入首都保卫者的行列，提高了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在工厂中的工人则加班加点地忘我工作，生产武器弹药。他们通常都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2~3倍^③。

莫斯科保卫战期间，各部队、各兵团运用各种不同的形式进行党的政治工作。在前线吃紧的情况下，利用战斗间隙召开党员、团员会议或全体军人大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堵住敌人通向莫斯科的道路”，参加会议的军人一致表达歼灭希特勒匪军的坚强决心。坦克第四旅党员大会的决议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共产党员将献出全部力量，执行西方方面军的命令，一旦需要，我们宁愿血洒疆场也决不让德寇闯进莫斯

① 情况参见 Н. Шатагин.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 вдохновитель и организатор побед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Москва. 1955.

② [苏] Н. Г. 安德罗尼科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4卷（上册），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俄语翻译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第165页。

③ Н. Шатагин.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 вдохновитель и организатор побед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Москва. 1955.

科!”^① 在战斗中，党团队伍人数不断增加，截至1941年11月初，在莫斯科近郊作战的军队中，党员超过12万人，几乎占全军党员的10%^②。虽然党员在历次战斗中伤亡甚多，但军队中的党组织却显著加强，影响也随之增大。

在首都军民的顽强抗击下，1941年11月，德军攻占莫斯科的“台风”计划遭到破产。一位德国将军在判断12月初的形势时写道：“这是我们东线战役的转折点。想在1941年打败俄国的希望已在最后一分钟化成泡影。”“抵抗我们的是这样一支军队，它的战斗素质远远超过我们过去在战场上所遇到的一切军队。”^③ 他忘记了一点——这是共产党所领导的一支有严格组织纪律的、坚强不屈的力量。

德军在列宁格勒市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战争之初，德军包围了列宁格勒，但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这座城市成了不可攻破的堡垒。当城市危急时，列宁格勒人响应党的号召，组织起多个人民义勇军师团，列宁格勒党组织中几乎有70%的党员，共青团组织中近90%的共青团员走上了前线。几十万个列宁格勒市民冒着炮火，顶住敌人的不断进攻，在半饥半饱的状态下修筑防御工事。

1941年冬天，是列宁格勒市最困难的一个冬天，粮食很少，燃料和电力用来供应军工生产。列宁格勒人在严寒与饥饿中顽强地战斗着、工作着。当时被围在城中的女诗人别尔戈利茨曾作诗表达列宁格勒人的思想感情：

无论是不眠的夜晚还是严酷的白昼，
我们不知道什么叫作流泪，
什么叫作恐惧和祈求。
我宣告：大炮的轰击决不能
把我们列宁格勒的公民吓倒；

① [苏] Н. Г. 安德罗尼科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4卷（上册），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俄语翻译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第175页。

②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т. 5. первый.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70. с. 236.

③ 这是德国布鲁门特里特将军的话。参见 Роковые решение Москва. 1958. с. 98。

假如明天就要发生巷战，
我们决不丢弃街垒逃跑……^①

列宁格勒的军民经受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但他们没有让德军进入这座有着光荣历史的城市。其中，共产党员是保卫城市的组织者和灵魂。他们在最重要的地段和最困难的地方工作：开机床、炼钢铁、修筑防御工事，在唯一的运输通道——拉多加湖上从事运输等。他们以坚强、沉着和忘我精神与列宁格勒人民共同克服重重困难。其中许多人没能活到城市解放。在被围困中的列宁格勒市，1942年上半年，死于饥饿的居民就有60万人以上^②。在这段时间里，列宁格勒市党组织失去了15%以上的党员，但又有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了党组织。在战争的第一年，有大约11500名列宁格勒人入党^③。就这样，共产党员与人民群众紧密团结，经受了战争初期最严峻的考验，并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初期，斯大林格勒市和斯大林格勒省每天有15万以上的居民参加修筑防御工事，其中有2000多人是斯大林格勒市党组织的共产党员。德军的进犯，使这座城市日夜处于火海之中。钢筋混凝土的楼房被炸倒了，掩蔽所崩塌了，但苏军战士英勇地守护着每一寸土地、每一座房屋。中士巴甫洛夫率领一小批苏军战士坚守住从敌人手里夺回来的一座大楼达58天，德军曾发动几十次进攻都没有将这座大楼攻下，却在大楼的各个要道上留下了无数尸体，后来这座大楼被称为“巴甫洛夫大楼”^④。

从1942年11月19日起，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周围展开反攻。在准备进攻时，为保持党对指战员的影响，苏军政治部做了大量工作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主要做法是把共产党员放在最恰当的岗位上和吸收优秀军

① [苏] Н. Г. 安德罗尼科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4卷（上册），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俄语翻译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第199页。

② [苏] Н. Г. 安德罗尼科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4卷（下册），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俄语翻译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第551页。

③ 数字来自 С. Князев и другие. На защите Невской твердыни Ленинградская партий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в годы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Ленинград. 1965. с. 338。

④ [苏] Н. Г. 安德罗尼科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4卷（下册），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俄语翻译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第24页。

人人入党。仅11月，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党组织就吸收了5300多名战士和指挥员入党，比同年7月多2倍^①。进攻开始前，几乎所有连队都建立了党组织或党小组。例如，在1942年11月和12月，第40集团军就有2138名优秀指战员入党，从而大大加强了分队的党组织。原有党组织的加强和新的党组织的建立，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共产党员把全体军人团结在一起，教育战士英勇奋战，争取立功。

到1943年1月，受命强攻敌人阵地的各分队人员中，有32%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到进攻开始时，第一线部队基层党、团组织有60%的党员、团员被编入了担任冲击任务的分队^②。在进攻中，党员总是冲锋在前。以第6集团军为例，各级党组织共有党员5059人，直接参加进攻战斗的就有4265人，占党员总数的84%。其中又有1833名党员担任炮手、机枪手、自动枪手和反坦克枪手^③。

在其他战场上，共产党和共青团也是抗击敌人的先锋。1943年9月，在强渡第聂伯河的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什方面军里，就有23.9万名联共（布）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有19.1万名共青团员^④，申请入党和入团的人源源不断。9月，两个方面军部队共发展预备党员约16400名，共青团员11800余名^⑤。当时第40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克拉伊纽科夫将军曾写道：“我们向第聂伯河进攻的日子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因其战斗出色，而且党的队伍得到了飞速发展……递交申请书最踊跃的时间不是在战线沉寂之时，而是在最困难的考验时期。在发起进攻前最严峻的时刻，许多指战员写道：‘我要以共产党员的身份投入战斗。’”^⑥

在战斗中，苏军指战员建树了大量英雄功勋。每一战功都体现了苏

① [苏]帕罗季金、霍罗希洛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6卷，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第78页。

② [苏]帕罗季金、霍罗希洛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6卷，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第190页。

③ [苏]帕罗季金、霍罗希洛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6卷，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第106页。

④ [苏]索洛维约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7卷（上册），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第361页。

⑤ [苏]索洛维约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7卷（上册），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第361页。

⑥ К. Крайнюков. От Днепра до Вислы. Москва. 1960. с. 148.

维埃人的伟大气魄和为夺取胜利不怕牺牲的精神，站在最前列的照例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在对敌作战中的献身精神鼓舞着全体战士。

苏联军民的顽强不屈精神令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肃然起敬。斯大林格勒战役取得胜利时，美国总统罗斯福致信斯大林，认为斯大林格勒会战将名垂史册。他还给斯大林格勒市寄来一份奖状，上面写着：“我代表美利坚合众国人民把这份奖状授予斯大林格勒市，以表示我们对其英勇保卫者的敬意。他们在1942年9月13日至1943年1月31日受围攻期间所表现的坚毅勇敢和自我牺牲精神将永远鼓舞一切自由的人们。他们的光辉胜利制止了侵略的狂澜，成为同盟国反侵略战争中的转折点。”^① 英国首相丘吉尔在1943年2月1日给斯大林的信中，把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取得的胜利称为一次惊人的胜利^②。英国国王则送给斯大林格勒市一把宝剑作为礼品，剑身上用俄英两种文字刻着题词：“赠给斯大林格勒坚强如钢的公民们，聊表英国人民深厚的敬意。——英国国王乔治六世敬赠。”^③ 这些敬意既是给苏联城市和人民的，也可视为对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员在战争中的先锋模范作用的肯定。没有党的组织，没有共产党员冲锋在前的模范作用，要取得这样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

案例 1-1 共产党员在卫国战争中的先锋模范作用

1941年秋，在莫斯科保卫战中，在一个保卫莫斯科的部队里曾有过这样的事情：

……军人们肩并肩站成一排，聆听着指挥员和政委在他们去执行困难而又危险的战斗任务之前的临别赠言。

“您是共产党员吗？”指挥员问排头兵。

“是！”战士答道。

① Переписк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Совета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с Президентами США и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ами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во врем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941 - 1945 гг. Москва. 1957. т. 2 с. 52.

② Переписк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Совета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с Президентами США и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ами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во врем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941 - 1945 гг. Москва. 1957. т. 2. с. 288.

③ [苏] 帕罗季金、霍罗希洛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6卷，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第136页。

指挥员走到第二名跟前：“是党员吗？”

回答一样。

所有被挑选去执行任务的人都说自己是党员。突然，政委问一个人：“冈塔尔，你是什么时候入党的？”

“应当首先成为一个党员，然后再申请入党。”军人平静地回答说。

“对。”政委赞同道。他命令：“党员，向前两步走！”

整个队列向前迈了两步，冈塔尔也不例外。

“您，政委同志，请不要把我们分开。”他请求说。

“请党员举手。”政委说。

十名士兵中有三人举起了手。然而，所有站在队列中的人组成了一个为共产主义而战斗的统一、友爱的家庭。

资料来源：转引自《苏联武装力量的党政工作》（苏联高级军事—政治院校教材），谢力译，战士出版社，1982，第435页。

这件事反映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情況：首先，战士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到前线保卫祖国。其次，他们都希望自己能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战斗（有的战士在去参加战斗前留言：“假如我在战斗中牺牲了，希望我能够被追认为共产党员！”）。也就是说，作为共产党员去参加战斗，对每个战士而言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最后，战士们认为自己首先要以英勇地履行军人职责，遵守纪律等行为，达到党员的标准，然后才可以入党。可见，共产党员已经在战士们心目中树立了英勇无畏的形象，党员能够把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整个部队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集体去参加战斗。这是军队中指挥员、政工干部和广大党员在平时所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果，体现了党组织的凝聚力，也体现了军人的爱国主义精神。

四 基层党组织在敌占区领导游击战争和宣传工作

从德军侵入苏联国土之初，苏联的爱国者就在被占领区同敌人展开斗争。1941年6月29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发布文件，指示在敌人后方展开游击战争，并确定了游击力量的最适宜的组织形式。在德军占领的乌克兰、白俄罗斯、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

尼亚，成千上万名共产党员、苏维埃干部、共青团员隐蔽下来，从事地下工作。他们领导建立起地下党组织网，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对敌斗争：组织游击队与敌人作战，散发传单、报纸等进行宣传活动，组织当地居民对敌人的政治、经济、军事设施进行破坏，等等。

（一）敌后地下党组织网的建立

由于德军的闪电进攻和进攻后的快速推进，战争爆发之初，在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各加盟共和国没能事先建立起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在有些来得及建立的地方，敌人进行残酷镇压，导致刚建立起的组织无法巩固下来，也难以开展活动。所以，战争开始后的半年里，地下活动的开展面临重重困难。尽管如此，1941年，在敌占区还是有18个地下州委、260多个地委、市委、区委和其他一些党的机构，以及一批基层党组织和党小组在活动。

1942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秘密活动的地下党组织体系基本建立起来。据不完全统计，1942年夏，仅在俄罗斯联邦的敌占区内就有约850个基层党组织在进行活动^①。到1943年4月，白俄罗斯游击队中就有328个党组织，另有144个地区性的地下党组织^②。1943年秋季，在敌后已有24个州委，370多个专区委员会、市委和区委以及其他地下党的机关，他们负责领导敌后党和共青团组织的工作。

随着地下党组织体系的建立和稳固，各地的地下党组织网不断扩大和延伸。仅1943年一年内，在普斯科夫州各区就成立了134个党小组。1943年夏初，在基辅和基辅区所属地区内有169个地下组织和小组进行活动^③。1943年上半年，乌克兰北部地区的地下党组织吸收了917人入党^④。这些地下党的基层组织 and 党小组从事游击队的组建工作，对法西斯当局的命令进行暗中抵制，在居民中开展政治活动，配合前线对德军

① [苏] Н. Г. 安德罗尼科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4卷（下册），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俄语翻译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第639页。

② Н. Якубовский. Помощь советского тыла партизанам [материаль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обеспечение] минск. 1973. с. 92.

③ Герои подполья. О борьбе советских патриотов в тылу немецко-фашистских захватчиков в годы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Москва. 1972. соб. 1 с. 296.

④ Во главе защиты Советской Родины. Очерк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КПСС в годы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Москва. 1975. с. 178.

的作战。

在卫国战争后期，随着苏联国土的收复，党组织转入公开状态，地下党组织的数量逐渐减少，但总数仍相当大，因为新的党组织也在不断建立。

（二）领导敌后游击战争，发展党员

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是敌后游击战的主体。在战争爆发后最初一段时间里，敌后的党员和共青团员多半以自发形式从事对敌斗争。随着沦陷区地下党组织逐步建立，有组织的游击战争成为敌后斗争的主要形式。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游击队数量不断增加。到1941年底，在敌占区活动的游击队共有2000多支，总数有9万多人^①。1942年春夏时节，在敌后游击队中，党员成分占游击队总人数的15%~20%^②，党员是一支组织和动员力量，他们将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与敌人战斗。

一方面，地下党的基层组织组织游击队员进行大规模的破坏活动，破坏机车车库、机器制造厂，使敌人无法利用那些设施。在奥廖尔州，由于党和共青团地下工作者的组织，当地居民在劳动中故意怠工，并且也像游击队员一样去破坏敌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设施，如破坏机车、车辆和车库等，使敌人不能使用。戈梅利火车站的车场就由于多次遭到破坏和怠工，1942年春几乎陷于瘫痪。明斯克铁路总局报告说：“开往前线方面的火车在戈梅利平均要耽搁40~50小时，并且几乎有半数的机车还未到达指定车站就得返回。”^③在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车站的机务段，以共产党员阿尼申科为首的地下小组把51台机车的烟道管用炉渣堵住，将19台机车的轴箱塞满沙子，对86台机车的轴承胡乱浇灌巴比特合金，把很多机车上的空气泵和水泵都弄坏^④。在从事这些地下活动时，往往会遭受损失，有人员上的伤亡，但在德军占领地区，这样的活动从

①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т. 5. первый.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70. сс. 260, 264.

② [苏]莫罗佐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5卷，吴文智、朱蕴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第496~497页。

③ [苏]Н. Г. 安德罗尼科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4卷（下册），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俄语翻译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第621页。

④ Днепропетровская область в годы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1 - 1945 гг.)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и материалы. Днепропетровск. 1962. с. 87.

未停止过。

另一方面，地下党领导游击队战士对敌人进行伏击，袭击敌人守备部队，破坏铁路，炸毁桥梁，消灭叛徒，侦察敌情，配合苏军的行动。随着游击队活动范围的扩大，敌后游击队数量也在增加。例如，在敌后第4突击集团军地带，1942年3月只有14支游击队，500多人，到当年夏已有7个游击旅、2个团和7个独立支队在那里活动，游击队人数增加了14倍，几乎达到7500人^①。据不完全统计，到1943年底，游击队员已增加到25万人，比一年前增加了1倍以上。

地下党组织注意在游击队中发展党员，使游击队中党员人数不断扩大。例如，乌克兰游击队到1943年底时已发展党员4600人；白俄罗斯到1943年8月入党的有3600多人；奥廖尔州和斯摩棱斯克州到1943年10月发展党员3000人；列宁格勒州到1943年7月发展党员1200人^②。1943年1月5日，联共（布）决定在游击队中恢复政委制，享有与指挥员同等权力的政治委员在游击队中发挥了出色的作用。当苏军进入反攻时期，在靠近前线的地方，游击队与苏联红军的配合，在红军的反攻中发挥了辅助作用。

（三）进行宣传活 动

此外，党的基层组织还在上级党委领导下，率领广大党员和共青团员从事敌后的宣传工作。他们刊印报纸、传单、小册子、宣言，尽可能经常、及时地向敌占区的游击队员和居民报道前线战争的进程，使他们增强战胜法西斯的信心，为他们指出同占领者斗争的有效方法和途径，揭露敌人宣传中的谎言。从1941年8月起，苏军总政治部用俄文、乌克兰文及白俄罗斯文发行大量传单，报道国内和前线发生的事件。在敌占区，这些宣传品主要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党员和共青团员发送出去。1943年一年内，乌克兰敌占区的游击队和居民得到了220万份俄文和乌克兰文的报纸，5~8月，运往白俄罗斯的《真理报》《消息报》《红星报》和其他报纸即达92.7万份，还有232.9万份传单。地下党还自主发

^① [苏] H. Г. 安德罗尼科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4卷（下册），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俄语翻译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第603页。

^② [苏] 索洛维约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7卷（下册），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第43页。

行刊物。1942年5~11月，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指挥部出版的报纸就达50多种，还有大量的传单；白俄罗斯的地下工作者在1943年出版了140种发行量相当可观的报纸^①。

在可能的情况下，地下党组织还召集有报告和演讲的集会、座谈会，在群众中开展宣传活动。例如，以伏罗希洛夫名字命名的第一支游击队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从1942年1月底到5月，在库尔斯克州、奥廖尔州、契尔尼哥夫州和苏梅州的居民点先后召开集会和群众大会，参加者共达20余万人^②。截至1942年3月底，维贴布斯克州的游击队员仅在德里萨区、罗索内区、波洛茨克区和乌沙契区就举行了1104次座谈会^③。

除此之外，地下党的基层组织还按照上级党委的要求，进行一些临时性的工作，支援前线。1941年9月，联共（布）中央决定在全国居民中为前线军人募集寒衣和内衣，基层党组织在群众中开展了广泛的宣传工作，与共青团和工会共同领导这项工作，保证了作战军队的战士在当年冬天得到了寒衣和靴鞋。

在党的各级组织领导下，基层党组织在敌占区的居民和游击队中进行了广泛的军事和政治工作，对游击队的战略准备进行指导，提高战士的战斗力和士气，以游击战方式打击敌人，向军民阐明战争的目的和性质，介绍国内外形势，使他们树立起战胜敌人的坚强信心。

五 基层党组织是后方生产活动的主要组织者

在卫国战争中，苏联的工业生产，尤其是军工企业的生产，一直保持在保证前线需要的水平上。苏联进行的这场保卫祖国的战争，一方面是人的较量，另一方面也是生产能力、军队物资保障的较量。共产党是后方生产活动的领导者，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在生产劳动中起到了组织者和劳动带头人的作用。

① [苏] 索洛维约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7卷（下册），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第131页。

② [苏] H. Г. 安德罗尼科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4卷（下册），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俄语翻译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第606页。

③ 数字参见 [苏] H. Г. 安德罗尼科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4卷（下册），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俄语翻译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第606页。

（一）基层党组织是工业企业搬迁及建立东部工业生产基地的主要组织者

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初，根据敌人迅速占领苏联西部地区的情况，苏共中央委员会重新分配了国家的资源和后备力量，决定将大企业转移到后方，在后方建立国家主要军事基地。这项工作由以什维尔尼克为主席的疏散委员会领导。这是大量机器设备、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从西向东的一次史无前例的迁移。由于战场形势严峻，几乎必须在同一时间里把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克里米亚等地区以及中部地区的大工业企业疏散到东部，实为一项规模巨大的工程。一位州委书记曾在后来回忆道：“要拆掉这些工厂并把机床和各种设备装上火车，我们只有很少几天时间了。”^① 鉴于时间紧迫，任务繁重，工厂企业的党组织做了大量组织工作，以保证搬迁有条不紊地进行。工厂党委和车间主任、党组织书记积极参与，在有计划和按次序安排的情况下，疏散工作有条不紊，没有出现慌张忙乱现象。在一些工厂中，“所有的设备，连一颗螺钉和螺帽都装上及时开到的平车上”。从6月底开始，满载货物和人群的列车源源不断地驶向东方，仅7~11月就从临近前线的地区搬迁了1523个企业，其中包括1360个大型企业，主要是军工企业^②。

由于搬迁时原工厂企业的工人、工程师、技术员只有不到一半随同企业一道转移，故东部地区的党、苏维埃、工会、共青团组织积极参加，将有劳动能力的居民也动员投入新厂建设，他们克服诸多困难，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运来的工业设备安置好，并投入生产。东部的建设工程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进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一个建筑工程，在30天内建成了1.2万平方米工业面积；在车里雅宾斯克州，一座生产面积为6.1万平方米的工厂只用半个月时间就投入生产^③。在阿尔泰边疆区鲁波佐夫斯克市，利用哈尔科夫拖拉机制造厂撤退到这里的设备，1942年开始建设一座大型拖拉机制造厂，在第一批车间奠基后仅8个月就开始出产

① 这是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前州委书记格鲁谢沃伊的回忆。参见 К. Грушевой. Тогда в сорок первом... Москва. 1972. с. 38。

② Н.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 Воен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СССР в период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Москва. 1948. с. 41.

③ К. Климинко. Уральский 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район. Москва. 1945. с. 30.

拖拉机。1944年初，这个工厂已经为农业和军队生产出1000多台拖拉机^①。就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建立起了重工业生产基地。生产力迁至大后方，工业转入战时轨道，使东部地区变成了国家的主要兵工厂。到1942年3月，东部地区军工产品的产量已达到战争开始前全国的生产水平，成为苏联陆海军的大兵工厂。

在战时情况下，将大工业企业在短时间内迅速搬迁，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这次搬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改变了德军在兵器生产技术方面所占的优势，进而使苏联军用产品的产量大大超过德国。一位苏联领导人认为，这场生产力的转移使东部各州、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经历了一场真正的工业革命。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考验中，党和苏维埃的干部及技术人员向全世界显示了自己的高度组织能力^②。就这样，在战争年代，党调动起人民千百倍的创造精神和主动精神，迅速地把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等部门的一切潜力和资源都利用起来。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则是这种创造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参加者。

（二）在后方生产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带头完成高定额，基层党组织领导开展以节约能源和原材料、提高质量为目的的社会主义竞赛

战争初期，党发出号召“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后方党员群众以此作为自己的劳动宗旨。从战争爆发的头几天起，后方各工厂就开展了“200%生产者运动”^③。这个运动是由高尔基市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共青团员们发起的。不久之后，许多工人通过革新工作方法和技术而将定额完成到3~5个，甚至达到10个或更多^④。共产党员广泛参与了这项活动并加以推广，使之很快成为群众性运动。在莫斯科保卫战期间，高尔基市莫洛托夫汽车工厂完成了15个定额的钳工、共青团员

① Составитель Ю. В. Плотников. В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1941 – 1945: Словарь-справочник Москва. 1985. с. 28.

② 这是加里宁的话。参见 М. Калинин. Вопросы советск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Москва. 1958. с. 672.

③ 指在生产工作中，每天完成两个定额的工作量：一个为自己生产，另一个为上前线的同志生产。

④ 情况可参见 Н. Шатагин.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вдохновитель и организатор побед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Москва. 1955.

瓦西里·舒宾创立了第一个共青团员—青年前线工作队。这个前线工作队完成的计划都不少于200%^①。这一创举很快得到国内许多企业中共青团员的响应。1942年初，莫斯科汽车制造厂职工呼吁开展社会主义竞赛，纪念苏联陆军和海军建军24周年。这次竞赛由工厂共产党员发起，职工们决定到节日前在计划之外超额生产3个师用的武器^②。1942年春，各生产部门广泛开展了超产和提前完成前线订货的竞赛活动，并推动了社会主义竞赛的展开。

在国家面临严重困难的情况下，苏联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周围，群众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与日俱增。1942年5月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同意了库兹涅茨克冶金工作者的爱国倡议，决定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竞赛。最初竞赛主要在苏联航空工业、坦克和冶金工业等部门中展开，先进工人提出倡议，争取最好地完成前线订货，发掘内部潜力，节约原材料，降低成本。竞赛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工业中劳动生产率一年就增长了19%^③。1943年，为保证前线物资供应，社会主义竞赛在苏联国民经济各个生产部门广泛开展^④。1943年初，工业、建筑、运输部门有77.6%的工人参加了竞赛，到年底时就增加到了82.1%^⑤。全苏社会主义竞赛成了发挥群众创造性和积极性的强大动力，打开了生产的补充源泉。

在一些重大战役进行之时，后方工厂中的工人加班加点生产，以配合前线作战。1943年7月17日，正当库尔斯克会战激烈进行的时候，莫斯科“狄纳莫”工厂的全体职工呼吁工业和运输业的职工更广泛地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做出应有的成绩来迎接十月革命26周年，提前完成年度生产计划。这年秋冬时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和库兹涅茨克等地的冶金

① Н. Шатагин.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вдохновитель и организатор побед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Москва. 1955. с. 41.

②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Москов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КПСС. Москва. 1966. с. 588.

③ [苏]莫罗佐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5卷，吴文智、朱蕴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第527页。

④ 在战争时期，苏联在农业生产中也开展了社会主义竞赛活动，对保证国家粮食和工业原料的供应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个问题将在有关苏联农业中的基层组织的部分另行论述，在这里就不再提及。

⑤ Профсоюзы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в четырёх томах. Москва. 1963 т. 3. с. 372.

工业职工也组织了超额完成国家任务、改进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竞赛活动。

在战争后期，为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指标，各地都在努力节约原料、燃料、电力和材料，降低产品成本。在冶金行业，一大批新的车间集体、炼钢工人、轧钢工人、动力工程师、运输工人等在社会主义竞赛中成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或突击手。仅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联合企业，从1944年1月1日到1945年1月1日，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和突击手就从1.1万人增加到1.54万人；在库兹涅茨克从0.93万人增加到1.68万人^①。

在铁路运输部门，以加快车皮周转率为主要内容的劳动竞赛也在展开。铁路工人既要保证运往前线的武器装备和人员顺利通行，还肩负着日益增长的国民经济运输任务。在西南部、西部和其他地区的铁路线上，许多司机以图拉省机车司机科罗勃科夫为榜样，用低质煤开重载列车，准点并经常超前完成列车运行任务，节约了大量燃料^②。

1945年初，苏联的国际地位巩固。由于共产党巨大的组织、思想工作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全国的军事经济潜力有了很大的增强。苏联人民忘我劳动，使工业、交通运输业、农业和科学技术发展取得很大成就。1944年工业品的生产比1943年增长了15.3%，比1940年的水平提高了4%。新电站的建设和发电厂的增加使电力生产提高了21.4%。战争期间军事工业的发展，使钢铁生产也有增加。1944年钢产量比1943年增长了28.5%，生铁增长了30.5%，钢材产量增长了28.4%。在这个时期，民用产品生产也有所增加^③。

战争年代的农业尽管困难极大，但到1944年农业产量已停止下降，粮食总收成达到4910万吨。与1943年比较，牲畜头数也有增加。虽然劳动力缺乏、技术不高，但苏联的农业还是保证了前线和后方的粮食供应，保证了工业的原料供应。

社会主义竞赛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方

① 数字参见〔苏〕Н. И. 舍霍夫佐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10卷，蒋妙瑞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704页。

② 情况参见Г. Куманев. На службе фронта и.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ый транспорт СССР накануне и в годы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938 - 1945. Москва. 1976. сс. 295, 324。

③ 数字参见〔苏〕Н. И. 舍霍夫佐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10卷，蒋妙瑞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13页。

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党的领导下，工业部门、运输部门、农业部门和军事工业部门的工作都有很大改进。这些部门在劳动力十分缺乏的情况下，通过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完成或超额完成了生产计划，保证了战时的军事供应与战争后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增长。党始终是群众劳动竞赛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党组织、生产部门、工会、共青团组织互相协调，在生产中宣传和推广先进工作队的经验与做法，把成千上万的城乡劳动者吸引到劳动竞赛中来。

案例 1-2 卫国战争后期经济恢复工作中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

1941年8月，德国侵略军占领了乌克兰，乌克兰最大的第涅伯罗捷尔任斯基冶金工厂被迫停止了建设步伐。工厂中的冶炼工人多数都到了前线。德国占领军企图恢复工厂的建设与生产，但由于地下党组织领导的破坏活动，使得生产难以进行。德国派驻当地的官员施门特给柏林的上司写信说：“工厂没有可能恢复起来，因为当地工人不予合作，他们激烈地反对我们。”“这确实是一个大工厂，但我们不能使它恢复原来的生产能力。我们在几个月中只生产80辆轻便马车、1500把锉刀、8万块钢轨的连接板……”

1943年10月25日，在被占领两年两个月后，第涅伯罗捷尔任斯克市解放了。工厂需要重建，但当时工厂中党员数量很少。第一次工厂党员大会只有6名党员参加：厂长H.M.弗明科、总工程师Ф.С.达兰诺夫、工程师H.H.尼基金科和Я.И.勃列日涅夫、高炉车间工长A.K.菲力波夫、工厂党组织书记H.И.哈雷宾娜。但很快，党员队伍得到充实，到1944年1月，工厂党员数量已达270人，有26个车间党小组。

工厂党组织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有经验的干部严重不足。在战前工厂中有70%是经受锻炼的工人，现在刚好相反，有70%是不懂专业技术、没有经验的年轻人。针对这种情况，工厂党组织将老工人组织起来，与年轻人进行座谈，到他们住的地方给他们讲解专业技能，教育他们热爱冶金工作。党组织还派出党员，到农村去，把战争中逃到农村的有经验的工人召集回来，参加工厂的重建。

工厂党组织还组织技术培训部对新工人进行专业技术培训，在一年多时间里对几千名工人进行各专业的培训。在乌克兰共和国的物资援助以及工厂领导和工人的多方努力下，工厂很快投入生产，为战争后期各地恢复建设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冶金制品。工厂党组织还在各车间组织劳动竞赛，一些共产党员在劳动竞赛中表现出色，并以自己的行动影响年轻人。

这样，工厂战胜了战时的各种困难：党员干部不足、缺乏原材料、电能和其他能源不足等，在苏共中央和乌克兰共和国党的领导下，战争后期工厂生产出大量冶金和机器产品。共产党员在恢复生产过程中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出现了奥列什金、德米特里科夫、菲力波夫、卡尔马金等先进人物。党和政府对在生产中做出重要贡献的工人进行了表彰，有 2785 人由于忘我劳动获得了 1941 ~ 1945 年伟大卫国战争奖牌。

这个工厂党组织的活动几乎折射出战争期间许多工厂党组织的情况：战争开始后很多党员到前线参加保卫祖国的战斗，不能到前线的，就在后方参加抵抗德国占领军的斗争。他们破坏工厂设施，使占领当局不能利用当地的工厂设备组织生产，也就不能为德军提供作战物资。当德军被赶走，工厂党组织克服重重困难，扩大党员队伍，培训熟练工人，解决技术、原料、能源、电力等方面的问题，使工厂生产迅速走上正轨。在生产活动中，基层党组织还开展劳动竞赛，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生产，为前线军队和原被占领地区恢复经济提供更多的产品。

资料来源：参见 С. К. Скоробогатов. Авангардная роль коммунистов в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и Днепродзержинского завода имени Дзержинского (октябрь 1943 - 1945 гг.)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периода Ви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Кие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61. с с. 178 - 183。

这些都是战时和战争结束后初期党组织所做的具体工作。仅由 6 名党员发展为几百名党员，不是用口号就能做到的。第涅伯罗捷尔任斯基冶金工厂党组织发挥每一名党员的模范作用，调动起所有工人的爱国主

义劳动热情，为工厂重建和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战争时期后方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发挥创造力，以忘我精神进行生产活动的反映。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基层党组织是工厂生产的重要组织者，共产党员是生产劳动的骨干。

本章小结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先锋队： 不可忘却的历史

在苏联 70 多年历史上，有过两次大的保卫国家的战争。第一次是 1918 ~ 1920 年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武装的战争。当时，苏维埃国家千疮百孔，满目疮痍，前线军人英勇战斗，后方党员与群众用自己最大的力量支援前线。在后方，党之所以能够调动起全民力量，靠的是宣传和鼓动工作。在前线，政治委员作为党和苏维埃政权在红军中的代表，作为布尔什维主义精神、党的铁的纪律、党在争取革命事业胜利斗争中的勇敢无畏精神的体现者，把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团结在自己周围，用自己的榜样和威信鼓舞群众，带领他们去同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战斗。列宁曾肯定地说：“没有政治委员，我们就没有红军。”^① 1918 年 4 月 6 日公布的第一个政治委员条例中规定：“政治委员是苏维埃政权在军队中的直接政治代表。他的职位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应该任命那些无可指责的、能够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忠于革命职守的革命者担任政治委员。”^② 政治委员起到的是党的宣传员的作用。

第二次则是伟大卫国战争。这时，苏维埃国家已经开展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国家的经济能力与军事实力都远远超出于苏维埃国家初建之时，但要与几乎拥有整个欧洲大陆的全部生产能力与军事实力的法西斯德国较量，除去国家实力等物质因素外，还依靠全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强而有力的组织系统，这个组织系统的基础就是基层党组织。1931 ~ 1934 年，苏联共产党就对党支部进行调整，从扩大市党委会权力到以基层党组织作为党的基层组织单位，基层党组织在社会主义工业化

^① 《列宁全集》第 39 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 140 页。

^② 苏联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编《苏联武装力量（建设史）》，《苏联武装力量》翻译组译，战士出版社，1981，第 34 页。

建设和实行农业集体化^①的过程中发挥了组织、宣传和带头作用，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正是这个完整的组织体系，在大战之初，领导着前线士兵尽其所能地进行顽强抵抗，有序地组织工人将国家主要工业生产部门转移到后方，并迅速地在西伯利亚和中亚建立起了新的工业生产基地。

正如国内战争时期到前线的共产党员随身携带的“党员基本义务简明手册”上所写的那样：“随时随地，完成重要任务时，你都应当冲锋在前，撤退在后。”^②在卫国战争作战前线，共产党员是向敌人进攻的主力；在战斗将开始时，在党和国家处于最危险的时刻，都有大批军人加入党的队伍；在战斗中牺牲的共产党员的口袋中，经常可以看见被鲜血染红的党证；在敌人后方，地下党组织领导共青团员进行着敌后游击战争，给德国占领军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在未被占领的地方，党组织领导党员与群众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一个人完成几个人的工作定额，加班加点地生产，尽早为前线提供武器与弹药……苏联人民能够取得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物质的因素——战前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尤其是欧洲战争开始后加紧军备生产，为战争提供了物质保证；也有精神的因素，即全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战胜敌人的坚强信心；还有外来因素，即反法西斯同盟各国的道义与物质援助，这些因素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对于这个国家自身而言，在战时有一个强大而又灵活的组织系统，把所有人力与物力都调动起来，是不可或缺的内部因素，基层党组织在这个体系中是一个最广泛而又最关键的环节。战争时期基层党组织有秩序地进行的工作，看起来不一定是很活跃或充满创造力的，但它能使党员按照党的要求按部就班地运转，这正是党的生命力所在。

因此，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所起到的是国家的保卫者、社会主义制度的捍卫者的作用。基层党组织是党的战时政策和组织工作的执行者，将党的策略和方法落实到具体战斗活动中；基层党组织还是党的宣传者，在群众中做宣传鼓动工作，坚定人们的必胜信念；基层党组织又是战时生产的组织者和参加者，战时工农业生产的组织、

^① 苏联共产党基层党组织在农业集体化中的作用将在后文中专门论述。

^② 《苏联武装力量的党政工作》（苏联高级军事—政治院校教材），谢力译，战士出版社，1982，第147页。

前线军备供应等一系列经济活动都要依靠基层党组织来进行。

战争期间，有 500 多万人加入苏联共产党，其中，苏联军队中吸收 378.8 万名军官和士兵为预备党员，237.6 万名军官和士兵为正式党员。战争结束时，一半以上的共产党员在苏联军队中，在苏共授予的全部“苏联英雄”中，几乎有 3/4 是共产党员。由于战争结束，军人大批复员，军队中的党员所占比例又恢复到战前的 15% 左右，也就是说，战争结束后，有约 250 万名党员随着复员大军回到了地方，充实到工农业生产第一线，尤其是农村中。这些经过战争洗礼的共产党员在战后苏联经济的恢复与建设中，继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除了具体的军事、政治、经济、组织工作外，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党员和共青团员在战争中还创造了数不胜数的英雄形象，感染并教育着所有热爱和平的人。在前线，那些英勇顽强抗击敌人的战斗英雄的感人事迹，后方游击队中，诸如卓娅和舒拉姐弟的故事，著名的青年近卫军^①，从实际人物到文学作品，曾经感染着一代又一代苏联青年，教育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为祖国献身。这些英雄不仅属于苏联历史，也属于全人类历史。就此意义可以说，苏联共产党和人民所进行的保卫祖国的战争，留下了不朽的精神财富，这种精神财富将永远是苏联历史中值得骄傲的内容。

^① 青年近卫军（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是卫国战争时期在德军占领的伏罗希洛夫格勒州克拉斯诺顿市活动的地下共青团组织。在以 Ф. П. 柳季科夫为首的地下党的领导下成立了“青年近卫军”。1942 年 7 月 20 日克拉斯诺顿被德军占领后，在市区和城郊出现了一些反法西斯青年小组。其领导人有 И. А. 泽姆努霍夫、О. В. 科舍沃伊等。这些小组组成了地下组织——青年近卫军，共约有 100 名成员，其中有 20 名共产党员。青年近卫军成员不畏德国占领军的血腥镇压，在整个克拉斯诺顿地区建立了战斗小组和基层支部网。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他们散发了 30 种不同名称的共 5000 份反法西斯传单，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周年前夕，在市区和郊区升起 8 面红旗，救出 90 余名被关押在集中营和医院里的苏军战士，放火烧毁存有准备运往德国从事苦力的苏联人名单的职业介绍所，从而挽救了近 2000 名当地居民，还烧毁德军运输人员和弹药的汽车等。后由于出现叛徒，青年近卫军成员多半被捕，在经受酷刑后牺牲了。只有极少数一部分成员逃脱了追捕。战争结束后，大部分近卫军成员被追授了英雄奖章。著名作家 А. А. 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生动再现了这些地下英雄们的事迹。20 世纪 60 ~ 70 年代，在他们牺牲的地方，一些城市 and 居民点以及建筑都以青年近卫军战士的名字命名，以纪念那些英雄。

第二章 从苏共 20 大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 基层党组织建设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前，在苏联社会政治生活中，基层党组织所进行的宣传以及广大党员从党的会议、文件以及各种宣传品、文学艺术作品中所获得的有关党和国家政策的内容多是正面的、积极的。在苏联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的几十年间，党员群众所能接触到的思想文化宣传内容中，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都是高大而令人敬仰的，是值得所有党员群众学习的光辉榜样。有关列宁、斯大林、捷尔任斯基等革命家的事迹、个人传记、回忆录、小册子、画册是政治宣传和文学艺术作品的重要内容，他们的事迹以及在国内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伟大卫国战争时期中出现的典型人物，如 20 年代的奥斯特洛夫斯基、恰巴耶夫，30 年代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战争年代的卓娅和舒拉等形象，是苏联政治文化宣传的主题，尤其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和战争结束后对斯大林个人形象的宣传，更是深入苏联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可以说，在 50 年代中期以前，在广大党员群众心目中，列宁、斯大林等党和国家领导者的形象是伟大而英明的、完美无缺的，党和政府制定的政策永远是对的，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制度，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的未来充满希望。

苏共 20 大首次改变了党的代表大会只做正面宣传的习惯做法。虽然在这次大会的公开讲话与大会通过的公开决议中，没有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直接批判，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却揭开了批判斯大林的序幕。该报告对斯大林对“大清洗”应负的责任，他对伟大卫国战争初期苏联军队所受损失负有的责任等情况的揭露，不仅使当时听到报告的党员震惊，也在不久之后的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产生了巨大反响。人们开始对苏联共产党的宣传、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以及党的政策产生怀疑，在苏联共产党几十年间政治宣传形成的统一声音中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1961 年的苏共 22 大又进一步做出决定，将斯大林遗体从列宁墓中

迁出，继而在苏联掀起了非斯大林化运动，广大党员的思想再一次受到震荡。

苏共 20 大和 22 大不仅因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给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带来的变化，两次会议还提出了一些新概念、新政策，如“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概念，以及对西方的“三和政策”等。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前后苏联文学思想界出现了“解冻思潮”，60~70 年代又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苏联思想界除党的正面宣传外，出现了另外一股社会思潮。虽然这种思潮不能给党的形象带来致命影响，但说明几十年间形成的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内容已不再是“铁板一块”。

基于上述原因，苏共 20 大后基层党组织工作面临着复杂的内外形势，虽然党员数量逐年上升，甚至上升很快，党组织体系也比较健全，但党员思想却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基层党组织工作也更加复杂化。因此，对于基层党组织建设而言，苏共 20 大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点。

第一节 苏共 20 大给苏联社会政治生活带来重大变化

苏共 20 大在苏联共产党的建设历程中是一次转折，虽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改革，也不是像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的那种急剧转变，但确实具有标志性影响。赫鲁晓夫在苏共 20 大上所做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个人迷信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批判，在社会上引发了思想波动，既带来一定程度的思想解放，也带来了一些混乱。从基层组织角度看，苏共 20 大给基层组织带来了一些鲜活气息，党内政治生活开始趋向于正常。但是，党员的组织观念出现了较大变化，人们可以对一些问题有自己的思考，同时对党的方针与政策产生怀疑。思想上的初步混乱与组织上的稍有松弛，使得 20 大以后的苏共具有与以前不十分一致的工作作风与思想状态。

一 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从苏共 20 大到 22 大

1956 年 2 月 14~25 日，苏联共产党举行了第 20 次代表大会。在苏共 20 大的最后一天，赫鲁晓夫做了题为《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

密报告，因公开批判斯大林而轰动世界，并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引起诸多的猜测和争议。

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之前，马林科夫等苏共领导人在报告中就提到了个人迷信问题，但没有人公开指责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赫鲁晓夫在苏共 20 大的最后一天，做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了公开指责和批判。他主要从斯大林破坏集体领导原则、滥用职权；破坏法制，在“大清洗”中制造了许多冤案；其独断专行导致苏联在卫国战争之初遭受重大损失；在卫国战争中破坏党的民族政策等方面进行了指责。报告特别谴责了斯大林违反法制、个人专断以及过分地颂扬自己。赫鲁晓夫还指出，造成个人迷信种种后果的原因是斯大林在个人品质方面的多疑、粗暴、专横等因素^①。

一方面，赫鲁晓夫的报告用激烈的言辞指责斯大林，如说斯大林专断，破坏列宁的集体领导原则：“党就是我”，“国家就是我”，“他掌握不受制约的无限的绝对权力”。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强迫国家安全部门大肆违法乱纪，斯大林应对安全保卫机关的工作人员刑讯、拷打承担主要责任；斯大林由于多疑，自己造出了许多“事件”，而在审理这些事件时，他自己就是总检察长，那些保卫人员在斯大林允许下做出许多专横行为，他们根本没有顾忌到党和苏维埃法律的规定。赫鲁晓夫肯定说，斯大林是一个十分多疑的人，他有着病态的多疑^②。另一方面，赫鲁晓夫也承认，斯大林有一些功绩。在报告开始时他指出：“关于斯大林的功绩，在他生前有足够多的书籍、小册子和论著来描述。在筹备和进行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期间，在国内战争期间，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斯大林的作用举世瞩目。”在“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反对右倾投降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的斗争中，“斯大林起到了积极作用”。不过，在说到斯大林的功绩时，赫鲁晓夫一再强调“斯大林得以与苏维埃国家领导人相提并论的多数功绩，并不是斯大林一个人的业绩”，并用“我们的历史性胜利的取得是有赖于党的组织工作，有

^① 实际上，在会议进行期间，赫鲁晓夫已经就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问题做过讲话，并做了补充说明。这个情况在历史档案中有记载。参见 РГАНИ. Ф. 52. Оп. 1. Д. 169. Л. 1 - 63。

^② РГАНИ. Ф. 52. Оп. 1. Д. 169. Л. 5 - 28。

赖于地方党组织”，来“千方百计地贬低斯大林对苏维埃国家成就的贡献”^①。总而言之，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充满了前后矛盾^②。

赫鲁晓夫做的是秘密报告，当时对与会者的身份有严格限制，一些外国共产党代表和苏联记者以及大会工作人员都被通知离开会场，报告开始前还要求与会者不准做记录。会议结束后，这个报告的内容只是在党和共青团的会议上进行了口头传达，这样做的目的是“不给敌人以破坏苏联社会主义根基的机会”^③。不过，会后不久，报告的内容就在苏联全国传开，令所有苏联人震惊，并“像一场海啸一样，在从奥德河（民主德国）到长江（中国）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流传开来，然后传播到世界”^④，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从1956年3月开始，苏联政府通讯机关塔斯社每日收到各类信息几十页到几百页，根据中央要求，向中央各部门负责人、苏联科学院各所级以上领导以及各重要媒体负责人、驻外使领馆负责人通报。在所通报的信息中，记录了各个地方党的机关，尤其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等地方的反应，还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的反应，以及从南北美洲一些国家与英国、瑞士反馈的信息^⑤。西方国家幸灾乐祸，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看成一颗政治原子弹，趁机掀起了一个世界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美国人声称这是“空前未有的合乎我们目的”的行动，表示要利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作为武器来摧毁共产主义运动的威望和影响”^⑥。西方各种媒体发起了强大的反苏反共宣传，把斯大林描绘成“杀人狂”，把社会主义苏联说成一个“巨大的集中营”，甚至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画上了等号。而在南北美洲的“立陶宛民

① Юрий Емельянов, Миф XX съезда. <http://www.thewalls.ru/truth/myth XX.htm> 07.05.2003.

② 进入21世纪前后，一些俄罗斯与西方学者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材料进行了深入研读与考证，揭穿其谎言，澄清事实，如尤里·叶缅里扬诺夫的《苏共20大的神话》。而美国学者格雷弗·弗更是逐条加以辨析，在收集了大量资料以及各种评论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原来，全部指控都是谎言。”参见〔美〕格雷弗·弗《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与赫鲁晓夫的谎言》，马维先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③ Федор Бурлацкий. Сталин и сталинизм: прошлое, которое не уходит. <http://www.ng.ru>, 17.02.2006.

④ Федор Бурлацкий. Сталин и сталинизм: прошлое, которое не уходит. <http://www.ng.ru>, 17.02.2006.

⑤ РГАНИ. Ф. 5. Оп. 33. Д. 8.

⑥ 《共产党的危机》，《纽约时报》1956年6月23日。

族主义分子”则趁机加强自己的各种组织，并利用侨民的生活困难，进行反苏宣传与活动^①。秘密报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对于国外的兄弟党来说，这个秘密报告不啻一种突然袭击，使兄弟党的工作陷入很大的被动。正如毛泽东所说，赫鲁晓夫的报告“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②。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缺乏思想准备、没有事先做好工作的情况下，一下子把盖子揭开，党内外的各种矛盾便在短时间内一齐暴露出来，导致东欧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程度不同的政局动荡。震惊世界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在苏联国内，尤其是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出现了一些抗议活动。格鲁吉亚等地的抗议活动，以及波兰和匈牙利政治危机等事件的出现，使得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调子不得不降低。在几个月后的 1956 年 6 月 30 日，苏共中央发表《关于克服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决议，说明党对个人迷信的批评的实质是要消除这种迷信的有害后果，从而巩固社会主义的阵地，而不是笼统地否定斯大林在党和国家生活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这实际上是对赫鲁晓夫所做的前述“秘密报告”的说明。赫鲁晓夫本人也解释道：“在斯大林同志的活动中我们看到两个方面：一个是肯定的方面，我们支持这一方面并且给予很高的评价；另一个是否定的方面，我们批评、谴责、摒弃这一方面。”^③他甚至在一些场合还承认斯大林是“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不过，到 1957 年，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格·马·马林科夫、拉·莫·卡冈诺维奇和维·米·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认为反党集团犯了“力图反对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和平共处”“反对民主集中制”等错误，对“反党集团”成员做出撤销中央委员资格等处理。实际上，这个“反党集团”成员主要的错误还在于，他们“反对党采取消除个人迷信的后果的措施”，换言之，他们阻碍了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随着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被撤职，苏共中央内部批判斯大林的

① РГАНИ. Ф. 5. Оп. 33. Д. 8. Л. 15.

② 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第 4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 496 页。

③ правда. 28 августа. 1957.

阻力越来越小。

1961年10月，苏共22大再次批判斯大林，做出《关于弗拉基米尔·列宁墓的决定》，提出将斯大林的遗体移出列宁墓，并在会后就落实。次年，《真理报》发表文章指出，由斯大林亲自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浸透着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此后，在苏联官方报刊上，在赫鲁晓夫的讲话中，对斯大林的批判尖锐起来，基本的调子仍然是把问题归结为个人品质。各地方以斯大林命名的地名、城市、街道等都改换了名字，斯大林的画像也被从宣传栏以及办公场所撤下。就这样，在苏联掀起了一场“非斯大林化”运动，对斯大林的批判进入高潮。

在基层党的工作上，从苏共20大到22大，苏共在对待斯大林这位前领导人的态度上反复变化，既说明当时党的领导人在思想路线上的多变与不定，也给各级党组织的宣传工作带来混乱。尽管赫鲁晓夫的报告带来了自由气息，报告者一再强调发扬党内民主，但这种突然揭开的内幕与突然而至的“民主”在一段时间内令党的各级组织宣传工作者不知怎样做，只能根据“上边”的要求行事，并且在思想与行动上尽量与“上边”保持一致，这实际上限制了他们工作的灵活性与创造力。

二 “全民国家”“全民党”理论的提出

继20大后，赫鲁晓夫在苏共22大上又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理论。在苏共22大上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①中提出：“由于剥削阶级被消灭，镇压它们反抗的职能也就消亡了。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的全民组织的过程开始了。”“从国内发展的任务来看，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产生的国家，在新的阶段即现在阶段已变为全民的国家，变为表达全体人民的

^① 1961年10月31日苏共22大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的导言中指出，在1903年7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2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第一个布尔什维克党纲领，目标是推翻沙皇专制和资产阶级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1919年布尔什维克党第8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第二个纲领，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苏共22大通过的这个纲领是党的第三个纲领，规定党的任务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并对当时社会各阶层情况、党和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参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第163~165页。

利益和意志的机构。”“在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过程中，国家机关将逐渐变成社会自治机关。”^①也就是说，由于剥削阶级被消灭，国家已由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转变为全民的，国家机关的职能也由管理机构变为社会自治机构，这就是“全民国家”理论的主要内涵。在“全民国家”理论基础上，《苏联共产党纲领》还提出“全民党”概念：“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由于苏维埃社会的一致加强，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了全体人民的党，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扩大了自己的指导作用。”由此，苏共 22 大通过的党章强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苏联消灭了剥削阶级，形成并巩固了苏维埃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社会主义完全地和最终地胜利了。共产党，工人阶级的党，现在成了全体苏联人民的党。”^②这些都意味着，苏共已经“成为全民政治组织”^③。

“两全”理论的提出，在当时对于克服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发扬党内民主、纠正阶级斗争扩大化以及“大清洗”的错误无疑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也是赫鲁晓夫从做 20 大秘密报告开始就抱有的主观愿望。但是，从理论依据来看，这个理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家都是具有阶级性的，没有超阶级的国家，更不可能有“全民的”国家。同样，在阶级社会中，政党都是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党派，没有也不可能囊括所有社会各阶级的政党，即反映全部社会阶层要求的、超阶级的政党^④。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建立的党，是由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深刻了解、愿意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先进分子组成的，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最根本的条件是保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才能带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第 245～246 页。

②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第 275、449 页。

③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第 275 页。

④ 赫鲁晓夫的“两全”理论充满矛盾，并不切实际，连西方人也看到（“全民国家”理论）“是违反传统的共产主义观念的，（因为）按照共产主义观念，每个国家都是一种专政”。参见〔西德〕瓦根莱纳《没有前途的共产主义——苏联共产党新纲领评注》，吴康等译，商务印书馆，1964，第 80 页。在《苏联兴亡史纲》一书中，对“两全”理论从内容到实质及消极影响做了比较细致的分析，本书写作从中受到启发和提示。详细内容参见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 381～387 页。

领全体民众夺取对资产阶级最后的胜利。这个理论的实质是混淆阶级界限，否认在苏联还存在阶级斗争，加上他在对外政策中提出的“三和路线”，导致苏共放松了对西方颠覆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活动的警惕。它在当时苏联国内外仍然面临尖锐复杂的斗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阶级斗争性质的情况下，过早宣布阶级斗争熄灭，过早宣布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这就在思想上解除了共产党的武装。

在赫鲁晓夫“全民党”纲领的影响下，在苏联社会、苏共党内出现了一批所谓“苏共二十大的儿女”，他们全盘接受了赫鲁晓夫的“全民党”“全民国家”理论，最终成为苏联共产党的掘墓人。1990年7月2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向28大提出的政治报告中提出：“我们的党是个改革的党，因而今天的苏共是一个全民的政治组织。”^①他还明确指出，这个提法和赫鲁晓夫“全民党”有直接联系：“当然，说我们的党是全民党是再简单不过了，这在1961年的纲领中已作了说明。”从整个苏联历史来看，“全民党”的纲领为戈尔巴乔夫彻底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民主化”和“公开性”思潮下，苏共党的先锋队作用一步步丧失殆尽，直至最后失去了执政地位。就此意义来说，这个缺乏理论根据又不符合当时苏联的国情和党情的“两全”理论，对苏联国家和党所起到的作用是弊多利少，甚至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对于基层党组织建设而言，“全民党”因无限扩大党的组织界限，片面强调党的全民性而忽略了其阶级性，从而引发了思想和组织上的混乱。

三 苏共在管理体制上的变动及社会影响

赫鲁晓夫时期不仅在党和国家政策方面提出新理论，还在工农业生产和经济管理体制上实行了一些改革措施。例如，在农业方面大规模垦荒，减轻农业税收，改组直至取消农业拖拉机站，合并集体农庄。在管理体制上他所采取的一个比较大的举措就是在地方按生产原则改组党的组织。1962年苏共中央11月全会认为：“以往的领导国民经济的组织形式……现在已不能更加有计划和具体地管理工农业的各个部门……妨碍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91，第41页。

正确地安排党的干部更好地利用他们的知识和经验。”“必须过渡到自下而上地建立党的领导机关的生产原则。”^①为此，在大多数边疆区和州里建立了两个独立的党组织，一个是统一领导工业、建筑业、运输业等部门的党组织，另一个是统一领导农业以及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部门和机关的党组织；撤销了农村的区委会，代替它们的是生产管理委员会的党委会，位于农村地区的企业的党组织统一由地区性的工业生产系统的党委会实行领导。

这种改组从一开始就造成了混乱，因为在有些地方工农业的管理权限是很难分开的，在客观上还使党、苏维埃和经济机关的权利与义务混淆起来。改组导致一批新的领导机构的产生，一些党委会代替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造成领导工作中的平行重复现象。农村中作为行政和经济单位的区，在党和国家方面被人为地分割开来，使党、苏维埃和经济机关在解决政治和经济任务方面无法同心协力和目标一致地进行活动。虽然改组不涉及基层党组织，但是实际上给工农业基层党组织平添了一些领导机构，导致基层党组织上层出现多头领导，而领导权力不清又导致具体事务中的扯皮和效率低下。在非工农业部门，基层党组织则因不知道应属于哪个权力部门管辖而无所适从，党的领导失去效力。这种没有经过检验而进行的不成功的改组，后来成为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之一。

列宁曾教导过，党采取任何新的步骤都不应过于匆忙，要考虑这项步骤可能带来的各种好处和弊端。探索党和国家领导的新的形式并不意味着要进行无休止的改组。改变已有的管理形式或管理体制，无论是涉及组织机构或党的组织建设的其他方面，都应在生活和实践证明现有形式不能适应新的条件的情况下，经过试验后稳步推行。这种改变不应该由主观愿望决定，而应由客观条件和新的任务决定。在这方面赫鲁晓夫屡次冒进，导致生产管理和党组织体系出现混乱。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勃列日涅夫取代。在赫鲁晓夫下台一个月后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苏共纠正了赫鲁晓夫大规模改组工农业党组织的做法，认为必须恢复按地区和生产原则建立党组织及其领导机关的做法，将州和边疆区的工业党组织与农业党组织合并。1962~1964年，

^① Справочник партийного работника. 1963. четвёртый.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с. 196.

经过改组与合并，再重新恢复，给工农业党组织工作带来诸多混乱，也给基层党组织工作带来许多不应有的麻烦。

从1965年秋起，苏联开始推行将计划经济与物质刺激相结合的“新经济体制”^①。“新经济体制”实行初期对于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起到了一定作用，工厂中的党组织在组织劳动竞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这种经济刺激手段由于计划经济的僵化，也渐渐失去效力。基层党组织工作内容在组织劳动竞赛时逐渐流于形式。

不过，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农业中的党的领导和基层党组织建设与苏联前期相比还是有了一定的成就^②。

1967年，苏共用“发达的社会主义”^③理论取代了“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理论。“发达的社会主义”理论提出，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不是社会关系的新形式，而是社会主义自身发展的新的更高阶段，是社会主义长入共产主义发展道路上的一个特殊阶段。在这个阶段里，苏联社会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从时间来看，成熟和

① 还在1962年9月，苏联哈尔科夫工程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叶·利别尔曼在《真理报》上发表《计划·利润·奖金》一文，对经济改革提出建议，提出将计划与企业利润和奖金结合的管理办法，扩大企业权利。他的建议引发了一场讨论，在赫鲁晓夫支持下，苏联曾在“女布尔什维克”和“灯塔”两家服装企业试验。试验结果还未及推广，赫鲁晓夫就被赶下台。但这种思想在勃列日涅夫之初得到肯定，1965年苏联开始实行“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新体制”的改革。主要内容是扩大企业权利，加强经济核算，以利润提成和奖金等手段提高工人劳动效率。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种新经济体制逐渐退出。参见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63~70页。

② 关于苏联农业基层党组织的情况在后面将有专门论述。

③ 关于“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有苏联学者是这样解释的：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是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社会主义经济原则在经济、社会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生活的各个领域已经得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规律得到更加充分和彻底的体现；开始了从社会主义直接长入共产主义的过程。发达社会主义的特征和标志在于这个新社会的成熟程度已经达到“各种社会关系在社会主义内在固有的集体原则基础上的改造行将完成”（勃列日涅夫语）的阶段。参见〔苏〕A. M. 科瓦廖夫文《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合乎规律的阶段》，载于《苏联问题译丛》编辑部编译《苏联问题译丛》第5辑，三联书店，1980，第189页。还有学者从社会结构上加以分析：1913年，苏联的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8%，到1976年则达到62%。而农民所占比例由75%到低于1/4。1960~1961年，苏联城市人口赶上了农村人口，工人阶级达到了劳动人口的半数。而苏联的理论家正是以此作为苏联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标志。参见《苏联问题译丛》编辑部编译《苏联问题译丛》第6辑，三联书店，1980，第243~244页。

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阶段是“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道路上的一个相当长的发展时期”^①。这个理论肯定苏联仍然是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而不是如“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理论所说的已经进入共产主义时期；社会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已经达到成熟状态，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上，主要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农庄合作社所有制两种；在阶级关系上，不再像赫鲁晓夫的理论那样否定社会各阶级的差别，而是肯定，在苏联仍然存在阶级差别，但是阶级和社会集团在进一步接近，它们之间的本质差别在逐渐消失。同时，社会主义社会统一的全民基础不断加强。当然，在理论基础上还是坚持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理论。虽然“发达的社会主义”理论也不十分符合苏联社会发展实际情况，但与赫鲁晓夫的理论相比还是客观了一些，能够体现出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一定程度上的理性思考。

苏联共产党在一些政策上的转变，从斯大林逝世后的 1953 年就已经开始了，尽管斯大林的逝世在当时令无数人悲痛不已，很多人认为“在这个强有力的领袖之后没有人能够代替得了他”^②，但对斯大林时期一些政策的纠正或改变还是悄悄地开始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以及苏共 22 大后在苏联掀起的“非斯大林化”运动，标志着代表强大的苏联形象的斯大林时代已经过去。苏共 20 大提出的“三和路线”以及后来在 22 大上提出的“两全”理论，都说明苏联的内外政策在发生转向。当然，就实质内容来看，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后来把他赶下台的勃列日涅夫所实行的政治经济政策都没有完全脱离斯大林体制，有些不适当的改革政策反倒给党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带来不小的混乱。

第二节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中期 苏联的社会思潮

20 世纪 50 ~ 80 年代是苏联社会意识形态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

^① 《苏联问题译丛》编辑部编译《苏联问题译丛》第 5 辑，三联书店，1980，第 191 页。

^② 这是一位来自涅尔琴斯克的女售货员 O. Г. 米哈伊洛娃在苏联解体后接受调查时说的话。参见 Ю. В. Аксютин.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строения в СССР (1953 - 1982) . Г. Н. Севостьянова. Россия в XX веке. Реформы и революции. т. 2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2002. с. 340.

个时期中，既有来自上层政治引发的思想波动，如苏共 20 大前后出现的“解冻思潮”、对斯大林个人迷信批判在党员群众中引起的思想震动，也有自下而上对苏联社会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加之西方思想的侵入，宗教政策放松后在思想界引起的多元化状况等，导致这个时期苏联社会思潮波动比较大。而社会思潮的变化给基层党组织在管理、组织、宣传等方面的工作带来复杂性，从而影响到基层党组织工作的效果。

一 苏共 20 大在基层党员群众中引起的波动

苏共 20 大引发的社会思想波动，不仅反映在思想界和苏共领导阶层中，在基层党员群众中也同样引起很大反响。这些反响在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职业或教育程度的人身上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苏联解体后所出现的一些回忆赫鲁晓夫的史学及政论著作中，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在群众中引起的反响做了比较客观的介绍。综合来看，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所讲到的内容，主要有肯定、否定以及态度模糊或不予评论等几种立场。

基层党员和共青团员多是在党和团组织会议上得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当时的直接反应就是“不可能”。一些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党员也不相信斯大林会做出如赫鲁晓夫报告中所讲到的那些事情，他们中的许多人曾不止一次地冒着生命危险，忍受极大的苦难而不改变对党的信念，他们相信斯大林的英明伟大。在这些人的记忆中还保留着卫国战争年代的印象：斯大林的名字在战场上流传，他的话就像命令一样被毫不犹豫地接受；而那些没有经历过“大清洗”，从童年时代就习惯了使用诸如“像列宁一样诚实”“像斯大林一样诚实”“列宁—斯大林的事业”“列宁—斯大林的党”这类词句的年轻人，更不理解昨天还是伟大领袖的人物为什么转眼之间就变成了恶魔一般的反面形象^①。几十年后，一位会计师还回忆道：“斯大林在过去就像我们的父亲一样，我们怎么会相信这一切？”更有人在当时提出“停止赫鲁晓夫作

^① Юрий Емельянов, Миф XX съезда. http://www.thewalls.ru/truth/myth_XX.htm. 07. 05. 2003.

为国务活动家的活动!”根据阿克秀金进行的、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反应的调查,被问询者有 30% 以上相信并赞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说法,有 10% 的被问询者不完全相信或带有怀疑看法,有约 50% 的人不相信也不赞成,有 20% 的人完全不相信也不赞同,有 10% 的人态度模棱两可。从中可见,至少有 50% 的人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否定或不相信的^①。许多人被迫带着内心的伤痛割舍对从前热爱的领袖的感情,而另一些人则对赫鲁晓夫和他的报告表示极度愤慨。在格鲁吉亚,赫鲁晓夫的报告不被接受,并被视为损害了格鲁吉亚人民伟大儿子的形象。在那里发生了捍卫斯大林的群众集会和抗议示威,政府动用武力方才平息。

有一些人则相信赫鲁晓夫的报告^②。一位接受调查的汽车制造厂的工程师 Л. Ю. 勃龙什金认为:“赫鲁晓夫是正确的,斯大林是国家的耻辱!”另一位冶金研究院的工程师 Е. Н. 杜比宁说:“我的父亲就曾遭到镇压。”当时同样也有亲属被镇压的一位女大学生回忆说,她们班的一些同学将挂在宿舍墙上的斯大林画像扯下来,还刺破了画像上斯大林的眼睛^③。看得出来,那些有亲属被镇压的人多半相信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

另有一部分人则提出疑问:斯大林时代确实存在那些残酷的做法,但赫鲁晓夫为什么不早说?当然,也有人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弄清楚国家政治生活中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事情,这样的人属于少数,而且大多不是共产党员。

由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露与批判同先前人们心中的印象相去甚远,许多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充满信心的基层党员群众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他们面临艰难的选择:相信谁?是赫鲁晓夫还是斯大林?——最终结论则是谁都不可信^④。人们对政治的冷漠,对领导人的不信任,应该说始于赫鲁晓夫的报告。这种情况给基层党组织在思想宣传方面带来

① Ю. В. Аксютин.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строения в СССР (1953 – 1982) . Г. Н. Севостьянова. Россия в XX веке. Реформы и революции. т. 2.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2002. с. 341.

② 在前述阿克秀金的调查中,这个比例占 15%。

③ Г. Н. Севостьянова. Россия в XX веке. Реформы и революции. т. 2 Москва : Наука, 2002. с. 341.

④ Юрий Емельянов, Миф XX съезда. http://www.thewalls.ru/truth/myth_XX.htm. 07. 05. 2003.

混乱。以前，基层党组织只要按照上面的要求进行传达就算完成工作；现在，当基层党员群众要求解释那些疑问与困惑时，就给那些甚至自己都很疑惑的基层干部带来了难题。而从苏共 20 大到 22 大期间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反复，更使党和团的基层干部无所适从，他们的工作开展起来也就极其困难。

当然，也有人肯定苏共 20 大的积极意义。包括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内的一批出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的党员，正是在苏共 20 大的召唤下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在他们眼中，苏共 20 大“就像一个伸张正义的事件一样，能够对许多人的意识产生一时的积极作用。它使人们深信真理能够战胜谬误，善良能够战胜邪恶”^①。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H. A. 雷日科夫曾回忆说，苏共 20 大召开时他只是乌拉尔重型机械制造厂的一名工段长，那时他并没有考虑入党问题。但苏共 20 大召开后，“我第一次听到了党的声音，听到了伟大的党的声音……我认为我与以前相比，显得大不一样了。1956 年 12 月，我被吸收加入苏联共产党”^②。我们可以相信雷日科夫的话，当时不只他一个人有“二十大的号召力相当大”的印象。

可见，就基层党的建设而言，一方面，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及其反复，尤其是赫鲁晓夫过分夸大斯大林的种种错误，给基层党组织的理论研究与宣传工作带来了混乱；另一方面，这个报告又给一些年轻人带来希望，使他们对党和社会主义的未来充满信心，于是，一批年轻人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应该说，多数人还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并且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也应看到，在这些“二十大的儿女”^③中，还包括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等人，他们在后来的苏联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并起

① Юрий Емельянов, Миф XX съезда。http://www.thewalls.ru/truth/myth XX.htm. 07. 05. 2003.

② [苏] 尼古拉·雷日科夫：《背叛的历史——苏联改革秘录》，高洪山、韩生民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第 109 页。

③ 这是阿克秀金的提法。他认为，他们那一时代的人，可以算做“二十大的儿女”。这次代表大会对他们的政治观点的形成，对他们看待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态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后来，这种提法几乎可以指代当时的一代人。参见尤·阿克秀金编《赫鲁晓夫——同时代人的回忆》，李树柏等译，东方出版社，1989，第 27 页。

到了重要作用^①。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他们与那些“保守的”苏共领导人之间产生了冲突，这种冲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不同时代背景下加入苏联共产党的党员之间不同的看法与选择，用中国人最通用的话来说或许应该叫做“代沟”。不过，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最终成为社会主义苏联的“掘墓人”。有中国学者这样评价道：“赫鲁晓夫过分夸大斯大林的错误对苏联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是非常大的。后来对苏联的垮台负有重大责任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一大批‘掘墓人’，就是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大浪潮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政治生涯也是在赫鲁晓夫时期开始的。例如戈尔巴乔夫，他在 30 岁时就已经是苏共二十二大的代表，举手赞成过苏共二十二大的决议。”^② 这个分析从一个角度反映了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中夸大其词带来的政治后果。

总体来看，赫鲁晓夫从苏共 20 大到苏共 22 大批判斯大林，带来了严重后果：在批判斯大林错误的同时，否定了斯大林时期苏共的整个历史，放弃了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定信念和无限忠诚，特别是放弃了斯大林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绝不妥协的革命精神。与此同时，一批不熟悉党的革命传统和一些革命立场不坚定的青年人，在苏共 20 大精神和赫鲁晓夫思想的影响下开始成长起来。他们后来被称为“二十大的儿女”。正是这批人，成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推行苏联演变和埋葬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骨干力量。就此意义来说，苏共 20 大开始的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所造成的结果，不仅仅是批判斯大林个人，还对苏联国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

二 “解冻文学”与自由化思潮

苏共 20 大带来的思想解放，直接推动了一批著名文学家和政论家的出现。有人形容道：“苏共 20 大造成了这样一种气氛，就是在漫长的思

^① 雅科夫列夫的代表作《一杯苦酒》，就表达了对赫鲁晓夫和苏共 20 大的充分肯定与“念念不忘”的“感激之情”。参见〔俄〕亚·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新华出版社，1999，第 11~18 页。

^② 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 381~387 页。

想政治严冬之后，突然解冻了，人们呼吸到沁人心脾的空气。”^①著名作家И·爱伦堡创作于1953~1955年，在1956年才得以全部出版的名为《解冻》^②的长篇小说，成了苏共20大之后的标志性文学著作。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苏联文艺界出现了一批揭露社会阴暗面的作品，形成了“解冻文学”现象。

最初，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人对“解冻文学”持肯定态度，主张作家应该深入生活，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这推动了那些反映阴暗面、批判官僚主义作风的文学作品大批出现。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描述了一位医生在苏维埃政权下遭到的迫害；索尔仁尼琴于1962年发表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反映了斯大林时代被关押和流放者的生活，在社会上引起轰动，被视为将体现斯大林个人迷信与艺术手段完美结合的典型作品。特瓦尔多夫斯基1963年在《消息报》上发表的长篇叙事诗《焦尔金游地府》，将斯大林时代比做“阴曹地府”一般黑暗。与此同时，这股“解冻”潮流的迅速发展，引发自由化思潮的兴起，在文学艺术界，不顾思想性、醉心于庸俗生活的文艺作品，与那些歌颂卫国战争时期英雄形象的《青年近卫军》等作品共同出现在文艺领域。在思想界，这个时期西方借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而掀起的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攻击，东欧国家中出现的危机事件，都给苏联共产党的理论与宣传带来了冲击。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等领导人对文学和思想界的自由化思潮采取了忽左忽右的态度，也加重了思想领域的混乱。

应当承认，首先在文艺领域出现的这种“解冻思潮”，对于繁荣文艺创作和活跃社会科学研究具有促进作用，反映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改革文化体制和政策的正当要求。但是由于缺乏正确的引导，一时间各种良莠不齐的作品纷纷出现，可以说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一些作品具有明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色彩和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倾向。这些情况在基层党员和群众中引起了严重的思想混乱，给基层党组织的宣传

① Ю. В. Аксютин.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строения в СССР (1953 ~ 1982) . Г. Н. Севостьянова. Россия в XX веке. Реформы и революции. т. 2 Москва : Наука, 2002. с. 341.

② “解冻” (оттепель)：这个词是作者用来隐喻斯大林时代的结束，后来成为苏共20大之后文学现象和新社会思潮的代名词。

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对此，苏共采取了一些限制或者“收紧”的措施，加强意识形态方面的管理。不过，在社会思想已经日渐放开的情况下，这方面的工作还是漏洞百出。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有一些大学生和党员对自己所见到的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现象明确表达了不满。1981 年 4 月 18 日，在一封来自国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大学的有多人签名的信件中，谈到了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信中列举了当时由高等学校出版社出版的教材中所存在的内容老套、表达不准、错误众多等问题，指出高校教材在思想理论界具有权威地位，苏联当前应注意提高教材质量，教材的编写应该引人入胜、内容丰富。他们肯定“进步出版社”的一些教材：“我们坚信，编写教科书可以信赖的只是那些不仅完全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论，还是一流著作的作者。他们能够把理论与广博的知识结合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质量，提升其适应时代条件的水平。这就要求我们加强意识形态斗争，提高苏联民众的成人教育与文化程度。”^① 由于信件所反映的问题具有较大影响，这封信由《共产党员》杂志编辑部转交给了国家出版委员会以及相关负责人。还有人从国外写信给《共产党员》杂志编辑部，对苏联的电影与电影评论所反映出的问题提出批评，认为一些人在评论中“向帝国主义做出意识形态让步”，所反映的已经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了，应当同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展开斗争^②。这些来信从不同问题上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及宣传工作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保证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也表达了基层党员群众对社会思想混乱的担忧。

三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 20 世纪 60 ~ 70 年代苏联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关于它的定义，有西方人认为，“持不同政见者”是从

^①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766. Л. 54 - 64. 信件作者有 П. В. 鲍鲁扬 (П. В. Полуян)、А. В. 卡尔比科夫 (А. В. Карпиков)、И. В. 巴宾科 (И. В. Бабенко) 等共 9 人，是国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大学政治俱乐部的成员。

^②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845. Л. 50. 信件作者为 Т. 谢尔托夫 (Т. Сертов)，信件写于 1983 年 7 月 28 日。

60年代初期起在苏联政治舞台上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持各种立场的违反准则者，社会制度的批评者和反抗者，他们的特点是敢于公开反对共产主义制度，并且“无论是监禁还是强迫进精神病院都不能封住他们的嘴”^①。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给它下的定义则比这还要宽泛得多。罗伊·麦德维杰夫的定义是：“所谓持不同政见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对于任何社会（包括苏联在内）所赖以存在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或道德基础都多少持有不同的见解。不仅如此，他们还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并且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这些观点表达出来。”^②最初，“持不同政见者”只是一些对苏联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生活等方面存有与官方不同看法的个人，如专门以劳改营、流放地生活为创作题材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就是早期“持不同政见者”的代表。这些人只是以文学艺术作品来表达自己对当时政治的不满。到60年代中期以后，在苏联开始出现群众性的抗议活动，还组成群众性的组织（譬如由著名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等人于1970年发起的“莫斯科人权委员会”），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海因茨·布拉姆1977年写道：“在过去几年里，估计有1000~2000名积极从事人权斗争的人士公开露了面。”而苏联天体物理学家K. 柳巴尔斯基在文章中提出，参加公开反抗的积极活动的“持不同政见者”至少在1万人以上，如果把宗教、民族等反对派分子加在一起，那么积极活动的“持不同政见者”至少有25万人。由此可见，对于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规模，还是有很大分歧的^③。“持不同政见者”在60年代中期以后形成三种主要派别，即以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为代表的，提倡民主社会主义、批判斯大林集权统治以及破坏民主法制行为的“改良派共产主义者”；以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院士为代表的，提倡西方民主自由的“自由主义者”；以文学家索尔仁尼琴为中心的，强调俄罗斯的斯拉夫民族精神、反对西方化也反对社会主

① 《苏联问题译丛》编辑部编译《苏联问题译丛》第3辑，三联书店，1980，第49~50页。

② [苏]罗伊·麦德维杰夫：《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刘明、洪历建译，群众出版社，1984，第1页。转引自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506页。

③ 《苏联问题译丛》编辑部编译《苏联问题译丛》第3辑，三联书店，1980，第50页；《苏联问题译丛》编辑部编译《苏联问题译丛》第6辑，三联书店，1980，第290页。

义的“基督教民族主义者”^①。此外，还有以地方民族主义和宗教运动为表现形式的派别，他们或者宣扬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人权，或者对苏联当时的政治提出批判意见，强调俄罗斯传统文化和政治制度，用来批判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及马克思主义理论。除了这些，还有以俄罗斯民族主义或苏联地方民族主义为代表的民族主义主张，以及以东正教等教派为代表的宗教主张。这些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分处在不同学科或政治、经济生活领域中。

对于“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苏联共产党的定性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②。勃列日涅夫政府主要采取压制的办法，在文化领域里对新闻出版业加以控制，在思想上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侵入”加以严防。但是，采用压制或限制的手段来解决思想领域里出现的问题显然不是上策，苏联共产党在宣传组织方面还存在一定弊端，导致这种思想上的不同意见屡次遭到禁止都不能完全控制。即使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后期因政治上的严格压制“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声势渐弱，人们思想中所存有的东西依然不可能完全消除。因此，到戈尔巴乔夫改革时代，在“民主化”“公开性”等口号下，一些当年的“持不同政见者”又开始出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并且表现出更强的宣传力度。

与“解冻思潮”一样，“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出现及扩展，在一定程度上给苏联共产党基层党组织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带来影响，基层党组织的宣传形式化倾向越来越严重，也使得在思想宣传领域其所占领的

① 《苏联兴亡史纲》一书对“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形成的三种主要思潮和派别做了比较详尽的分析，详细内容可参见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508～514页。这里“改良派共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基督教民族主义者”是联邦德国的海因茨·布拉姆对“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主要三派的称呼。参见《苏联问题译丛》编辑部编译《苏联问题译丛》第3辑，三联书店，1980，第50页。

② 例如，在苏共与法共关于人权的争论中，苏共中央在给法共的回信中这样讲道：“‘持不同政见者’对社会主义的‘批评’实质上是否定社会主义，是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同共产党人进行斗争的一种方式。这种‘批评’在行动上正在变为有组织的、受帝国主义操纵的反苏活动。给这样的活动以自由就意味着不要巩固，而是动摇社会主义。”参见沈志华、于沛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504页。

阵地越来越小，最终在苏联国内多种思潮和西方思想进入的多方打击下，共产党的舆论宣传失去了权威性和影响力。

此外，在20世纪70年代的苏联还出现了“夜间人”现象。所谓“夜间人”是指那样一些人，他们白天在公共场所处处与官方宣传保持一致，到了夜间则过起自己的生活：阅读地下出版物，交流政治笑话，与家人和朋友议论时政，抨击权贵。这是一些对现实不满而又没有公开加入“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人^①。这种现象不像“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那样在国内外都有巨大影响，但也是一种社会思潮。并且，苏共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制以及各种限制对“夜间人”基本没有直接作用，这种情况一直存在到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以至于戈尔巴乔夫将消除“夜间人”现象作为自己改革的一项成果。他后来总结道：“大多数苏联人多年来已习惯于保持‘双重思想’的状况——在公开场合都支持当局的行动，而在家里、在私下或在朋友圈中就说出他们的怀疑，甚至愤怒。双重思想状况只是在改革中才得到了消除。”^②

从苏共20大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到“解冻思潮”，再到“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在斯大林逝世后的30年间苏联社会是一个各种思想出现，党和政府有时鼓励、多半压制甚至采用镇压手段对待的时期。人们的思想主张，有的是对赫鲁晓夫公开批判斯大林不满，有的是反对苏联政治体制，还有大肆鼓吹西方民主自由的，除此之外在一些地方还出现过民族主义思潮、宗教主张。可以看出，在戈尔巴乔夫提倡政治“多元化”之前，苏联思想界的“多元化”已经露出端倪。相反，一些党员群众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事件，如赫鲁晓夫下台、苏联与美国开展大规模军备竞赛等问题倒显得不那么热心，这反映出人们对政治越来越冷漠。普通党员和民众对政治的冷漠，给基层党组织进行组织和宣传工作带来很大困难，政治宣传越来越具有形式化特点，缺乏实际效用。基层党组织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都在下降，苏联共产党对于社会意识形态的把握和控制能力也极大下降。相反，在这个时期，西方的人道主义、自由化思

^① 这是中国学者陈之骅对“夜间人”现象所下的定义，参见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123页。

^② 〔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第24页。

潮却逐步占领思想阵地，更增加了基层党组织工作的难度。

第三节 20 世纪 50 ~ 80 年代的苏共基层党组织

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在 20 多年间经历了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出现各种社会思潮，调整工农业政策，还有在国际共运中与中国反目，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等事件。在对内政策上，勃列日涅夫采取了与赫鲁晓夫的“冒失”相反的对策，以稳定为先，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国民经济发展近乎停滞。在基层党组织建设上，一方面由于从赫鲁晓夫时期起，对于清党和开除党籍等问题采取了与斯大林时期不一样的、比较慎重的策略，党员队伍不断扩大，尤其是农村中基层党组织情况有了很大好转，苏共在基层党组织结构上进行了调整，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得到完善；另一方面，在赫鲁晓夫时期，由于苏共上层决策上的冒失，也给基层党组织工作带来一些混乱。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发展稳定，人民生活也相对较好，但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方面却出现了诸多问题，基层党组织工作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局面。

一 党的队伍扩大，基层党组织结构和工作内容调整

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初，苏联共产党的队伍不断壮大，从 1966 年苏共 23 大起，苏共党员突破 1000 万人，达到 1250 万人（当时苏联总人口为 2.322 亿人，平均约每 20 人中有 1 名党员），党员人数急剧增加，国内外形势日益复杂，给基层党组织工作带来很多干扰因素。不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和宣传工作除因苏共决策有所变动外，基本上按照原来的工作方式进行，没有重大改变。到 70 年代以后，在基层党组织会议或宣传内容中，形式主义的成分越来越多，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先锋队与模范作用越来越小。

（一）基层党组织数量增加与组织结构的调整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共产党在组织生活与党内民主等方面有了一定调整，尤其在苏共 22 大上赫鲁晓夫提出“全民党”理论后，对党员的资格，基层党组织的职能、作用有了新的提法。1961 年 10 月 28 日科兹洛

夫所做的《关于修改苏联共产党章程》报告，对赫鲁晓夫提出的“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理论，以及“全民党”理论做出了进一步阐发。关于党员资格，新党章规定，“积极参加共产主义建设的任何苏联公民，都可以成为党员”，这是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6大所规定的入党条件内容的再一次修改^①。这就将党的大门向“积极参加共产主义建设的任何苏联公民”敞开。在增强党的开放性的同时，该报告还强调：“党内思想生活的活跃、党的纪律的加强和党员觉悟的提高，使得开除苏共党籍的事例在近几年来大大减少了。我们在将来也应当从这一点出发：作为党内最高处分的开除党籍，只应适用于那些确实没有资格留在党的队伍里的人。”^②这样，一方面是党的大门敞开，另一方面对开除党籍更加谨慎，这使苏共党员数量有了极大增加。根据苏共中央主抓党组织工作的彼得罗维切夫提供的数字，在苏共22大到23大之间，苏共每年接收为预备党员的人数超过76万人，1966年苏共23大召开时，苏共党员人数超过1000万人，达到1250万人。苏共23大后，这个势头有所控制，每年接收预备党员平均约60万人，1974年接收预备党员55万多人^③。尽管如此，苏共党员数量每年还是迅速增长，到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的1981年，达1743万人。与党员数量迅速增加比较，这个时期基层党组织数目的增加不是很快，1961年有29.4万多个，1971年有36.9万多个，到1981年有41.4万多个，基层党组织数量增长比较平稳，但其规模在扩大。1956年工业企业中平均一个基层党组织有38名共产党员，到1977年时，已经达到95名。在建筑工地上，这两个数字分别是27名和39名；在国营农场这两个数字分别是25名和69名；在集体农庄这两个数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6大所规定的入党条件是：“凡承认党纲、加入党的一个组织、服从党的一切决议并缴纳党费的人，都可以作为党员。”以后的党章第一条都按此内容规定。1952年10月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对这一规定做了第一次修改，规定：“任何从事劳动、不剥削他人劳动的苏联公民，承认党的纲领和党的章程、积极促使它们实现、在党的一个组织内工作并执行党的一切决议的人，都可以成为苏联共产党党员。党员必须缴纳规定的党费。”当时这个修改党章的报告是由赫鲁晓夫做出的。参见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编《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求实出版社，1982，第179、202页。

②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编《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求实出版社，1982，第235～236页。

③ Первичная партий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пыт, формы и методы работы.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75 с. 10.

字分别是 13 名和 55 名^①。

随着基层党组织中党员数量的增加，苏共多次通过决议，扩大地方党的机关的权力，以加强基层党组织在企业、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的影响。1956 年苏共 20 大通过的《关于修改党章的决议》规定，在党员超过 300 人的大企业和大机关，可根据上级党委会的决定成立党委会。而在党员超过 50 人的基层党组织可根据上级部门的决定成立车间党组织。在 1966 年 4 月 8 日苏共第 23 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关于部分修改苏联共产党章程的决议》中规定，党员超过 1000 名的基层党组织的党委会，经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同意，在接收苏共新党员等方面具有党的区委员会一级的权力。在这些组织内部，必要时可建立车间党委会，而生产工段的党组织可具有基层党组织的权力；在共产党员满 50 人的国营农场，可以成立党委会，并规定党员满 300 人并有车间组织的基层党组织，全体党员大会每 2 个月至少举行 1 次^②。1971 年 4 月 9 日，在苏共第 24 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部分修改苏联共产党章程的决议》，强调加强基层党组织在本单位的组织工作和教育工作，进一步扩大基层党组织的权力，规定在有 500 名以上共产党员的党组织中，在大车间建立党委会，给予生产工段党组织以基层党组织的权力^③。可见，这个时期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基层党组织的人数也在增加，为加强基层党组织工作的效果，使基层党组织在本单位的组织和教育工作更有实效，苏共不断调整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形式，以适应基层党组织规模扩大的形势。

（二）干部队伍的长期稳定导致干部的老化与官僚主义倾向

苏共 22 大党章对从基层组织到中央委员会成员的选举办法做出了新规定，要求在每次选举的时候，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的成员至少更换 1/4；加盟共和国中央及边疆区委、州委成员在每次选举时至少更换 1/3；党的专区委、市委、区委、基层党组织的党委或支委会的成员

① [苏] H. A. 彼特罗维切夫主编《党的建设》，郭华等译，求实出版社，1983，第 215 页。

②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编《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求实出版社，1982，第 199 ~ 200、263 页。

③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编《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求实出版社，1982，第 265 ~ 266 页。

至少更换一半。基层党组织的书记可以连续当选，但最多不得超过两届^①。这是对各级组织选举的一种硬性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共在干部轮换制度方面的民主设想，但这种做法在强化党的全民性的同时，却忽视和淡化了共产党的工人阶级性质。从实际效果来看，干部的频繁更替，影响到党组织的稳定。在基层党组织中更是如此，每届至少更替一半，造成基层党组织人事上的频繁变动，使得一部分有能力的干部因为落选而失去施展才能的机会，还有一部分干部因害怕落选而充满危机感，为保证自己不因落选而降职，便想方设法甚至不择手段晋升。这样既不利于干部队伍的稳定，又在选举中引出一些非正当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民主”的初衷。因此，1966年苏共23大对党章做出了修改，取消了党章第25条对党的各级机关选举中更新比例的硬性规定，不再要求硬性的比例，只提出在党的各级机关选举中遵守机关成员经常更新、党的领导要新陈代谢的原则^②。这种修改在一段时期内稳定了党的干部队伍。在基层党组织工作中，从正面效果来看，有利于培养出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干部，并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发展的总体形势相符合。勃列日涅夫在苏共25大上对这次修改还做出了“经验性”的总结：“爱护并关心干部在党内已成为一种风气。无理地调动和经常撤换工作人员的做法——这个问题早在苏共第23次代表大会上就已经提出——现在已经消除。要在工作需要或者有必要加强这一或者那一部门时才调动干部。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拿固定干部作借口，把不称职的，所谓不拉车的人留在领导岗位上。当然更不能把不负责任的，吃老本的，认为职务本身能保证他们的威望受人尊敬的人留在领导岗位上。”^③实际上，到勃列日涅夫后期，他所说的应该避免的那些情况，基本上都体现了出来：干部队伍的稳定带来的是领导干部的长期不动，有些干部甚至终身任职，从而导致干部的老化，庸庸碌碌无所作为，而干部的老化又引出政治生活中的官僚化、形式主义、工作效率低下等问题，基层干部按部就班，一级一级地慢慢向上提升，并且一般只升不降，改变了基层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第277页。

②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编《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求实出版社，1982，第262~263页。

③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76，第96页。

党组织的组织功能，使之变成晋身特权的阶梯，不利于年轻党员干部的成长，也使基层党组织的主动性、创造力降低，战斗堡垒、先锋队作用渐失。

（三）基层党组织在组织和开展劳动竞赛中继续发挥作用

一般而言，苏共党章对基层党组织的职能和任务的规定都依据党所面临的主要情况。在苏共 22 大上，科兹洛夫所做的《关于修改苏联共产党章程的报告》称，党组织的任务是团结和组织劳动者“为建设共产主义而斗争”，要教育共产党员养成共产主义道德，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群众^①。也就是说，这个时期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教育党员的共产主义精神，使党员都能积极主动地参加共产主义建设。基层党组织的具体任务，除了“把积极参加共产主义建设的任何苏联公民”发展入党外，还要通过深入群众，在工农业生产中发挥作用，“帮助劳动者培养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能力，在广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础上铲除官僚主义、地方主义和破坏国家纪律的现象”，目的是“进一步提高基层组织在完成共产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中的作用，使它们更加积极、更具有战斗力”^②。可见，这次对苏共党章在理论上的修改，主要侧重于使党员在“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即以苏联进入“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为前提，要求共产党员为在 20 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而发挥作用。

“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这个口号本身并不符合苏联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在理论宣传与具体实践上也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浮夸和空洞性。因此，赫鲁晓夫下台后，苏共做了调整，提出要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而不再强调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时期。在“发达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基层党组织的主要任务还是在生产中发挥组织和

^① 苏共 22 大通过的新党章还对共产主义道德原则做了解释，包括忠于共产主义事业，参加社会劳动，提倡集体主义和同志互助，强调社会生活中做人的基本道德，并强调加强苏联各族人民和世界各国劳动者的团结等。参见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编《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求实出版社，1982，第 219～221 页。

^②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编《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求实出版社，1982，第 252～253 页。

带头作用。组织和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是基层党组织发挥作用的表现之一。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苏联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主要形式是共产主义劳动竞赛运动，劳动竞赛的内容从50年代继续开展提高劳动效率、节约原材料、节约成本、降低消耗，到60年代中期以后实行经济核算，在企业中科学地组织劳动，实行科学管理，再到70年代保证生产质量，追随科技进步而提高劳动的科技含量，用新科技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原料、燃料和电力，以便顺利完成已确定的任务。像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时期以及伟大卫国战争时期那样，基层党组织在劳动竞赛中继续发挥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作用，组织参观、观摩、展览以及各种技术经济代表会议，出版发行报刊、宣传画等宣传劳动竞赛中的先进人物，实行辅导员制，以先进人物和技术帮助后进者，在劳动中组织工作接力赛，帮助劳动集体和个人制订响应上级号召的竞赛计划，提出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效率方面个人和集体的义务以及制订以后的生产计划等。

由于广泛的宣传与组织工作，加之党员队伍不断扩大，在这个时期，参加生产劳动的党员人数不断增加，社会主义竞赛发展成为群众性、全民性的运动。1976年，大约有9750万人参加了社会主义竞赛，其中2500多万人荣获了“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的称号^①。1977年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参加生产劳动的党员人数比卫国战争结束时的1946年增加了近5倍，党员成为苏联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主要参加者。

由表2-1中可看出，20世纪60~70年代，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劳动部门中，参加生产活动的党员人数不断增加，这一方面与党员队伍的迅速扩大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基层党组织将组织和领导广大党员参加劳动竞赛作为主要工作任务有关。为更好地提高工作效率，基层党组织注意发挥车间党组织和党小组的作用，注重用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相结合的办法，使劳动竞赛中的先进集体与个人得到承认、尊敬和嘉奖，同时及时发现那些旷工者、懒惰的人以及制造废品的人，给予处罚。

^① [苏]雅·阿·约夫菲、列·巴·兹洛马诺夫编著《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统计资料手册(1917-1977)》，文郁译，求实出版社，1984，第91页。

表 2-1 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农业中工作的共产党员人数

单位：人

| 部门 | 1946 年 | 1966 年 | 1971 年 | 1976 年 | 1977 年 |
|------|--------|---------|---------|---------|---------|
| 工业 | 839655 | 3108345 | 3647090 | 3881519 | 3968712 |
| 建筑业 | 42828 | 591395 | 887401 | 1048492 | 1069939 |
| 运输业 | 264175 | 826791 | 897940 | 934225 | 947612 |
| 农业 | 726688 | 2270080 | 2562812 | 2611698 | 2644629 |
| 其中： | | | | | |
| 国营农场 | 61397 | 814950 | 976860 | 1020018 | 1042272 |
| 集体农庄 | 541783 | 1298966 | 1398487 | 1373654 | 1371435 |

注：数据截至各年 1 月 1 日。

资料来源：〔苏〕H. A. 彼特罗维切夫主编《党的建设》，郭华等译，求实出版社，1983，第 411 页。

在这个时期的苏共纲领中，在苏共 24 大、25 大所拟定的苏联社会发展任务的决议中，都要求每一个工段、每一个车间、每一个企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以及各机关中的党组织通过积极的、目标明确的组织和思想工作，在劳动集体中起到领导核心作用，很好地动员群众完成国家建设任务。从客观效果来看，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组织和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过程中，尽管带有一些形式主义色彩，但党员在生产劳动中参加稳定的劳动组织，有利于党组织对劳动集体中的党员的管理，有利于加强党的组织性。

（四）基层党组织监督权力扩大

在苏共早期的党章中，并没有条文明确规定基层党组织有监督生产的权力。20 世纪 30 年代，基层党组织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对生产经营过程的监督权被提了出来。1939 年，在苏共第 18 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章中，第一次规定基层党组织具有监督企业行政工作的职权^①。不过，对于政府各部、各国家委员会及其他中央和地方的苏维埃机关、经济机关和主管部门的党组织，党章规定“不行使监

^① 苏共 18 大通过的党章中这样规定：“为了加强各生产企业（包括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和机器拖拉机站）的党的基层组织的作用，提高它们对于企业工作状况的责任心，党的基层组织具有监督企业行政工作的职权。”参见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编《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求实出版社，1982，第 97 页。

督行政工作的职能”。对商业企业和科研机构以及文化教育机构的监督权也没有规定。也就是说，当时党章中把基层党组织划分为具有监督行政工作权力的和没有监督权的两种。

以后，随着党员队伍的扩大，基层党组织在苏联共产党的组织结构中的作用也在增强，因为全部党内生活——党在领导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全部政策和具体工作——在最终落实时，都反映在基层党组织这个焦点上。1959年，苏共中央在6月26日的决议中规定，生产企业和商业企业的基层党组织可以成立工作委员会来行使监督权。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在讲话中经常强调基层党组织工作的重要性，强调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勃列日涅夫曾总结道：“党的全部生活，它的成就和缺点，使我们感到高兴的一切和感到痛心的一切——所有这些都在于我们基层党组织的活动中得到反映。在党基层组织中常产生许多往往成为全党财富的新事物。同时，党的基层组织也总会遇到一些不良的现象，总要同这些现象进行斗争……基层组织……的工作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就在这里。”^①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和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根据苏共党员人数迅速增加的情况，一再扩大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权限，由此不难看出，这个时期苏共中央对基层党组织的工作还是给予了比较高的重视的。

1971年苏共24大通过的《关于部分修改党章的决定》中，将苏联共产党章程中关于监督行政工作的权力的规定，扩大到一切其行政职权不超出本单位的设计机关、科学研究所、学校、文化教育机构、医疗机构以及其他机构和组织的基层党组织。也就是说，基层党组织监督行政工作的权力不再划分为有权和没有权力两种。这样，基层党组织的监督权力和范围都扩大了，勃列日涅夫在党的代表大会和其他讲话中也多次强调发挥基层党组织在生产中的带头作用。

基层党组织监督权力的扩大表明苏共领导对基层党组织的重视程度提高，但也引出了一些问题，如监督权力的扩大，分散了基层党组织对生产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注意力，反而使其过分关注一些细节性的事务，从而造成工作重心的偏差：该管的事情没有管好，却干涉一些不重要的

^① 厦门大学外文系俄语翻译组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78，第95页。

事情。例如，1977 年 2 月 7 日《真理报》登载一篇文章《交彩礼之后》，讲述了土库曼共和国一个集体农庄中，一对青年男女因自由恋爱遭到家长反对引发的一场风波，这场涉及几个家庭的纠纷最后的解决者是他们所在的格奥克—杰彼区党委，区党委书记 K. 巴巴耶娃亲自过问了这件事，“党的工作者真正干预了这个家庭的遭遇”，最终成全了一个因索要彩礼而被破坏的家庭^①。在这里，区党委解决的是买卖婚姻问题，这应属于司法部门管辖范围，农庄里的村组织也有权介入，但这件事的最终解决靠的是区党委。像这样必须通过“越级”上访才能解决的问题，在当时苏联社会中还有很多。例如，1984 年 12 月，马里州伏尔加河行星齿轮减速器厂的 A. A. 瓦利乌林写信给《共产党员》杂志，反映正在建设中的齿轮减速机工厂虚报经济效益的情况。信件由杂志编辑部转给苏共马里州委员会后，马里州委员会对工厂进行了调查，对其生产和经济活动材料进行审计，结论是：“已经核定，在 1975 ~ 1982 年第一季度期间，工厂完成并执行了生产计划，组装了 3.6 万卢布的设备，在 1982 年第一季度提高了 3453 卢布的销售额度。在 1983 年 3 月进行的审计监察过程中，完成记录的事实没有得到证实，甚至没有找到提高 3453 卢布销售额的证据。不过，可以认定的是，正在建设中的伏尔加钢铁产品托拉斯在 1982 年初就应该生产出来约什卡尔奥拉（Йошкар-Ола）建筑安装局下的订单，3453 卢布的定额应在 1982 年 3 月 16 日就已完成。”^② 这封信说明，对于杂志登出的信件地方政府十分重视，并进行核查，并给予认真回答。还有基层党员就自己的工作职务和工作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进行上访。1985 年 3 月，乌克兰共和国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公民努日内写信给《共产党员》编辑部，反映自己在阿波斯托洛沃区的工作中受到的不公正批评以及被撤职等问题。信件被转给乌克兰共产党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会书记 H. 扎多亚，后者经过调查，做出答复，肯定了努日内在担任阿波斯托洛沃区党委第一书记期间的工作，认为，这个区“向国家出售蔬菜、肉、鸡蛋、工业产品的产量提高了，建筑—安装工作以及日常服务的规模也扩大了”，但是，“由于一系列工业企

① 《苏联问题译丛》编辑部编译《苏联问题译丛》第 6 辑，三联书店，1980，第 301 ~ 306 页。

②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910. Л. 9 - 10.

业、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没有完成基本指标，由于复杂的气候条件……限制了党的区委以及努日内个人的工作，使得他在党的州委员会上不止一次被批评，并在报纸上遭到批评”。“鉴于努日内同志有出色的经济工作经验，他本人还是水利工程师、专家，州党组讨论推荐他担任州土壤改良和水利经济管理局的处长。”^①

一方面，这些案例说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基层党组织在党员的组织工作中发挥着比较重要的作用，基层党组织对普通党员所犯的错误有权力处理，并且基层群众也承认这种权力；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基层党组织监督权力的扩大，不只在党的组织和宣传工作范围内，还涉及其他领域。不过，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在党员遇到问题时，基层党组织并不能及时处理和解决，而党员有了问题时，要向《共产党员》杂志或者其他机构反映，再经过周折，转到更高级的部门中，才有可能得到解决。尽管这些问题都得到了答复或者解决，但是上下级沟通的不畅以及基层党组织不能合理处理党员中出现的问题与纠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它的信任，人们更认可“越级”上访或者以公开信的形式反映问题。这无疑导致问题的扩大化以及基层党组织的可信度降低。

由于勃列日涅夫时代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在政治上缺乏创新，逐步导致人们对政治的冷漠与麻木。来自苏共自身体制的原因，加之这个时期各种社会问题的增多，使基层党组织工作面临宣传无力、情况复杂的局面，在具体工作中形式主义多于实践，从而影响到其实际工作效果。不过，总体来看，党的基层组织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还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苏联执政党的基层组织仍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要载体，其主流地位并没有改变。

二 基层党组织工作的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

20 世纪 50 ~ 60 年代堪称苏共历史上的转折时期，赫鲁晓夫在苏共 20 大、苏共 22 大上掀起的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改变了苏联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领导形象、社会舆论等方面的一贯政策，开始强调党内生活的民主性，党的干部在工作方法上呈现出多样性和灵活性，人们不

^①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910. Л. 46.

再一味相信党的领导人，而是有了自己对问题的评价和看法。从赫鲁晓夫时期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在近 30 年间苏共基层党组织工作所面临的情况比较复杂：前期由于苏共 20 大的召开以及赫鲁晓夫在内政外交等方面政策的种种变化，给基层党组织工作带来混乱；勃列日涅夫时期上层求稳，给基层组织工作带来了比较稳定的环境，但由于“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以及苏联对外争霸政策，与西方的冷战，带来内政外交的复杂局面。在社会问题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基层党组织工作也出现了种种新问题。

（一）基层党组织工作有所创新，民主性有了加强

赫鲁晓夫在党的 20 大和 22 大上对斯大林时期破坏民主与法制的情况进行了批判。后来他又对工农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极力提倡民主的工作作风和敢于创新的思想。在基层党组织工作中，提拔年轻人才，倡导创新意识，成为赫鲁晓夫时代的主流。除了党的各种会议决议和官方报刊中的宣传外，人们还可以从当时的文学作品中看到这种舆论导向。例如，柯切托夫的《州委书记》描写了两个州委书记^①的不同工作作风：一个关心生产，工作认真，善于接受新事物，能接受群众批评；另一位则官僚主义严重，不接受批评，在工作中弄虚作假。小说肯定了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抨击弄虚作假的风气，肯定了注意抓生产的党的干部，认为“不仅仅是口袋里装着党证的人，而且还能完成计划的人，才是共产党员。……党的工作首先就是经济工作”；同时，对从事个体经济的党员进行批评：工人叶里扎尔·杰苗希金参加了共产党，又“搞资本主义”，做投机买卖，出租房屋，在 3 年时间里赚了 50 万卢布，没有根据党章要求按照收入比例缴税，赖掉了“不下一万五千卢布”，并且“把它们藏起来不让党知道”。州和工厂党的领导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由于他不改正，车间党组织一致通过，将他开除出党^②。这部小说的主角不是基层党组织的干部，但小说倡导党的干部联系群众，有创新精神，不隐瞒实情，采用灵活的、民主的工作方法，在当时代表了一种新的舆论导向。

^① 符谢沃洛德·阿尼西莫维奇·柯切托夫（1912～1973 年），苏联当代作家。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茹尔宾一家》（1952 年）、《叶尔绍夫兄弟》（1958 年）等。这里说的两个州委书记是斯塔夫罗波尔州委书记瓦·安·杰尼索夫与维索科戈尔斯克州委书记阿·格·阿尔塔莫诺夫。

^② [苏]柯切托夫：《州委书记》，孙广英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第 454 页。

由于上层的大力提倡，与斯大林时代相比较，赫鲁晓夫时期苏共基层党组织工作中的民主性和灵活性增强了，党务工作人员的官僚气息有所降低，比较注重工作方法的灵活性和创新性。不过，官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传统，从苏维埃政权初期就存在，在苏联社会政治生活中，一直是难以克服的风气。到勃列日涅夫时代不但依然存在，甚至加重，在一些党的文件中也有反映。例如，苏共中央1972年8月8日《关于塔什干市党组织中领导干部的马列主义学习和经济教育工作的决议》就指出，在这个市“某些领导干部不以礼待人，用粗暴、命令的口吻对人讲话，不容许下级批评。对劳动人民的申诉和申请采取马虎有时甚至是轻视的态度。违反劳动法和以各种毫无根据的理由为借口将勤勤恳恳的工作人员解除职务的事件时有发生”。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一些干部身上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并且，职位越高的领导官僚气息越浓重。尽管苏共中央一再以文件、决议的形式加以批评，还是难以抑制。官僚主义带来各级领导机构工作的低效，也压制了基层党员与群众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

另外，勃列日涅夫时代党的思想建设越来越注重形式。勃列日涅夫在1971年党的24大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报纸一次发行的份数约为1.4亿份，而杂志为1.5亿多份。”“仅在1969~1970年间，列宁的著作和论述列宁和列宁主义的书就超过了7600万册。”到1981年党的26大时，勃列日涅夫再次肯定：“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者有了更多的宣传工具。3.8亿份报纸是每天进行宣传的可靠渠道。我国有7500万台电视机的屏幕每天在放映节目。也就是说，每天使几千万个家庭既有可能接受必要的有关党的政策的宣传，也有可能获得各方面新的知识，丰富自己的思想和精神。”除此之外，在苏联，还有“一支由党员和非党人士组成的大军——演讲员和宣传员、鼓动员和报告员，他们把党的思想带给群众并宣传党的政策”^①。他把这一切作为党宣传工作成就的总结，乍看起来，在苏联已经建立起一套覆盖面广、比较完整的意识形态和党的政策宣传体系，但实际上，由于宣传内容空洞，脱离实际生活，使得各种宣传流于形式，充满教条。赫鲁晓夫时代所提倡的民主性和灵活性、创

^① 辛华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76，第122页；辛华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82，第100~101页。在俄罗斯现代历史档案馆的档案中，对于上述数字的确有具体统计。

新精神已经难寻踪影，取而代之的则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空洞乏力。基层党组织的宣传成为一种形式化的工作，难以引起党员对党组织工作的关心，党员的党性观念淡薄，党组织缺乏凝聚力。

（二）党员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要求基层党组织工作改进方法

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解冻思潮”到 60~70 年代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再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对思想界加强控制，社会思潮的变化对基层党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形成了冲击，加之西方思想的渗透，苏联党和政府对宗教政策的放宽，带来了社会思想多元化。党员社会结构的变化给基层党组织工作带来新任务：战后，知识分子加入党组织的数量越来越多，党员中工人、农民、知识分子^①所占比重有了很大变化。党员文化程度的提高要求党的干部改变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水平。基层党组织面对这样一些新情况将采用怎样的对策来展开工作，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由表 2-2 可见，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苏共党员中职员所占比例迅速提高，并且一直在 50% 上下。这主要与苏共的政策与导向相关。斯大林逝世前后，苏共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就有了转变。赫鲁晓夫在苏共 22 大上提出的“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及“全民党”理论，吸引一大批人带着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愿望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党员，尤其是知识分子入党人数大为增加，基层党组织干部文化素养有了提高。苏共用组织培训以及提拔掌握专业技术的干部的方法提高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文化素养，基层党组织干部的文化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见表 2-3）。

表 2-2 苏共党员的社会成分

单位：%

| 时间 | 工人占比 | 农民占比 | 职员占比 |
|--------------|------|------|------|
| 1917 年 | 60.2 | 7.6 | 25.8 |
| 1919 年（10 月） | 52 | 15 | 32 |
| 1923 年 | 45 | 26 | 29 |
| 1928 年 | 56.8 | 22.9 | 18.3 |
| 1934 年 | 60 | 8 | 32 |

^① 知识分子在党员的社会成分中归入职员之列。

续表

| 时间 | 工人占比 | 农民占比 | 职员占比 |
|-------|------|------|------|
| 1953年 | 32.1 | 17.8 | 50.1 |
| 1961年 | 33.9 | 17.6 | 48.5 |
| 1971年 | 40.1 | 15.1 | 44.8 |
| 1976年 | 41.6 | 13.9 | 44.5 |
| 1977年 | 42.0 | 13.6 | 44.4 |

注：①因各时代对职业的理解不一样，有的年代在统计党员职业时就出现较大差别，如1934年3种职业人员所占比例的数字显然有些问题。因此，这个数字仅可作为说明职业情况时的一般参照。

②1917年除工人、农民、职员3种成分外，其他成分的人占6.4%；1919年10月有18%的白领工人和14%的知识分子。

③时间截至各年1月1日。

资料来源：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т. 3. первый.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г. 1967. с. 24；〔英〕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徐葵等译，东方出版社，1991，第263~264、342、470页；〔苏〕H. A. 彼特罗维切夫主编《党的建设》，郭华等译，求实出版社，1983，第74页。

表2-3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20世纪70年代苏联
共产党基层党组织书记的受教育程度

单位：%

| 时间 | 高等学校毕业 | 高等学校肄业 | 中学毕业 | 七年制学校毕业 | 小学毕业 |
|-------|--------|--------|------|---------|------|
| 1946年 | 9.6 | — | 32.4 | — | 58.0 |
| 1952年 | 9.3 | 4.7 | 27.3 | 29.3 | 29.4 |
| 1956年 | 11.4 | 7.9 | 29.5 | 30.6 | 20.6 |
| 1961年 | 19.7 | 7.3 | 37.9 | 24.8 | 10.3 |
| 1966年 | 28.3 | 5.9 | 43.3 | 18.1 | 4.4 |
| 1971年 | 38.5 | 5.4 | 44.8 | 10.3 | 1.0 |
| 1976年 | 47.8 | 4.3 | 42.8 | 4.9 | 0.2 |
| 1977年 | 49.7 | 4.0 | 42.0 | 4.2 | 0.1 |

注：数据截至各年1月1日。

资料来源：〔苏〕H. A. 彼特罗维切夫主编《党的建设》，郭华等译，求实出版社，1983，第238页。

从表2-3可以看出，战后初期，在基层党组织书记中，只有中学和小学文化程度的占90%以上，其中小学毕业的占一半多，而受过高等教育的只是极少一部分。这种情况到1966年以后有了比较大的改观。1976

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已经超过一半，小学毕业的已经微乎其微。这反映了苏联共产党注意从受过教高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中提拔党的基层领导，另一方面苏共也加强了对党的领导干部的培训工作。这个时期在党校、马列主义大学中学习的不仅有党的高层领导干部，基层和车间的党委会委员、党组织书记、副书记甚至党小组长也参加学习。在一份有关 1962 ~ 1963 学年卡巴尔达 - 巴尔卡尔州、卡尔梅克州、卡累利阿州、科米州、马里州委员会的党组织学习统计表中可以看到，党员干部学习的内容既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苏共党史、科学无神论、哲学、政治经济学，也有经济学领域分门别类的工业、农业、交通、贸易、建筑等学科知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夜大学中，有历史、经济、哲学、无神论、伦理学和美学、苏联国际关系与对外政策等系。在学科设置以及学习形式、受培训人员身份等方面都有详尽的分类与统计^①。通过学习，党的基层组织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得到提高。此外，党组织之间还可以交流工作经验，完善党务工作方法。

苏联社会以及苏联共产党党员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文化层次的提高，要求基层党组织在工作方法上有所改进，不能用原来的组织甚至强制手段来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应更注重思想宣传和说服教育，这种趋势也促使基层党的工作者提高理论和文化修养。表 2-4 是 20 世纪 70 年代初莫斯科“镰刀和斧头”工厂的中层管理人员对自己工厂领导的评价。从中可以看出，那时对领导的要求除思想政治素养外，人们对他们的评价还包括技术水平以及性格中的能够接受正确的批评意见等一些人性化的东西。

表 2-4 “镰刀和斧头”工厂工段长、车间主任和科长对领导人评定情况
单位：%

| 业务水平和个人品质 (总表的一部分) | 占回答总数的 百分比 | 业务水平和个人品质 (总表的一部分) | 占回答总数的 百分比 |
|-----------------------|---------------|-----------------------|---------------|
| 优点 | | 缺点 | |
| 渊博的业务知识 | 23.7 | 过于自信 | 20.5 |
| 同下级人员关系好 | 13.1 | 缺少技术和经验知识 | 16.9 |
| 能发扬主动精神 | 12.3 | 组织能力差 | 14.5 |

^① РГАНИ. Ф. 5. Оп. 55. Д. 178. Л. 133 - 140; Л. 160 - 169.; Л. 184 - 188.; Л. 204 - 209.

续表

| 业务水平和个人品质 (总表的一部分) | 占回答总数的 百分比 | 业务水平和个人品质 (总表的一部分) | 占回答总数的 百分比 |
|-----------------------|---------------|-----------------------|---------------|
| 要求严格 | 10.5 | 态度粗暴 | 14.4 |
| 能推动最有能力的下级人员 | 9.6 | 不了解下级人员 | 10.8 |
| 幽默感 | 9.6 | 要求不严 | 8.4 |
| 号召力 | 7.2 | 爱闹矛盾 | 6.1 |
| 能接受正确的批评 | 4.1 | | |

资料来源：《苏联问题译丛》编辑部编译《苏联问题译丛》第6辑，三联书店，1980，第36页。

这个评价是以工厂领导为对象，不是以工厂的党组织领导为直接对象的，但由于当时多数工厂领导都是党员并以党的领导干部身份担任工厂企业的领导工作，所以，这些看法也反映出那个时候对党的基层领导干部的一般评价。应该说，这些评价更侧重于专业技术和工作作风等内容，不再以政治素质作为唯一评价标准。这也反映出人们对领导干部在教育水平、文化素养、工作方法等方面的要求提高了，促使一些不具备相应素质的干部在工作中改进自己的工作作风与方法。

从赫鲁晓夫下台，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后期，与产生巨大影响的“解冻思潮”以及“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形成对比的是，普通党员群众对政治的热情在降温，或者说，党的号召力在降低。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位西方学者认为：“意识形态的疲惫无力是今日苏联的一个特征。”“大量的旁证、报道和不满言论都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已丧失了它的魅力。”^① 知识分子加入党组织本身有助于提高党员的整体文化素质，不过，这种情况也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和工作人员改善工作方法，更多地采用宣传和说服教育的手段，不能仅靠行政和组织手段。但是，70年代中期以后，从苏共高层到基层党组织在工作方法上并没有完全顺应社会结构的变化而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甚至在手段上越来越单一，在思想上加强了控制，导致党组织工作在思想政治上缺乏影响力和吸引力，基层组织无论在组织还是在宣传方面，功能都逐渐降低，从组织角度来说，

^① 《苏联问题译丛》编辑部编译《苏联问题译丛》第3辑，三联书店，1980，第50页。

渐渐变成了向上晋升的阶梯。

（三）从事流动性职业的党员增加，给基层党组织的管理工作带来困难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前的苏共基层党组织中，党员的职业主要有工人、农民和军人以及机关工作人员，从事商业服务行业的人员还很少。到了 60 年代中期，随着苏联城乡生活服务设施的增加，人民日常需求日益增加，商品生产和销售迅速扩大，在国营商业和合作商业部门工作的党员人数也在逐年递增。由于传统意识上人们对商业服务行业的轻视，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往往是一些文化素质较低或者没有经过很好的职业训练的人，多数人不喜欢做服务工作，因此，这个行业职工队伍不稳定，人员大量流动。例如，在弗拉基米尔州，各商业单位 1967 年有 6.5 万多人辞职，占从业总人数的 17%。不过，当时这些行业中的党组织并没有相应地建立起符合这种职业特点的管理和宣传活动体系。由于党员流动性大，加之当时往往把一些没有经过很好训练、缺乏干劲的干部派到商业服务业各部门，结果，基层党组织对自己所在单位的影响并不大，有些单位党员甚至很少，对于服务业中存在的营私舞弊、态度蛮横、不尊重顾客等行为不能起到制止或纠正的作用^①。实际上，这种情况在 60~70 年代的苏联还是比较普遍的。结合前述弗拉基米尔州的情况，苏共责成弗拉基米尔州委以及各市委和区委加强对商业服务业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完善基层组织结构，改进生产部门中党员的配备状况，但整个服务行业党组织工作不力的状况一直难以改变。

在建筑行业，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起，苏联政府为改善居民住房状况就开始建设新居，到 60~70 年代，建筑业有了比较大的发展，这给工业企业基层党组织的管理和思想教育带来了新问题：随着建筑队伍的扩大，建筑行业党员人数也在增加，但由于行业工作性质，即工作地点经常变动，经常加班，给这个行业的基层党组织工作带来困难，要组织党员大会和学习通常是比较困难的。另外，在这个行业中，由于有的工人进入大学学习、有的工人退休等客观因素，以及建筑行业本身工资收入提高不快，平时普遍加班工作，在休息日也要劳动，建筑工地的生活条件很差，建筑工人的住房、学龄前幼儿设施得不到保证，有的大工地

^① 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编《苏共党务组织工作文件选编》，1983，第 92~94 页。

施工任务繁重，机械化水平不高，在任何气候条件下工人都要露天操作，居住地距离工作地点很远等，导致建筑业从业人员流动性很大。根据70年代后期俄罗斯联邦国家劳动委员会在俄罗斯联邦73个城市180个工业企业和建筑托拉斯进行调查的材料分析，工人干部流动总数中有60%是青年，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决定变换职业。另据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对西伯利亚建筑组织干部变动情况的分析，在离职者的技术水平上，有18.6%的一级工和15.3%的二级工工龄超过3年。这说明建筑行业劳动条件及工作环境等是他们离职的主要原因。而在这之中又有约2/3的人受过不低于不完全的中等教育，1/4受过高等或未结业的高等、中等专业教育以及普通中等教育^①。也就是说，离职者的文化素养比较高，在建筑行业中多属于“干部”一类的技术人员或管理者，其中也包括党员。

由于工作的流动性，加之行业人员总体流动性比较大，使得建筑部门基层党组织工作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成为苏共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一个特殊部分。苏共中央和劳动管理部门采取加强劳动纪律和生产纪律、实行承包制、加强干部技术人员培训等措施，制止干部工人的流动。同时，将中小建筑企业联合起来，组织大型建筑组织，在这样的大型建筑组织中，有条件把党的力量集中起来。到70年代，在共产党员超过100人的一般建筑托拉斯和专业化托拉斯中，通常建立由党委会领导的统一的基层党组织，将同一个市或同一个区的建筑行业各部门的党员集中到一起。尽管采取了各种措施，建筑行业基层党组织工作还是因行业特点而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到80年代中后期，由于管理不善，以及长期远离党组织，建筑行业的一些党员出现了自动退党现象。

此外，在农村，春季播种、秋季收割时节，人们要组织季节性的工作队，因而在这些季节性的工作队中建立起临时党组织。这种季节性的党组织有利于加强对农村流动党员队伍的管理，不过这种管理还存在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党组织渐渐成为组织纪律松散的集体。

^① 《苏联问题译丛》编辑部编译《苏联问题译丛》第8辑，三联书店，1981，第19、199页。

（四）各种社会问题增加，使基层党组织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情况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社会上酗酒、赌博、流氓案件增加，离婚率上升，官员中间贪污受贿风气盛行，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也增加了基层党组织工作的难度和复杂性^①。

（1）酗酒。在苏联，酗酒是一个传统性的社会问题。由于多数地区地处寒带，气温较低，人们需要以酒御寒，所以从沙皇俄国时代起，这个社会问题就存在。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曾采取过一些措施，对饮酒加以限制，如 1926 年 9 月 11 日公布了《关于与酒精中毒现象作斗争的紧急措施》，社会舆论也大力提倡禁酒。由于政府的行政以及宣传措施，以及社会风气好转，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苏联的酗酒现象虽然屡禁不止，但人均酒类消费量处于下降趋势。1906 ~ 1910 年，俄国人均消费纯酒精每年 3.41 公斤，1935 ~ 1937 年下降为 2.8 公斤，1950 年再降到 1.85 公斤^②。60 年代以后，情况有了变化。在苏联前期，在政府的限制以及倡导下，酗酒者多为成年男人，到 60 年代部分青少年和妇女也加入酒徒行列，“伏特加”^③ 成了一个到处使用、在外国几乎可以“代表”苏联的词。据估算，70 年代苏联居民人均每年伏特加酒的购买量是：1972 年 23 瓶（每瓶半升），1973 年 24 瓶，1975 年 26 瓶，1976 年 28 瓶。这还不算国产和进口葡萄酒、白兰地酒、自酿酒、工业酒精、变性酒精、花露水以及其他在苏联普遍饮用的含有酒精的饮料^④。1972 年，苏联政府将伏特加酒的售价提高了 30% ~ 40%，医疗助理、心理学家、教师等许多人被动员起来同酗酒作斗争，但酒的消费量还是逐年增加。同时，酗酒者的职业和身份也在变化，有些受到高等教育的人和共产党员也在其中。根据记录，1976 年头 9 个月，莫斯科警察局抓到酒鬼的情况是：受过初级教育的占 6%，受过高等教育的占 23%，科学副博士占

① 张建华教授曾专门著文谈到有关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问题，主要介绍了当时苏联社会上存在的酗酒之风、20 世纪 60 ~ 80 年代苏联居高不下的离婚率等情况，还列举了苏联政府针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政策以及诸多社会问题所造成的深远社会影响。参见张建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严重的社会问题》，《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 年第 1 期。

② 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 168 页。

③ 俄罗斯人用粮食酿制的烧酒。

④ 《苏联问题译丛》编辑部编译《苏联问题译丛》第 5 辑，三联书店，1980，第 248 页。

2.5%，共青团员占29%，党员占13%，青少年占9%，妇女占11%^①。

酗酒成风影响到苏联的社会风气，也影响到生产和生活。莫斯科民警局1976年夏季某一天的记录显示，仅在这一天就有几起因醉酒引发的事故：1名电工酒后违规操作，导致另2名电工死亡，还有3名电工被严重烧伤；2名工人酒后驾车肇事，压伤14人，其中6人在急救车到来前死亡；还有1位国家结核病研究所所长、技术科学副博士酒醉打架，用酒瓶子打了科员的脑袋致其死亡……这只是一天的记录，实际上酗酒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已经很难控制。由于在周末过度饮酒，星期一这一天，苏联各工厂、科研机关和设计单位的劳动生产率平均要降低30%~40%，莫斯科的企业、机关由于酗酒造成大量的旷工，每周损失工作日不少于10万个^②。对于酒醉造成的事故，党和行政部门也出台惩罚措施，但这是社会现象，很难制止。在军队中，酗酒也成为普遍存在的风气，在中亚的驻军中甚至还出现了吸毒现象。

这个时期基层党组织增加了一项工作任务：同酗酒作斗争。基层党组织不仅在党员中制止酗酒，还要动员工会、共青团以及其他组织进行这项工作，但往往是一种事后的补救措施。例如，1976年的某一天，在莫斯科第一汽车运输联合公司，上班前对150名司机进行了检查，结果有48人处于不同程度的醉酒状态。但是，在党组织和公司领导的坚持下，他们大部分人还是上了班^③。可见，基层党组织对于普遍性的酗酒也已经难从根上治理，但这又是一项必须抓的工作。

(2) 离婚。在卫国战争结束后，苏联的离婚率就呈现上升趋势，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益严重。据统计，1960年苏联的离婚案有27万起，1975年达到78.3万起，1976年又增加到86.1万起。在1960年每1000对结婚的人中，有104对离婚，1975年有288对离婚，1976年则有322对离婚，即每3对结婚者中就有1对离婚^④。大城市的离婚率更高，1976年，大城市的离婚率达到50%。离婚率升高，导致单身男女增加，带来人口出生率的降低问题、娼妓问题以及堕胎问题。70年代非法妓院

① 《苏联问题译丛》编辑部编译《苏联问题译丛》第5辑，三联书店，1980，第250页。

② 《苏联问题译丛》编辑部编译《苏联问题译丛》第5辑，三联书店，1980，第247页。

③ 《苏联问题译丛》编辑部编译《苏联问题译丛》第5辑，三联书店，1980，第248页。

④ 《苏联问题译丛》编辑部编译《苏联问题译丛》第3辑，三联书店，1980，第91页。

大量出现，有的妓院还按照职业组织起来，如出现了供党的工作者、作家、演员、大学生、运动员等使用的非法妓院。1976 年出生的婴儿有 1/10 是私生子，在莫斯科则达到了 1/5^①。离婚也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酗酒和离婚数量的增加，影响到社会风气。而醉酒者和单身者到处游荡，也增强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在 20 世纪 60 ~ 70 年代的苏联，抢劫、赌博、流氓案件的增加与这些情况有很大关系。有的党员或基层党组织干部也因酗酒或家庭婚姻出现问题而思想颓废，影响了党员或党的干部的自身形象。有一封党员的信件反映了民族地区的犯罪问题^②。信中指出，在他们所处的土库曼共和国，主要犯罪问题有反社会现象，包括妨害生命与健康的重度犯罪，这在当地有习惯和传统，这些习惯和传统与民族区域社会中的各种消极因素相关。在土库曼共和国从封建社会遗留下来了一部分恶习，如收结婚礼金、收取红包，以及一些受伊斯兰教义严重影响的行为，如轻视女性、强迫女性顺从丈夫和亲族。这些不良习俗对年轻人有很大影响，对他们积极地找工作，到其他需要他们劳动的地方去工作都有影响。当然，不是所有地方的风俗习惯都会引发犯罪，但是对民族地区的地方习惯特征必须加以研究。

(3) 贪污腐败。贪污受贿之风在当时可谓愈演愈烈，严重败坏了苏联的党风，在基层党员中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苏联共产党执政早期，列宁和斯大林对党的干部的责任与义务早有论述，对官僚主义、贪污腐败现象也有明确的态度，而苏联的法律对党的干部与政府官员的行为也有严格规定。领导干部中间的贪污受贿现象并不多，尤其在新经济政策末期到卫国战争时期，党内严格的组织纪律对干部形成了比较大的约束。有学者认为，在苏联出现大规模贪污贿赂行为是在苏共 20 大之后，“随着对作为党和权力化身达数十年之久的斯大林的一贯正确的狂热信仰的崩溃，随着党的统治集团的成员和广大党员思想

① 《苏联问题译丛》编辑部编译《苏联问题译丛》第 5 辑，三联书店，1980，第 253 页。

②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759. Л. 87 - 90. 作者 X. 阿玛诺夫 (X. Аманов)、Г. В. 安东诺夫 - 罗曼诺夫斯基 (Г. В. Антонов - Романовский) 均为国立土库曼高尔基大学的法学副博士。

顾虑的消除而产生的”^①。这个说法在当代俄罗斯学者的笔下也得到了认同。有研究者评论说，苏共领袖多多少少带有禁欲主义色彩的时代在赫鲁晓夫时就被终止了，而勃列日涅夫对接受“礼品”的热情以及他做这种事时孩子般的开心是尽人皆知的^②。的确，勃列日涅夫本人及家族牵涉腐败，在苏共官员中贪污腐败现象严重。根据人们所了解的情况，包括勃列日涅夫本人在内，他的家族很多人都涉嫌腐败，而在当时的苏共官员中，贪污腐败案件也不胜枚举。就腐败案件的数量、规模以及社会影响来看，在苏联70多年的历史中，勃列日涅夫时期堪称“空前绝后”，尤其是在他执政后期，即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10年左右的时间里。

第一，总书记“带头”腐败。勃列日涅夫的女儿之所以牵连进“珠宝钻石走私案”这样的大案，其主要原因在于勃列日涅夫对女儿一直以来的姑息，助长了她的种种恶习。尽管也有人说，勃列日涅夫曾不止一次痛心地责怪女儿的行为，斥责酩酊大醉的儿子，但“这并不妨碍他包庇女儿的丑行”^③。同时，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勃列日涅夫本人就是腐化堕落的“带头人”。他对贵重礼品、轿车、猎枪的喜爱在苏联时代就已为很多人所知晓，尤其是他在百万电视观众面前爱不释手地摆弄Г.阿利耶夫送给他的那枚有名的金刚钻戒的镜头，更把自己的那点爱好毫不遮掩地置于众目睽睽之下。同时，他从不忘记满足家人的要求。Г.沙赫纳扎罗夫曾回忆说：“行贿受贿致命地击中了社会高层。勃列日涅夫本人也经不起‘甜蜜生活’的诱惑，不能自持并深陷其中。他喜欢礼品并找到了不光彩的办法来满足这种欲望：在出访时尽可能送给外国首脑贵重的礼物（当然，费用是公家出），期待着轮到给自己送礼物时对方不小气（这也是公费的，只是‘报’给总书记个人了）。”他还回忆，每一次出访回来，在莫斯科伏努克沃机场2号航站楼，总书记的专机落地时，都

① [苏] K. 西米斯：《苏联各部门的贪污贿赂》，载《苏联问题译丛》编辑部编译《苏联问题译丛》第5辑，三联书店，1980，第202页。作者原为苏联外交部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并当过律师和法律研究员，写这篇文章时已移居美国。

② Александр Островский, Кто поставил Горбачева, Москва. Алгоритм, ЭКСМО. 2010. с. 116.

③ [俄] 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第341~342页。

会从飞机上卸下装有高档礼品的几十只箱子，装到厢式货车上给总书记运回别墅。而勃列日涅夫不可能不知道，他每次去捷克的卡罗维发利之后，夫人维多利亚·彼德罗夫娜都会收到很多“贡品”，而对珠宝钻石有着病态痴迷的女儿所做的那些冒险勾当，他也不可能不知情。人们说，维多利亚·彼德罗夫娜·勃列日涅娃有一间房专门装着她收集到的礼物，为此，家人叫他“铜山的女主人”^①。

此外，勃列日涅夫弟弟的受贿行为也广为人知。他女儿在回忆中曾写道：“父亲……跟那些来路不明的高加索人、小商贩、在宾馆酒店搭上关系的专业人士来往，他们打着他的旗号购买短缺的‘伏尔加’轿车，建造别墅，还有朋友和老乡也扯进这种地下活动。”勃列日涅夫在对外贸易部担任第一副部长的儿子尤里也有一些腐败传言，人们说他是“一个酒鬼加小偷”。而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更甚：他从一个上尉到内务部第一副部长的升迁，以及贪赃枉法、索贿受贿的种种恶行早已被人们所知。有人生动地记下了他去也门出访的行为：开始他完全是很冒失地、踉踉跄跄地从飞机里走出来，差点没跌倒在前来迎接的“高规格迎宾队”以及皇家卫队和其他人面前。访问日程也被他完全给改了：因为从中午到晚上他很不像样子地喝得烂醉，而从早晨到午饭前又不能打扰他。等回国时，却带了数不清的行李和箱子。正因为如此，有人在介绍“总书记本人和他的家庭的腐败和贪欲”的一些情况时断定，“总书记自己的家庭也变成了社会的腐败场所。”“扎维多沃已经变成了腐化堕落的地方。”^② 看起来，这个判断并不为过。

第二，高官带头腐败。除了家人，勃列日涅夫还对自己的朋友、同乡姑息纵容。他所提拔的那些在乌克兰的同事及老乡，或者曾在摩尔达维亚一起工作的同事，其中不乏贪腐之人。例如，内务部长谢洛科夫，作为亲信之一，很得勃列日涅夫的信任，但他“不仅是个猥琐无能的小人，而且还是个道德败坏甚至蓄意犯罪的人”，关于他领导的内务部“发生的霸占和侵吞珍贵财物的事件”有很多报道，他充分地利用了勃

^① Александр Островский, Кто поставил Горбачева, Москва. Алгоритм, ЭКСМО. 2010. сс. 116 - 117.

^② Александр Островский, Кто поставил Горбачева, Москва. Алгоритм, ЭКСМО. 2010. сс. 117, 116.

列日涅夫对女儿女婿的“舐犊之爱”为自己投机钻营。此外，受到勃列日涅夫包庇纵容的亲信还有梅杜诺夫、拉希多夫、阿利耶夫、库纳耶夫^①等。

在中央各部门以及地方，涉嫌贪污腐败官员级别高，并且范围在不断扩大。从最初的个别部长，到勃列日涅夫后期涉及多个部，甚至中央委员。例如，1975年苏共查处了一批贪腐案件，涉案人有州委会和加盟共和国的部门领导，还有一些政论家和经济活动家。在这批被查处的官员中，有一位苏联部级女领导阿德加·纳斯里特季诺娃，她在1959~1970年曾担任乌兹别克最高法院主席团主席，1970~1974年又担任苏联民委主席。她通过各种手段获得了别墅、住房、裘皮、汽车等，而她女儿贪污案值不下几百万卢布。

腐败甚至出在苏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典型例子是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候补委员B. 姆日阿瓦纳泽。原格鲁吉亚中央第二书记H. A. 罗吉昂诺夫回忆说：“在我到格鲁吉亚上任后不久，姆日阿瓦纳泽夫妇邀请我和我妻子去做客。主人生活很一般，穿着也一般。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一切都变了——总书记的夫人和女儿开始打扮高贵亮丽。他们开始很时髦地大张旗鼓庆贺女主人的生日，把她称为‘维多利亚女皇’。生日庆典邀请了大量宾客，他们赠送了价值不菲的礼物。”姆日阿瓦纳泽夫妇的住宅，现在也成了“公馆”，因为一走进那所大房子“马上让人想到贵族阶层的古玩店，而不是过日子的地方”^②。

这些情况在戈尔巴乔夫夫人赖莎的回忆中也可得到证实。她回忆说：“1978年搬进莫斯科以后，我有不少发现，其中之一就是：某些国家领导人，包括党的领导人，除了拥有供应的国家别墅外，还修建了私人别墅，为自己的子女、孙子们同时修建了私人别墅。这种奢华和大胆，令

^① [俄] 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第342~343页。谢洛科夫的最终结局是在后来的案件调查中自杀。梅杜诺夫时任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拉希多夫为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第一书记，阿利耶夫为阿塞拜疆共和国第一书记，库纳耶夫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第一书记，他们在当时都有腐败行为或者牵涉到一些重大的腐败案件中。

^② Александр Островский, Кто поставил Горбачева, Москва. Алгоритм, ЭКСМО. 2010. сс. 105, 107.

我为之震惊。”^① 的确，在 20 世纪 70 ~ 80 年代之交，贪污盗窃国家财产的现象在俄罗斯联邦贸易部、苏联外交部、外贸部、后勤部、俄联邦轻工业部、苏联文化部都有出现。正因为如此，时任苏联文化部部长 E. 福尔采娃把用于装修大剧院的材料挪出了一部分，用来建造个人别墅，被告发了。而当政治局开会就这件事批评她时，她大光其火，扔给在座的人们一句话：“没有什么可责备我的，看看你们自己吧。”^② 是啊，如果大家彼此彼此，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第三，贪污腐败涉及各部门各行业各级别工作人员。在当今的很多媒体中，能举出勃列日涅夫时期腐败案件的名称有很多，有影响的大案如前述的“珠宝钻石走私案”，还有“黑鱼子酱走私案”“乌兹别克黑手党案”“驸马案”等。当时的腐败案件所涉及的部门与行业很多：在国内贸易、国际贸易领域，鱼类、肉类、食品加工等生产领域，还有金矿、金刚石等矿产开采部门都有。而在每个涉案部门和行业中，又能“纵向”牵出一串又一串的相关人员，并且最终有可能指向一些位高权重的领导。例如，苏联检察院调查处处长 A. 布图尔林回忆，在参与调查“鱼类案件”时，“一开始我们就遇到多方面的人，涉案的人从操作班长、工匠到鱼类加工厂厂长，从‘海洋’联合公司贸易工作人员到渔业部主要领导，直到副部长雷托夫”。实际上，这个贪赃受贿的链条末梢没有止于雷托夫，还涉及渔业经济部领导、苏共中央委员 A. A. 伊利可夫。这是在渔业部，在别的领域，如肉类、木材加工、棉花、粮食以及日用品服务系列，还有社会保障部门，情况也与此类似。在棉花生产领域的“乌兹别克黑手党”案件中，一大批领导干部虚报棉花产量 100 万吨，从国库骗取 20 多亿卢布的收购资金，案件涉及乌兹别克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

当时在莫斯科商业贸易领域也发生了因出售大宗商品“提成”而引发的“特列古波夫案”，从莫斯科贸易百货公司往下，每个部和每个部门都有提成，形成了一个封闭的链条，“参与犯罪的实际上有 30 万首都

① 转引自李慎明主编《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 312 ~ 313 页。

② Александр Островский, Кто поставил Горбачева, Москва. Алгоритм, ЭКСМО. 2010. с. 107.

贸易工作者”。在苏联另一个大城市列宁格勒也一样，根据原列宁格勒“太平洋公司”贸易部的一位工作人员在1995年提供的信息，截至1987年，在列宁格勒贸易领域从售货员到经理，有95%的工作人员涉案^①。

在对外贸易领域，除了涉案人员多之外，金额巨大，也令人瞠目。1980年破获的“黑鱼子酱走私案”，涉及渔业部、贸易部、食品工业部、太平洋舰队等部门的300多名干部，使国家遭受了几百万卢布的经济损失^②。

自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开始从国外进口粮食。最初，进口粮食是为了弥补国内粮食生产的不足，而到后来，则与粮食走私案件紧密关联。有人计算过，1961~1985年，苏联为农产品额外支出了1500亿美元。1986年7月11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讲道：“我们付给美国每吨粮食160美元，而在国内每吨只值111美元。这样一来，每吨损失50金卢布。”根据另外的数据，“购买小麦的内部价格是每吨100卢布，而在国外购买则是每吨225卢布”。这就是说，苏联每进口一吨粮食，就要比在国内购买多花1倍以上的钱。“为什么苏联政府在明明知道这一点的同时，还要超高价地付给美国和加拿大的农场主，而少支付给自己的集体农庄庄员呢？”1973~1983年担任加拿大大使的A. H. 雅科夫列夫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写道：“我很清楚，在粮食进口系统中，国家黑手党有组织地、很好地操控着这件事，并使得相互关系复杂化。”^③

还有一个例子是金刚石走私。20世纪70~80年代，苏联的金刚石产量不断增加，到接近80年代中期时，苏联的金刚石开采量已经占世界的1/4。还在1960年，苏联内贸部就同英国的“德比尔斯”公司签署了在这个领域合作的合同。合作的“成果”是，1970~1988年，苏联向境外运出价值48亿美元外汇储备的金刚石，而“德比尔斯”公司仅在1977~1978

① Александр Островский, Кто поставил Горбачева, Москва. Алгоритм, ЭКСМО. 2010. сс. 105 – 106.

② 在《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一书第五章中，对“黑鱼子酱走私案”具体情况有比较详尽的介绍，本书不再赘述。参见李慎明主编《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316页。

③ Александр Островский, Кто поставил Горбачева, Москва. Алгоритм, ЭКСМО. 2010. с. 109.

年通过倒卖苏联金刚石到以色列就赚了 26 亿美元。事情还不止于此：金刚石在加工成钻石后，身价“成百倍”地提高。因此，在政府中，多次有人提议，苏联应该自己组织加工金刚石来出口钻石。但是，每次都有某种“不为人知的力量”压住了这些提议，并极力证明苏联没有能力发展自己的钻石生产^①。于是，在苏联，一面是官员及家属从事钻石走私活动，另一面又在出口廉价的金金刚石，使外国公司通过倒卖金刚石赢取巨额利润。

这些情况也说明，当时在国家（可能还有党）的结构中，不仅有责任部门从事“影子经济”的人，还有外国资本，为达到个人赢利目的，有可能对苏联国家政策施加影响。

第四，买官卖官猖獗，连党证和公职也可以买卖。除了经济领域的腐败活动外，在党政职能部门，还有利用职务牟利受贿的，这就是出卖公职和党证的活动。当时，在一些党组织，把“党的权力”变成了牟利工具，“在某些共和国甚至有给党证明码标价的”。根据格鲁吉亚共和国中央第二书记罗季昂诺夫的话，在这个共和国的一些党组织中，有人从事党证交易，他们把各种类型的骗子接纳进入苏共组织，在他们行了更大的贿赂之后，又把这些人推上了更高的职位。安德罗波夫的前助手西尼岑也断言，根据他掌握的信息，买卖公职在阿塞拜疆也有。还有记录说，在阿塞拜疆的一些地方，给州委书记、一些职能部门官员、管理人员和普通工作人员定的价格为 50 万卢布、30 万卢布、5000 卢布、3000 卢布。在这里，主要问题不是区分党证的价格和各种职位的价格，重要的是，党证和公职交易说明，一些犯罪组织已经同国家及党的组织结合到一起，甚至包括同司法机关结合。有人指出，在 20 世纪 70 ~ 80 年代，从事地下交易的犯罪组织“在城市的和州一级的苏维埃及党的机关里有，个别的甚至活动进入了苏共中央部长会议。党和国家机关的受贿意味着，对于越来越多数的官僚政客和党的政客来说，社会公众的利益被放在了后面，而个人的利益被摆在前面，为了这些个人利益，他们可以牺牲党和人民乃至国家的利益”^②。

① Александр Островский, Кто поставил Горбачева, Москва. Алгоритм, ЭКСМО. 2010. сс. 109 - 110.

② Александр Островский, Кто поставил Горбачева, Москва. Алгоритм, ЭКСМО. 2010. с. 108.

第五，克格勃也不再是一块“净土”，出卖情报与叛逃现象屡屡发生。由于严格的纪律与极其规范的要求，克格勃成了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部门。在一些人心目中，克格勃是苏联国家机关中唯一没有腐败现象的机构^①。不过，克格勃和情报总局的实际情况证明，这种判断并不正确。1991年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有人向时任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提了一个问题：“有多少苏联情报人员投敌？”克留奇科夫眼睛也没眨地回答：“在近16年间（自1974年他担任情报总局领导起）共有8个。”实际上，正如安德罗波夫的前助手西尼岑所写：“正是在克留奇科夫领导下，苏联对外情报机关叛变投敌、逃跑和窃取国家公款的人数超过了第九个。”^②这还没有说有关行贿受贿、盗窃公款及走私这类问题，这些事情在苏联特工部门也有人参与，只是没有达到像在别的部门发生“质变”的那种程度。

外国特工渗透到国家尽可能多的各个机构，是党和国家特权阶层蜕化堕落的证据之一。一般来说，在这个方面不可能得到准确完整的数据。不过，用那些被曝光的或者暴露身份的情报人员的信息情况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一本名为《叛逃者》的书举出了克格勃和情报总局91个工作人员的名字，他们都是1945~1991年叛国的人，其中占大半的48个叛逃到境外或者败露。这些事件发生在1975~1991年。在此只以这份“黑名单”上的两个人为例。

德米特里·费多洛维奇·波利亚科夫曾在情报中心和情报总局总部工作了1/4个世纪。他于1961年11月被美国中情局招募，1962年夏天返回莫斯科。波利亚科夫一度曾在情报总局的“中心机关”工作，后被派往彼尔姆，然后又被派往印度。1972年他重回莫斯科，被任命为军事外交科学院的系主任，并获得少将军衔。1979年初他被派往印度并在那里工作到1980年6月，然后被召回到莫斯科，离开了岗位。但根据一些材料，过了没多久他又被雇到情报总局中心机关。最初他被怀疑是在

^① 有关苏联克格勃的情况，参见王铭玉等编译《克格勃全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

^② Александр Островский, Кто поставил Горбачева, Москва. Алгоритм, ЭКСМО. 2010. с. 110. 弗·亚·克留奇科夫在1974~1988年担任情报总局（克格勃第一局）的领导，1988~1991年任克格勃主席。

1981 年，但因上层领导的庇护，对他的调查拖了 5 年，“直到那些侦查员最终说服了所有上级——从克格勃主席到军事检察长”。1986 年 7 月 7 日，波利亚科夫被捕了。调查证明，在同美国中情局合作的 1/4 个世纪中，他“提供了 19 个非法移民者，超过 150 个外国公民身份的间谍，透露了苏联军队和对外情报部门工作的 1500 名军官的私人信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还有一个被逮捕、送交法院并被作为中情局间谍被枪毙的弗拉基米尔·比古佐夫，被捕时他正在苏联克格勃侦查机关的红色学院工作，并且不属于教师系列，而是党委书记。利用职务之便，他“不只能获得最多的特工机关的秘密文件，这些文件涉及国家安全机关间谍机构干部培养的系统组织，还涉及当时正在办的另外一个名叫‘森林学校’的工作人员的个人信息，这些都是完全真实的数据”。有信息说，比古佐夫破译了几千个克格勃工作人员的密码，并且不只是驻外间谍机关的，还有大量苏联在国外的特工人员的个人信息^①。

这些情况在更早时间不是没有人知道，但却没有人来管。正因为如此，20 世纪 60 ~ 80 年代美国中情局成功地“发展”了几千个苏联间谍，他们做的工作有可能引起大规模逮捕或者驱逐浪潮，但这样的事却没有发生。相反，苏联在国外的情报网却被暴露，或被美国中情局追查，或者被策反。一位美国人曾回忆说，美国中情局的间谍出现在苏联系统中的所有部门，克格勃、情报总局、克里姆林宫、科学研究所，“到处都是”。同时，美国中情局不仅仅“渗透到了苏联以及华约组织国家的情报机关”，还“在最大限度地操控着他们”。在 80 年代有一则笑话，说美国中情局在莫斯科有三个办事处：一个在美国使馆，一个在情报总局，一个在克格勃总部^②。就这样，部分被外国情报部门收买并控制的情报工作人员，为了获得金钱而出卖国家情报，或者直接叛逃出去。这些情况也说明，当时，不只是在经济部门和党政职能部门出现了贪污腐败现象，在情报部门中，为了钱，一部分人也“什么都做”。

除了上述各种现象外，还可以用一个数字来加以说明：一些腐败案

① Александр Островский, Кто поставил Горбачева, Москва. Алгоритм, ЭКСМО. 2010. сс. 111 - 112.

② Александр Островский, Кто поставил Горбачева, Москва. Алгоритм, ЭКСМО. 2010. сс. 113 - 114.

件牵连的人数众多，受到处分的党员也在增加。从党组织的调查数字中可窥见一斑：1981～1985年，苏共开除了42.95万名党员；1986～1989年，开除了49.84万人。大约10年间，被开除出党的人数有近100万人^①。尽管这些被开除的不一定都是因贪污腐败而违法的人，但可从一个角度折射出党员队伍的情况。总体来看，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官员腐败已经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职业上，贪污贿赂涉及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警察、司法、教育等几乎所有行业。在行政级别上，从党和政府高级官员到地方领导，级别最低的一般是区、州一级的干部，如区委书记和各部部长，以及掌管司法权力的官员，还有检察机关（消防、公共卫生、环境卫生和兽医服务等）的负责人，地方各级领导机构的普通成员也利用职权索贿行贿。官员贪污受贿的渠道和手段是不一样的。例如，在工业部门，受贿者主要是各个部、计划部门和供应部门的高、中级主管官员，他们掌握着各企业生产单位的原料及设备的调配权，生产企业的领导为了得到调拨单就要向管理部门的官员递送现金、物品（名酒、生活用品），以及请客吃饭等。在商业部门，商业点的经理或经营者为得到商品的调拨单而向区、州委中主管商业工作的党政负责人，如与商业有关的各部部长、商业局长等行贿。此外，一些商店、餐馆和咖啡馆还要不时地向当地警察行贿，以寻求保护。他们行贿的手段包括现金和商品以及免费服务等。在农村，官员们主要采取向国营农场、集体农庄摊派产品，以及使用农场或农庄中的维修加工（汽车修理、服装加工），还有运输服务等。除以上各种情况外，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可能随时因有求于一些官员而行贿，如为得到居住证^②，汽车驾驶执照或在公路运输上顺利通行，人们要对警察行贿；为使中学生进入高等学校而对入学考试部门行贿；为得

① Александр Островский, Кто поставил Горбачева, Москва. Алгоритм, ЭКСМО. 2010. с. 106.

② 指给予某人在一个指定地点或指定寓所居住的权利的许可证。一般是给予人们在一些大中城市居住的权利。根据估算，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人们要取得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大一点的州级城镇居住的权利，用来行贿的钱数为100～500卢布，而要取得在莫斯科或列宁格勒这样的大城市的居住证，行贿数额一般在1000卢布左右。参见〔苏〕К. 西米斯《苏联各部门的贪污贿赂》，载于《苏联问题译丛》编辑部编译《苏联问题译丛》第5辑，三联书店，1980。

到官职晋升而向上级主管部门的官员行贿；等等。

不难看出，贪污受贿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部门。在官员贪污受贿的过程中，工厂企业的厂长、商业部门的经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主席一般是处于行贿者的地位，他们不能被视为贪污贿赂的源头，甚至在很多时候他们可能是不得不从事贿赂活动，一旦事发他们又可能成为牺牲品^①。为了能够展开工作，一些原来不会或者不想从事行贿受贿活动的领导渐渐被“拉下水”。企业或农庄、国营农场的行贿者多数也在基层党组织担任职务，他们的行贿活动直接影响到基层党员群众。同时，他们自己在行贿过程中，也捞取好处，结果导致盗窃公共财物、出卖工职、商业欺骗等现象蔓延。这种情况严重降低了党员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败坏了党风。

总结上述内容，不难看出，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官员的贪污腐败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其特点主要有：一是层次高：勃列日涅夫本人就十分喜欢阿谀奉承、乐于收受各种礼品，他的家人也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索贿受贿。而一些被勃列日涅夫提拔起来的亲信，那些曾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或者摩尔达维亚与他共事过的下属，还有他的“乌克兰老乡”，那些不属于勃列日涅夫的亲信但也握有职权的省部级或以上官员，以及官员家属——“官二代”，都仿而效之，各级干部除了对上边投其所好，自己也借机搜刮。正如雷日科夫所说：“我们监守自盗。”二是贪污受贿案值大，案由多样。可谓什么都干：从走私黄金、钻石、古董，到粮食、石油、棉花，基本上是只要赚钱什么都敢干，只要赚钱多就一定会有人干。而出了事，特权身份以及关系网又有可能帮他们“摆平”。于是，这些人也便无所顾忌，无视国法民权。三是牵涉面广。各个行业和部门，包括海关、公路铁路船运等运输部门、国内国际贸易各部和各种职能部门，只要需要的地方，基本上都拉入腐败行列或者用钱或权力

^① 例如，20 世纪 60 年代莫斯科市委曾向商店和餐馆派了几十名退伍军官、共产党员，期望他们能够改变所在单位的风气。结果，一位军官因拒绝行贿，导致所在的食物店得不到批发的食品，难以经营下去。为保证正常经营，这位军官只好允许手下人按照行业“潜规则”行贿。事发后，他自己被牵连而承担法律责任。另一位则因拒不向行贿妥协而受到威胁，被迫离职。参见〔苏〕K. 西米斯《苏联各部门的贪污贿赂》，载于《苏联问题译丛》编辑部编译《苏联问题译丛》第 5 辑，三联书店，1980，第 226～227 页。

来“摆平”。于是，贪污腐败的案件往往是“窝案”，每一个案件都会牵涉进很多人。贪污腐化的干部及其家人肆无忌惮。他们有的是明知故犯，而有的根本不知道所做的事情是犯法的，因为大家都在这样做。四是情节恶劣，给国家带来严重损失，在社会上产生恶劣影响。为了走私或者获得其他个人利益，一些人甚至干预国家内外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从而使国家在经济上以及对外关系中蒙受损失。而在社会上，人们谈话中经常出现领导干部及其家人的一些笑话和传闻，这些私下里的谈话既有真实的，也有道听途说的。但由于领导干部队伍良莠不齐，本身就存在很多问题，于是，对于那些传闻，人们更乐于信其有。这本身就反映出人们对苏共领导人以及各级干部的反感甚至否定。

从身份来看，勃列日涅夫时期贪污腐败的官员基本上都处于“特权阶层”，故此，他们的腐败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特权阶层的情况^①。

官员腐败对当时以及后来苏联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第一，党员干部的贪污腐败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带来思想混乱，动摇了苏共执政的社会基础，造成官员与群众之间的矛盾甚至对立。贪污受贿之风不仅污染了全党，也污染了全社会。正如一位俄国学者指出的那样：“在20世纪70年代末，特别是在80年代初，谎报指标、弄虚作假、盗窃公物、行贿受贿实际上已成为群众性现象。”^②为了牟利，那些贪官往往形成较为封闭的、由自己人构成的“圈子”。他们脱离群众、欺上瞒下、损公肥私、贪污受贿等行为很快又对党内风气形成了致命的影响。当时出现的“夜间人”“面具人”“持不同政见者”，甚至普通百姓，经常把一些官员腐败的事作为谈资。于是，有关苏共领导人和官员乃至家属的各种“消息”“传闻”在私下里广泛传播，一些腐败行为在经过传播者的编织后，绘声绘色，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那些真实的或者半真半假或者根本就子虚乌有的传闻严重损毁了党员干部的形象，

^① 李慎明主编的《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一书第五章对苏共特权阶层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本书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其内容。在此对该书作者表示敬意与感谢。参见李慎明主编《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② 转引自李慎明主编《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323页。

而官员们的腐败行为更是引起了群众的愤慨和憎恨。他们把自己与腐败分子及其所处的特权阶层对立起来，而把特权阶层与党和政府画上等号。于是，苏联党和政府不再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成了高高在上的拥有既得利益的特权阶层的代表，甚至成了贪污腐化、不劳而获者的化身，使得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

第二，影响了改革进程，给后继者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由于勃列日涅夫本人缺乏治国理政的才能，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又身体多病，而他本人以及所任用的一些官员醉心于享受、满足于现状，不思进步与改革。苏联在 6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不仅错过了第三次世界科技革命的机遇，也扼杀了诸如柯西金改革以及其他一些学者和政治家的进步改革实践。与此同时，却使诸如“影子经济”“黑市交易”这样的贪污犯罪行为活跃起来。根据俄罗斯研究者计算，到 80 年代中期，全部黑市交易的金额已经达到 2000 亿~3000 亿卢布^①。这些行为给社会健康发展带来极坏影响，“停滞”与“短缺”逐渐成为勃列日涅夫后期的代名词。而改革与整顿社会秩序更让百姓期盼，人们甚至在心照不宣地“等待”勃列日涅夫的逝去。但是，他却给继任者留下了一个处处都要收拾的“烂摊子”。安德罗波夫一上台，就要先“收拾残局”，着手处理像谢洛科夫腐败案、丘尔巴诺夫贪污案、乌兹别克黑手党案这样一些腐败案件。由于身体多病，加之过度劳累，安德罗波夫就任总书记不到一年便住进医院，几个月后去世，他几乎来不及做其他的事情。有的腐败案件在他病逝后就停了下来，直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又“捡起来”，如丘尔巴诺夫腐败的“驸马案”。于是，在当时，有的案子审了五年，材料整理了几百页。而有的案子来不及了结苏联就解体了，办案人员自己却受到调查或迫害^②。这些情况对于“后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的改革而言，十分分散精力，影响了其他工作的进行。其后续影响可能直到现今——普京政府也同样面临腐败问题的考验。

第三，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失。如前所述，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贪污腐

^① Александр Островский, Кто поставил Горбачева, Москва. Алгоритм, ЭКСМО. 2010. с. 47.

^② 李慎明主编《苏联解体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 88~93 页。

败案件无论是涉案人员的级别、人数，还是案值金额都十分巨大，那些“巨贪”如同一个又一个“硕鼠”吞噬着国民的财富。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伸出“黑手”去干预各个领域各个部门的政策制定与正常工作。尤其是在走私案中，他们甚至与西方国家那些操纵国际油价以及黄金、钻石等的资本“大鳄”沆瀣一气，里应外合。这种“黑手党”性质的经济活动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对苏联在国际贸易以及外交关系带来的损失仅用美元或卢布怕是已经难以计算^①。更为重要的是，还有那些身处特权阶层、精英阶层的官员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了使自己手中的财产完全私有化和合法化，一些联盟一级以及加盟共和国的高官，希望国家转向资本主义轨道，极力推动社会制度的变革乃至“革命”，对苏联解体起到了催化作用。最终在苏联的“丧钟”里他们收获了原本不属于自己的财产，并继续利用“私有化”等手段侵吞国家财富^②。美国学者大卫·科兹在《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中所提出的观点在当代俄罗斯学者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

第四，授人以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无产阶级政党，它的美好理想是铲除资本主义社会的严重贫富不均和极端个人主义，建设一个社会公平、公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领导干部是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为民众谋利是他们的义务。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腐败盛行，党的作风建设与干部自律在这个时代也成为空谈。他们的腐败行为成为西方反共、反苏人士的把柄。从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西方国家就从未停止过制造谣言与推翻政权的努力。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国家的报刊描写苏共特权阶层的文章连篇累牍，研究苏共特权阶层的著作也五花八门。出于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西方政界、学界的一些人不惜歪曲事实、夸大特权，大力渲染苏联社会的特权阶层，以达到丑化苏联党和政府的目的。这些现象损害的不只是苏共领导人、苏共、社会主义苏联的形象，还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

① 参见〔美〕施魏策尔《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殷雄译，新华出版社，2001，第119页。

② 关于部分苏共官员借改革之机谋取私利的情况，参见李慎明主编《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327~333页；〔俄〕尤里·普罗科菲耶夫：《苏联解体：谁之罪？怎么办？》，张树华译，《红旗文稿》2012年第14期。

甚至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信仰。

总之，酗酒、抢劫、赌博、流氓案件的增加，加之官员中的行贿受贿、贪污腐败盛行，所有这一切导致苏联社会道德风气败坏，各种矛盾日益突出。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社会主义苏维埃国家的情况是：“勤勤恳恳的劳动变成最卑贱的营生。迟到、缺勤、跳厂、消极怠工、虚报产量、弄虚作假成了普遍现象。伴随而来的是老老少少普遍酗酒。”“冷酷、粗暴、说下流话成了所谓苏联生活方式的‘道德规范’。”^① 社会道德水准的下降，各种社会问题的突出暴露，给基层党组织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复杂情况，基层党组织工作的难度也前所未有地增强。

（五）民族矛盾上升加重了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工作的复杂性

苏联是一个有 100 多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从联盟成立之初就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由于波罗的海国家和摩尔达维亚等地方并入苏联，以及 20 世纪 40 年代苏联政府强行迁徙巴尔卡尔、卡尔梅克等少数民族，因而埋下了民族争端的祸根。苏共 20 大前后，苏联政府就开始为斯大林时代一些被强制迁徙的少数民族平反，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多数当年被强制迁徙者陆续迁回原居住地，但还有一些民族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少数民族的斗争并没有平息^②。1964 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在中亚的吉尔吉斯、乌兹别克，以及波罗的海三国，还有乌克兰、摩尔达维亚等地区以及犹太人，非俄罗斯族人反对俄罗斯的民族压迫，要求民族独立的文章、游行示威、抗议活动一直延续到 80 年代。这些反抗活动有的是针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有的是对苏联政府思想控制表达不满。与斯大林时期对民族主义者动辄关押或判刑等极端政策相比，勃列

① [苏]阿夫托尔哈诺夫：《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杨春华、张道庆译，新华出版社，1981，第 112 页。

② 例如，1957 年 2 月苏共中央通过几个决议，准许在卫国战争期间被从北高加索地区迁至中亚的巴尔卡尔、车臣、印古什、卡尔梅克、卡拉恰耶夫人有组织地迁回原处，并恢复这些少数民族的自治共和国或自治州。1964 年、1967 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撤销 1941 年《关于迁徙伏尔加河地区日耳曼人》的命令，公布“关于在克里米亚居住过的鞑靼公民的法令”，给曾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日耳曼人、鞑靼人平反，但没有准许他们迁回原居住地。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译《苏联民族问题文件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第 206～209、278～279、293 页。

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的政策还是相对宽松一些，尽管也采取压制的政策，但不再采用过于严厉的打压手段对待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抗议，甚至对“有民族情绪”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一般也只是更换职务或者撤销原来的职务。当然，这些少数民族领导解职后的空缺多由俄罗斯人来填补^①。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化解或掩盖了民族上的敌对情绪，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不再有大的民族冲突事件。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2大上抛出“人们新的历史性共同体”即“苏联人民”^②这一概念，强调苏联境内各大小民族日益紧密地接近。1972年，勃列日涅夫在庆祝苏联成立50周年大会上总结民族问题时甚至宣布：“过去遗留给我们的那种状况的民族问题，已经完全解决，已经彻底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③他把这个成就与苏联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文化革命等方面的胜利相提并论。实际上，在当时的苏联，民族问题已经暗流涌动。

在苏共党内，俄罗斯人一直占有比较大的比重，少数民族党员的数量相比较而言要少一些。这一方面是由于在俄罗斯共和国党的力量发展较快，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苏联政府推行向少数民族地区迁移俄罗斯人，而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党员和培养党的干部时，又以俄罗斯人为先。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苏共党员中俄罗斯人占据了多数。表2-5是对1977年苏共各民族党员所占比例的统计结果。

表2-5 苏联共产党的民族成分（1977年）

单位：人，%

| 民族 | 绝对数字 | 占比 | 民族 | 绝对数字 | 占比 |
|------|---------|------|--------|-------|-----|
| 俄罗斯人 | 9679129 | 60.6 | 摩尔达维亚人 | 72331 | 0.5 |
| 乌克兰人 | 2561818 | 16.0 | 拉脱维亚人 | 66402 | 0.4 |

① 例如，1973年苏联《真理报》报道亚美尼亚党中央第二书记格·阿·捷尔-加扎里扬茨被解职，是同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经济不稳定”有关，他的职务由俄罗斯人阿尼西莫夫接替。在这前后，曾担任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谢列斯特被解除了在乌克兰和苏共中央担任的领导职务，其主要原因是他有“民族主义情绪”。

② 赫鲁晓夫在苏共22大上断言：“在苏联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的、新的历史性共同体，即苏联人民。”“苏联境内各加盟共和国的界限愈来愈失去原来的意义。”参见阮西湖等《苏联民族问题的历史与现状》，三联书店，1979，第122、124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译《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第343页。

续表

| 民族 | 绝对数字 | 占比 | 民族 | 绝对数字 | 占比 |
|-------|--------|-----|-------|---------|-----|
| 白俄罗斯人 | 550833 | 3.5 | 吉尔吉斯人 | 51112 | 0.3 |
| 乌兹别克人 | 333907 | 2.1 | 塔吉克人 | 65477 | 0.4 |
| 哈萨克人 | 292936 | 1.8 | 亚美尼亚人 | 239460 | 1.5 |
| 格鲁吉亚人 | 265625 | 1.7 | 土库曼人 | 50269 | 0.3 |
| 阿塞拜疆人 | 241677 | 1.5 | 爱沙尼亚人 | 50984 | 0.3 |
| 立陶宛人 | 110934 | 0.7 | 其他民族 | 1331582 | 8.3 |

注：数据截至 1977 年 1 月 1 日；苏共党员和预备党员总数为 15964476 人。

资料来源：〔苏〕H. A. 彼特罗维切夫主编《党的建设》，郭华等译，求实出版社，1983，第 80 页。

从表 2-5 中可知，俄罗斯人占据了党员的一半以上。而在生活中，是不是党员又影响到一个人的政治地位，因此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也多由俄罗斯人担任。俄罗斯人在各加盟共和国的党组织中，一般都处于第二把手的位置，而在实际上又是主要决策者。一些俄罗斯人在言谈中经常流露出对少数民族的轻视态度。例如，1976 年在立陶宛，一个克格勃小头目就曾说：“为加速民族融合的一切手段证明都是有道理的。我们要镇压立陶宛，就像按死跳蚤一样，立陶宛将不复存在。”^① 俄罗斯族干部的歧视，加上对苏联政府民族政策的不满，使得少数民族党员对于苏共的民族政策的不满情绪也在增长。例如，1971 年夏天，在苏联拉脱维亚加盟共和国有 17 名老党员（自称党龄在 25~30 年甚至更长时间），给一些外国的领导人写信，指责苏共中央把强迫同化苏联境内的少数民族作为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对内政策目标之一。他们还举出一些事实：俄罗斯族“移民”涌入拉脱维亚后，约有 2/3 的电台和电视节目是用俄语播放的，而里加广播中心的前负责人耶林斯基则因“抵制俄罗斯人这方面的要求而被撤职”。在拉脱维亚共和国各市、州以及大多数区的行政机构以及所有企业，用俄语处理一切事务，“所有大小会议都用俄语进行”。他们对这种情况极为不满，希望其他国家领导人了解真相，给苏联

^① 转引自阮西湖等《苏联民族问题的历史与现状》，三联书店，1979，第 126 页。

政府施加压力^①。这种“老党员”集体抗议的情况尽管在当时并不多见，但可看出，在一些加盟共和国的党员中确实存在不满情绪，而调解民族间矛盾也成为各加盟共和国基层党组织在正常工作之外的任务之一。

20世纪50年代以后，尤其是60~70年代后，苏联各种社会问题日益增加。造成这些社会问题有思想上的原因，如因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起的思想震荡，“解冻思潮”与“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有组织管理上的原因，如商业服务业人数增加以及建筑业中从业人员的流动性很大；有日常生活行为上的表现，如酗酒、赌博、离婚等；加之国家政治生活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如官员中的贪污行贿行为，俄罗斯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关系及民族矛盾的突出，等等。这些问题有的在斯大林时代甚至在列宁时代就已经存在，但由于当时有强大的、组织严密的党的体系，党在组织和管理以及宣传上始终采取强而有力的措施，加之国内战争、处于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威胁以及伟大卫国战争等客观因素的存在，使得一些内部矛盾被掩盖了下来。苏共20大揭开了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盖子”，也带出了原本存在的社会问题。到60年代以后，各种问题的凸显与交错，使基层党组织工作面临复杂的局面。这就要求基层党组织工作加强领导，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应对各种困难，而实际上基层党组织工作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

三 20世纪中后期农业政策调整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加强

赫鲁晓夫时期实行了大规模垦荒政策，还部分下放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计划制订权，苏联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开始好转；勃列日涅夫时期国家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实行货币工资制等，使农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农业生产的低效率，使得苏联农业逐渐成为国家经济的一个负担。

^① 具体情况参见郑志《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苏联非俄罗斯民族反抗斗争纪要（1964年12月至1980年1月）》，载《苏联问题译丛》编辑部编译《苏联问题译丛》第5辑，三联书店，1980，第115~161页。该文将当时能够收集到的有关苏联国内民族反抗的报道都收集起来，其中有一部分材料来自美国、英国、法国、西德、瑞典、瑞士的各种通讯刊物的报道，其出发点在于站在不同意识形态角度，批评苏联的人权状况，具有一定的煽动性，以挑动苏联民族矛盾和国内冲突。在引用这类材料时，对其立场和出发点需要认真加以辨析。

（一）1953 年前后苏联农业政策的调整

直到 1952 年，党在农村中的影响还是不够的，也是不经常的，因为这时在许多集体农庄中还没有党组织，农村中的党员多半是从事领导和技术工作的人员，很少深入农庄从事具体的农业劳动，且受教育水平也比较低。在斯大林逝世的 1953 年，苏联共有集体农庄 9.3 万个，工艺合作社 1.6 万个，消费合作社 2.3 万个^①，集体农庄是集体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从这一年起，苏联农村状况有所改善。1953 年 8 月，马林科夫代表苏联政府宣布将农业税减低两成，并保证人民的衣食供应，受到农民和工人的欢迎。这些政策使一些地方的农民家中有了牲畜、农副产品甚至现金，因此他们“完全支持马林科夫”。人们不只拥护马林科夫，对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也完全信任^②。

根据赫鲁晓夫的一份报告，到 1953 年 9 月，在农业部门工作的受过高等或中等教育的 35 万名专家中，在集体农庄中工作的只有 1.85 万人，在机器拖拉机站工作的只有 5 万名。在 9.4 万个集体农庄主席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只有 2400 人，受过中等专门教育的只有 1.42 万人，并且不是所有集体农庄主席都参加农业生产活动，许多机械师、农艺师、畜牧师、兽医等专业人员都待在机关里，甚至原来在农村机器拖拉机站工作的拖拉机手和其他机务人员转行到工业企业和建筑业以及其他机构中工作，而机器拖拉机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又极其缺乏高素质的农业干部^③。赫鲁晓夫的报告中讲到了苏联农村中种种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为此，苏共中央采取了一些比较现实的措施来解决农业问题，如用提高农村机器操作人员的工资等办法大大增加对集体农庄从事生产的物质刺激；简化中央对集体农庄的多重控制，放松对生产计划的集中控制，允许各农庄有一定的自主性；增强党对农庄的领导，削弱政府机构的作用；同时，强化农村区一级党委机关工作，加强农村党组织的活动，使之对集体农庄、国营农场以及机器拖拉机站的工作发挥必要影响。

① 《吴仁彰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第 211 页。

② Ю. В. Аксютин.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строения в СССР (1953 – 1982) . Г. Н. Севостьянова. Россия в XX веке. Реформы и революции. т. 2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2002. с. 340.

③ 上述数字及具体情况参见北京大学经济系研究所编《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1953 年 3 月～1964 年 10 月）》，商务印书馆，1976，第 15～16 页。

由于党对农村政策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加之从1954年在哈萨克开垦处女地活动，使得粮食获得丰收。从1955年起，机器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可以制订自己的详细生产计划，提请中央批准和调整，而在过去都是由中央下发指示来执行。1953~1957年，苏共还派出几千名共产党员（党政工作人员、工业企业工程师、农艺师、畜牧师等）到集体农庄从事领导工作。1956年，8.75万个集体农庄中还有7000个没有基层党组织，而有1万多个集体农庄的基层党组织只有3~5名党员^①。但是，农村中的党的领导工作已经有很大改观，到1957年初，集体农庄主席中已有90%以上是共产党员，有1/3以上的集体农庄主席受过高等或中等专门教育^②，加上一批从实际工作中提拔起来的干部，使集体农庄中的基层党组织发展并巩固起来。1958年，在苏联农村进一步合并集体农庄^③，农庄总数降至7.8万个左右^④。党在集体农庄中加紧发展党员。这一年赫鲁晓夫宣布取消机器拖拉机站，将农业机械转归农庄所有，集体农庄成为独立的计划单位^⑤，农庄主席逐渐得到农民的信赖，他们与基层党组织相互配合，加之解散拖拉机站时一大批党员充实到集体农庄中的党组织里去，因此，到1958年，差不多所有的集体农庄都有了基层党组织，一个较为健全的农村党组织网建立了起来。1958年，赫鲁晓夫在一次讲话中宣告，农村粮食生产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⑥。

① [英] 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徐葵、邹用九、裘因译，东方出版社，1991，第625页。

② 数字参见北京大学经济系研究所编《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1953年3月~1964年10月全会）》，商务印书馆，1976，第295页。

③ 苏联农村原本多是分散的小型农庄，还在斯大林时代后期，就开始把集体农庄合并成为更大的单位，以达到正规化管理，其内部可以有一个合适的基层党组织来进行工作，基层党组织把它的影响扩展到农庄的其他成员。不过，这个工作的大规模展开是在1958年，改革机器拖拉机站，大范围合并集体农庄，使苏联农村状况有了比较大的改变。

④ Правда，28 марта 1958.

⑤ 原来国家通过拖拉机站来控制集体农庄，农庄的生产活动都要依靠拖拉机站，取决于国家统一计划。现在将拖拉机站的设备转让（出售）给集体农庄，显然改变了集体农庄同国家的关系。美国教授格雷戈里·格罗斯曼提出了这种看法。参见陆南泉、张文武编《国外对苏联问题的评论简介》，求实出版社，1981，第175页。

⑥ Правда，28 марта 1958. 赫鲁晓夫于1958年12月15日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对集体农庄收入的增加做出了估计，认为1957年所有集体农庄总收入比1952年增长了1倍多。

1959 年，在苏联农业劳动者中广泛开展了短期内按人口平均计算肉类和其他畜产品生产赶上美国的社会主义竞赛，粮食产量和肉蛋类产品产量增加，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出现了一批先进的集体农庄和农业生产革新者个人。例如，坦波夫州 E. И. 安德烈耶夫领导的共产国际集体农庄提前一年实现了自己的竞赛任务，每 100 公顷农业用地平均生产 171 公担肉类和 350 公担奶类；拉脱维亚共和国“卡捷尼耶基”国营农场养猪员安东·巴尔杜里斯喂肥了 2014 头猪，交售给国家 2000 公担猪肉，等等^①。苏共中央号召全部集体农庄庄员、农村中的一切劳动者以及党的各级组织、工会、共青团等都来参加社会主义竞赛。在这一时期，基层党组织与工会、共青团共同进行社会主义竞赛的宣传与组织工作。

1962 年，赫鲁晓夫划分工业党和农业党，一直到基层都有专职的党的书记，这种做法给基层党的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混乱，主要是上级领导又增加了，并且职权划分不清，从而出现工作中领导权限不清的混乱。1964 年 11 月，苏共中央做出决议，合并州、边疆区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以纠正赫鲁晓夫政策的错误，农村中基层党组织工作重新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来。

（二）20 世纪 60 ~ 80 年代农村基层党组织队伍的扩大

应该说，从 1953 年以后，苏联共产党就比较重视农村中党的工作，强调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加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的基层党组织工作。1958 年合并集体农庄后，农村的基层党组织网建立起来，到 1965 年初，苏联农村中已有 5 万个基层党组织，有 200 万名以上的共产党员^②，他们是一支在农村中宣传和鼓动群众的大军。到 1968 年，农村中的共产党员已达 500 万名以上。农产品产量增加，集体农庄的收入也有增加。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劳动竞赛，以保证所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年年增加农产品交售量。

在 1966 年 4 月 8 日苏共第 23 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关于部分修改苏联共产党章程的决议》中，对党章第 57 条做了补充：“共产党员满 50

^① 参见北京大学经济系研究所编《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1953 年 3 月 ~ 1964 年 10 月）》，商务印书馆，1976，第 434 ~ 437 页。

^② 参见北京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编《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1964 年 11 月 ~ 1976 年 2 月）》，商务印书馆，1978，第 53 页。

人的国营农场，可以成立党委会。”^①这说明，在国营农场中基层党员数量有所增加，基层党组织规模扩大，不过与当时城市中工厂企业的基层党组织相比，规模还是小了一些。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更加强调干部的专业化水平。1971年召开的苏共24大通过的决议中写道：“党认为，具有首要意义的是，要让政治上成熟的、通晓业务和有才干的组织者来领导党的、国家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和社会的各个工作部门。党和国家面临的巨大而复杂的任务，迫切要求领导干部精通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富有对新鲜事物的敏感性，能看到发展的远景，善于寻找出解决当前出现的问题的最有效的途径，善于运用别人的知识及经验。”^②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苏共注重干部的专业化与知识化，对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干部，也侧重于专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国家为农村培养了一批有技术的专家。据统计，1965年在集体农庄中工作的专家是23.2万人，到1977年已达54.8万人，这一期间，在国营农场和辅助生产单位中的专家数量从28.7万人增加到65.9万人。这些人提升了农村中基层领导干部的文化水平。到1976年4月1日，92.5%的集体农庄主席和98.1%的国营农场场长，95.4%的集体农庄的主要专家（农艺师、畜牧学家、兽医、工程师）和国营农场97%的主要专家受过高等或中等专业教育^③。

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在不断增加。1966~1977年，国家用于发展农业的投资已经超过2780亿卢布，比过去整个苏维埃政权年代投资的总额还多1.6倍。在农业投资总额中，国家投资的比重从59%（1966~1970年）增长到67.5%（1976~1980年）^④。这些投资主要用于农村生产、住宅和文化生活建设的各个方面。到20世纪70年代，苏联政府每年要对农业进行大量投资，如1979年国家对于农业的基建投资就达233亿卢布。因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同时又要稳定消费品零售价格，国家每年要花费大量财政补贴。到1979年，国家对肉、奶和蔬菜的采购价格和零售

①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编《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求实出版社，1982，第263页。

② 辛华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76，第274页。

③ 数字出自〔苏〕Ф.Ф.彼得连科、B.M.沙普科《苏联共产党的干部政策》，载《苏联问题译丛》编辑部编译《苏联问题译丛》第4辑，三联书店，1980，第153页。

④ 〔苏〕伊·伊万尼科夫：《把农业投资用到有效的方向》，载《苏联问题译丛》编辑部编译《苏联问题译丛》第4辑，三联书店，1980，第259页。

价格的差价补贴，就达 260 亿卢布左右。国家用购销农庄、农场银行贷款的办法来支持苏联农业，1965 ~ 1978 年先后两次购销农庄、农场银行贷款 91 亿卢布。据此，有学者断定，70 年代末的集体农庄已经成了国家的一大负担^①。

总结苏联农村状况，有西方学者认为，从十月革命后到卫国战争之后，苏联农民的生活状况基本上都处于很低的水平，20 世纪 20 年代的苏联农村是国家榨取剩余粮食的地方，而 30 年代则成了国家进行资本积累的工具^②。这种说法是否完全成立还有待继续探讨，但的确道出了当时农民生活的大体情形。直到 50 年代以后，苏联农民生产和生活状况才有了一些好转，到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农民得到工资收入，享受与城市职工接近的各种福利，他们的生活条件改善了，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以及对集体的关心程度却在下降。

1953 年以后，随着农业生产逐步好转，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状况也有所改善。苏共中央给集体农庄一定的自主权，使得集体农庄中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可以参加生产管理方面的一些决策，基层党组织的作用也有所增强。到 1958 年大规模合并集体农庄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规模也扩大了，党员活动更加正规，党组织作用增强。在 20 世纪 60 年代，农村中基层党组织基本处于平稳发展状态。不过，由于苏联农业生产的低效率，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组织形式不利于农民个体劳动积极性的调动和发挥，到 70 年代，苏联农业生产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国家不得不连年加大对农业的投资，但还是不能改变从国外大量进口粮食的状况。加上各种社会问题的增加，农村党员思想涣散，基层党组织所发挥的作用减小。

案例 2-1 1953 年前后莫斯科州集体农庄党组织在 农业生产和生活中的作用

1953 年苏共中央 9 月全会决定，在苏联已经建立起一个效能强

^① 这是美国教授格雷戈里·格罗斯曼的看法。他的结论是：“苏联现在的集体农庄已远不像过去那样是榨取剩余粮食和进行资本积累的工具，反而成了国家的一大负担。”参见陆南泉、张文武编《国外对苏联问题的评论简介》，求实出版社，1981，第 176 页。

^② 指美国教授格雷戈里·格罗斯曼。参见陆南泉、张文武编《国外对苏联问题的评论简介》，求实出版社，1981，第 176 页。

大的技术上完善的重工业，并且集体农庄制度已经得到巩固的情况下，国家要迅速发展农业生产，提高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产量，在今后两三年内大幅提高对全体居民的粮食供应，并提高全体集体农民的物质福利。为响应这个号召，莫斯科州给其党组织规定的任务是：动员全体集体农民、机器拖拉机站工作人员和农业专家，为进一步提高所有农作物收成和发展公有畜牧业而斗争，使每一个集体农庄都能顺利完成对国家的任务，保证进一步巩固公有经济并提高集体农民劳动日的报酬。全会后，苏联莫斯科州的一些集体农庄党组织在发展生产，组织劳动竞赛以及在群众中进行宣传鼓动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当时莫斯科州已经将小集体农庄合并，农庄数目约有1400个，比原来减少了3/4，每个集体农庄耕地面积从196公顷增加到836公顷，共有1100多个集体农庄有党组织。以下介绍的是几个党组织的党员人数，他们在农庄中担任的职务，党组织宣传工作的主要做法、效果等。

1. 莫斯科州列宁区“列宁”集体农庄

这个集体农庄党组织中有党员40名，其中有36名正式党员、4名预备党员。这些党员担任的职务大多是集体农庄中的领导或工人、拖拉机站技术人员。例如，党员姆·查哈洛夫是集体农庄主席，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领导全体农庄工作；党员贝·葛里戈里契夫、阿·卡列娃、特·节列希尼柯娃都是工作队队长，农业生产的组织者；党员斯·托朗金、姆·奇柯夫、阿·萨道夫和恩·康诺夫担任养畜场主任，积极传授牲畜饲养先进做法和经验；预备党员符·拉甫涅耶娃是挤奶员，在1953年将每头乳牛产奶量由1952年的2800公斤提高到3300公斤；党员姆·葛里戈里契夫和贝·彼得洛夫都是集体农庄的货车司机，一年比其他司机多工作多个工作日；党员依·戈涅发雪夫在锻铁厂工作，及时修好农庄的农具；党员阿·德罗静是农庄汽车司机，保证不出事故并多工作了几百个工作日。

农庄党组织所做的主要工作：

(1) 宣传鼓动。在这个党组织领导下还有一个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队伍，有50人。其中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农业专家和先进

的集体农民。他们定期在各个工作队、小组和养畜场举行座谈会。座谈的题目有：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常会的决议、苏共中央 9 月全会的决议、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的成就、国际形势、集体农庄和工作队的生产活动。在座谈会上鼓动员还推广农业和畜牧业能手的经验，对一些工作态度不好的庄员进行批评和帮助^①。党员自己带头并帮助其他非党庄员提高劳动生产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 培养集体农庄干部。党组织注意对党员的培训，培训的内容有党史、党的第 19 次代表大会决议内容等。在 1952 ~ 1953 学年的学习中，集体农庄的党课教育网包括 3 个党史学习小组，其中有 29 个党员。党委会成员为参加学习的党员准备教材、练习簿以及实物教材。

此外，集体农庄党组织还组织了演讲团，参加者有党的积极分子、教师、农学家、畜牧学家、集体农庄的生产革新者等，演讲的内容有生产经验，如集体农庄的女挤奶员、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克·阿列克谢耶娃讲了“我增加乳牛挤奶量的经验”；农学家姆·希谢尔柯夫在“培育早熟蔬菜”和“获得马铃薯高度收获量”的演讲中，总结了集体农庄先进工作者的经验，还采纳了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各种意见。

2. 莫斯科州卢霍维茨区“斯大林”集体农庄

这个集体农庄党组织共有党员 27 人，直接参加集体农庄生产的有 24 人，其中 7 个在养畜场，2 个是田间工作队长，6 个参加田间工作。被选为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委员的有 5 人。农庄党组织除组织生产、对生产劳动进行监督外，还负责进行生产技能培训。例如，先进挤奶员、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克·洛雪诺娃在党委会组织的培训班上，就做了题为“饲养对牲畜产品率的影响”“怎样照料牲畜”“正确的挤奶方法”的谈话，介绍自己的工作经验。

为学习先进经验，共产党员组织了集体农民参观团，参观了“卡拉伐耶夫”“丘尔基-索柯洛夫”“林中空地”国营农场，莫斯

^① 例如，女挤奶员谢尔盖耶娃因工作不认真，导致产奶量降低。在座谈会上，鼓动员给她比较数字，告诉她这样工作给集体农庄带来的损失，对她触动很大，后来她的劳动态度有了很大好转。

科州拉明斯克区的“台尔曼”“莫洛托夫”集体农庄，以及乌克兰共和国基辅区的几个先进的集体农庄。

这个集体农庄是本区也是莫斯科州内先进的集体农庄之一。由于在发展公有畜牧业产品方面的成就，它的名字已经登上了全州的光荣榜。

3. 拉明斯克区“走向共产主义之路”集体农庄

这个农庄党组织十分关心畜牧业工作，经常在党员大会、党委会上讨论养畜场的工作。由他们的党组织发起，建起了乳牛的野外牛舍，以提高乳牛产奶率。由于建野外牛舍，奶牛以放养为主，牛奶的产量有了很大提高。1953年第一季度每头乳牛平均产奶213公斤，5月将牛群放到野外牛舍后，奶产量达到了425公斤，即增加了1倍。他们还注意提高养猪场的工作水平。

4. 莫斯科州卢霍维茨区“红河湾”集体农庄

这个集体农庄是全州的先进典型。集体农庄党组织共有26人，他们领导着田间工作队和养畜工作队，像普通的集体农民一样在田间和养畜场工作。党组织影响集体农庄生产事务的主要方法是对管理委员会的经济活动进行监督，在党员大会上讨论经济问题，听取集体农庄主席和生产队长的工作报告，揭发缺点并要求改正。

这个集体农庄也有1个鼓动队，有32名鼓动员，包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及先进的集体农民、教师、农学家、医生，还有1个讲师小组。1953年，这个讲师小组从区里请来的报告员在俱乐部共做了44次关于政治、农业、自然科学和文学方面的报告。党组织领导劳动竞赛活动，还对改进农业生产技术等问题进行研究。

5. 莫斯科州乌赫托姆斯基“伏罗希洛夫”集体农庄

这个集体农庄有31名党员，分布在田间工作队、养畜场和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党组织运用鼓动员、农村演讲团、墙报、俱乐部、图书馆、业余艺术活动、电影院、无线电站、展览会和其他工具进行政治宣传工作。

这个集体农庄的鼓动员有65人，其中有25名党员和5名共青团员。鼓动员深入田间工作队、养畜场、打铁场、木工场等地方开展工作，全体鼓动员都在党课小组学习，大多数鼓动员都有私人图

书室，鼓动员自己参加政治学习，了解农业生产状况，提出进一步提高产量的建议。他们多采用谈话方法进行鼓动工作，他们还关心农庄庄员的家庭生活。例如，女集体农庄农民西陀罗娃的儿子在学校学习不用功，母亲很发愁，不知道该如何教育他。在别人的建议下，她找来鼓动员、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弗·马卡洛夫与儿子谈话。马卡洛夫同她一起与她的儿子谈话，使他改变了学习态度。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但足以说明鼓动员是如何接近群众的。

在党组织的宣传中，除了鼓动员外，还利用演讲会和报告会进行宣传。以下是这个农庄 1953 年演讲和报告的若干题目：“苏共第 19 次代表大会和我国共产主义建设的任务”“苏联第五个五年发展计划是走向共产主义的新的巨大的一步”“第五个五年计划中苏联工业的发展”“第五个五年计划中社会主义农业的进一步高涨和我们集体农庄的任务”“党和政府对改善苏联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关心”“宇宙的构造”“什么是生物化学，它给苏维埃社会带来了什么好处？”“农业税的新法规”等。

他们还利用墙报进行宣传，有“战斗小报”“快报”“警报”等。他们还在俱乐部举行了如下题材的图片展览会：“苏联为争取全世界和平而斗争”“苏联宪法是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宪法”“我们的农业先进人物”“马铃薯与蔬菜的方形簇种法”“米丘林园艺”，并在俱乐部放映以伟大卫国战争为题材的电影。

由以上 5 个集体农庄的例子可以看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1953 年莫斯科州的这几个集体农庄中党组织人数一般在 30 人以内，比当时集体农庄所拥有的党员平均数要高出 1 倍左右^①。由此可见，这个州的党的力量是很强的，也许在全国都是最好的，所以，其不能作为一般性的代表，只能作为特例，但在宣传上代表着当时苏联农村发展的趋向。

第二，党员一般担任生产中的管理者或者是小的组织的领导者。从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党员一般不是只从事生产劳动

^① 到 1956 年，苏联国营农场中平均 1 个基层党组织有 25 个共产党员，在集体农庄中是 13 个。参见〔苏〕H. A. 彼特罗维切夫主编《党的建设》，郭华等译，求实出版社，1983，第 215 页。

的普通农民，他们大多在生产单位中担任管理人员、组织人员或技术人员。

第三，农庄中党组织在组织、宣传、监督生产等方面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把党员组织起来，在生产中发挥带头作用；对先进人物和先进的生产方法进行宣传；党员大会或者党委会研究生产中的问题，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第四，党员大会或者党委会关心的问题有生产性的，还有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甚至包括农庄农民生活的具体细节。应该说，这个时期党员干部基本上是接近农庄农民的生活的。

资料来源：В. Ионкин и др. Партийная работа в колхозе.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 1954。

总体来看，当时在集体农庄中，党有号召力，能够发动群众，发展党员队伍，其宣传鼓动也容易得到人们的接受。

案例 2-2 20 世纪 70 年代的苏联农业与农村基层党组织

应该说，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农村中的党的基层组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到 70 年代后期，有些地方农庄中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农庄中的党组织作用降低，农民的生产劳动热情也在下降。一位日本人曾举出这样两个例子：1978 年早春，莫斯科州的符拉基米尔区“布尔什维克”集体农庄，连绵的春雨下了几个星期，农庄的约 300 头牛没有饲料可吃，饿着肚子挨雨淋。庄员们无事可做，利用休假饮酒作乐。当区党委会成员、国家谷物储备员问这个集体农庄的负责人他们的农庄是否还有饲料时，这位负责人、畜牧业专家说：“当然有，没有还像话吗？”结果，10 天后，当雨停时，他们到牧场上看到已经有 16 头牛被饿死。后来，虽然上级临时拨来应急饲料，但因质量不好，又有 219 头牛死掉。就这样，损失了价值 4 万卢布的牲畜，法院对于有关负责人的处罚是，要求他们在 7 年内赔偿其中的 7500 卢布，其余的由国家负担。

另一个例子则反映了农业生产中的不负责任。有人问：“在地里收获 100 个土豆，供应厨房吃的能有几个？”苏联农业专家回答说：

“挖土豆时，由于机械的胶皮质量差，或者胶皮脱落，铁质外露，要弄坏 20 个。从全国情况来看，仓库需要储藏 2100 万吨土豆，可是目前只能储藏一半，大量土豆需要马上运到城市去，在卸车时要用耙子往下扒，又要弄坏 30 个。另外，由于仓库的保存条件不好，还要损失 10%。”这样算来，从地里收获 100 个土豆，能供应厨房吃的只有 40 个^①。尽管苏联政府一再强调要采用新技术成果，提高劳动效率，但在苏联农业中，还是存在这样低效率的情况。农民对集体不关心，连集体农庄的负责人也毫不脸红地说假话，集体农庄中的党组织失去了号召力和影响力，这样的农业自然要成为国家的负担。

将案例 2-1 与案例 2-2 比较，不难看出，同样在莫斯科附近的集体农庄中，20 世纪 50 年代与 70 年代的情况相去甚远。在 50 年代，农庄党组织领导全体党员与群众组织农业生产，监督生产计划的制订与执行，开展劳动竞赛，培训生产技术人员，对国家的政策法规以及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进行讨论与宣传，基本起到了先锋队的作用；而到了 70 年代，农庄党组织已然失去作用，农庄管理涣散，领导者没有责任心，庄员不关心集体生产，劳动效率低下，生产成本很高。为保证国家的粮食供应，苏联政府不得不实行“补贴农业”政策，并且从国外大量进口小麦等粮食。这种情况进一步加重了苏联农业生产的落后性，也给国家带来了巨大负担。70~80 年代，苏联的农业已然成为国家的一个沉重的包袱。

不过，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苏联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组织机构和组织形式上还是比较完整的，至少在形式上基层党组织都存在，并且在一些生产和生活领域还发挥着作用。也就是说，这个时期苏联农村基层党组织体系还是比较完备的，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不力或者农村中存在的一些诸如生产率低下、劳动者的劳动热情不高、人们不关心集体生产等情况，主要还是因农村集体生产的体制不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① 上述情况参见日本《东京新闻》驻莫斯科的特派员发出的报道《农民懒惰 牛饿死——令人头痛的苏联农业的真相》，载《苏联问题译丛》编辑部编译《苏联问题译丛》第 4 辑，三联书店，1980，第 284~286 页。

通过对劳动管理体制的改革有可能革除这些弊病。在当时的一些党员来信中，可以窥见一斑：

在1981年第1期的《共产党员》杂志上，登出了一篇文章《伟大的奇迹——粮食》，谈到了如何提高粮食产量。这篇文章引发了学者们的兴趣，有多位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的院士与通讯院士联名写信指出：“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总结出必须最大限度地运用禾本植物的分蘖特质，以及在此基础上大幅降低播种定额。我们认为，食用禾本植物播种面积问题的研究，是我国植物学研究的最重要课题之一。必须通过提高科技含量，持续不断地探索新的更新的道路，提高粮食作物的产量。当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为了这项探索要有科学的基础和现实的保障，而不是虚假地投入，仅以实施粮食生产纲要为目的。”^① 这封信得到了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回复。从中既可以看出学者和科学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程度、苏共高层对农业问题的重视，也间接反映出当时农业的科技含量很低，已经严重影响到粮食产量。只要有能够提高粮食产量的好方法，就会引发诸多“大人物”的关注。与此相关的是，有的基层党员对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经济中存在的不盈利和亏损现象感到极为不安，对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领导者的领导能力和管理才能提出质疑。对此，《共产党员》杂志编辑部坦率地回答：苏联农业效益很低的确是事实。这里的原因有很多，“单个经济的亏损无论如何也不能只用领导水平低来解释，或者用国营农场领导以及集体农庄主席工作不力来解释。解决这些问题，与平衡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与完善计划与价格机制相关”。该杂志表示“将继续关注农业经济的命运”^②。由此可以看出，苏联农业的问题已经是积弊甚多，根本原因还在于计划经济的机制上。

下述信件则与农业经济中党员的个人权利相关。1985年5月，《共产党员》杂志提交给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封信，信中讲到了奥格列区“劳伯列”集体农庄以及它的基层党组织不正常的状况：1983年9月，在“劳伯列”集体农庄工作人员捷明（人民监督组组长）和斯特劳特曼尼斯之间发生了一次冲突，奥格列区执行委员会内务部根据捷明

①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830. Л. 10 - 20.

②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804. Л. 8. 收信时间为1982年10月28日。

的申诉进行了调查，并把材料发到“劳伯列”集体农庄，敦促法庭进行调查。捷明反对这样做。1983年11月3日，根据奥格列区执行委员会内务部处长的指令，捷明被以“流氓行为”为由抓起来送到人民法庭，并被追究行政责任。人民法院起诉捷明的行为违法。于是，捷明开始了申诉。由于他一直告到了拉脱维亚共和国中央委员会，自上而下又展开逐级调查，最终，“劳伯列”集体农庄经理受到处罚，集体农庄主席明格尔松被解除职务，开除党籍^①。这个申诉和审议过程从“劳伯列”集体农庄党的会议开始，经过了拉脱维亚党中央委员会组织—党务工作部、奥格列区党委会、区委会人民监督委员会、区农工联合公司执委会几个层级，最终由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德米特里耶夫批示。对于捷明的申诉，各级管理部门进行了认真调查，分别对属于事实和与事实不符的部分加以区分，对相关干部进行了处理。

下面的信件也与基层党员的个人权利有关。

1985年8月，亚美尼亚共和国克拉斯诺谢尔斯克区托赫鲁日镇居民戈扎耶夫给苏共中央写信（发给了《共产党员》杂志编辑部）。他是一位农艺师，希望在托赫鲁日集体农庄农业劳动集体中担任组长职务。由于没有空位，他的要求未能得到满足。后来，区农业局调他到另外一个名为沙肯茨的集体农庄担任总农艺师。但是，戈扎耶夫以身体健康为由始终没有到岗。区党委认为，戈扎耶夫作为农艺师，在几个岗位上都不能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除此之外，他的两个兄弟分别在集体农庄中担任主兽医和大型奶牛场场长职务。他们都与农庄主席以及集体农庄党组织对抗，这一切造成集体农庄专家中间的不健康氛围。因此，区党委认为戈扎耶夫不能再被任用^②。

通过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在集体农庄的基层组织中，党员干部为所欲为、不服从组织领导、以权谋私的现象确实存在。并且，这些只是被发现并调查出来的，还有更多的问题可能是没有被上级发现并处理。对于本已经成为苏联政府的经济负担的农业经济而言，其问题不仅在计划

①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910. Л. 25 - 27.

②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910. Л. 21 - 22.

经济下的体制、机制与决策层面，或者生产技术的提高上，基层党组织工作也同样存在各种问题。只不过，与国家农业政策等更重大的问题相比，这些情况的影响面还是很小的。

总体来看，苏联农村中的基层党组织在 1917 ~ 1980 年的 60 多年间，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发展之路。从十月革命时农村几乎没有一个基层党组织，到 20 世纪 50 年代基层党组织网的建立，再到 60 年代中期农村中一支宣传鼓动大军的建立，应该说，在这几十年间，农村党员和基层党组织的发展在规模上取得了一定成就。不过，对于整个苏联共产党的组织体系而言，农业中的基层党组织无论其组织能力还是影响力都十分有限，并且其中还存在很多问题。

四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初苏联军队的基层党组织建设

苏联共产党一向重视军队中的党组织建设，苏共作为执政党几十年，在武装力量中坚持党的领导，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军队建设成为传统。在苏维埃政权初建时期以及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军队的基层党组织为保卫社会主义国家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和平年代，军队基层党组织也组织竞赛活动，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军人。在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前，军队中的基层党组织基本处于正规建设状况。苏联军队的军种原来与其他国家一样，主要有三种：陆军、海军和空军。卫国战争结束后，苏联与西方盟国的关系破裂，开始了冷战时期。为加强国土防卫力量，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60 年代初，苏联军队又增加了两个军种：防空军和火箭部队。各个军种都由国防部统一调配，对军人的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的要求有了较大提高。国家开设了上百所军事院校，除了招收部分普通学生外，主要是对军人，尤其是军官进行高等教育。这个时期军队中党员数量也有很大增加。有研究者指出，在苏联军队中，“90% 以上的军官都是党员，在将校两级则达 100%”。包括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在内的各级军事单位都设有党的基层组织和党的委员会。内务部和克格勃的部队也是如此。其他国家机关中的党员比例不会超过 15%。这样，苏联武装力量——国防部、内务部和克格勃——名义上虽属国家机关，但其独特之处是它们的军官几乎是清一色的党员。在基层部队中，党员的比例与其他国家机关大体相同，但士兵中列宁主义青年团员的比例明显高于其

他地方。”^① 在军队中，党的机构建设是一项重要工作。

同时，党组织工作内容和方法有了进一步发展，这在苏共中央 1957 年批准的军队党组织工作细则中有所反映。1973 年 2 月，苏共中央批准了新的工作细则，规定，各团、独立部队（营、大队、连、炮兵连、航空大队以及与之相当的分队），一、二、三级军舰，小型舰艇大队，司令部、各部（处）和机关，在不少于 3 名党员的情况下均可建立基层党组织。党员超过 75 人的团和舰艇，党员超过 100 名的司令部、高等院校的系以及机关，在必要的情况下，经军区、舰艇政治部批准可以建立党委，并享有授予营、大队以及与之相当的分队的党组织以基层党组织的权力。在基层党组织内，经政治处批准，有 3 名或 3 名以上党员的营、大队、航空大队、军舰的战斗部门和部队（舰艇）的独立分队可以建立相当于车间党组织的党组织。无论在基层党组织内，还是在相当于车间党组织类型的（连、排、炮兵连、航空兵中队、机组、小型舰艇等）党组织内，均可建立党小组。

党员大会是党组织的最高机关，在这个会议上，党员有权批评任何一个党员和预备党员，但不允许批评指挥员以及首长的命令和指示。党的干部要向党委和党员报告工作，并在苏共章程规定的期限内进行改选。军队指挥员无论是否为苏共党员，在战斗中都要依靠党组织进行政治教育和加强军纪。军队党组织和地方党组织要保持密切联系，军队党组织可以帮助地方党组织展开爱国主义教育。

军队基层党组织的任务是，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加强军队战斗实力，把全体党员团结在党的周围，用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军人，促进军民团结；动员全体军人保持高度警惕，做好高度战斗准备，圆满完成军事训练、政治教育和战斗值班任务，掌握技术装备和武器；教育军人坚决履行军人职责，执行指挥员和上级首长的命令。主要责任包括：“使军事人员努力保持高度警惕并做好战斗准备，模范地执行有关战斗训练和政治教育任务、战斗任务和军事勤务，以及掌握军事装备和武器使用等任务。”“共产党员在训练和执勤方面起领导作用，并影响部队中的

^① [美] 威廉·奥多姆：《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王振西等译，新华出版社，2000，第 39 页。

生活与活动的各个方面。”此外，同地方基层党组织一样，军队基层党组织的主要工作是将在军队中最有才干的人吸收入党。基层党组织要考察党的发展对象，对其进行思想教育。基层党组织每月至少召开一次会议。“党员在会上讨论军事训练和加强纪律性问题时，有权批评任何党员和预备党员，不论其职位高低。”^① 领导共青团工作也是军队基层党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军队基层党组织主要设在团一级，而军队中的共青团工作主要集中在连（或中队）一级，党和共青团组织共同负责军人的思想政治工作。

苏联军队对基层党组织发展新党员有严格规定。其程序是：志愿要求入党的军人、职工须向基层党组织递交亲笔申请书，按苏共中央制定的格式填写表格，还要根据党章的要求及苏军党组织工作细则规定的程序提出介绍人。入党申请书首先在分队党组织党员会上讨论，然后送执委会审查，最后由基层党组织党员大会做出决定。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在经兵团政治处或其他相应的政治机关党务委员会批准后方能生效。在有党委的团（舰）或同级部队中享有基层党组织权限的党组织所通过的接收新党员的决定，须经党委审查，在得到党委同意后方可报送兵团党务委员会批准。这样逐级审查入党申请，严格遵守呈报、批准程序及其他规定要求，以保证把最有觉悟、在履行军人职责和社会工作中表现好的人吸收到党组织中来^②。

卫国战争结束后，苏联军队中还广泛开展了社会主义竞赛。军队中社会主义竞赛的项目包括：高质量地演练战斗训练课目并符合各种标准，有效利用训练时间，缩短分队进入战备的时间；很好地掌握、熟练地使用、正确地操纵和保养武器和技术装备，获得并提高技术等级，努力在各种比赛中获得优胜；开展发明创造，提出合理化建议；努力维护军人的荣誉和尊严，举止端正，有良好的军容，队列整齐，战斗训练中同志间互助；爱护军用物资，合理使用与节约器材，保养好军营、训练设备

① A. И. 赫美尔：《苏联军人的教育——苏联武装部队中的党政工作》，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72，第56、62页。转引自〔美〕哈里特·法斯特·斯考特、威廉·法·斯考特《苏联的武装力量》，王学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288～289页。

② 《苏联武装力量的党政工作》（苏联高级军事—政治院校教材），谢力译，战士出版社1982，第157页。

和生活保障设施；提高军人的政治、文化水平，积极参加群众性文体活动，培养等级运动员和运动健将。在一些具体军事部门，如军队建筑部门、铁道兵部队等，社会主义竞赛的内容还可以结合本部门的专业技术情况，如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原材料等^①。

案例 2-3 有关 20 世纪 70 年代军队党、团组织开展社会主义竞赛的分析

(1) 鲁卡维钦大尉在他的连队中组织社会主义竞赛的例子。鲁卡维钦大尉首先研究了营里下发的月计划，然后使所属人员了解并熟悉这个计划。排长、班长和党团员同每个士兵谈话，帮助他们制定个人指标，指标必须尽可能高，同时又实际可行。确定班、排、连的指标时要适当考虑列兵、军士和军官的个人情况。

连队里的每项实习训练中都充满着同志式竞赛的精神。连队军官们要注意使班长们积极参加竞赛的日常组织指导工作。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班长要负责许多操练项目，与列兵们十分接近，因而处于能经常影响他们的地位。

在一天结束总结工作时，班长给那些想发言的士兵们以发表意见的机会。士兵们检讨自己的缺点，并对那些浪费训练时间的同志开展批评。由以上情况可看出，在 20 世纪 70 年代苏联军队中，基层党、团组织是社会主义竞赛的组织者，他们领导士兵制订竞赛计划，监督计划的落实，发挥宣传和组织作用。

(2) 20 世纪 70 年代苏联军队中党的宣传方式是：军队基层党组织通过印刷品、电影、电视、广播等手段在军人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还通过举办演讲、专题讲座、时事报告会、座谈会、专题晚会等活动展开宣传。这个时期座谈会的题目主要围绕“共产党对劳动人民福利的关心”“社会主义竞赛先进者的新成绩”等主题进行。一般在分队中每月举行一次军人大会，会上定期讨论一些问题，如“关于履行社会主义职责”“关于战术演习的准备”“关于军

^① 《苏联武装力量的党政工作》（苏联高级军事—政治院校教材），谢力译，战士出版社 1982，第 400 页。

人的正直和诚实”等。

(3) 举办专题晚会。以 20 世纪 70 年代苏联军队中的一次专题晚会“苏军是苏联各族人民友谊的军队”为例。晚会开始时宣传员致简短的开幕词，说明各族人民的友谊是苏维埃多民族国家及其武装力量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的一个主要源泉。之后，各民族的军人讲述自己乡亲的劳动功勋和战斗功勋，交流关于军人友谊和同志关系的思想。然后，诗歌、音乐、舞蹈的爱好者给大家表演独具风格的民族艺术。最后，晚会在高唱爱国主义歌曲声中结束。

(4) 反酗酒宣传。20 世纪 70 年代苏联军人中存在酗酒情况，一些军人因思想空虚、无所用心和无目的地消磨时间而酗酒。对于军人，酗酒有很大的危害，可以导致事故、军事犯罪以及其他不道德行为，尤其是在现代武器装备十分复杂，又需要集体操纵的情况下，个别人酗酒就可能导致集体行动能力下降。因此，在 70 年代后期军队基层党组织政治工作中，进行反酗酒宣传、监督酗酒行为等成为内容之一。

资料来源：〔美〕哈里特·法斯特·斯考特、威廉·法·斯考特：《苏联的武装力量》，王学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 290～291 页；《苏联武装力量的党政工作》（苏联高级军事—政治院校教材），谢力译，战士出版社，1982，第 244、313～314 页。

案例 2-3 说明，在 20 世纪 70 年代苏联武装力量中，党组织采用多种手段和方法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对士兵进行时事政治、军人道德、专业技术等方面的教育，在宣传中采用多种手段，以更好地吸引党员和士兵参加到各项活动中来。

不过，与其他部门和领域的情况类似，苏联军队中的这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总体上还是形式主义的，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问题，如酗酒、赌博、吸毒与走私毒品、偷盗公共资产、精神颓废等现象，在军队中也程度不同地出现。有研究者指出，苏联军队经常从事有偿劳动，而那些收入总是被军官们据为己有，这成了苏联军官腐败的一个渠道。士兵们每月的津贴很少，不过，他们会从事其他一些活动赚取“补贴”，如盗窃军用物资。1979 年开始的阿富汗战争使得苏军内部本来就存在的盗窃和

贪污情况十分突出：“为了换取阿富汗人的物资，士兵们偷窃的物品包括弹药、武器、车辆零部件以及军营内能找到的任何东西。西方的许多消费品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而毒品在这方面的需求显得更大。”^①此外，组织纪律不够严格，老兵或者上级士官对新入伍士兵的虐待甚至体罚、军官的特权等问题在军队中都普遍存在，甚至还出现了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②。这些都给苏联军队的形象以及军队中的思想工作带来了难度。

总体来看，在苏联武装力量中，在基层党组织职能的发挥上，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初一直保持着比较正规的形式，军队中基层党组织与共青团组织共同发挥作用，做军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当然，在那个时期的苏联军队中，也出现了不少带有时代特点的社会问题，但苏共对军队中的思想政治工作还是给予了相当高的重视。因此，直到 80 年代改革时期，苏联军队中的基层党组织建设都是比较严格和具有规范性的。

本章小结 执政党必须不断完善自身

20 世纪 50 ~ 80 年代是苏联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斯大林逝世后，苏共领导人针对苏联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苏联农业发展缓慢、工业发展缺乏活力等情况，在农业、轻工业生产以及改善人民生活方面采取一些措施，并且或多或少地落实了。赫鲁晓夫执政后，面临着一个重要的历史使命是如何推陈出新，积极稳妥地改革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过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推进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应该说，他看到了斯大林时期的问题，并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但是，赫鲁晓夫从经验出发，意气用事，强迫命令，甚至心血来潮，办事凭一时的冲动，因此干出许多草率、荒唐的事情。赫鲁晓夫不搞调查研究，只

① [美] 威廉·奥多姆：《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王振西等译，新华出版社，2000，第 290 页。

② 最有代表性的是 П. 格里戈连科将军。他于 1907 年生于乌克兰，参加过卫国战争，曾任伏龙芝军事学院教研室主任，1959 年晋升为少将。1961 年以后，他积极参加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后被开除党籍，免去少将军衔，降为普通士兵。1969 年 5 月他在塔什干市被捕，被关进精神病院，1974 年获释，1978 年到美国探亲时被取消苏联国籍。

是依靠行政命令，盲目扩大玉米种植面积，并在1957年毫无根据地提出了农业冒进口号。在冒进计划和政治压力之下，苏联各地刮起了浮夸风。由于赫鲁晓夫的瞎指挥、强迫命令与政策失误，苏联的农业生产大幅起落，在他执政后期出现农业增长缓慢，粮食出现严重危机。苏联自此由传统的粮食出口国变为粮食进口国。在工业和建筑业方面，1957年的改组造成了严重后果，引起国民经济的混乱。在干部问题上，赫鲁晓夫过于频繁地调动和撤换干部，造成各级领导核心缺乏继承性，干部队伍极不稳定。他还强行把大部分州和边疆区的党组织分割为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结果，非但没有产生预期的作用，反而严重削弱了党的统一领导，不仅割断了工业与农业之间的紧密联系，还造成了党政机构的进一步膨胀，遭到州委书记们的普遍反对。赫鲁晓夫对苏联内政外交的改革中，给苏联和苏共历史带来影响最为深远的，也是争议最大的事件，莫过于苏共20大。俄罗斯学者理·科索拉波夫曾指出：“苏共经历了一个逐渐蜕变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从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作‘秘密报告’开始的。”“赫鲁晓夫把党的所有力量都引到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上，而且这种揭露在许多方面是不客观的，甚至是对党和国家自十月革命以来所走过的道路进行诽谤。这不仅破坏和瓦解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且使所有的反苏分子幸灾乐祸，因此赫鲁晓夫批判的是斯大林，打击的是全党，触及了列宁、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方方面面。从此以后，斯大林主义这个字眼就成了反对派和反革命攻击苏联社会主义的武器。”^①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根·瓦·奥希波夫也认为：“苏联解体不仅是从戈尔巴乔夫时期开始的，而且还是从赫鲁晓夫时期执行反俄罗斯、反苏联的政策开始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阿·伊·卢基扬诺夫则断定：“我认为赫鲁晓夫脱离马列主义正确轨道不是从口头上背离开始的，而是从实践中悄悄开始的。他忘记了列宁这样的忠告：社会主义政权、社会主义原则的胜利不能保证我们永远不会倒退到反面，倒退到敌人的立场。”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在内政外交方面都出现了重大变化。

^① 转引自李兴耕等编《前车之鉴——俄罗斯关于苏联剧变问题的各种观点综述》，人民出版社，2003，第98~99页。

赫鲁晓夫下台以后，苏共开始了长达 18 年的以勃列日涅夫为最高领导人的时期。这是苏联综合国力最强盛的时期，从国际范围来说则是时代特征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在勃列日涅夫执政之初，苏共调整了政策，纠正了赫鲁晓夫时期那些草率推行的改革，如取消所谓的“工业党”和“农业党”，恢复统一的州、边疆区的党组织，恢复“按部门原则组织工业管理”。勃列日涅夫还纠正了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对斯大林的评价力求采取公正客观的态度，与此同时，针对斯大林的错误，强调党内集体领导和加强民主法制。勃列日涅夫上台初期的政策调整，以及由于推行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而出现的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使党内外出现了一种乐观的、团结稳定的形势。但是，苏共领导人因此而自满起来。他们把稳定看成了目的，把维持现状当成了实现稳定的手段。这种情况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显得尤为突出。这就使得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因得不到改革而逐步发展到僵化，使党和国家的发展由稳定逐步转向停滞。主要表现在，苏共终止了由柯西金主持的经济体制改革，党的权力进一步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干部队伍严重老化，中央国家机构不断增加，人员不断膨胀。领导干部的老化，特别是高层领导干部的老化对党的高层决策机制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它使苏共逐渐失去了朝气与活力，以及不断开拓的创新精神。另外，苏共领导干部中的腐败现象不断发展，到 70 年代末期和 80 年代初期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还有一个情况是，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共内部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其成员主要是各级党、政、军、群众团体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以及一部分当权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掌握着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的绝对领导权，其中多数人在思想上因循保守、不思进取，在工作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表面上拥护社会主义，在内心里却向往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特权阶层”无论在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上，还是在生活作风上都严重脱离了广大群众，使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威信极大地下降。

可以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没有利用国内外经济环境和政治稳定的时机，跟上时代的步伐，锐意改革，与时俱进。尽管当时也进行了一些改革，提出了一些新思路，但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和实践中的故步自封经常占上风，因而使党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先进性，而变得暮气沉沉，

很少活力。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无论是苏共，还是在它领导下的苏联，都已经走到了危机的边缘。其中，执政党不思进取、不能完善自身，是一个重要原因。

从赫鲁晓夫时期到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共在党和国家内外政策上的调整，党员队伍从数量到文化素质等结构上的变化，苏联所面临的国内外局势的变化，都要求基层党组织工作采用新方式、适应新局面。不过，从党的高层蔓延开来的官僚主义、不思进取以及缺乏活力，在基层党组织中继续扩展。被表面上的“稳定”和“形势大好”掩盖起来的问题实际上有很多。这个时期苏共基层党组织工作的成就以及存在的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苏共党员队伍扩大，党员人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1956年苏共党员和预备党员共有约677万人，到1976年，在20年间增加了1倍多，达到150多万人。党员队伍扩大，一方面说明苏联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执政的群众基础更广泛，党的力量增强，社会影响扩大。另一方面，党员队伍扩大，要求基层党组织在组织规模、结构等方面也做出相应调整，以加强管理，调动每个基层组织和每个党员的积极性，使他们都能参与到党的生活中来，发挥积极作用。从苏共的实践来看，适应于党员队伍扩大情况，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对基层党组织结构做出了一定调整，在基层党组织职能与作用的发挥上也给予了一定重视，但在发展党员时只顾数量不重视质量等现象还是广泛存在，党员的共产主义信念不够坚定，基层党组织不能在组织与宣传活动中及时发挥影响，必然要导致基层组织工作内容空泛并流于形式。

第二，基层党组织体系在各行业与各部门中更加健全。在十月革命前后，布尔什维克党就比较重视在工人、农民、士兵中发展党员。成为执政党后，苏共党员在职业上包括了社会生活几乎所有部门，有工人、农民、军人、教育工作者和科研人员以及机关工作人员。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党在有些部门的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最突出的是农业。尽管联共（布）曾采取多种措施，如向农村派遣党务工作者，在特殊时期组织党员干部到农村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实行农业集体化，建立一定规模的农场和集体农庄……但党在农村中的影响真正得到显著提高还是在5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1958年以后，大规模合并集体农庄使农村

中的党组织工作有了很大改善。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党组织不仅在农村，在诸如商业服务业、建筑业等一些流动性行业中也建立起来。应该说，从 5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的苏共基层党组织深入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这个时期，基层党组织网络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组织体系更加完备，这种情况有利于在组织上保证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各部门的管理并施加影响。直到 80 年代苏联改革时期，苏共基层党组织体系还是比较完善的，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基层党组织职能和作用的全面发挥。

第三，党员文化素质提高，对基层党组织工作在内容与方法上提出了更高要求。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后，在党员队伍迅速扩大的同时，党员的文化素质也有了很大提高。20 ~ 30 年代，党员具有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所占比例还比较大，一部分党的基层组织干部只有小学、初中文化水平，而有的党员甚至没有文化。到 70 年代以后，党员中初中以上或大学文化程度的比例有了很大提高。党员文化程度的提高，说明苏联共产党在整体上文化素养得到提高，这就要求党的干部在执政与决策中更民主、更有说服力，党员群众对基层党组织干部的要求也更高。对于基层党的干部而言，党员文化水平提高，理解与接受党的政策的能力也就相应有所提高，基层党组织宣传工作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另外，党员群众对党的干部素质要求更高。作为经常与群众接触的基层党组织干部必须不断学习，了解国家发展大势，在思想上始终处于先进行列，在行动上更加有影响力和说服力，才能受到群众欢迎。这一点在赫鲁晓夫时代的宣传中有一定反映，但随着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在领导方法与体制上渐趋僵化，尤其是 70 年代以后在思想控制上的加强，使党员文化素养的提高并没有给党在决策和政治远见上带来实质性改变，基层党组织工作反倒因思想上的多样化和党员群众要求的提高而在一些领域显得力不从心。

第四，在苏共 20 大以后，苏联社会生活中各种问题逐渐暴露，从“解冻思潮”，到“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或明或暗地对苏共领导不满的情绪始终跟随着苏联的思想界和社会生活。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后，西方思想文化开始渗透到苏联人的生活中，苏联原有意识形态受到威胁。尽管苏联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抑制西方思想的进入，但社会思想和文化还

是有了很大改变。苏联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各种问题，如酗酒、赌博、贪污受贿、贪图享受、对政治冷漠、对集体事务缺乏热情、远离社会公共事务、对国家前途失去信心、向往西方、共产主义信仰不够坚定、在民族地区民族矛盾突出等，这些都给基层党组织的宣传与组织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和难度。

总之，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的近30年是苏联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苏共党员队伍扩大，基层党组织体系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各领域建立，党的群众基础加强，使苏联共产党在组织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在这个时期，党员和党的基层组织干部文化素质提高。在各行业中基层组织体系的建立，都给基层党组织工作创造了一些比较好的条件。与此同时，从思想上的变化开始，各种社会问题的突出暴露，也向基层党组织工作提出了挑战。是顺应新形势，采用新方法和新手段，在新的国内外环境要求面前改善自身，加强基层党组织工作的影响，还是抱残守缺，对外界形势的变化不闻不问，方法单一，形式僵化，“以不变应万变”，实际上是苏联共产党自上而下面临的一次选择。在赫鲁晓夫时代，苏共还提倡党内民主，提倡灵活的、有创造力的工作方式，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发展停滞，制度上僵化，党的干部不是以基层选举为主，而是以上层委派的方式，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力与作用被严重削弱，导致官僚主义、贪污腐败、滥用职权、特权享受等风气的盛行。到70年代末期，基层党组织在国家决策和政治生活中已经难以起到什么作用。在党内，“党的上层发生的事情，在通常情况下，不但一般的党员，就是中央委员会机关的工作人员也不得而知”^①，党和国家的政治决策与基层党员越来越远。这一切导致基层党组织工作逐渐流于形式，缺乏实际内容，虽然苏共在理论宣传领域加强控制，而实质则是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保卫社会主义政权与建设社会主义大工业过程中形成的先锋队、战斗堡垒作用渐渐丧失。

概括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共基层党组织情况，可以说，

^① [苏]罗·亚·麦德维杰夫主编《政治日记》，贾连义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第222页。

这个时期的苏共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路线，在基层党组织工作中能够以党的政策方针为导向，作为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维护者，在基层党组织结构和制度上，也保持着比较完整的体系和严格的纪律。这表明当时党的领导人在政治上能够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从而保证党在大的方向上是正确的。另外，在苏联国内外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党员群众中新思潮涌现、各种社会问题突出的情况下，从苏共高层到基层党组织不能及时顺应新形势，改进工作方法，做到与时俱进，从而使自身落后于时代甚至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看，后来戈尔巴乔夫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改革在早期能够得到广大党员群众的支持。

第三章 戈尔巴乔夫时代基层党组织： 先锋队的蜕变

从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到1991年苏联解体，是苏联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也是苏联共产党近90年历史的最后阶段。在这个时期，先是在戈尔巴乔夫倡导下苏联进行了经济和政治改革。改革没有使苏联经济向前发展，反而使人民生活陷入困境。在经济改革难以继续进行、社会问题突出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又提出“民主化”“公开性”，要建设“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实行多党制，基层党组织的职能由社会主义建设的先锋队变为多党竞争下的一个政治选举力量。这个时期苏共召开的3次重要会议（苏共27大、苏共第19次会议、苏共28大），对苏共在改革时期的职能都做出了新规定，苏共的执政党地位一再发生变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小。党内高层由于在对改革的方向以及党在苏联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的认识不同，分成“保守派”“激进派”等派别，高层间的斗争在加剧。1991年的“8·19事件”是党内高层矛盾的直接表现。事件发生后，苏共被停止活动，实际上被解散。几个月后，苏联解体。从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来看，在改革前期，基层党组织是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参加者；在改革后期，基层党组织涣散，组织资源几乎丧失殆尽，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先锋队变为极端民主制的拥护者。

第一节 改革前期：基层党组织是 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参加者

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开始实行改革。苏联改革首先从经济体制入手。在改革初期，苏共领导人多次强调发挥基层党组织在生产建设中的带头作用。出于对年轻的领导人的信任与期望，多数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参加到改革的活动中，宣传实践党的政策方

针。即便是在经济改革受挫、国家经济形势恶化的情况下，多数党员也坚持信仰，支持改革。

一 从安德罗波夫到戈尔巴乔夫继任之初的干部调整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病逝，继任的安德罗波夫是一位“有良好的愿望，树立了改革的里程碑”^①的领导人，他一上台就开始更换干部，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干部政策进行了很大调整，让那些年迈体衰的“老师们”^②退休，惩治不称职的干部，在一年多时间里撤换了近20%的州委会第一书记，22%的部长会议成员和中央的一大批高级领导干部（部长或副部长）^③。安德罗波夫还着手进行经济改革，并提出苏联尚处于“发达的社会主义”开端阶段的理论，以取代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关于苏联已经进入“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提法。在苏联史研究中，安德罗波夫执政的一年多时间多被视为一个过渡时期：由于执政时间短，对苏联历史进程的影响十分有限，学界对安德罗波夫其人及其执政时期的研究远远不如对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的研究那么深入和广泛。而苏联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克格勃主席这一身份，更使安德罗波夫被视为苏联历史上最具神秘色彩的总书记和国家领导人。近年来，在研究苏联解体原因时，研究者经常会面对一个问题，即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与安德罗波夫的关系。对此，自苏联解体后至今，在苏联时期的一些领导人的回忆录中，以及当代俄罗斯学者都有一些看法和论述^④。不过，这些看法和观点往往充满矛盾：有人将安德

①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第49页。

② 这是苏共领导人利加乔夫的一种形容，他引用了一句话：“如果你想拥有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那就让老师们退休吧。”参见[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第26页。

③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第26页。

④ 例如，苏共官员尼·雷日科夫、瓦·博尔金、叶·库·利加乔夫的回忆著作《大动荡的十年》《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戈尔巴乔夫之谜》等；罗伊·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政治传记》，徐葵、张达楠、何香译，新华出版社，2001；[苏]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这些著述对这个问题有较深入的分析。

罗波夫视为苏联历史上的一位改革先驱，有人将其视为传统体制的维护者；在俄罗斯民意调查中，安德罗波夫是得到正面评价最多的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而在另一些人眼中，安德罗波夫又犯了选错接班人、导致国家解体的严重错误^①。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描述的那样：“他到底是坚持苏式社会主义的强硬派，还是锐意改革的自由派，是斯大林模式的继承人，还是戈尔巴乔夫的先导者，谁也说不清。”^②

尤里·安德罗波夫（1914～1982年）在苏共中央总书记位置上的时间很短，不过，他在苏联政治生活中却是一位有长期领导工作经验的领导人，曾担任苏联第16个加盟共和国卡累利阿·芬兰的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驻匈牙利大使、苏共中央社会主义国家联络部部长、克格勃主席、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直至苏共中央总书记。他曾参与过1956年匈牙利事件、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向阿富汗出兵、20世纪80年代初波兰危机，以及“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民族问题和整顿社会秩序问题等重大国际国内问题的决策。在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期间，他以严厉手段惩治腐败，在一定范围内实行改革。后来，戈尔巴乔夫时期的一些改革措施被视为安德罗波夫时期未来得及实行的措施的继续。因此，尽管安德罗波夫的执政时间很短，但是他对勃列日涅夫后期苏联的内外政策以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根据对当代一些回忆录和文章的内容的总结，中国学界对安德罗波夫其人及其执政时期的评价主要有：首先，安德罗波夫是一个极其自律的人，在参与决策过程中有着清醒的判断和敏锐的洞察力。他极富魅力，与周围人平等相待，生活节俭，不谋私利，在民众中有着良好的口碑，就个人品行而言，几乎无懈可击。苏联解体前后，几乎所有最高领导都遭人诟病，安德罗波夫却是唯一例外。不仅如此，在他曾工作过的卡累利阿，2004年人们还为他立了一座不锈钢纪念碑，这是苏联解体后首次为原苏联领导人立碑^③。其次，安德罗波夫在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期间，在强化劳动纪律、

① 参见张树华《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新华出版社，2001；〔苏〕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

② 盛世良：《神秘的安德罗波夫》，《党建》2007年第10期。

③ 参见盛世良《神秘的安德罗波夫》，《党建》2007年第10期；〔苏〕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第347～351页。

整饬社会秩序、整顿干部队伍、惩治腐败方面采取有力措施，产生了很大社会影响。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扩大企业自主权，提高劳动生产率，有效地遏制了经济持续衰退的现象。针对勃列日涅夫关于苏联已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论断，面对现实，安德罗波夫提出苏联还处于“发达社会主义”的开端阶段，并对苏联民族问题、对外关系进行了一些客观分析。最后，安德罗波夫留下的最大遗憾，就是“苏联历史让勃列日涅夫在台上站的时间太长了，而留给安德罗波夫的时间则太短了”^①。安德罗波夫执政仅15个月，使得他的很多措施来不及实行。

安德罗波夫病逝后，他的继任者契尔年科采取了保守的政治策略，并且也在上台仅一年多的时间就病逝了。从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逝世，到1985年3月契尔年科离开，3位苏共领导人在不到3年间接连病逝，使得“俄罗斯已被这样一批死气沉沉的领导人弄得疲惫不堪”。于是，“被接二连三的苏共总书记的葬礼搞得筋疲力尽的苏共中央，想找一位比较不容易死的人来接班”^②，于是推出了年轻的戈尔巴乔夫，苏联开始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时代。

在从安德罗波夫到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初的政权更迭过程中，变化比较明显的就是干部调整。众所周知，安德罗波夫的主要政治形象是神秘的克格勃主席，在国际社会中，迄今为止，与他一样出身于特工的大国元首只有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和普京。这种特殊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安德罗波夫的干部政策以及社会管理方法。安德罗波夫一上台就把整顿纪律、改进党风作为突破口，从1982年11月至1983年底，仅党中央、政府部长和州党委第一书记以上的高级干部，因贪污受贿或渎职而被撤换的就有90多人，包括内务部部长谢洛科夫，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等。然而，有学者指出，他把长期盘踞在安乐窝里的近1/3的高官赶走，用自己熟悉并信任的克格勃干部取而代之。在安德罗波夫时代，13名政治局委员中有3名克格勃将军，比例

① [俄] 罗伊·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政治传记》，徐葵、张达楠、何香译，新华出版社，2001。

② [俄] 戈尔巴乔夫、[日] 池田大作：《20世纪的精神教训》，孙立川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234页。

超过了斯大林时代^①。对此，当代俄罗斯学者茹科夫院士颇有异议。他认为，安德罗波夫领导的克格勃掌握了在苏联共产党之上的国家权力。他们在电影院、商场、餐馆和咖啡厅搜捕来出差的人，这种“加强社会主义纪律”的奇特方式给人们留下了十分不好的印象。茹科夫院士还指出，这种管理方式不仅没能加强“社会主义的”纪律，反而导致人们对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出现了动摇。

1985年4月，戈尔巴乔夫刚上台就提出改变干部政策，以此作为实行“加速战略”的一个步骤。1985年3~9月，苏共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撤换了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20余名部长以及几十位部级领导，撤换了30余名州委第一书记和大批市、区级领导人^②。这种大规模更换干部的举动对于结束“老人政治”，将一批年富力强的领导放到重要岗位上来，为改革扫除障碍因素，无疑是有益的。

从安德罗波夫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对干部政策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勃列日涅夫以来干部老化、官僚主义严重等问题，给长期沉闷的苏联政治生活带来一些新鲜空气。尽管这种调整在开始阶段主要体现在党的区、市级以上领导，并没有更多地涉及基层党组织，但这毕竟代表了苏共干部政策的一个新方向，即年轻化、有活力，也给基层组织带来了新气息。在一批年轻而又有文化素养的基层干部得到提升后，基层党的领导也得到更换，由年轻干部来担任。这种干部政策的调整有利于改变苏联长期以来存在的积弊，并发挥年轻干部的作用，但在几个月间大规模更换党的领导干部，也导致一批有经验、党性强的领导在“大帮哄”中被替换。在新提拔的领导干部中，有一些党性不够强、共产主义信念不坚定的人，在后来苏共瓦解、苏联解体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上层干部调整对基层党组织的影响还是很有限的。在基层党建方面，从安德罗波夫执政到戈尔巴乔夫继任之初，几位苏共领导人对党的思想建设以及基层组织建设还是给予了一定重视的。1983年安德罗波夫在一次讲话中说道：“各级党的委员会、每个党组织都应该懂得……一旦思想

^① 盛世良：《神秘的安德罗波夫》，《党建》2007年第10期。

^② 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626~627页。

工作更有成效，群众更好地理解党的政策，把它看作是符合人民切身利益的自身的政策，前进的速度就会多么快。”关于干部问题，他说：“各级党的委员会都应当有一批受过专门训练的干部，他们能够善于在工人、集体农民、知识分子、青年等各种居民集团中进行思想工作，并对这项工作负责。……评价他们工作的标准只能有一个，那就是群众的政治觉悟水平和劳动积极程度。”^①契尔年科在接任党的第一书记前，主要抓思想政治工作，他曾指出：“今天，政治教育工作的重心已经转移到基层劳动组织——生产作业队。应该在作业队里建立党、工会、共青团组织或小组，对人数较少的作业队，要派党的组织工作者。”^②比较而言，安德罗波夫时期对于党的基层组织工作论述不多，且只是在理论上泛泛而谈；契尔年科因为在任总书记前主要抓意识形态工作，在这个方面提出的理论比较多，也比较丰富，有些思想值得研究。可惜，正如他在1984年苏共中央二月非常全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那样：“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担任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时间太短了，短得令人惋惜。”^③不仅是安德罗波夫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时间短得令人惋惜，他自己在一年多的时间后也留下了同样的遗憾。

短暂执政使得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的一些改革主张及党建理论来不及付诸行动，所以很多主张也就停留在了理论层面上。当时基层党组织活动总体上还是循规蹈矩，沿袭旧制，不过在活动内容上还是有一些创新。比如，基层组织活动不仅学习理论，而且还商讨生产、技术、社会现象等问题。这可以在党员的来信中看出来。1983年2月，伊尔库茨克州的一位公民马托林在信中谈社会上的消极现象，如流氓行为、欺诈行为、盗窃国家资财、投机倒把、行贿受贿、打官腔、不遵纪守法，他将这些行为视为“过去的万恶的资产阶级残渣余孽在苏维埃人意识中的遗存”，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要素”，应该彻底清除^④。还有党员对基层党组织活动形式提出建议。一位莫斯科的车间党支部书记拉古坚可

① 《安德罗波夫言论选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第337～338页。

② [苏]契尔年科：《契尔年科言论选集（1971～1984）》，苏群译，三联书店，1985，第426～427页。

③ [苏]契尔年科：《契尔年科言论选集（1971～1984）》，苏群译，三联书店，1985，第459页。

④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843. Л. 71 - 72.

夫在1983年4月给《共产党员》编辑部的信中，介绍了车间党组织在开会做决议时，效率很低，缺乏实效性的情况。他指出，党组织的会议经常是这样的：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是开会却又什么决定都做不出。对此，党员们提出了不同建议。一些人主张应当建立一个委员会，先甄别党员的各种要求，然后再把必须解决的问题拿到会议上讨论；另一些人认为应该由党的机关做出决定，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只要服从；还有一些人认为，有些决定是可以由个别党员来做的，不必拿到党的会议上讨论^①。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些基层党员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消极现象与违法行为存有很大的不满情绪，他们不希望这些消极现象继续损伤党的机体。而基层党组织活动的效率低下，很多基层党员深有感触，他们希望党的组织能够改进作风，提高效率，不再把时间耗费在无结果的讨论与开会上。尽管党员会议是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的一个体现，但如果流于形式或者只有形式没有结果，基层党员还是愿意以“集中”来代替这种形式上的民主。当然，这也提出了党的会议在形式与内容上的改进的问题。因此，《共产党员》杂志编辑部的切尔诺夫承认，这样的问题“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党的会议应该在议程上做好充分准备^②。到1984年，党员的思想更趋活跃。

二 “加速战略”与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基层党组织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两年时间内，实行了以完善社会主义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其措施包括国民经济的“加速发展战略”^③，具体实施的内容主要有继续以重工业为主导，发展机器制造业，实行“禁酒运动”，与“非劳动收入”作斗争等^④。戈尔巴乔夫改革从经济入手，在几年间，苏联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民众生活因此受到极大冲击，其影响

①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843. Л. 3.

②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843. Л. 6 - 9.

③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就提出要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完善社会生活。1986年，在党的27大上，“加速发展战略”被作为苏共当前阶段的总路线提出。其主要任务是加速国民经济发展、完善社会关系、提高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公正等。参见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620页。

④ 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619～626页。

直至苏联解体之后。

最初，戈尔巴乔夫“完善社会主义”的改革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1985~1988年，苏联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人民生活有了一些改善^①。在经济体制改革早期，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多次在讲话中号召广大党员和基层党组织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作用，做“改革的先锋队”，并注意在各生产领域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基层党组织和党小组在生产各个领域都有一定发展。1981年，苏共有基层党组织约41.4万个，车间党组织约45.7万个，党小组约61.8万个，到改革开始后的1986年，这几个数字分别增加到约44万个、51.2万个和72.1万个^②，党组织深入改革的各个部门。

在改革的氛围下，各级党的工作者也开始强调改变基层党组织以往的工作方法，对过去形式主义、教条主义、不注重实效的基层组织工作提出批评。例如，苏尔库茨克市党委第一书记尼·阿尼金提出，在城市经济支柱产业中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不应当是上边派人下来走一走，看一看，检查一下了事。在两个行业^③中，可创建临时支部，联合各部门的党员活动，加强行业间协作。他还要求市党委各部门的书记及其他领导人，工作日不要坐在办公室里，而是到石油建设工地，到各生产企业亲自走走，解决实际问题，给基层党组织以真正的指导和帮助，并要求加强基层组织对党的干部选拔、干部政策的监督，不能只是由上边派下来就接受。这一时期各地方党委对基层组织建设提出的主要问题是用怎样的手段提高党员们的生产积极性。譬如，在工厂企业中，采用党员经济核算制度来调动党员生产积极性，在集体农庄中按新方法组织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提高人们的劳动热情。同时，注意通过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党对工厂中的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影响，提高产品质量，为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努力^④。从以上论述中不难看出，这个时期已经有一些党的干部对基层党组织工作提出新要求，就是党的基层

① 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645~647页。

② Справочник партийного работника. 1989.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с. 599.

③ 苏尔库茨克市以石油和天然气业为主要经济支柱。

④ 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 №. 17. 1986. сс. 48 - 53; №. 21. 1986. сс. 45 - 48; №. 17. 1986. сс. 44 - 46; №. 19. 1986. сс. 42 - 45.

领导已经不应当只是坐在办公室中就理论问题谈一谈，而是要到生产实践中去，采用多种方法发挥党员在生产中的积极作用。并且，基层党组织要在工厂和集体农庄将经济核算与思想工作结合起来，调动党员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这实际上也就是要求党组织改进工作方法。在苏共上层，为更好地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在1985年12月底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社会主义竞赛与生产一群众工作部负责人给《共产党员》杂志的一份信件中，有这样的表述：“近年来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很多劳动集体的实践中，开始采用社会主义义务保护合同。它的目的是实际帮助竞赛参加者明确义务，监督其完成，照顾相邻班组集体、车间的要求，甚至与国外完成任务提高效率相比较。”“义务保护合同规则的确定，通常以社会主义竞赛为条件，有明确的劳动集体，标明企业的特殊性及其结构划分。”“在一些企业中，保护者是生产一群众委员会、企业的工会组织、车间委员会。在另一些单位，创建单独部门，有党和工会、共青团组织的行政人员代表，部门专家和工作人员。也会有另外的规则。比如，在以日丹诺夫命名的‘伊若拉工厂’，是这样进行保护的：保护工人的——是有车间技工和专家参加的班组委员会；保护班集体的——是有社会主义竞赛组织者参加的车间委员会；保护生产、车间、部门和实验室的集体的——是企业联合体委员会。”“说到谁来保护社会主义义务，通常由劳动班组、车间集体自己决定。这将成为领导者和共同的组织，以及先进生产者的代表。”落款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社会主义竞赛与生产一群众工作部副部长戈列宾希科夫^①。这说明，在开展新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情况下，苏共中央更加注重谁来保护职工及其集体的权益，其目的也是使更多的劳动者参加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

到1987年，苏共对基层组织在改革中所发挥的作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И. 格洛美科、В. 日瓦列夫斯基在《党的生活》第一期撰文《积极改进基层党组织活动》提出，要贯彻苏共27大精神，改进基层党组织工作，加强基层党组织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例如，在工厂企业中，

^①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910. Л. 11 - 12.

基层党组织的任务是组织党员高质量完成生产任务^①。198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定，要根本改变企业管理方法，由以行政领导为主转向以经济管理为主，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制等，加快改革的速度。在经济体制改革加速、政治体制改革也已着手的情况下，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方法也有改变，更多地参与到改革中。在党的基层组织工作中，强调采取灵活多样的工作方法，一些党务工作者对基层党组织在改革中的任务、作用提出自己的意见，由他们的意见也可看出当时基层党组织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例如，有些党的干部还有官气，不能深入生产实践；在党的干部选拔中还存在“选派”现象，不能发扬基层民主；党员大会走形式，内容空洞，等等。在1987~1988年《共产党员》杂志收到的很多信件中，都在讨论重新阅读和重新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可以看得出来，当时对于一些经济问题，人们试图从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入手获得解释。广大党员还就苏共27大的改革议题、党的组织问题、苏联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等问题积极提出意见和建议，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党内民主的加强。

对于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过程以及后果，当代俄罗斯学者有多种分析与评价。在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其对党的执政基础的破坏以及在基层党员群众中的影响。当代俄罗斯历史学家皮霍亚曾详细叙述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措施，以及自己对那场经济改革的看法。他写道，在苏共中央4月全会（1985年）上，戈尔巴乔夫提出加速经济发展的概念，包括加速科技进步、改造国内机器制造业、生产新型机器和设备、采用高水平的工艺等。与此同时，还提出了下放经济管理权、扩大企业权利、实行经济核算、提高劳动集体的责任和利害关系的思想，宣布实行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方针。“第十二个五年计划（1986~1990年）预计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提高到20%~22%、工业产量的增长速度为21%~24%、农业产量的增长速度提高1倍。郑重地提出了2000年在工业生产水平方面赶上美国的任务”。对于这些措施的实施，皮霍亚认为，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即1987年之前，在经济改革措施上继承了安德罗波夫的经济政策，经济改革还是以行政干预为主，而不是市场导向的。1985

^① 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 №. 1. 1987. сс. 42 - 47.

年5月初，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实际上宣布了在全国实行“禁酒令”的方针。他实行的反酗酒运动，则给国家财政和预算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国库少收的资金：按照1985年的计划应获利润600亿卢布，1986年为380亿卢布，1987年为350亿卢布，1988年为400亿卢布。给预算带来的打击如此巨大，以至于到苏联存在的最后日子都没有克服。”从1988年起，“加速战略”换成了另一个口号——“强有力的社会政策”。在这一时期，因资金不足，国家集中投资减少。到后期，随着国家财政出现困难，外债增加。金融领域的变化严重冲击着统一的中央政权。“苏联领导人面对积累起来的经济问题实在是软弱无力。‘意志的麻痹’导致丧失了实行任何连续性经济政策的机会。到20世纪90年代初，计划经济的失衡极其严重，联盟中央势必与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孤立政策发生冲突。”各加盟共和国开始成立自己的银行，也就是各过各的日子，在联盟解体前，经济的崩盘已经明显出现。不过，联盟作为一个政治体系的崩盘已经使得所有其他问题都不那么引人注意了，因为那时政治问题更令他们焦躁不安^①。

另一位当代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在回顾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时指出：“1985~1986年，已经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没有能够正确地确定优先目标。在当时国内政治和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大多数人生活水平低下。工人、农民和干部们期待着新领导给予解决。这是可以提起整个链条的关键环节。在中央，领导人需要关注的有工资和退休金、生活水平、改善外省的食品供应状况等。只有这个政策才能够保证得到居民经久不变的支持和建立进行各项改革的先决条件。甚至在1989年时，在公开的民意问卷调查中，超过60%的居民认为要求解决的问题中居第一位的是必须改善物质生活条件，只有15%的居民要求扩大政治权利。在谈到社会主义的目的时，40%的问卷回答者提到物质福利，30%认为应该振兴农村和农业经济，25%希望实现没有特权的公正性，只有18%谈到民主。然而，正是在提高物质福利方面，改革却没有作为。”罗伊·麦德维杰夫认为，戈尔巴乔夫继续苏联时期发展机器

^① [俄] 鲁·格·皮霍亚：《苏联为什么解体？》，王晓菊译，载李慎明主编《历史的风——俄罗斯学者论苏联解体和对苏联历史的评价》，人民出版社，2009，第296~298页。

制造业的传统，忽略了人民群众对提高物质生活条件的要求。同时，“以行政手段反对酗酒，只能引起群众的不满。在反酗酒运动实行了三年多，被迫停止后，颁布了一系列‘搞活’经济的决议，如关于扩大个体劳动经营范围的决议，允许自由交易私人商品，允许买卖郊区私人住宅，开始了城市住房的私有化，废除很多使用花园、菜园及对宅旁地的限制，扩大别墅的建造等。只是，所有这些政策和措施在实行时，‘破快于立’”。罗伊·麦德维杰夫还用加拿大学者的话作为自己观点的“佐证”。他回忆说，还在1990年夏天，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俄罗斯和东欧研究中心的学者举行了一个特别的以“戈尔巴乔夫政治失败之原因”为题的“思想交锋”。加拿大研究者得出的结论是，苏联领导人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正是错误地确定优先目标。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否认了斯大林模式。”“但是，在1985~1987年他的经济政策反映出来的还是计划性的传统立场。”国家不顾消费品不足等情况，决定把投资放在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电力工业和核工业设施上。在执政五年之后，戈尔巴乔夫“使广大的人民群众同自己疏远了，使党和政府瘫痪，使先锋队体制陷入总危机”。最后，戈尔巴乔夫解散苏共，“但是没有了党有效地去参与解决经济的无序状态，以及没有能够替代党的机构的市场机构，苏联经济必将陷入泥潭”^①。值得一说的是，这个分析与结论是加拿大研究者在苏联解体半年之前做出的。

还有学者指出了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对苏联经济的破坏作用。当代俄罗斯历史学家卡拉-穆尔扎认为，苏联不是失败在经济问题上，而是失败在意识形态上。他写道：“通常以为苏联的垮台是经济原因，这是经不起推敲的——这是试图对无法解释的事物寻找简单的和习惯性的说明。在1988~1989年的激进改革之前，苏联并没有发生经济危机。国民生产总值每年保持了3.5%的增长。”“甚至到了1989年，90%以上的公民都没有预感到不久的将来会发生任何经济困难，这个可靠的事实足以证明危机并不存在。”他认为，戈尔巴乔夫继任之初，苏联经济并没有走到尽头，改革并非没有可能成功。最主要的是，作

^① [俄] 罗伊·麦德维杰夫：《意识形态衰落是苏联解体的最重要的原因》，葛新生译，载李慎明主编《历史的风——俄罗斯学者论苏联解体和对苏联历史的评价》，人民出版社，2009，第274~276页。

为改革的设计师，戈尔巴乔夫本人对改革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清晰的规划^①。原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季诺维也夫在苏联解体后的一次谈话中说：“我认为苏维埃时期是俄罗斯历史上的顶峰。”“等到多少个世纪过去后，后代将会怀着惊讶和赞赏的心情研究这个时代，为一个处于极端困难条件下的国家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做了这么多的事情而惊叹不已。不错，有过许多不好的东西，有过犯罪行为、错误和失望。然而我认为这个时期真的是非常好的，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现象之一。”^②苏联解体以来，国内外学界对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做出过诸多评价，因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列举。这些评价与分析无论是肯定的也好，否定的也罢，都已经是“事后诸葛亮”，而那场混乱的经济改革最大的受害者是苏联民众，基层党组织工作也因此受到极大冲击。

总体来看，在苏联改革前期，人们对戈尔巴乔夫实行的改革充满期望，基层党组织在实际工作中也比较主动，能够参与到改革中，支持改革。应该说，这是改革的良好群众基础。但是，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却让广大党员群众开始感到疑惑，并渐渐失望，直至绝望。

第二节 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 前后：党的队伍不稳定

在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两年，国民经济有所发展时，苏共的改革转向政治领域。从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提出“民主化”“公开性”，到1988年6月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苏共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其间在“民主化”“公开性”思想指导下出现的重新评价历史，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思潮，对基层党组织的稳定带来极大冲击，这个时期开始出现大规模退党现象。

① [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上卷），徐昌瀚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409页。

② 张捷：《从苏维埃制度的批判者到颂扬者的季诺维也夫》，载张捷《俄罗斯作家的昨天与今天》，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一 “民主化”“公开性”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

1987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提出了社会变革的“民主化”和思想上的“公开性”主张，同时，他在讲话中还多次重申“改革”就是“革命”，号召对苏联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来一场“深刻的革命性变革”，这标志着苏联的改革开始转向政治领域。在苏联出现了新一轮的干部更替，而这次更换干部主要是以其对待改革的态度来衡量。根据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的报告，在两个多月时间里，乌克兰更换了1/5以上的由乌克兰党中央任命的工作人员，还改选了462个工业、建筑业、运输业、邮电企业的领导和国有农场场长、2.5万名集体农庄和国有农场的生产队长和班组长^①。干部的更替给基层党组织工作带来混乱，而选拔干部不是以党性为原则，不按照党章要求，仅仅以是否支持改革来衡量，一方面说明改革在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方面出现问题，改革开始遇到阻力；另一方面也导致一批优秀的党员干部受到挫折，他们对党、对改革的信心有了动摇。

不久之后，在苏联出现了重新评价历史的思潮。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公开提出，在苏联历史中“不应该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苏联舆论界对苏联历史中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一一重新历数，尤其是对斯大林时期的政治生活加以“深入”分析，把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后掀起的、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再次推向高潮，继而出现了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情况。这场批判运动不仅歪曲历史、完全丑化了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的形象，也严重损害了苏联共产党的威信，从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领域动摇了苏维埃国家的根基，是苏联解体的重要思想因素。对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也产生了极大影响。对于这个过程，有必要进行较为详尽的叙述和分析。

（一）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对斯大林的批判

1986年初，戈尔巴乔夫提出“民主化”“公开性”“舆论多元化”的口号。在中央，戈尔巴乔夫要求把一些有关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的材料公开，因为“党和社会还不知道斯大林制度的全部罪行，要接受

^① Украина Правда, 25 марта 1987.

事实的教训，必须将那一时期的真相公之于众”。一批历史档案开始对外开放，成立了许多专门委员会为斯大林时期的受害者恢复名誉，大批“持不同政见者”和政治犯也逐渐从劳改营或国内流放地释放回来，他们成了国家实行“政治迫害”的“活证据”。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要扩大“公开性”，还提出在苏联历史中“不应该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他对著名的史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中没有人公开站出来感到不满意，于是，在这几个领域里进行了批判斯大林的动员。为扩大宣传阵地，《星火》《莫斯科新闻》等主流报刊的主编相继换成自由派知识分子，这些报刊连篇累牍地登载批判斯大林的文章。在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报告中，戈尔巴乔夫严厉批判了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1987~1988年，批判斯大林的运动达到了高潮。1990年7月，在苏共第28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戈尔巴乔夫再次严厉批判了“斯大林一伙的罪行”，并几次声明要抛弃“斯大林极权体制”。在大会正式通过的决议中清楚地写道：“极权的斯大林体制给国家、人民、党、社会主义思想本身造成了巨大损失，这一体制正在被取消。”^①对斯大林的批判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之后。就这样，在苏共上层的主导下，苏联掀起了一场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狂潮。按照一些人的说法，苏联过去的挫折和失误都是由斯大林造成的，而成绩和进步则是违背他的意志取得的。斯大林被看成给人们带来痛苦和不幸的灾星，“独裁者”“暴君”“阴谋家”“杀人犯”等成为他的常用称谓，在几年之内，斯大林被完全妖魔化了。

随着批判斯大林的进一步升温，自然提出了对“导致斯大林现象产生的苏共其他领袖人物”的批判问题。1989年以后，对斯大林的批判，逐渐扩大到批判与否定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以及列宁本人。开始时，一些文章或明或暗地指出，斯大林的错误实际上与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乃至列宁本人有着直接联系。也有人干脆说，斯大林之所以“罪恶累累”，是因为列宁带了个“坏头”。1990年，在准备纪念列宁120周年诞辰时，戈尔巴乔夫向手下人提出，应该“结束把列宁‘描绘为神’并加以崇拜的现象，设法使列宁归入历史上活动家的行列，理应根据‘他的时代背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莫斯科，1990，第2、29、88页。

景’对他进行客观的、科学的研究和认识”^①。于是，对列宁也“动起手来”。关于列宁的“罪证”主要有这样的说法：“十月革命并非一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革命，而不过是一个巨大的阴谋，是一次在西欧一小撮阴谋家和冒险家的情报机关帮助下，由‘德国奸细’列宁和‘英美’特务托洛茨基密谋组织并挑唆完成的一次‘政变’。”^②有作家公然宣称“十月革命根本就是不必要的”，列宁“不是一个善良的人”，而是一个“具有革命的残酷性的人”，“斯大林一点也不比他的导师更残酷，列宁就是昨天的斯大林”。从1989年起，苏联各地连续发生了多起推倒列宁纪念像，或向列宁像涂抹油漆、投掷脏物的事件。

（二）批判斯大林以及苏共领导人的缘起与目的：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

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对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的批判有其思想渊源以及最终目的。

首先，批判斯大林的最早起因可以追溯到苏共20大。众所周知，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揭开了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序幕，苏共22大后又采取了一系列“非斯大林化”的措施。对此，戈尔巴乔夫持肯定态度，认为这是“重新评价内外政策、分析历史事实”。不过，他把这种“重新评价和分析”给进一步“发展”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对斯大林的“揭批”，不仅对斯大林的“罪行”做了“深入剖析”，而且无限扩大了。

戈尔巴乔夫自称“苏共20大的产儿”。他曾不止一次地公开赞扬“赫鲁晓夫大无畏的行动”，高度评价苏共20大“是对极权体制的第一次冲击，是朝社会民主化迈进的第一次尝试”。不过，戈尔巴乔夫认为赫鲁晓夫在揭露斯大林方面还有局限性，不能也不愿揭露他所抨击的现象的深层基础。他明确地指出，这个“深层基础”就是“社会体制”^③。所以当他宣称要在全社会推行“公开性”“民主化”，并且与“极权的官僚

^① [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第409页。

^② [俄]《莫斯科新闻》2007年6月1日。

^③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王尊贤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56、60页。

体制决裂”时，自然也仿效赫鲁晓夫的做法，首先发起对斯大林等苏共领袖人物的攻击。

其次，从思想素养来看，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是戈尔巴乔夫等人全盘否定苏共领袖和苏共历史的思想根源。

戈尔巴乔夫在给一本书所写的序言中曾写道：“开始改革的时候，我关心的主要是政策。我认为必须彻底改变苏共的政策，因为苏共把国家引入了一条死胡同，把世界推向了核对抗。”^①的确是这样，改革之初，戈尔巴乔夫的“加速发展战略”受挫，对此他不是从主观方面寻找原因，反而认为这是体制障碍问题，便急于着手政治变革。他十分清楚：要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必须和原有的苏联体制决裂，并幻想以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来取代“旧体制”。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原苏联国防部部长亚佐夫在2001年回忆道，1987年以前，戈尔巴乔夫表现得好像非常坚定，但实际上他的信仰早就发生了动摇。他曾私下说：“共产主义思想对于我已经过时。”后来，他和雅科夫列夫一起，从组织上和宣传上从事反共活动。他们首先控制住苏共舆论宣传阵地，借“公开性”和“民主化”大搞无政府主义的民主，通过全盘否定斯大林、夸大苏共的历史错误、揭露存在的官僚腐败等问题，搞乱了党员和群众的思想，为最后背叛确立了思想理论基础。

苏联要进行改革，确实需要对斯大林个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做出正确评价，因为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对推动改革、多途径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无疑是有益的。但戈尔巴乔夫等人“重评历史”从一开始就带有极大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并且一步步走向了全盘否定苏共领导人和苏联社会主义70年历史的道路。

最后，批判斯大林以及苏共领导人的实质：把矛头指向苏联社会主义制度。

“公开性”的目标之所以直接指向斯大林，是因为戈尔巴乔夫从一开始就把改革定位为一场摧毁原来制度的革命。“改革是一个含义广泛，内容极为丰富的词。但是，如果从它的许多同义词中选出一个关键的、

^① 俄罗斯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编《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第256页。

最能表达其实质的词，那就可以这样说：改革就是革命。”^① 戈尔巴乔夫等人的任务就是先彻底清除这种“不正确”制度的代表——斯大林，而实际上他们最终摧毁的则是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国家。

1988年6月，在党的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中，戈尔巴乔夫指出，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方针不仅是倡导“民主化”“公开性”“舆论多元化”，而是要放弃苏共是苏联政治体制核心，是要把国家权力中心从共产党手中向苏维埃政权转移。这是他第一次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与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他称之为极权社会主义）根本不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改造党的思想，就是用西方社会民主党的那一套理论来替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用这个理论来改造党，就是要最终取消党的执政地位，按戈尔巴乔夫的说法是“把权力从独家操纵的共产党手中交到按宪法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的苏维埃手里”；用这个理论来改造社会制度，就是把社会主义改变为资本主义。

（三）批判斯大林、否定苏联历史带来深远的社会后果

利用各种舆论工具大张旗鼓地批判斯大林、批判苏共主要领导人，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最终结果是全盘否定苏联历史，带来思想混乱，从而引发一系列思想意识和社会问题。

第一，严重破坏了苏联领袖的形象，搞乱了思想意识，带来了信仰危机。

对斯大林的批判伴随着“公开性”铺天盖地而来，对一些历史问题的解释引起学术界和思想界的极大混乱。斯大林成了“恶魔”，列宁成了“无赖”，整个苏共和苏联的历史除了罪恶还是罪恶，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社会带来的只是灾难，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成了人们心目中自由和富足的理想天堂。社会思想意识被错误引导，是非完全颠倒。正如一位俄罗斯学者所总结的那样：“改革的意识形态机器在破坏苏联社会集体的历史记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国家历史上的象征和里程碑被抹上了黑，

^①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第55页。

受到嘲笑，黑白被颠倒。”^① 当时，不只是斯大林的个人形象被严重扭曲，他所领导的党、社会主义苏联的形象也被严重损毁，社会主义价值观被破坏，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信仰不断下降。到1991年，在主流舆论千百次地重复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各种媒体把党的领袖形象抹得一团漆黑，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把这些谎言和谬论误认为真理的情况下，在共产党被解散、社会主义制度被推翻的危急时刻，还有谁会站出来捍卫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呢？

第二，批判苏共领导人引发了各种社会矛盾，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重要思想因素。

意识形态的混乱加剧了经济恶化。1988年批判斯大林达到高潮，1989年苏联经济出现几十年来第一次“负增长”，社会开始动荡，民族离心倾向加强。1989年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后，苏联完全陷于混乱：民族情绪沸腾，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处于大规模内战的前夕，几百辆火车滞留在外高加索，在哈尔科夫，“人民鲁赫”宣称其“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独立的乌克兰。1990年2月，在莫斯科出现了有25万~30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人们不仅喊出了“打倒利加乔夫”“打倒戈尔巴乔夫”的口号，还要“打倒整个苏共”以及克格勃，甚至要打倒一切，以使政权化为灰烬。

在共产党的领导人形象被破坏、社会舆论被搞乱的情况下，各加盟共和国党组织离心倾向也加强了。从1989年起，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等一些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提出脱离或独立于苏共的要求。立陶宛共产党不顾苏共的劝阻和反对，于1989年12月20日在立陶宛共产党20大上通过了《立陶宛共产党宣言》和《关于立陶宛共产党地位的决定》，宣布立陶宛共产党脱离苏共，与苏共保持“平等的伙伴关系”。苏共党内所谓的“民主派”也利用这一形势，与党外的民族分离主义者相互呼应、紧密配合，进行分裂苏共、解散苏联的活动。

有俄罗斯学者曾总结说，苏联的解体并不是缘于经济问题，而是基于政治意识的原因。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也

^① [俄] 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上卷），徐昌瀚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401页。

认为：“苏联的垮台和原苏联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崩溃不是持不同政见者所为，而是在‘克里姆林宫’领导下的最高政权的代表们所为。”^①实际上，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具体措施、步骤有问题，而在于改革的政治方向错了，他以批判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为开端，否定和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试图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来改造整个社会，结果是追求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葬送了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

第三，在批判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美化”西方民主，给西方“和平演变”战略以可乘之机。

在批判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苏联媒体大肆宣扬西方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思想，对苏联原有的思想信仰、道德观念形成极大冲击。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批判，对西方民主自由的宣传，极大地影响了苏联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政治导向。到戈尔巴乔夫改革末期，原来所谓的“坚定的列宁主义者”摇身一变成了“极权主义”的斗士，他们拥护“激进思潮”并到处传播，大学里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成了被嘲笑的对象，全国众多的科学共产主义教研室仿佛一夜之间都变成了传播西方政治学的基地。有相当大的一批知识分子对西方模式顶礼膜拜，对苏联历史和现状心存不满，其中少数知识精英最终成了瓦解苏共、摧毁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急先锋”。苏联解体以后，通过对这场剧变的反思，一部分俄罗斯学者认识到：“苏联解体是西方帝国主义有意识的政策的结果，他们借助在苏联内部被其收买的、贪赃枉法的一帮人直接实现了这个目的。”^②

第四，批判斯大林、否定苏联历史是社会主义事业在东欧失败的直接导因。

在“公开性”旗号下，苏联公开的档案材料使得东欧与苏联的一些历史“旧账”被重新翻出来，导致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复杂化。而批判斯大林，完全否定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领袖的形象，否定共产党和社会主

① [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上卷），徐昌瀚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409页；[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侯艾君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第269页。

② В. Нешко, Распад СССР, Москва, 1996. с. 14.

义制度，对东欧共产党政权又形成了极大冲击。其中，影响最大的应属波兰。在公布苏德战争时期的档案后，波兰舆论界认为，1939年苏军进入波兰东部，苏德战争爆发初期华沙被德军摧毁，苏联有“坐视不帮”之责。1988年后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在媒体上发表文章披露卡廷事件，更增强了波兰人对苏联政权的仇视。1989年3月，波兰罗马天主教反对派的刊物《普世周刊》刊登了一篇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社论，把卡尔·马克思说成“19世纪最阴险的、最使人厌恶的人物之一”。该文还指出：“全世界的知识分子，以他们的荣誉的名义，并且无须等待最后审判日的裁决，就可控告马克思现在和将来永久地把人们引入歧途。”当时，西方媒体也对波兰加强策动。1989年中，波兰自由工会组织团结工会合法化，并在当年的选举中获胜，“波兰的历史又回到原位”^①。不只是在波兰，1989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几次大会中都宣布要“完全放弃斯大林主义”“同斯大林主义者及其变种划清界限”；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通过决议要放弃“一党独断”，实行多党制；保加利亚也修改宪法，取消宪法第一条有关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决定……共产党政权在东欧各国如雪崩一样倒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

（四）基层党员对否定历史的看法

由苏共领导人发起的这场批判运动，在基层党员中所引发的反响是不一样的。对于那些本人或者家庭经历过“大清洗”或者其他阶段的镇压与迫害的党员而言，他们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同时还可能失去亲人、失去原来的家庭与家庭财产等，他们对这个制度从拥护到困惑到质疑，如今似乎解开了多少年郁结于心中的“结”，他们不可能原谅“制造”了那些悲剧的领导者，认为应该追究其责任。当然，多数党员在心目中是把斯大林与苏联、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分开的。他们认为，是斯大林的个人品格以及他周围的那些人制造了社会悲剧，应该受到惩罚的是斯大林。1988年9月莫斯科的一位党员阿尔诺利德给《共产党员》杂志写信，对一篇登载在1987年第18期上的文章提出异议。他表示，自己不认同“斯大林体现了所处时代的社会心理的客观特点”这样的说

^① [美]塔德·舒尔茨：《昨与今：战后世界的变迁》，中国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东方出版社，1991，第59、84页。

法，并且认为斯大林代表的是其个人，而不是社会。他明确地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证明斯大林、斯大林主义及社会主义无罪。”^①对此，杂志的回复是，当前的关键问题不是为了证明斯大林无罪，斯大林的性格与个性中那些特点已经尽为人知，人们不再感兴趣。不过，有关这一切的讨论才刚刚开始，远远没有终结。问题在于，为什么那一些事情在我们的社会中能够发生，被我们的这个领袖人物制造出来？为什么这一切发生在他身上，而不是发生在他的对手们身上？能不能保证这一切不再重演？分析客观因素恰恰是要解答这些问题，而不是为了证明斯大林无罪^②。另一位名叫叶尔马拉耶夫的人，在1988年3月给《共产党员》杂志来信，要求全方位放开科学与群众信息手段，以使广大党员群众更多地了解历史真相，提出应该清算斯大林主义，清除其历史遗毒，并认为：“我们的学者们将无助于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他们提出并捍卫了斯大林主义。”^③显然，这些信件的作者看到了斯大林“有着深重的政治错误，他和他身边的人做出了那些事，使得我们的人民为了他们所做的事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给我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沉重后果”^④。他们甚至提出激进的想法，要彻底清除斯大林的“遗毒”，这代表了当时一部分基层党员的观点。

不过，也有基层党员对于否定历史、否定自己国家的过去提出异议。例如，一位哈尔科夫市的卫国战争老战士、老党员和劳动者岗察洛夫对当时否定苏共历史、批判苏共领导人的做法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我出生并成长在社会主义祖国，体会了她所有的苦痛与快乐。虽然不能作为全部见证人，但也是我们国家所做出的巨大成就的积极参加者。”“苏联从一个农业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变成了一个大工业国，有大规模的农业集体经济，完成了文化革命，同时建起了适合人居的住房、医院、文化一体育设施，还要提前防范战争。”这都是不可否认的巨大成就。“当听到并读到一些作家、记者和其他公民写的东西，竭力抹黑斯大林，弄出各种臆想、说法、谎言用于否定苏维埃国家的过去时，我很忧伤，也很痛

①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1029. л. 141.

②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1029. л. 142.

③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1033. л. 108.

④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1033. л. 109.

苦。”他质问：“难道，在那些年中，我们都在从事反革命的活动？”他强调，那些写了否定历史的作品的人“应该为侮辱我们的社会和人民而道歉”。他还指出，抹黑过去的人们鼓吹说，眼下我们不能除掉我们国家历史中的“空白点”，就不能向前走，因此，他们要用污泥填满“空白点”，“但是污泥将喷溅到当时那些诚实的人们身上”。“1936~1938年的大镇压，是无论在世界还是在国家内出现了复杂而紧张的形势带来的结果，是维护领导权的斗争，是斯大林周围一部分人争名逐利，包括在国家安全机关利用斯大林的怀疑心，首先是国家不同阶层居民的叛卖的结果。”^①与此观点相近的，就是当时列宁格勒工学院女教师安德烈耶娃给《苏维埃俄罗斯报》编辑部的信件《我不能放弃原则》。信中指出：“公开化、开放、取消批评禁区、群众意识中特别是青年人中的狂热，常常会导致许多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要么是西方电台广播的‘提示’，要么是我们同胞中那些对社会主义核心理念动摇的人的影响。”“在学生中出现最多的是对祖国历史的争论。”“目前，因为关于镇压的话题在青年中已经极其泛滥，遮蔽了对过去的客观认识，而且像这样的例子绝不是个别的。”“毫不奇怪，为什么会在一些学生中出现虚无主义情绪增加，出现思想上的混乱、政治方向迷失、在意识形态方面随心所欲等现象。甚至可以听到有人这样控诉：据他们所言，从1917年开始共产主义者就逐渐使我国的生活丧失了人性。”“那些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为指导，研究特定历史过程的评论家们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沙特罗夫在歪曲我国的社会主义历史。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而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贡献，我们今天的改革根本无从谈起。作者还指责斯大林暗杀了托洛茨基和基洛夫，在列宁生病时孤立了他。但是，难道仅可以凭借想象、并不去寻找证据，就把带有倾向性的指控抛向历史人物吗？”^②

可以看出，当时基层党员在如何对待苏联历史问题上存在截然不同的对立观点。一部分人完全赞同和支持苏共第19次会议有关公开性的表述，另一部分人对否定历史的做法提出疑惑乃至抗议。尽管有一些党员

①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1032. л. 170 - 175.

② [俄] 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安德烈耶娃：《我不能放弃原则》，李瑞琴译，环球视野网站，<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28091>，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6月30日。

起而大声呼吁，反对抹黑历史、全盘否定领袖、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过去，但是围绕历史问题的这场争论还是引发了社会思潮的巨大变化，也带来了思想上的大波动，给党员队伍造成了不稳定的状况。据统计，仅在1987年头9个月，因被开除出党以及退党而离开党的队伍的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就分别达到89816人和25834人。也就是说，在9个月间有115650名党员离开党的队伍^①。这个数字在后来又有急剧增加，但是在这之前，在苏共历史上，尽管有过多次清党，党的队伍人数如此大规模地减少还是不多的。

当然，尽管出现了思想波动，苏共基层党组织工作基本上还能够按照原有的轨迹进行。1987年的基层党建理论涉及的内容更广泛，如在教育行业，在中学里，基层组织的会议不仅要进行政治理论学习，还参与培训教师，使之树立良好职业道德素养并具有较高职业技能；还有人提出党的会议的实效性问题，认为党的会议不能只走形式，当“好好先生”，在党的会议上可以就具体问题进行争论，如对党的经济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等问题展开争论，只要能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就行；这一时期基层党组织在加强民族团结中的作用也得到一定重视，强调在多民族企业中，加强民族团结，而基层党组织的任务则是建立良好氛围、创造条件，使各民族工作者和睦相处，培养爱国知识分子。同时，对于不讲究工作方法的党的基层领导提出批评，并提出改正意见^②。大体上看，到1987年，尽管改革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党员队伍也出现了不稳定状况，但党员总人数还是呈现上升趋势。当然，与1985年和1986年比较，1987年以后新入党人数已经开始下降（见表3-1）。

表3-1 1985~1988年苏共接收入党人数比较

单位：人

| 时间 | 接收为预备党员人数 | 接收为正式党员人数 |
|-------|-----------|-----------|
| 1985年 | 654233 | 609927 |
| 1986年 | 663070 | 640719 |

① Справочник партийного работника. 1989.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с. 590.

② 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 №. 2, 1987. сс. 51 - 52; №. 11, 1987. сс. 47 - 50; №. 14, 1987. сс. 64 - 65; №. 12, 1987. сс. 64 - 66.

续表

| 时间 | 接收为预备党员人数 | 接收为正式党员人数 |
|--------|-----------|-----------|
| 1987 年 | 585294 | 607201 |
| 1988 年 | 438886 | 522884 |

资料来源：Справочник партийного работника. 1989.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с. 591。

由表 3-1 可看出，1987 年苏共接收预备党员和正式党员的人数与 1985 年和 1986 年相比都有减少，而 1988 年则比 1987 年还要少。主要原因在于，1988 年苏共开始对发展党员进行控制，采取更加民主和公开的办法吸收新党员。在评价新党员的标准上，除要求有更高的文化素质外，把对改革的态度作为重要一条。入党要求上的变化，给接收党员工作也带来了一些影响。

（五）历史教训与反思

苏联解体后，在反思历史的过程中，当年批判斯大林的一些历史事实逐步澄清。近年来，俄罗斯学界和民众中涌现出一股重新评价斯大林的思潮。2003 年 3 月 5 日，在斯大林逝世 50 周年之际，这股思潮达到一个高峰。正如《消息报》所说：“在人民领袖斯大林逝世 50 周年之际，为他恢复名誉完全成为有组织的行动。”^① 最有代表性的是当年一些对斯大林持批评态度甚至是“持不同政见者”的观点。俄罗斯“红色爱国者”作家邦达列夫曾经批判斯大林是一个“残酷的、狡诈的、意志坚强和充满矛盾的人物”。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他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1998 年底，他在一次讲话中称斯大林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人物”，认为斯大林“改造了俄罗斯，建立了一个独一无二的高度发达的社会”^②。在 1999 年发表的札记里，他把斯大林与世界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并列起来，充分肯定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建立的功勋。

重评斯大林是俄罗斯存在的社会危机的反映，也反映出俄罗斯民众希望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心理，因为在他们心目中，斯大林正是牢固地和“稳定”“秩序”联系在一起的领袖，为达到稳定的目的，政府和国家领导人应该像斯大林一样有一双“强有力的手”。

^① Известия, 12 марта 2003.

^② Литература, 22 июня 1988; Завтра, №. 52, 1998.

当年，批判斯大林，批判苏共其他领导人，将苏联共产党的领导说成充满罪恶的，称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为“极权体制”，同时极力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甚至不惜以破坏国家形象和民族利益去追求所谓的自由民主，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这场改革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啻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完全破坏了苏共领袖的形象，摧毁了苏联人民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连社会基本价值观都被否定了。当今俄罗斯重评斯大林，重评苏联历史，强调的是斯大林的国家主义、强国思想，意在重建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道德、民族尊严为主题的社会价值观。这是在苏联解体、经济退步的情况下，俄罗斯政府重建民族信心的一个重要举措。从这个角度来说，重新评价斯大林和苏联历史，其实质意义是要在俄罗斯重建社会的主体价值观，因为任何社会都需要有正确健康的主体价值观，有一个稳定的价值体系。只有保持稳定的社会价值观，才能从社会意识上保证政府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才能在思想上巩固国家的根基。只是，破坏容易，重建却十分艰难，这是苏联历史留给人们的又一个深刻教训。

二 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与全国性的苏维埃选举

1988年6月，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做了题为《关于苏共27大决议的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的报告，肯定民主化、公开性“根本改变了苏联的思想政治社会风貌”，指出经济体制改革进展缓慢的原因是政治上保守势力的阻碍。该报告认为，三年的改革以及实行党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等经验证实，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实行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了，而政治体制改革决定性的发展方向是充分保证苏维埃代表的权利。该报告用了很大的篇幅论述苏维埃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要求重新划分党和苏维埃的权力，规定：“任何一个国家问题、经济问题或社会问题，都不能越过苏维埃来解决。”“所有党组织都应该在苏联宪法和苏联法律范围内活动。”^①在用苏联宪法和法律限制苏共的同时，苏联对1977年宪法进行了修改和补充，规定对人民代表实行差额选举，经过选举的新一届苏联

^① Справочник партийного работника. 1989.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сс. 6 - 22。

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在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也建立人民代表大会，作为相应级别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在这个报告中，除共产党外的社会组织第一次被允许可以派代表正式参加国家最高权力机关^①。在对新选举方法进行了广泛宣传后，苏联全国开始了苏维埃选举的竞选活动。在竞选过程中，一些人为拉选票，以民主派身份出现，在演说中批评共产党的政策，提出激进改革设想。这次竞选结果，有87%的当选者是苏共党员，这种情况令戈尔巴乔夫兴奋。他认为，通过这个数字看，苏共还是有政治威信的，但也有人提出，这些共产党员当选是因为他们“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强调自己是共产党员”。另外，有30个按民族和地区提名的地方党组织领导人落选。这些情况说明，尽管“落选的只是30个人，实际上落选的是整个苏共，因为这30个人代表的是苏共”^②。无论从政治权力看，还是从社会威信看，苏共作为执政党的权力中心地位都在下降。

还在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召开之前，在广大党员中就已开始了有关多党制的讨论。1988年3月，布良斯克州卡拉切夫市的热列布佐夫给《共产党员》杂志编辑部写信。他认为，《共产党员》杂志社是苏共的一个理论性与政治性的机构，在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将要召开之际，它有责任向读者解释党的理论和政策。他就多党制向杂志说：“在眼下的苏联很多人都在谈论这个问题，无论是现在还是在别的什么时间实行多党制都不奇怪。实际上，在赫鲁晓夫执政后，关于一党执政人们就已经开始思考。”热列布佐夫是一个工程师，工作十年了，并且还担任党支部的负责人，从事党的工作，但是他说：“我越来越相信……多党制对我们十分必要。”^③同时，他也很困惑，因为对这个问题不同看法显然也是广泛存在的。对此，杂志编辑部顾问库德里亚夫采夫的回复是，有关“民主化”“公开性”，今天已经有不少人在讨论，尽管有大多数共识，也有不少争议。这个问题部分是与向多党制过渡相联系的。眼下回答这个问题还不容易，因为这个问题很新，对其研究还不多。能够看到的是，

① Правда, 3 декабря 1988.

② [苏]尼古拉·雷日科夫：《背叛的历史——苏联改革秘录》，高洪山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第249~250页。

③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1033. л. 121.

随着多党制和其他多元化的实行，在原则上将加强民主的保障，形成执政党的竞争，加强它的自我批评，从而通过辩论与利益妥协的途径达成最优解决办法，等等。库德里亚夫采夫还分析说，当前对这个问题有反对意见，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历史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心理的和组织的因素。苏共还是具有权威性的，它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代表了最广泛的社会阶级和阶层，是国家所有政策最基本的意识形态载体，也是这个政党领导了改革。当然，继续改革还将面临很多困难。但时间将证明，一些非正式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如果更多地参加到协商和议政中，一定会使政策的选择更具有正确性和社会影响力。到那时，有关多党制的讨论将更加具体^①。可以看出，一些党员，包括党的理论工作者，尽管对多党制的实行抱有很大希望，但实际上并不十分清楚应该怎样落实，也不知道实行多党制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伊尔比特市的杜布斯基赫在1988年3月给《共产党员》杂志写信，认为当前社会存在普遍的消极现象，也是导致改革不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一党制的机制下，已经很难推动经济社会继续发展。因此，他向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建议，应该实行多党制，使苏共能够从多渠道得到建议，克服改革阻力^②。杂志编辑部顾问库德里亚夫采夫给了他一份长篇回复，根据苏联宪法第51款，“出于建设共产主义的目的，苏联公民有权利结成推动政治积极性与自主性发展的社会组织”。库德里亚夫采夫认为，尽管这个条文中没有直接提出建立第二个党，但是实际上也包含这个意思，因为“党也是社会组织”。众所周知，一党制是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就已奠定的基础。“一党制不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规律，在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中成功地实行共产党与其他党的紧密结盟。”这种情况的存在纠正了那些现象，就是党代表某个专门的阶级以及社会集团的利益，如统一的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教徒等。我们国家建立是基于这样的基础，工人、集体农庄农民与知识分子有着不同的利益，在根本上不是共同的。这也是当前的经济社会形势。结果是激进的经济改革与民主化，以及合作化与工业劳动活动的发展并

①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1033. л. 131.

②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1033. л. 81.

没有出现。苏联共产党从最初作为工人阶级的党到成为代表全民的党，首先是出于它的社会民主结构，它努力调整作为先进阶级的工人阶级的比例（1917年，工人占63.8%，农民占8.3%，职员占23.9%，其他人员占4.0%；1986年，工人占45.0%，农民占11.8%，职员占43.2%）。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中有先进的工人，集体农庄农民、知识分子、妇女和青年等。因此，要说多党制代表多种利益和社会基础，苏共当前正具有这样的基础。

库德里亚夫采夫还指出：“多党制拥护者的正确之处在于，任何一种竞争在原则上都可以使政治（经济）体制更健康，也使得其不断地‘合乎形式’。但是，为了在思想上形成这种现实的与苏共竞争，这个实验中的政党（甚至它也以共产主义作为目的和纲领）至少要与苏共一样富有经验，在群众中有威信，有自己的纲领，等等。如果这‘第二个党’出现了，您会视之为‘代表先进知识分子的利益’，没有纯粹基于自己的经济、社会立场的阶级利益？在当今的党国机构中从官僚主义中能产生‘第二个党’吗？……当然，所有这些想象，都属于‘在咖啡渣子上的占卜’。生活的实践将会解决这样的问题：从本质上看，如果新的党派有现实基础，它们将不可避免地参与到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过程中，参与到社会多元化发展中，以及非正式组织的活动中。很明显，观点的多元化，最终将达到自己的逻辑终点……也就是结成组织。目前能说的是，这个问题很复杂，对我们来说很新，还不能说很多，还需要进一步讨论。”^①不难看出，党的理论工作者要给实行多党制做出合理解释，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另一位59岁的党员泽姆采夫在1988年6月11日给《共产党员》杂志编辑部写信，说眼下人们都在谈论苏共第19次会议，但是在1988年6月8日那天，车间里要就这个话题进行讨论，会却没能开起来，因为“到场的党员不到50%”^②。他就此谈到了基层党员的消极性，对改革的怠惰，这一方面是由于对国家的某些政策不十分理解，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党的不信任。他还认为：“党应当有阶级性，我们的党就有。我们的

①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1033. л. 82 - 84.

②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1034. л. 114.

党应该能够联合各个社会阶层。”^① 对此，编辑部顾问切尔诺夫由于参加苏共第19次会议，在过了两个多月后回复，说：“您在信中谈到了某些党员以及基层党组织的消极性，以及党在补充与调整党的队伍时，在完成根本变革中的我们国家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缺点。这些问题在第19次会议上都有讨论，在决议中也有体现。代表们描述改革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他们得出结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根本转折还不能进行。阻碍机制，正如您在信中所说，是不民主，没有用加速机制替代。经济还在沿着粗放道路走。”^② “并非高估，第19次会议做出了真理性的有历史意义的决议，包括有关同官僚主义斗争、公开性、法制变革、国际关系的内容。所有这些文件都值得深入研读。”^③

还有党员对党的决议产生了困惑。一位名叫叶洛耶夫的人在1988年7月15日写信给《共产党员》杂志编辑部，对当前食品价格的提升感到担忧，另外，他还对党的总书记与苏维埃主席“一肩挑”感到不解^④。杂志编辑部顾问库德里亚夫采夫的回答显然是在“解惑”。他说：“您在来信中提出了几个十分重要的、很多人都在讨论的严肃问题。所以，必须回复您，并期望能与您有共识。第一，您认为，苏共第19次会议，看起来形势并不乐观，似乎‘国家的人民（生活）不会变得更好’，您这样说的首要根据是‘食品价格的提高是必然的’，同时您还认为，即便有经济补偿也不能掩盖差价的迅速提升。我要问的是，您从哪里得到这样的信息？要知道，价格改革的想法还只是在讨论中，它的实行不应当使劳动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当然，提价现在还只是在计划中。您所说的，提高差价，食品价格要提高‘2~3倍’，这是没有根据的。您后面所说的，不只是提高或者降低价格，还要改变价格制定的途径，同样也是没有根据的。我们不必做这样的猜测。现在我只能强调一点：没有来自人民的同意不可能这样做。而即便做了某些事，其目的也完全是补偿劳动者那些花在购买农产品上的钱。第二，关于党的机关。利加乔夫称党的工作者中间在制订计划时缺乏信任。大概，他是中央书记，高于地区党

①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1034. л. 115.

②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1034. л. 118.

③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1034. л. 121.

④ РГАСПИ. Ф. 599. О 1. Д. 1033. л. 104 - 105.

的书记。眼下的改革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党的最高领导的计划是来自工厂领导和大学者的计划，他们是无人干扰的，他们的工作有着重大责任。由此，应该客观地评价那些肩负着复杂的领导社会重任的人们的劳动，而不要关注那些编造的关于高层领导享有‘优惠’与‘特权’的说法。第三，关于党的第一书记与苏维埃主席职务‘一肩挑’，我相信问题没那么简单。这是合乎规则并得到党的会议通过的，同时还要继续讨论的。党允许表达赞同和反对意见。我知道，您是反对的，而我们想投赞成票。这是因为，首先，正如党的会议决议所说，推举党的书记到主席位置上，是符合规则的（现在，不是永远）；其次，如果他被选为苏维埃主席，将成为执政者，也就意味着党与苏维埃合议制的开始，这正是我们努力争取的；最后，把党置于议员和选民的监督之下，这就意味着宪法和法律涉及关于选举和苏维埃政权建设；通过这个渠道也就传递给苏维埃，它的作用现在已经不再是归于党委会领导了。”^①

从上述来信与答复中不难看出，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有关实行多党制、苏维埃选举等议题，在广大党员中引发了很大反响。他们有的赞同，认为早在赫鲁晓夫时期就开始探讨的这个问题，如今就要实行，是值得肯定的。而有的党员看到其他党员的消极怠惰，感到困惑，虽然不满，但实际上他们自己也清楚，改革进行了三年多，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有的党员对提高物价产生怀疑，因为这与党所宣传的改革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说法是明显不一致的。还有人对戈尔巴乔夫作为党的总书记参加苏维埃选举，然后将党的第一书记与苏维埃主席“一肩挑”的做法产生怀疑，不清楚是谁在领导谁。尽管杂志的回复都是合乎党的政策的理论说教，但如今看起来，这些问题和疑惑正反映出改革进程中党员群众对改革的措施、党的理论方针和指导思想的怀疑，而多数疑惑在不久后就已经得到证实，如物价的提高，无论“人民”答应不答应都出现了，并且在后来的几年间几乎是无法遏制地上升。而把党的第一书记与苏维埃主席“一肩挑”的领导人后来还当上了苏联的第一任总统。这些情况既反映了广大党员的思想困惑，从中也可以透视出，尽管一些党员支持多党制、支持苏维埃选举，但是他们也同周围人一样，心里

^①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1033. л. 106 - 107.

有很多的不理解。可以想见，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所提出的有关多党制等政治改革设想，已经超出了普通党员所能够理解以及接受的程度。

除了上述问题，一些党员还对苏共的其他政策与决策提出了质疑，如阿富汗战争问题。到1988年，苏联出兵阿富汗已经是第十个年头，实际上已是深陷其中，而每年从阿富汗用“铁皮棺材”运回的苏联军人，已经让一些家庭在伤痛之余质问：为什么我们要向阿富汗派兵？这是什么爱国主义？阿富汗人真的威胁到我们国家的安全了吗？一位西方学者描述说：“戈尔巴乔夫刚一当上党的总书记，阿富汗战争就摆上了他的议事日程，其原因是洪水般的信件寄到了中央委员会、中央新闻机构和国际部。这些信件大多署了名，多数寄自俄罗斯和西伯利亚的边疆区，多数是士兵及其家人写的，所有信都要求立即结束这场战争。”^①伊万诺夫是一位苏共党员，技术科学副博士，某研究机构的副所长，他给《共产党员》杂志编辑部写来长篇文章，名为《阿富汗侵略的代价》。文章中说，最近广播和报纸中都在讨论阿富汗战争问题。但是，这些讨论没有涉及一个至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开始一场战争的代价。他指出：“我们最终将看到，阿富汗战争是苏联侵犯阿富汗主权的肮脏的战争。……在阿富汗发生的这场无法解释的战争——是苏联践踏国际法以及我们的宪法，破坏我们不干涉别国内政、不侵犯他国主权与领土完整这个原则的侵略战争。”“在阿富汗进行的实际上是一场内战，我们只是在支持其中的一个派别。”他还断定，宣传中所说的“应人民代表的要求，进行国际主义的兄弟援助”是骗人的。苏联所进行的的阿富汗战争既不是国际主义的，也不是英雄的，而是侵略战争。

伊万诺夫在信中还指出，自己曾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与一个参加阿富汗战争的士兵谈话。后者在战争中受了伤，但并不为此感到忧伤，反倒很骄傲，并炫耀自己打死了多少“敌人”。当他问那个士兵“你有没有想过，你杀死的是活的灵魂”时，那个士兵说“我没有想，我只是执行命令，尽到义务而已”。他对这种情况感到悲哀。他希望关于阿富汗战争的问题能够得到讨论，而不是搁置并继续骗人^②。对于伊万诺夫的质

^① [美] 威廉·奥多姆：《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王振西等译，新华出版社，2000，第114页。

^②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1034. л. 152 - 156.

问，编辑部只做了简短回答：“眼下还不能简单地说我们直接介入阿富汗战争是对还是错，还需要时间，需要不短的时间。但是需要明确的是，我们没有侵略，只是尽到国际义务。”^① 这个回答显然十分无力。不过，不久后苏联从阿富汗撤兵，证明了这个质疑不少单个现象，并且完全有其道理。就此意义来说，在苏共第19次会议前后形成的言论自由风气，对于人们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也可看出，苏共第19次会议在极力推动“民主化”和“公开性”，从而使各种社会思潮急剧出现。在党员来信中，对第19次会议的决议以及一些政策的变动有十分尖锐的提问，也有各种不解与思考。

与此同时，一些共产党之外的其他社会组织在竞选前后纷纷涌现。据统计，从1990年10月开始，就有一些党派出现。到1991年初，在苏联出现的政党和非正式团体有约6万个，其中有一些小的团体甚至由几十个人构成，其主张包括保护环境、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还有与所在加盟共和国、州、区人们生活相关的组织。有些社会组织和政党的规模比较大——从两三千人到两三万人^②。其名称有苏联自由民主党、萨哈罗夫民主力量联盟、和平党——这是民主党的分支之一、人民宪法党、俄罗斯人民阵线、俄罗斯民主党、俄罗斯和苏联人民民主党等^③。在行政区域上涵盖苏联14个加盟共和国，其政治主张包括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甚至君主立宪等。其中有些政党直接表明是反共产主义的。各种社会力量纷纷登台亮相，阐述各自的主张。这种各说各话的状况虽然看起来有利于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化，实际上却带来社会政治思想的混乱^④。这些团体和组织要求取得与苏共平等的地位，实行多党制，改变共产党一党执政状况。各种社会组织出现原本是“民主化”“公开性”及其推行过程中的“副产品”，却给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带来巨大冲击。

①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1034. л. 157.

② Обществе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 СССР, Человек и политика, июнь 1991.

③ Обществе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 СССР, Человек и политика, июнь 1991.

④ 苏联解体前后出现的各种政治组织和政党情况可参见王廷玉等编译《苏联“改革”中的各政党和政治组织》，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各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主要主张也可参见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663～664页。

第三节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与 多党制：基层党组织职能转变

在各种社会组织纷纷出现，要求实行多党制的情况下，苏共领导人一步步退让，从不反对实行多党制到允许实行多党制，再到公开肯定多党制，苏联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地位一再降低，最终成为多党制下的一个“议会党”。在这个过程中，党员流失加剧，基层党组织涣散，党的凝聚力丧失。基层党组织作为执政党的群众基层组织，已经失去了对党的监督作用，同时党员也开始变成多党制的支持者。

一 苏共 28 大：苏共由执政党变为“议会党”

1989 年以后，在苏联要求实行多党制的呼声越来越高，戈尔巴乔夫对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态度开始发生动摇。1990 年 2 月，扩大的苏共中央全会召开，讨论如何改造和革新党的问题。代表们就苏联国内形势、苏联向何处去、苏共和苏联改革向何处去等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①，最后，全会通过了提交给苏共 28 大的《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行动纲领》草案。在这次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做了报告，提出，苏共是一个自治的社会政治组织，是志同道合的共产党人的自愿联盟，是一个选择了社会主义的政党，其理想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党的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党的权力和地位应严格限制在民主程序范围内。他还要求修改 1977 年宪法中关于保障苏共执政地位的第 6 条条款^②，即改变苏共作为国家和政治制度及社会组织的核心地位。同时，戈尔巴乔夫还提出准备实行多党制，建议实行总统制。1990 年 3 月 12 ~ 15 日召开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

① 基于苏共内部对改革目标的不同看法，以及对苏共和基层党组织在改革中所发挥作用的观点，在苏共中央内部形成了三个主要派别：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派”（或称民主派），以利加乔夫、雷日科夫为首的“保守派”（或称强硬派），以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为代表的“调和派”（或称主流派）。三派之间的争论甚至斗争几乎伴随改革全过程。

② 这一条款原文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及其政治制度、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是苏联共产党”，即苏联宪法肯定苏共是国家和政治制度及社会组织的核心。

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对苏联宪法第6条做出了修改，将苏共领导作用界定在“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通过自己选人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与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①。还规定“苏联公民有权结成政党”，一切政党“应在宪法和苏联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②。这实际上肯定了多党制。

1990年7月，苏共28大在莫斯科召开。这次大会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苏联共产党章程》等一系列决议。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苏共第28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和党的任务》中明确肯定：“支持修改苏联宪法第6条和第7条，决定不再取代国家机关，不再行使行政管理职能。”党现在是在改革中起“先锋作用”的党，并且“不能把先锋作用强加给社会，要……通过实际行动……争取到先锋作用”。苏共还要“在民主过程范围内和在中央和地方立法机关选举范围内争取保持执政党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看，苏共起着议会党的作用”^③。从戈尔巴乔夫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到苏共28大时，苏联共产党成了仅仅在改革中起“先锋作用”的党，并且在法律允许的选举范围内，党起着“议会党”的作用，即党现在已经成了“先锋党”和“议会党”。

在《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决议中，对基层党组织的权力和组建原则做出了新规定：“基层党组织可自主地结合具体条件确定任务和活动方式，基层组织和机关的结构及数目、举行集会、采取政治行动的期限和程序。”“上级组织不能撤销基层组织在苏共章程赋予的权限范围内做出的决定。”“按地区和生产单位原则建立党组织的做法必须修改。在保留生产单位和其他集体内党组织的同时，考虑到按居民区开展竞选活动的意义越来越大……苏共党员有权选择基层组织过组织生活，可以选择生产单位的党组织和居住区的党组织或两者兼之。保证建立横

① 有关苏共中央1990年2月全会的情况以及对苏联宪法第6条的修改情况，参见王廷玉等编译《苏联“改革”中的各政党和政治组织》，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第211～212页。

② 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668页。

③ Правда, 3 июля 1990.

向组织和横向组织活动的自由。这类横向组织包括党的俱乐部、党组织书记委员会以及按专项利益、职业利益和其他利益成立的其他联合组织。”^① 这些规定意味着基层党员和基层党组织的活动有了很大的自主性和自由度，将基层党组织的权力扩大了很多。

1990年是苏联共产党性质发生实质性变化的一年，从2月全会苏共放弃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与核心地位，到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宣布实行多党制，再到7月苏共28大明确肯定共产党是苏联改革的“先锋党”和多党制下选举中的“议会党”，共产党的职能一再变化，政治地位一再降低。与此同时，在苏共各种决议和党章规定中，基层党组织的权力在扩大。从表面来看，这是党内民主增强的表现，实际上却是对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改变，党的上级机关对基层党组织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小，而基层党组织在权力扩大的同时，管理和组织工作却呈现出混乱状态。

二 基层党组织：从改革和建设的先锋队到多党制下的选举力量

在政治体制改革时期，苏共对基层党组织职能的提法有了一些变化。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做的《关于苏共27大决议的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苏联共产党在改革中起到的是先锋队的的作用。这种作用的发挥没有党的生活内部深入的民主化是不可能发挥的，基层党组织生活的民主化具有重要意义，应当首先提高基层党组织的自主性，减少来自上层的琐碎的规定，提高党的选举机关和基层党组织书记的权威，创造条件，激励他们积极工作，克服一些党员身上的惰性^②。可见，党的各级组织在苏联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主要职能是贯彻民主化，发挥改革先锋队的的作用。并且，提高基层党组织自主性是贯彻党内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基层党组织权力增强才能使其在改革中积极主动地工作。

1989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会议上指出，基层党组织是“可依靠的杠杆”，“抓住这一杠杆才能强有力地推动全部党的生活和使全党活跃

^① Правда, 15 июля 1990.

^② Справочник партийного работника.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9. с. 20.

起来”。他提出，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其措施包括：重视选拔基层党组织领导人；市区党委要把权力下放给基层组织，纠正过去给基层党组织会议规定日程的做法；《企业法》贯彻后基层党组织不要干预企业的行政业务，但要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反对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保证全民利益^①。

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在理论宣传中，苏共对基层党组织建设给予了更多关注，主要观点是强调基层党组织在改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党的生活》1988年第3期刊文《基层党组织是改革的主要环节》提出，改革进行到今天，实践证明，没有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汇集党和国家先进力量的那些能够做出科学决策的人们，没有一个政治上的先锋队，改革是不可能进行的。基层党组织很好地发挥作用，党的事业就前进，否则就将退步。该文章引用戈尔巴乔夫的话说：“现在的主要环节是基层党组织，我们应集中全部精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党员的积极性，这样我们才可能在改革事业上迈出一大步。”文章号召基层党员行动起来，加强组织性、责任心和工作的实效性。文章还认为，改革初期的实践证明，哪里的基层党组织善于发挥人们在劳动中的积极性，提高政治热情，能够始终把握社会思潮，追随时代步伐，哪里的改革就会取得成功。基层党组织肩负着倡导公开性、发扬民主、监督检查各级代表和社会组织等任务，要求基层党员成为实现社会变革的先锋^②。与此相类似，在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背景下，这一年的许多文章都在讨论基层党组织的工作任务、工作方法。例如，《在改革中的区党委、市党委》一文认为，区党委和市党委处于改革斗争的前沿，他们更多地接触基层党组织和劳动集体，了解它们的主要事务和主要需求，因此，能够并可以有效地推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营造健康的社会道德和政治氛围。另一篇文章则提出改革的成就最终取决于基层党组织的主动性和战斗力，基层党组织应努力承担起所在集体的全部责任^③。

这里应注意到，“改革”一词已不再是单独出现，而是与“斗争”相连，也即改革已经不是一帆风顺的，变成了一场“斗争”。在改革遇

① 《吴仁彰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第247-248页。

② 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 №. 3, 1988. сс. 7 - 11.

③ 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 №. 7, 1988. сс. 10 - 14. сс. 40 - 44.

到挫折时，党号召基层党组织发挥先锋作用，“做改革斗争的先锋队”。1989年史学副博士弗·阿列克谢耶夫的文章《党的领导：是谁，怎样做》，记述了格鲁吉亚库塔依斯市委第一书记 T. B. 洛尔德基班尼捷怎样注意在具体工作中体现党的方针路线，克服制度上的惰性，改变思想方式，积极引导党员的思想朝向改革和社会进步方向。党的市委机关应克服官僚主义方法，更多地同群众接触。机关工作人员应关心群众生活，不放过小事，多倾听群众的要求和意见^①。这是在强调发挥党内的民主，党的各级领导应与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保持密切联系。

在1990年苏共28大报告中，关于基层党组织的职能，戈尔巴乔夫提出：“基层党组织不再认为可以监督，而且实际上已经无权监督企业和团体的行政机关的活动，以及各部和主管部门、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关的工作。但是，党组织不能成为劳动集体或地方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旁观者，它们应当学会通过共产党员，首先是党员领导人，采用新的政治方法和组织方法对解决各种各样任务发挥作用。党组织的新作用是，在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全体会议上集体确定对社会生活重大问题采取的立场，把它通报给相应的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在公开讨论中阐明这些立场，指导共产党员在实际工作中坚持这些立场。苏共影响的范围将首先取决于党所宣布的思想的力量以及这些思想对劳动人民的吸引力。”^②这就是说，基层党组织已经不再具有对企业和团体行政工作的监督权，而只是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起思想宣传作用的力量。

应该说，在1990年前，基层党组织的主要职能还是在改革中发挥作用，在1990年苏共中央扩大的二月全会后，尤其是在苏共28大以后，随着苏共由执政党转向“议会党”，基层党组织的职能有了原则上的变化。例如，哲学博士 H. 菲里弗罗夫的文章《基层党组织能做什么》，号召基层党组织在各加盟共和国参与选举，实现党的民主，推动公开性。而普罗科比耶夫市委书记 B. 卡萨金则探讨怎样克服官僚作风，以加强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苏共中央书记 Ю. 马那因可夫号召共产党基层组织在多党制下，发扬民主，起到先锋队作用，多倾听其他党派意见，做改革

^① 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 №. 2. 1989. сс. 46 - 47.

^② Правда, 3 июля 1990.

的推动力并发挥创新精神。戈尔巴乔夫更号召苏共“成为人民的党，改革的党”^①。基层党组织的职能已经逐步向“议会党”选举中的群众力量转变。

三 党员的流失与基层党组织的困境^②

进入政治体制改革后的苏联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党员人数上的大起大落。在1989年以前30多年间，苏共党员人数基本上呈现上升趋势，1989年达到最高点1950万人。进入1990年，党员人数开始下降。1990年6月苏共28大后，党员数量急剧下降，党的力量严重流失，其中有被开除出党的，也有党员自动退党。1991年夏秋，退党声浪达到高潮，在苏联的各行业和各加盟共和国，党员纷纷离开党组织，其原因有经济上的，有思想上的，也有组织上的。基层党组织的职能不能正常发挥：接收党员数量很少，党费收缴困难，思想政治工作无话可说，基层党组织干部受到排挤，与上级党的机关联系困难，这一系列情况导致很多基层党组织处境艰难，实际上陷于瘫痪。

（一）党员的流失

苏联改革之初，人们对党、对党的领导人寄予厚望，用实际行动参加并支持改革。不过，在“民主化”“公开性”的号召下，基层党员的思想出现了较大变化，对党的政策开始怀疑，思想上的不信任也在增加。这种情况的直接反映就是退党或者因各种原因被开除出党的人数增加。

自1987年以后，苏共被开除出党的人数开始增多。1987年头9个月，苏共被开除的党员为81042人，退党的正式党员有17974人，退党的预备党员有16634人。也就是说，在1987年前9个月党员共流失115650人。在1988年前9个月中，苏共被开除的党员为73358人，退党的正式党员有26016人，退党的预备党员有21217人。也就是说，这一年前9个月党员共流失120591人^③。1990年被开除出党的党员大为增加，有585088人，这一年退党的人数达1809424人。而到1991年，仅

① 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 №. 15. 1990; №. 18. 1990; №. 20. 1990; №. 24. 1990.

② 本标题内部分内容参见谭继军《苏联解体前夕苏共基层党组织资源的丧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1999。其中所引用原文均经核对。

③ Справочник партийного работника. 1989.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с. 590.

第一季度苏共党员退党的就超过 587000 人^①。由于被开除出党和退党党员数量增加，导致苏共党员人数急剧下降，1989 年初苏共党员达到建党以来的最高点 19487822 人，到 1991 年 1 月降到 16516100 人，2 年间减少了 297 万人^②。

1990 年苏共 28 大以后，退党声浪开始高涨。在苏共 28 大上，叶利钦与莫斯科市市长波波夫、列宁格勒市市长索布恰克先后宣布退出共产党，他们的行为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一些企业或机关，基层党组织领导交出党证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1989 年，在秋明地区的下聂瓦尔多夫斯克，企业主要领导退党的只有 2 人，到 1990 年就增加到 37 人^③。党的干部退党在广大党员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企业中“带动”起大规模的退党风潮。例如，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铝业工厂，在 1990 年初以后一年半的时间内，党员从 1700 人缩减到 500 人，仅在苏共 28 大以后的半年中退党的就有 900 人，剩下的党员还有很多不愿参加党的会议，在组织生活中根本不露面，与党组织实际上中断了联系。有些原来的党委成员和老党员退出党组织后，加入其他组织，甚至加入与外国有联系的组织^④。1991 年乌拉尔汽车制造厂党委书记卡登尔金曾总结道：“我们厂 1989 年有党员 9072 人，到 1991 年初就只剩下 1646 人，其中还有 300 人不交党费。”^⑤ 另外，基层党的领导退党也导致基层党组织数量减少。据俄罗斯联邦科马共和国党委第二书记科尔什科夫估算，从 1990 年夏到 1991 年夏，在 1 年时间里这个共和国有 260 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和副书记退党，共和国减少了 28 个基层党组织、870 个车间党组织和 1014 个党小组。党组织数量削减了 27.5%^⑥。而根据俄罗斯学者后来的估算，从 1990 年 1 月到 1991 年 6 月，在一年半时间里党员就从约 1900 万人急降

① *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 №. 11. 1991. с. 31. с. 33.

② *Справочник партийного работника* 1989.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с. 589;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июнь 1991. с. 33.

③ *Н. С. Столяров. Настроения коммунистов.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май 1991. с. 47.

④ *А. Логвинов. Спираль взлетов и падений. 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 №. 14. 1991.

⑤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июнь 1991. с. 33.

⑥ *А. Коршиков. Аритмия. 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 №. 14. 1991.

至约 1500 万人^①。如果说，在苏共 28 大之前，退党还不是普遍现象，那么，28 大后，从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到基层普通党员，退党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洪流，从内部冲击着苏共党的组织。

（二）党员流失的主要原因

在流失的党员中，主要有两种情况：被党开除或自动退党。党员被开除的主要原因是，到 1986 年以后，苏共对党员的管理有所加强，以对改革的态度作为评价党员的一个重要标准。苏共 27 大后，一些党的工作者认为，在新的形势下，有不少党员不符合要求，他们“很少与组织联系，不主动参加党的生活”，成了党的“包袱”。关于处理这些“包袱”的办法，有人提出进行清党或者自我评议两种方式，当时主要采纳了第二种方式，进行党员“社会鉴定”，开展对党员的公开评议，在评议中不合格党员经教育后仍不改正的则予以开除。在 1986 年苏共 27 大以后的两年中，有 37.2 万名党员被开除，比两年前开除的人数多 4.13 万人^②。对党员的评议到 1990 年上半年还在进行，并且由于各种因素影响，1989 ~ 1990 年被开除出党的人数有很大增加。例如，在塔什干州，1989 ~ 1990 年春有 12 万人交出党证，其中就有 7 万人是被开除出党的^③。

党员退党的原因比较复杂。根据一位党务工作者在 1990 年春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原因：有些党员因在工作中表现懒散消极，不愿意缴纳党费，不想履行党员的义务。例如，一位在森工企业工作的打枝机操作员 B. 叶鲁科夫，不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很少参加党的会议，不止一次地拖延缴纳党费。由于这些行为违反了党的有关规定，1988 年底他在车间党组织会议上自己提出了将他开除出党的要求。有的党员是由于不愿接受行政部门或党组织委派的工作、辞去党政职务、降职、对生活待遇不满意等原因退党。有一些曾参加过卫国战争、已经退休的老党员，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把自己的全部生活都与党联系在一起，党性很强，但由于年龄大了，身体状况不好，完全不能履行党员的义务，根据党章规定

① [俄] 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 61 页。

② 《吴仁彰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第 245 ~ 246 页。

③ В. Илюшин. Из партии выбыл или исключен? 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 №. 4. 1990.

(第8条), 自行退党。还有一些老战士在外地领取退休金, 与党组织中断联系。据此, 这位党务工作者认为, 应该根据居住地和工作区两种情况选择过组织生活, 以此积极而有效地解决党员与组织联系的问题。

另外, 还有一部分人退党是由于对党的机关活动、党内生活中的缺点, 甚至对党的改革缓慢不满。例如, 在卡列尔州党组织中, 很大一部分党员退党的原因是不满意改革的低速, 党的威信降低, 不相信党的政策, 对党没有积极解决居民粮食以及日常用品供应等问题不满。令人担忧的是, 有些基层或车间党组织书记或担任其他职务的党的工作者厌倦了基层组织, 对党的活动和党的会议中的形式主义反感, 对自己的工作没有信心。还有党员因对工作不满意而引出退党问题。例如, 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滨海边疆区阿尔谢尼耶夫斯克市, 一位建筑队长 B. 奥贝杰尼科对所在单位和所从事的简单体力劳动不满意, 向上级领导和党委会反映情况, 在得不到肯定答复的情况下交出了党证。他所在的基层党组织也没有弄清楚他这样做的原因, 阿尔谢尼耶夫斯克市委员会就以奥贝杰尼科违反党纪做出了开除他的党籍的决定, 后来, 经过滨海边疆区党委会的干预, 阿尔谢尼耶夫斯克市党委才被迫撤销上述决定^①。

这些情况主要出现在 1990 年春季以前。苏共 28 大之后, 退党现象又由一些新的因素引发。叶利钦等苏共内部反对派中著名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退党, 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 实行多党制后有的党员加入其他党派, 尤其是原来一些担任党的各级领导职务或基层的干部, 有丰富的组织或宣传工作经验, 有专业知识和技能, 加入其他党派后担任一定职务, 对原来所在党组织的党员和群众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各加盟共和国退党情况与民族独立情绪也有很大关系。从 1990 年夏到当年底, 苏联 15 个加盟共和国全部通过主权宣言, 有的党员因对苏共不满或支持民族独立而退出苏联共产党。例如, 1991 年夏, 在立陶宛, 就有人宣布苏联共产党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 而立陶宛共产党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党, 他加入的是立陶宛共产党, 但不承认自己是苏共党员^②。此外, 还有一些党员因对自己所处的经济状况不满或改信宗教而

^① 参见 В. Илюшин. Из партии выбыл или исключен? 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 №. 4. 1990.

^② Тересе. Лейнартене. Люблю мою литва. 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 №. 16. 1991.

退出共产党。

苏共党员流失的原因是多方面并且十分复杂的。总体看来，对苏联改革的失望，对改革几年后物质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降低，对苏共所实行的各种经济和政治政策不满，是主要原因。多党制的实行、民族分离情绪的扩散，也加剧了党员流失。

（三）基层党组织的困境

党员的流失使基层党组织工作面临困难。尽管苏共一再强调给基层党组织以更多的自主性和主动权，但到1990年以后，很多地方的基层党组织实际上已经失去原有的职能与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由于要求入党的人越来越少，基层党组织在发展党员工作中失去了吸引力，基层党务工作者在入党方面几乎无事可做。根据一位党务工作者计算，在切良宾斯克地区，1986年入党的有6000人，到1989年就降到750人，1990年仅为81人，1991年第一季度则只有4人^①。萨拉托夫法学院党组织1990年接收35人入党，1991年前5个月仅接收14人入党^②。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退党的人数在逐年增加。在苏共党章中，只规定基层党组织在接收新党员时应做的工作（介绍人、考验期、入党宣誓大会等），没有对基层党组织在党员退党过程中应有的程序做出规定^③。因此，对于退党风潮，基层党组织实际上是没有什工作可做的。第二，有些没有退出共产党的党员长期不缴纳党费，不参加组织生活，与基层党组织失去联系，基层党组织在召集党员大会或组织党员学习时，经常遇到党员缺席的情况。在与一些党员缺乏联系的同时，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有时也会出现与上级党组织脱节的现象。例如，1990年，萨朗斯克市仪表制造厂党委书记尼·麦德维杰夫因发表文章《克服机关事务的无序》对萨朗斯克市和区党委机关活动提出批评，被市党委以“在思想和组织上分裂苏联共产党的实际行动”为由而开除出党，并被解除厂党委书记职务。但这时，在基层人民代表的民主选举中，他却当选为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无产阶级区”民族区域的人民代表，这

① “Трудные дни пауткома” (Круглый стол в Челябинске)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июнь 1991. с. 55.

② В. Родионов. Наразвилке. 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 №. 14. 1991.

③ В. Илюшин. Из партии выбыл или исключен? 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 №. 4. 1990.

就引出一个难题：尼·麦德维杰夫已经被开除党籍，他的人民代表资格不能取消，但人民代表又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不能由非党员担任。于是，他的身份出现了“矛盾”。最终，市党委做出决定：保留对麦德维杰夫开除党籍的决定，但他仍担任厂党委书记。于是，在这个工厂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不是共产党员的人担任厂党委书记^①。在这件事的发展过程中，胜利者实际上是作为苏维埃人民代表的尼·麦德维杰夫，而市党委则对苏维埃做出了让步。这件事反映出党组织工作中的脱节现象，同时从中也可看出，在人民代表的民主权利面前，“党”已经失去了执政党的权威与严肃性。第三，基层党组织在工厂企业生产中难以发挥作用。根据不完全统计，到1990年，全国有1/5的车间党组织、1/2的党小组被解散或停止活动。一些车间党组织和党小组因党员被开除或退党而所剩人数很少，不能构成一个组织。即使有组织的集体，也因党务工作人员“老化”，缺乏创造力和创新精神而没有吸引力。例如，在斯霍德涅斯克市“俄罗斯”家具生产联合企业，新当选的党委书记希·尼库拉耶维奇，对党的工作漠不关心，甚至连续9个月不召开车间党组织会议^②。基层党组织工作人员对党务工作的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降低了党组织的威信。第四，企业不需要党组织。从1990年起，基层党组织被逐出工厂企业的现象时有发生。根据1991年夏召开的地区基层党组织书记会议的情况看，到1991年春，在科梅洛夫州，被禁止活动的工厂党委会就达32个。在维尔纽斯“阿尔法”生产联合企业公司，党委书记B. И. 马克西莫维奇没有权利了解企业的生产情况，甚至还被没收了工厂的出入证。这个企业裁员时首先裁减的就是共产党员。更早一些，还在1990年8月，科梅洛夫州尤尔金机器制造联合企业公司就做出决定，将党委会逐出企业，理由是党委会在劳动集体中已经起不到积极作用了^③。

到1991年夏，苏共面临着严重的意识形态的、组织的、政治的危

① А. Горенков. Беспартийный секретарь парткома. 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 №. 11. 1990.

② А. Овчинников. Ах, анкета, анкета…… (Как теряется авторитет). 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 №. 18. 1990.

③ К итогам зональных совещаний секретарей первичных партий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 №. 13. 1991.

机，基层党组织工作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党的地区领导干部见到基层党组织的书记和工作人员时，对方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干什么？怎样做？一位党务工作者认为，苏联共产党在70年历史中还没有经历过政治责任如此沉重的时刻。换言之，到1991年夏，党已经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基层党组织所面对的也是前所未有的新情况^①。一位国营农场的党委书记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当前党组织不参与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只做思想工作，那么，在企业中还要基层党组织干什么？^② 尽管苏共一再强调给基层党组织以自主权，实现基层党组织工作民主化，但实际上基层党组织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权力与威信。

不过，并不是所有党员和基层党组织都对党失去信心，在共产党处境艰难的日子里，仍有党员和基层党组织工作者坚持自己的信念。在大规模退党风潮中，仍有一些群众支持共产党。1991年8月，当苏联政治动荡的时候，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一位名叫伊利亚·瓦西里耶夫的人说，自己在党遇到困难时坚决要求入党，因为“党在困难时刻，需要新鲜血液”。他相信：“只有苏联共产党才能把国家从危机中拯救出来并使人们过上好生活。”^③ 有的处于困境中的基层党组织工作者，仍在继续坚持工作。在波梁斯克州一个基层党组织中，有许多领取退休金的老党员，他们因年老多病而不能经常参加党组织的活动，但这个基层党组织克服各种困难，坚持每月召开一次例会，在会上听取基层党组织书记介绍当前形势，交流居住区的生活情况，检查上次例会要做的工作是否落实，还要为居住区的党员群众解决一些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④。有些基层党组织在没有工作场所、缺乏经费的情况下，还组织各种学习和讨论活动，出版报刊，与工会、共青团、妇联组织协作，共同发挥作用。这些情况说明，在苏联共产党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时，还是有一些老党员或者普通群众相信共产党，坚持社会主义信念，自觉地参加党组织活动。苏共的基层党组织并不是全部处于瘫痪状态。

① А. Коршиков. Аритмия. 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 №. 14. 1991.

② А. Коршиков. Аритмия. 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 №. 14. 1991.

③ “Будут сподвижники”, 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 №. 16. 1991.

④ Н. Сагайдак. А мы работаем. 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 №. 14. 1991.

四 戈尔巴乔夫军事改革与苏联军队的瓦解

军队改革虽然不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主题，但是在改革过程中却受到了很大关注。这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时，遇到的经济困难与政治阻力，在一定程度上与军队相关。在戈尔巴乔夫改革过程中，暴露了苏联军队的各种问题。最终，在联盟解体后，苏联军队也瓦解了。

（一）戈尔巴乔夫的军事改革

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初，苏联拥有全世界首屈一指的武装力量，与美国在陆地与太空中进行着各种较量。苏联的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军事实力体现出来。但是，随着经济改革遇到困难，尤其是在财政支出上出现困难，削减军队开支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最初的削减军费问题是从有关裁军问题开始讨论的。卫国战争时期，苏联军队人数迅速扩展，由战前的420万人增加到1100万人。战后，大量军人复员，军队人数降至280万人，1955年增至550万人，20世纪60年代初降至360万人，之后再增加，到1985年苏联军队正式军人有530万，加上预备役及其他人员，苏联武装力量有近600万人^①。这个庞大的军队的开支，始终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军队里，每700人中就有1名将军。那些军官享受着优厚的待遇，也成为国家财政负担的一部分。不过，比较而言，苏联军事工业综合体（БИИК）是国民经济中最为庞大的一个经济体。这个在卫国战争前后形成的军事工业体系，在冷战期间一直是苏联军队与西方军事对抗的物质保障。但是，在改革过程中，在高级领导人中经常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怎样减轻国家财政的“沉重包袱”——军事工业综合体。“20世纪8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矛盾升级及其对苏联的军事威胁，同苏联军队相关的生产量占重工业产量的35%~40%。最出色的科学家、工程师和设计师都受雇于该工业，并且生产了技术上最先进和可靠的产品。”^②这个曾经把苏联推上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地位的军工体系，给国民经济带来的负担日益引起

^① [美] 威廉·奥多姆：《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王振西等译，新华出版社，2000，第42~43页。

^② 艾尔伯特·萨吉斯：《关于苏联军事解体的一些经济、政治和军事因素》，《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5期。

人们的关注。利加乔夫虽被视为保守派的代表，但他也承认：“1985年4月以后，我们面临削减军费的任务。不这样做，就不可能推行大规模的社会计划：军事预算竟然占整个国民经济的18%，背负这样一个包袱，经济不可能正常运转。”^①1987年以后，军队裁员以及军事工业的“军转民”问题开始被提上日程。1988年，戈尔巴乔夫在一次会谈中说道：“是的，我们实现了与美国的军事战略平衡，可是没有人知道我们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必须计算一下。现在很清楚，不大量削减军费，我们就无法解决改革所面临的问题。……我们……需要裁军。而现在裁军是可能的。”1988年12月7日，戈尔巴乔夫向全世界宣告，苏联将实施单方面裁军：“在未来的两年里……（军队）人员将减少50万人，常规武器的数量将大大减少。裁军将单方面进行，不涉及在维也纳进行的谈判。”^②这个计划后来逐步得到落实。

戈尔巴乔夫提出单方面裁军，其主要指导思想还是基于战争观的转变。最初，戈尔巴乔夫继承了以往苏联领导人的战争观，坚持军队与国防建设的重要性，要与美国保持平起平坐，甚至在某些尖端武器的研制与使用上超过美国，以确保苏联在未来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占据优势。在这一战争观的指导下，苏联领导人始终保证军队建设的投入。后来，戈尔巴乔夫抛出“新思维”，提出了新的战争观：要保证全人类利益，人类的和平成为最重要的事业。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军事主张从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御，对军备采取“合理够用”观点，以及“防御性防御”这一“新军事学说”。1988年底，戈尔巴乔夫在宣布苏联将裁军50万人的同时，还主张“在苏联边境而不是华约成员国的边境开展边境防御，从而让华约成员国自行抵抗帝国主义”^③。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宣布：“在与我们的华约盟国取得一致意见后，我们决定到1991年底前，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撤出6个坦克师，并将其解散。”“驻扎在这些国家里的苏联军队将削减5万人和5000辆坦克。”

① [美] 威廉·奥多姆：《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王振西等译，新华出版社，2000，第100~101页。

② [美] 威廉·奥多姆：《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王振西等译，新华出版社，2000，第155、165页。

③ 艾尔波特·萨吉斯：《关于苏联军事解体的一些经济、政治和军事因素》，《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5期。

“同时，我们还将减少驻扎在苏联欧洲部分的军队人员和武器数量。”“在相同的两年里，我们还将大大减少我们国家驻亚洲部分的驻军。”^①1989年，苏联还做出从阿富汗撤军的决策，结束了阿富汗战争。这些几乎是完全改变传统战略思想的主张和行动为戈尔巴乔夫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1990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不过，东欧国家相继发生了剧变，社会主义制度在东欧遭到了全面失败，这一情况与苏联军队的全面撤出有直接关系。而阿富汗撤军后，在亚洲出现了一个新的战略“真空地带”，也为美国插手提供了机会。

（二）“公开性”与多党制下军队基层党组织的涣散

军人的失败感要比东欧的失败来得更早一些。在改革之初，军队是国民经济的“包袱”之说，就已经使军队在国家经济遇到困难时成为被指责的对象。而裁军、削减核武器，以及放弃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也使得军队的作用与地位严重降低。苏联从东欧撤军后，撤回的几万军人没有住房，经济收入没有保障，他们的个人权益受到严重侵害。而从东欧国家以及阿富汗撤军后，军人在社会中不受尊重，甚至被指责，更增强了他们的失败感。军人从国家的骄傲变成了社会的弃儿。这在当时的一些信件与文章中有一定反映^②。

1988年苏共第19次会议后，开始了有关“公开性”的辩论。这场辩论的社会影响前面已经有介绍，这里着重分析其对军队的影响。在“公开性”以及全国性的非政府组织运动倡议下，军队中也出现了一些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在为军人表达诉求、争取权益的同时，也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当时主要的军事组织有：^①“盾牌”。它的全名为“为军人和军属争取社会保护的联合会”，成立于1989年秋，据称最初成立时有约300名军官会员。其目标是提高社会对士兵、年轻军官及其家属的支持力度。随着苏军不断地从东欧撤回，很多军官和他们的

^① [美] 威廉·奥多姆：《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王振西等译，新华出版社，2000，第165～166页。

^② О денежном довольстви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и советских офицеров, Коммунист вооружённых сил, №.1.1991; Как живёшь, офицерская семья? Коммунист вооружённых сил, №.4.1991; О чём они думали, или О настроениях военных накануне августа 1991 года. Армия, №.21.1991.

家属遇到了住房不足甚至根本没有住房的困难。由于军队领导机关不关心他们的生活，所以“盾牌”组织者声明，军官和部队要设法自己照顾自己。这个组织的活动得到了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安德烈·萨哈罗夫的支持，并且在非政府组织运动中表现活跃。②“士兵母亲运动”。最初这是一些要求停止阿富汗战争的士兵母亲发起的活动，由玛丽亚·基尔巴索娃在1989年4月创立了“士兵母亲委员会”作为组织机构。这个委员会主要是反对对外派兵，关注士兵自身权益，保证士兵人身安全。这个组织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吸引了一些政客参加。③“军官会议”。这是帝俄时期的“军官会议”组织的“复活”。它在1989年11月成立，是一个有官方背景的组织，目的是抵销前两个组织的影响。这个组织呼吁提高军人工资，提高社会对军队的支持。④老战士团体，包括几个老战士组织，有“全苏军队和劳动老战士组织”“全苏老战士协会”“民主阿富汗战争老战士联盟”等，参加者有维护苏联传统体制的老战士，也有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老战士。他们从不同角度表达诉求，主要目的也是维护老战士的权益，要求社会支持军队。⑤“联盟”，用西方人的话来说就是：“这个组织的成员是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中的一些反动派代表。”他们的领导者维克托·阿尔克斯尼斯在1990年秋天的一次公开会议上告诉戈尔巴乔夫，军队与戈尔巴乔夫已经不再站在同一条战线上^①。应该说，有些与士兵维权相关的工作，原本是军队党的基层组织做的工作，现在都由一些军队非政府组织来做了。

这些组织在参加有关军队改革问题的辩论时，产生了一定影响。相对于当时整个社会的非政府组织运动以及多党制而言，它们的影响较小，后来的发展也并不是很顺畅的。但是，在非政府组织运动以及多党制的背景下，像社会上其他人群一样，军队中也出现了大规模退党现象。有西方学者这样描述：“1989年和1990年，越来越多的军官退党。这些人虽然遭受严厉的惩罚，但这些惩罚常常不起作用。例如，在堪察加半岛的一个导弹靶场任职的亚历山大·罗金中校以痛恨腐败现象为由退了党，被禁闭在一所精神病院，后来由于他威胁要煽动公众闹事，才被释放。

① [美] 威廉·奥多姆：《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王振西等译，新华出版社，2000，第226~232页。

随着退党人数的增多，空军飞行员成为全军退党比例最高的团体。”^① 在这个时期，苏联军队还承担了平定一些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骚乱的任务，包括1986年12月平定阿拉木图的“民族主义骚乱”，1989年4月在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用铁锹和毒气对付抗议者的“第比利斯大屠杀”，1990年1月在阿塞拜疆首府巴库“制止民族分离主义暴乱”，1991年1月对立陶宛民族分离运动进行军事干预。在这些军事行动中，无论是否动用武器，军人对和平居民所采取的镇压行动，都降低了军队在民众心目中的威望。而一些军人在这些行动中心理上受到打击，以及上层为推脱责任而相互指责，又使得这些军事行动的合法性无法得到解释。在此情况下，军人的离心力更强。

（三）苏联军队的崩溃

美国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曾任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的威廉·奥多姆的著作《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从苏联军队的内部结构及其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年代遇到的来自内外各个方面的问题入手，分析和叙述了“苏联军队的崩溃”。他指出，苏联军队的崩溃是由三个方面的原因促成的：“第一个原因是戈尔巴乔夫发动并坚持了大裁军：起初是单方面裁减军队员额50万人，接着签署了《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最后是不愿阻止华沙条约组织的崩溃，其结果是迫使苏联从东欧全部撤军。第二个原因是由戈尔巴乔夫促成的。军事政策上的公开性使公众对征兵制和军营生活的现状颇有怨言。第三个原因是没有预料到的。对征兵制的抵制趋向公开且迅速蔓延，使军队一年两次的征兵与退伍工作无法正常进行。”^② 他详细叙述了大规模裁军给军官及其家属带来的生活困难，而波罗的海三国以及摩尔达维亚等加盟共和国对安置军人的抵制，更增强了军人的愤怒情绪。同时，苏联军队中长期存在的老兵欺负乃至虐待新兵的“老爷子”现象，以及普通士兵待遇低下，军队中的腐败，还有种族歧视等弊端，在“公开性”条件下被曝光，给征兵工作带来了难度。

^① [美] 威廉·奥多姆：《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王振西等译，新华出版社，2000，第240页。这个观点在另一篇文章中也有阐述。参见艾尔波特·萨吉斯《关于苏联军事解体的一些经济、政治和军事因素》，《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5期。

^② [美] 威廉·奥多姆：《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王振西等译，新华出版社，2000，第320页。

1990年秋季，全苏联的征兵计划只完成了78.8%，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摩尔达维亚都低于这一水平。1991年春季征兵的情况也大抵如此。“征兵危机开始于1989年，一直持续到1991年，直至苏联解体以后。”^①到1991年，苏联军队已经处于十分混乱的状态，在基层部队尤其如此。当时，军队中的技术事故时常出现，军人开小差的现象更不鲜见：“从1989年到1991年，在上层中开小差的数量达到数千人，而擅离职守者则数以万计。”^②但是，军队的建制与结构都完整地存在下来。直到戈尔巴乔夫交出核按钮，在电视节目中宣布联盟已经不存在，苏联军队还在“等候决定”，以至于联盟解体后，建立独联体军队依然是一个可能的话题。

就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整个过程而言，苏联军队中尽管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在军队建设中也出现了严重困难，但是军队始终在听党指挥、服从决定。正因为如此，美国研究者威廉·奥多姆在自己的著作开篇就说：“苏军并未被入侵的敌军消灭，它也没有企图从已处于土崩瓦解状态的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手中夺权，哪怕是为自己生存而孤注一掷。它也未曾向别国发动战争，以便团结国内民众来支持摇摇欲坠的政权。它手中握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核武器，却没有威胁要使用它。相反，苏联武装力量只是埋怨不休，没有采取任何积极行动，最终——用托尔斯泰的话说——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③的确是这样，在苏联解体后的很长时间里，人们在探究苏联解体的原因时，虽然会提到军队改革、军事工业综合体、军队中的一些乱象，但是，几乎很少有人专门来研究苏联军队自己是怎样走向崩溃的，因为这个问题对于苏联解体而言似乎并不是重要问题。的确，威廉·奥多姆的书使用“崩溃”一词，是有些言过其实了，因为苏联军队在国家解体过程中，并没有大的举动或者大规模行动，更不要说保卫国家、捍卫联盟。从全部过程来看，它的瓦解更像是一种“服从组织安排”的行为，这个“组织”就是苏联共产党和

① [美] 威廉·奥多姆：《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王振西等译，新华出版社，2000，第347～348页。

② 艾尔波特·萨吉斯：《关于苏联军事解体的一些经济、政治和军事因素》，《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5期。

③ [美] 威廉·奥多姆：《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王振西等译，新华出版社，2000，序言。

联盟——“共产党同它的将军们手挽手、肩并肩地走向灭亡。”^① 在这个过程中，军队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已经很难发挥。从这个过程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到，苏共失败、苏联解体，更多的原因来自共产党和联盟自身。

五 “8·19事件”与苏共被停止活动

自1987年开始政治体制改革后，苏共在领导权力和政治职能上一步步退让，“民主化”“公开性”使党的威信降低；从苏维埃国家的领导者、政治先锋队到“改革的先锋队”，使党的领导职能降低；多党制使党的职能由国家的领导者变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者之一；在党的高层，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进入白热化状态，导致“8·19事件”的发生，结果苏共被解散。

（一）苏共7月全会

1991年7月苏共召开中央全会，在戈尔巴乔夫的报告和全会通过的提交全党讨论的《苏联共产党纲领》中，进一步批判斯大林以来的苏共路线，认为必须根本改变对社会主义的全部看法，“与过时的意识形态和陈规坚决决裂”；“经验没有提供共产主义在可预见的将来能够成为现实的理由”，是否把党的名称改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将由苏共第29次代表大会决定。在苏共纲领草案中，对苏共性质、作用和目标的规定是：苏共是“一个社会进步和民主改革的党，一个维护社会公正和全人类价值的党，一个主张经济、政治和精神自由的党”，它在政治活动中将遵循“社会全面进步的利益”“人道主义和全人类价值原则”“民主和自由原则”“社会公正原则”“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原则”；它将为在民主选举中取得代表资格而奋斗，努力得到人民对它的竞选纲领、主要政策方向和实际行动的支持，在议会中的共产党议员成为少数派的政权机关里将采取建设性的反对派的立场；“共产主义是一种历史前景”，“社会主义、民主、进步——这就是苏联共产党的目标”。有俄罗斯学者肯定，这次全会“对党的理论、意识形态和组织基础都进

^① [美] 威廉·奥多姆：《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王振西等译，新华出版社，2000，序言。

行了非常勇敢的修改”^①。的确，这是一次带有根本原则性的改动。

这个纲领草案再次强调深刻民主化是苏共革新的最重要方向，要使“加入苏共的各加盟共和国的党具有独立性，为地方和基层党组织的主动精神开辟广阔的天地”。“党员可自由选择在自己的知识与能力的领域里参加党的活动”，可奉行无神论观点或信教^②。苏共在党的原则路线上的一再退让，给苏共内的所谓“保守派”以很大打击，很多苏共领导和党员不再相信戈尔巴乔夫。

（二）“8·19事件”与苏共被停止活动

苏共党内对于改革目标以及其他问题的分歧日益加重，国内民族矛盾及各种社会问题加剧，联盟岌岌可危。为挽救联盟，避免国家分裂，戈尔巴乔夫提出了“9+1”计划。在这个计划中，苏联共产党将失去原来的执政党地位，并且国家政体也有实质性的改变^③。这种情况引起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苏共其他领导人的不安。1991年8月19日，亚纳耶夫等宣布戈尔巴乔夫停止行使总统职权，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由于发动政变的共产党领导人准备不足、叶利钦等激进派的反击，以及一些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宣布支持戈尔巴乔夫，“8·19事件”以失败告终。

1991年8月22日，叶利钦签署命令，宣布苏联军队中的共产党基层组织为非法。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加盟共和国地方党组织自己决定怎么办。他还发布命令，停止苏共在苏联武装力量、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其他机关的活动。8月25日，苏共中央书记处被迫发表声明，宣布应该接受自动解散苏共中央的决定。8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其内容当中有一项就是终止苏共在全国范围内的活动。在此之前，苏共中央大楼就已被查封，财产被没收，档案也被查封，各加盟共

① [俄] 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63页。

② 参见王廷玉等编译《苏联“改革”中的各政党和政治组织》，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第217~218页。

③ “9+1”计划是指由作为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与另9个加盟共和国签订新联盟计划，以取代旧的苏联。这样，苏联的名字将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改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即苏联将由社会主义联盟国家变为松散的邦联国家。

和国共产党也被迫终止活动或被解散。11月6日，叶利钦正式签署命令：“停止苏共和俄共在俄联邦境内的一切活动，解散其一切组织机构；俄联邦国家权力执行机关对俄联邦公民加入苏共和俄共的事实不予追究；苏共和俄共在俄联邦境内的所有资产归为国有资产。”^① 苏联共产党在组织上被摧毁。

“8·19事件”后，雅科夫列夫指出，在苏共被停止活动时，国家发生政变之际，共产党却一声不吭，共产党员继续留在这个没有起来反对政变的组织中是不道德的。他和一些其他党派的领导人号召共产党员退党，加入别的党派。当时，在俄罗斯掀起了新一轮反共浪潮。有的作家大肆叫嚣：“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要分清自己人和其他人，即‘我们’和‘他们’。‘我们’是正常的人，是劳动人民，而‘他们’则是共产党员，是寄生虫。……俄罗斯的当权者被人民所憎恶是他们应得的下场。”^② 很多不久前还是积极的共产党员，现在却公然宣布与苏共决裂。他们烧毁党证，丢弃或出卖党证。“8·19事件”后，在莫斯科阿尔巴特大街上，一些外国收藏家曾以每张100美元的价格购得党证，后来的价格竟然跌到了10美元^③。在叶利钦正式签署停止苏共和俄共在俄罗斯境内活动的命令时，“整个社会对此表现得非常平静，许多人甚至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成千上万的苏共党员很快就转向了新制度的一方”^④。但是，这并不证明所有共产党员都支持解散苏共。一些共产党员如麦德维杰夫、利加乔夫、久加诺夫等纷纷提出抗议，认为“把苏联共产党从政治舞台上驱逐出去并停止其活动是非法的和专横的”，停止苏共活动“没有任何重大的法律依据”^⑤。苏共中央被解散后，有些党员和干部就

① Россия, 9 ноября 1991.

② Литература, 4 сентября 1991. 作者是列昂尼德·绍罗霍夫。

③ 在俄罗斯作家尤·波里亚科夫的小说《无望的逃离》中，对焚烧党证有过比较详细的描写，可参见尤·波里亚科夫《无望的逃离》，张建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185页。

④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187~188页。

⑤ 麦德维杰夫原为苏联人民代表，苏共中央委员；利加乔夫曾为苏共中央书记，中央委员；久加诺夫是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上述情况可见王廷玉等编译《苏联“改革”中的各政党和政治组织》，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第224~225页。

开始为恢复苏共而斗争，他们保留党证，不承认解散苏联的决定的合法性，或者加入其他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组织。例如，一部分苏共党员将俄罗斯共产党^①视为苏联共产党的继承者，很多共产党人为恢复俄共的合法地位而多方活动。1992年12月，在俄罗斯全境开始恢复基层组织并对苏共党员进行重新登记，这些基层组织和党员将作为恢复苏联共产党的力量或者是被视为苏共的继承者——俄罗斯共产党的力量参加到社会政治活动中。

本章小结 正确的改革路线是基层党组织 发挥积极作用的保证

1985~1991年，苏联进行了六年多的改革。在改革之初，苏共领导人比较重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从安德罗波夫到戈尔巴乔夫继任之初的干部政策的调整，说明这两位有改革意识的苏共领导人已经注意到：对于20世纪80年代面临改革的苏联，“人”的因素，或者说一支有文化、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十分必要。从当时苏联国内情况来看，在80年代前期，无论是苏共的各级领导者还是普通民众都意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他们相信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目的是解决多年累积的社会矛盾，对他的改革充满期待。戈尔巴乔夫因此也获得了人们的信任，他一再宣称：“改革的实质正是在于它把社会主义和民主连在一起，在理论与实践上完全恢复社会主义建设的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我们全部的改革纲领——完全基于以下原则：更多的社会主义，更多的民主。”戈尔巴乔夫承诺，改

^① 自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成立以来，俄罗斯一直没有本共和国的共产党组织。随着其他共和国共产党要求自主权的呼声日益加大，在俄罗斯人们也要求成立独立的共产党，1990年6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成立。但是，1991年“8·19事件”后，叶利钦签署命令，禁止俄共在俄罗斯境内活动。1992年11月，俄罗斯宪法法院判定叶利钦停止俄罗斯境内苏共与俄共活动符合宪法，但禁止以区为单位的俄共基层党组织活动违反了宪法，这个裁决实际上恢复了俄共的合法地位。1993年2月，俄共重建，有党员约60万人，是俄罗斯境内最大的政党。相关情况参见张伟垣、曹长盛、杨阴滋主编《苏联兴亡和社会主义前景》，新华出版社，1999，第428~429页。有关“8·19事件”后苏共党员、基层党组织干部恢复苏共的努力，也可参见〔俄〕罗伊·麦德维杰夫《俄罗斯向何处去——俄罗斯能搞社会主义吗？》，关贵海、王晓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第269~285页。

革的目的是满足人们对食品和日用品的需求，使人民得到高质量的服务，实施住房建设方案，改善医疗条件，提高国民教育和文化水平。其中首要的任务是：加大力度保护自然环境，根本改善全国的生态状况，解决经济发展中多年积累的历史问题，使国家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戈尔巴乔夫承认，确实有一些人对改革抱有怀疑态度，一些批评家强调改革进程中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消极现象。这些人预言将会发生通货膨胀、失业、物价上涨、社会分化加剧，也就是西方走上“富裕”之路时所发生过的那些情况。但是，戈尔巴乔夫自己却十分乐观。从表面来看，戈尔巴乔夫思想开放，他的认识和见解已经超过了学者们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认识的理论高度，给普通民众带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尤其是在连续送走三位病逝的总书记的情况下，人们对戈尔巴乔夫寄予厚望。但是，在戈尔巴乔夫身边的人其实已经意识到，改革有可能带来通货膨胀、失业、物价上涨和社会分化等后果。只是，戈尔巴乔夫华丽的辞藻和灵巧的发挥使那些人丧失了应有的警惕性。

在最初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两年多时间里，苏联共产党基层党组织还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1985~1986年苏联共产党党员队伍在继续扩大，基层党组织、车间党组织和党小组的数量都在增加。党的基层干部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生产中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积极性，关心生产，发现生产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在工作中发挥主动精神，积极参与到改革中去。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组织上，基层党组织都可视为一支执政党领导下的有组织、有纪律的政治力量。当然，从20世纪70年代起，苏联的各种社会问题导致党员群众对政治冷漠，基层党组织在宣传和组织工作中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等问题，但人们对党的新领导人、对国家改革还抱有希望，也乐于参加到改革之中。

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提出“民主化”“公开性”，揭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重新评价历史，其目的是解放人们的思想，为深化经济改革扫除思想障碍，但在实际效果上却带来了思想的混乱，改革的风向开始发生变化。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宣布进入政治体制改革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用宪法来限制苏联共产党。苏联的改革从“完善社会主义”转向“完善苏维埃制度”，明确划分共产党和苏维埃的权力。在苏联进行的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

举中，苏共党员占了当选者的多数，尽管有人认为这并不意味着苏共的胜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说是苏共的失败，但从社会影响来看，苏共党的干部和党员还是有很大影响力的。

全国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一个社会后果是各种各样社会组织纷纷涌现。这些社会组织的代表在参加选举的过程中，以批评共产党的政策来扩大本组织的影响。从国家政治角度来讲，允许广大党员群众对执政党的政策和措施发表意见甚至提出批评，确实是国家政治民主、政务公开的一种表现，尤其是对于苏联这个被西方视为共产党专权的“极权”国家而言，言论自由是必要的，但这种做法的代价却是共产党的威信被削弱。同时，众多社会组织提出的“多党制”要求，使坚持共产党领导的苏共领导人在思想上发生了动摇。

客观地说，在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召开前，苏共领导人在政党制度的问题上，至少在表面上还能够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希望实行一党制下的社会团体多元化。戈尔巴乔夫曾信誓旦旦地表示，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将毫无前途。他说：“我们将走向更好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远离它。我们是在诚恳地说这句话，而不是对自己的人民和外国撒谎。期待我们将开始创造某种别的、非社会主义的社会，并将转入另外一个阵营，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① 1989年1月21日，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市组织第27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坚称：“谁也不能在政治上代替党，今天在发扬公开性、民主化的情况下，党是一支强大的思想政治凝聚力量。”^② 在1989年11月15日接见全苏大学生讲话中他也说道：“许多国家存在着5个、10个、20个政党，然而那里绝对不存在人民利益的和谐气氛。”^② 但是，戈尔巴乔夫的这种立场并没有坚持下来。到1990年2月，他提出修改宪法第6条，认为“党的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

早在苏共正式修宪之前，苏联一些民间团体就开始了自己的修宪运动。1987年，“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起草了《欧洲和亚洲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宪法草案》。草案明确规定：这个联盟最高权力机构为“独立

^① 参见陈新明《苏联演变与社会主义改革》，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第342页。

^② 参见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东西方政党和文化比较研究中心组织编写《苏共的失败及教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第147~148页。

于任何党派的中央政府”，而且这个政府的首脑——总统“也不得担任任何党派的领导职务”，从而明确取消了苏共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当时还没有正式登记注册的一批非正式组织甚至组织游行示威，要求进行“宪政改革”，实行多党制，取消苏共对国家的领导权。1990年3月14日，第3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对原第6条苏共领导地位的规定做了修改：苏共不再具有法定执政党地位；同时规定，“苏联公民有权结成政党、社会团体”，从而确认了多党制。

苏共在丧失执政法理依据的同时，也逐步放弃了在国家机构中的领导权。这一转折的标志是修改原宪法，实行总统制。戈尔巴乔夫对此有明确解释。他说：“第六条的问题同改造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建议一起研究……表明我们承认民主制的另一项重要原则：权力分立。”所以，在就任总统时，作为苏共总书记的他公然宣布自己不是某个政治派别的代表。这样，苏共从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从中央领导到基层组织，几乎完全丧失了组织和领导作用，党的先锋作用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了。苏联共产党成为多党选举制度下的政党之一，由原来的执政党和生产与社会生活的先锋队转变为“议会党”，与其他政党没有什么区别了。

在苏共一步一步放弃组织和领导权力的同时，基层党组织的作用也在削减。1987年以后，党员被开除、退党人数在增加，与此相应，入党人数却逐年减少。基层党组织职能发挥不畅，在组织和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难以起到应有作用。尤其是在苏维埃选举过程中，对共产党的政策以及一些苏共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批判与攻击成为各种社会组织代表在竞选演说中最具吸引力的内容。共产党在思想上社会威信急剧下降。

1990年夏召开的苏共28大是苏共党的队伍以及基层党组织工作的重要转折。尽管在这之前党员退党以及基层组织涣散现象已经存在，但还没有从根本上冲垮党在基层组织的机体。戈尔巴乔夫在多党制立场上的转变以及多党制的实行，对于苏联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形成了巨大冲击。从苏共高层领导到基层党务工作者，党的各级干部公开宣布退出党组织，带起一股退党洪流，一些有知识、懂技术、担任一定社会职务的党的基层干部从苏共退出，进入苏维埃，或很快被其他组织与政党吸纳，普通

党员也纷纷退党。很多基层党组织几近瘫痪，党的工作者被驱逐，基层党组织被禁止活动，企业或工厂、农庄中尚存在的基层党组织形存而实亡。当然，也有一些党员和基层党组织坚持党的信念，坚持过组织生活。在苏联军队中，尽管存在各种问题，但是党的组织和军队结构还是完整地存在的。

总体来看，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初，尽管有勃列日涅夫时代基层党组织工作留下的各种问题，如形式主义，教条主义，人浮于事，以及党员群众对政治冷漠，工作不积极，对党和国家的大事不关心等情况，但多数基层党组织在结构上还是健全的，基层党组织在一定范围内还能够发挥宣传教育作用。在前期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时，基层党组织积极组织广大党员参加到改革中，基层党务工作者主动探讨党的工作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采用新的工作方法，基层党组织是改革的基础和支持力量。到1987年以后，开始进入政治体制改革时期，基层党组织工作开始受到几个方面的影响：一是经济体制改革成效不大，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明显好转，甚至在降低，导致人们对改革产生怀疑甚至失去信心。二是政治体制改革从“民主化”“公开性”以及重新评价历史入手，重翻历史旧账，过急地公开一些历史档案，带来思想上的混乱，人们对共产党领导的信任度降低，对党员的思想 and 基层党组织工作带来不利影响。三是苏维埃人民代表选举，修改宪法第6条，用宪法限制苏联共产党的活动，将共产党的领导权逐步分散，党的地位一步步降低。1990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之年。这年春，在苏共扩大的中央全会和3月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多党制得到肯定并实行；也是这一年，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总统，党的总书记职务对他而言已经不是身份的主要标志；同样是这一年，俄罗斯共产党成立。这一切的直接结果就是党的队伍迅速涣散，从党的高层领导到普通党员，退党成为一股洪流，基层党组织工作陷入困境。其后，苏联改革的决策与政治立场距离苏共越来越远：缔结新联盟条约，继续选举活动，甚至有人提出将共产党的名称改为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等。党内矛盾突出，出现了“8·19事件”，这个事件的直接后果就是苏联共产党被宣布停止活动。

从表面来看，“8·19事件”是导致苏共被解散的直接原因，实际上，还在1990年，在实行多党制、进行总统选举时，苏联共产党的地位

已经一落千丈，苏联领导人就已经远离了共产党的路线。因此，有人指出，1990年戈尔巴乔夫当上总统后，以此新职发表的第一次讲话就谈联盟条约问题：“改革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新的联邦制的改造是否成功。现在在我就任总统之际，再次确认将忠于国家的完整。同时也认为，采取措施以期巩固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及其政治和经济的自主权、提高自治共和国和其他民族区域构成体的地位，应当是总统权力特别关注的对象。”在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已经不再认为党是调动民众继续改革的重要依托，他甚至要甩开苏共，实行没有共产党的改革。所以，“8·19事件”并不是他的改革离开党的轨道的开端，他早已经抛开了共产党^①。同样，对激进派而言，“8·19事件”只是为他们提供了解散苏联共产党的契机，实际上，解散共产党至少在一年前就已有先兆。而在苏联共产党被解散时，如雅科夫列夫所说，党员没有抗议，是因为自上而下的力量已经将共产党在组织上的机体搞垮。

^① [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第131页。

第四章 苏共基层党组织建设与苏联 解体关系分析

基层党组织是党的基础，它的建设关乎党的稳定。基层党组织的公共权力与公共影响构成基层党组织存在的根基，而其公共权力与公共影响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力。在苏联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基层党组织发挥作用与职能的方式也有不同，但是从苏维埃政权初期到 20 世纪 80 年代前期的苏联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路线。这两点是执政党的权威性的保证，也保证了执政党地位的稳固。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逐步放弃了执政党的领导权力，苏共从上到下各级权力与地位的丧失，造成基层党组织涣散，也毁坏了党的机体。而作为联盟的基础，苏共被解散，使得联盟失去了对各行业、各地区、各民族人民的维系力量，联盟解体也就成为必然了。

第一节 苏联历史上基层党组织建设的 主要成就与问题

在苏联 74 年历史上，基层党组织无论在保卫苏维埃国家还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在多数时间里都起到了先锋队和战斗堡垒作用。作为执政党的基础，苏联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都要通过基层党组织实现或者推动。可以说，没有基层党组织的实践活动，苏共就没有生存的土壤，更不要说作为执政党执政几十年。在 70 多年时间里，基层党组织遍布于苏联国民经济、行政机关、军队、教育等行业中，发挥着宣传和组织作用。无论是在巩固和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工业化、战后恢复的建设时期，基层党组织都是落实苏共方针的主要载体。基层党组织自身的建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同时，在苏共基层党组织建设中，也存在

破坏民主集中制原则、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僵化、形式主义等问题，还有基层党员人身权利与政治权利遭到破坏，长期积累以后给基层党组织建设带来不利影响，也动摇了一些基层党员对党的信任。

一 苏共在基层党组织建设理论和实践上的成就

苏共领导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在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苏共基层党组织建设理论是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而列宁、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对党的基层组织作用、地位的认识，以及他们在这方面的理论与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内容。苏共基层党组织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前期发挥先锋队作用，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党的正确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信念。在苏联建立的完备的基层党组织体系，对于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保证社会主义国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胜利，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基层党组织建设是执政党牢固奠定执政基础的保证。

（一）列宁与斯大林在基层党组织建设上的理论贡献与实践经验

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建立前后，党的理论家列宁、马尔托夫等就曾围绕党的组织原则、党的组织纪律等展开过讨论或争论。这些讨论或争论对于明确党的组织纪律，建立一个有严格组织体系的政党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列宁虽然长期居住在国外，但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国内革命形势，对党小组和党支部的组织工作、斗争方式提出了一系列看法和观点，尤其是在建立一个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政党、加强党的集中领导，以及实行“民主的集中制”等方面的理论，对于布尔什维克党基层党组织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1917年回到国内后，列宁亲自参加革命活动，深入到工人、士兵和群众中，进行宣传鼓动。他对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系统的理论构想，从组织结构到组织原则、斗争方式等都有比较细致的思考。列宁擅长于思想鼓动，无论在党的领导人中间还是在党内其他党员中间，有分歧甚至矛盾他都会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他还要求布尔什维克党的各级干部深入到党员群众中做宣传鼓动工作。因此，在列宁时期的党的基层组织中，民主集中制贯彻得比较好，党员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在诸如“共产主义星期六”这样的活动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从实际效果来看，列宁时期

基层党组织的主要工作是鼓动和宣传，党的基层组织生命力在于将所有党员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基层组织成为一个有创造力、有灵活性的组织。列宁的理论与实践后来成为苏联共产党党建的重要内容，为苏共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斯大林在革命前的经历与列宁不同，他一直在国内从事具体的组织工作。他是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中央政权中唯一一个没有在国外长期生活的领导人，因此斯大林更擅长于做实际工作，在思想工作上不够擅长。但因他从参加革命后一直在做组织工作，所以他能够调动起党的组织体系，在组织结构上环环相扣。正因为如此，斯大林时代的苏共在领导工业化建设，实现农业集体化，进行伟大卫国战争的过程中，各级党组织和其他机构都能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这也是一种组织艺术。当然，斯大林时期的党是组织型的执政党，工业化、集体化和卫国战争基本上都是依靠自上而下的严密的组织体系。在党内生活中，主要依靠强大的集中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斯大林时期，基层党组织的生命力在于秩序：在五年计划的执行中，在农业集体化的“胜利进军”中，以及伟大卫国战争中，还有在战后初期苏美英同盟破裂、冷战背景下的经济恢复等，都体现出基层党组织在领导和组织上的有序性。这种有秩序地进行的工作不一定是很活跃或充满创造力的，但它能使党员按照党的要求完成工作。当然，在“大清洗”开始后，党内风向有很大转变，在党员的心理上产生了一定影响，不安全感上升，基层组织的活力受到一定影响。不过，随后开始的伟大卫国战争使得爱国主义情绪上升，党组织的宣传以爱国主义宣传为主，党员群众的爱国热情成为第一位的情感，这种情感增强了党的战斗力和党组织的凝聚力，党的威信也极大提高。战后，也即斯大林后期，对于基层党员的要求已经不像战前那样十分严格了，但党的集中领导限制了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教条式的工作方式开始取代创造性的工作方法。

（二）在组织资源上，苏联共产党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深入国家各部门、各行业、各机构的基层组织网络

布尔什维克党在建立之初，就重视发展党员，扩大党的队伍。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主要是城市工人和军队的士兵，在成为执政

党掌握国家政权以后，布尔什维克党在农民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将党的影响扩展到农民中，从几个主要的大城市扩展到农村。十月革命前，农民在党员中仅占 7.6%，党员主要成分是工人和士兵，到 1919 年 10 月，党员中 52% 是工人（指原来曾受雇的工人），15% 是农民，18% 是白领工人，14% 是知识分子^①。1920 年“征收党员周”使得农民党员人数比 1919 年 10 月约增加了 4 倍，到 1920 年 9 月，在农村支部中已有 18 万名正式党员和候补党员。到 1923 年时，党员中工人占 45%，农民占 26%，其他成分占 29%^②。在行业上，工业和交通支部党员占 18%，军队支部党员占 24%，苏维埃机关支部党员占 19%，农村支部党员占 30%，其余占 9%（包括学生和无职业者等）^③。从 1919 年起，到 20 世纪 40 年代末，苏联共产党经过多次清党和大规模发展^④，对党员的成分、党员的党龄、党员文化程度进行调整，根据党的建设和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党员队伍中所占比例在不同时期也有所改变。到 80 年代末，苏共党员成分基本涵盖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部门（见表 4-1），女党员在所有党员中的比重在 1/4 强到接近 1/3，并且逐年有所提高（见表 4-2），她们在各行业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在各加盟共和国，少数民族党员也都占有一定比例。可以说，直到 1990 年以前，苏共都是一个体系比较完备、可以影响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政党组织。

表 4-1 20 世纪 80 年代党员在各行业中所占比例

| 行业 | 单位：% | | |
|---------------|--------|--------|--------|
| | 1981 年 | 1986 年 | 1989 年 |
| 物质生产部门 | 73.3 | 73.1 | 72.1 |
| 工业、建筑、交通、通信部门 | 47.4 | 47.1 | 46.3 |
| 农业 | 20.1 | 19.9 | 19.7 |
| 国营农场 | 8.1 | 8.1 | 7.9 |

① Известия ЦК ВКП (б), №. 15. март 1920.

② Известия ЦК ВКП (б), №. 49. январь 1923; №. 52. апрель 1923.

③ Известия ЦК ВКП (б), №. 47-48. ноябрь-декабрь 1922.

④ 主要有 1919 年对党员进行重新登记，1920 年“征收党员周”，1921 年清党，1924 年为纪念列宁而征收党员，1929 年清党，1939 年清党。

续表

| 行业 | 1981 年 | 1986 年 | 1989 年 |
|-----------------|--------|--------|--------|
| 集体农庄 | 10.1 | 9.9 | 10.0 |
| 商业、饮食服务、物资供应等部门 | 5.8 | 6.1 | 6.1 |
| 非生产部门 | 26.7 | 26.9 | 27.9 |
| 科学部门 | 4.4 | 4.2 | 4.3 |
| 各级教育、卫生、文化、艺术部门 | 11.7 | 11.5 | 12.2 |
| 国家管理机关、党政机构 | 8.7 | 9.1 | 9.2 |
| 居住区 | 1.9 | 2.1 | 2.2 |

注：数据截至各年 1 月 1 日。

资料来源：Справочник партийного работника. 1989.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с. 599。

表 4-2 20 世纪 80 年代女党员所占比例

单位：人，%

| 时间 | 女党员数量 | 在党员队伍中所占比例 |
|--------|---------|------------|
| 1981 年 | 4615576 | 26.5 |
| 1986 年 | 5475145 | 28.8 |
| 1988 年 | 5767181 | 29.6 |
| 1989 年 | 5829654 | 29.9 |

注：数据截至各年 1 月 1 日。

资料来源：Справочник партийного работника. 1989.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с. 599。

另外，随着党员队伍的扩大，以及基层党组织规模的逐渐扩大（见表 4-3），苏共还对基层党组织结构进行调整，从最初的党支部改为基层党组织（1934 年）。在战争年代以及和平年代，随着党员数量的增加，党员成分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个部门的变化，基层党组织以及下辖的车间党组织、党小组等也有所调整。

表 4-3 苏共基层党组织规模变化情况

单位：%

| 党组织规模 | 1946 年 | 1961 年 | 1977 年 | 1981 年 | 1986 年 | 1989 年 |
|--------------|--------|--------|--------|--------|--------|--------|
| 少于 15 名党员 | 63.0 | 43.7 | 40.4 | 39.9 | 39.8 | 39.0 |
| 15 ~ 49 名党员 | 29.7 | 43.8 | 40.9 | 40.6 | 40.1 | 40.5 |
| 50 ~ 100 名党员 | 5.4 | 8.1 | 12.7 | 12.6 | 12.9 | 13.0 |

续表

| 党组织规模 | 1946年 | 1961年 | 1977年 | 1981年 | 1986年 | 1989年 |
|----------|-------|-------|-------|-------|-------|-------|
| 多于100名党员 | 1.9 | 4.4 | 6.0 | 6.9 | 7.2 | 7.5 |

注：数据截至各年1月1日。

资料来源：〔苏〕A. 彼特罗维切夫主编《党的建设》，郭华等译，求实出版社，1983，第218页；Справочник партийного работника. 1989.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с. 599。

涵盖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个部门的党员队伍以及组织结构比较完备的基层党组织体系，使党的影响可以达到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证明苏联共产党队伍建设在组织体系上比较完整和成熟。

（三）基层党组织发挥主要职能，在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起到生产先锋队和战斗堡垒作用

基层党组织的一个重要工作任务是发展党员。在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后，党员队伍经过了扩大和收缩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以后，党员数量基本稳定，党的队伍逐年扩大，基层党组织接收党员的工作有秩序地进行。根据党对党员标准的要求，基层党组织在接收新党员时对要求入党的党员进行考察，组织新老党员学习等，做了大量工作。

在苏共党章中，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生产、斗争以及社会生活需要，对基层党组织的职能做出了不同规定。基层党组织在国内战争中，在巩固苏维埃政权时期，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在战后恢复时期以及20世纪60~80年代和平发展建设时期，在保卫国家、组织生产、宣传党的内外政策、为社会主义国家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贡献。正是由于基层党组织发挥组织、宣传职能，在党和群众中间架起桥梁，才保证党的政策、方针得以落实，保证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得以顺利进行。尽管基层党组织不是决策机构，在苏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不完全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但作为党的基础，基层党组织是苏联党和国家政权稳固的基石。

（四）基层党组织与行政部门实现党政分开，为执政党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了经验

党组织与行政领导之间的关系问题，或者说在国家各部门中党的领导与行政领导权力怎样划分的问题，在布尔什维克党掌握政权之初还不十分突出，因为那时党和行政领导在人力资源上基本是共用的，党员担

任各个部门的领导职务。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列宁为了反对官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曾主张在经济部门实行一长制，同时主张实行多种形式的自下而上的监督，以调动经济部门一些专业技术人才的生产积极性。这种由党员监督、经济管理人员负责的领导方式体现了苏联共产党在经济生活中的民主性。

斯大林时代推行一长制，在工矿企业和社会基层单位中党政职权基本分开了。在1929年联共（布）中央的决议中，批评企业里的党支部干预过多，并决定在企业中推行厂长负责制^①，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基层组织中基本做到了党政分开。不过，这样一来，出现了过于强调厂长的职权，甚至导致领导职权的专断：“厂长是工厂的绝对领导者”，“经理在工厂走动时，大地应该颤抖，每个值班人应该走近向他汇报”^②，工厂企业中党支部的作用有所削弱。为加强党支部的监督作用，1939年苏共18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企业（包括工矿企业、商业企业、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基层党组织拥有对行政工作的监督权。

斯大林时代的党政分工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上台后，努力加强党组织的民主性，在基层党组织工作中，提倡创造力和灵活性，并将党组织的工作方法应用于生产实践中。50年代末，苏共中央为加强基层党组织对企业行政工作的监督，通过了《关于生产企业、商业部门的基层党组织对企业行政工作实行监督的条例》，规定基层党组织委员会应当对企业及时完成生产任务、国家定货和按产品目录供应优质产品情况进行系统的监督，在基层党组织委员会领导下成立各种监督委员会。1961年苏共22大决定把行政工作的监督权扩大到各种设计机关、科研机关的基层党组织。

① 对厂长职权的规定是：①厂长全权负责生产管理，企业中任何人“不管他们在党、工会或其他组织中担任何种职务，都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厂长作出的所有经济业务决定”；②厂长直接任命厂内各级领导人员，党支部如有不同意见，可向上级申诉，但不得停止执行厂长的决定；③党支部起“保证”和“监督”的作用，保证企业贯彻党的指示，完成生产计划，对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指导生产委员会、生产会议和临时监督委员会工作，与各种破坏现象作斗争。转引自《吴仁彰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第179页。

② 1934年9月卡冈诺维奇在联共（布）17大上的讲话以及在重工业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Правда，24 сентября 1934.

到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强调基层党组织要更充分、更好地发挥监督权利，监督的重点包括干部问题（党组织过问干部的选拔、分配和培养）、企业完成生产计划的情况、职工的劳动和生活条件改善情况等，基层党组织应“随时随地维护全党全国的利益”^①。

总体来看，在苏联几十年历史上，在基层，党政分工基本上还是比较明确的。当然，长期来看，在苏共的中、上层领导集团内，并未正确解决党的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没有很好地解决以党代政和党政不分的问题，后来也成为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的一项内容，即改善党的领导，为党和国家政治体制提供新的活力。但是，从基层党组织来看，在党政分工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有益经验。

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失败、国家解体后，曾总结道：“我本来可以不实行改革，当初，体制当中潜在的稳固性之大，足够维持几十年之久。”^②他的这番话意在解脱自己的责任，同时也道出了一个客观事实：苏联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几十年间积累起强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这些财富完全可以使这个国家不需要任何变革而继续支撑下去。用中国传统的话来说就是，戈尔巴乔夫原本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吃老本”。这个“老本”够不够戈尔巴乔夫吃，抑或说他在上台后是否应该进行改革，还需要另做认真衡量，但可以肯定的是，苏联共产党在几十年时间中在组织资源、组织结构、执政党的建设等方面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这是苏维埃国家和苏联共产党从被资本主义包围的状况下得以成长壮大的力量源泉。苏共虽然失败了，但不能因此完全否定苏联共产党曾经取得的成就。同样，任何人都不能因苏共失败和苏联解体就完全否定苏共基层党组织在几十年间积累的经验与财富。

二 苏共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苏共几十年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样，经历长期发展后，苏共基层党组织建设也积累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不同

^① 1981年8月21日苏共中央《关于沃龙涅什市工业企业基层党组织对行政工作实施监督的决议》。

^②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俄罗斯向何处去——俄罗斯能搞社会主义吗？》，关贵海、王晓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第208页。

时期有不同表现形式。多种问题长期积累，在一定程度上损坏着苏共的机体，降低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一）关于党内民主和集中的关系问题

民主集中制是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以后确立的组织原则。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对于党的生存和发展十分重要。不能想象一个真正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没有集中。如果每个党员、每个党组织都各自为政，不遵守集体制定和通过的决议，无视多数人的意志和上级党机关的指示，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的行动统一，党就无法再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存在，它就会分裂为许多彼此毫无联系的单个的组织。同样，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没有党内民主也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说没有集中党会变成一种无法积极地共同行动的争论俱乐部，那么没有民主党就有蜕化为官僚主义组织的危险。在这种组织里，纪律是靠盲目服从来维持的，因而也就不可能是巩固的。只有把集中和民主正确地结合起来，才能使党具有战斗力，使它发挥自己作为群众的政治领袖的作用。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成立初期、十月革命时期、国内战争时期都主张加强党的集中领导，不能实行完全的民主；国内战争结束后，俄共（布）采取了发扬党内民主的方针。列宁对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的理论与实践说明，他主张坚持民主集中制，但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所面临的内外形势不同，党实行民主集中的程度和方式不应当一个标准。

斯大林时期由于领导权威的加强，在党的组织生活中，个人权力扩大，破坏了党内民主，给党的建设带来不利影响。这种做法不仅在当时造成“大清洗”等不正常现象，还影响到以后党的建设。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对斯大林的一个重要指控就是斯大林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赫鲁晓夫则要恢复党内民主。他的想法是没有错的，但他突然抛出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的指责与批判，以及在苏共22大上提出的“全民党”“全民国家”概念，则给党员群众带来思想上的混乱，影响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的社会思潮。尽管苏共后来几次做出解释，在意识形态上重新筑起堤坝，依旧无法防范各种思潮的影响。到戈尔巴乔夫时代，在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取得什么成就时，进入政治体制改革时期，提出“民主化”“公开性”，批判苏共

长期以来缺乏民主的体制，在党的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党的组织生活要“恢复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到党的28大前后，苏共进一步“发扬”民主，给基层党组织以更多的自主权，也给其他社会组织以更多的民主权利，即实行多党制，这种决策的后果是造成党的各级组织和思想体系涣散，给苏联共产党带来致命打击。而在党的基层组织涣散，党的权力受到严重威胁时，作为苏共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向反对派放权，一味迁就，最终抛开了共产党。苏共的失败说明，党的集中不仅是思想的威信，而且是由党的机关和它的各级领导者共同体现的权力威信，在党的领导权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集中是无产阶级政党继续存在和正确地进行活动的必要条件。

在党的基层组织中，民主集中制是组织生活的重要内容。苏共领导结构决定了越往高层权力越大，而在基层反倒将中央决议的内容贯彻得比较好。基层党组织对行政工作的干预比上层要少，因此基层的民主要好一些，甚至也可以说，基层党的领导与群众的关系也更密切，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威信更大一些。

但是，在苏联政治体制改革时期，由于来自上层和外部力量的冲击，基层党组织还是被“民主”的力量冲垮。

（二）共产党员的思想信仰与领导者个人崇拜问题

俄国是一个传统的东正教国家，东正教是“三位一体”的国家基本支柱之一。在十月革命前，绝大多数俄罗斯人都有宗教信仰。十月革命胜利后，在苏维埃国家就开始了树立新价值观的努力。首先需要摒弃的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同时还要传播无神论，因为共产党员是无神论者，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主张。在革命胜利之初，党员就已经没有了私人生活和个人信仰：“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随时准备放弃自己多年信奉的思想。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早已把自己的个性彻底融入‘党’的集体之中，愿意作出必要的努力，抛弃自己的意见和信念……如果党有需要，他愿相信，黑是白的，白是黑的。”^① 党员作为无神论者不仅要放弃自己原来的宗教信仰，甚至为了“革命工作”还要远

^① [英] 奥兰多·费吉斯：《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第45页。

离家庭生活。不过，在列宁时代，尽管也有很大一批“资产阶级学者”被驱逐出境，并对宗教活动有一定限制，但当时还没有完全取消宗教。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对宗教人士的迫害加强，苏共严格限制宗教信仰的标志之一就是在莫斯科的救世主大教堂被下令炸毁。马克思主义成为苏维埃国家的“全民宗教”，取代了人们对上帝的崇拜。

没有了“万能的上帝”，人们心中的神被驱逐，苏维埃国家曾经向世界展示出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义精神面貌，并且在社会主义建设前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这种新的价值观却逐渐被对党的领袖的个人崇拜所代替，并且在苏共几十年执政过程中，不断被演绎和发展。党的领导人的个人崇拜首先出现于斯大林时期。斯大林击败党内对手后，开始用个人专断来代替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和集体领导原则，个人崇拜越来越严重。在苏联领导层内部，形成了一个权力的阶梯，越往上权力越大，越不受群众以至于法律的监督。在斯大林晚期，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达到高潮，斯大林的画像出现在苏联的大街小巷各种建筑内部和外面，几乎每个苏联家庭中都要悬挂斯大林的肖像，在文学艺术作品中斯大林也是歌颂的主题。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有其积极意义，但赫鲁晓夫把个人崇拜归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并且把自己在其中的责任推开，并在不久后又树立自己的个人迷信，在苏联政治和文学艺术中又出现一批称颂甚至夸张赫鲁晓夫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的的作品。为防止个人崇拜复发，赫鲁晓夫提出领导成员更换要制度化，在这中间他却把自己的亲信放到重要岗位上，并将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事实上导致上层官员特权化。勃列日涅夫对赫鲁晓夫改革进行调整，全面恢复高度集权的部门管理体制，形成庞大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到他执政后期，苏联中央部委有81个，正副部长有800多人，下面还有一套庞大的机构。勃列日涅夫集党政军权于一身，树立起自己的个人迷信。到后期，他被称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人物”“我们党的领袖”，甚至与列宁并称“两个伊里奇”^①。在当代俄罗斯政治家的回忆中，不止一次提到勃列日涅夫对“奖章”的偏爱，以至于达到自己给自己屡次授勋颁奖的地步。

^① 情况参见〔苏〕阿夫托尔哈诺夫《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杨春华、张道庆译，新华出版社，1981，第43页。

对于基层党员而言，他们从信仰共产主义，到崇信党的领导，崇拜党的领导干部，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崇拜权力。但是，这个体系并不牢固：赫鲁晓夫在苏共 20 大的“秘密报告”中开始揭开斯大林的另一面，这个报告在当时的党员与共青团员中引发了剧烈震荡。苏共 22 大之后在全国开展的“去斯大林化”继续撕去从前人们心目中领袖人物的面纱。赫鲁晓夫努力塑造一个亲民的领导人形象，实际上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个人崇拜。最终，赫鲁晓夫在一场“宫廷政变”后被免职，代之以原本并不出色的勃列日涅夫，对他的塑造在不久后再次掀起。实际上，在斯大林逝世后对劳改犯的大赦，以及整个 20 世纪 50 年代后半期的甄别平反活动，就已经使人们对共产党政权本身、对党的领袖产生怀疑。当然，那些曾受到迫害，虽然没有客死异乡但也基本上妻离子散的共产党员，在主观意愿上更乐于相信，当年的清洗与迫害斯大林并不完全知情，而是他手下的那些人在作恶，或者斯大林只代表他自己，并不代表党。但是在人们看到了赫鲁晓夫的下台，以及后来勃列日涅夫时代官员的腐化堕落后，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共产党领导干部的崇拜还是渐渐淡化了。

综观苏联历史上的个人崇拜现象，不难发现，仅仅从苏共领导人来说，这个现象不只发生在斯大林一个人身上，即不是一两个领导人的问题，而是几个领导人，也就是说根本原因在于体制的问题。对领导者个人“丰功伟绩”大肆颂扬，是舆论宣传机构的工作，同时，在党的基层组织生活内部，也时常会出现这样的内容。虽然基层党组织不能直接“造就”伟大的个人，但他们却做着宣传颂扬领导者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基层党组织也是滋生特权以及个人崇拜的土壤，是宣传党的领导者个人成绩、进行个人崇拜的工具。而在领导者的形象遭到破坏或者神话被揭穿后，基层党组织的威信也因之降低，就此意义来说，基层党组织又成为个人崇拜的受害者。苏联解体后，当代俄罗斯重新恢复了东正教的社会地位。我们看到，当年的党员，甚至高层领导干部又回到了教堂。这似乎在告诉人们，历史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似乎只是在这里，他们才寻到了灵魂安歇之处。到此时，谁都不可能去批判那些曾经的共产党员改变或者背叛了信仰，只能感叹，曾经取代上帝、取缔人们心中的神的当权者，并没有很好地维护他们的成果，反而用那些违背马克思主义原理、违反党的纪律与原则甚至违背社会主义基本道

德的行为亵渎了人们对共产党的信任。

（三）抵制各种思想因素侵蚀的能力问题

苏共党章规定，在基层党组织职能中有一项内容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做思想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与形式影响到基层组织宣传工作的效果，也是党与其他组织以及反党势力争夺舆论市场的工具。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由于国家在政治上与西方对立，苏联的国门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基层党组织在社会上的正面宣传影响很大。赫鲁晓夫上台后，在对外政策上实行“三和路线”，苏联与西方国家的交往增多，西方思想开始进入苏联人的生活中，对苏联思想界也开始产生影响。最初，西方思想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还没有形成意识潮流。到70年代以后，来自西方的思想意识进入了苏联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苏联开展旅游业后，1976~1980年到苏联的旅游者达2500万人，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占40%，他们带来西方的宣传品，对苏联青年产生了一定影响。西方国家还利用电波对苏联展开舆论攻势。据统计，70年代后期，外国对苏广播电台有37个，用23种苏联民族语言进行播音，昼夜广播。勃列日涅夫说，整个太空“都充满着反苏宣传”^①，这些宣传又往往以青年为对象。西方的宣传攻势对苏联青年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苏联青年中出现了一些叛逆行为，如仿效西方的生活方式，举止、衣着打扮一改苏联传统，在生活习惯上出现了酗酒、吸毒现象，还在私下里贩卖外国商品以牟利；崇拜并迷醉于西方的音乐舞蹈艺术，向往西方的自由、民主生活，出现了知识分子叛逃等现象；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出现动摇，信仰宗教，等等。面对这些情况，苏联政府采取了一些对策，如在思想上加强俄罗斯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豪感教育，严厉查禁西方宣传品，在宣传读物中揭露西方阴暗面，改进电台电视节目以吸引青年等^②。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并未达到预想目的，因为在党团组织中的学习往往是“刻板地学习众所周知的真理”，“回避当前实际生活问题”，并不能引起青年的兴趣。到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的大门向西方打开，苏联青年的共产主义信仰也就面临着一场严峻考验。

^① 转引自《吴仁彰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第55页。

^② 参见《吴仁彰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第54~61页。

应该说，在苏联改革前期，青年的思想还没有出现巨大波动。苏联共青团一直是向党输送先进青年的主要渠道。直到1988年，苏联共青团员中入党的比例还是比较大的（见表4-4）。

表4-4 共青团员接收为预备党员的比例

| 时间 | 人, % | |
|------------|---------|----------|
| | 绝对数字 | 占接收者总数比例 |
| 1962~1965年 | 1465830 | 48.1 |
| 1966~1970年 | 1355938 | 45.4 |
| 1971~1975年 | 1689557 | 65.1 |
| 1976年 | 435361 | 71.4 |
| 1985年 | 468147 | 71.6 |
| 1986年 | 473440 | 71.4 |
| 1987年 | 402293 | 68.7 |
| 1988年 | 268601 | 61.2 |

资料来源：〔苏〕A. 彼特罗维切夫主编《党的建设》，郭华等译，求实出版社，1983，第94页；Справочник партийного работника. 1989.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с. 592。

到1989年时，党龄在5年及以下的年轻党员所占比例与20世纪80年代初相比有所下降，并且成为发展趋势（见表4-5）。同时，在党员中经过长期革命考验的老党员比例也在减少。1977年，苏共党员中战前入党的仅占约20%，而有80%是战后时期入党的。到1989年初，50年以上党龄的有128050人，其中，1917年前入党的仅有30人，1917年入党的有230人，1918~1923年入党的有3825人，1924年为纪念列宁逝世入党的有1448人^①。

表4-5 苏共党员党龄

| 党龄 | 单位: % | | | |
|--------|-------|-------|-------|-------|
| | 1977年 | 1981年 | 1986年 | 1989年 |
| 5年及以下 | 15.7 | 17.2 | 16.7 | 15.5 |
| 6~10年 | 17.3 | 14.0 | 15.3 | 15.4 |
| 11~20年 | 34.3 | 33.5 | 25.6 | 24.6 |

^① Справочник партийного работника. 1989.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с. 596.

续表

| 党龄 | 1977年 | 1981年 | 1986年 | 1989年 |
|--------|-------|-------|-------|-------|
| 21~30年 | 14.1 | 16.7 | 23.5 | 25.0 |
| 31~50年 | 18.1 | 17.7 | 18.1 | 18.8 |
| 50年以上 | 0.5 | 0.9 | 0.8 | 0.7 |

注：数据截至各年1月1日。

资料来源：〔苏〕A. 彼特罗维切夫主编《党的建设》，郭华等译，求实出版社，1983，第89页；Справочник партийного работника. 1989.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с. 596。

到1990年以后，苏联青年被接收入党的人数急剧减少，共青团员加入党组织的比例突降。1991年切良宾斯克电力冶金公司党委书记A. И. 安德列耶娃总结党组织工作时说道：“1990年和1991年我们没有吸收一个青年入党，我们对青年已经失去吸引力。”“我们失去了一代青年。”^①1990年苏联社会情况对于这种现象的出现的的确有很大影响。不过，在党的宣传与基层党组织工作乏力等因素长期作用下，苏联青年的思想堤坝一触即溃。

此外，随着苏共党员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知识分子加入党组织的比例在增大，他们的作用也不可忽视。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苏共党员受教育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见表4-6），这对提高党员素质十分有利。不过，知识分子是一个思想活跃的群体，在他们中间做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需要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较强的说服力，反之则可能降低党员的“免疫力”。

表4-6 苏共党员教育程度

单位：%

| 时间 | 高等学校毕业 | 高等学校肄业 | 中学毕业 | 七年制学校毕业 | 小学毕业 | 未上过小学 |
|-------|--------|--------|------|---------|------|-------|
| 1927年 | 0.8 | — | 9.1 | — | 63.0 | 27.1 |
| 1941年 | 6.2 | 1.9 | 15.1 | 16.6 | 45.2 | 15.0 |
| 1952年 | 8.9 | 2.8 | 22.2 | 27.6 | 31.4 | 7.1 |
| 1956年 | 11.2 | 3.6 | 22.2 | 29.6 | 28.4 | 5.0 |
| 1961年 | 13.2 | 3.0 | 26.2 | 28.6 | 25.8 | 3.2 |

^① Трудные дни парткома (Круглый стол в Челябинске).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июни 1991. с. 57.

续表

| 时间 | 高等学校毕业 | 高等学校肄业 | 中学毕业 | 七年制学校毕业 | 小学毕业 | 未上过小学 |
|-------|--------|--------|------|---------|------|-------|
| 1966年 | 15.7 | 2.5 | 30.9 | 27.5 | 23.4 | — |
| 1971年 | 19.6 | 2.4 | 34.3 | 24.9 | 18.8 | — |
| 1976年 | 24.3 | 2.5 | 38.5 | 20.3 | 14.4 | — |
| 1977年 | 25.1 | 2.4 | 39.2 | 19.7 | 13.6 | — |
| 1981年 | 28.0 | 2.2 | 41.9 | 17.1 | 10.8 | — |
| 1986年 | 31.8 | 2.1 | 44.5 | 13.7 | 7.9 | — |
| 1989年 | 34.3 | 1.9 | 45.1 | 12.1 | 6.6 | — |

注：数据截至各年1月1日。

资料来源：〔苏〕A. 彼特罗维切夫主编《党的建设》，郭华等译，求实出版社，1983，第89页；Справочник партийного работника. 1989.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с. 596。

由于基层党组织的理论宣传和思想工作长期以来存在形式主义和教条化，缺乏说服力和影响力，反而降低了党的宣传力度。这样，党员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与思想工作中党的正面宣传影响力的降低形成了对比。到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中党员数量的增加不仅没有提升党的凝聚力，在关键时刻却造就了自己的对立面。一位俄罗斯作家曾在其作品中描述了这样的情形：1987年苏共提出要增加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在党员中所占比例，于是一大批科研人员和专家被突击吸收进入党的队伍。仅仅过去几年，在“8·19事件”之后，这些突击入党的技术人员马上宣布脱离党组织，甚至发起焚烧党证的活动^①。对于这样的情况，基层党组织已经没有任何能力阻止。如果说，多党制的实行给了基层党组织以致命一击，导致基层党组织陷入困境甚至瘫痪状态，那么在实行多党制前，苏共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就已经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漏洞和问题，在思想工作方面缺乏影响力，对于来自外部势力的思想冲击缺乏抵御能力，从而导致思想涣散。

（四）党员人身权利受到侵害的问题

在苏共90多年的历史中，曾经有过一些重大事件，其发生对国家、社会与民众生活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这些事件有的是正面的、有积

^① 参见〔俄〕尤·波里亚科夫《无望的逃离》，张建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第181~212页。

极作用的，如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卫国战争；有的则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消极影响，如农业集体化运动、“大清洗”。那些产生正面影响的事件曾经激励人们满怀热情地为建设国家、保卫国家而斗争，而那些起到负面作用的历史事件即便在一段时间被掩盖起来，最终还是要被揭开，在苏联后期则成为戈尔巴乔夫揭开历史“空白点”的主要内容。在揭开历史真面目的同时，当时人们所受到的迫害与不公正待遇被重新提起，对历史事实的揭示也就自然成为苏共领导人以及党自身“污点”的暴露过程。这个过程最早开始于赫鲁晓夫时期，高潮则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而在苏联解体之后，随着档案材料的公布，加上历史见证者的回忆，苏联历史上很多侵犯人身权利的事件曝光，“人权”问题越来越成为历史研究的焦点，如农业集体化中“消灭富农”，遍布全国产粮区的饥荒，对农民人身权利的伤害；从1936年开始，在1937~1938年达到高峰的“大清洗”；卫国战争前后对一些少数民族的强制迁徙；卫国战争后对犹太人的迫害；还有劳改营制度等，都成为苏共历史中的“污点”。而在这些事件中，基层党员受到的迫害，其人身权利受到的伤害，也是苏共历史中不应忽视的问题。

2014年，一本名为《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①的书被翻译成中文，书的作者是英国历史学家、俄罗斯历史专家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②，他也是《娜塔莎之舞：俄国文化史》、《俄罗斯革命：1891~1991》^③等专门研究俄罗斯文化与社会生活著作的作者。从2002年起，他用四年多的时间，用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对苏联历史的亲历者或者其后人进行了采访，并且收集了数百份家庭档案，包括信件、日记、回忆录以及照片、实物等，对从十月革命胜利后到1956年前后苏联的私人生活进行了描述。在他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十月革命胜利后那些“老布尔什维克”的家庭生活，以及新经济政策所造就的“耐普曼”的家庭生活。不过，作者的笔触重点在于揭示斯大林时期苏联普通人的生活，主要介绍了“极权制度受害者”的遭遇。他们中的一部分

① Orlando Figes,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 New York: Picador, 2008.

② 中文有时也翻译为菲格斯。

③ Orlando Figes, *Natasha's Dance, A Cultural History of Russia*. London: Allen Lane, 2002; Orlando Figes, *Revolutionary Russia, 1891-1991*. New York: Pelican, 2014.

人先是作为富农被强制迁移到“特殊定居地”，之后在与富农的斗争中被流放甚至被枪决。书中介绍了“大清洗”中的受迫害者，包括受迫害者本人及其家人的种种不幸遭遇；也介绍了各地劳改营中的悲惨生活，尽管在卫国战争中一些人“为保卫祖国而战”，精神境界有了提升，但是战后对犹太人的迫害再度掀起清洗之波。即便在斯大林逝世后，从贝利亚到赫鲁晓夫的平反活动，让一些受到迫害的人得以离开流放地或劳改营，返回家园，但他们已经不可能再重温从前的家庭生活。有的家庭已经被破坏得面目全非，有的家庭即便可以复原，但是心理的创伤却成为家人之间沟通的巨大障碍。作者用“耳语者”（Шепчущий, Шуптун）这样的词来形容那个人权受到侵害、自由表达权受到严重压制的时代。在那其中，除了因发家致富而变成了“特殊定居者”或者“富农”的农民外，在政治清洗中受到镇压的，很大一部分是各级党员和干部，从他们的经历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那些时期党员的生活与思想。

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中，受到政治迫害的多半是各个层次的党员及其家人。费吉斯在讲述“波及每一级党组织、苏维埃机构和社会各界”的大恐怖时，特地举出了党员的数字：“据估计，从1937年到1938年，遭到处决或者监禁的党员有116885人。”^①“从1937年到1938年，许多人消失，特别是在都市的党和知识分子里时有发生。”^②这种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本身已经严重违反了党的原则，但是，很多布尔什维克即便有可以出逃的机会也不会离开，哪怕知道自己将被捕，也不愿出逃。“他们中的大多数接受党在思想上的灌输。向党证明自己清白的深层次渴望，很容易抵消任何试图抵制的想法。”“还有其他布尔什维克……明明知道自己是无辜的，如果党有需要，他们也愿意承认对他们的指控。”^③他们不仅自己遭受了清洗，还牵累了家人：家里的成年人被流放，孩子被强制送往孤儿院。但是，即便经受了巨大苦难，很多党员也没有改变信仰。对他们而言，被开除党籍就等于失去了政治生命。当

① [英] 奥兰多·费吉斯：《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第251页。

② [英] 奥兰多·费吉斯：《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第254页。

③ [英] 奥兰多·费吉斯：《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第256~257页。

他们在得到释放时，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请求恢复党籍。正因为如此，在斯大林逝世后，苏共出现了大规模的平反活动，其中，给党员恢复党籍是一项重要工作。

在苏共党章中，对党员的权利、基层党组织对上级领导部门及党的领导干部的监督有明确的规定。在几十年的执政过程中，苏共党内也建立起一些沟通渠道，使党员可以反映他们遇到的情况，比如通过给各级机关部门写信、上访、要求组织调查等，通过组织渠道来解决问题。客观地说，自赫鲁晓夫执政以后，苏共大规模迫害党员的举动基本不再发生，但是在基层党组织内，个别党员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却没有间断。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这些来信来访所提出或反映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折射出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共产党员》杂志是苏共中央主办的一份以党员领导干部为读者的重要杂志，其登载的文章多与党建中的重大问题相关。这个杂志经常收到基层党员的来信，还有一些不能登载的文章，都作为档案材料保存下来。从那些未能登出的文章与信件中，可以看出一些党员的思想状况。对于这些信件的答复和处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党的宣传机关对党员干部的思想影响。

1981年，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首府马哈奇卡拉市的一位党员、副教授写信给《共产党员》杂志编辑部，反映她在工作中受到打击报复的情况：

我叫杰米尔别科娃·玛丽萨·杰米尔别科夫娜，父亲曾是加盟共和国共青团组织者，家中的姐妹也是共青团干部，他们在卫国战争中都牺牲了。我的不间断工龄是35年，长期从事共青团工作，曾任《达吉斯坦共青团员报》主编，州党委会讲演者。1968年取得副博士学位后，我到达吉斯坦国立师范学院哲学与科学共产主义教研室工作，已经有13年，是副教授。在从1973年起的5年里，我承担了大量科研工作，在《党的生活》《政策自学》《鼓动员》《消息报》《农村生活》等报刊上发表过文章。我还担任了一些社会工作。

1980年我得了高血压。在养病期间，教研室主任库尔巴诺夫借口没有人代替我，建议我离开工作岗位。我不想离职，也不想请假。

但是我的病加重了，多次叫急救车，还晕倒在工作岗位上。他们决定利用我的病情，强迫我离开工作岗位。理由是我多次因病耽误了讨论课，或者在发病后不得不离开教室，不能听取学生们的报告。他们告诉我说，研究室已经讨论过了，认为他们不需要一个病号，就宣布停止我的工作。而实际上我已经在这个系里工作了10年。

后来，他们找借口把我送进精神病院，我在那里待了一个半月，其间我实际上已经被停职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要把我打发得远点。我现在才明白原因：当官的对我以前提出的批评意见不满，要报复我。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止一次地向校长和研究室主任汇报和申诉，请求他们让我工作。因为在此之前校长已经下了命令，我从1981年7月1日起就被解职，停发工资。我准备博士学位论文很多年了，并且已经完成了80%，现在也被迫放下了。

现在，我请求组织给予帮助，恢复原来的工作，在我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后，解决我晋升高级职称的问题，同时返还给我停发的工资。

编辑部在收到信后，将她的信件转给了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党的书记科洛宾尼科夫，请他过问并解决她的工作安置问题，并要求“把结果告知作者本人以及编辑部”^①。

这位高校副教授、副博士仅仅因病就被解除了工作职务。她的申诉信反映出党的基层干部对知识分子缺乏应有的尊重，而不经劳动仲裁部门的审理就解除工作关系，也是超越基层干部行政权限的行为。但是，这样的事情需要到《共产党员》杂志来申诉，还要通过自治共和国党的书记亲自过问才有可能解决，也反映出当时党员群众维权之难。

以下是一组有关基层干部腐败以及违法乱纪行为的“举报信”。

从1981年6月17日到1982年4月，新罗西斯克市的党员、克拉斯诺达尔“渔业集体经济联盟”跨农庄基地捕捞船队“伊万·博贡”号动力船工艺师基谢廖夫先后三次给《共产党员》杂志写信，对自己因举报

^①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769. Л. 9 - 13.

本单位领导遭到报复、被开除党籍的情况进行申诉^①。在第一批信件中，基谢廖夫对整个事件的原因及发展情况做了介绍。

他在1981年10月3日的信中写道：

我们的船长菲尔索夫从一开始说觉得自己是“领主”，是他所领导的企业的主人。他经常这样说“我的船”，“我——就是主人”。这位船长包庇电工潘琴科，在工余时间兼职，还允许技师切尔诺祖宾科把船开到别的港口不管，回家做自己的第二职业。而副船长维诺格拉多夫也有第二职业，在船上值班。他晚上在船上酗酒，然后把船扔在码头，自己去城里，再回来已经是第二天午饭时，甚至这时酒还没有完全醒。他们的行为给其他船员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

菲尔索夫坚持这样的信条：个人利益高于一切！他毫不掩饰自己的信念，总是重复着自己的信条：“守规矩的人已经没有了！每个人都努力地给自己多吃点，使自己更肥壮一些！”

我认识菲尔索夫已经有10年了。我们俩共同的熟人上百人。多数时候他们谈到菲尔索夫时会说他“一无是处”，总体上对他的评价明显是负面的。这是他自己造成的。不过，他的负面影响不仅如此，当一个虽然级别不高的官员散播下了不善良的东西后，恶的种子不是长在自己的田地里，而是播向社会，它的苦果要集体承受，总体上是要社会承受。

这样的行为与苏共党章和我们国家的法律是背道而驰的，他们秉承的是与我们不同的思想和道德。因此，我们不断地请求你们进行党内调查，制止这种放肆行为。我们坚定地相信：像菲尔索夫这样的人不应该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也不应当担任集体的领头者。

基谢廖夫在1982年4月22日给《共产党员》杂志的公开信中写道：

这是我第三次陈述。原来的问题现在更严重了，我没有等来它的正确解决，我的几百个同事，党内的、苏维埃中的、社会上的和

^①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804. Л. 10 - 14.

生产工作中的同事也没有等来答复。他们对我被开除党籍感到很难过，也不能理解。我从内心讲，也感到不公正。让我们更感到遗憾的是，地方党的机关坚持的完全是另一种立场……

苏共党章指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敢于公开缺点并努力战胜它们，同骄傲自大的行为斗争，同盲目乐观、地方主义斗争，对各种试图压制批评的人予以坚决回击，起来反对各种损害党和国家利益的行为，把它们通报党组织，直至苏共中央。”“关注各种问题，向党的各级机关直至苏共中央委员会反映并建议，要求回答，是自己的本职。”而现在我反映了问题，得到的答复却是沉默，或者是书面回答，没有实质性解决办法。为了寻找正义，我这个共产党员还要一次又一次地寻找帮助。

区党委员会应该通过基层党组织了解有关党员个人事务的详细材料。而事实上不是这样——根本没有！有的只是一个没有任何根据的空洞的决定。让我们更感到羞耻的是，区党委会居然把这个“个别事件”列入了调查范围，要调查“诽谤共产党员和基层领导”的行为。

基谢廖夫最后补充道：

今年（1982年）4月15日我被从工作岗位上赶了下来，还被开除党籍。我们全家人只靠妻子一个人的工资——80卢布生活。不过，你们一定知道，在我的党籍没有得到恢复时，我不可能离开这个集体。

第二封信是基谢廖夫的同事福明在1981年9月16日写的，也是举报船长菲尔索夫^①。信中说：

从1980年初开始，船长就把船送去大修。已经超过了一个月的大修期，船长还要继续大修。原因是：“这样的话船长什么都不用做

^①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804. Л. 15 - 16.

了……船长感兴趣的，不在于鱼汛期要捕捞和加工水产品，而是关心怎样从船的维修中为自己捞到好处。”这不仅是他的“坚定信仰”，也是他的生活目的。为此，船长不择手段。例如，他谎称为修理渔船支付了1000卢布，而实际上只用了300卢布。他还谎称发给机器部件刷漆工1000卢布，实际上一个戈比都没有支付给干活的人。

这些“花招”都是有人给他帮忙的：第二机械师切尔诺祖宾科和船长助理维诺格拉多夫。他们帮助船长贪污钱款，自己也从中捞好处：维诺格拉多夫通过倒卖伏特加给渔民赚钱——他根据船长的命令，把“俄国伏特加”放到自己的船舱里，在鱼汛期卖给出海的渔民。此外，在我们的船上还有其他秘密。甚至领工资都是“暗中”进行的。每个人只能看见工资条上自己名字的部分，谁知道这里还有多少把戏？此外，船长的行为还给集体造成了诸多不正常状况，比如，在给工作人员分配船舱时，会区分“自己人”和“下人”，他还会使出其他鬼主意。

列宁在著作中说：“党是我们时代的智慧、尊严和良心。”但是看看我们的领导和他们的“培养人”做出的这些下作举动，你在他的身上找不到一丁点党员的品质。他们在工作中的聪明智慧就是为自己谋利……我认为，像菲尔索夫这样的人配不上共产党员的称号，也不适合担任集体领导。我请求你们撤换他并解决船上的问题。

第三封也是证明信，是渔轮高级技师西尊采夫1981年12月24日写给苏共十月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别兹肖可夫的^①。西尊采夫给基谢廖夫和菲尔索夫的关系做证明：

我从基谢廖夫在开始工作当初级工时就认识他，当时我是高级技师，后来他到“伊万·博贡”号动力船上工作。我对他一点不好的印象都没有，他是一个很好的同志。而我对菲尔索夫的印象很不好。我在船上工作了22年，还没有遇到像菲尔索夫这样的船长，他

^① В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804. Л. 17 - 18.

不让别人在船上吃饭，十分专横和没有人性。菲尔索夫这个人思维总是病态的、很矛盾的……在船上人为制造不健康的环境……他有自己喜欢的人，这些人被称为“菲尔索夫的看家人”。船队工作了一年半，而船员却换了两批半，因为早前被安排在菲尔索夫领导下工作的人，后来都拒绝到船上工作。

第四封信是一份声明，是基谢廖夫的同事米哈林科 1981 年 12 月 27 日写给苏共十月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别兹肖可夫的^①。信中写道：

当知道基谢廖夫被开除党籍后，我就决定必须要写这封信。我和他在前后两个船上一起工作过，我知道他是一个聪明的、懂技术的、机灵的、乐于助人的人，他很正派。要我说，这样的人才算共产党员。

在这里我还要说说我们的党组织。在“伊万·博贡”号动力船上的党的集体，相互关系紧张，十分不健康。这里的很多事情都起因于菲尔索夫船长。他是一个傲慢的人，不跟大家一起吃饭，轻蔑地对待所有船员。正是他们导致船上的船员不停地流动。他还擅自降低船员的待遇。

我请求组织客观地对待这件事。

第五封信还是一份声明，是一位马达工约尔图霍夫斯基 1981 年 12 月 28 日写给苏共十月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别兹肖可夫的^②。他写道：

得知基谢廖夫的事情后，我决定给您——第一书记写信。我想跟您说的是，我从 1974 年起就跟基谢廖夫共事，在一个班组。他是捕鱼能手，我们的那个集体是一个很好的集体。基谢廖夫是一个善于做思想工作的人，我们的班组在他带领下成为船上的优胜班组。他还是一个非常爱家的人。

①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804. Л. 19 - 20.

②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804. Л. 21.

我们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党员。

第六封信是新罗西斯克市另一位党员谢苗诺夫 1982 年 1 月 3 日写给苏共十月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别兹肖可夫的，也是为基谢廖夫鸣不平的^①。他说，他之所以写这封信，就是为了他的朋友基谢廖夫的事情：

基谢廖夫处于“困难的、艰难的时刻”。听说他被开除党籍，这简直令人不能相信，以至于找不到一个词能表达我得知内幕时的感觉。难道我们——共产党员能够容忍这样为所欲为，以如此歪曲真相的解释，放纵地乃至肆意放纵地臆想的官僚主义者，以令人十分厌恶的阿谀奉承者的身份做出这样的事情？

我与基谢廖夫在很多地方共事过。我过去认为，现在也认为，他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家庭里，在做任何事的时候，都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样子。他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榜样。请您相信，基谢廖夫是一个坦诚的、有自制力的人，一个守规矩的人，最谦虚的人。此外，基谢廖夫还是一个时刻都想要帮助别人的人。不久前我与他一起在《新罗西斯克工人报》工作过，他的表现还是一个出色的记者。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个记者，强烈要求您关注并仔细分析这一事件。还请求您认真阅读与这一事件有关的全部材料。我已经明白，党的会议做出将基谢廖夫开除出党的队伍的决定是非常不认真的，这是根据少数人口头指令的行动，不是多数人的意愿，他们采取的立场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

亲爱的同志，请听听我的心声！不要允许迫害行为。我期待着，也相信您的高尚人格与诚意。

第七封信是船员康德拉绍夫 1982 年 1 月 4 日写给苏共十月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别兹肖可夫的^②。他在信中也写道：

①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804. Л. 22.

②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804. Л. 23.

得知基谢廖夫被开除党籍，我想说：我跟他共事两年半，我知道，他在集体中很合群，同其他船员相处总是平等和充满善意的。日常的他谦逊、洁身自好、忠诚于家庭。在工作中他很好地掌握了专业技能。因此，菲尔索夫船长对基谢廖夫的态度非常不公平。当船在租赁时期，菲尔索夫也像对基谢廖夫一样，扣下了我和其他人的工资。由于他的错误做法，“伊万·博贡”号船处于不健康状态。人们……拒绝跟他共事，因为在他眼里所有的人都是错的。他还把5箱伏特加放在他的船舱里，卖掉它们，收取现金……而船员们仍对他充满善意。这件事发生在1980年1月初的捕捞期。我认为这样的举动玷污了船长的共产党员称号。

第八封信是一位船员波波夫1982年1月5日写给苏共十月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别兹肖可夫的^①。他也是谈基谢廖夫被开除党籍的事情。他认为，基谢廖夫是一个好同事，工作很专业，也很合群，因此船长对他的态度很不公正：

船长菲尔索夫经常侮辱基谢廖夫，赶他下船，朝他扔面包，给船上的厨师下令不给基谢廖夫饭吃，克扣他的工资，取消他的奖金。船长还让人拿来伏特加放在自己的船舱里，然后在鱼汛期卖给渔民。我自己也不止一次从他那里买酒。

“伊万·博贡”号船上气氛很不好，在一年半时间里换了三批船员，谁都不愿意跟菲尔索夫船长一起工作。如果干部处指令谁到这个船上工作，那个人肯定不愿意来，哪怕是被迫丢了工作，甚至还有人为此干脆辞职。

因此，我认为，船长开除基谢廖夫党籍不公正。同时我也认为，应该调查船长的那些行为，要求船长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第九封信是高级经济师季莫菲耶娃1982年2月10日写给苏共十月

^①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804. Л. 24.

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别兹肖可夫的^①。她在信中也说自己对基谢廖夫被开除党籍很不理解：

对于基谢廖夫被开除党籍，谁都不能给我一个可以理解并接受的答复。船上的氛围很不好，人们钩心斗角。

另外，她还在1981年12月4日给渔业集体经济联盟主席切勃塔廖夫写了一份声明，说明她自己的工资待遇与本人所做工作不符合，因为船队在发放奖金的时候，她的名字被排除在名单之外。她还说明，自己已经担任了高级经济师的职务，还兼任高级监察员的工作，但是给她的工资却不公正。她请求予以解释。在自己所受的不公正待遇问题上，她要求船长向她道歉。

第十封信是热金娜1982年2月28日写给苏共十月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别兹肖可夫的声明信^②。当她得知基谢廖夫被开除党籍，就要写这样一份声明。她是船上的厨师，跟基谢廖夫一起在船上工作，对后者的印象是“除了好的东西，说不出不好听的话来”。她讲述了在船上船长和主管后勤的维诺格拉多夫如何克扣船员的食品，如何不平等地对待船员的事。最后他说：

我给您写信，就是希望您知道，一个诚实的人是因为什么过错被开除党籍。如果不把那些人赶走，那才是对党的侮辱。如果您想了解详情，我可以随时回答。

第十一封信是基谢廖夫1982年2月22日写的一封继续反映问题的“补充的公开信”^③。这一次把船长贪污腐败克扣船员工资福利等事情理得更清楚，说得更详尽。他举出了13件事情的时间、地点、人物、过程，都与船长的为所欲为和贪污腐败相关。最后他得出结论：

①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804. Л. 25 - 28.

②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804. Л. 29.

③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804. Л. 30 - 41.

把我开除党籍，却又根本没有我本人的“罪状”。这是他的私刑，是对我的迫害。

现在我从党的原则追问：谁是这些肮脏的阴谋，恶毒的诽谤者，以及敌视人类的行为的发起人？——菲尔索夫！而在这里谁在支持他？行政部门。谁又该为严格的党纪承担责任？——菲尔索夫！但是谁被开除党籍？——基谢廖夫！这就是你们所说的真理吗？

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发生？——由于那些领导！正是那些领导示意下面的党委会保持沉默，并且导致没有一个党的机构接待我们，还回避我们……在对党员进行公开迫害的同时，那些人还有“赫列斯塔科夫”^①这样的人在追随、在吹捧……所有一切都是一致的。在这种时刻他们想的，并不是他们的行为玷污了党的荣誉、党的列宁中央委员会的荣誉，因为在使用这种私刑和个人意志的时候，他们正是以这个最高机构的名义——苏共中央来进行的！

我坚决要求党调查这个党员。

到目前，我的心还在跳动——这是为列宁的精神而活的。只要基谢廖夫活着，就还是共产党员！

下面还有他在1982年3月11日、14日、16日写的三份声明^②。他要求基层党组织解决自己被开除党籍的问题。他从党的原则、法律角度、国家原则几个方面申明了自己的权利和理由。

这份由十几封申诉、声明、证明、解释的信件，或是写给个人或是以公开信形式组成的上访材料几乎占据了一个卷宗。这样多的材料不能不引发每一个读者的关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个船长“惹”出了一大堆举报信？可以理清的事实是，这个船长把集体的船当成自己的“自留地”，以大修或者购买配件的名义从国家套钱，克扣船员工资，在船上为所欲为，拉帮结派，压制群众意见，引发了诸多不满情绪。船上的技

① 赫列斯塔科夫（Хлестаков）是小说《钦差大臣》中主人公的名字，是一个“吹牛大王”。

② В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804. Л. 42 - 46.

师在得到多人反映的情况后，向报社检举他，就招来报复：不给饭吃，扣发工资，甚至被开除党籍，解除工作关系。而这样的船长还得到了上级部门明里暗里的包庇和支持……这种公然违背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的行为，屡次举报都得不到惩罚，当事人只好反映到《共产党员》杂志，并举出了“一大帮”证人的证言。到这时，那些证人的目的已经不仅仅是对船长的做法予以处罚，更主要的是申请为技师基谢廖夫“恢复党籍”“恢复工作”。

从上述信件中可以看出，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苏共基层党员在生活中会遇到一些损伤个人利益甚至人身权利的事。但即便受到基层干部的不公正对待，很多党员还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要求自己。在很多申诉信中，都有这样的字样：“某某，苏共党员，某年入党”。他们以党员的身份向党组织提问，但是出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党的组织尤其是基层组织在倾听群众意见、保护群众的权益方面所做的工作并不是很周全和完善的，甚至有些党的基层干部自己就由于违背党的原则而引发很多不满和意见。

作为苏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共产党员》杂志是党员学习党的决议、领会党的政策的重要读本。不过，除了登载苏共中央的决议以及一些理论文章之外，这个杂志还要受理基层党员的来信来访，予以答复或者转交相关部门处理。从 1981 ~ 1986 年《共产党员》杂志的来信来访情况，可以窥见当时群众所关心的一些问题（见表 4-7、表 4-8、表 4-9、表 4-10、表 4-11 和表 4-12）。

表 4-7 1981 年劳动者给《共产党员》杂志编辑部发来的
信件、申诉、声明及处理情况

单位：件

| 项目 | 1月 | 2月 | 3月 | 4月 | 5月 | 6月 | 7月 | 8月 | 9月 | 10月 | 11月 | 12月 |
|-----------------|-----|-----|-----|-----|-----|-----|-----|-----|-----|-----|-----|-----|
| 当月收到信件总数 | 267 | 306 | 182 | 360 | 207 | 189 | 182 | 131 | 195 | 196 | 176 | 209 |
| 给苏共 26 大的信件 | 22 | 36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来的各类稿件 | 43 | 43 | 33 | 57 | 40 | 36 | 49 | 19 | 33 | 32 | 30 | 39 |
| 对杂志刊发文章 表达意见 | 73 | 112 | 34 | 87 | 44 | 49 | 28 | 40 | 63 | 35 | 43 | 35 |

续表

| 项目 | 1月 | 2月 | 3月 | 4月 | 5月 | 6月 | 7月 | 8月 | 9月 | 10月 | 11月 | 12月 |
|------------------|----|----|----|-----|----|----|----|----|----|-----|-----|-----|
| 组织—党务问题 | 14 | 14 | 13 | 18 | 13 | 11 | 10 | 4 | 7 | 8 | 9 | 13 |
| 理论和政策问题 | 8 | 20 | 9 | 24 | 11 | 14 | 11 | 8 | 14 | 12 | 9 | 10 |
| 读者建议 | 9 | 14 | 3 | 10 | 7 | 5 | 5 | 5 | 10 | 7 | 6 | 17 |
| 申诉和声明 | 98 | 65 | 75 | 145 | 80 | 81 | 79 | 57 | 98 | 89 | 80 | 91 |
| 住房事务 | 16 | 13 | 12 | 24 | 11 | 24 | 15 | 13 | 17 | 18 | 15 | 22 |
| 就业安置和劳动纠纷 | 8 | 8 | 6 | 13 | 9 | 9 | 7 | 6 | 7 | 7 | 9 | 11 |
| 养老金问题、社会保障、残疾人就业 | 7 | 5 | 2 | 5 | 2 | 1 | 9 | 4 | 9 | 3 | 4 | 11 |
| 有关舞弊及对领导不满 | 16 | 10 | 13 | 23 | 10 | 10 | 7 | 6 | 19 | 12 | 12 | 12 |
| 迫害批评者 | 5 | 2 | 3 | 9 | 3 | 3 | 5 | 2 | 2 | 3 | 8 | 3 |
| 打官腔、拖延情况调查 | 6 | 4 | 5 | 5 | 5 | 5 | 3 | 2 | 2 | 4 | 4 | 2 |
| 其他 | 40 | 38 | 34 | 66 | 40 | 29 | 33 | 24 | 42 | 42 | 28 | 30 |
| 匿名信 | 9 | 9 | 13 | 14 | 4 | 6 | 6 | 6 | 16 | 17 | 11 | 8 |
| 通过编辑部给组织的信 | 52 | 28 | 60 | 90 | 47 | 54 | 41 | 32 | 46 | 54 | 33 | 39 |
| 信件内容得到调查核实 | 24 | 18 | 36 | 41 | 21 | 33 | 20 | 25 | 31 | 27 | 16 | 27 |
| 信件申诉得到组织回复 | 33 | 25 | 38 | 11 | 25 | 20 | 33 | 16 | 34 | 31 | 29 | 32 |

资料来源：根据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769. Л. 3 - 39 的统计数据整理。

表 4-8 1982 年劳动者给《共产党员》杂志编辑部发来的信件、申诉、声明及处理情况

单位：件

| 项目 | 1月 | 2月 | 3月 | 4月 | 5月 | 6月 | 7月 | 8月 | 9月 | 10月 | 11月 | 12月 |
|-------------|-----|-----|-----|-----|-----|-----|-----|-----|-----|-----|-----|-----|
| 当月收到信件总数 | 267 | 202 | 214 | 255 | 201 | 174 | 169 | 185 | 152 | 201 | 191 | 181 |
| 发来的各类稿件 | 46 | 39 | 41 | 35 | 21 | 33 | 35 | 44 | 25 | 34 | 35 | 47 |
| 对杂志刊发文章表达意见 | 25 | 40 | 33 | 53 | 45 | 36 | 40 | 26 | 25 | 41 | 23 | 37 |
| 组织—党务问题 | 13 | 17 | 14 | 10 | 12 | 6 | 6 | 6 | 6 | 16 | 11 | 12 |

续表

| 项目 | 1月 | 2月 | 3月 | 4月 | 5月 | 6月 | 7月 | 8月 | 9月 | 10月 | 11月 | 12月 |
|------------------|-----|----|-----|-----|-----|----|----|----|----|-----|-----|-----|
| 理论和政策问题 | 10 | 4 | 7 | 15 | 7 | 5 | 11 | 8 | 6 | 9 | 11 | 9 |
| 读者建议 | 12 | 9 | 3 | 11 | 6 | 3 | 6 | 5 | 6 | 10 | 7 | 2 |
| 申诉和声明 | 110 | 93 | 116 | 131 | 110 | 91 | 69 | 95 | 84 | 91 | 104 | 74 |
| 住房事务 | 24 | 23 | 24 | 21 | 15 | 20 | 12 | 15 | 11 | 15 | 25 | 20 |
| 就业安置和劳动纠纷 | 9 | 7 | 17 | 18 | 9 | 8 | 3 | 8 | 5 | 8 | 17 | 7 |
| 养老金问题、社会保障、残疾人就业 | 4 | 3 | 8 | 4 | 4 | 3 | 3 | 6 | 3 | 3 | 4 | 1 |
| 有关舞弊及对领导不满 | 11 | 14 | 14 | 17 | 21 | 11 | 9 | 13 | 12 | 22 | 23 | 10 |
| 迫害批评者 | 2 | 3 | 3 | 5 | 2 | 5 | 2 | 1 | 2 | - | - | 1 |
| 打官腔、拖延情况调查 | 8 | 4 | 3 | 2 | 2 | 4 | 2 | - | - | - | 2 | - |
| 其他 | 52 | 39 | 47 | 64 | 57 | 40 | 38 | 52 | 51 | 43 | 33 | 35 |
| 匿名信 | 14 | 7 | 11 | 14 | 9 | 7 | 7 | 13 | 12 | 8 | 6 | 4 |
| 通过编辑部给组织的信 | 45 | 50 | 45 | 54 | 46 | 50 | 48 | 47 | 40 | 45 | 49 | 45 |
| 信件内容得到调查核实 | 26 | 18 | 25 | 30 | 24 | 30 | 7 | 24 | 23 | 21 | 23 | 25 |
| 信件申诉得到组织回复 | 20 | 35 | 36 | 30 | 28 | 35 | 30 | 47 | 28 | 28 | 36 | 23 |

资料来源：根据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1061. Л. 143 - 118 的统计数据整理。

表 4-9 1983 年劳动者给《共产党员》杂志编辑部发来的信件、申诉、声明及处理情况

单位：件

| 项目 | 1月 | 2月 | 3月 | 4月 | 5月 | 6月 | 7月 | 8月 | 9月 | 10月 | 11月 | 12月 |
|--------------|-----|-----|-----|-----|-----|-----|-----|-----|-----|-----|-----|-----|
| 当月收到的信件总数 | 231 | 178 | 311 | 205 | 183 | 169 | 195 | 147 | 138 | 167 | 131 | 167 |
| 发来的各类稿件 | 46 | 38 | 49 | 55 | 40 | 34 | 37 | 37 | 43 | 46 | 32 | 52 |
| 马克思—列宁理论发展 | 7 | 11 | 10 | 10 | 11 | 13 | 15 | 8 | 11 | 12 | 9 | 13 |
| 党和国家对国民经济的领导 | 9 | 16 | 18 | 28 | 17 | 12 | 9 | 9 | 13 | 8 | 11 | 16 |

续表

| 项目 | 1月 | 2月 | 3月 | 4月 | 5月 | 6月 | 7月 | 8月 | 9月 | 10月 | 11月 | 12月 |
|----------------|----|----|-----|----|----|----|----|----|----|-----|-----|-----|
| 意识形态、共产主义教育 | 4 | 9 | 11 | 11 | 9 | 5 | 11 | 11 | 6 | 20 | 10 | 16 |
| 完善苏联生活方式 | 2 | - | 9 | 5 | 2 | 3 | 2 | 9 | 10 | 3 | 2 | 5 |
| 自然—科学论题 | | 2 | 1 | 1 | 1 | 1 | - | 2 | 3 | 3 | - | 2 |
| 对杂志刊发文章的意见 | 50 | 35 | 87 | 38 | 39 | 39 | 50 | 29 | 30 | 37 | 32 | 30 |
| 正面的 | 31 | 29 | 74* | 29 | 31 | 25 | 39 | 20 | 24 | 32 | 23 | 17 |
| 反面的 | 7 | 2 | 2 | 2 | 2 | 8 | 5 | 1 | 1 | 4 | 7 | 7 |
| 尚存争议的 | 12 | 4 | 17 | 7 | 6 | 6 | 6 | 8 | 5 | 1 | 2 | 6 |
| 读者的问题 | 72 | 39 | 62 | 38 | 30 | 31 | 37 | 38 | 22 | 32 | 25 | 31 |
| 理论—政策问题 | 45 | 20 | 28 | 13 | 7 | 5 | 9 | 18 | 9 | 13 | 9 | 12 |
| 组织—党务问题 | 17 | 15 | 23 | 17 | 15 | 15 | 22 | 13 | 10 | 15 | 11 | 16 |
| 国际问题 | 3 | - | 5 | 2 | 3 | 2 | - | - | 2 | - | 1 | 1 |
| 查询发来的材料 | 7 | 4 | 6 | 6 | 5 | 9 | 6 | 7 | 1 | 4 | 4 | 2 |
| 读者建议 | 2 | 4 | 6 | 3 | 6 | 2 | 5 | 3 | 1 | - | - | 1 |
| 申诉和声明 | 85 | 62 | 107 | 71 | 68 | 63 | 66 | 39 | 41 | 52 | 42 | 54 |
| 住房事务 | 16 | 21 | 17 | 17 | 8 | 9 | 8 | 7 | 13 | 11 | 5 | 7 |
| 就业安置和劳动纠纷 | 9 | 6 | 7 | 8 | 5 | 8 | 7 | 3 | 4 | 6 | 3 | 3 |
| 养老金、社会保障、残疾人就业 | 5 | 4 | 3 | 3 | 1 | 2 | 3 | 3 | 1 | 1 | 1 | 1 |
| 有关舞弊及对领导不满 | 21 | 12 | 27 | 12 | 12 | 10 | 9 | 2 | 6 | 6 | 7 | 12 |
| 人权保护机构的工作 | 13 | 4 | 18 | 8 | 9 | 7 | 7 | 4 | 1 | 9 | 9 | 10 |
| 迫害批评者 | 5 | 1 | 3 | 2 | 3 | 2 | 4 | 6 | 1 | 2 | 5 | 6 |
| 官僚主义拖拉作风 | - | - | 4 | 3 | 1 | - | 2 | 3 | 2 | 5 | 2 | 6 |
| 苏共党员资格再审 | - | 1 | 1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他 | 16 | 13 | 31 | 18 | 29 | 25 | 26 | 11 | 13 | 12 | 10 | 9 |
| 匿名信件 | 6 | 3 | 11 | 6 | 1 | 6 | 4 | 1 | 1 | - | 1 | 1 |
| 通过编辑部给组织的信 | 57 | 53 | 67 | 54 | 44 | 32 | 44 | 25 | 23 | 32 | 24 | 29 |

续表

| 项目 | 1月 | 2月 | 3月 | 4月 | 5月 | 6月 | 7月 | 8月 | 9月 | 10月 | 11月 | 12月 |
|------------|----|----|----|----|----|----|----|----|----|-----|-----|-----|
| 信件内容得到调查核实 | 30 | 25 | 30 | 35 | 22 | 26 | 22 | 15 | 5 | 19 | 18 | 15 |
| 信件申诉得到组织回复 | 42 | 28 | 35 | 43 | 40 | 30 | 28 | 30 | 17 | 19 | 24 | 21 |

* 在这部分文章中，安德罗波夫（Ю. В. Андропов）的“关于卡尔·马克思的学说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若干问题”的文章有19篇；А. 沙霍夫的“光明与面包”的文章有18篇。

资料来源：根据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1061. Л. 108 - 142 的统计数据整理。

表 4-10 1984 年劳动者给《共产党员》杂志编辑部发来的信件、申诉、声明及处理情况

单位：件

| 项目 | 1月 | 2月 | 3月 | 4月 | 5月 | 6月 | 7月 | 8月 | 9月 | 10月 | 11月 | 12月 |
|--------------|-----|-----|-----|-----|-----|-----|-----|-----|-----|-----|-----|-----|
| 当月收到的信件总数 | 175 | 175 | 171 | 196 | 177 | 205 | 210 | 145 | 124 | 195 | 202 | 321 |
| 发来的各类稿件 | 46 | 55 | 60 | 54 | 52 | 61 | 51 | 35 | 32 | 44 | 48 | 43 |
| 马克思—列宁理论发展 | 13 | 11 | 16 | 10 | 13 | 17 | 28 | 11 | 10 | 14 | 15 | 14 |
| 党和国家对国民经济的领导 | 5 | 14 | 10 | 13 | 18 | 23 | 8 | 10 | 7 | 8 | 9 | 13 |
| 意识形态、共产主义教育 | 12 | 8 | 7 | 10 | 6 | 11 | 10 | 7 | 11 | 18 | 12 | 11 |
| 完善苏联生活方式 | 10 | 20 | 25 | 19 | 10 | 8 | 3 | 2 | 3 | 4 | 7 | 4 |
| 自然—科学论题 | 6 | 2 | 2 | 2 | 5 | 2 | 2 | 5 | 1 | - | 5 | 1 |
| 对杂志刊发文章的意见 | 27 | 15 | 24 | 24 | 25 | 21 | 30 | 22 | 13 | 22 | 27 | 29 |
| 正面的 | 1 | 6 | 15 | 17 | 13 | 15 | 11 | 9 | 5 | 10 | 13 | 15 |
| 反面的 | 9 | 2 | 3 | 1 | - | 1 | 2 | 4 | 1 | 2 | 3 | 3 |
| 尚存争议的 | 17 | 7 | 6 | 6 | 12 | 5 | 17 | 9 | 7 | 10 | 11 | 11 |
| 读者的问题 | 44 | 28 | 42 | 45 | 36 | 42 | 40 | 25 | 19 | 42 | 37 | 49 |
| 理论—政策问题 | 22 | 14 | 21 | 16 | 8 | 12 | 16 | 10 | 10 | 20 | 16 | 20 |
| 组织—党务问题 | 15 | 10 | 15 | 21 | 18 | 19 | 11 | 11 | 7 | 14 | 16 | 23 |
| 国际问题 | 1 | - | - | 1 | 6 | 5 | 2 | 1 | 2 | 2 | 1 | 4 |
| 查询发来的材料 | 6 | 4 | 6 | 7 | 4 | 6 | 11 | 3 | - | 6 | 4 | 2 |
| 读者建议 | 3 | 5 | 4 | 5 | 10 | 4 | 2 | 4 | 6 | 2 | 7 | 5 |

续表

| 项目 | 1月 | 2月 | 3月 | 4月 | 5月 | 6月 | 7月 | 8月 | 9月 | 10月 | 11月 | 12月 |
|------------------|-----|-----|-----|-----|----|-----|----|-----|----|-----|-----|-----|
| 发来的各类稿件 | 52 | 43 | 58 | 55 | 38 | 68 | 51 | 46 | 36 | 59 | 42 | 48 |
| 马克思—列宁理论发展 | 11 | 19 | 20 | 21 | 3 | 20 | 28 | 5 | 9 | 12 | 8 | 8 |
| 党和国家对国民经济的领导 | 18 | 11 | 12 | 10 | 16 | 29 | 8 | 20 | 17 | 32 | 17 | 16 |
| 意识形态、共产主义教育 | 14 | 7 | 10 | 12 | 10 | 14 | 10 | 19 | 8 | 8 | 9 | 14 |
| 完善苏联生活方式 | 1 | 1 | 5 | 5 | 1 | 3 | 3 | 1 | 1 | 3 | 4 | 4 |
| 自然—科学论题 | 8 | 5 | 11 | 7 | 8 | 2 | 2 | 1 | 1 | 1 | 4 | 5 |
| 就党纲和党章的建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对杂志刊发文章的意见 | 53 | 44 | 49 | 39 | 34 | 24 | 30 | 26 | 20 | 48 | 48 | 20 |
| 正面的 | 31 | 31 | 38 | 21 | 24 | 15 | 11 | 9 | 9 | 15 | 21 | 8 |
| 反面的 | 4 | 2 | 3 | 1 | 2 | 2 | 2 | 1 | - | 3 | 4 | 2 |
| 尚存争议的 | 18 | 11 | 8 | 17 | 8 | 7 | 17 | 16 | 11 | 30 | 23 | 10 |
| 读者的问题 | 43 | 52 | 50 | 53 | 49 | 41 | 40 | 44 | 28 | 63 | 44 | 35 |
| 理论—政策问题 | 21 | 20 | 22 | 24 | 21 | 19 | 16 | 14 | 5 | 30 | 20 | 15 |
| 组织—党务问题 | 19 | 23 | 20 | 23 | 24 | 16 | 11 | 18 | 13 | 14 | 13 | 12 |
| 国际问题 | - | 5 | 6 | 3 | 2 | - | 2 | 1 | 4 | 4 | 6 | 2 |
| 查询发来的材料 | 3 | 4 | 2 | 3 | 2 | 6 | 11 | 11 | 6 | 15 | 5 | 6 |
| 读者建议 | 3 | 3 | 7 | 4 | 13 | 7 | 2 | 4 | 3 | 8 | 8 | 9 |
| 申诉和声明 | 128 | 126 | 107 | 106 | 97 | 100 | 87 | 101 | 88 | 142 | 100 | 128 |
| 住房事务 | 26 | 24 | 14 | 12 | 9 | 18 | 13 | 15 | 8 | 28 | 20 | 22 |
| 就业安置和劳动纠纷 | 15 | 20 | 8 | 12 | 6 | 13 | 9 | 13 | 13 | 15 | 12 | 15 |
| 养老金、社会保障、残疾人就业 | 5 | 5 | 3 | 9 | 8 | 3 | 6 | 4 | 1 | 4 | 2 | 9 |
| 有关舞弊及对领导与不道德行为不满 | 27 | 26 | 41 | 28 | 20 | 27 | 19 | 27 | 20 | 36 | 32 | 27 |
| 人权保护机构的工作 | 15 | 9 | 6 | 16 | 6 | 3 | 13 | 2 | 5 | 9 | 6 | 15 |

续表

| 项目 | 1月 | 2月 | 3月 | 4月 | 5月 | 6月 | 7月 | 8月 | 9月 | 10月 | 11月 | 12月 |
|------------|----|----|----|----|----|----|----|----|----|-----|-----|-----|
| 迫害批评者 | 5 | 6 | 7 | 5 | 10 | 5 | 1 | 3 | 4 | 4 | 4 | 9 |
| 官僚主义拖拉作风 | 9 | 9 | 12 | 10 | 11 | 6 | 8 | - | - | 5 | 3 | 1 |
| 苏共党员资格再审 | - | - | - | - | 1 | 1 | - | 1 | 1 | 7 | - | 3 |
| 其他 | 26 | 27 | 16 | 14 | 26 | 25 | 18 | 36 | 37 | 34 | 21 | 27 |
| 匿名信件 | 9 | 8 | 16 | 6 | 3 | 9 | 11 | 5 | 7 | 14 | 10 | 9 |
| 通过编辑部给组织的信 | 72 | 68 | 73 | 64 | 69 | 56 | 47 | 50 | 45 | 76 | 53 | 73 |
| 信件内容得到调查核实 | 42 | 39 | 33 | 34 | 36 | 39 | 26 | 34 | 34 | 44 | 32 | 42 |
| 信件申诉得到组织回复 | 36 | 37 | 46 | 43 | 35 | 58 | 40 | 34 | 39 | 34 | 45 | 37 |

资料来源：根据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1061. Л. 37 - 71 的统计数据整理。

表 4-12 1986 年劳动者给《共产党员》杂志编辑部发来的信件、申诉、声明及处理情况

单位：件

| 项目 | 1月 | 2月 | 3月 | 4月 | 5月 | 6月 | 7月 | 8月 | 9月 | 10月 | 11月 | 12月 |
|-----------------------|-----|-----|-----|-----|-----|-----|-----|-----|-----|-----|-----|-----|
| 当月收到的信件总数 | 573 | 421 | 271 | 295 | 223 | 245 | 264 | 302 | 420 | 573 | 335 | 554 |
| 就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给苏共 27 大的建议 | 311 | 174 | 11 | 1 | - | 16* | 5* | 3* | - | - | - | |
| 发来的各类稿件 | 40 | 66 | 59 | 80 | 52 | 61 | 82 | 100 | 118 | 180 | 112 | 173 |
| 马克思—列宁理论发展 | 12 | 6 | 13 | 11 | 9 | 9 | 6 | 12 | 13 | 25 | 29 | 20 |
| 党和国家对国民经济领导 | 18 | 24 | 13 | 25 | 12 | 14 | | 35 | 44 | 53 | 35 | 56 |
| 意识形态、共产主义教育 | 6 | 16 | 12 | 18 | 16 | 18 | | 24 | 25 | 28 | 23 | 50 |
| 完善苏联生活方式 | 1 | 6 | 8 | 6 | 4 | 6 | 7 | 11 | 17 | 31 | 14 | 29 |
| 自然—科学论题 | 3 | 2 | 8 | 7 | 10 | 4 | 9 | 5 | 15 | 13 | 4 | 4 |
| 就党纲和党章的建议 | | 12 | 5 | 13 | 1 | 10 | 10 | 13 | 4 | 30 | 8 | 14 |
| 对杂志刊发文章的意见 | 36 | 34 | 42 | 33 | 16 | 16 | 27 | 14 | 35 | 112 | 44 | 120 |

续表

| 项目 | 1月 | 2月 | 3月 | 4月 | 5月 | 6月 | 7月 | 8月 | 9月 | 10月 | 11月 | 12月 |
|------------------|-----|-----|-----|-----|-----|-----|-----|-----|-----|-----|-----|-----|
| 正面的 | 23 | 16 | 21 | 15 | 10 | 6 | 12 | 9 | 8 | 33 | 6 | 28 |
| 反面的 | 1 | - | 5 | 5 | 1 | 1 | 4 | 3 | 2 | 8 | - | 4 |
| 尚存争议的 | 12 | 18 | 16 | 13 | 5 | 9 | 11 | 2 | 25 | 71 | 38 | 88 |
| 读者的问题 | 62 | 36 | 59 | 31 | 26 | 37 | 29 | 36 | 44 | 88 | 68 | 90 |
| 理论—政策问题 | 29 | 20 | 34 | 12 | 10 | 12 | 16 | 23 | 28 | 68 | 53 | 66 |
| 组织—党务问题 | 16 | 16 | 19 | 18 | 14 | 25 | 11 | 11 | 11 | 13 | 12 | 20 |
| 国际问题 | 2 | - | 6 | 1 | 2 | - | 2 | 2 | 4 | 7 | 3 | 4 |
| 查询发来的材料 | 1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读者建议 | 10 | 3 | 2 | 2 | 3 | 8 | 5 | 5 | 13 | 21 | 15 | 30 |
| 申诉和声明 | 114 | 108 | 205 | 148 | 115 | 107 | 116 | 142 | 210 | 172 | 96 | 141 |
| 住房事务 | 14 | 23 | 22 | 16 | 14 | 10 | 15 | 21 | 18 | 25 | 8 | 18 |
| 就业安置和劳动纠纷 | 12 | 11 | 28 | 12 | 15 | 9 | 7 | 21 | 16 | 14 | 9 | 12 |
| 养老金、社会保障、残疾人就业 | 4 | 4 | 6 | 3 | 1 | 1 | 8 | 1 | 8 | 2 | 5 | 3 |
| 有关舞弊及对领导与不道德行为不满 | 24 | 24 | 54 | 31 | 15 | 25 | 24 | 24 | 49 | 31 | 22 | 26 |
| 人权保护机构的工作 | 9 | 13 | 23 | 12 | 20 | 11 | 5 | 23 | 17 | 6 | 13 | 6 |
| 迫害批评者 | 2 | 3 | 11 | 15 | 10 | 7 | 4 | 3 | 14 | 9 | 2 | 3 |
| 官僚主义拖拉作风 | 4 | 1 | 5 | 5 | 5 | 2 | 4 | 1 | 5 | - | 3 | 3 |
| 苏共党员资格再审查 | 2 | 1 | 6 | 3 | 3 | 3 | 5 | - | 2 | 5 | 4 | 3 |
| 其他 | 43 | 28 | 47 | 51 | 32 | 39 | 44 | 46 | 81 | 80 | 30 | 67 |
| 匿名信件 | 17 | 10 | 21 | 16 | 3 | 12 | 7 | 2 | 9 | 9 | 4 | 8 |
| 通过编辑部给组织的信 | 48 | 55 | 109 | 61 | 74 | 57 | 36 | 60 | 63 | 74 | 54 | 47 |
| 信件内容得到调查核实 | 33 | 33 | 55 | 24 | 18 | 35 | 22 | 39 | 38 | 47 | 19 | 26 |
| 信件申诉得到组织回复 | 34 | 49 | 33 | 43 | 53 | 29 | 28 | 29 | 36 | 38 | 47 | 38 |

* 此为“就国家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改革的基本方针”向苏共中央提出建议的信件数。

资料来源：根据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1061. Л. 1 - 36 的统计数据整理。

图 4-1 显示的是 1981~1986 年《共产党员》杂志编辑部在各年中收到来信的总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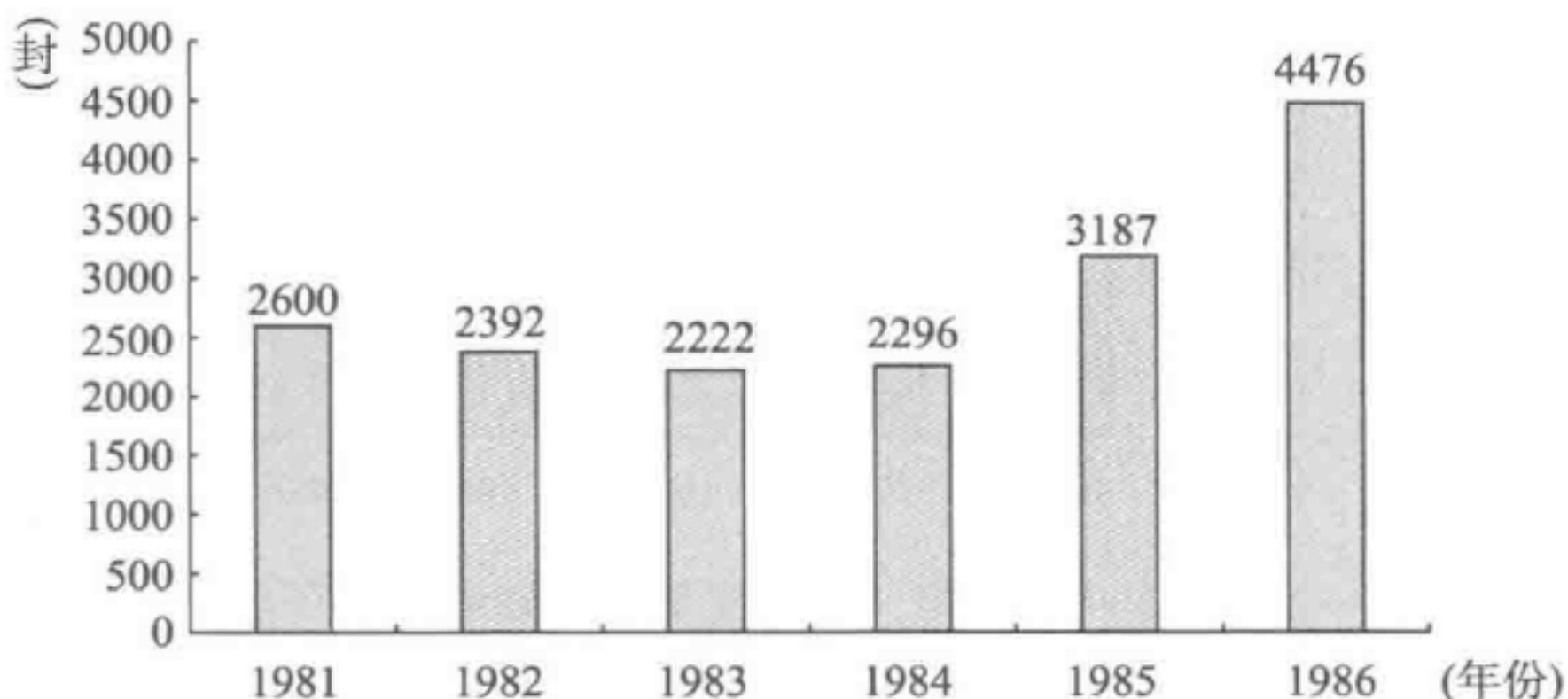


图 4-1 1981~1986 年《共产党员》杂志编辑部收到来信的总数

可以看出，随着戈尔巴乔夫的上台，苏联改革开始拉开帷幕，广大党员群众的参与热情在 1985~1986 年有明显提升。在 1985~1986 年的来信中，有一部分是写给将要召开的党的第 27 次代表大会的信件，这是就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为党的代表大会提出意见和建议的信件。写信人还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苏联内政外交、意识形态、党纲和党章的修改乃至生态环境等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和看法。广大基层党员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支持改革，对改革充满期待，并积极参与进来，献计献策。上述数字可以作为一个证明。

在所有来信中，“申诉和声明”是占“大部头”的内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申诉”（Жалоба）一词，在俄语中的主要意思是“诉苦，抱怨，发牢骚”，还有“控告，控诉，申诉”之意。在杂志上设立这样一个栏目，主要目的是给基层党员提供一个表达意见的地方。从主题来看，所涉及的是与基层党员日常生活有关的事情，主要有住房问题，就业安置和劳动纠纷，养老金、社会保障、残疾人就业，有关舞弊及对领导与不道德行为不满，对人权保护机构工作的意见，对党的领导干部利用手中权力迫害批评者，打官腔，故意拖延对群众来信的调查，对那些因各种原因被开除党籍的党员进行资格复审工作的意见，等等。这一部分也往往是在全年来信中占有最大比例的内容（见图 4-2）。

在这 6 年中，“申诉和声明”部分占编辑部所收到的全部来信的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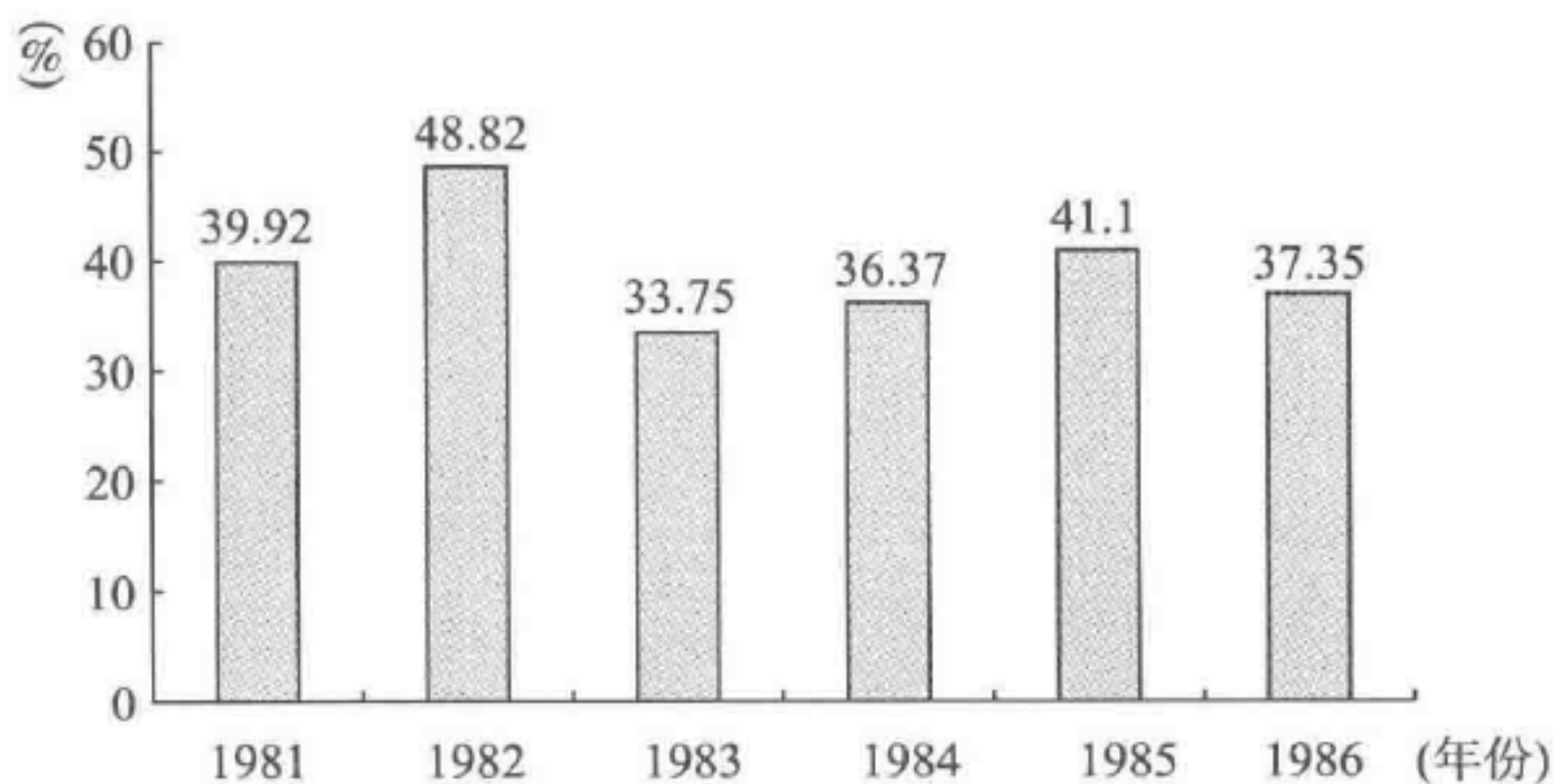


图 4-2 1981~1986 年《共产党员》杂志编辑部所收到的信件中“申诉和声明”部分所占比例

例，平均数字为 39.55%。这说明，基层党员对与自己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始终非常关注，也存在很大意见。而在这当中，住房问题和“有关舞弊行为以及对领导干部及其不道德行为不满”又是两项重要内容。基层群众对长期以来存在的住房待遇问题，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存在官僚主义作风、贪污腐败等问题都很不满。可以说，在关乎民生问题上的社会改进，以及纠正党员干部中的官僚主义作风，都是当时党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通过上述数据还可以看出的是，在苏联时期，基层群众的舆情可以通过苏共中央机关的这类媒体得以上达，他们可以请编辑部向各级组织转交（或者以公开信的方式），也可以请求编辑部予以协调解决。编辑部则根据所反映问题的情况，向各级党的机关转达，有的信件还可能直达苏共中央。尽管不是所有信件所反映的情况都能得到调查核实，也不可能全部得到相关组织部门的答复，即便得到核实或者答复也不一定能够真正得到解决，但是这个渠道还是有的。并且，在编辑部各个部门的回信^①中，对于稿件是否能够采用、其理由、稿件中所涉及的重大理论问题或者社会问题都会给予认真回复和解答。尽管这样的解答不一定能够使来信人完全满意，但这种方式还是可取的，至少在倾听群众意见、维护基层党员的权益方面还是有一定作用的。而且其中一些问题在编辑

^① 编辑部会根据信件内容的情况，交给群众工作部，或者外联部等不同部门，一般是由各个部的主任或者顾问回复。个别信件还可能由编辑部领导或者顾问回复。

部的过问与督促之下，得到了切实解决。只是，得到这样答复的只是所有党员群众所提出的问题中的很少一部分。并且，尽管这个大门在理论上对所有党员都敞开，但并不是所有党员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渠道维护自身权益。

到1988年苏共第19次会议前后，当苏共高层与宣传机构大力倡导“民主化”“公开性”，以及多党制、苏维埃选举时，党员们对于这些政治新名词表达了各种不同意见。有人热烈欢迎，积极参与，有人表示反对，还有人表达了心中的种种疑惑和不解。实际上，与他们关系最为密切的，还是普通人的民生问题——作为社会基本成员的基本权益。当物价上涨、商品匮乏取代了党的领导人所发出的种种号召，越来越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时，基层党员的关注点也由政党、政治、国家、社会转向了个人，转向了他们的基本生存条件。在一份1991年所做的社会调查中，可以证实这个情况：

工人与政治——社会调查的一些结果

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工人阶级是一支数量庞大的积极的队伍。他们有什么情绪，有什么愿望？为了回答这个问题，1991年2月，苏共中央所属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中心和社会与机关学院（塔什干）^①进行了一项调查，共询问了400名工人（在10个塔什干、撒马尔罕和费尔干纳的企业中）。

调查证实，大量工人意识到，现在正处于转折时期。在他们中间，政治和心理的疲惫、愤怒情绪在上升，这种愤怒情绪是对作为基本社会阶层的工人同现实的改革过程脱离的不满。他们中只有一小部分（只有15%的被调查者）相信改革会取得成就。超过60%的人回答，他们认定改革是退步了。这与共同的消极情绪相伴随。67.8%的被调查者认为，国家的经济形势不仅没有变好，反而更坏了。57.6%的人完全感觉到国家在向危险的方向运动。超过72%的人对生活不满意。1/3的人由于今天和以后的日子持续动荡感到疲

^① Центр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Академи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при ЦК КПСС; Институт политологии и управления (Ташкент).

惫。1/4的人希望回到改革前的时代。

国家和社会政治不稳定、生活水平急剧降低，引发了工人对社会政治机关的信任危机。以下是一些回答。

(1) 您对全苏联管理机构和地方政权机关的态度？

肯定自己的未来与全苏联国家机关的活动有关的占4.5%，认为与共和国国家机关有关联的占32.5%，赞同最高苏维埃的工作的占26.1%，赞同乌兹别克最高苏维埃工作的占48.7%。

(2) 谁能更好地维护普通人的利益？

答案是：工会占20.3%，共产党占28.5%，共青团占5%，非正式组织和运动38.4%。

被调查者认为，恢复共产党在工人中的影响同维护他们的社会—阶级利益相关，而不是与抽象的全人类价值有关。

在政治和心理方案中最重要的是，在宽松的社会意识、高度政治化与多元化条件下的社会中，工人阶级对党的活动的评价，在今天的形成与昨天不同。从过去延续下来的党的工作方法形式，走向同重建社会（无论是工人还是共产党员自身）相冲突的方向。

处于低等权利下的广泛的工人阶层对政治生活、公民文化、旧套路的统治，继续保持着热情、期待、政治信任和过度的信任。这些情绪被那些傲慢的领袖、领导政权的人，与苏联人民不同的人积极地利用。从这里形成了对国家机关和党员，从一些地方到另外一些地方的快速上升的不满情绪；引发对通货膨胀的批评；同时也对冷漠、不专业的党的机关提出反对和批评，形成了“民众的愤慨”。

尽管苏共的权威降低了，人们对它的信用的相信程度还是很高的。这不，41%的被调查者认为，苏共是现实的政治力量，有能力领导国家走出危机。不过，为此，它应当进行深入的内部重建。（有28%的人难以回答）有67.8%的被调查者认为，党在很多地方还保持着行政—命令关系体系。许多党的领袖依旧与他所从事的工作的标准以及人们的期待不相称。只有24.3%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企业的党的领导能够适应标准及其所面临的任务的复杂性（有38.7%的人认为不适应，而有36%的人很难回答）。

(3) 工人的倾向还可以从以下问题中反映出来：按您的观点，

对我们国家的将来，什么样的制度是可以接受的？

答案是：传统形式的社会主义占5%，重建后的社会主义占48%，国家资本主义占6%，资本主义占8%，“难回答”占32%。

这也就是说，工人们在本质上还是认同社会主义的。同时他们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多数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政治机构在现实活动中实现的信心已经削弱。失望将促使工人尽快离开苏共，远离改革，形成自己的独立的政党和运动。

资料来源：A. Голованов, Рабочие и политика. Некоторые результаты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Человек и политика 1991. 5。作者是戈洛万诺夫·亚历山大·亚历山德洛维奇，政治学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实验室高级研究员。

这项调查是在乌兹别克斯坦加盟共和国进行的，而不是在苏联全境。调查在企业工人中进行，不是完全针对各行业、各领域的基层党员。不过，这次调查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当时基层党员的情绪：他们曾经对改革寄予厚望，希望社会经济形势在改革中得到好转，自己的生活水平能够有所提升，而眼下的一切恰恰相反。他们开始失望、愤怒、不满，对国家机关和党员的不信任情绪急剧上升，形成了“民众的愤慨”。在此情况下，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认同社会主义，希望国家形势通过改革得到改善，但是从个人角度来说，他们已经不再反对加入其他党派，并且有些人还主动加入其他组织和党派。这些人寄希望于其他政党和社会组织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在这种情况下，苏共的基础实际上已经开始松动甚至塌陷。

第二节 苏共基层党组织与苏联解体关系分析

自苏联解体之后，分要其原因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有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角度分析的，有从苏共路线失误角度分析的，也有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政治家个人因素分析的。总体来看，从苏联与苏共领导上层入手分析的更多一些。基层党组织处于党的最底层，对于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确不能起到决定性影响，但基层党组织是党的基础，它

的触角深入苏联社会的各个“毛孔”。基层党组织在组织体系上的瘫痪和思想体系上的涣散，说明党的领导能力降低，甚至于基础动摇，而执政党的大厦倾倒实际上与基础动摇密切相关。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苏共失败、苏联解体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党和国家的领导者放弃了党的领导，没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一 基层党组织职能与作用的有效发挥体现了党的活力

在苏共几十年历史上，基层党组织是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者和执行者。无论党和国家处于和平建设时期还是保卫国家的战争年代，基层党组织都是联系党和群众的桥梁，也是实现党的各项政策措施的基本群体。总结苏共基层党组织的组织结构以及建设历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组织体系的深入性。苏共是一个组织严格的体系，作为执政党，在几十年中，它深入苏联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保证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民族等各个方面有序运转的结构或支柱。基层党组织将国家内的各民族、各社会阶层中的党员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有组织的整体，一旦国家面临危险或困难，基层党组织就能够动员各种力量，组织起一个有秩序的体系。在国内战争时期，基层党员发动“共产主义星期六”活动，在全国带动起义务劳动的热潮，不仅党员参加，非党群众也加入义务劳动行列，他们的劳动热情和成果极大地支援了前线；在卫国战争中，从战争初期的工厂拆迁，到战争后期收复地区的重建，基层党组织在其中既是参加者也是组织者；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基层党组织参加和组织劳动竞赛，将劳动竞赛纳入党组织生活，为社会主义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党员们的劳动热情和爱国热情也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在这些过程中，基层党组织都参加进来并深入国民生活的各个角落。基层党组织能够发挥积极作用，正是因为其作为党组织的最广泛、最末梢的神经，是有活力的。第二，基层党组织有弹性。尽管在70多年执政历史上，苏联共产党的队伍有时迅速扩大（如在国内战争年代的“征收党员周”，卫国战争中军队中党员队伍迅速壮大），有时又急剧缩小（如1921年、1939年的清党，卫国战争初期前线军队党员队伍的损失，使党员数量明显缩小），党员数量上的变化必然带来党组织规模的变化，在组织结构上也有影响，但基层党组织在可能的

情况下始终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能并且发挥作用。苏共几十年的变化证明，基层党组织是一个有弹性的组织体系。第三，在不同部门基层党组织有自己的运转方式。最初，布尔什维克党主要分布在工人和士兵中，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布尔什维克党掌握了国家政权，在苏维埃国家的国民经济部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在军事部门（部队、军工生产部门和军队物资保障部门），在商业服务业，及至在居民生活区，在建设工地上，在临时性的生产部门中，都有自己的一套基层组织体系，并且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基层党组织都能够以不同的活动方式保持组织结构的完整。这些情况说明，正是因为有适应各种条件和情况的组织体系，苏共基层党组织才能够在几十年间保持活力和生命力。

作为执政党的基础，基层党组织正常发挥组织作用，是保证国家机器运转的条件，一旦党的组织体系被破坏，国家“机体”也就失去了赖以正常运转的能量。因此，苏共几代领导人，如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都以自己对该党的理论的理解在基层党组织资源调动、组织管理、作用发挥等方面进行阐述和理论分析。而苏联的改革，在工作方法上，也多以基层党组织工作为对象。例如，在赫鲁晓夫时期，恢复党组织的民主生活，在基层党组织工作中，提倡创造力和灵活性；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对干部队伍进行调整，都反映出对党的组织工作的重视，以及立足于基层党组织进行改革的态度。这些情况说明，苏共领导人或者在理论上或者在实践中都已认识到，基层党组织职能和作用的发挥关系到党的生命力和活力，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能动性对于党的方针路线的实施具有重要影响。

二 削弱基层党组织的职能与作用动摇了党的根基

从十月革命胜利后到卫国战争结束，是苏共领导地位比较稳固的时期。在这30多年时间内，虽然在党的组织生活中出现过破坏民主集中制等现象，但由于党的领导权稳定，基层党组织基本能够以合乎党章规定的方式发挥职能和作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的政治经济情况以及国际形势有了很大变化，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对基层党组织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基层党组织作为国家利益的捍卫者、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在国家处于危急关头、民族利益受到威胁的特殊形势下，

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号召、动员为主的执政党组织。当国家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在没有外族入侵，不能用爱国主义、先锋队精神来激励党员群众的情况下，基层组织还能发挥怎样的职能和作用？50年代中期以后，苏共也在探索基层党组织工作的新方法和新途径。例如，在工厂企业基层党组织探索新的工作方法，组织并参加劳动竞赛，为企业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在集体农庄参加生产计划的制订，宣传和采用科学种植和饲养手段，组织学习，提高农庄庄员的文化水平；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下，提高党员的文化素质，发展知识分子入党；在社会思想意识多样化的情况下，加强党的思想宣传，以抵制西方思想的入侵。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党的宣传机构还担负着对西方的“反宣传”任务，以揭露西方社会的黑暗面，加强共产党的舆论影响。从基层党组织职能与作用发挥情况来看，直到80年代中期，基层党组织还能够以比较完整的组织体系和组织结构发挥各种职能与作用。

不过，由于苏共党内官僚的腐败、特权现象，基层党组织的权力实际上已经在很大程度降低，从而影响到其作用的发挥。阿夫托尔哈诺夫曾对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的官僚统治做过形容。他把苏联共产党从下到上的各个级别比喻为苏联的一种由大到小的一个个套娃：第一层是“党”，大约有1600万名党员和候补党员^①；第二层是各级党委会的400万名委员；再里面是大约40万名专职党的干部；最后是“上层精华”——从区委会到苏共中央的大约3万名党的书记。他认为，这一层层层的“党”各自根据职务大小来分享国家的权力，“党”的人数越少，权力就越大。1600万名苏共党员是没有实权的，在苏联真正掌权的是3万名书记。他把这个集团形象化为共产党专政的“金字塔”：底层是普通党员，中层是“委员会集团”，上层是“书记集团”，塔尖上是政治局^②。这里说的处于第二层的“党”——基层党组织是没有什么实际权力的。这种描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联共产党内部官僚主义导致基层

^① 他写文章是在1979年，这是当时的党员数量。

^② [苏]阿夫托尔哈诺夫：《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杨春华、张道庆译，新华出版社，1981，第77页。应当注意的是，阿夫托尔哈诺夫认为由列宁创建、由斯大林加以完善的苏联政治体系是“以国治人，以党治国，以党的机关治党”。他的另一本书《党治制的由来》（中文名译为《苏共野史》）就是讲苏联共产党以党治国。他站在反对派的立场上看待和分析苏联共产党的统治，因此对其观点需要辩证对待。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民主权利丧失的情况。阿夫托尔汉诺夫的观点不一定完全正确，但也道出了当时苏共党的领导中的一些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处于最底层的人数最多的“党”的权力降低，对于整个“党”而言已经产生了不利影响，即这多数人的“党”因无权而开始不关心处于上层的“党”的状况。具体地说，就是普通党员对党自身的发展以及党和国家政治冷漠。虽然上层的党拥有很大的权力，但如果不是建立在众多普通党员群众的支持之上，这个权力大厦就要成为空中楼阁。

推倒并拆除这个大厦的工作是由戈尔巴乔夫等人做起的。从苏共基层党组织的发展历程中不难看出，基层党组织处于党组织的最下层，但它的先锋模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党的上层政策、策略的指导。尤其是对于苏联共产党这样一个执政党而言，领袖的个人魅力、工作作风、实践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基层组织 and 群众党员作用的发挥。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初，人们对他寄予厚望，但在改革进行过程中人们发现，他们的精神寄托——年轻的苏共领导人对改革并没有充分的考虑和思想准备，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束手无策，更多的时候是在空谈。在他和另外一些处于激进派观点的领导人的推动下，苏联又开始了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见成效已经使人们渐渐失去信心，政治体制改革又带来新的混乱，尽管党的领导人和党的第19次代表会议、28大以及中央全会一再强调要给基层党组织以更多的权力，但这只是空谈口号。实际上，从党的上层到党的基层组织，权力一再丧失，党的领导阵地不断缩小。“民主化”“公开性”以及多党制的实行，给党的地位带来冲击，冲垮了基层党组织，导致党员队伍和基层党组织涣散。苏共基层党组织丧失了凝聚力和战斗力，在苏共最终失去政权时，已经没有人 and 组织给这个昔日的大党以强有力的支持了。

三 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苏共失败的根本原因

所谓政党是代表某一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并为之奋斗的政治组织，是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进行阶级斗争和社会政治活动的产物。政党的基本特征是：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有一定的组织机构，拥有党员和所联系的群众。执政党是指公开地掌握国家政权的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享有较大的公共权力和社会权威。一个

执政党能否长期保持执政地位，关系到这个政党自身的发展、国家政治的稳定和社会发展，而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对于执政党来说就如同生命线一样十分必要，因为“在所有社会生活中，在所有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中，领导是必不可少的”^①，失去了政治领导地位的执政党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执政党。

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成为苏维埃国家的执政党。在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党的领导人列宁基于俄国的基本情况（这是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进行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其前提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而无产阶级的领导只能通过共产党来实现），一再重申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从原则上说，对于应该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我们不能有任何怀疑。”^②“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两年半以后，我们在共产国际的会议上向全世界宣布说，不通过共产党就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③从列宁时代起，在苏联这样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里，为保证社会主义胜利，就必须坚持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这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列宁的这一理论原则成为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国内战争取得胜利以及新经济政策条件下苏维埃政权得以稳固的思想指导，也为苏联共产党的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苏联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党和国家的领导者斯大林继续坚持党的领导。1927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实行一党制，共产党“不应当与其他政党分掌领导”^④。苏共17大通过的党章中明确规定“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切机关”，1936年宪法中也规定共产党“是劳动群众的所有团体及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其他组织，包括工会、苏维埃、合作社、青年团，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党领导这些组织，并指导其活动。

赫鲁晓夫时期对党的领导原则有一定“修正”，即提出了“全民党”理论，但这个理论的基础是苏共仍起领导作用，苏共22大通过的党章中

① [美] 罗伯特·塔克：《政治领导论》，丛郁、李洋池译，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第29～30页。

②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第174页。

③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35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第191页。

规定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当然，赫鲁晓夫在理论上进行了小的修改，把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改为是“全体人民的先锋队”，把“工人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改为“社会政治组织的最高形式”，但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一个基本原则。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也肯定了党的领导。苏联1977年宪法规定，党是“苏联社会政治体制的核心”，以及“一切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的核心”。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前期，也坚持这一原则。苏共27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是社会政治组织的最高形式，政治体制的核心，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戈尔巴乔夫在讲话中也一再强调在改革中要发挥党的领导作用^①。

在苏联几十年历史上，都能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的作用，这一路线是保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也是维系苏维埃联盟的精神基础。对于执政党而言，这一点是十分必要也是必需的。尽管在党的领导及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执政党的地位是稳固的，这是保证国家政权稳定的政治前提。

当然，在苏联共产党执政过程中，存在以党代政、苏维埃政权作用不能充分发挥、群众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保障不足等问题，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这些积弊暴露出来，并且对经济体制改革形成阻碍。因此，在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对于党内存在的问题必须进行修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以放弃党的领导这种途径来实现，更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以“革命”的方式来完成。苏共作为执政党，是国家的政治核心和政权领导，其存在前提是这个政党能够掌握、控制和运用对国家的领导权。苏共领导人在开始政治体制改革以后，从“民主化”“公开性”，到广泛实行苏维埃代表选举，再到“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直到实行多党制，共产党一步一步放弃领导权，最后走向失败。从这个过程不难看出，放弃党的领导权是苏共领导人的一个原则性错误，正是这个错误导致苏共的全面失败。

^① 上述内容均参见《吴仁彰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第172~173页。

四 苏联共产党失败使苏维埃联盟失去了维系基础

苏联共产党是社会主义苏维埃联盟国家的执政党。在执掌政权的几十年中，苏联共产党用不同政策和策略稳固政权，保证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执政党在行使管理党和国家的社会事务的权力时，一般应具有两个方面的权威：一是这个党掌控着国家的权力机关，如军队、警察、司法机构等，通过严格的管理达到有序治理，从而保持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二是这个党应该拥有民众的自愿忠诚，民众信任并支持这个党，以其宗旨作为自己的政治信仰，愿响应其号召，这个党的政权也能稳固，也就是说，这个执政党在民众心目中具有权威性和合法性。当代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曾肯定：“任何一种政治系统，如果它不抓合法性，那么，它就不可能永久地保持住群众（对它所持有的）忠诚心，这也就是说，就无法永久地保持住它的成员们紧紧地跟随它前进。”^① 在几十年的执政过程中，苏联共产党已经成为拥有国家管理绝对权威的执政者，同时也成为各民族人民的精神依托，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刻，在国家需要动员全部力量建立社会主义大工业时刻，“党的号召”是对民众爱国精神和劳动热情的最好动员。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苏联共产党在苏维埃国家中，既是权力的掌控者，又是民众的精神领导者。正是由于具备这两种要素，这个党才能执掌政权几十年，历经内外冲击而保持政权与社会的稳定。换言之，苏联这个由 100 多个民族、15 个加盟共和国构成的社会主义联盟之所以能够在长时期内保持稳定，共产党是一个重要保证者。

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布尔什维克党只有 35 万党员、162 个基层党组织，到 1989 年时有 1950 万党员、44 万个基层党组织，苏联共产党的队伍几十倍地扩大，其影响渗透到国家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构成执政党政治统治的组织基础。尽管这个党在掌握政权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出现过滥用职权和特权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民众的信任，但党的权威稳固，国家政权也就有政治保证。当执政党的地位

^① [德] 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 264 页。

不稳时，国家政权也就摇摇欲坠。苏联改革后期，党的危机与国家政权危机几乎是一出戏中的两个场景：一面是苏共内部在改革以及国家政体等问题上的争论，另一面是苏维埃政权的民主选举；一面是叶利钦等人退出共产党，另一面是叶利钦、戈尔巴乔夫竞选总统。在两个镜头中，得胜者总是“联盟派”，而共产党屡屡居于下风，并最终失败。虽然“联盟派”打败了“共产党”这个对手，但没有多久它自己也解体了。

俄罗斯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在总结苏联解体原因时说，苏联这座大厦是建立在不坚固和不稳定的基础之上的，其内部结构也有许多缺陷，1991年的剧变正是它的基础和承重结构遭到侵蚀和破坏，导致建筑倒塌的结果。他认为，苏联的巩固是依靠苏联共产党的纲领和行动计划，苏共实行的是强硬的专政，它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牢固地维系住了多数共产党员和广大群众^①。麦德维杰夫的话道出了一个事实，即苏共的专政、共产主义思想是维系苏联的纽带，失去了这个纽带，这座大厦也就无法继续耸立。

麦德维杰夫还指出，苏维埃政权曾经历过四次危机，即1921年、1928~1933年、1953~1958年、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前几次危机靠党和国家政策的改变得以化解，第四次危机是一次经济、意识形态和道德领域的全面危机，由于戈尔巴乔夫既没有在经济领域改善人们的生活，又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没有充分准备的重大修改，既触动了权威阶层，也招致广大民众的不满而无法化解^②。麦德维杰夫的这段话实际上道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国家在前几位领导人时期没有解体，偏偏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解体？虽然其中原因错综复杂，但一个直接导因是，戈尔巴乔夫等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失去共产党的领导，苏维埃联盟就必然无法维系。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苏共基层组织处于党的低层，其权力与地位无法对国家政治产生重大影响，但它却是苏联共产党的基础，在支持着苏联共产党。共产党来自下层的涣散，以及从上层失去领导权力，实际上是与苏维埃联盟息息相关的。

①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279页。

②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282页。

苏共领导人对这个问题没有清醒的认识，没有牢固把握党的领导权和执政地位，决定了联盟必然解体。

第三节 苏共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与启示

作为执政党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探索与实践，苏共基层党组织建设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留下了深刻的经验与教训。深入分析与认真反思其中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影响，对于当今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 苏共历史上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经验

在苏联共产党 90 多年历史中，基层党组织发挥作用的条件与具体情况是不一样的。苏联前期，由于党的领导人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符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并在革命胜利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领导党员干部从实践中学习，向群众学习，尊重基层党员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是十月革命胜利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理论前提和基础。

（一）建立广泛的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并在组织上不断发展和完善

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掌握政权，成为执政党。作为执政党的领袖，列宁的党建思想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还在十月武装起义前，列宁就呼吁在工人、农民、军队中，在俄罗斯人与非俄罗斯人中建立党的组织。布尔什维克党取得政权后，逐渐在各个行业、按地域建立起自己的基层组织体系，党给基层组织规定的主要任务是在群众中做鼓动、宣传和组织工作。苏共早期的党章中规定，按党员的地域分布情况建立党小组或党支部，后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苏共党员在职业上包括了社会生活几乎所有部门，工人、农民、军人、教育工作者和科研人员以及机关工作人员。就组织体系来说，基层党组织几乎覆盖了社会各行业、各地区。

在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展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党的队伍后，原有的党支部已经难以有效地领导人数越来越多的党员群众发挥作用。于是，

1934年，联共（布）17大对党的组织结构做出重大调整，设立基层党组织作为党的基层组织，按地域和生产部门建立，以便于党的领导更加有效地体现在基层工作中，也使基层群众的活动更多地纳入党的组织体系^①。基层党组织能够随着形势变化及时从组织结构上做出调整和反应，才使得苏共基层党组织更有效地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

苏共的历史证明，完善的组织管理体系使得党在组织结构上环环相扣。在几十年中，它深入苏联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保证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民族等各个方面有序运转的结构或支柱。基层党组织将国家内的各民族、各社会阶层中的党员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有组织的整体，一旦国家面临危险或困难，基层党组织就能够动员起各种力量，组织起一个有秩序的体系。

（二）党员干部要善于学习

自建党之初，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就把学习作为党的建设的基础。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取得胜利的主张，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执掌政权后，布尔什维克党继续倡导学习。列宁是一位十分善于学习的领导人，他十分注重从实际出发，学习新知识，深入探讨党的基层组织工作的任务与方法，不断完善党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手段，不仅发动群众取得十月武装起义的胜利，还在保卫苏维埃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中，注意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宣传和组织群众方面的巨大作用。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号召党员学习管理经济，要求党的各级组织不要害怕让共产党员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他甚至提出：“为了学习要不惜破费，只要能学到东西就行。”^②看到一些共产党员因不懂管理而在工作中受到挫折，列宁告诫全党要不怕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要公开承认自己的素养不够，本领不大；观察事物要清醒一些，扔掉华而不实的东西，脱去华丽的共产主义外衣，老实地学着做些平凡的工作，这样才能战胜资本家。

斯大林时期的苏共继续保持在实践中探索和学习的习惯。在苏联开

^①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编《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求实出版社，1982，第76~77页。

^②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第234页。

始展开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党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号召党员青年学习科学技术，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包括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

可以看出，苏共早期党的领导人不仅善于向群众学习、在实践中学习，还能够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知识与技术，通过向资本家学习管理、学习新技术，发展苏维埃国家的经济，这是苏共作为执政党在领导国家开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的科学发展理念。

（三）尊重基层党员群众的创新精神

国内战争时期，国家满目疮痍，到处都在加紧恢复和建设。1919年4月的一个星期六，由莫斯科—喀山铁路的一个党支部组织发起了党员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对基层党员在实践中的创新活动给予了充分的支持与尊重。他在192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一天亲自参加了义务劳动，还将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称为“伟大的创举”，以此充分肯定了基层党员的首创精神。1921年，苏共中央颁布条例，把党员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作为一项制度规定下来^①。由此，组织广大党员群众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就成为基层党组织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以共产党员为主，带动党的同情者和非党群众共同参加的共产主义劳动形式，在保卫和巩固苏维埃国家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巩固苏维埃政权以及国家的早期建设中，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同时也为基层党组织建设、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后来，在全国各地由青年组成了青年突击队，在内战后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建设中，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在巩固苏维埃政权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后，“青年突击队”“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能够在全国广泛展开，并且党员在其中发挥了组织和带头作用。直到如今，“青年突击队”依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先锋作用的典范。

一般而言，在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过程中，在新经济政策实行过程中，列宁都强调发挥基层党员和党组织的先锋队作用，每当苏维埃国家面临危难时刻，列宁都号召共产党员走在前面，做各项工作

^① Первичная партий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Документы КПСС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й период).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74. сс. 17 - 19.

的带头人。他在每一个阶段都向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提出新的任务和要求，这不仅调动了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积极工作热情，还激励他们去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成为真正的先锋队和带头人。正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充分尊重基层党员的主体地位，及时肯定基层党员的首创精神，党组织给了基层党员以充分发挥自身潜力的空间，全体党员活力和创造力得到了最好发挥，从而在党的各级组织中形成合力和向心力，党组织才有了凝聚力和战斗力。布尔什维克党才能动员起超出自身百倍千倍的力量，战胜敌人。

（四）大力宣传倡导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主的、积极向上的组织文化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它建立前期（1917～1945年）的近30年中，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孤立和敌视中。在早期，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者曾企图将这个社会主义的“婴儿”扼杀于摇篮里，后来，德国法西斯对它发动了强大的进攻。但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战胜了重重困难，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一个变为多个，其力量的源泉之一就是社会主义的必胜信念。在基层党组织中，这体现为社会主义价值观。

在苏联时期，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主要内涵是指爱国主义——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热爱；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互相协作与配合；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作为苏联公民的自尊与自信，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并愿意为之付出自己的全部努力。这是苏联社会主义事业能够取得胜利的思想保证，也是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把广大党员群众团结在党的各级组织中并发挥作用的纽带。党组织以各种形式（如文学作品、电影、人物传记、历史读物和教材等）大力宣传社会主义价值观，那些在思想上积极向上的作品，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都起到了震撼人们心灵的教育作用，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青年。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基层党组织大力支持党组织中的团队建设，倡导并推动党员群体发挥带头作用，如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的集体协作。同时，党还注意采取一些激励措施，如计件工资、树立典型、给予优厚待遇等正面激励措施，从组织行为上调动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在基层党组织中，这种健康向上的组织文化使苏共基层党组织发挥了不可替

代作用的有机体。正因为如此，在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基层党组织都发挥了组织、管理、带动作用，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

二 苏共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历史教训

苏共基层党组织建设不仅留下了丰富的经验，也有深刻的历史教训。

（一）基层党组织建设应在社会生产和生活各个部门平衡发展，在城乡各个领域共同发挥作用

十月革命前，俄国农村中布尔什维克党的力量十分薄弱，党在农村中的影响很小。十月革命后不久，布尔什维克党就派出党员队伍到农村，在农村中发展党组织。不过，农村中党组织建设始终比较薄弱。苏联农业集体化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力量并不强，在集体农庄中，基层党组织的主要工作是监督那些被流放的所谓“富农”，基层党员多半在集体农庄中担任领导或者农机站的技术人员，基层党组织与农民的关系在这个时期不是很融洽，有时甚至处于对立状态。直到斯大林逝世时，集体农庄中的基层党组织依然比较薄弱。

1953年以后，苏联共产党就比较重视农村中党的工作，强调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加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的基层党组织工作。1958年合并集体农庄后，农村的基层党组织网建立起来。20世纪60~70年代，在国营农场中基层党员数量有所增加，基层党组织规模扩大，不过，比较于当时城市中工厂企业的基层党组织来说，规模还是小了一些。

从组织体系来说，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到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前，苏联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组织机构和组织形式上还是比较完整的。也就是说，这个时期苏联农村基层党组织体系还是比较完备的。但是，与城市相比，农村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并不是很大，在农村普遍存在生产率低下、劳动者的劳动热情不高、人们不关心集体生产等情况，这些情况出现的原因主要在于农村集体生产的体制不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不过，城乡基层组织发展不平衡，使得苏联农业中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始终处于“瘸腿”状态。从根源来说，这是苏联农村经济体制的弊端，也是苏联农业基层党组织建设过程中的一个教训。

（二）执政党必须学会适应发展变化的国内外形势，不断改进自身，以保持先进性

苏联前期，党的领导人以身作则，基层党组织也能够响应党的号召，在保卫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只是，这种传统和作风没有坚持下来。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的近30年，是苏联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苏共党员队伍扩大，党员人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基层党组织体系在各行业与各部门中更加健全，基层党组织网络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组织体系更加完备，党员和党的基层组织干部文化素质有了很大提高，这些都给基层党组织工作创造了一些比较好的条件。与此同时，从思想上的变化开始，各种社会问题的突出暴露，也向基层党组织工作提出了挑战：是顺应新形势，采用新方法和新手段，在新的国内外环境要求面前改善自身，加强基层党组织工作的影响，还是抱残守缺，对外界形势的变化不闻不问，方法单一，形式僵化，“以不变应万变”？实际上，这是苏联共产党自上而下面临的一次选择。在赫鲁晓夫时代，苏共还提倡党内民主，提倡灵活的、有创造力的工作方式，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发展停滞，制度上僵化，党的干部不是以基层选举为主，而是以上层委派的方式，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力和作用遭到严重削弱，导致官僚主义、贪污腐败、滥用职权、特权享受等风气盛行。到70年代末期，基层党组织在国家决策和政治生活中已经难以起到什么作用。在党内，“党的上层发生的事情，在通常情况下，不但一般的党员，就是中央委员会机关的工作人员也不得而知”^①，党和国家的政治决策与基层党员越来越远。这一切导致基层党组织工作逐渐流于形式，缺乏实际内容。虽然苏共在理论宣传领域加强了控制，而实际上则是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保卫社会主义政权与建设社会主义大工业过程中形成的先锋队、战斗堡垒作用渐渐丧失，基层党组织在更多的时候成了一些人向上攀升的阶梯。

^① [苏] 罗·亚·麦德维杰夫主编《政治日记》，贾连义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第222页。

（三）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在经济改革遇到挫折、改革难以进行下去的情况下，以“民主化”“公开性”为旗号，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了一场批判运动。批判的矛头首先指向斯大林，之后这种批判活动也指向苏共早期其他领导人，如列宁、捷尔任斯基等。这场批判运动不仅歪曲历史，完全丑化了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的形象，也严重损害了苏联共产党的威信。社会思想意识被错误引导，是非完全颠倒。

当时，不仅斯大林的个人形象被严重扭曲，他所领导的党、社会主义苏联的形象也被严重损毁，社会主义价值观被破坏，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信仰不断下降。一份抽样调查显示，1988年以前，群众对苏共的信任率为70%左右，到1990年下降到20%，1991年更是下降到百分之十几。思想上的混乱在党组织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党员人数上的大起大落。在1989年以前的30多年间，苏共党员人数基本上呈现上升趋势，1989年达到人数最高点——19487822人，进入1990年党员人数开始下降。1990年6月苏共28大后，党员数量急剧下降，到1991年1月，下降到16516100人，两年间减少了297万人^①。

党员的流失使基层党组织工作面临困难。尽管苏共一再强调给基层党组织以更多的自主性和主动权，但到1990年以后，很多地方的基层党组织实际上已经失去原有的职能与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由于要求入党的党员数量越来越少，基层党组织在发展党员的工作中失去了吸引力，基层党务工作者在党员入党方面几乎无事可做。第二，有些没有退出共产党的党员长期不缴纳党费，不参加组织生活，与基层党组织失去联系。第三，基层党组织在工厂企业生产中难以发挥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到1990年，全国有1/5的车间党组织、1/2的党小组被解散或停止活动^②。一些车间党组织和党小组因党员被开除或退党而所剩人数很少，不能构成一个组织。即使有组织的集体，也因党务工作人员“老

^① Справочник партийного работника 1989.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с. 589;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июнь 1991. с. 33.

^② А. Овчинников. Ах, анкета, анкета…… (Как теряется авторитет), 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 №. 18. 1990.

化”，缺乏创造力和创新精神而没有吸引力。第四，企业不需要党组织。从1990年起，基层党组织被逐出工厂企业的现象时有发生，理由是“党委会在劳动集体中已经不起积极作用了”^①。

到1991年夏，苏共面临着严重的意识形态的、组织的、政治的危机，基层党组织工作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当党的地区领导干部见到基层党组织的书记和工作人员时，对方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干什么？怎样做？一位党务工作者认为，苏联共产党在70多年历史中还没有经历过政治责任如此沉重的时刻^②。这是苏共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留下的一个极其沉重的历史教训。它告诉我们：执政党必须正确看待自己的历史、自己国家的历史，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信仰。没有坚定的信仰，不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社会主义改革大业不可能取得成功。

三 苏共历史经验教训对执政党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启示

苏联共产党执政几十年，走过了初创、形成、稳定、衰败几个时期，其留下的历史遗产极为丰富。

（一）基层党组织建设必须常抓不懈

基层党组织是党和群众联系的桥梁和纽带，通过分布于各地方、各行业、各部门、各领域的基层党组织体系，可以将党的理论、政策、主张以最直接的形式对群众进行宣传。就此意义来说，基层党组织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有组织、有活力的基层党组织，可以在群众中起到宣传、示范、组织作用，没有活力的基层党组织则不能最有效地发挥先锋队和战斗堡垒作用，而如果基层党组织涣散则必然给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带来严重影响。此正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所以，基层工作关系党的事业的成败。基层工作做好了，党和国家的事业才会有坚实的基础和旺盛的生命力。现在，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各种矛盾困难相互交织，人们精神文化需求不

^① К итогам зональных совещаний секретарей первичных партий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 №. 13. 1991.

^② А. Коршиков. Аритмия. 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 №. 14. 1991.

断提高，基层工作面临的情况更加复杂、承担的任务更加繁重。必须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切实把工作着力点放到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上来，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

（二）先进的组织文化、正确的思想路线是基层党组织发挥作用的基础

组织文化是基层党组织的魅力的体现，先进的组织文化、正确的思想路线是党组织发挥作用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大张旗鼓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向历史学习、向群众学习、向人类一切先进科学知识学习的过程中，汲取养分，保持自己在思想和文化上的先进性，以引领党员走向未来。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则是要把党的方针路线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在群众中开展宣传工作。过去，包括高校在内的基层党组织，基本上是做开会、读报、传达上级指示和文件精神的事情，形式单一，内容枯燥，“党员活动”成了让基层党员苦恼的事情。近年来，由于党对党史、革命传统教育越来越重视，在一些有条件的地方，基层党组织除了学习文件和传达会议精神外，还开展组织党员参观革命遗迹，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组织红色旅游等活动，很受欢迎。实践证明，只要基层党组织的学习与宣传活动组织得科学合理，内容新颖，形式多样，那么多数党员群众还是乐于参加和接受的。另外，基层党建还可以与团组织的活动、工会工作，以及其他群团组织的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在多样化的活动中，进行党史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只有以积极健康的组织文化和宣传活动引领党员思想，树立远大理想和信念，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教育群众，思想教育建设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基层组织才能保持活力，否则，“一个缺少全体衷心共有的目标、价值观与使命的组织，必定难成大器”^①。总之，基层党组织建设在组织文化的建树上，必须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形成健康先进的组织文化，才能保证自身不刻板、不落伍。

^① [美] 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郭进隆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第9页。

（三）保持基层党组织的先进性是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思想保障和组织保障

要保持基层党组织的先进性，就必须不断学习。建设学习型政党，基础是基层党组织。将各级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学习型基层党组织，实现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宏伟目标才有坚实的根基。我们生活在一个以变革、调整、创新为显著特征的时代，倡导建设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会，已成世界潮流。基层党组织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员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必须学习掌握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各方面知识，在不断优化知识结构、开阔思路、把握规律中，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能力，成为本领域本行业的行家里手。基层党组织应该成为党员学习新知识、增长新本领的大学校，引导每个党员干部把学习作为一种政治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正如胡锦涛在十七届四中全会上所强调的那样：“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战略任务必须落实到基层，每一个党组织都要认真履行组织党员学习的职责。”“只有党的基层组织都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的基层干部都充分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全体党员都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才能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为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不断凝聚强大力量。”^①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在实际工作中的最终落实者是基层党组织，就此意义来说，基层党组织的科学发展也是党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组织保障。

（四）从组织行为角度来看，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的各种问题的根源往往来自政党自身

建设学习型基层党组织的前提是建设学习型政党、学习型党组织，只有上下同步，协调一致，整个组织体系才能有机高效运转。党在基层组织建设上出现的问题往往是各种各样的，最常见的有组织涣散，没有凝聚力，党的组织与宣传工作难以开展，各项方针政策传达困难，在农村尤其严重。胡锦涛曾指出：“有些地方农村党员队伍年龄老化、文化程度偏低的情况严重。”“部分党员素质不高，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有些党员甚至丧失了先进性。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基层党组

^①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09。

织作用的发挥。”^① 这些困难的出现不能完全归咎于基层党员群众不觉悟，素质低，文化浅。应该从党组织自身查找原因，看看是不是由于工作方法不对路，指导思想有问题，或者具体执行过程中有问题。只有谦虚地接受群众的批评与建议，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方法和作风，使基层组织工作更贴近群众，更接近群众的生活，才能得到广大党员群众的肯定与支持。在基层组织工作中一定要敢于创新，善于创新，创新才有活力，创新才能提高。加强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一定要把改进创新作为基本着力点，作为增强工作活力的重要途径，作为开创工作新局面的基本要求。

同时，汲取苏共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教训，在加强城市社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等新兴组织体中的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同时，还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不能让农村基层党组织成为学习型政党、学习型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瘸腿”。

（五）尊重基层党员的首创精神，大力弘扬集体主义和团队合作精神

任何一个组织都存在个体、群体和组织体系三个要素，在这三个要素中，把个体凝聚起来，形成组织的支撑力的群体或者团队，是代表组织文化的重要部分。在基层党组织活动中，深入细致地研究个体，有针对性地组织党员活动，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是一项长期细致的工作。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基层党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发展合格的党员，在发展党员时，把好质量关，就成了第一要务。基层党组织要全面考察发展对象，把德才兼备的群众及时发展到党组织中来，提高基层党员的整体素质。同时，基层党组织应尊重党员在学习和工作中的首创精神，及时发现那些健康向上的、有创意的、有影响力的典型人物，在社会上树立党员的先进典型，以他们的事迹影响周围的学生，激励和带动普通群众。当健康向上的思想成为主流的时候，不健康的、低下的思想也就失去了传播市场。对于基层组织来讲，这既是帮助和带动党员个体学习、发展、提高的过程，也是基层党组织自我完善的过程，只有把党员个体都维系在组织中，把他们团结起来，基层党组织才有凝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卷），人民出版社，2003，第2437页。

聚力和号召力，才有可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另外，基层党组织还应大力弘扬集体主义和团队精神，努力营造积极向上的群体氛围。出于人数和地域等主客观原因，各地方、各部门基层党组织中的党员数量有多有少，有些活动还召集不齐人。不过，无论人数多少，基层党组织都是一个群体，是党在群众中最基层的组成部分。这些群体发挥作用的好坏，对于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宣传与落实，对于在群众中建立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形成有活力的、有战斗力的、高效率的战斗堡垒，有着重要影响。基层党组织应以多样化的形式，利用多种渠道，加强与基层党员和普通群众的联系；通过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把群众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发挥基层党员的创新精神，不断创新组织活动形式，以个体创新带动党组织工作的创新；发挥基层组织的团队精神，以先进的典型人物和团队事迹来宣传和引导社会舆论，形成积极向上的集体环境；通过组织活动使基层党员得到良好的培养和锻炼，使之有可能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把党的影响带到各行业各部门。总之，基层党组织在完成党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时，要善于发动党员群众，发挥基层党员和普通学生的创造力，营造和谐健康的组织氛围，在基层党组织中更好地发挥群体与团队的作用，通过群体与团队为组织的其他人员树立典型，起到示范作用。那些身边人活生生的教育形象，正是基层党组织发挥教育作用的好抓手。

总之，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加强自身建设来保持先进性。要保持基层党组织的先进性，就必须不断学习。

结束语 男儿为何不抗争

2014年11月7日，也就是原苏联时代的国庆日，也是十月革命97周年的纪念日。在莫斯科的普希金广场附近，来自俄罗斯各个城市和州、区的共产党代表举行了游行集会。在那个下着时大时小的秋雨的傍晚，成百上千的老党员不顾雨水打湿了他们的衣服，来参加集会和游行，那里成了红色的海洋。在网上可以看到，这一天在俄罗斯的其他一些城市，共产党员也举行了规模不等的集会。苏联解体已经快30年了，苏共被解散也有这样长的时间，但是每到这一天，在俄罗斯的各个地方都会有大大小小的集会，人们以此方式纪念1917年建立苏维埃国家的那一场革命。令人唏嘘感叹的是，在接近100年前的那场革命发生时，在俄罗斯有35万名党员，这个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打退了帝国主义国家的进攻，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并在74年后达到1900万人。但也正是在它成为世界上党员数量第二多（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远远超过它）的情况下，这个党失去了执政权力，随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今天，俄罗斯共产党的人数比近100年前的十月革命时还要少（15万人左右）。尽管俄罗斯共产党的领导人和党员一直在为提高党的政治影响力而竭尽全力，但辉煌的历史毕竟已成过去。

自从苏联解体后，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就成了一个热议不衰的话题。人们从历史的、当下的、客观的、主观的、内部的、外部的各个方向探寻其原因。也是在那个时候，一位中共领导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时，苏共的上千万基层党员在做什么？他们是怎么想的？在没有掌握足够的材料情况下，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不过，当代俄罗斯历史学家罗伊·麦德韦杰夫在其著作《苏联的最后一年》中一个场景的描述却令人扼腕叹息：1991年8月23日，当苏共中央和俄共中央的部分工作人员离开位于老广场的苏共中央办公大楼时，大批示威人群汇集在大楼的出口，“到处是喊声、口哨声、叫嚣声，俨然就是一场革命。有人冲着库普佐夫喊道‘揍他！’有人抢走了一位女工作人员的书包，

并仔细地翻看着，显然是想寻找秘密文件。他们的表现极其蛮横无理，对我们党来说，这简直是一场灾难！”^①——苏共的执政历史就在这样的境况下黯淡地结束了。就像一部轰轰烈烈的大片，正在上演，观众正在看着的时候，“主要演员”却出来谢幕了，所有的场上人物也都一下子散去……后来，不少中国学者也感到疑惑：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广大基层党员真的是十分冷漠，没有一个人去为这个曾经创造了举世瞩目成就的党抗争。那么，当时的苏共基层党组织在做什么？而广大基层党员到底是怎样想的？在2013~2014年，当全世界因为乌克兰危机而关注俄罗斯时，人们看到的是一位“为了国家利益”敢跟美国人叫板甚至敢跟整个西方世界叫板的俄罗斯总统，还有他身后80%以上的俄罗斯民众。在过去的一年里，“战斗民族”是人民经常用到的对俄罗斯人的称呼。可以说，俄罗斯不缺血性男儿，这是半个多世纪前那场艰苦卓绝的卫国战争就已经向全世界诠释了的事实。但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时，为什么竟然没有热血男儿为了自己的党、为了自己的国家起而抗争？

实际上，仅仅从罗伊·麦德韦杰夫的描述，或者其他前政要的回忆，或者其他当事人在苏联解体前后的莫斯科街头看到的场景中就得出“苏共垮台没有一个党员起而抗争”的结论，还是过于简单了一些。毕竟这是有着接近2000万名党员的大党，每个城市、每个地方面临的情况不同，每个党员的思想也不一样，他们在苏联面临历史抉择的关头，反应也绝对不可能一样。在理顺苏共的组织结构、管理模式，苏共作为执政党走过的几十年历程，还有苏共基层党组织的兴衰，以及不同层面的基层党员的思想和生活，还有苏联的最后几年那些基层党员看到、听到、体会到的苏联社会之后，我们应该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苏联的解体并不取决于基层党员，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也不在基层党员。若不是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老党员、老红军战士在苏联解体几十年后，还要顶风冒雪地每到与革命胜利有关的纪念日就走上街头，纪念当年的那场革命。但是，基层党组织的涣散，广大党员对执政党的政治冷漠，却使得共产党、苏维埃联盟大厦根基开始动摇。而没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执政党

^① [俄] 罗伊·麦德韦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142页。

的执政权也就不可能稳固。

在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访学期间，最初我曾经对一些老党员提出一些问题：“苏联解体的时候，您在想什么？当时您不觉得遗憾吗？您没有觉得应该为了捍卫党、捍卫联盟而出去游行示威或者呼吁吗？”这是非常明显的政治问题，接近于质问，似乎是在声讨当年的共产党员们。而我得到的回答往往是“非政治的”“生活化的”：“国家大事并不取决于老百姓，即便我们去抗议，又有谁听呢？”“当时物价飞涨，生活艰难，谁还顾得上那么多呢？”这样的回答尽管让我感到很不全面，甚至几乎是答非所问，因为“您的国家都没了，党也没了，在国家四分五裂的情况下，作为党员难道不应该捍卫党几十年领导的成果吗？怎么可以用‘顾不上’这样简单的话来解答如此重要的问题？”但是，在阅读一些回忆录以及查阅当年的档案材料，尤其是基层党员在斯大林时代和改革时期所经历的镇压、迫害以及眼见官员腐败、自己生计艰难的情况后，我对那些基层党员的感受有了一点体味，也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对于苏联解体这么重大的事件，基层党员的态度真的是可以用“冷漠”一言以蔽之的吗？他们真的不在乎自己的党、自己的国家存在与否？不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一个最重要的观点，就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英雄可以在某一时刻出现，被某种时势造就，甚至可以影响时局或改写历史，但是历史终归是由人民群众来写就的。苏联历史上有过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这样影响历史进程的“英雄”，苏联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围绕这样一些重要历史人物来写的（本书的结构大抵如此）。认真分析苏共基层党组织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苏联共产党基层党组织的发展经过了党小组、党支部和基层党组织几个阶段。列宁在早期革命活动中，对党的组织纪律、基层党组织的组织结构、斗争原则与方法等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这些理论后来成为苏共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理论指导。苏联前期，基层党组织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以及保卫社会主义国家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组织和宣传作用，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先锋队 and 战斗堡垒。苏共 20 大以后，基层党员的思想开始出现了重要变化，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使得广大党员不再完全相信党的伟大、党的领袖的英明。“解冻思潮”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以及西方的

“和平演变”等都在思想上给基层党组织的宣传工作带来干扰。而20世纪60~80年代在苏联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也给基层党组织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在各种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苏共领导人不思进取，在党的建设上，或经验主义、教条刻板，或一味压制不同意见，导致党组织宣传工作保守并缺乏新意，对党员失去吸引力，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也严重降低，基层党组织变成党员晋升特权的阶梯，被西方人称为帝国的苏维埃联盟的基础出现了松动。

真正给基层党组织在思想和组织工作上带来致命打击的是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无成就的情况下，在政治领域中实行的一些削弱共产党领导地位、违背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政策：“民主化”“公开性”使历史上的空白点越来越少，广大党员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越来越低；苏维埃选举、多党制的实行，对共产党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1990年夏到1991年上半年的退党风潮以及“8·19事件”后的反共风潮，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彻底搞垮了党的基础。

在这样的发展变化过程中，人们不难领会到：基层党组织在苏共这个执政党中处于最底层的地位。苏共的广大基层党员曾经在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过程中发挥过先锋模范作用，不过在多数时候，他们是被号召、被领导、被指挥的，在大多数时间里，他们都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国家的强大，寄托于国家领导者的有力与明智，尤其是在经历十几年“老人当政”的情况下。正因为如此，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广大党员群众被号召参与并支持改革，很多党员对年轻的领导人所描述的党和国家的改革寄予了极高的期望。但是，改革的过程却与领导者最初的承诺渐行渐远，也让那些党员群众困惑不解。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越改革物价越高，商店里的商品越少，越改革社会越动荡。最终，他们大失所望。部分基层党员所发挥的“最大的”一次主动性，就是在改革后期，在“民主化”“公开性”以及多党制与非政府组织运动大潮中，选择了退出共产党，加入其他政党组织或者干脆远离政治。

在回顾整个苏联历史，尤其是基层党组织的形成与发展历史的前提下，对于基层党员“远离”执政的共产党这一现象，并分析基层党组织与苏共失败、苏联解体的关系时，从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发挥角度，或者从基层党员的政治信仰、组织管理与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来看，可以做出如下判断。

1. 基层党员难以行使真正的民主权利，更无权决定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前就对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党的组织纪律、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动员与发挥基层党员的积极性和革命热情有过很多论述，他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也身体力行，经常深入基层党员群众中做深入细致的宣传工作。正因为如此，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在十月革命前后有了迅速扩大。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与革命热情在打退国内外敌人进攻、恢复战后生产的过程中也得到了极大发挥，人们忘我地参加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积极踊跃地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甚至在国家出现了“粮荒”，需要到农村去说服农民，与富农斗争的时刻，党员组成的“工作队”也成了农村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尽管当时很多“城里人”并不了解农民的生活，他们所做的工作也根本不受农民欢迎，但是那些党员的的确是怀着热情、十分忠诚地去完成党所交给的工作。在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以及卫国战争的过程中，广大党员也能够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去与“富农”展开斗争，成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英勇地保卫国家。不过，列宁当初强调的民主与集中的先后顺序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变化：从最初可以畅所欲言地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到组织决定，甚至领导人的一言一行、一个微笑或者一个不悦的表情都可以决定其他人的命运。党的组织结构层级越来越鲜明，权力越来越集中，基层党员的主动性与民主参与权利已经越来越小。并且，党的领导干部享有的特权越来越大，他们与基层群众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官僚主义、打官腔几乎成为苏联各级官员必须掌握的一项基本的工作技能。尽管赫鲁晓夫时期和勃列日涅夫前期曾经尝试过改革，但是苏共党的官僚结构还是以稳固的“金字塔”形状确定了下来。正如前述阿夫托尔哈诺夫在《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执掌国家命运与权力的是在塔尖上的政治局，以及由3万名党的书记构成的“书记集团”；几百万名党的干部组成的“委员会集团”享有或大或小的权力；而最下层的1600万名党员和候补党员并没有实权^①。阿夫托尔哈诺夫站在反对派的立场

^① [苏]阿夫托尔哈诺夫：《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杨春华、张道庆译，新华出版社，1981，第77页。阿夫托尔哈诺夫写这本书是在1979年，这是当时的党员数量。

上看待和分析苏联共产党的统治，我们不能因为他的这种描述就完全断定苏共基层组织没有任何民主权利。但是，事实上，广大基层党员的确对关乎国家和党的命运的政治问题几乎没有发言权。在几十年间他们接受的组织纪律就是服从，如果不想服从，就只能选择沉默，或一级一级地写信申诉，或在私下里表达不满。就此意义来说，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民主化”和“公开性”的确给了基层党员以表达意见的权利，但是几十年的惯性造就了基层党员的忍耐与服从，同时思想与言论一下子放开，以及对苏共领导人、苏共历史的否定又使得一些人脱离了共产党。在此情况下，不要说那些基层党员作为当事人并不可能完全意识到这样几个关节点：“8·19事件”的失败意味着党就要被摧垮，“别拉韦日阴谋”是一个推倒联盟的历史事件，即便是当时能够明辨历史，认识到那是关乎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他们也没有权力去左右高层政治家的决策。正因为如此，基层党员在当时更多的举动是沉默和服从。

2. 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与党的清洗严重挫伤了基层党员的积极性，也打击了他们的政治信仰。对政治的失望乃至绝望，是部分基层党员不愿意支持自己的政党的主要思想原因

对苏共党员数量变化^①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苏共历史上，有几个年头党员数量的变化比较明显：苏共党员总数在1917年10月达到35万人，1918年达到39万人，1919年回落到35万人；1921年达到73.3万人，1922年降到52.8万人，1924年再降到47.2万人，1925年又增加到80.2万人；1930年达到167.8万人，1934年再增加到270.1万人，到1939年又降低到230.7万人；1986年正式党员达到1828.9万人，1989年正式党员达到1897.6万人，到1991年正式党员的人数又降到1651.6万人。在这样的数字变化中，可以理清一些党的历史上的重大决策：1918~1919年的首次清党，1922~1923年的再次清党，使得1919年和1923~1924年党员人数大幅减少；1924年因列宁逝世而“号召青年入党”，1925年党员人数急剧增加；1939年党员比1934年减少近400万人，在这期间发生了党内最大规模和镇压和清洗；1986年正式党员与预

^① 参见本书附录一。

备党员的总数首次超过 1900 万人，1989 年正式党员接近 1900 万人，到 1991 年这个数字降到 1651 万人，在这期间党员大范围退党……几乎所有数字的变化都与苏共的“政治风向”紧密相关。

苏共历史上的清党，最初是为了清理资产阶级的残余以及投机主义者（如 1919 年和 1922 年），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则以党内斗争和混进苏维埃政权内部的“第五纵队”为主要目标。除了这些清洗之外，“消灭富农”、与“资产阶级工程师”斗争、揪出谋杀领导人的“医生集团”等斗争，也造成了大批党员被驱赶出境、被枪决、被流放、被强制迁移或劳动改造的情况。他们中间的确有资产阶级分子或者被西方国家买通的、企图破坏苏维埃政权的敌对分子，以及破坏集体农庄的“富农”坏分子，但更多的人则是蒙冤受屈者，他们有的被“公开审判”后枪决，有的被秘密处死，家人不知所踪，还有的被判为劳改犯，在环境极其恶劣的劳改地病饿而死。还有一大部分人最终等来了平反，但回到家里才发现原来的家已经支离破碎，亲人甚至不知在哪里，或者家人很难接受这些因多年劳教而性格变得怪异的亲人……所有这些都是“党”带来的伤害。在揭开这些内幕时，有西方学者指出了“纠正”党的错误的三个重要年代：斯大林逝世后的 50 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 80 年代中期以后，还有一个时间点则是苏联解体后^①。正是基于前述这样一些事实，斯大林的苏联被西方称为“极权主义”国家，出现了索尔仁尼琴以及萨哈罗夫那样一批“持不同政见者”；也因为如此，戈尔巴乔夫号召揭开历史“空白点”时，一段时间内收到极大效果，大批历史的、文学的著作纷纷登上媒体，谁批判这个制度谁就会受到欢迎，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几乎被完全否定。在此情况下，出现的脱党、退党甚至脱离联盟的主张，似乎都与争取自由联系在一起。为了能够“自由地呼吸”，人们甚至在内心中希望这个“不民主的制度”毁掉，在这个制度的代表——苏联共产党垮台之时，有的人欢呼，有的人沉默，更多的人则表现出冷漠，也就不足为怪了。

^① 奥兰多·费吉斯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这几个时间点。参见〔英〕奥兰多·费吉斯《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3. 党的官员的腐败，使得基层党员群众不可能去捍卫一个由贪官与特权者掌握的政党和国家

从列宁时期起，苏共就对党的财务纪律，党费支出，党的干部所能享受的医疗、食品、住房等方面的待遇有明确规定。在革命胜利之初，列宁就明确，金钱对于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十分重要，但是这是国家劳动者的劳动换来的，不能随便使用。必须把金钱用于正确的地方^①。在那个时期，党的干部多半是没有金钱观念、没有家庭观念、“把一切献给党”的革命者。当然，他们在生活待遇上也有部分特权。不过，真正的特权阶级却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规模饥荒时期。在饥荒的背景下，为了收集老百姓手中的美元、外汇等高档物品，在一些大城市里设立了可以用外汇购买食品的、专门的“外汇商店”。后来，这样的商店逐步变成了给领导干部提供价廉物美商品的“专供商店”，党的高层享有的特权由此不断扩大，包括食品和日用品的专供、修建别墅、每年定期休假，还有在电影院、剧院等公共场所设置特殊座位等等，一个精英阶层就这样逐步“养成”了。到了勃列日涅夫后期，官僚腐败、上下勾结、卖官鬻爵等现象几乎遍布苏共各个阶层，尽管安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时期采取了一些惩治腐败的措施，也不能根绝官员腐败现象。腐败与特权使领导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距离更加拉大。尽管很多基层党员也清楚，不能用个别党员干部的行为代替党的形象，甚至“斯大林的所作所为”都不能代表苏共，但是当他们的权利重新选择自己的党派和政治信仰时，还是有一部分党员离开了苏共，他们已经不可能再用鲜血、用生命去捍卫一个腐败的、不能为民众谋利的执政党。

当然，这里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的基层党员群众都希望共产党垮台。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工学院教师尼娜·安德列耶娃的文章《我不能放弃原则》。针对当时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口号掩盖下出现的批判斯大林、否定苏联历史的情况，安德列耶娃指出，全面否定斯大林的历史功绩的做法与其说是关系到历史上的个人，不如说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工业化、集体化建设时期的全部历史。她认为，在那个时期，整整一代苏联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业绩，

^① РГАСПИ. Ф. 347. Оп. 1. Д. 187. Л. 17.

不能出于今天意识形态的需要就简单地将当时人们创造的业绩完全抹杀。这位女教师的话反映出当时一些苏联人对苏联执政者在意识形态领域所实行的政策的不满，信件发表后也从上到下引发了很大反响。实际上，这样的一封信是在报纸上得以公开发表的，而在笔者查阅相关档案时，还发现有一些类似信件，被杂志社扣压下来，没有登出。有的信中还用“不能抹黑历史”“不能这样对待我们的过去”“抹黑我们的历史是有害的”等言辞表达对否定苏共的历史、否定党和国家的过去的强烈不满，对当时否定历史的做法进行了批评^①。这些情况说明，苏联解体前后，在苏联出现的全盘否定历史的做法，一些宣传内容不仅对斯大林个人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进行攻击，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广大党员和群众在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做出的成就，令部分老党员和很多亲身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群众愤慨。他们也发出了呼吁，但显然他们的声音或者被苏共高层的个别人利用来“抓女妖”^②，攻击“保守派”，或者被揭开历史“空白点”的“公开性”给压制或湮没了。当否定历史、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的言论泛滥时，那些为历史的公正而发出的呐喊之声已经无法与之抗衡。这些事实充分证明，苏共意识形态领域放开、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执政党放弃领导权的教训极其深刻，发人警醒。

苏联解体前，在所谓“公开性”“民主化”的口号下，苏共放弃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允许党员公开发表与组织决议不同的意见，实行所谓各级党组织自治原则，一些苏共党员甚至领导层成员成了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成了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大喇叭，苏共党内从思想混乱演变到组织混乱。最后，这样一个有着90多年历史、连续执政70多年的大党老党就轰然倒塌了。人们曾经提出一个问题：苏共早年在有20万名党员时能够夺取政权，在有200万名党员时能够打败法西斯侵略者，而在有近2000万名党员时却丢失了政权、丢失了自己，这是为什么？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分析道：“我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政治纪律

^① 在РГАСПИ. Ф. 572. Оп. 1. Д. 1034、Д. 1035、Д. 1036这几个卷宗中，有一些写给《共产党员》杂志编辑部的信件反映了基层党员的反感情绪。

^② 这是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的说法。参见〔苏〕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王廷玉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第145页。

被动摇了，谁都可以言所欲言、为所欲为，那还叫什么政党呢？那是乌合之众了。”^①的确，苏联共产党曾经是一个有着严格组织纪律的执政党，战胜过国内外敌人，克服了各种困难，却在拥有近2000万名党员的情况下失去了政权。这足以说明，党员的数量并不能完全代表党的力量，重要的是党要执行正确的路线，把广大党员的思想凝聚到一起，才能成为一个可以牢牢掌握政权并富于创造力的执政党。苏共基层党组织在纵向上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在横向上曾深入苏联社会生活的几乎每一个角落。这样庞大的政党基层组织，在苏联解体前即已松动垮塌，其根源还在于苏联共产党的领导者自身。苏联共产党在斯大林时代没有被法西斯打败，主要原因是党的领导人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基层党组织作为党的基础始终是党的事业的支持者。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共产党也没有被来自对立面的思想运动或暗流涌动的民族矛盾摧毁，主要原因也是苏共领导者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路线这一基本原则。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后期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走社会主义道路，失去了民心，搞乱了党的基层组织，导致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失败。苏共失败的事实证明，执政党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坚持严格的组织纪律与严明的政治纪律，对于党的事业、社会主义事业十分重要。

19世纪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曾说，历史是“一个时代在另一个时代里发现的值得注意的那些东西的记录”^②。在苏联的70多年以及苏联解体以来，有关苏联共产党基层党组织的“值得注意的”材料浩如烟海，要将苏联社会生活中每个领域中基层党组织的情况都说清楚，也许需要有几部十几部专著来专门研究。就此意义来说，本书还有很多不足。不过，能够在现有材料基础上，将苏共基层党组织的发展历程理出一个大致轮廓，总结一定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为执政党在基层党组织建设方面提供一些借鉴，本书的目的也已经基本达到。

^① 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月22日。

^② 雅格布·布克哈特（1818~1897年），19世纪瑞士历史学家，在西方艺术史和文化史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他在1860年所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是研究文艺复兴的经典著作之一。文中引用的话取自Jakob Burckhardt, *Judgments on History and Historians*, London: S. J. Reginald Saunders & Company, 1958, p. 158. 转引自〔英〕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吴柱存译，商务印书馆，1981，第57页。

附录一 苏共党员人数变化

单位：人

| 时间 | 正式党员数量 | 预备党员数量 | 党员总数 |
|---------------|----------|---------|----------|
| 1905 年 | 8400 | 无 | 8400 |
| 1907 年 | 46000 | 无 | 46000 |
| 1917 年 (3 月) | 240000 | 无 | 240000 |
| 1917 年 (10 月) | 350000 | 无 | 350000 |
| 1918 年 | 390000 | 无 | 390000 |
| 1919 年 | 350000 | 无 | 350000 |
| 1920 年 | 611978 | 未计算 | 611978 |
| 1921 年 | 732521 | 未计算 | 732521 |
| 1922 年 | 410430 | 117924 | 528354 |
| 1923 年 | 381400 | 117700 | 499100 |
| 1924 年 | 350000 | 122000 | 472000 |
| 1925 年 | 440365 | 361439 | 801804 |
| 1927 年 | 786288 | 426217 | 1212505 |
| 1930 年 | 1184651 | 493259 | 1677910 |
| 1934 年 | 1826756 | 874252 | 2701008 |
| 1939 年 | 1514181 | 792792 | 2306973 |
| 1941 年 | 2490479 | 1381986 | 3872465 |
| 1946 年 | 4127689 | 1383173 | 5510862 |
| 1952 年 | 5853200 | 854339 | 6707539 |
| 1956 年 | 6767644 | 405877 | 7173521 |
| 1959 年 | 7622356 | 616775 | 8239131 |
| 1961 年 | 8472396 | 803430 | 9275826 |
| 1966 年 | 11548287 | 809021 | 12357308 |
| 1971 年 | 13745980 | 626583 | 14372563 |
| 1976 年 | 15029562 | 609329 | 15638891 |
| 1977 年 | 15365600 | 628876 | 15994476 |

续表

| 时间 | 正式党员数量 | 预备党员数量 | 党员总数 |
|--------|----------|--------|----------|
| 1981 年 | 16732408 | 698005 | 17430413 |
| 1986 年 | 18288786 | 715592 | 19004378 |
| 1988 年 | 18827271 | 641515 | 19468786 |
| 1989 年 | 18975725 | 512097 | 19487822 |
| 1991 年 | 16516100 | - | - |

资料来源：〔苏〕Н. А. 彼特罗维切夫主编《党的建设》，郭华等译，求实出版社，1983，第70~71页；Спутник партгруппорга Москва. 1982. с. 3；Справочник партийного работника. 1989；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с. 591；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июнь. 1991。

附录二 苏联共产党基层党组织 发展情况

单位：个

| 时间 | 基层党组织数量 | | 车间党组织数量 | | 党小组数量 |
|--------|---------|-------------------|---------|-----------------------|--------|
| | 总数 | 设有党委会的 基层党组织数量 | 总数 | 享有基层党组织权利的 车间党组织数量 | |
| 1922 年 | 32281 | — | — | — | — |
| 1941 年 | 184238 | 298 | 23842 | 6802 | 27433 |
| 1946 年 | 244707 | 429 | 23250 | 9403 | 28959 |
| 1952 年 | 343976 | 773 | 52054 | 16979 | 112150 |
| 1956 年 | 351249 | 1340 | 76058 | 26974 | 122243 |
| 1961 年 | 294873 | 12234 | 173961 | 96248 | 164931 |
| 1966 年 | 326886 | 24704 | 287250 | 185279 | 351463 |
| 1971 年 | 369695 | 31219 | 352871 | 235660 | 443233 |
| 1976 年 | 390387 | 35951 | 400388 | 274454 | 528894 |
| 1981 年 | 414048 | 40652 | 457053 | 312562 | 618127 |
| 1986 年 | 440363 | 44698 | 511579 | 348405 | 721271 |
| 1989 年 | 441949 | 46141 | 521425 | 360152 | 683003 |
| 1991 年 | 426266 | 40862 | 401675 | — | 309427 |

资料来源：〔苏〕Н. А. 彼特罗维切夫主编《党的建设》，郭华等译，求实出版社，1983，第215页；Спутник партгрупорга Москва. 1982. с. 3；Справочник партийного работника. 1989；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с. 598；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июнь. 1991。

附录三 当代俄罗斯学者评析赫鲁 晓夫的“秘密报告”

苏共二十大的神话*

Ю. В. 叶缅里扬诺夫

一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出台的动机

赫鲁晓夫使自己的报告处于不为主席团其他成员所知的秘密状态，企图以此证明后来他所做的秘密报告的内容已经被 20 大决议所接受。显然，如同当时采纳所有会议决议的过程一样，20 大决议的正文在主席团开会前已经被通过。大概，赫鲁晓夫已使主席团确信，他的报告将符合决议的内容。实际上，决议中反复说到的关于个人崇拜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遵守列宁的集体领导原则的话，一点都没体现出秘密报告的主要内容。

此外，赫鲁晓夫显然不是仅仅因为突发奇想采取行动，而是处心积虑地将自己的这个报告变成政治武器。利用这个报告，他向自己的政敌主动出击，创设了一个将要向他们发起进攻的“立足点”，同时又能保证在自己处境不利时临时停战，以保证自己能稳定现有的局面。

赫鲁晓夫在自己的报告中十分关注莫洛托夫及马林科夫都参与过的

* 本文取自 Ю. В. 叶缅里扬诺夫的手稿《评判斯大林》（*Суд над Сталиным*）一书中的一章。作者叶缅里扬诺夫，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历史学副博士、政论家、作家、肖洛霍夫国际奖金获得者。1937 年出生，1961 年毕业于苏联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1961 ~ 1995 年在苏联科学院工作，主要研究国际关系、世界历史。著有《斯大林：通往权力的道路》《斯大林：在权力的巅峰》《文明的诞生与毁灭》《布哈林札记》等著作，他在文章《苏共二十大的神话》（Юрий Емельянов. Миф XX съезда）中详细讲述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在青年团员中的反响。该文译为李燕，原载李慎明主编《历史的风——俄罗斯学者论苏联解体和对苏联历史的评价》，人民出版社，2009，第 166 ~ 188 页。

1936~1938年的“大清洗”。“列宁格勒案件”被列为报告的一个单独的章节，因为下一步赫鲁晓夫就指责马林科夫参与制造了这个“事件”。可以设想，他这样做就是为了向自己的对手发起攻击准备立足点。

在报告中，尽管赫鲁晓夫并没有直接提到马林科夫的名字，但他却不止一次地向代表们提供一些使这位前部长会议主席威信扫地的信息。在谴责战争初期斯大林给红军使用恶劣的武器装备时，赫鲁晓夫回忆了自己与马林科夫的一次电话交谈。当回答赫鲁晓夫说的“有许多志愿者想参加军队并要求得到武器，您必须向我们提供武器”时，马林科夫似乎答复：“我们不能给你们提供武器。我们要把所有的武器都发往列宁格勒，你们应当自己武装自己。”这个故事反映出马林科夫是一个冷漠无情的官僚主义者，他在战争初期妨碍组织国家性的防御，并拒绝给爱国者提供武器。这也就难怪会议的速记记录中，回应赫鲁晓夫的话的是“大厅里一阵骚动”。

在宣布斯大林在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冲突中“扮演了可耻的角色”后，赫鲁晓夫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特别停顿下来。他强调苏共中央七月全会（1955年）的决定，当时，在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的争论中，全会支持了他。于是，赫鲁晓夫就使大家认识到，半年前莫洛托夫因赫鲁晓夫拒绝坚持以前对铁托的政策，对赫鲁晓夫严厉批评，同样也“扮演了可耻的角色”。

这样一来，在向斯大林进攻的同时，赫鲁晓夫也准备好了继续与马林科夫及莫洛托夫斗争的思想政治阵地。过了一年半，他就以苏共20大秘密报告中的话为根据，来指控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他们的同伙在斯大林执政时期做了目无法纪的事。不过，在苏共20大上，赫鲁晓夫并没有采用波斯别洛夫委员会直接指控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的材料，从而避免了与自己在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同事们的论战。他采用适度的方式，以使自己的同事们暂时摆脱了被指责为那些不合法行为的同谋者的处境，而对那些不合法的行为，赫鲁晓夫只是谴责了斯大林。他宣称：“正如当时向中央政治局成员宣布的那样，斯大林并没有给他们看许多被指控的党的积极分子的申诉，这些积极分子给军事法庭带来自己先前的认罪书并请求客观地分析他们的事情。”在集中起所有对斯大林的指控（只有一部分指向贝利亚、阿巴库莫夫和叶若夫）后，赫鲁晓夫实际上是在提

议自己的同事们联合起来反对那位已故的大元帅。

对斯大林的攻击使赫鲁晓夫得以找到全党共同的政敌，并使可能形成的反对自己的帮派瓦解。在做报告时，赫鲁晓夫不止一次地提醒一个或另一个党的领导人想起斯大林给他们带来的屈辱。赫鲁晓夫回忆了在1952年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斯大林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严厉批评，并复述了布尔加宁对斯大林不信任自己的抱怨。赫鲁晓夫还召来了沃洛什洛夫，用他的回忆批评斯大林。

赫鲁晓夫不断地引用大量的例子，为的是造成一种印象，即那些党的领导人随时可能成为“大清洗”的牺牲品，被关押和被枪决。同时，赫鲁晓夫还营造出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们处于痛苦中的气氛，以使这些人比较容易避开滥用职权甚至犯罪等这样或那样的指控。正是因为始终处于被关押、刑讯、拷打和死亡的威胁之下，他们才被迫接二连三地做出一系列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不错，这种说法会削弱赫鲁晓夫下一步对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以及其他反对者的进攻，但同样也使得他自己躲开了批评。看得出来，在那个时候赫鲁晓夫更感兴趣的是，他的报告不是以进攻别人为目的，而是承担自我防卫的任务。

在史无前例地攻击自己的前任的同时，赫鲁晓夫明显地试图确立进行政治斗争的新规则。当代政治生活的经验证明，领导人对自己卸任后所将要面对的命运之恐惧，有可能促使他们采取极端行为。因此，对他们而言，在任时的一个强烈目的，就是提前得到自己在放下权力后没有危险的担保。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党的领导已经确认，他们坚决反对使政治斗争尖锐化到以人身消灭为结局这样的目无法纪和恐怖行为，当然，这种提法只是在1953~1954年，在逮捕和处决了贝利亚、巴吉罗夫、米尔库罗夫、阿巴库莫夫和其他人以后才得到落实并强化。

尽管赫鲁晓夫千方百计地使这些人的形象给人们留下恶劣印象，但在指责20世纪30~50年代的“大清洗”时，他还是不断强调不能容忍逮捕、处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为。在介绍这个或那个人在“大清洗”时期无辜遭难时，赫鲁晓夫常常引证他们在革命年代的作用以及在党内显眼的地位。赫鲁晓夫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证明那些残酷的“大清洗”的牺牲者的党的活动家无罪，正因为如此，他宣布艾伊赫无罪的主要证据是，艾伊赫曾是“党和苏维埃政府著名的工作者”，“从1905年就入了

党”。为证明鲁祖塔克无罪，赫鲁晓夫这样强调他的特点：他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当时曾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代表”，“一个在沙皇时代服过十年苦役的人”。赫鲁晓夫还用“他从1905年就是党员”这种话来肯定罗泽勃柳姆无罪。为“证明”对卡巴科夫的指控是荒谬的，赫鲁晓夫强调他是“斯维尔德洛夫州党委会书记，联共（布）中央委员，从1914年就入了党”。赫鲁晓夫用以证实科西奥尔、丘巴里、波斯德舍夫、凯萨列夫无罪的主要证据是，“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杰出的活动家”。

按照赫鲁晓夫的逻辑，可以想见，老革命者的身份和在党内具有很高地位本身就可排除对这些或那些人的有罪指控和使之成为被告的可能。同时，赫鲁晓夫还使人们明白，那种至今仍在起作用的规则（就是按照这种规则枪决了贝利亚和其他人），现在被废除了。

通过确定政治斗争新规则，赫鲁晓夫一方面避免了自己因“背叛列宁和斯大林的事业”而在中央政治局受到迫害的威胁；另一方面，宣布对党的最高阶层成员的豁免，是在向他们担保其不会受到逮捕、死刑和法律惩罚，赫鲁晓夫本人就能够得到党内高层中大部分人的支持，这些人在国家权力斗争尖锐化时会因担心自己的命运而支持他。不能否认，正是这种情况保证了赫鲁晓夫在大会代表中获得了必要的支持。苏共20大速记记录证实，在宣读重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名单时，只是读到赫鲁晓夫的名字后，会场响起了“暴雨般的掌声”。掌声是否真是“暴雨般的”很值得怀疑，但可确知的是，在对苏共20大第一轮中央主席团成员选举中，赫鲁晓夫重新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这是意料当中的事。

赫鲁晓夫那些在后来几乎半个世纪中带有各种说法和补充说明的、被一再提起并且目前仍在被提到的对斯大林的指控，只是为挽救自己的政治前程（可能还包括生命）。当时，因为斯大林已经故去，赫鲁晓夫对他的评判不能以惩处而告终，于是这些指控也就都以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形式出现。

尽管报告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词句，还引用一位在中国鲜为人知的德国政论家、历史学家瓦尔德海姆·布洛斯说的，有关马克思曾向他表示过十分反感“个人迷信”的话，这个报告也不能当成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个题目的理论著作。别看赫鲁晓夫反对颂扬历史

中的个人，但从他的报告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并不能对诸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样的单个历史人物提出新的看法。

不错，赫鲁晓夫曾表示，要限制用健在的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居住区、企业的数量。但是，以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其他一些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字命名的一系列城市和其他居民区、工厂、集体农庄，只是到1957年将这些人解除党的领导职务后才出现名字上的变化（沃洛什洛夫被“取消”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城市和工厂是在1961年以后，那时赫鲁晓夫得知了他积极地反对自己）。除此之外，在苏维埃政权早期形成的，给处在党和国家高层位置上的领导人的待遇没什么改变。关于党的高层领导公开讲话的报道、关于他们在官方活动中的报道，被公开发表在报纸的头版，并在广播和电视新闻中播出。他们的讲话和报告依旧会被印成几百万份小册子发行，他们的照片依旧挂在政府机关的墙上，在重大节庆日子里，他们的照片还会挂在城市或农村的街道上。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被特殊的荣誉包围着。他的讲话不断地被公开发表或播报。他的言论被作为解决各种现实问题的有教益的指示，不断登载在报纸、政论性刊物或在科学讨论中引用。有关他的活动的照片登载在各地报纸头条的显要位置，他的画像也挂到了其他苏联领导人中间。

显然，以任何形式进行的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绝不是说要拒绝承认那些在世的和已故的领袖们在苏联社会生活中的领袖地位。他们的活动和讲话，关于他们的生平介绍，对于苏联人而言，仍然还应是思想、政治、精神的指南，他们的形象仍将激励人们去创造劳动业绩。同时，马克思写给布洛斯的信中的一句话被理解为前述的那些活动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中也不必完全杜绝个人迷信现象。

二 赫鲁晓夫指控斯大林的主要内容

在赫鲁晓夫的报道中，所有直接谈及对待领导者个人问题的内容，都被称为“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报告的内容特别提到斯大林的活动。赫鲁晓夫并没有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代之以实际上是在表述自己的看法：斯大林是否能够配得上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样

享有的荣誉，甚至于说，他是否可以与许多已故的以及现在仍在活动的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相提并论？因此，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就具有了揭开面具的特点，实际上也可得出结论，就是斯大林不配享有所有苏联老一辈领袖，包括当时在世的国家领导人享有的那些荣誉。

首先，赫鲁晓夫极力证明，使斯大林得以与苏维埃国家领导人相提并论的多数功绩，并不是斯大林一个人的业绩。在千方百计地贬低斯大林对苏维埃国家成就的贡献，以及强调共产党的作用，特别是党的地方组织的作用（他用了这样的话“我们的历史性胜利的取得是有赖于党的组织工作，有赖于地方党组织”）时，赫鲁晓夫向州党委领导们，以及其他州和区一级党的代表们显示自己是怎样注意这个问题的，以期借抬高地方领导们在国家成就中的作用，来贬低斯大林的作用。

其次，赫鲁晓夫断言，斯大林的一些功绩并不完全属于斯大林自己。赫鲁晓夫竭力消除那种诸如斯大林是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的组织者的看法。他把战争初期红军武器装备不足和后来红军在各个战场上的失败（包括1942年5月西南战场上的军事进攻被击溃），都归罪于斯大林。赫鲁晓夫断定，斯大林认为在选择开始进攻的时机上，朱可夫元帅荒唐迷信，因此不相信朱可夫的指挥才能。于是赫鲁晓夫下结论说，斯大林是按照地球仪指挥军事行动的，他也根本不会看军事地图。

按照赫鲁晓夫的观点，斯大林不只是根本不适合在战争时期作为国家领导人，他还证明斯大林在战后和平时担任国家领导人也是完全不具备能力的。在重复马林科夫1953年在苏共中央七月全会上最先提出的、对斯大林不懂农业的指责后，赫鲁晓夫断言：“斯大林只是从电影上看到农村和农业。而这些电影画面都对农业经济的实际情况做了美化。”

最后，赫鲁晓夫承认，斯大林也有一些功绩，这些功绩他不予抹杀，但也不详细说明。在报告开头他指出：“关于斯大林的功绩，在他生前已经有足够数量的书籍、小册子和论著来描述。在筹备和举行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庆祝活动期间，在国内战争期间，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斯大林的作用举世瞩目。”就是在报告中，赫鲁晓夫也承认，在“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反对右倾投降主义者和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的斗争中，“斯大林起到了积极作用”。在评价这些斗争的意义

时，赫鲁晓夫说：“这是顽强、艰苦的斗争，又是必须进行的斗争，因为无论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还是布哈林分子，他们想坚持的政治路线，在实质上，都是复辟资本主义和向世界资产阶级投降的路线。”

在明确自己不久前批评马林科夫低估重工业的意义，过于关注轻工业的发展时，赫鲁晓夫特别痛斥了1928~1929年的“右倾”路线：“让我们来看看，如果在1928~1929年右倾分子在上层掌握了政治路线，或者是我们采纳了‘棉纺织工业化’，抑或是依靠富农的路线，将会出现怎样的情形吧。我们的国家将是羸弱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赤手空拳。”赫鲁晓夫使大家认识到，苏联面临世界战争放下武器，与马林科夫的主张，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因此，赫鲁晓夫讲到斯大林的作用的几句话，对于他自己而言，仅仅成了他与反对派进行斗争的政治武器。

赫鲁晓夫所列举出的斯大林的全部活动，包括他的功绩，按赫鲁晓夫的看法，都成了斯大林的罪行。报告更关注的是斯大林所做的恶劣的事，因此，赫鲁晓夫的演讲，实际上变成了对斯大林的声讨。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主要指控归结起来看，首先是贝利亚对斯大林的一些指责：斯大林应对安全保卫机关工作人员为逼迫人们承认各种各样的罪名而对他们进行刑讯、拷打承担主要责任。结果，对安全保卫机关工作的介入，就成了斯大林活动中引人注目的部分。在此情况下，赫鲁晓夫也像贝利亚一样，肯定斯大林强迫国家安全部门大肆违法乱纪。

赫鲁晓夫宣布：“我们指控叶若夫1937年的粗暴行径完全没错。但是，我们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当叶若夫要逮捕如科西奥尔那样的人时，没有斯大林的批准能行吗？政治局有没有就这个问题交换过意见或做出决定？没有，不曾有过，就像在其他情况下一样没有这样做。叶若夫本人能够决定得了那些优秀的党员的命运吗？不，认为叶若夫一个人就可以做这事的想法很幼稚。十分明显，是斯大林决定了这些问题，没有他的命令和允许叶若夫不可能做这种事。”

赫鲁晓夫用贝利亚对斯大林的指控来做补充说明。贝利亚断定，斯大林由于多疑，自己造出了许多“事件”。于是，赫鲁晓夫总结：“在审理这些事件时，他自己就是总检察长……许多专横行为是斯大林允许做出的，他们做那些事时根本没有顾忌到党的原则和苏维埃法律的规定。

斯大林是一个十分多疑的人，他有着病态的多疑……”

与贝利亚指控斯大林所捏造出来的事件的数量相比，赫鲁晓夫极度夸大了人们在拷打之下被迫承认罪状的那些捏造出来的案件的数目，实际上他把组织 1936 ~ 1938 年“大清洗”，叶若夫任职内务部人民委员会期间（1936 年 10 月 1 日至 1938 年 12 月 9 日）的罪过都加到了斯大林一个人头上（在这段时间内苏联最高军事法庭和赴 60 个国家出境管理委员会共判处 30514 人枪决，这还不包括在这期间地方一级法庭判处枪决的人。根据美国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杰里·哈弗估计，1936 ~ 1938 年清洗过程中约有 5 万人被枪决。众所周知，1905 ~ 1907 年为压制革命，出于政治原因被沙皇政府枪决和处死的也仅有约 2 万人）。

赫鲁晓夫还指控斯大林擅自决定迁移那些被揭发与德国占领者合作的人，而且还捏造了“列宁格勒案件”（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有 56 人被起诉）。在重复了贝利亚的指控后，赫鲁晓夫将捏造“医生谋杀案”的主要罪责放到了斯大林的头上。

此外，赫鲁晓夫极力将斯大林任期内所有失误中的大部分责任归罪于斯大林。在这里，很明显，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伙依据的是托洛茨基与斯大林斗争的手段，以及托洛茨基分子的作品，多半是 И. 杰伊奇的书。像 И. 杰伊奇一样，赫鲁晓夫将伟大的卫国战争初期红军的溃败归罪于斯大林。也像杰伊奇一样，赫鲁晓夫断定，斯大林毫无根据地不相信丘吉尔在 1941 年发来的电报，在电报中，英国首相告知德军将要进攻。

从报告内容可知，国家在 1956 年不得不解决的绝大多数突出问题，都是斯大林所造成的，或至少是因斯大林的行为而加深了。这种说法根本没有用严肃的证据来证明，但却使得对斯大林的指责加强了，并减弱了对当时国家领导人的批评。

赫鲁晓夫列举的斯大林的罪行，产生了极大影响，以至于假如斯大林还活着，而这些指控又被证实的话，他将不可避免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不过，即使赫鲁晓夫的全部指控都有根据，要证明一个实际上被赋予无限权力的大国执政者有罪，也是很难的。

三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指控是否合法

众所周知，对于执政者，人们可以因发生在其掌政时期国家中的任

何灾难来指控他。由此，反对者造出的传闻，甚至指责涅龙和鲍利斯·戈东诺夫^①组织在自己国家首都放火。与此相类似，对于沙皇时代周期性的大规模饥荒，在革命后，人们分析出的原因就不是在任何制度下都经常要发生的导致庄稼枯死的干旱，而是沙皇大臣的过错。他以俄国谷物出口为借口说：“我们吃不饱，但也要出口。”（在苏联解体后也同样，在我们纬度地区里不可避免的所有旱灾的后果，都可归咎于苏联的执政者们）。

苏联时代大国的规模和执政者被迫解决的诸多问题的特点，使得排除执政者直接参与大部分政府活动成为可能。这个大国的领导人有时甚至都没有机会得到关于平息发生在国内的事件的准确消息。因此，要想证明大国执政者个人的过错，必须有在法律方面无可争议的根据，证明那些违法行为是他本人做出，而非他手下的人做出。国家决策机制及其执行机制的复杂性，有可能使这样的调查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要撤掉大国领导人职务，在程序上要求职业法律工作者从各个方面付出巨大努力，来寻找证明领导人错误的必要文字材料和事实根据，这不是个别现象。甚至在对国家或政府首脑进行刑事犯罪的指控时，例如指控韩国前总统卢泰愚和全斗焕或者委内瑞拉前总统西梅内斯盗窃和营私舞弊，要证明他们有罪并不容易。对国家领导人之间在决策与行动权力方面的争夺进行指控，要想证明这种指控的正义性尤其困难。1973~1974年对美国前总统尼克松，1998~1999年对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弹劾程序的指控调查，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历史上也有过不遵守应有的法律程序对执政者进行的审判，这就成了无法无天的审判，就是这样的审判，曾将查理一世和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当时，用来证明这些君主过错的，是对其暴政的口头表决式的指控，关于无辜的婴孩极凄惨的遭遇，“暴君”的奴仆们含混不清的叙述，还有歇斯底里地要求为似乎是由君主们做出的暴行而复仇的呼声。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就曾用“有关暴君们所做的可怕的事……我们的极其悲惨的同胞姐妹们，我们的在母亲怀抱中被打死的孩子们”这样

^① 涅龙 (Tib. Claudius Drusus Nero Germanicus Caesar)，公元 37~68 年在位的古罗马皇帝；鲍利斯·戈东诺夫 (Борис Фёдорович Годунов，1551~1605 年)，1598~1605 年执政的俄国沙皇。

的话，来激起人们对路易十六及其从属们的仇恨。在发言反对延迟判决路易十六时，罗伯斯庇尔肯定地说，因为“法国人民的暴君……在逃离犯罪地点时被突然发现”，因此应该“在24小时内”给他定罪。罗伯斯庇尔进行判决的原则，是他预先给法国国王定下的死刑判决：“人民可以要求报仇……路易十六应该死，因为国家要活。”

可以想见，赫鲁晓夫已经没有可能将斯大林撤职，也不能惩处他。同时，即使对死后的斯大林提出指控，也要有确凿的证据。人们应该注意到，近些年来，在处理尼克松、克林顿以及叶利钦的事件中，至少都遵守了这种有法律权威的程序。如果再考虑到斯大林以及围绕着他的政权哪怕是专权的期限，都不是美国总统及俄罗斯总统所掌握的权力所能相比的，于是，这种调查就更需要付出难以想象的巨大努力，并且需要清晰的法律依据。与此相反，在这里，对斯大林的审判竟然变成了由人为树起的某些权威来评判已死去的前任，根据这些判决来“惩罚”他们的尸体这样一场稀奇古怪的闹剧。

赫鲁晓夫的报告根本不符合向国家领导人提出有根据的指控十分必要的条件。报告一开始宣读的题目——证实“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怎样不断地增长”这样的问题时，并没有展开。那些赫鲁晓夫向大会提出的、对代表们讲述的不久前苏联政治史的内容，只是部分地引用了一些信件、文章、讲话、政府决议中的句子，而且引用的句子有时对所讨论的问题并不适用（例如，大部分是从列宁、马克思、恩格斯文章中引用的话），或并不涉及斯大林本人。

赫鲁晓夫所提出的对斯大林的多数指控，都是被通过的决议，既不能作为对斯大林的已确认的权威评价，也不能作为确凿的证据。听众们不得不相信赫鲁晓夫的论断，即斯大林对采纳这样那样的决定并引发的后果负有责任。只有一个特例，就是赫鲁晓夫引用了被他称为“联共（布）中央密码电报”这一文档中的几行。在这个引文中，讲了“如何避免”使用“肉体行为的办法……来对待有名望的彻头彻尾的人民之敌”。但是，赫鲁晓夫肯定，并无根据证明这份电报是由斯大林发出的。赫鲁晓夫甚至没有说出同意签发电文的人的名字。

此外，作为证据，从这封电报中节取下来的几行字并没有揭示电文的真实内容。甚至可以用全部电文来指控赫鲁晓夫，因为可以根据电报

发出的日期（1939年1月20日）来判断。它是在叶若夫离开内务部（1938年12月9日）不久后发出的，当时已经开始了“叶若夫团伙”的审判活动（在消除“叶若夫团伙”后果的活动过程中，成百上千被关押的人得到了释放，被释放的人中就有过去曾是后来又成为苏联元帅的洛可索夫斯基和缅列茨科夫）。很快，由党的高层拟定好了电文，在联共（布）第18次代表大会期间（1939年3月10~21日）对叶若夫进行政治审查，他被逮捕了（1939年4月10日）。

“秘密报告”的大部分内容是赫鲁晓夫讲述对斯大林的个人印象。他断定，斯大林能够凭自己的怀疑逮捕人，进行拷打，并用这种方式得到所需要的供词。赫鲁晓夫用含混不清的证据来论证这些事，得出的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结论：“斯大林能够看着某一个人说‘为什么你今天不用眼睛直视我？’或‘为什么你今天鬼鬼祟祟？’这种病态的怀疑使他多疑并且不信任共事多年的党的优秀领导人。在他看来，到处都是‘敌人’‘叛徒’和‘间谍’。掌握着无限的权力，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消灭任何人。”

尽管赫鲁晓夫希冀成为有关斯大林的“真正的真理”的首位历史学家，他的报告还是存在歪曲历史事实，以及对过去的重大历史事件解释不清楚的错误。在讲述伟大卫国战争中的一些事件时，赫鲁晓夫激愤地说：“在战争期间中央政治局没有地位，也没有召开过一次会议。不错，1941年10月曾准备召集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当时中央政治局成员被从全国各地召集到莫斯科。他们为开政治局会议等了两天，却白等了。斯大林不愿意与政治局成员见面，也不愿意同他们谈话。这件事说明，在战争的头几个月斯大林是多么灰心丧气，又是多么傲慢和轻视政治局成员。”

赫鲁晓夫的叙述，可以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在战争初期，斯大林“轻视”政治局成员，“傲慢”地在自己位于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休息，情绪低落；他还在克里姆林宫狂饮，却不愿与政治局成员开会。但是，赫鲁晓夫只字不提，在1941年10月德军突破了苏军防线并向莫斯科迅速推进，这段时间在莫斯科出现了恐慌，所有政府官员中也出现了恐慌。与这种惊慌失措相反，斯大林坚决拒绝撤离莫斯科，表现得沉稳镇定，他用自己的行为让人们相信，首都不可能落到德国人手里。赫鲁晓夫也

没说，尽管患病，斯大林在1941年10月仍不停地工作，这种情况使他不能也不便于召集中央的政治局会议。但是，赫鲁晓夫对历史事实并不感兴趣。在讲述这些情节时，他感兴趣的只是指责斯大林如何“不尊重”政治局成员，同时证明，他自己如何尊重政治局成员，他自己怎样反对各种“傲慢”和“怀疑”地对待政治局成员的态度。赫鲁晓夫之所以要歪曲历史事实，目的在于使大会代表和将要上任的政治局成员明白，赫鲁晓夫才是他们的朋友和他们利益的捍卫者。

在解决政治斗争中所面临的任任务时，赫鲁晓夫将自己与斯大林对立起来，而他们两个人唯一一致的地方，就是都是苏联的领袖，是在任的和已逝的领袖。为了保全自己在政治领袖中的地位，赫鲁晓夫决定牺牲斯大林，将他从苏联英雄的名字中除去。为此，赫鲁晓夫极力证明，斯大林同伟大领袖列宁是有原则性差别的。赫鲁晓夫在报告一开头就讲述他所收集起来的列宁对斯大林的看法，以使代表们形成一种印象，即布尔什维克党的奠基人曾不断批评斯大林，给他各种忠告，直至临终前与他发生争论。这些说法从20世纪20年代起在反对斯大林的斗争中曾不断被使用，后来不止一次地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反映出来。其实，列宁的这些警告并不是他在多年共事中对斯大林所做出的全部评价，并且其中也有他对斯大林的称赞。此外，赫鲁晓夫显然没有注意到，他用这些来作为反对“个人迷信”的证据，并不合乎逻辑，因为列宁任何说法的出发点都不是在揭露一个永远正确的神。

同时，赫鲁晓夫还极力证明，与斯大林相比，列宁的主要优点是“苏维埃国家的第一位领袖在工作中尊重自己的同事”。赫鲁晓夫将列宁对党内同志，包括对某些时候反对过他的人的耐心，与斯大林对待从前各种反对派成员的缺乏耐心相比较。在证明国内战争时期“红色恐怖”完全正确时，赫鲁晓夫强调，列宁在任何时候都不会主张逮捕和枪决优秀的党的活动家，即便他们做出对革命事业有害的举动。赫鲁晓夫进一步指出，甚至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报刊上泄露了布尔什维克组织起义的秘密后，“列宁也未提出过逮捕和枪决他们的问题”。

从赫鲁晓夫这段话可以得出印象，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因为不同意1917年十月举行起义，而于1935年被逮捕并在1936年被处决。甚至还可以得出看法，在政权建立之初及政权巩固后，列宁完全有权力以

通敌罪名逮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甚至枪决他们，但出于善良的本性和正义感，列宁没有这样做。

苏联时代发行的电影和书籍的宣传作用，使得对列宁行为动机的这种解释在人们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实际上，以列宁为首的一方，和以季诺维也夫及加米涅夫为首的另一方之间的尖锐冲突，在1917年10月直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几乎没有超出党的领导人的圈子。说当时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中间甚至没有人想要惩罚这两个人，还可用这件事来作证：在被列宁斥责为“工贼”一周后，Л. Б. 加米涅夫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他和季诺维也夫后来都当上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

此外，赫鲁晓夫明显没有注意到，列宁在1917年10月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指责与1936年最高军事法庭对他们的指控在法律依据上截然不同。众所周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1917年10月的“错误”在于，他们发言反对起义，也就是反对破坏已建起的社会秩序。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1917年10月的立场无可指责。1936年8月他们被指控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组织杀害基洛夫以及许多其他犯罪行为，尽管有理由怀疑这些指控的根据，但这次他们的错误是有反对政府的行为，而不是力图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

四 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的真正目的

显然，以下结论对于赫鲁晓夫而言更为重要：逮捕并枪决那些著名的党的活动家，在原则上是不应该的。在这一点上，赫鲁晓夫与托洛茨基、季切尔^①指责斯大林时遵循了同样的原则。在发展这个思想的同时，赫鲁晓夫宣称：“以托洛茨基分子为例……他们中的许多人断绝了与托洛茨基分子的联系，并重新站到了列宁的立场上。”“有必要消灭这些人吗？”——赫鲁晓夫问道。这样问，意思是说所有过去的托洛茨基分子都“被消灭”掉了，对于赫鲁晓夫而言这很荒诞和不可思议。实际上，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远远不是所有托洛茨基的同党都被消灭了。Ф. Э. 捷尔任斯基曾加入托洛茨基反对派，他后来站到了斯大林一边。还有 A. A. 安

^① 指季诺维也夫——译者注。

德列耶夫也是托洛茨基分子的同党，他在1930~1952年斯大林掌政时期进入政治局。赫鲁晓夫本人也曾是积极的托洛茨基分子，这并未影响他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当上政治局委员。

拥有了很高的地位，对赫鲁晓夫而言，铲除自己昔日的同谋者的问题也就不是离奇和荒谬的。相反，在揭露真实的或臆想出的托洛茨基的同伙时，他相当积极地消灭托洛茨基分子。这一时期，正如1927年一样，在全国不超过4000人站在反对派立场上参加全国投票，而莫斯科市党组织第一书记赫鲁晓夫，1935年竟然能够仅在莫斯科市就搞出比8年前全国数量多出两倍半的托洛茨基分子。在1935年12月30日的报告中，赫鲁晓夫通报说，仅在莫斯科市就有超过1万名托洛茨基分子被揭发出来。不用说，这些真实的或臆想出来的托洛茨基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被“消灭”掉或投入了劳改营中。1938年2月，就任乌克兰党委书记后，赫鲁晓夫也带着同样的热情“揭露”并“消灭”托洛茨基分子。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报告中却多次肯定，大规模清洗的责任只在于斯大林，而党的其他领导对所发生的事情完全不知情。

在赫鲁晓夫的报告中，历史的真实被篡改成关于斯大林的谎言。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在20年时间里斯大林都在犯着深重的罪孽，那时善良的人们（政治局其他成员）就好像被罪恶的魔法师迷惑了一般，对此无能为力。如同所有谎言一样，报告也包含真理的种子（报告中讲到了受伤害的人们的命运），尽管有蛊惑性，有许多虚假和不真实的证据，报告还是因讲述了很多人的真实的遭遇而引起了巨大反响。

除非是完全冷漠无情的人，才能在听到艾伊赫、鲁祖塔克和其他人讲述自己所遭受的拷打和折磨的信的内容时能保持平静；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能冷漠地对待凯德洛夫信中的话：“我的痛苦已经到了极限。我的身体已被摧垮，我的意志和耐力也近乎崩溃。被作为卑鄙的背叛祖国的人死在苏联的监狱中——对于诚实的人来讲，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了。一切是多么可怕！无尽的痛苦噬咬着我的心！”只有没有想象力和没有感情的人，才会对那些成为荒诞的怀疑和拙劣的诽谤的牺牲品的人们的遭遇无动于衷——赫鲁晓夫的报告不可能不在代表们心中引起巨大的感情波澜。

显然，报告的炮制者——赫鲁晓夫、波斯别洛夫和舍彼洛夫期待的

正是这样的效果。他们非常清楚，死者的信，讲述在非人的拷打和残酷折磨下被迫招供的事，这些将会产生怎样的反响。这些甚至可以给苏共 20 大代表们留下活生生的人类痛苦的记忆，因为他们也像许多苏共 17 大的代表们一样，曾经有可能落入被拷打、折磨和枪决的境地。报告几乎令他们窒息。

看得出来，赫鲁晓夫没有在报告中进一步谴责斯大林，而是尽量让大会代表们保持在这种状态中。可以想见，代表们在精神恍惚的状态下，由于没有发现决议的内容和赫鲁晓夫的报告正文之间明显的不一致之处，因而接受了含有赫鲁晓夫的报告内容的决议。大会关于个人迷信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简短决议，并没有提供任何根据，可以推断的是，似乎只是由于某些“二十大的决定”，成千上万的人才获得自由，国家才恢复了法制。这个神话推动了大量著名文学作品和政论作品的产生，而 И. 爱伦堡创作于 1953 ~ 1955 年，在 1956 年才得以出版的名为“解冻”的长篇小说，成了苏共 20 大之后那个时期的标志。赫鲁晓夫的报告造成了一种印象，就是在漫长的思想政治严冬之后，突然解冻了，人们呼吸到沁人心脾的空气。

诚然，就像一个伸张正义的事件一样，苏共 20 大的神话本身能够对许多人的思想意识产生一时的积极作用，它使人们深信真理能够战胜谬误，善良能够战胜邪恶。根据一些回忆来看，包括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Н. А. 雷日科夫在内的一部分人，至今仍相信这个神话。雷日科夫曾写道：“1956 年召开了苏共大，我第一次用心去听党的声音。她的声音是那么响亮，那么可信，带着病容，却有透明度。我不能再按原来的样子生活了，1956 年 12 月，我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可以相信雷日科夫的话，就是当时不只是他一个人有“二十大的号召力相当大”这样的看法。

众所周知，并不存在什么“二十大的号召”，仅仅是在神话政权下人们的一种思想意识，认为能够感受到“党”的存在，能够听到她的“声音”。苏共 20 大的神话也再没有增加别的内容。同各种歪曲事实的神话一样，苏共 20 大的神话向人们掩盖了会议期间那些玩弄权术的事件的真正特点（尽管由此可以更清楚地认识会议决议），同时也掩盖了这些事件的真实内幕（在人们所经受的苦难上用卑劣下流的手段大做文章，

以及为迎合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伙们的政治考验，而不分青红皂白地篡改国家的历史)。苏共 20 大的神话成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常说过的“人民的鸦片”。正如所有的麻醉剂一样，这种“鸦片”让人们一时减轻了痛苦并感觉增添了力量，但之后却最终破坏了他们的意识和机体。在传播对国家领导人的无根据的“人道主义”幻想，掩盖政治斗争的真相，以及捏造出关于斯大林和他的时代的歪曲事实的说法的同时，苏共 20 大的神话欺骗了人们，并使千百万人在关乎国家命运的问题上丧失了斗志。苏共 20 大的神话后来使雷日科夫也迷惑并丧失警惕，在应该起而捍卫国家利益的历史关头，他却支持出卖国家利益的冒险家戈尔巴乔夫。

五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后果

与创造了神话相反，苏共 20 大本身只是把人们引向赫鲁晓夫所讲述的内容上去。确实，正如以后所表现的那样，大会的沉默，掩盖了人们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不同反应。后来，许多苏共 20 大的参加者在自己的声明或回忆录中，指责赫鲁晓夫的报告具有煽动性，并嘲笑他的一些指控荒诞不经。反正，在一段沉默后，苏共 20 大实际上是因赫鲁晓夫的提议而进一步阐释了苏联历史。

听到那些死前关于拷打、折磨及死刑的噩梦般的故事，想到如果不赞成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时期的评价和他所确立的政治斗争新规则，自己也有可能落入到这种境地，出于这种担忧，苏共 20 大代表们在选举时，明显地倾向于第一书记一方。选举的过程，就像电影“弃婴”中那个小姑娘面对的情况那样（有人问她“你想要什么？小姑娘，你要么掉脑袋，要么跟我们去别墅？”）代表们做出了明哲保身的选择（实际上是有利于这位在任的国家领导人）。

就像那个选择了跟着别人去别墅的五岁的小姑娘，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亲人一样，代表中的许多人显然忘记了，自己能够被提升为党的最高层领导干部应该归功于斯大林。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响应“列宁的号召”入了党，斯大林坚持执行这个号召，在他的努力下，在党内解除了那些同劳动人民联系不够密切的人的领导职务。斯大林还鼓励一些教育机构努力培养苏联的新型知识分子，在苏共 20 大的代表中，许多人在工农速成中学接受了教育。可以说，在苏共 20 大的大部分代表是被斯大林提拔

到领导岗位上来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斯大林将布尔什维克党的老干部撤职后，以惊人的速度晋升上来。在默然接受了赫鲁晓夫的报告内容后，大会的代表们显然在努力忘记真实的过去，极力突出第一书记为他们描述的那些暴行画面。

然而，斯大林对待自己周围的人并非那样反复无常。他有惊人的记忆力，能够将自己的“情感”摆到相应的位置。他说：“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心存感激，而后再同他发生争论时，那种普通人常有的正常情感，使他比对待完全不相干的人更加敌视自己从前的朋友和恩人。为了说明自己残酷无情和忘恩负义是正确的，你们应该把自己的对手想象成恶棍。”

大会代表们接受了赫鲁晓夫所讲述的过去的事情，未必想到了将来，准确地说，未必能考虑到自己的选择的全部后果。他们不知道，从那时起直到苏联共产党政权终结，党的高层都不仅可以避免对他们施加肉体折磨和死刑等，而且在卸任后也可不再追究。从苏共20大以后，国家和党的著名活动家成了不受控制的人，实际上置身于法律权威之外。不清楚是否有苏共20大代表对赫鲁晓夫的说法存在疑虑，但新规则完全为他们建立起来了。尽管那是一个虚伪的、不真实的和荒谬的报告，他们也支持由赫鲁晓夫确立的这些规则。

在克里姆林宫外，对赫鲁晓夫报告的反响或关于报告的传闻，没有被政客们的观点所左右，因此反应更发自内心。同大部分了解政治斗争规则和习惯的苏共20大代表不一样，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迷惑的大部分听众，是没有卷进政治阴谋中的人们。当时党给许多共青团组织发出了介绍“秘密报告”内容的信，而对于多数听到报告的人而言，1936~1938年发生的事，或是在他们出生前，或是在他们幼年时期，因此像艾伊赫、波斯德舍夫、科西奥尔这样的名字当时并不为人所知。国家领导人很高的威望，“秘密报告”的形式，以及赫鲁晓夫不断声称的他揭开了关于斯大林的“真相”——所有这些都不会使人对他所列举的材料真实性产生怀疑。令人恐惧的关于拷打、死刑的事实，凯德洛夫、斯涅戈夫和其他人发自关押地的信，不能不引起震惊。当时是我们同年级同学，后来担任俄罗斯驻英国大使的尤里·费金，受学院党委委托向我们宣读了赫鲁晓夫的报告，我还记得自己如何费力地记住那些不熟悉

的名字，以及读到死者极其凄惨的信所引起的那种激动。

尽管报告中提到的许多名字我们早已不知，但从小受到革命英雄故事的教育，使我们接受了诸如“诚实的共产党员”“老布尔什维克”这样的词，“从事地下工作的革命者”就是大义凛然、奋不顾身和英雄主义精神的毫无异议的证明。当阿尔卡季·盖达尔的小说《敲鼓手的命运》中的老土匪雅科夫为使自己更好地隐藏起来，决定给自己造出“传奇”经历时，他选择了参加过国内战争的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者的形象，这种事情一点都不奇怪。这个匪徒的同伙还向他做了这样的详细交代：“你是一个恰巴耶夫式的老游击队员，十月革命前服过苦役的政治犯，在生活中经受了很大磨难。”可见，连狂妄的匪徒也能列举出所有令他周围人尊敬的人名。当赫鲁晓夫说道“80%的有选举权的17大的参加者，在从事地下活动时，在革命前或在国内战争时期就入了党”，可以想见，这一席话勾画出了这些人诚实、正直、可靠的特点。

报告成了几乎无法解释的道德难题。加入少先队时的生动印象还留在记忆中，那时我们曾“郑重宣誓”，誓词中有“将坚信列宁—斯大林的事业”这样的话。在四年少先队时光中，每一次少先队集合，都有这样的问答：“少先队员们，要为列宁—斯大林的事业而斗争，时刻准备着！”——我们齐声回答：“时刻准备着！”还在四五年前，加入共青团时，在誓言中我们写下了愿为列宁—斯大林的事业而战斗这样的话。赫鲁晓夫宣布斯大林是一个恶魔，实际上将使我们一再违背自己的誓言。

我们面临困难的选择。从童年时代就习惯了这样的词“像列宁一样诚实”“像斯大林一样诚实”，以及词组“列宁—斯大林的事业”“列宁—斯大林的党”，接受了被列入“语文”课内容中的有关列宁和斯大林童年时代的故事。现在，赫鲁晓夫实际上要求我们在列宁和斯大林之间只选择列宁。由此还可断定，列宁并不认为斯大林是自己的最佳继承者，他在晚年甚至还同斯大林有过争吵。

报告毫不留情地破坏了我们从出生时起就形成的对斯大林的认识。大家的记忆中还保留着对战前的童年时期的模糊印象，还能想起歌词里唱的“敬爱的斯大林在对我们微笑”。斯大林和一个乌兹别克小姑娘在一起的大照片就是这个样子，当我们还是一年级的小学生时，曾在这张照片下拍过照。从战争时代的童年起，我们就记住了有关卓娅的故事，

在牺牲前她说：“斯大林和我们在一起！斯大林万岁！”接着，像回答她一样，响起了斯大林的洪亮声音，斯大林命令发起总攻，用“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这个清晰的句子结束命令。在少年时代的记忆中，大家都还记得斯大林70岁诞辰时，街上向他致敬的川流不息的人群，还有向斯大林赠送的礼物多得令人惊讶，成了博物馆。也不能忘记那张“改造自然的斯大林计划”的宣传画，斯大林的形象印在防风林带的地图上。宣传画的说明好像是斯大林亲口说的一句坚定的话：“一定要战胜干旱！”

尤里·费金宣读了赫鲁晓夫的报告，但大家脑畔还响着许多颂扬斯大林的歌。我们还能记起1953年3月里的哀乐。那时，斯大林逝世这个话题是那么沉重，刚听到时，我们男校正要上课，教室里立刻沉静下来，谁也没打算对自己的同学说点什么，这种静穆比女校中的眼泪和哭声更沉重。

现在，赫鲁晓夫向我们宣布：我们对斯大林的称颂是没有根据的，因他的逝世而带给我们的悲哀都失去意义了。赫鲁晓夫造出了一个不久前的活动家形象，病态的多疑、无比虚荣、冷酷无情是他的主要品质，他用这个人代替伟大英明而又关心我们的善良领袖的形象。所有那些我们从童年时代就知道的关于斯大林的事，全都是胡说。所有关于斯大林的电影、歌曲，现在都要通过赫鲁晓夫有关斯大林支持采用刑讯，通过艾伊赫关于自己的无辜的那些话等论断来领会。相信赫鲁晓夫的话也就意味着抛弃从童年时代便视为神圣的东西。谁要是再坚持童年时代的信仰，也就意味着他是反对苏联政权的，毫无疑问，同样也是亵渎神圣的。

不过，18~20岁年龄段的人所经历的震荡，与那些有意识的生命中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对斯大林的信仰当中的人们的感情经历是无法相比的。他们中的许多人曾不止一次地不顾生命危险，忍受极为沉重的艰难困苦，只因坚信斯大林的英明伟大。斯大林的名字在战场上流传，他的话被当成命令毫不犹豫地接受。斯大林时代在人们中间培养起来的价值体系，要求绝对服从和完成党的命令。这一次，党，这个大家一直称之为列宁—斯大林的党，发出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命令——抛开斯大林。在国内以及国外得知报告内容的一些人，被迫带着内心的伤痛割舍对从前热爱的领袖的感情。另一些人则对赫鲁晓夫和他的报告表示极度愤慨。在格鲁吉亚，赫鲁晓夫的报告不被接受，并被视为损害了格鲁吉亚人民伟大

儿子的形象。在那里发生了捍卫斯大林的群众集会和抗议示威，政府动用武力方才平息。

在支持赫鲁晓夫报告的人们中，也有不少人希望停留于对斯大林的批判，而是上升到苏联共产党领导苏联社会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权力问题上。有关斯大林的作用的讨论在许多共产党中引发震荡，很多老共产党员退出了自己所在的党。赫鲁晓夫的报告在北京引起了极大不满，成为苏联与中国思想政治分歧急剧上升的开端。在一些中欧社会主义国家，有关斯大林的争论引起了国内政治危机。在波兰，这场危机导致了波兹南的冲突。

苏联领导人亟须给有关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各种传闻所带来的问题以更加明确的解释。但很明显，在赫鲁晓夫的指控基础上，做出对斯大林的判决并非易事。苏共20大之后，用了4个月时间，才出台了苏共中央1956年6月30日全会“关于克服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决议。

决议的作者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出发，极力证明斯大林堕落的起因是他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决议重述了卡尔·马克思对瓦尔德海姆·布洛斯讲的话，来分析斯大林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是由于他“过分夸大自己的功绩，完全相信自己绝对正确”。

决议的作者判定斯大林另一个违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方，在于“对党内民主和苏维埃民主的某些限制，在同阶级敌人及其奸细的残酷斗争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而后来在反对德国法西斯占领者的斗争时期……斯大林粗暴地践踏了列宁的领导原则，开始将这种限制上升为党内和苏维埃国家的生活准则”。其后果，按作者的话来说，就是对组织工作的破坏，造成召开党的大会和实施联共（布）的其他措施时，出现不正常状况。

决议的作者所指出的斯大林破坏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方面是，“斯大林提出这样一个错误公式，即随着苏联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将越来越激化”。决议肯定，“这个错误的理论公式”“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给党内民主的发展带来极大危害”，并“给极为粗暴地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和实行大规模镇压提供了根据”。

根据决议作者的判断，只是由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错误和破坏列宁的党建原则，对国家安全机关的监督“不断地被斯大林个人监督所

替代，而通常的司法准则不止一次地上升为他一个人的决定”，这个系统的工作变质了。的确，“严重破坏苏联法律 and 大规模镇压”，其结果是“许多诚实的共产党员和非党苏联人被诋毁，并无辜遭难”，之所以出现这一错误首先是由于中了“敌人的奸计”。

尽管经过一段时间后已确定，除了中“敌人”的奸计，“斯大林还有许多，尤其是在他的晚年做出的目无法纪的错误”，但难以弄清的是，斯大林的过错在其中占有多大分量。随着赫鲁晓夫等宣称“苏联人民了解斯大林是这样的人，他的出发点总是保卫苏联，免中敌人的奸计，为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对斯大林的指控实际上变轻了。斯大林的错误的原因被归结为，他“在这场斗争中采用了不正当的方法，破坏了列宁的原则和党内生活准则”。在用这些混乱而又矛盾的说法做总结时，决议的作者得出十分含糊的结论：“这就是斯大林的悲剧所在。但所有这些同时也使反对斯大林时期目无法纪的斗争越发困难，因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在个人迷信情况下苏联政权的巩固，也都可归功于斯大林。”

决议的作者试图解释这种含糊的说法，直接摆出了赫鲁晓夫做报告的过程中不断有人问到的一个问题：“可能要冒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人不公开反对斯大林，也不解除他的领导职务？”决议的回答是：“在当时情况下，反对他的任何行动都不可能为人民接受，问题完全不在于个人勇气的不足。很清楚，谁想在那种情况下反对斯大林，都不可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可见，就像1937年的托洛茨基所处的情况一样，“中央委员会的列宁核心”直到1953年还认为，全国人民热情支持斯大林。总结起来，上述两种观点之间的差别是，托洛茨基认为，“苏联的工人们”做出了令他不愉快的事，但他们的选择是没有错的。而在后来，正如赫鲁晓夫和其他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在1956年所认为的那样，当年人民支持斯大林，是他们看错了。

然而，“列宁核心”查找了一些文件，通过这些文件来证明人民的做法是“错误”的。决议中讲道：“苏联劳动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就，给每一个苏联公民带来自豪感，并造成了这样的气氛，即领导人的个别错误和缺点，在巨大的成就的面前好像无足轻重，而这些错误的负面影响很快将被党和苏联社会力量的增长所抵消。”原来，破坏“苏联民主”准则，甚至“目无法纪”，只是“个别的错误和不足”，它

们“很快”被用苏联国家的成就“抵消”。因为将斯大林在反抗敌人保卫国家和建设更繁荣的生活方面的积极作用说得越高，也就可以想见，他的成绩盖过了他的“个别错误和缺点”。由此，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果斯大林的成绩胜过他的“个别错误和缺点”，那么，也许人民不愿意解除他的职务，这个判断就是正确的？而如果是这样，还用得着在斯大林死后对他进行评判吗？

不错，在这些评论之后，决议沉重地讲道：“有关斯大林的许多事实和他的不正确行为，尤其是一些破坏苏联法律的行为，只是在近期，在斯大林死后，才开始为人们所知，主要由于揭露了贝利亚匪帮和确立了党对国家安全机关的监督。”但是，决议并没有讲，由于这些“事实和不正确的行为”极大地削弱了斯大林的功绩的意义，也加重了他的错误。

对“斯大林事件”的“判决”没能平息社会思潮。在波兰和匈牙利，于1956年春天开始的“暴动风潮”，演变成这些国家领导人下台的重大事件，在匈牙利事件甚至发展为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起义。苏联的社会思潮也不平静。“斯大林问题”明显的爆炸性，使得赫鲁晓夫被迫临时中止了自己审判已故的斯大林的打算。

尽管赫鲁晓夫保持住了自己在国家领导中的重要位置，但是实际上他在自己于1956年开始的反对斯大林的审判中输了。虽然1956年6月30日决议对斯大林提出了严厉谴责，但没有采取将斯大林从苏联领袖名字中取消的任何行动。不错，苏共20大以后，不再使用诸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学说”或“列宁—斯大林的旗帜”这样的说法，莫斯科的“斯大林工厂”也在1956年因这个工厂的厂长逝世而举行活动时更名为“利哈切夫工厂”。但是，城市、工厂、农庄、企业和研究院依旧采用斯大林的名字，斯大林的全身和半身塑像、浮雕、照片和画像继续装点着广场、大街和官方建筑内部。这一年在红场上，列宁—斯大林墓的看台下仍有人进行了游行，赫鲁晓夫和其他领导人站在看台上，手举着带有斯大林形象的旗帜。1957年春，在做了几次官方声明，指出斯大林对苏维埃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后，赫鲁晓夫不得不事实上承认自己对斯大林的第一轮进攻失败了。

这一时期赫鲁晓夫的谴责给敬仰斯大林的人们带来了沉重打击，不过，打击不仅仅在这一点上。承认了赫鲁晓夫报告中这样那样证据的公

正和苏共中央决议的结论，人们不能继续相信斯大林的无限仁慈和非同寻常的远见；而要保持对昔日领袖的无限信任，就应该驳斥赫鲁晓夫报告的指责，以及苏联共产党中央纯属杜撰的决议。许多人面对选择，该相信谁？是该拒绝相信斯大林还是拒绝相信赫鲁晓夫？在眼下都不可能。

国内流传着许多笑话，这些笑话反映了民众对领导人行为的看法。据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会议上做秘密报告时，收到了一张字条，上面写道：“当斯大林胡作非为时，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又在哪里呢？”读过这张字条，赫鲁晓夫粗鲁地要求写字条的人从座位上站起来并做自我介绍，但没有人承认是自己干的。“这不，我还在老地方”——赫鲁晓夫好像是回答了字条上的问题。这则笑话的流传证明，人们对党的领导人的高大形象和勇敢精神的信念已经动摇了。苏联出现了一种社会情绪，即在赫鲁晓夫的报告后，更多的人认为，如今，同斯大林统治下一样，领导人只会为自己考虑，而不可能发表违背上级意愿的独立见解。

赫鲁晓夫的报告增强了政治上的投机和民众的不信任情绪，极大地损伤了苏联社会思想和道德，而反对苏联的西方宣传机构却积极利用这种情况。不错，在对苏联听众产生很大影响的同时，在1956年，西方电台还不能够从事反对现有制度的任何离间活动，只能不断利用“大清洗”做文章，并破坏斯大林的威望。但是，他们的作用是一种逐渐产生效果的毒素：他们使苏联听众养成了从西方价值结构上认识世界的习惯，不断增加了对西方大量信息和文化的需求。对这种精神食粮的需求，最终导致与本国价值观、国民传统和历史的中断。

那时，这些宣传掩盖了一些所谓“民主”和“市场经济”国家几个世纪真实历史中的很多事实。在这些国家的历史上，曾有过奴役，消灭了几百万土著居民，以及大规模的政治镇压。他们从不提保留至今的殖民制度，也不说在自己国家里悬殊的社会政治不平等，以及发生在他们的国家中各个警区里的违法乱纪行为。只是到了后来，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驻联合国的黑人代表恩德勒·扬格，曾失言指出，在联合省的监狱中关押着几十名政治犯，对他们从事刑事犯罪的虚假指控掩盖了他们的真正过错^①。不过，西方广播更喜欢避而不谈这

^① 指他们是黑人这一“过错”——译者注。

些情况，而是极力向苏联听众吹嘘西方生活方式，在那里似乎休想违法乱纪。这样，他们就可以引证苏联主要领导人所承认的东西了。

在解决斯大林逝世后争权夺利的任务时，赫鲁晓夫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发现，他们很难回答那些在研究斯大林的活动、研究苏联国家以及苏联历史时必然遇到的复杂问题。回答这些问题要求对社会发展问题有更深入的研究，要求人们客观地研究苏联历史，不被个人的政治野心，以及用人们所经受的苦难做文章以争取广泛支持的想法所左右。只有这样，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才能解决面临的那些问题。那时，苏联领导人仅仅通过禁止研究斯大林和全部他的活动时期，用他们关于“列宁的准则”“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空洞表述等方法，阻止人们去理解斯大林和他的时代。在搞乱斯大林和他的执政时期的问题时，也导致他们自己无可避免地在领导国家时出现新的错误。

被政治斗争中纯粹是见风使舵所造出的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报告，引出了一连串的事件，这些事件给国家带来了不小的损失。但是从国家利益角度来看，这个明显的政治错误被编造出的“二十大的神话”所掩饰。按它的说法，在赫鲁晓夫的报告发表后，国家似乎从错误和犯罪的重压下解放了出来并坚定地前进。

附录四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初的 苏联社会思潮

苏联的社会思潮（1953 ~ 1982 年）*

Ю. В. 阿克秀金

近几年来，苏联的社会思潮还很少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一般来说，在苏联时代，社会思潮完全或者几乎完全地被宣传鼓动机关的大量报道形成的社会观点所湮没。甚至于有关民众对那些苏共中央委员会讨论的与地方或强力部门相关的各种重大事件的评论的综合报道，在苏联时代也都是遵循预先设定的说法，即广大劳动群众一致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做法。当然，在这同时“有的地方也存在个别情况下的不正常现象，有时还存在敌对现象”。

我们可以从作为公开材料的日志或者纪念性文章中找出有关社会思潮的内容。但是，从本质来说，这些材料只是停留于主观层面，同时它们又只能证实当时出现的看法，或当时人们的说法，甚至是讨论过的观点，而并不能证明这些看法的普及程度以及其他人的观点。

为了对这类历史材料的不足有所弥补，莫斯科师范大学历史系、政治学与法学系开展了对大量口头实证材料与评论材料的收集工作。按照

* 本文取自由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Г. Н. 谢瓦斯基扬诺娃主编的《20 世纪的俄罗斯》一书第 2 卷，该书由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2002 年出版（Г. Н. Севостьянова. Россия в XX веке. Реформы и революции. т. 2 Москва ; Наука. 2002. с. 339 – 350. ）。本文作者 Ю. В. 阿克秀金（Юр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Аксютин），历史学副博士、教授，是研究赫鲁晓夫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文章分析了 1953 ~ 1982 年知识分子运动和大国价值观的形成，其中主要涉及公众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反应、对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改革措施的反应以及对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上台的反应等。该译文原载李慎明主编《历史的风——俄罗斯学者论苏联解体和对苏联历史的评价》，人民出版社，2009，第 152 ~ 165 页。

预定的方案，在1994~1999年对1500位记得当时事件的人进行了访谈。这些人的叙述，主要表达了他们对苏联时代这件或那件大事，对这个或那个领导人的个人看法。不过，他们的叙述给我们提供了反映当时各种政治思潮尤其侧重于“解冻”和“停滞”时期的人和事的大量评价材料。我们将其辑录成文，希望这篇文章能够为深入研究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提供帮助和一些根据。

同各种有关过去的回忆一样，口头材料带有不完全实证的特点，它们通常因人的记忆的局限性和在很大程度上以今天的态度对待过去的事情而带有修饰色彩。但是，要知道，即使人们视为客观的官方档案也可能会有很大的倾向性。同时，收集并大量加工整理口头记忆，可使研究者深入“沉默的大多数”的社会底层，让过去处于苏联社会底层的那些人有机会表达他们的倾向和思想，这是从所有别的来源中很难得到的完整客观的认识。

一 对斯大林逝世的态度^①

在访谈中首先提到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多数访谈对象在当时都感到抑郁、忧伤、哀婉和悲痛。涅尔琴斯克的售货员米哈伊洛娃肯定“斯大林的伟大形象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取代的”。

二 有关斯大林逝世后马林科夫的农业改革

马林科夫领导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于1953年8月8日颁布了政府方案，宣布减少两成农业税并计划在两三年内保证人民吃穿用度，以及减少从个人宅旁园地中抽取所得税。在某种程度上，几乎一半的访谈对象对此很有感触。扎戈尔斯克光学机械厂工人戈留诺夫回忆，在那之前他们如何无可奈何地上交300升牛奶和50只鸡蛋。图拉州沃洛夫斯克区索洛季洛娃村的索克洛娃也谈到了这件事。库尔斯克的一位农艺师和女教师的儿子切尔维亚琴科也证实说：“在农村人们得知这个消息后奔走相告，许多人还为砍光果树和灌木去交税而后悔。”莫斯科郊区罗斯车站居

^① 为更有条理地反映原文中所表述的主要问题，译者为每个访谈议题加上了小标题。译文中的八个小标题皆为译者所加。

民古列舍夫在谈到马林科夫的这个功绩时回忆道：“人们开始自己出售自家的产品——牛奶、肉。”在斯摩棱斯克州科柳契克村，农户家里开始有了家畜、农副产品甚至现金。当时正在农村度假的列乌托夫斯克棉纺厂医生娜扎洛娃说，那里的人们认为“没有谁比马林科夫更好”。

几乎一半的访谈对象相信政府在两三年时间内保证人民吃穿用度的允诺。库兹涅茨克冶金公司工人波诺马廖夫，以及弗拉基米尔州博洛茨克农业拖拉机站的钳工莫罗佐夫指出：“当时所有人都相信政府。”一位集体农庄的代表声明：“我们都赞成党的决议并对党的决议抱有期望。”来自谢尔科沃的卫生技术员卡拉马诺夫相信党的决议，是因为这件事他已经期盼很久了。古比雪夫州“切尔诺夫斯克”农庄的菜农玛卡洛娃指出，人们“出于本能地”相信这个决议。在巴拉希哈公路收费处工作的雅科夫列娃则肯定“人们希望政府如果总是这样才好”。

大约有1/4的访谈对象不相信政府的允诺。莫斯科信号工厂的工人之一格拉祖诺夫这样解释自己不相信这件事的原因：“国家太穷了。”来自阿拉木图的医生库兹緬科则重复前者的话说：“人们的生活压力很大，政府的承诺被大家拿来当做玩笑。”纳罗-福明斯克的九年级学生施特罗姆别尔格认为：“领导人的允诺在那时都已经很少有人相信了。”在莫斯科近郊加里宁城第88科学研究所工作的工人斯特鲁科夫干脆说：“谁都不会信。”

三 对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所做“秘密报告”以及20大路线的态度

赫鲁晓夫1956年2月25日在苏共20大上所做的“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只有接近1/3的访谈对象在党或共青团的会议上亲耳听到。另外，有超过1/3的访谈对象没有听到过这个报告，但从别人那里得知有这样一个报告。

听到报告的人中有超过1/3的访谈对象相信并赞同这个报告。托米林禽类加工厂工作人员瓦西里耶娃讲述说：“是的，斯大林和他手下是犯了错误，报告做了统计，一切大家都知道了。但只是在家里，在非常小的家庭圈子里，有时讨论这事，只是私下里谈论。”莫斯科近郊涅姆琴诺夫卡居民阿列克谢耶娃有些不理解：“怎么能不相信？个人迷信是有的，

而且多么严重！反正斯大林就是上帝，令人畏惧。我不知道，在斯大林统治下谁能感觉平安无事。”赫梅利尼茨基农业拖拉机站工人邦达鲁克沉重地说：“大家称颂了他那么多年，把他视为上帝，可现在又在指控他了！但我们认为，党不能欺骗人，既然说了，就得是对的。”来自卡缅斯克-乌拉尔的戈鲁波契科夫不仅解释自己的动机，还阐述自己对报告的社会意义的理解：“报告确实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宽松氛围，并且在报告之后，尽管党的指导方针没有变，毕竟人们渐渐地不必为讲了不该讲的话而担惊受怕了。”

有15%的访谈对象完全相信并赞同这个报告。罗姆内市机器制造厂工程师布隆什金认为：“赫鲁晓夫是对的，斯大林是国家的耻辱！！”茹科夫国家自动化控制研究中心工程师杜比宁宣称：“我的父亲就曾被镇压。”谢尔普霍夫师范学校学生谢尔巴科娃曾有亲属遭到镇压，她讲述说：“我们班的姑娘们扯下挂在我们宿舍房间里的斯大林画像，并刺破了画像上的眼睛。”莫斯科“巴乌曼”电车库技术人员哈里托诺夫对一切非常清楚：“对我个人而言斯大林就像未被发现的美洲大陆一样野蛮。”

大约有10%的被访谈者不完全相信或有保留地相信这个报告。通信兵古谢夫就曾很困惑：斯大林毕竟“领导战争取得了胜利”，但同时他又实行了“残暴的统治”。来自列乌托夫市的售货员什罗叶娃很气愤：“为什么赫鲁晓夫不早说这些？”“海燕”鞋厂女工瓦西里叶娃认为，证明斯大林有错误应当不是无根据地说，而应符合司法程序。新西伯利亚的建筑工人秋尔金则“有某种不愉快的感觉，就像自己做错了什么，而又不想自我原谅”。

几乎有一半的访谈对象不相信、不赞同这个报告。来自阿塞拜疆马里自治共和国奥尔洛夫斯克村的会计员萨文采娃想不明白：“斯大林过去对我们而言就像自己的父亲，今天我们怎么能相信这一点？”当年曾是莫斯科的建设者的古列绍夫认为：“他不可能做这一切！”在莫斯科波特金医院当医生的克列伊宁娜说：“我们的一切全都仰仗斯大林——生活、战胜敌人，等等。”当年曾在莫斯科一所医学学校学习的费杜列耶娃随后解释道：“我们是在斯大林主义思想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只是随着年代的增加，我们才认识到斯大林在我国历史中的实际作用。”首都科学研究所工厂的一位工程师利亚先科认为：“公开批判斯大林这种过激的做法不只是

针对伟人自己，而且是反对苏维埃政权。”他还讲述道：“1932年我同被镇压的父母亲一道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但过了几个月我们就接到通知，说我们是被诬陷的，上面已经调查清楚，给我们恢复了自由。尽管受到牵连，我也没有指责苏维埃政权，因为在一个国家没有错误和牺牲，不可能进行根本改革。”来自拉姆斯克耶区阿克谢诺沃村的司机秋马洛夫肯定，赫鲁晓夫“没必要这样做，不应该扩大纠纷”。

有1/5的访谈对象完全不相信、不赞同赫鲁晓夫的报告。“这是诽谤”——工作在列乌托夫棉纺厂的医护人员希罗科娃和娜扎洛娃，甚至还有在全苏农业综合体工作的绿化工人科林绍娃，以及柳比林诺市一个幼儿园的保育员安德里阿诺娃都这样认为。军官拉里科夫宣布：“不要再把赫鲁晓夫当成一个大国的国务活动家。”居住在克拉斯诺戈尔斯克、在图什诺第500号工厂工作的谢瓦斯基扬诺娃，对加在斯大林头上的多数指责用这样的话表达了自己的不信任：“在老百姓中流传着一些说法，好像是赫鲁晓夫的父亲或者祖父曾在某个时期是工厂主，在斯大林当政时遭难了，于是赫鲁晓夫就用揭露斯大林的方式来替自己的亲人进行报复。”

有大约10%的访谈对象态度中立。彼得罗扎沃茨克铁路食堂经理格里申娜一方面不能不拥护反对党的成员的个人迷信这一条党的路线，另一方面又不能摆脱苏联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胜利是与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思想情结。飞行员巴利里斯基不相信在党的会议上听到报告的邻居的说法，但作为共产党员，虽然不是全心全意地，他又不得不拥护赫鲁晓夫的主张。尼古拉耶夫的列车队长波波夫说，一方面，报告中提到的许多事件在当时是千真万确的，另一方面“斯大林赢得了胜利，他的很多做法并没有错”。莫斯科动力学院大学生米特洛凡诺夫相信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对斯大林的指责，但又不赞同把对斯大林的不满到处宣扬。他说：“我们认为，是时代和环境导致这种牺牲不可避免。”莫斯科“克鲁普斯卡娅”师范学院大学生库兹涅佐娃认为，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的行为没有错，但同时她也反对全民性地批判斯大林，因为“这对于国家的强大与威望没有好处，反倒可能被敌人利用”。

对于赫鲁晓夫号召在牛奶、奶油、肉的生产方面赶超美国，满足人民要求，有超过1/3的访谈对象持肯定态度。在“切尔诺夫斯基”集体

农庄工作的布哈洛夫，当时就曾因达到令人满意的高指标，进入古比雪夫州伏尔加区完成指标先进个人行列。因此，在这一点上为什么不相信集体农庄的这个工人？梁赞无线电技术学院大学生卡尔别茨基相信报告中关于梁赞州在一年时间内完成三年计划任务的说法。赶超美国也是那时新西伯利亚建设者秋尔金的现实任务，因为“关于美国我们几乎什么都不知道”。在莫斯科哈夫斯克街一所学校当教师的切巴诺娃说：“我始终相信我们的政权，相信它所确定的目标和任务。”当时曾热情洋溢的斯塔罗斯戈里地质勘探学校学生切尔维亚琴科宣称：“我们所有人都全力以赴地去做。”当时在阿塞拜疆马里自治共和国兹韦尼戈夫区一个印刷所工作的工人阿尔杰米耶娃满怀激情地接受了党的号召，“不过，很快，就像所有的事一样，成了笑话”。

大约有一半的访谈对象对赫鲁晓夫的号召不相信。弗努戈夫海关职员舒布尼可夫首先认为，这个号召缺乏依据，因为按他的话说，“那些1945~1947年从德国运来的奶牛”可以打破挤奶纪录，但这样的奶牛总头数却并不是那么多。沃洛科拉姆斯克区谢列茨乡村医院卫生员索柯洛娃当时“并有没想，在赫鲁晓夫领导下所有这一切都有可能做到”。军官布列霍夫则回忆起当时人们开的玩笑：“这是一件好事，但只怕像在裤子后面开个洞，什么作用也不起。”莫斯科建筑工人古列舍夫知道，在他的家乡梁赞什纳，为了完成被提高到两倍的计划“宰杀还没有长成的小牛，从居民家里抓走家畜，不同意就缩减其家庭所有的菜园地”。沃斯克列谢斯克区谢里彼诺村女挤奶工捷拉西莫娃不相信赫鲁晓夫的话，因为她在牧场中亲眼见到过上述情形。

四 关于1957年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集团”的斗争

有超过1/3的访谈对象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1957年夏天试图将赫鲁晓夫从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位置上撤下来表示反对。莫斯科郊区塔伊宁镇居民米哈伊洛夫认为，赫鲁晓夫是“天才的领导者 and 政治活动家”。他断言：“社会反对撤销赫鲁晓夫的职务的企图。”莫斯科人沙塔林是赫鲁晓夫的支持者。他说：“因为赫鲁晓夫是斯大林的揭露者。”尼古拉耶夫的列车队长波波夫认为：“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

诺维奇三人集团想使国家回到斯大林和贝利亚时代。”克拉斯诺亚尔斯克26分区的军队工程师彼萨廖夫分析说：“他们想自己掌握政权，但没想到他们不可能得逞。”古比雪夫州“切尔诺夫斯基”集体农庄的建筑工人布哈罗夫认为：“这一小撮人应当被绞死。”莫斯科郊区科西诺的女教师比亚基克列斯托夫斯卡娅“作为党的一员”也曾拥护党的决定。

约有1/5的访谈对象希望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当时曾工作在库斯塔奈州一个农业拖拉机站的苏沃洛夫认为：“人们是拥护莫洛托夫等人的。”来自托姆斯克州的律师沙洛夫为莫洛托夫等人鸣不平：“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没有别的选择，他们只能那样做，因为他们坚持党的路线，阻碍了赫鲁晓夫的所有新做法。”诺金自动化燃料工厂工人叶辛娜抱怨道：“赫鲁晓夫也太为所欲为了。”莫斯科“弗伦泽”棉纱厂工人尼基京娜见过赫鲁晓夫本人，她认为赫鲁晓夫“太过幼稚”。梁赞无线电技术学院学生卡尔别茨基的看法是：“赫鲁晓夫已经变得非常官僚主义了，而马林科夫等人还按1953年的观点来看待他，因为当时他们曾支持他。”

大约有1/3的访谈对象没有谈自己的观点。国营沃洛涅什发电站钳工阔莫夫回忆说：“当时我们不知道情况，也就没考虑。”

五 关于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说起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全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几乎所有的访谈对象都感到振奋、高兴、扬眉吐气。赫缅里尼茨农业拖拉机站工人邦达尔秋克认为：“这说明，我们是全世界最优秀最智慧的人。”梁赞无线电技术学院大学生卡尔别茨基则脱口而出：“这振奋了民族精神。”

六 关于苏共22大的党纲和在那前后苏联政府采取的经济政策

有近60%的访谈对象对1961年10月苏共22大通过的党纲持肯定态度。22大党纲给当时将成为“弗列泽尔”工厂磨工的波德克尔吉娜的印象是“所有人都将平等，也就是说大家都生活幸福”。卡卢加州小雅罗斯拉韦茨区扎哈洛沃村的农庄村员科玛洛娃十分向往：“人民将会得到更大的满足和幸福。我们将会吃得更好，使用城里的商品。”阿塞拜疆马里自治共和国奥尔洛夫斯克村的会计员萨维采娃讲述了当时的情形：“大家

期待着共产主义的到来，因为到那时所有东西都将是免费的。”波多利斯克区西扬诺沃镇的斯彼里多诺娃介绍说：“谁都不知道共产主义会是什么样的，但大家都相信，生活会变得更好。何况生活也确实得到了改善，农庄庄员们拿到了外出通行证，我的兄弟们还能到莫斯科去挣钱，我自己也开始按月拿到残疾人抚恤金。”科林区康德林斯克中学教师谢尔巴科娃讲述，那个时期大规模的住宅建设特别令人兴奋，为此人们“特别感谢赫鲁晓夫”。

有约 10% 的访谈对象不相信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说法。图尔州扎伊切沃克村的挤奶员基先科声明：“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根本不意味着我们信仰共产主义。”莫斯科郊区加里宁格勒的售货员米哈伊洛娃承认：“在我周围人中谁都不相信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甚至很难解释原因。”来自伊尔库茨克州图伦市的保育员莎拉波娃不无怀疑地评论道：“总是有人比其他人的生活得更好。”而奔萨州的共产党员捷维亚特金娜自己都想不明白：“所有的人都平等，并且同时都生活得好，这怎么可能呢？”

对于 1962 年 6 月 1 日提高奶油和肉的价格，大约有 1/3 的访谈对象将其视为必要的和临时的措施给予理解。全苏农业经济科学研究所科学工作者波梁斯卡娅将这一步骤视为十分必要的措施，她本人就参与了对农业经济产值的成本与价格水平的测算工作。她肯定地说：“原来的价格是十分可笑的。”来自文尼察州特普里克区乌德齐村的斯捷秋拉也肯定有这事：“怎么能不相信？要知道当时连从基辅运来的奶油都已经没有了。”“红色无产者”工厂附属托儿所的保育员费杜列耶娃回忆道：“大家都认为，这是暂时的现象，因为国家需要把钱用到国防上。”莫斯科轻工业技术学校教师娜扎洛娃“始终相信报刊上的各种声明”。

有约 1/3 的访谈对象对提高农产品价格完全不理解。“镰刀和锤子”工厂冲压工菲拉托夫就迷惑不解：“为什么战争刚结束时物价降下来了，而这个时候又要提升？”第 30 工厂的工人基里扬诺夫将这种做法视为“赫鲁晓夫追赶美国的结果”。在莫斯科热力第 505 所任技术员的多伦京认为，给别的国家过多的经济与财政援助是导致苏联经济困难的真正原因。可想而知，在这个问题上，对政府的号召与做法的习惯性、机械性相信，同无论是不情愿还要继续做出牺牲，抑或对赫鲁晓夫个人的不满

混杂到了一起。

有 1/5 的访谈对象证明有人对提高农产品价格公开表示不满，或听说过进行抗议的情况。莫斯科第 23 食堂的厨师卡波什娜回忆说：“我们食堂就曾有过某种形式的抗议。”在克拉斯诺戈尔斯克光学机械厂，人们引用目击者的话讲述了在新切尔卡斯克抗议的工人在游行中遭到射击的事。科罗姆纳一座医院的 X 光照相师马斯金也听说过有关在那里的“起义”和“射击”的事。外文图书馆工作人员阿巴扎杰听说过发生在诺沃切尔斯克的事件，并对参加者很同情。几乎有一半的访谈对象不能想象怎么可以发生这种事情。波特利波克的售货员米哈伊洛娃断定：“没有人听说后不感到特别愤慨。”库兹涅茨克冶金公司的工人波诺马廖娃说：“民众简直是被蒙骗了。”居住在涅姆琴诺夫卡，在莫斯科某幼儿园当保育员的阿列克谢耶娃断言：“任何人要想表达自己的不满，都会因反对政府的罪名而坐五年监牢，在赫鲁晓夫时期对这种情况的处罚甚至更严厉。”“巴乌曼”电车库机械师哈里托诺夫则接过前者的话说：“有谁愿意进监狱呢？”有趣的是，这其中多数人当时相信了政府的解释和承诺。

多数访谈对象都提到了 1963 年粮食减产，在食堂取消免费供应面包和以各种方式实行的实际上的粮食定量供应。莫斯科交通运输公司司机古克回忆道：“那个时候，从早上 5 点钟人们就排着长队等着买面包和面粉。”茹科夫国家自动化控制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阿尔秋辛娜曾早晨 5 点就起来去排队买面包。来自莫斯科郊区的司机秋马罗夫用自己的经历证明，在萨朗斯克市，人们排队等面包一直站到了 12 点。莫斯科郊区赫列勃尼科夫森林公园的护林员戈罗季林回忆：“香肠和鱼类制品都看不到了。”莫斯科郊区“列宁”集体农庄的队长科瓦尔达克说：“玉米面做的面包不好吃，并且很快就干巴了。”环卫工人谢维尔回忆说：“通心粉和其他的面粉制品都消失了，人们为了买面包得排长长的队伍，白面包只能在医院和幼儿园才能弄到。”萨拉托夫州叶尔绍夫消费者协会的代表米哈里切夫证实，白面包实际上已经停止发售：“公民为了能买到一个整个的白面包，得拿出医嘱，说明这个人得了病并且恰恰需要吃白面包。”杜波维茨卡娅曾凭票在巴拉诺维奇拿到了自己的一份面粉，然后又乘火车到维尔纽斯（尽管明斯克更近一些）领别的食品。市场上食品特别贵。第一钟表厂工作人员古西克娃几乎花去全部工资，用她的话说，开始为

糊口而奔忙。来自科罗姆纳的医护人员列米佐娃在回忆当时为了面包而排长队时，进一步明确说，面包供应不足不是短时期的，持续了两三个月。第涅伯彼得罗夫斯克矿业学院的大学生切尔维亚钦科和年轻的妻子曾2个月“掉在豌豆干菜汤和黑面包里，城市里的小白面包要6戈比才能买1个，还是挺大的事。”

有1/3的访谈对象对粮食供应困难的态度是忧心、痛苦，甚至认为是没有指望的。莫斯科州一所学校的厨师茹科娃断言：“人们等着最坏的情形出现。”在莫斯科郊区科斯京诺村流传着有关大饥荒将要到来以及回到票证供应时代的说法。“但我们都冷静地对待那一切，违法的事情我们不想做”——“巴乌曼”电车库技术人员哈里托诺夫这样承认。

七 对赫鲁晓夫下台的看法

有几乎40%的访谈对象支持1964年10月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来自诺金区波尔特沃村的农庄庄员罗曼诺夫相信对赫鲁晓夫的指控。除了听收音机和看报纸得到的消息外，尼古拉耶夫的共产党员、列车队长波波夫没有听到别的信息。全苏农业经济科学研究所科学工作者舍维亚柯娃这样阐释自己的观点：“需要改变一下了，尤其在农业经济方面，并且，没有经过认真考虑的改革早已令人厌烦。”而来自纳罗-福明斯克区马鲁什金诺村的斯捷潘诺娃则认为：“赫鲁晓夫搞垮了农业经济。”图拉州扎伊切夫卡村的挤奶工基先科宣布：“不能原谅他在1962年和1963年提高价格以及要求交出个人家养的牲畜。”柳别列茨基区“十月”村庄的售货员艾金娜则抱怨赫鲁晓夫让人们“用玉米糊口”。小雅罗斯拉韦茨区高罗金克村的农庄庄员戈里布科娃感叹道：“商店里实际上什么都没有了，所有人都饿坏了。”“莫斯科”游泳馆工作人员拉佐琳诺娃认为：“赫鲁晓夫没教养招人烦。”В/ч4452部队军官拉富罗夫斯基把“没有理由地缩减军队”视为赫鲁晓夫的一个过错。新西伯利亚的建筑工人秋尔金认为，赫鲁晓夫是一个“左倾机会主义者”。克拉斯诺扎沃茨克第11工厂的调度员科克柳什金娜明确表示“我们不喜欢他”。米尼斯捷尔斯托夫道路交通部门的工程师阿纳尼耶娃把赫鲁晓夫与斯大林进行比较：“斯大林令人畏惧，但赫鲁晓夫不值得尊敬。”萨拉托夫玻璃技术工厂的工作人员贝科娃断言“没有人为他惋惜”。奔萨州的捷维亚特金则认为：

“所有人对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都是非常非常肯定的，人们希望勃列日涅夫能带来秩序，并使人民生活得更好。”显然，这一批访谈对象回答问题的根据与出发点更多地受到激动情绪的影响。来自离柳别尔茨市不远的捷尔任斯基村的女教师玛尔登诺娃宣布：“所有人都对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感到满意，因为他企图贬低斯大林，在这一点上任何人都不能原谅他。”其他一些对赫鲁晓夫被撤职感到满意的人没有明确说到这一点，但他们中间超过半数的人在1956年消极地对待过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所做的报告。

有1/5的访谈对象对赫鲁晓夫被撤职感到遗憾。在西姆基п/я577厂工作的钳工阿舒尔科夫认为：“在赫鲁晓夫领导下国家取得了很大成就。”卡拉恰洛夫机械厂工作人员特鲁索娃不假思索地说：“他在所有方面都是一个好领导，没贪污也没受贿。”莫斯科郊区涅姆奇诺沃克的阿列克谢耶娃为赫鲁晓夫惋惜：“要知道他是那么努力地去做事，在他当政时期人民生活开始安定，负担减轻。”斯摩棱斯克州多罗戈布日区什维叶列沃村的挤奶工吉洪诺娃回忆道：“在赫鲁晓夫执政时集体农庄开始有钱花了。”加里宁州奥列宁斯克区别特洛沃村的农庄庄员萨文柯娃确信，赫鲁晓夫“想让人民吃饱饭，但他们却没给他机会”。拉姆斯克耶区弗拉索沃镇第13中学的女教师泽米特鲁克则举例说：“在赫鲁晓夫执政时，开始了‘解冻’时期，人们可以轻松地喘口气了，我们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了。”克麦罗沃市居民古谢娃和她的从事电信工作的丈夫认为，在赫鲁晓夫当政时期“出现了民主的迹象”。克拉斯诺戈尔斯克光学机械厂工人巴京也肯定“他带来了民主”。莫斯科郊区毗邻特鲁多瓦伊车站的一个军事城镇的工程师阿拉波夫认为，他们把赫鲁晓夫“拉下来”，是因为他是一个“民主的领导人”。奥金佐沃市运输“A”管理局的工人列别赫看出并感觉到，在赫鲁晓夫被免职这个问题上有“令人发指的不公正”。他对此很愤慨：“赫鲁晓夫是一个天才的、出色的领导人，他是一个讲信用的、谦虚的人，他能胜任一切工作，是受屈辱和受压迫的农民的保护者。作为1962年就入党的苏共党员，我对不能捍卫这样的领导人感到心中有愧！”科辛斯克针织品厂工作人员米哈伊洛娃也很愤慨：“无论赫鲁晓夫是怎样的一个人，都不应当以密谋的方式解除他的职务。”

有1/5的访谈对象对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的政权更替态度摇摆

不定。莫斯科“三山”纺织厂工人涅维叶罗夫认为，赫鲁晓夫当政时“有不少好的东西，但也有很多错误”。莫斯科工程师弗里德曼将改善居住环境和发射卫星视为赫鲁晓夫做的好事，而把推广种植玉米列为赫鲁晓夫做的不好的事。来自尼古拉耶夫的现役军人乌姆尼茨基概括说，大力加快住宅建设是赫鲁晓夫当政好的一个方面，而在农业经济方面的错误、大范围缩减武装力量则是不好的一面。莫斯科的一位大学物理教师普洛霍洛娃对赫鲁晓夫被解职表示遗憾，但又希望一切朝好的方向转变。来自莫斯科郊区列乌托沃村的潘克拉托夫似乎已经很厌烦赫鲁晓夫，但新的领导人又令他感到害怕。扎戈尔斯克区水上运动学校教师扎普卢特尼科娃对“谁将代替他”一事也感到不安。按第涅伯彼得罗夫斯克矿业学院大学生切尔维亚琴科的想法，勃列日涅夫未见得会更好，因为他是出名的“最擅长向赫鲁晓夫溜须拍马的人”。

有 1/5 的访谈对象态度冷漠。莫斯科州赫列巴尼科夫森林公园护林员戈洛季林在这个问题上一点都没有迟疑地说：“撤了他就撤了呗。”来自莫斯科郊区阿什特科沃村的织布女工日尔诺娃“更关心的是自己家过日子的日子的问题”。莫扎伊斯克粮食联合加工厂的工作人员比柳柯娃回忆道：“当时我们还是年轻人，对我们来讲谁掌权都一样。”航空发动机制造中心学院技术部检验员米金娜认为“苏联共产党更英明些”。莫斯科“海燕”制鞋厂工作人员瓦西里耶娃曾相信“这只是很小的改变”，而莫斯科“桌帘”咖啡厅厨师格拉祖诺娃认为“没有必要寄希望于越来越好”。扎戈尔斯克区库罗耶多沃村居民索波列娃在这件事上只看到了为争权夺利而进行的斗争。斯巴达克体育协会的足球队员西蒙尼扬大声喊叫说：“赫鲁晓夫也好，勃列日涅夫也罢，对于老百姓都没啥区别！”古克断定，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的人事变动的实质是“政权从一伙人手中转到另一伙人手中”。来自首都第 23 食堂的厨师卡波西娜则高谈阔论：“这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有一些复杂的转变。”

八 对勃列日涅夫执政的看法

有接近 40% 的访谈对象对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执掌政权寄予希望，希望一切会更好。同样，也有约 40% 的访谈对象没有特别关注这个问题。譬如，拉缅斯克耶“红旗”纺织厂工作人员贝达科娃、科诺瓦洛

娃，以及热列兹诺多罗日内市第26建筑安装局的勤杂工西罗特金都这样认为。无党派的莫斯科郊区巴拉希哈的卫生技术钳工斯克沃尔佐夫对这个事“跟所有的事情一样，没什么特别的热情”。

有近一半的访谈对象不记得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的经济改革。普斯柯维加诺夫当时还在克里米亚师范学院学习，他这样解释自己回答不知道的原因：“如果他们做得更务实一些，毫无疑问，我也就记住了。”几乎有1/5的访谈对象能够理解“发达的社会主义”所表达的含义。他们认为，“发达的社会主义”就是进步的社会思想，一些好的东西，是比资本主义更好的制度，是共产主义之前的一种社会模式，是对大多数民众而言更好的生活，是所有人都幸福安康，生活更富足，是文明的生活。尽管当年在哈萨克斯坦生活很艰苦，切利诺格勒州“加斯特洛”集体农庄八年级学校教师舒莫娃还是认为，“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意思是，社会保证人民富足和国家有力量，而她对富足的具体理解是指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养老，甚至还包括“我们真正地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像朋友、同志和兄弟一般，一切都顺遂自己的心意……真正感受到故乡不会抛弃我们”。萨哈林州多林斯克的卫生保健医生库普林娜娅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国家保证供应其居民所有必需品，而居民则竭尽全力维护国家的强大。”

大约有2/3的访谈对象不明白“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含义，但这不是说他们都不相信社会主义，只是这个说法对他们而言距离现实生活十分遥远。莫斯科州沙杜尔区“和平”集体农庄的菜农费多洛娃认为：“对我们普通劳动者而言，这个提法没有意义。”克拉斯诺戈尔斯克机械厂工程师叶尔莫拉耶娃“从来就没有考虑过这些事情”，而自动化控制中心研究所的检验员阿弗捷耶夫则指出：“不理解，说我们这代人是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简直就是胡扯。”

有1/4的访谈对象相信当时苏联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大概是，不错，可能还不是那样发达”——莫斯科“巴乌曼”高等技术学校大学生别尔申评论道。莫斯科州沙杜尔区“和平”集体农庄的经济师雅洪托娃则这样判断：“同西方生活方式的确有些不一样，但恰恰是这种不一样，是谁都说不清楚的。如果上边确定这就是发达的社会主义，那也就以为它是吧。”莫斯科郊区热列兹诺多罗日内市的

勤杂工斯彼林娜说：“如果领导说是什么，那就是什么，因为他们是一些有学问的人。”

有 1/4 的访谈对象不相信“发达的社会主义”的说法。扎顿斯克市的糖果师科诺瓦洛娃认为，使用“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一术语是为了将勃列日涅夫时期同赫鲁晓夫时期区分开来。

有 1/5 的访谈对象对 20 世纪 80 年代初勃列日涅夫时期没有异议，而超过 40% 的访谈对象则在期待奥运会给苏联党和国家带来转机的同时，批判地看待那个时期。

综上所述，1953 ~ 1982 年苏联的社会思潮证明，不包括斯大林逝世时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升空前，1953 ~ 1982 年的苏联社会并不是团结一致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大国的价值观，几乎是无条件地相信政权的作为，构成了那个时期社会思潮的主要内容。领袖的价值观影响了不超过 1/4 的苏联公民的观点。人们对于这个或者那个政治家、国务活动家的好恶认识相当稳定并带有神话成分。这些人的叙述与其说是表达了个人的爱好和认识，不如说是反映了意识形态的倾向，以及大概从古代就流传下来，至今还在对人们的认识产生导向作用的，站在权力顶端的人对人们行为的影响。

参考文献

一 俄罗斯档案文献

1. РГАНИ. Ф. 5. Оп. 33. Д. 8.
2. РГАНИ. Ф. 5. Оп. 55. Д. 178.
3. РГАНИ. Ф. 52. Оп. 1. Д. 169.
4. РГАСПИ. Ф. 347. Оп. 1. Д. 70.
5. РГАСПИ. Ф. 347. Оп. 1. Д. 124.
6. РГАСПИ. Ф. 347. Оп. 1. Д. 179.
7. РГАСПИ. Ф. 347. Оп. 1. Д. 187.
8. РГАСПИ. Ф. 5. Оп. 1. Д. 25.
9. РГАСПИ. Ф. 5. Оп. 1. Д. 32.
10. РГАСПИ. Ф. 572. Оп. 1. Д. 3.
11.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759.
12.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766.
13.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769.
14.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804.
15.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830.
16.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843.
17.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845.
18.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910.
19.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1029.
20.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1032.
21.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1033.
22.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1034.
23. РГАСПИ. Ф. 599. Оп. 1. Д. 1061.

二 俄文、英文著作

1. Под. Ред. А. Береловича, В. Данилова. Советская деревня глазами ВЧК-ОГПУ- НКВД. 1918 – 193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осква. РОСС ПЭН. 2005.
2. Александр Островский, Кто поставил Горбачева, Москва. Алгоритм, ЭКСМО. 2010.
3. Александр Шевякин. Как убил СССР: Величайшая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атастрофа. М: ЭКСМО: Яуза. 2014.
4. Александр Шевякин. Кто готовил развал СССР? М: Алгоритм, 2014.
5. Александр Широкоград. Диссиденты 1956 – 1990 гг. М: Алгоритм. 2014.
6. Александр Шубин. 10 мифов советской страны. Москва: Яуза. ЭКСМО, 2007.
7. Г. Д. Алексеева.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 в России. Идеология. Политика. 60 – 80 – е годы XX века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2003.
8. С. Андронов. Партия в борьбе за упроч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1937 год-июнь 1941 года)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61.
9. Под ред. Д. И. Антонюка. КПСС справочник.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78.
10. Ю. Арутюнян. Совет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в годы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Москва. 1970.
11. Отв. Ред: А. Б. Безбородов. науч. Ред: Н. В. Елисеева,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14.
12. Борьба КПСС за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ую индустриализацию страны и подготовку сплошной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и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1926 – 1929 годы)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60.
13. Под ред. В. Данилова, Р. Маннинг, Л. Виолы. Трагед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деревни.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я и раскулачивани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в 5 томах. 1927 – 1939.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1999 – 2006 гг.
14. Н.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 Воен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СССР в период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

й войны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48.

15. О. В. Волобуев и др.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17 – 1991 совет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Москва. ТЕРРА. 1997.

16. Вопросы внутрипартийной жизни и руководяще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КПСС на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этапе.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74.

17.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периода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Кие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61.

18. Л. Н. Денисова, Исчезающая деревня России: Нечёрноземье в 1960 – 1980 – е годы. Москва. Логос. 1996.

19. ред. Ю. В. Дербинов и др. Первичная партий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авангард трудового коллектива. Москва: Мысль. 1975.

20. О. А. Захаров, П. А. Огурцов. Партий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учреждения.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76.

21. под ред. А. И. Зевелев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России: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0.

22. В. Зимин, Цеховая партий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 1953.

23. Зубкова Е. Ю. Прибалтика и Кремль. 1940 – 1953. М: РОССПЭН, Фонд первого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Б. Н. Ельцена. 2008.

24. Игорь Пыхоров. Великий оболганный Вождь. Ложь и правда о Сталине. Москва. Яуза-пресс. 2010.

25.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т. 2.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66.

26.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т. 3. первый.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67.

27.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т. 5. первый.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70.

28. С. М. Кляцкина и др. В тылу врага.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62.

29. Гл. ред. М. М. Козло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Москва.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85.

30. Г. А. Куманев. 1941 – 1945 крадная история документы фотограф

ии.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2.

31. под ред. *В. И. Купцова*. Страниц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ФактыПроблемы Уроки Москва: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89.

32. *Л. С. Лепов*. Членство в партии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приёмом в партию новых членов. Москва. 1953.

33. *Г. Луненко*. Партий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и печать.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62. Москва. ИРИРАН. 1996.

34. Материалы Пленума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КПСС, 25 – 26 июня 1987.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7.

35. *С. Ф. Найда, А. П. Алексащенк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в период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военной интервенции и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Масква: Советская наука. 1959.

36. *А. С. Орлов, В. А. Георгиев, Н. Г. Георгиева, Т. А. Сивохина*.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учебник. Москва, ТК Велби. 2007.

37. *Е. Н. Орлов*. Партийный контрольна промышленных предприятиях Масквы (1959 – 1960гг) . Ма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62.

38. Партия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в борьбе за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ую индустриализацию страны. Мс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 1949.

39. Партия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в борьбе за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ю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1930 – 1934годы) . Мс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 1950.

40. Партия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в борьбе за завершени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Мс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 1949.

41. Первичная партий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Документы КПСС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й период) .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74.

43.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Минск. БГУ им. В. И. Ленина. 1979.

44.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Минск.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ое. 1985.

45.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Минск.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ое. 1987.

46. Составитель *Ю. В. Плотников*. В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1941 – 1945: Словарь-справочник. Москва. 1985.

47. ред. *Ю. А. Поляков, А. Н. Сахаров*. Россия на рубеже ХХI века.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2000.

48. *Б. Н. Пономарев, М. С. Волин, В. С. Зайцев и др.*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2.
49. Профсоюзы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в четырёх томах.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63.
50. *В. И. Пуньяненко.*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 партийная работа: опыт, проблемы. Москва: Мысль. 1988.
51. *И. Ротин.* Москов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ВКП (б) в 1935 – 1941 гг. Партия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в борьбе за завершени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 1949.
52.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А. Н. Сахарова.*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XX век. Моск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е. 2002.
53. *Г. Н. Севостьянова.* Россия в XX веке. Реформы и революции. т. 1, т. 2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2002.
54. *Сергей Кара-Мурза, Геннадий Осипов.* СССР- Цивилизация будущего. Инновации Сталина. Москва. Эксмо. Яуза – пресс. 2010.
55. Сила партийных групп.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74.
56. *М. Г. Соболев.* Первичная парторганизация в военном коллективе Москва.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СССР. 1975.
57. *Соколов А. К.,* От военпрома к ВПК: советская военн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1917-июнь 1941 гг. М: Новый хронограф. 2012.
58. *В. Д. Солдатенко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нравственные последствия усиления власти ВКП (б) 1928 – 1941 (июнь) .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отделени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94.
59. Справочник секретаря первичной партий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67.
60. Спутник партгруппорга.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76.
61. Спутник партгруппорга.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1.
62. Секция: проблемы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 партийной и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работы на селе.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75.
63. Урок даёт история.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9.
64. Редактор-составитель *И. А. Швец.* Словарь по партийному строи

тельству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7.

65. Н. Шатагин.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вдохновитель и организатор побед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55.

66. В. Ф. Шевченко.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партий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Кие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Украины. 1985.

67. В. А. Шестаков, М. М. Горинов, Е. Е. Вяземский. История отчества XX век. Моск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е. 2002.

68. В. Н. Хоришко. Партийная дисциплина. Москва: Мысль. 1989.

69. Г. Царев. Парторганизация завод. во главе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оревнования. Эпоха. 1951.

70. М. И. Халдеев и др. Первичная партий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пыт, формы и методы работы.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75.

71. Н. Якубовский. Помощь советского тыла партизанам (материаль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обеспечение) Минск. 1973.

72. Anna Louise Strong, *The Stalin Era*. New York: Mainstream Publishers, 1956.

73. *Natasha's Dance, A Cultural History of Russia*. London: Allen Lane, 2002.

74. *Orlando Figes, Revolutionary Russia, 1891 – 1991*. New York: Pelican, 2014.

75. *Orlando Figes,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 New York: Picador, 2008.

三 俄文报刊文章

1. Завтра, №. 52. 1998.

2. Известия, 12 марта. 2003.

3. Известия ЦК ВКП (б), №. 15. март. 1920.

4. Известия ЦК ВКП (б), №. 47 – 48. ноябрь – декабрь. 1922.

5. Известия ЦК ВКП (б), №. 49. январь. 1923.

6. Известия ЦК ВКП (б), №. 52. апрель. 1923.

7.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Май. 1991.
8.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июнь. 1991.
9. Литература, 22 июня. 1988.
10. Литература, 4 сентября. 1991.
11.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 3. 1998.
12. 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 №. 3, 1988.
13. 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 №. 7, 1988.
14. 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 №. 2. 1989.
15. 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 №. 4. 1990.
16. 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 №. 15. 1990.
17. 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 №. 18. 1990.
18. 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 №. 20. 1990.
19. 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 №. 24. 1990.
20. 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 №. 11. 1991.
21. 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 №. 13. 1991.
22. 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 №. 14. 1991.
23. 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 №. 16. 1991.
24. Правда, 24 сентября. 1934.
25. Правда, 3 июля. 1990.
26. Правда, 15 июля. 1990.
27. Правда. РУ. 31. 08. 2007.
28. Россия, 9 ноября. 1991.
29. Украинная Правда, 25 марта. 1987.
30. Человек и политика. №. 5. 1991.

四 中文著作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3.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 人民出版社, 2009。
4.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 人民出版社, 2009。
5. 《列宁选集》第1~4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6.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
7. 《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9。
8. 《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
9. 《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7。
10. 《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7。
11. 《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
12. 《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
13. 《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
14.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
15. 《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90。
16.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
17.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9。
18. 《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
19. 《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
20.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
21. 《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
22.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
23.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
24.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
25.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
26.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
27.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
28. 《列宁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8。
29. 《列宁全集》第51卷，人民出版社，1988。
30. 《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
31.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
32. 《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
33.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4分册，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64。
34.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

35. 厦门大学外文系俄语翻译组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78。
36.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76。
37. 《苏联问题译丛》编辑部编译《苏联问题译丛》第3~6辑，三联书店，1980。
38. 《苏联问题译丛》编辑部编译《苏联问题译丛》第8辑，三联书店，1981。
39. 《安德罗波夫言论选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
40. [苏]阿·阿夫托尔哈诺夫：《苏共野史》（上、下卷），晨曦、李荫寰、关益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
41. [苏]阿夫托尔哈诺夫：《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杨春华、张道庆译，新华出版社，1981。
42. [苏]安·安·格列奇科：《苏维埃国家的武装力量》，厦门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1972级工农兵学员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43. [苏]H. Г. 安德罗尼科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4卷（上、下册），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俄语翻译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44. [英]奥兰多·费吉斯：《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45. [法]巴齐尔·凯布莱：《当代苏联社会》，钱慰曾、金还珠、郭安定、杨祖功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
46. 北京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编《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1964年11月~1976年2月）》，商务印书馆，1978。
47. [美]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上海三联书店，1996。
48. [苏]H. A. 彼特罗维切夫主编《党的建设》，郭华等译，求实出版社，1983。
49. 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50. 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出版社，2004。

51. 陈新明：《苏联演变与社会主义改革》，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52. [美] 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53. [俄] 丹尼洛夫等编《菲利普·米罗诺夫：1917~1921年时期的静静的顿河》，乌传袞、温耀平译，人民出版社，2010。

54.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09。

55. 俄罗斯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编《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56. 王金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七十年——苏联经济发展史》，北京出版社，1992。

57. [苏] 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领袖和谋士：关于赫鲁晓夫、安德罗波夫和其他人……》，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1992。

58. [苏] 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一位高级顾问的回忆——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赵敏善、段永龙、官长明、孙军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59. [俄] 弗·沃·日里诺夫斯基：《俄罗斯的命运》，李惠生等译，新华出版社，1995。

60. 富景筠：《卢布信用危机与苏联解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61. [俄] 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

62. [苏] 戈尔巴托夫：《顿巴斯》，草婴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

63. [俄] 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64. [俄] 戈尔巴乔夫、[日] 池田大作：《20世纪的精神教训》，孙立川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65. [美] 格雷弗·弗：《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与赫鲁晓夫的谎言》，马维先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66. 国家劳动总局办公室外事组编《苏联工资制度概况》，三联书店，1978。
67. [美] 哈里特·法斯特·斯考特、威廉·法·斯考特：《苏联的武装力量》，王学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68. 基姆主编《社会主义时期苏联史（1917～1957年）》，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等译，三联书店，1960。
69. 李慎明主编《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70. 李慎明主编《历史的风——俄罗斯学者论苏联解体和对苏联历史的评价》，人民出版社，2009。
71. 李慎明主编《苏联解体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72. 李兴耕等编《前车之鉴——俄罗斯关于苏联巨变问题的各种观点综述》，人民出版社，2003。
73. 李毅夫、王恩庆、穆立立、徐福荣：《苏联民族问题的历史与现状》，三联书店，1979。
74. 陆南泉、张文武编《国外对苏联问题的评论简介》，求实出版社，1981。
75. [苏] 罗·亚·麦德维杰夫主编《政治日记》，贾连义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76. [苏] 罗·亚·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传》，肖庆平、孔岩、张小劲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77. [苏] 罗伊·梅德维杰夫：《赫鲁晓夫政治生涯》，述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
78. [俄] 罗伊·麦德维杰夫：《俄罗斯向何处去——俄罗斯能搞社会主义吗？》，关贵海、王晓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
79. [俄] 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80. [俄] 罗伊·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政治传记》，徐葵、张达楠、何香译，新华出版社，2001。

81. [美] 罗伯特·塔克：《政治领导论》，丛郁、李泮池译，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
82. [英] 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徐葵、邹用九、裘因译，东方出版社，1991。
83. [美] 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苏长和、嵇飞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84. [俄]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张达楠、王器、李方仲、宋锦海译，新华出版社，2002。
85. [苏] B. П. 莫罗佐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5卷，吴文智、朱蕴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86. [俄] 纳乌莫夫、科萨科夫斯基编《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任建华等译，人民出版社，2009。
87. [苏] 尼古拉·雷日科夫：《背叛的历史——苏联改革秘录》，高洪山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
88. [苏] И. В. 帕罗季金、Г. Т. 霍罗希洛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6卷，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89. 齐世荣、廖学盛主编《20世纪的历史巨变》，学习出版社，2005。
90. 《契尔年科言论选集（1971～1984）》，三联书店，1985。
91. [苏] Б. Г. 索洛维约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7卷（上、下册），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91. 苏联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编《苏联武装力量（建设史）》，《苏联武装力量》翻译组译，战士出版社，1981。
92. 《苏联武装力量的党政工作》，谢力译，战士出版社，1982。
93. [苏] Н. И. 舍霍夫佐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10卷，蒋妙瑞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94. 沈志华、于沛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3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95. 沈志华、于沛等编著《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苏共历史大事

实录》，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96. [美] 施魏策尔：《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殷雄译，新华出版社，2001。

97. [俄] 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98. 王铭玉等编译《克格勃全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

99. 王廷玉等编译《苏联“改革”中的各政党和政治组织》，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

100. [美] 威廉·奥多姆：《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王振西等译，新华出版社，2000。

101. 《吴仁彰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102. 辛华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76。

103. 辛华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82。

104. [苏] 雅·阿·约夫菲、列·巴·兹洛马诺夫编著《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统计资料手册（1917~1977）》，文郁译，求实出版社，1984。

105. [俄] 亚历山大·佩日科夫：《“解冻”的赫鲁晓夫》，刘明等译，新华出版社，2006。

106. [俄] 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

107. [苏] O. A. 叶尔曼斯基：《科学的生产组织和泰罗制》，张贤务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

108. [俄] 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大政治年代》，焦广田等译，东方出版社，2001。

109. [苏] E. П. 叶戈罗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8卷（下册），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110. [俄] 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

111. [波] 伊萨克·多伊彻：《流亡的先知 托洛茨基：1929 ~

1940》,施用勤、张冰、刘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12. [苏] 尤·阿克秀金编《赫鲁晓夫——同时代人的回忆》,李树柏等译,东方出版社,1989。

113. [俄] 尤·波里亚科夫:《无望的逃离》,张建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114. 张树华:《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新华出版社,2001。

115. 张树华、刘显忠:《当代俄罗斯政治思潮》,新华出版社,2003。

116. 张伟垣、曹长盛、杨阴滋主编《苏联兴亡和社会主义前景》,新华出版社,1999。

117. 张宇燕:《经济学与常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118.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编《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求实出版社,1982。

119.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东西方政党和文化比较研究中心组织编写《苏共的失败及教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1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译《苏联民族问题文件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

五 中文报刊文章

1. [俄] 瓦·福米乔夫:《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典藏》,李铁军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1期。

2. [俄] 尤里·普罗科菲耶夫:《苏联解体:谁之罪?怎么办?》,张树华译,《红旗文稿》2012年第14期。

3. [俄] 德·格·诺维科夫:《现阶段前苏联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陈爱茹编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4期。

4. 吴恩远:《俄罗斯重新评价斯大林》,《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

5. 吴恩远:《俄罗斯重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6期。

6. 吴恩远:《俄罗斯重评斯大林续》,《马克思主义研究》2004年第1期。

7. 吴恩远:《再谈俄罗斯反思历史、重评斯大林思潮》,《世界历史》2006年第2期。

8. 张建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严重的社会问题》,《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年第1期。
9. 周尚文:《俄共缘何衰落》,《俄罗斯研究》2006年第3期。
10. 弗·布罗夫、李燕:《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俄罗斯并不过时——俄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概况与主要流派》,《国外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11. 陈红:《布兹加林的马克思主义再现实化思想述评》,《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1期。
12. 姜天明:《苏联斯达汉诺夫运动及其经验与教训》,《辽宁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13. 李庆义:《俄重温“星期六义务劳动”》,《中国青年报》2001年4月26日。
14. 刘淑春:《俄罗斯社会主义流派当前境况》,《人民论坛》2012年第9期(下)。
15. 钱亚梅:《缥缈的理想幻灭于沉重的现实——读〈“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理论导刊》2007年第10期。
16. 盛世良:《神秘的安德罗波夫》,《党建》2007年第10期。
17. 佟宝昌:《试论苏联斯达汉诺夫运动》,《史学集刊》1982年第3期。

索引

A

安德罗波夫 11, 199 ~ 200, 205, 237 ~ 241, 245, 290, 328, 339, 365
阿夫托尔哈诺夫 14, 55 ~ 58, 105, 126, 207, 306, 340, 362,
爱国热情 15, 298, 338
奥尔洛夫 18, 398, 401
按劳取酬 86
爱国主义精神 15, 87, 93, 96, 111, 133, 139, 150 ~ 151
奥尔森 84, 86, 88 ~ 89, 115
安德烈·萨哈罗夫 170, 284
阿塞拜疆 22, 196, 199, 209, 285, 398, 400 ~ 401
安德烈耶娃 258
阿富汗战争 228, 267 ~ 268, 283 ~ 284

B

布尔什维克党 25, 36, 41, 44 ~ 45, 51 ~ 62, 67 ~ 69, 105 ~ 108, 120 ~ 121, 158, 232, 297 ~ 299, 301, 304, 339, 342, 344, 346 ~ 347, 349 ~ 350, 362, 382 ~ 383, 387
勃列日涅夫 11, 14, 37, 126, 148, 161 ~ 163, 171 ~ 174, 176, 180, 182 ~ 185, 188, 191, 194 ~ 197, 202 ~ 208, 210, 213 ~ 214, 231 ~ 234, 237 ~ 240, 294, 303, 306 ~ 308, 314, 339 ~ 340, 343, 351, 362, 365, 367, 395 ~ 396, 405 ~ 406, 408
波诺马廖夫 12, 36, 69, 397
波斯别洛夫 12, 36, 372, 384
别列洛维奇 13
布尔拉茨基 14, 16
巴齐尔·凯布莱 14
博尔金 15, 237
波罗的海国家 17 ~ 18, 207
布拉戈耶夫小组 24
勃鲁斯涅夫小组 25
波兰 54, 56, 85, 96, 113, 157, 238, 256, 390, 392
白匪军 71
彼得格勒 52 ~ 54, 57, 63, 69, 75, 122
白俄罗斯 6, 22, 56 ~ 57, 119, 129 ~ 130, 139 ~ 140, 142 ~ 144, 209
彼得·哈利托诺夫 132
别尔戈利茨 135
巴甫洛夫大楼 136
保守派 236, 269, 282, 288, 366
8·19事件 236, 287 ~ 290, 294 ~ 295, 311, 361, 363
贝利亚 313, 372 ~ 374, 377 ~ 378, 392, 401
布克哈特 367

C

朝鲜 7
财务监督检查制度 10
池田大作 16, 115, 239
陈之骅 2, 19, 78, 97, 159, 162, 167,
170 ~ 172, 191, 240, 242 ~ 243, 268,
270
超级大国 39, 281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 154
传统体制 238, 284

D

第二次世界大战 2, 80, 93, 96, 120,
125 ~ 131, 134 ~ 138, 140 ~ 143, 146 ~
147, 186, 207
大卫·科兹 4, 206
德意志意识形态 4
党支部 4 ~ 5, 24 ~ 28, 30 ~ 33, 38,
45, 49 ~ 51, 55, 58, 61 ~ 63, 68 ~
70, 72 ~ 73, 75, 94 ~ 95, 100, 103,
108 ~ 110, 121 ~ 123, 150, 241, 262,
297, 300, 302, 346, 348, 360
党小组 5, 12, 23 ~ 26, 28 ~ 33, 36,
38, 41, 44 ~ 45, 47, 52 ~ 53, 66,
79, 95, 100 ~ 101, 123, 129, 137,
140, 148, 178, 187, 225, 243, 275,
279, 291, 297, 300, 346, 352, 360,
370
杜马选举 6, 50
档案文献 9 ~ 11, 13 ~ 14
党代表大会 11, 25 ~ 27, 48, 101, 180
党代表会议 34
党务工作者 12, 41, 113, 232, 245,

276 ~ 278, 280, 293 ~ 294, 352 ~ 353
党的生活 13, 23, 232, 244, 271 ~ 272,
276, 314
党员登记 24, 31
鞑靼 56, 207
邓尼金 63 ~ 65, 69, 74 ~ 75
党员入门 108
大饥荒 116, 404
多元化 3, 164, 172, 185, 249, 253,
263 ~ 264, 292, 336
多党制 21, 35, 236, 256, 262 ~ 264,
266 ~ 271, 273, 277 ~ 278, 283 ~ 284,
287, 292 ~ 294, 305, 311, 335, 341,
343, 361
党员流失 269, 276, 278
独联体军队 286
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 314 ~ 315

E

恩格斯 4, 10, 48, 375, 380, 392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6, 290
俄罗斯议会 6
俄罗斯国家现代历史档案馆 10 ~ 11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25, 38, 44 ~ 48,
50 ~ 52, 54, 158, 174
俄罗斯帝国 105
俄罗斯民族主义 171
耳语者 14, 110, 305, 312 ~ 313, 364

F

方向性 2
反危机纲领 6
菲利普·米罗诺夫 13 ~ 14
费多谢耶夫小组 24 ~ 25

非俄罗斯民族 56, 210
 富农 106 ~ 108, 110 ~ 117, 120, 312 ~ 313, 350, 362, 364, 377
 伏罗希洛夫 101, 131, 143, 152, 218
 发达的社会主义 162 ~ 163, 177, 237, 343, 407 ~ 408
 腐败 193 ~ 197, 199 ~ 207, 228, 231, 234, 238 ~ 239, 252, 284 ~ 285, 315, 322, 334, 340, 351, 360, 365
 福尔采娃 197

G

戈尔巴乔夫 2 ~ 3, 5, 10 ~ 11, 15 ~ 18, 20 ~ 21, 35 ~ 37, 41, 61, 99, 115, 117, 160, 166 ~ 167, 171 ~ 172, 196, 198, 205, 230, 235 ~ 243, 245 ~ 255, 257, 259, 261 ~ 263, 265 ~ 267, 269 ~ 275, 277, 279, 281 ~ 296, 303 ~ 305, 308, 312, 333, 337, 339, 341, 343, 345, 350, 352, 360 ~ 361, 363 ~ 367, 386
 改革路线 2, 290
 官僚化 3, 176
 高度集权 3, 306
 国际金融危机 5
 公众投票 6
 古巴 7
 国家安全总局 13
 根纳基·奥西波夫 18
 干部政策 23, 214, 237, 239 ~ 240, 243, 290
 国营农场 21, 23 ~ 24, 27 ~ 28, 31, 33 ~ 34, 37, 104, 107, 114 ~ 115, 118, 120 ~ 121, 131, 174 ~ 175, 179,

182, 202, 203, 210 ~ 211, 213 ~ 215, 217, 219, 222, 280, 299, 302, 350
 工会 26, 35, 42, 45, 49, 54, 59, 61 ~ 64, 67, 69 ~ 70, 83, 95 ~ 96, 101 ~ 102, 104, 143 ~ 144, 148, 192, 213, 241, 244, 256, 270, 280, 302, 336, 342, 354
 共青团 13, 15, 27, 35, 42, 69, 74, 79 ~ 80, 82, 96, 100, 102, 104, 110, 118, 124 ~ 125, 127, 129 ~ 135, 137, 140 ~ 146, 148, 151 ~ 152, 156, 164, 192, 213, 216, 218, 226, 229, 238, 241, 244, 270, 280, 307, 309 ~ 310, 314, 336, 387 ~ 388, 397
 戈尔巴乔夫改革 2 ~ 3, 10, 18, 21, 35, 37, 171 ~ 172, 235, 239, 242, 249, 251 ~ 252, 255, 281, 285, 290, 294, 308, 341, 350, 352, 361, 364
 格鲁吉亚 22, 56, 156 ~ 157, 165, 196, 199, 209, 273, 285 ~ 286, 389
 国营托拉斯 65
 高尔察克 65, 69 ~ 71, 74 ~ 75
 国际歌 70 ~ 72
 公开性 3, 160, 171, 236, 248 ~ 253, 255, 258, 261 ~ 262, 265, 268, 272 ~ 274, 283, 285, 287, 291 ~ 292, 294, 304, 335, 341, 343, 352, 361, 363, 366
 国防部 121, 129, 150, 224, 252

H

核心作用 8, 179
 火星报 10
 赫鲁晓夫 11, 14 ~ 15, 18, 35, 37,

- 153 ~ 168, 172 ~ 174, 177, 180, 182 ~ 185, 188, 194, 208, 210 ~ 213, 229 ~ 234, 237, 249, 251 ~ 252, 262, 266, 302, 304, 306 ~ 308, 312 ~ 314, 339, 342 ~ 343, 351, 360, 362, 367, 371 ~ 406, 408
- 候补党员 108, 126, 131, 299, 340, 362
- 海因茨·布拉姆 170 ~ 171
- 和平演变 3, 255, 361
- J**
- 基层党组织 1 ~ 2, 4 ~ 16, 18 ~ 357, 359 ~ 364, 366 ~ 367, 370, 372, 374, 376, 378, 380, 382, 384, 386, 388, 390, 392, 394, 396, 398, 400, 402, 402, 406, 408
- 教条主义 3, 20, 231, 243, 291, 294, 297
- 计划经济体制 3
- 基层党员 7 ~ 8, 10, 13, 15, 20, 24, 31, 37, 41, 66 ~ 67, 95, 100 ~ 101, 112, 117 ~ 118, 122, 164 ~ 166, 168 ~ 169, 181, 184, 193, 203, 214, 222 ~ 223, 234, 242, 245, 256 ~ 258, 264, 271 ~ 272, 274, 297 ~ 298, 307, 312, 314, 324, 333 ~ 335, 337 ~ 338, 346, 348 ~ 351, 354, 356 ~ 363, 365 ~ 366
- 紧急状况委员会 13
- 集体化 12 ~ 13, 15, 27, 79, 81, 94, 104, 110 ~ 118, 120, 151, 208, 232, 298, 301, 312, 350, 365
- 精神风貌 15, 94
- 决策得失 15
- 久加诺夫 15 ~ 16, 79, 101, 289
- 杰克·马特洛克 16
- 军事化 17
- 军事工业 17, 130, 147 ~ 148, 281 ~ 282, 286
- 捷尼索娃 18
- 加盟共和国 6, 13, 16, 18, 22 ~ 23, 29 ~ 30, 37, 39, 124, 126, 140, 145, 175, 196, 206, 208 ~ 210, 238, 246, 254, 262, 268, 273 ~ 274, 277, 285, 288, 295, 299, 314, 337, 344
- 集体农庄 21, 23 ~ 24, 27 ~ 28, 31, 33 ~ 35, 37, 79, 82, 88, 94, 97, 104, 107, 110 ~ 121, 131, 160, 163, 174 ~ 175, 179, 181 ~ 182, 192, 202 ~ 203, 210 ~ 223, 232, 243 ~ 244, 249, 263 ~ 264, 300, 302, 340, 350, 364, 375, 397, 400 ~ 401, 403, 405, 407
- 基本核心 34
- 加速战略 37, 240, 242, 246
- 江泽民 40
- 纪德 85
- 计件工资 77 ~ 78, 83 ~ 84, 86, 88 ~ 90, 98 ~ 99, 349
- 军队党组织 121 ~ 126, 225
- 解冻思潮 154, 164, 168, 171 ~ 172, 185, 188, 210, 233, 360
- 激进派 236, 269, 288, 295, 341
- 禁酒令 246
- 极权社会主义 253
- 军官会议 284
- 集体主义 88, 91, 93, 99, 118, 177, 261, 349, 356 ~ 357
- 精英阶层 206, 365

K

克格勃 13, 200 ~ 201, 209, 224, 237 ~ 240, 254
 卡尔波夫 14
 克里姆林宫 17, 75, 201, 255, 381, 387
 喀山 24 ~ 25, 70 ~ 73, 75, 348
 克劳司·梅特纳 84, 88
 克拉斯诺顿 99, 152
 喀琅施塔得叛乱 107
 卡冈诺维奇 96, 102, 157, 302, 375, 400 ~ 401

L

列宁 4, 6, 10 ~ 11, 14, 18, 25, 35 ~ 37, 41, 44, 69, 71 ~ 72, 74 ~ 76, 79 ~ 80, 83, 86, 90, 93, 100, 104, 106 ~ 107, 109, 116, 121 ~ 122, 124, 133, 135 ~ 136, 142, 150, 153, 155, 157 ~ 159, 161, 164, 167, 169, 184, 187 ~ 188, 193, 198, 202, 210, 216, 222, 224, 230, 235, 237, 250 ~ 251, 253, 255, 258, 275, 290, 297 ~ 299, 302, 304 ~ 306, 309, 318, 323, 326, 328, 330 ~ 331, 333, 339 ~ 340, 342, 346 ~ 348, 352, 360, 362 ~ 363, 365, 371 ~ 372, 374 ~ 375, 378, 380, 382 ~ 383, 385 ~ 386, 388 ~ 392, 394, 403, 405
 理论创新 7
 老龄化 7
 老挝 7
 梁赞诺夫 10
 列宁研究院 10

列宁图书馆 10
 列宁全集 4, 11, 25, 36, 46 ~ 51, 54 ~ 56, 58, 60 ~ 66, 86, 122, 124, 150, 342
 列宁选集 11, 46, 53, 57, 60, 71 ~ 72, 75, 107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12, 158
 历史问题 2, 12, 15, 19, 253, 258 ~ 259, 291
 罗伊·麦德维杰夫 14, 170, 237, 239, 246 ~ 247, 276, 288 ~ 290, 303, 345, 359
 伦纳德·夏皮罗 15, 60, 107 ~ 110, 112 ~ 113, 119, 127, 186, 212
 罗伯特·康奎斯特 15
 利加乔夫 15, 237, 254, 265, 269, 282, 289, 366
 雷日科夫 15, 166, 203, 237, 262, 269, 385 ~ 386
 雷切尔·沃克 16
 李慎明 4, 19, 197 ~ 198, 204 ~ 206, 246 ~ 247, 371, 395
 历史真相 20, 40, 257
 领导结构 28, 32, 305
 劳动生产率 34, 71, 75 ~ 77, 79 ~ 81, 84 ~ 85, 90 ~ 93, 96, 102 ~ 103, 115, 146 ~ 149, 178, 192, 217, 227, 239
 六三政变 34, 49, 51, 71, 75 ~ 77, 79 ~ 81, 84 ~ 85, 90 ~ 93, 96, 102 ~ 103, 115, 146 ~ 149, 178, 192, 217, 227, 239
 立宪民主党 48, 56
 拉脱维亚 22, 54, 56, 139, 208 ~ 209, 213, 222 ~ 223, 254, 286

粮食征集队 106

罗斯福 138

柳巴尔斯基 170

罗吉昂诺夫 196

历史虚无主义 249, 366

联盟派 345

M

马克思主义 1, 3, 10, 16, 20, 24 ~ 25, 43 ~ 45, 85 ~ 86, 117, 159, 168 ~ 169, 171, 187, 207, 225, 245, 253, 255 ~ 256, 297, 305 ~ 307, 346 ~ 347, 352 ~ 355, 360 ~ 361, 367, 375, 386, 390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 10

莫斯科 10, 12, 48, 52, 54 ~ 56, 62 ~ 63, 66, 69 ~ 75, 79 ~ 80, 94, 96, 98, 100, 102 ~ 104, 113, 119, 121, 133 ~ 135, 138, 145 ~ 146, 170, 187, 191 ~ 194, 196 ~ 197, 200 ~ 203, 215 ~ 221, 226, 241, 250 ~ 251, 254, 256, 261, 267, 270, 275, 289, 292, 306, 348, 358 ~ 359, 371, 381, 384, 392, 395 ~ 407

马龙闪 2, 19, 78, 97, 159, 167, 170 ~ 171, 240, 242 ~ 243, 268, 270

明斯克 25, 141, 218, 397, 403 ~ 404

米哈伊尔·季塔连科 40

孟什维克 51, 53, 56, 60, 74

莫斯科—喀山铁路 70 ~ 73, 75, 348

玛丽·捷姆琴柯 97

马卡尔·马扎 97

秘密报告 153 ~ 157, 159, 164 ~ 165, 168, 210, 230, 304, 307, 371 ~ 373,

375, 377, 379, 381, 383, 385 ~ 387, 389 ~ 391, 393, 395, 397

毛泽东 157

马林科夫 155, 157, 211, 371 ~ 373, 376 ~ 377, 396 ~ 397, 400 ~ 401

莫洛托夫 79, 108, 145, 157, 218, 371 ~ 373, 375, 400 ~ 401

民主化 3, 17, 21, 160, 171, 236, 248 ~ 249, 251 ~ 253, 261 ~ 264, 268, 271, 274, 280, 287 ~ 288, 291 ~ 292, 294, 304, 335, 341, 343, 352, 361, 363, 366

姆日阿瓦纳泽 196

民族矛盾 3, 207, 210, 234, 288, 367

民主社会主义 3, 207, 210, 234, 288, 367

N

涅克拉索夫 8

内务人民委员部 13

尼古拉·加斯特洛 132

P

普京 6, 16, 205, 239

普里马科夫 15

普列汉诺夫 24, 52

帕夫里克 115

帕斯捷尔纳克 168

皮霍亚 245 ~ 246

Q

去斯大林化 6, 307

契尔年科 11, 239, 241

- 切尔尼亚耶夫 15, 251
 前车之鉴 40, 230
 强制集体化 111 ~ 112, 114, 116
 丘吉尔 138, 378
 全民党 154, 158 ~ 160, 173 ~ 174, 185, 304, 342
 全民国家 154, 158 ~ 160, 163, 304
 青年近卫军 99, 152, 168, 349
 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162 ~ 163, 177
 切尔诺夫 242, 265, 397, 399, 401
- R**
- 人事档案 24
- S**
- 苏联 1 ~ 28, 30, 32 ~ 44, 46, 48, 50, 52, 54, 56, 58, 60 ~ 62, 64, 66 ~ 70, 74 ~ 134, 136 ~ 148, 150 ~ 160, 162 ~ 164, 166 ~ 194, 196 ~ 240, 242 ~ 258, 260 ~ 264, 266 ~ 272, 274, 276 ~ 278, 280 ~ 367, 370 ~ 372, 374 ~ 408
 十月革命 1 ~ 2, 4 ~ 5, 10 ~ 12, 15, 21, 24, 26, 33, 36 ~ 37, 45, 53, 58 ~ 62, 67 ~ 68, 88, 90, 104 ~ 105, 120, 121, 146, 191, 215, 224, 230, 232, 250 ~ 251, 253, 298 ~ 299, 304 ~ 305, 312, 339, 342, 344, 346 ~ 347, 350, 358, 362, 388
 苏联解体 1 ~ 5, 7 ~ 17, 19 ~ 20, 24, 36 ~ 41, 43, 67, 75, 77, 99, 115, 117, 120, 163 ~ 164, 205 ~ 206, 230, 236 ~ 238, 240, 243, 246 ~ 250, 254 ~ 255, 260 ~ 261, 268, 274, 286 ~ 287, 296 ~ 297, 299, 301, 303, 305, 307, 309, 311 ~ 313, 315, 317, 319, 321, 323, 325, 327, 329, 331, 333, 335, 337 ~ 339, 341, 343, 345, 347, 349, 351, 353, 355, 357 ~ 361, 364, 366 ~ 367, 371, 379, 395
 苏联共产党 1 ~ 2, 4 ~ 28, 30, 32 ~ 44, 46, 48, 50, 52, 54, 56, 58, 60 ~ 62, 64, 66, 68 ~ 70, 72, 74, 76, 78, 80, 82, 84, 86, 88 ~ 90, 92, 94 ~ 96, 98, 100 ~ 102, 104, 106, 108, 110, 112, 114, 116, 118, 120, 122, 124, 126 ~ 128, 130, 132, 134, 136, 138, 140, 142, 144, 146, 148, 150 ~ 154, 156, 158 ~ 160, 162 ~ 164, 166 ~ 168, 170 ~ 180, 182, 184, 186 ~ 188, 190, 192 ~ 194, 196, 198, 200, 202, 204, 206, 208, 210 ~ 214, 216, 218, 220, 222, 224, 226, 228, 230, 232 ~ 234, 236, 238, 240, 242, 244, 246, 248 ~ 250, 252, 254, 256, 258, 260 ~ 262, 264, 266, 268 ~ 272, 274, 276 ~ 278, 280, 282, 284, 286 ~ 296, 298 ~ 306, 308, 310, 312, 314, 316, 318, 320, 322, 324, 326, 328, 330, 332, 334, 336, 338, 340 ~ 348, 350 ~ 354, 356, 360, 362 ~ 364, 366 ~ 367, 370, 372, 374, 376, 378, 380, 382, 384 ~ 388, 390 ~ 394, 396, 398, 400, 402, 404, 406, 408
 社会主义 1 ~ 3, 5 ~ 8, 10 ~ 12, 15, 19 ~ 20, 22, 24 ~ 28, 30 ~ 31, 33 ~ 42, 44 ~ 45, 47, 49, 51, 53, 55, 57 ~ 59, 61 ~ 65, 67 ~ 69, 71, 73 ~ 79, 81 ~ 107, 109, 111, 113, 115 ~ 121, 123 ~ 125, 127,

- 129, 131 ~ 133, 135 ~ 137, 139, 141, 143, 145 ~ 147, 149 ~ 153, 155 ~ 160, 162 ~ 163, 165 ~ 171, 177 ~ 179, 191, 206 ~ 208, 213, 216 ~ 217, 219, 224, 226 ~ 227, 229 ~ 231, 234 ~ 239, 240, 242 ~ 244, 246, 250 ~ 259, 261, 263, 268 ~ 270, 277 ~ 278, 280 ~ 283, 285 ~ 288, 290 ~ 292, 296 ~ 297, 301, 303, 306 ~ 307, 312, 328, 337 ~ 338, 340, 342 ~ 344, 346 ~ 354, 358, 360 ~ 362, 365 ~ 367, 376, 390 ~ 391, 407 ~ 408
-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 2
- 思想建设 2 ~ 4, 36, 184, 240
- 上层决策 4, 173
- 斯大林模式 3, 238, 247
- 实体经济 6
- 苏联共产党章程 11, 28, 32 ~ 33, 101, 122, 174 ~ 177, 179 ~ 180, 213 ~ 214, 270, 347
- 苏共中央决议汇编 11
- 斯大林文集 11, 86
- 斯大林文选 11
- 苏联共产党历史 12, 17 ~ 21, 24, 36, 39, 41 ~ 42, 52, 69
- 苏联大百科全书 12
- 四处出击 13
- 沈志华 13 ~ 14, 19, 119, 171
- 斯维尔德洛夫 14, 80, 131, 144 ~ 145, 263, 374
- 萨哈罗夫 18, 170, 268, 284, 292, 364
- 苏联宪法 18, 219, 261, 263, 269 ~ 270, 293
- 实证性研究 20
- 苏维埃 5, 11, 13, 15 ~ 17, 20 ~ 22, 24, 26, 30, 34 ~ 35, 38, 44, 48, 53, 55, 61 ~ 69, 71 ~ 77, 83 ~ 88, 90, 105 ~ 108, 110 ~ 112, 114 ~ 116, 119 ~ 122, 124 ~ 125, 132, 140, 144 ~ 145, 150, 155 ~ 156, 159, 161, 168, 171, 179, 184, 191, 199 ~ 200, 206 ~ 207, 214, 217, 219, 224, 228, 230, 241, 248 ~ 249, 252 ~ 253, 257 ~ 258, 261 ~ 263, 265 ~ 266, 270, 273, 277 ~ 279, 284, 286 ~ 288, 290 ~ 294, 296, 298 ~ 301, 303, 305 ~ 306, 313, 316, 335 ~ 337, 339, 342 ~ 345, 347 ~ 349, 358 ~ 359, 361 ~ 362, 364 ~ 365, 373, 375 ~ 377, 382 ~ 383, 390, 392, 395 ~ 396, 399
- 生产集约化 34
- 苏联武装力量 37, 121 ~ 123, 126, 128 ~ 129, 139, 150 ~ 151, 224, 226 ~ 229, 281, 286, 288
- 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35, 38, 69, 75 ~ 76, 79, 81, 84 ~ 85, 88 ~ 93, 95 ~ 96, 98, 100 ~ 104, 115, 118, 120, 151, 178 ~ 179, 243 ~ 244, 348 ~ 349, 360
- 斯托雷平 45, 49 ~ 51
- 社会革命党 47, 55 ~ 56, 74, 105
- 斯达汉诺夫运动 75 ~ 82, 84 ~ 86, 88 ~ 96, 98 ~ 102
- 斯美塔宁 79, 100
- 苏联英雄 152, 382
- 苏共 20 大 8, 12, 15 ~ 16, 37, 153 ~ 159, 161, 163 ~ 169, 171 ~ 173, 175, 177, 179, 181 ~ 183, 185, 187, 189, 191, 193, 195, 197, 199, 201, 203,

205, 207, 209 ~ 211, 213, 215, 217,
219, 221, 223, 225, 227, 229 ~ 231,
233, 235, 249, 251, 304, 306 ~ 307,
360, 372, 374, 384 ~ 387, 390, 392 ~
393, 397, 405

三和路线 37, 160, 163, 308

索尔仁尼琴 168, 170, 364

斯大林主义 14, 16, 166, 230, 250,
255 ~ 257, 398

苏共 27 大 236, 244 ~ 245, 261, 271,
276, 329, 331, 343

苏共第 19 次全国代表会议 248, 261 ~
262, 271 ~ 272, 291 ~ 292

社会主义价值观 78, 254, 349, 352

首创精神 47, 74, 346, 348 ~ 349, 356

T

特权化 3, 306

统一俄罗斯党 6

托洛茨基 14, 52, 58, 85, 122, 155,
251, 258, 376 ~ 378, 382 ~ 384, 391

托契斯基小组 24

同情者 33, 61, 70 ~ 71, 73, 348

泰罗制 83, 86

土地法令 105

拖拉机站 27, 111, 114, 118, 121,
160, 175, 179, 211 ~ 212, 216, 397 ~
398, 401

特瓦尔多夫斯基 168

退党 190, 248, 259, 274 ~ 280, 284 ~
285, 289, 293 ~ 294, 352, 361, 364

特殊定居者 313

团队合作 356

W

维克多·达尼洛夫 13

维·康德拉申 13

沃尔科戈诺夫 14

伟大卫国战争 15, 17, 24, 33, 37,
44, 80 ~ 81, 91 ~ 94, 96, 99, 101 ~
102, 123 ~ 124, 127, 134, 149 ~ 151,
153, 178, 210, 219, 224, 298, 301,
350, 381, 399

吴恩远 2, 16, 19, 78, 97, 159, 167,
170 ~ 171, 240, 242 ~ 243, 268, 270

王斯德 3, 19, 78

文化人类学 41

乌克兰 6, 22, 56 ~ 57, 77 ~ 78, 97,
106, 113, 118, 131, 139 ~ 140, 142,
144, 148 ~ 149, 181, 195, 203, 207 ~
208, 218, 229, 249, 254, 359, 384

伟大的创举 73 ~ 74, 348

五百公担运动 97

乌兹别克黑手党 197, 205

维克托·阿尔克斯尼斯 284

威廉·奥多姆 16, 225, 229, 267, 281 ~
287

乌兹别克斯坦 97, 196, 335, 337

伟大的创举 73 ~ 74, 348

X

先锋队 5, 20, 37 ~ 38, 44 ~ 45, 47,
49, 51, 53, 55, 57, 59, 61, 63 ~
69, 71, 73 ~ 77, 79, 81, 83, 85,
87, 89, 91, 93, 95, 97, 99, 101,
103, 105, 107, 109, 111, 113, 115,
117, 119, 121 ~ 123, 125, 127, 129,

- 131, 133, 135, 137, 139, 141, 143, 145, 147, 149 ~ 151, 159 ~ 160, 173, 177, 221, 234, 236 ~ 237, 239, 241, 243, 245, 247, 249, 251, 253, 255, 257, 259, 261, 263, 265, 267, 269, 271 ~ 273, 275, 277, 279, 281, 283, 285, 287, 289, 291, 293, 295 ~ 297, 301, 339 ~ 340, 342 ~ 343, 348 ~ 349, 351, 353, 360
- 现代化 6, 214, 355
- 消息报 13, 142, 168, 260, 314
- 肖洛霍夫 14, 371
- 谢尔盖·卡拉-穆尔扎 18
- 星期六义务劳动 65, 67, 69 ~ 76, 78 ~ 79, 91, 100, 348, 362
- 新经济体制 162
- 宪政改革 293
- 修宪运动 292
- Y**
- 意识形态 3 ~ 4, 11 ~ 12, 20, 39, 41, 84, 86, 89, 162 ~ 163, 169 ~ 170, 172 ~ 173, 184, 188, 206, 210, 233, 241, 247, 249, 253 ~ 254, 258, 261, 363, 279, 287, 304, 327 ~ 328, 330, 331, 333, 345, 352 ~ 353, 366, 408
- 越南 7
- 雅科夫列夫 13 ~ 16, 166 ~ 167, 198, 252, 269, 289, 295
- 伊萨克·多伊彻 14, 85
- 叶利钦 15, 166 ~ 167, 269, 275, 277, 288 ~ 290, 337, 345, 379 ~ 380
- 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 15, 254 ~ 255
- 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 17
- 亚历山大·舒宾 17
- 亚历山大·舍维亚京 17
- 伊戈尔·贝霍洛夫 18
- 尤·波里亚科夫 18, 289, 311
- 叶书宗 3, 19, 78
- 于沛 19, 119, 171
- 预备党员 27, 29 ~ 35, 73, 109, 114, 123 ~ 126, 128, 130 ~ 132, 137, 152, 174, 209, 216, 225 ~ 226, 232, 259 ~ 260, 274, 309, 368 ~ 369
- 1905年革命 12, 49
- 右派政党 56
- 亚美尼亚 22, 56, 208 ~ 209, 223, 286
- 伊利可夫 197
- Z**
- 资本主义 1, 63, 84, 86 ~ 88, 96, 163, 183, 206, 210, 231, 252 ~ 253, 255, 281, 303, 308, 337, 349, 377, 407
- 阻碍因素 2, 235
- 组织建设 2 ~ 4, 6 ~ 8, 10 ~ 12, 14 ~ 16, 18 ~ 20, 22, 24, 26, 28, 30, 32, 34, 36 ~ 40, 42 ~ 46, 48, 50, 52, 54, 56, 58 ~ 60, 62, 64, 66 ~ 68, 70, 72, 74, 76, 78, 80, 82, 84, 86, 88, 90, 92, 94, 96, 98, 100, 102, 104 ~ 106, 108, 110, 112, 114, 116 ~ 118, 120 ~ 122, 124, 126, 128, 130, 132, 134, 136, 138, 140, 142, 144, 146, 148, 180, 182 ~ 235, 238, 240, 242 ~ 244, 246, 248, 250, 252, 254, 256, 258, 260, 262, 264, 266, 268, 270, 272,

- 274, 276, 278, 280, 282, 284, 286, 288, 290, 292, 294, 296 ~ 357, 360, 362, 364, 366 ~ 367, 372, 374, 376, 378, 380, 382, 384, 386, 388, 390, 392, 394, 396, 398, 400, 402, 404, 406, 408
- 知识分子 3, 33, 49, 99, 108, 114, 126, 131, 168, 171, 185 ~ 186, 188, 231, 241, 250, 255 ~ 256, 259, 263 ~ 264, 299, 308, 310, 311, 313, 315, 340, 386, 395
- 政治冷漠 3, 234, 291, 294, 341, 359
- 组织体系 4 ~ 5, 37, 45, 90, 103, 140, 151, 154, 161, 173, 221, 224, 232 ~ 234, 293, 297 ~ 298, 301, 338 ~ 340, 346 ~ 347, 350 ~ 351, 353, 355 ~ 356
- 政治体系 4, 246, 340
- 战斗堡垒 5, 38, 42, 68, 120, 177, 234, 296, 301, 341, 347, 350 ~ 351, 353, 355, 357, 360
- 执政党 1 ~ 5, 8 ~ 9, 19, 21, 35 ~ 37, 39 ~ 45, 59 ~ 60, 67 ~ 68, 82, 90, 95, 124, 153, 157, 182, 224, 229, 232, 234, 236, 262 ~ 263, 269 ~ 270, 273, 279, 288, 291 ~ 293, 296 ~ 298, 301, 03, 338 ~ 344, 346, 348, 351, 353 ~ 354, 359 ~ 359, 361, 365 ~ 367
- 总统大选 6
- 政治诉求 7
- 转型时期 7
- 中国 2 ~ 3, 7, 9, 18 ~ 20, 38 ~ 42, 68 ~ 69, 74, 78, 83, 86, 90, 92, 94, 96 ~ 97, 100 ~ 101, 122 ~ 125, 156, 159, 162, 167, 170 ~ 173, 191, 207 ~ 208, 226, 228, 238, 240, 242 ~ 243, 248, 256, 268, 270, 274, 303, 354, 358 ~ 359, 374, 390
- 组织结构 5 ~ 8, 21, 26, 28, 36, 43, 46, 48, 59, 95, 100, 121, 173, 180, 189, 232, 235, 297 ~ 298, 300 ~ 301, 303, 338 ~ 340, 347, 359 ~ 360, 362
- 真理报 13, 71, 77, 97, 142, 158, 162, 181, 208
- 祖布科娃 17
- 周尚文 3, 7, 19, 78
- 张伟垣 19, 290
- 组织行为学 41 ~ 42
-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104, 106 ~ 107, 112, 116
- 政治部 21 ~ 24, 27 ~ 29, 33, 69, 114, 121 ~ 123, 129, 136, 142, 225
- 自由化思潮 167 ~ 168
- 资本论 245
- 最高权力机关 262
- 组织文化 349, 354, 356

后 记

这是一本跨越了三个学习时期的书稿：在我 2004 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不久，博士生导师吴恩远教授有一天很严肃地问我，是否愿意就苏联历史中某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做深入研究。作为一个从东北小城不小心“闯”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习的人，我并不清楚导师所说的“重要问题”有多大分量，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完成好，但知道人要有社会责任，做学问应该有社会担当。既然导师认为很重要，那就“试试看吧”——这一“试”就是十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研究生，到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博士后，再到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的访问学者，十年间我一直围着苏联历史和俄罗斯问题“转”，“走”得很辛苦，不过最终收获了还算成型的成果，并且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可以顺利出版，自感欣慰。

在这十年间的“路上”，我与无数人邂逅，有的只是一面之交，记忆不深；有的是某一个阶段的同路人，走过那一段路也就各奔前程；更多的是在人生的路上或多或少地扶助我、提携我、尽其所能帮助我的人。在书稿将要面世时，“盘点”这一路所得，深深感到，出一部专著对我来说固然是一个不小的成就，更大的成就还是收获的那些沉甸甸的关心、爱护与帮助。

感谢博士生导师吴恩远教授。是他将我领入（苏联）俄罗斯历史的研究之门。吴老师在学术上十分严谨，入学之初就谆谆教导我，要学习首先要做人，做一个有道德有良知的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学术研究，勤奋并敢于提出新创见，但无根据的话不能说，“文章不写一句空”。这些教诲不仅在博士学习期间使我获益，也成为我后来从事学术研究恪守的准则。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还追随张宇燕教授学习社会科学一般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张宇燕教授的课堂总是最受欢迎的课堂之一。因为他不仅教给学生经济学知识，还教授社会科学研究方

法；不仅以指导自己的学生为工作，还把提升所有学生的学业作为自己的责任。这是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教授的为师之道。正因此，张宇燕教授的课在研究生院“屡讲不衰”，也让我这个当了十几年教师的人对教师之角色有了新的理解。

同样扶助我的，还有张树华教授。近些年的很多研究和写作都离不开与张树华教授的探讨。有时他会直截了当地提出批评意见，更多的时候则是鼓励并帮助我做出清晰判断与选择。他的见解成为书稿中与政治学有关的部分内容的原初观点。

除了这几位老师之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期间，还得到原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于沛教授、廖学盛先生以及其他老师或同学的指点与帮助。他们的关心与爱护，使我时时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世界历史研究领域的“行路人”，并相信走在这条路上始终有人陪伴我。

此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唐少杰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张建华教授也都一直在关注我的每一项成果，不断给我鼓励与支持。对他们，我也心怀“敬意的感激”。

研究苏共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党员的情况，不到这个国家去接触和了解那些亲历苏联解体的老党员当年的所思所想，还有今日学者们的认识，就如同纸上谈兵。为此，2014年4月至2015年3月，我到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做了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在此期间，多位俄罗斯学者与同行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让我在这片异国土地上每天都能感受到善意的关心。首先要感谢的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著名汉学家米哈伊尔·季塔连科院士，他始终关心我的研究，无论多忙，只要我去拜访，都会抽出一点时间耐心地回答我的提问。他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以及为中俄友谊所做出的贡献，必将使他赢得越来越多后来者的爱戴和尊敬。

我在俄罗斯科学院访学时的指导教师弗拉基林·布罗夫教授、弗拉基米尔·舍甫琴科教授都给了我最大的支持和帮助。作为熟知中国国情的汉学家，布罗夫教授主动承当了指导、带领我的责任，连同他的夫人索菲娅女士一道，为我在俄罗斯的学习和生活竭尽全力提供帮助。舍甫琴科教授则在学术上为我“把关”。此外，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的亚历山大·舒宾教授也把给我讲授苏联历史作为自己的一份责任，每一

次拜访，他都会拿出几个小时的时间，条分缕析、深入浅出地回答我的所有问题。

2014年6月的一天，我跟随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历史虚无主义与苏联解体”摄制组来到莫斯科城北，拜访了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原副主任、精通汉语的叶夫盖尼·格拉奇科夫教授。他为我们一行详细讲述了苏联解体前后一个苏共党员对苏共、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对当前俄罗斯社会思潮的认识。他一再强调，共产党在其执政过程中，总是要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只有这个党才能领导俄国走向胜利和辉煌，没有了苏联共产党，苏联也就没有了联结各个社会阶层的纽带。他谆谆告诫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走向未来的保证，一定要尊重、珍惜、爱护自己的党。在采访将结束时，他还拿出自己始终保存的党证，告诉我们，苏共失败、苏联解体20多年了，他一直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现在，请张树华院长代他向中国的“党”转交党证。时过一年多，那一感人场景历历在目。

在俄罗斯访学时，我还有幸认识了原立陶宛共和国党的第二书记、如今的历史研究学者弗拉基斯拉夫·施维德教授。他在做了两次手术、只能侧身靠在沙发上的情况下，给我上了两堂有关苏联历史的“大课”。作为苏联时期的高层领导干部，他头脑睿智、思维敏捷、表达清楚，而近些年对“卡廷惨案”以及戈尔巴乔夫时期一些历史人物与事件所做的深入的史实考证，让我不能不敬佩他的渊博学识。

除了这些教授和学者之外，还有一些俄罗斯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给了我诸多帮助：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拉伊萨·奥巴金斯卡娅女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塔玛拉·卡尔加诺娃女士在我需要的时候总是竭尽全力地帮助我；为了查找档案材料，我在大约半年的时间里，几乎每天都“泡”在俄联邦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里，瓦列里·舍彼廖夫副馆长以及档案馆其他工作人员不厌其烦地帮助我查找材料，而他们对成千上万份档案材料的熟悉，对本职业务的精通不止一次地令我惊讶。当时，我还抽出部分时间到俄联邦现代历史档案馆查找苏共党史的资料。由于情况特殊，每次去那里，工作人员都要不辞辛苦地上下楼接送我，令我为她们的善意和敬业而感动。同样辛苦的，还有列宁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她们也不厌其烦地为我准备材料，给我提供帮助。如今，虽然已

经回国，但是在俄罗斯的生活使我对这个国家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对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充满信心。

这本书是同名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没有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这项研究也不一定能顺利地完成。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科研处的同事们对我的支持，也感谢院科研局项目处金朝霞处长、汤井东老师为我们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所做的辅助工作。正是他们的默默奉献使我们能够安心并有信心做好科研工作。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曹义恒编辑对书稿所做的相当专业和十分认真的编辑与修改。还要感谢课题组成员对我的支持，以及在访学前后，孔江女士、武卉昕教授、李瑞琴研究员、金哲博士、曹滔编辑等同事和朋友的支持。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家人。我的父母都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经历多年考验后才被接纳入党的党员。他们对党的信任，对自己所从事工作的热爱，在几十年间始终影响着我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的认识，他们的鼓励与支持使我能够积极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困难。更要感谢的是，几十年间，所有家人都在陪伴着我，并且这个“队伍”越来越大，像我们的国家，越来越有活力，越来越有朝气。很庆幸我能生活在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国家和这样的时代。感谢生活给予我的一切！

尽管得到诸多师长和朋友的支持与帮助，书中的错误也许还有不少，全部责任由我本人承担，也诚恳期望得到同行的批评与指正。我的邮箱为 Liyan939@163.com。

李 燕

2015年夏于西坝河